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九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目　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关于揭破远东慕尼黑新阴谋——

（一九四一年五月）

（一）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反德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华三国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之，反对之。

（二）以迫蒋投降为目的的日本军事进攻，日本现已宣告告一段落，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活动，这是敌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老政策的重演，我们必须揭穿之，反对之。

（三）与日本军事进攻同时采取的谣言攻势，如谓八路军不愿与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等等，是日本挑拨国共关系以利诱降的诡计，中央社及国民党报纸照抄散布，不惜与日本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其用意所在，殊属可疑，我们亦应揭穿之，反对之。

（四）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不发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中央军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作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之武力与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之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与投降主义者。

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解放日报》社论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四时，国际局势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变，疯狂的德国法西斯蒂开始了向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罪恶滔天的强盗的军事进攻。法西斯的猪嘴不自量力地侵入了伟大的光荣、和平、幸福、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的乐园。

不论法西斯蒂的盗魁在自己的宣言中怎样地企图以“苏联首先破坏国境”之类的卑鄙无耻的谎语来欺骗世界人民和蒙蔽世界舆论。可是正直的冷酷的铁的事实告诉全世界一切人士：背信毁约燃起战争之火的乃是疯狂的法西斯暴徒。不管德苏协定存在，不管德国政府对于苏联政府之履行条约义务无辞可借、无口可借，不管事先法西斯德国根本未尝亦不能提出任何口实，更不管未经宣战，乃竟野蛮地向苏联攻击，侵入苏联国境，出动空军轰炸苏联城市 德国法西斯象小偷一样地开始了反革命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人类历史上最卑污的罪恶行为。

无疑地，德国法西斯蒂这种罪恶行为必然将得到其应得的惩处，这种自掘坟墓的疯狂举动将永远埋葬掉法西斯制度。德国的法西斯将德国变成为人间地狱，剥夺了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无数德国的优秀的儿女丧身在法西斯的苦刑下和集中营里；他们残酷无情地驱使人民走入战争的灾祸，蹂躏着欧洲的许多民族，使他们陷于饥饿、流浪、贫困、死亡的深渊中；在广大的欧洲领土上正酝酿着反对法西斯反动和残暴的烈火。这个置身火山之上的法西斯竟向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动疯狂的冒险，其前途若何当不待龟卜。不仅二万万的苏联公民将像一个人一样亲密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周围，在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保卫光荣自由的祖国，不仅苏联的红军红海军及空军神鹰将以高贵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热忱，英勇地无敌地以二倍三倍的打击来教训那疯狂的侵略者，不仅苏联人民和军队有英明的无产阶级战略家——斯大林同志为其领袖和许多久经锻炼的布尔什维克指挥者，而且全世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将完全地站在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共同努力粉碎和葬送现代的中世纪式的野蛮暴君制度，而且德国人民亦将一定在真理和正义的旗帜下与苏联人民站在一起，来恢复那为法西斯暴君统治所染污了的美丽山河，来挽救那产生过康德与黑格尔，歌德和席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而为那希特勒和戈林等流氓推上毁灭之途的德意志！

我们——在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坚持地进行了四年民族战争的中国人民，在这抗战的四年中，深切地体会到苏联人民及政府给予我们的伟大同情和雄厚的援助的中国人民，当此德国侵苏战争开始之时，即毫不迟疑地，寄无限的同情于伟大的苏联，并愿追随苏联援华的光辉范例来援助苏联人民的祖国战争，诚恳地预祝他的正义战争的胜利，我们深信，为正义、为自由、为社会主义而战的苏联，必然能完全粉碎纳粹暴徒的狂妄的冒险，胜利是苏联的。

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周 恩 来

世界的惊人巨变，已因纳粹德国毫无信义的突向苏联进攻而爆发了。二万万伟大的苏联人民，已在苏联政府及斯大林的号召之下立即起来应战。战争就这样于六月二十二日在苏联西线开始，战线之长达二千五百英里，双方动员兵力之多之强，将成为全世界空前的一战。这不仅在数量上说是空前的，而且在质量上说也成为世界战争的转换点。这一战争，一方面站着纳粹德国及一切法西斯的同谋者，另一方面站着全苏联的军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和苏联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民民族和国家；前者是企图在击败苏联的基础上，继续扩张和达到他侵略和奴役全世界人民的血腥统治的目的，而后者则是为保护苏联，也同时为保护全世界人民和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前者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后者是正义的自卫战争。这一战的胜负，关系于全苏联并且是全世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苏联胜了，不仅苏联而且全世界被奴役的人民和民族都要得到自由和解放；纳粹德国胜了，将见全世界陷于黑暗的深渊。所以世界战争进入到苏德战争的新阶段，已经是历史上的新时期了。在过去，在西方，英德的争夺战是主体，而许多弱小民族国家却被法西斯侵略者所侵略所蹂躏了。在现在，法西斯侵略者的战火已转向苏联，苏德战争已成为主体，苏联已站在全世界反抗法西斯奴役斗争的最前线，背负着保卫全世界自由的重任，而被法西斯奴役的人民和民族，将得到恢复自由独立的机会，甚至被纳粹攻打的英国，也得到喘息的机会，这些事实，虽然成为世界战争中新的分水线。因此，全世界一切痛恨法西斯主义和压迫的人民民族和国家，都会认识苏联人民的奋斗，也就是他们应该参加的奋斗，邱吉尔说得好，“苏联的危机，即是英国的危机，同时亦为美国的危机”，扩大来说，也就是全世界的危机。苏联的人民已在前线，继着而起的，我们已看见来自全世界的同情苏联的呼声，这是一种新气象，新的反法西斯主义的高潮。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四年来久已站在反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前线，更会不落人后的将自己抗战的胜利和苏联抗战的胜利亲密的联在一起，共同努力于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事业的成功。

这次苏德战争的爆发，完全由于希特勒背弃国际信义撕毁德苏条约的一手所造成，而苏联则一贯的坚守信约，履行协定，决未向纳粹德国作任何的军事挑衅，这已为举世所公认。但苏联这种履行条约的精神，并非自缚其手足。苏联的国策一向是为阻止战争制裁侵略而斗争。当慕尼黑会议，集体安全制度被破坏以后，帝国主义战争已成为不可避免，于是苏联仍坚持其和平中立政策，与德意日先后缔结协定，以避免战争扩大。但这并不是说苏联便减轻了对于法西斯国家的警戒，两年来，苏联国防力量的加强，尤其是最近半年苏联政府的重要措施，提摩盛科“五一”的文告和演说，都说明苏联并未忽视在此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

谁将是越境窥伺的侵略者。这也更不是说苏联便因此改变其对于为民族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族的援助政策，两年来苏联对波兰境内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犹太民族的解放，对波罗的海三小国及比萨拉比亚等地之归还苏联版图，决没问纳粹德国是否愿意，而苏土宣言，苏南互不侵犯协定，以及对于罗马尼亚，对于保加利亚，对于匈牙利之出卖民族独立利益和追随纳粹德国之后的谴责声明，更不管纳粹德国是否高兴，这犹之苏联缔结了苏日中立协定，并不改变他援助中国的政策一样。谁说苏联两年来是在助长侵略而不援助被法西斯奴役的人民，这完全不是事实。并且也正因为这种原因，希特勒始终不能放心苏联立于战争之外。但是希特勒何以不在德苏协定以前反而在欧战进行了将近两年之后进攻苏联呢？两年前，慕尼黑会议，暴露了英法不仅没有制裁侵略的决心，而且还破坏了集体安全的可能，以自俯于侵略者，这自然使希特勒向易于进攻的方向动手。现在战争扩大了，美国一天天的走入战争，希特勒不能马上渡海攻英，而向埃及或近东发展，更有重兵远出的顾虑，于是遂不顾一切的先想从扫除苏联的威胁入手，这是一。战争走向持久，纳粹德国虽侵占了十四个国家，但其资源并不够纳粹德国的持久消耗，而欧洲粮食的恐慌，亦已造成大多数国家的饥饿，于是希特勒便迫不及待的向苏联伸手，企图夺取乌克兰的仓库和高加索的油田，奴役苏联的人民，以便继续他征服全世界的长期战争，这是二。两年来，法西斯蒂的黑流，和其血腥的统治，已经引起法国人民中尤其是被奴役的民族中的深刻不满和革命酝酿，而日益趋向于迅速结束战争，为人民的和平独立自由而斗争，于是希特勒便因为恐惧于此反法西斯的革命运动的生长，而迫不及待的想先从打击为人民的和平而斗争的大本营入手，以阻止革命发展，这是三。还有“英美上层阶级的反苏情绪”（“大公报”语）的存在，也颇利于希特勒的煽动，以便他转过头来先打苏后打英美，而收各个击破之效，于是赫斯奔英，便揭露了这个阴谋，而成为反苏暗流的最高峰，这是四。所有这些，都是大家意料中事，而所成为意外的乃是希特勒何以在英德并未妥协之前，敢于两面作战？这由于没有估计到希特勒在军事上，如果不在夏季动手，延到秋冬之间他便无法东进，只有等到明年，但在经济上又不容他等到明年，而政治上英美亦非一无弱点不能供其利用者。在英国，有所谓达维斯多克对德媾和的计划（二十五日伦敦合众电），在美国，斯克利泼霍华德的报纸，在德苏战争开始前就宣称，“这就是我们可以赞许的一种战争”。因此，希特勒就在这些基础上，爆发其最大的冒险的反苏战争。希特勒的意思是在说，我先打给你们看。实际上不管其战争进行得如何，只要战争还在进行之中，希特勒总不会放弃其对其他国家的和平攻势的。暗流虽是暗流，但我们总应该警戒这一暗流，才能使新的反法西斯主义的世界主流，得以汹涌澎湃的前进。

现在战争已爆发了一周，根据莫洛托夫的文告，根据全苏联人民热烈的响应，和对于敌人的愤怒，根据苏联红军红海军空军在前线的英勇抗战，证明苏联全国军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是有准备有力量能击退纳粹德国疯狂进攻的。苏联民族历史上屡次击退外来侵略的英勇传统，十多年来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力量，苏联全国军民坚固的团结，苏联布尔塞维克党、政府及斯大林的领导，全世界同情苏联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后盾，都是保证苏联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但是苏联的人民知道，进攻苏联的敌人是强大的敌人，苏联并不希望轻易致胜。苏联人民很勇敢的面向法西斯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当着最艰巨的阵势。他虽不愿为帝国主义的争夺去火中取栗，但他为苏联的存在和发展，为全世界人民的独立自由，却不惜重大牺牲，以争取人类的真正和平，这是社会主义的侠义行为。

战争的发展方在开始，我们已经说过：“其战果决不是短时期所可看出，更不是几个仗

便见分晓”，但是我们可预言的是时间有利于苏联。纳粹德国利在速决，故一开始便攻势甚猛，企图仍以闪击战达到其两个月征服苏联的狂言。苏联的战法，不论是拒之于国门之外，或是引之深入，只要苏联的主力在，人力在，物力在，时间一久，法西斯侵略者必然要遭受最后的惨败。故我们对苏德战争，不能以一时的出入胜负为断。同情苏联的人，因为不知苏联的究竟实力，有为苏联着急耽心的，这是一种好意，应该向他们解释。然而也有幸灾乐祸的人，以苏联败了为高兴的，那真是别有用心，应该归入法西斯之流。还有认为不管苏联胜败如何，都于我们有利的，那更是有害的思想。试问纳粹德国如果胜了，他将与其东西盟友日意法西斯强盗共同征服世界，我们何能幸免？

我曾说而且也很希望：“战争仍然循着最直接的战争轨道前进，暗流总是暗流”。虽然将来的变化还多，而且我们还应时刻提防着暗流的生长，但是目前英美的态度还总是反法西斯主义的。尤其是英相邱吉尔的态度很坦白，他知道对德妥协，不仅欧洲霸权无法取回，便连非亚属地在德胜苏之后，仍然有被侵入的危险，而联苏作战，不仅可以利用目前喘息的机会巩固英伦及北非近东的阵地，而且在反法西斯蒂的斗争中，还可维持英国某些利益。我们认为英国这种态度应该更求彻底，对于过去一贯反苏而又亲德的份子应该肃清出去，以免中途变卦，对于国内人民应恢复其民主权力，对于其属地人民，应给以解放可能，以便真正有力的动员人民的力量反对法西斯的侵入。对于苏联，英国正在进行其援助的协商，但最有效的还是军事上的协同动作，而空军的轰炸，海军的牵制，又为最重要的步骤。美国方面，确实是松了很大一口气，海长诺克斯既说德苏战争对于美国有利，两孤立派议员更大叫美国从此更无须参战，这就使罗斯福的对苏态度和援苏政策来得更加谨重，太平洋上的变化，也使得罗斯福要有所待。

然而不管怎样，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英美应该与苏联建立共同的阵线，这首先必须求得政治上的谅解，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向着为消灭法西斯统治以求得各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为着这个目的，必须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参加，才能保障其实现。

在轴心国方面，法西斯意大利已经成为纳粹德国的附庸，亦步亦趋的跟着希特勒走。而东方法西斯强盗，则向具有半独立性的作用，尤其因为缔结了苏日中立协定，所以连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事先都不知道，事后松冈所受到的打击，可以想见。现在日寇正处焦急徬徨等待之中。目前最大的可能是北进攻苏，这由于亲德派及反苏份子现在正好集中在这一焦点上，而维持现状派之反对武力南进，也正可作为他们转向北进的根据。但是北进也并不是没有困难和顾虑的，第一、中国问题将因此更陷于不能解决之境；第二、西伯利亚并没有象南洋那样多的国防资源；第三、时间上不很易于侥幸成功，万一拖长，则日寇的另一泥足又要陷于冰天雪地之中；第四、万一英美在其发动攻苏后，实行太平洋上的封锁，岂不陷于前后绝境?!并且武力南进虽然暂时搁起，但是经济妥协并非不可能的。何况在英美人士中，也并非无人主张对日妥协以拉其疏远或退出轴心者，这点也颇能眩惑日寇，使其想先拿住南洋资源然后再图北进，可是时间上又何能许?!因此，遂形成日寇目前的焦急徬徨和等待。而近卫松冈内阁也便在动摇不定之中，不过，德意法西斯蒂，却策动其北进不遗余力，所以日寇攻苏的危机是增长的，我们应该严重注意他的政治军事动态。然而不管日寇发动北进与否，对于已在他侵略下的我国，绝对不会忘怀，不会罢手，这是很显然的。他对我们的政策仍然是两面兼施，一打一拉。打的方面，有可能在配合其准备北进的步骤上，加紧华北的“扫荡”战，渡河侵犯郑、洛、潼关，或沿长江出击，以便在压迫我们之后转移兵力北进。拉的方面，

有可能采取一些形式上的让步，诱我投降，引我分裂，以便其先集中力量北进，然后再回师灭我，这是最毒的一着，也是我最应警惕的一着。

总之，世界风云变得这样急，这样大，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已屹然不动的坚持了四年，现在更不应受这个风浪波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并运用我们站在东方反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前线地位，联合东方一切反法西斯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结成更广大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肃清一切反苏反共及对日妥协的有害思想，以打倒东方法西斯蒂头子的日本强盗。在东方，英美的地位也显然增高了。过去，我们因为了解英国对德作战的困难，故只望英国不再对日妥协，而现在则较有可能加强其远东反日的力量，加增其对我的援助了。过去，我们因为了解美国不愿两洋作战，要先对德后对日，故也只望美国对日禁运，不再妥协，而现在则更有可能断绝一切对日妥协的念头，彻底对日禁运，加强对我的援助了。有人提议，中美英苏应该结成同盟，当然是很好的，但我想在今天的英美政府，是不会接受不能实现的。不过我们最小限度的主张：不再对日妥协，实行对日全面禁运，加强对我援助，准备太平洋上反法西斯主义的自卫力量，“共同制裁日寇”一个要求，这总应该可以作到，而我们更应联合起英美人民结成太平洋上反法西斯阵线，以求其作到。

还有，因为苏德战争及日本有北进可能而引起的一种过分乐观心理，这在我们四年抗战中已屡次证明是有害的心理。德苏战争，德国法西斯主义者所打击的正是四年来助我最多的友邦，而遭到战争惨祸的正是二万万为世界和平民族自由奋斗的人民，我们不仅在患难之交上同情这个朋友，便在援我的意义上，我们也要受到一些影响，但这里我们要声明一句，苏联的援助历来是助我整个民族，给我国民政府，而决不如上海哈瓦斯电讯所说，中国共产党系依靠于苏联的援助而存在的。至于估计到日寇北进，我们更不应因此过分乐观，致使放松对外，转而对内。我们应该乘机努力，加紧国内的团结，改善政治上的设施，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尤其是要加强军事的力量，国防的生产，以便一方面能有力的抗击敌人的进攻，收复一些据点，另一方面，在敌人果然北进时，我们也可配合友邦，实行反攻，击败敌人。

只有这样，我们的抗战，才有胜利的前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东方坚持反法西斯的大纛，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与苏联成为反法西斯的战斗共鸣，才配称得起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儿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

全国同胞们，抗战将士们！

我伟大中华民族为抵抗日寇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已经整整四年了。当此抗战第五年到来之时，正值国际形势发生严重的变化，疯狂的德国法西斯罪魁希特勒已经大举进攻苏联，苏联政府正在统率二万万人民与数百万红军举行粉碎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争。

同胞们，将士们！苏联这一反法西斯的战争，完全是和我们的抗日战争属于同一性质的，都是保卫独立、保卫自由、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而在德国法西斯方面，则与日本法西斯进攻中国完全相同，乃是侵略的、奴役的、非正义的。因此我们与苏联是完全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

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苏联的同情，迅速散布于全世界。而在我国人民，则关切之情，尤为深至。一则因为苏联是扶助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四年抗战，助我最多最力者唯有苏联；再则因为苏德战争直接影响我国的抗战，希特勒如在苏联得逞，则中国即将遇到严重的危机。故我国人民，咸知苏联人民所进行的战争，不但是保卫苏联的，而且是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之自由独立的。苏联的成败，即是中国的成败，即是一切民族之民主与自由、独立与解放、公理与正义、科学与光明的成败。而希特勒则不但是苏联的敌人，而且也是一切自由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敌人，因而打倒希特勒，不但是苏联人民与各国人民的任务，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任务。毫无疑义，法西斯希特勒的疯狂进攻，适足以加速其死亡，法西斯的敌人已遍布于全世界。一个强大的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正在全世界树立起来。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

欧洲的法西斯国家，为着拉拢日本，巩固法西斯同盟，反对中、苏、英、美之目的，不惜明目张胆，承认中国叛逆汪精卫，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魔爪现已伸向太平洋，其为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与全人类的公敌，实已暴露无余。而法西斯日本西陷中国泥淖，南与英美抗争，经济衰颓，民心怨愤，如又欲撕毁日苏中立协定，树敌于伟大之苏联，则其死亡崩溃之日，必愈益临近。惟其情况愈危迫，则横决以求一逞之心，必愈难阻遏，反苏之危险固已增长，灭华之方针则决不放弃，南进以侵犯英、美、荷、澳之野心，亦依然存在。法西斯同盟对于全世界的威胁，西方与东方同时增长。惟有建立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基础之上的坚决的斗争，方能制凶焰于已燃，挽狂澜于既倒。一切幸灾乐祸侥幸取巧的心理，均属浅薄无识之表现。至于张伯伦复辙的重寻，汪精卫后尘的学步，所谓绥靖政策与投降路线者，尤为愚不可及之下策，宜为中国与欧美民主国家所不取。中国人民对于远东慕尼黑的危险，是永远坚

持反对的。

我伟大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日战争，不独为了挽救自己祖国的危亡，亦且有助于国际反抗侵略的奋斗。四年以来，全国军民奋起抗战，不顾牺牲，不怕困难，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渡过了许多的难关，卒能使敌寇胆寒，环球心折，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产生了新生中国的雏型。此皆我上下同心，军民协力，党派合作，友邦增援之所致，值得我们欢欣庆祝，大书特书的。

然而敌人之进攻方兴未艾，协以谋我者，且有凶恶的法西斯同盟，南京之傀儡既为虎作伥，内部的亲日分子复诪张为幻，政治犹未澄清，民生愈见凋敝，党派仍有磨擦，民意尚未伸张，各种惊心怵目之阴影，竟有越来越大愈闹愈凶之势。尤可异者，反共成为政策，“异党”见于文书，军纪军令之美名，却假以打击抗日部队之最积极者，于是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被解散了，特务横行，非法逮捕之事层出不穷了，抗战之元气为之斫丧，抗战初期之新气象因而挫折了。凡此阴暗方面，如不加以消除，则抗战四年的成绩有中堕之忧，全国军民有无所适从之感，而国际同情亦将失所附丽，这是国人应该深切警惕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当此抗战第五年开始，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之时，正我除旧布新的良好机会，全国人民必须执行许多重大的战斗的任务，从外交以至内政，皆宜有新的改革与建树，方足以适应目前形势，一新国人耳目，达成抗战建国之目的。本党不敏，谨陈如下各端：

（一）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

（二）加强反对汪逆傀儡政府的斗争，肃清汪逆余党，巩固抗日阵营。

（三）加紧全部国军的整理训练，加强前线各军的配合作战，接济敌后各抗日部队的军饷弹药，积极反攻敌人。

（四）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设施，由政府予以援助，俾能长期坚持于敌后，使敌人无法抽调兵力西进、北进、南进。

（五）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合作，调整国共关系，解决新四军问题，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活动，停止逮捕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份子，消弭内部磨擦，培养抗战实力。

（六）给一切爱国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发动民智民力，反抗敌寇。

（七）改革政治机构，罢免贪官污吏，引用开明人员，从政府机关中淘汰暗藏的亲日份子，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

（八）禁止贪官污吏奸商劣绅囤积居奇，操纵国民经济，实行调剂粮食，平抑物价，以苏民困。

（九）改革兵役动员制度，禁止敲诈、贿买、强迫、虐待，代以鼓励人民上前线的政治动员，以利抗战。

（十）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信用本地人才，团结少数民族，以固后方。

本党认为上述各项，实为今日内政外交之基本方针，如能见之施行，则全国之气象必焕然一新，一切困难皆可克服，抗战建国之胜利便有了坚固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声明：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对于三民主义与抗战

建国纲领，本党实为最忠实最坚决的执行者。本党对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实践到底，决无丝毫违误之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国军的一部分，最忠实最勇敢的执行抗战任务，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人，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敌后的许多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一步一步的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各党派各阶层合作的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保证一切抗日阶层（包括地主资本家在内）的人权政权财权，实行了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农村政策，实行了一方面改良工人生活，一方面加强劳动纪律的劳动政策，实行了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的经济政策，实行了消灭文盲愚昧、提高民族精神的文化政策。凡此一切，无一不在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保卫祖国的先锋队，是言行一致的革命政党，是团结抗战的模范，是艰苦奋斗的典型。而敌人汪逆与亲日派则集矢于本党，务欲破坏之消灭之而后快，盖彼等深知本党之存在，实为其灭华计划之最大障碍，如不灭共，则断断不能灭华。所可怪者，一部分尚在抗战的国内人士，其污蔑陷害与破坏本党之心，竟与敌人如出一辙，称之为匪军，谥之为奸党，摧残镇压，不遗余力，大敌当前，相煎何急，诚有令人百思不解者。所望此等现象，迅速加以消除，回复抗战初期之状态，化戾气为祥和，易相克为相助，共以国家民族为重，则抗战前途，光明立见，抗战第五年的局面，必可变为团结进步胜利的局面，这就是本党所馨香祷祝的。

同胞们，将士们！抗战的第五年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年，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大家应该警觉起来，特别团结，特别努力，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脚踏实地，向前奋斗，配合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我们的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完全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努力，不犯错误，我们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法西斯奴役！

援助苏联！

抗战胜利万岁！

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解放日报》1941年7月7日）

中央一九四一年七月政治情报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

（一）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与苏联为保卫祖国的反德战争，是目前世界政治转变的枢纽。过去两大帝国主义营垒互相冲突的帝国主义战争及苏联采取和平中立政策的局面，从此改变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局面。一方面是以德国为主体、以意大利和日本为帮凶的极端反动势力，另一方面是苏、英、美、华及其他为民族自由独立而奋斗的反法西斯势力。

（二）法西斯阵线方面，因为过去英国的张伯伦政策及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大资产阶级的无能与投降叛变，使希特勒德国强大起来，奴役了欧洲十四个民族，现在他更想战胜苏联，进而征服英美和全世界，所以法西斯阵线成了苏、英、美、华和一切自由民族的非常严重的敌人。在反法西斯阵线方面，强大的苏联红军成了打击法西斯武力的主力，抗战四年的中国则起着箝制日本的作用，英国决定联苏反德，美国援英援华外，并申明尽可能援苏，欧洲各被奴役国家的人民亦正在酝酿反德斗争。所有这些力量所进行的战争及一切斗争，都是为着保卫自由独立的，都是正义的，都已经成为全世界总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而七月十三日订立的苏英协定更将是整个国际联合的枢纽和反法西斯胜利的保障，今后世界政治将环绕这一协定而支配着一个历史时期。

（三）在目前条件下，不论在英、美，在奥、捷、波、法、比、荷、丹、挪、南、希，或在其他国家如瑞典、瑞士、土耳其、伊朗及中南美各国，那里共产党的国内任务，均是动员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和我们中国一样，不分阶级党派，为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们的国际任务，则是为着促成各反法西斯国家的政府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而斗争。各国共产党对于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或国际统一战线，其唯一标准就是：凡属帮助毁灭法西斯军事政治机构和有利于苏联打胜仗的人们和行动都是好的，正确的，应该联合的，凡属妨害达到这个目的的人们和行动，则都是坏的，不正确的，应该反对的。

（四）苏德协定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因为第一，它使苏联得到了一年半时间，以准备反对法西斯进攻的军事条件；第二，它使苏联得到了新的用以抵抗德国进攻的西部领土；第三，它使英、美特别是英国由他们自己的经验中觉悟过来，由反苏的立场转入联苏的立场，使苏联得到广大的反德友军。苏联和整个反法西斯阵线，由于这些条件就对于德国和整个法西斯阵线获得了最后胜利的决定基础。但是法西斯德国究竟是强大敌人，法西斯日本及意大利亦尚有相当力量，苏德战争，中日战争，以及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乃是苏联、英国、中国及一切自由民族生死攸关的斗争，一切盲目轻敌和对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阵线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容许的。

（五）日本在苏德战争后，虽暂时采取静观态度，但它正等待苏德战争与美国态度的结果。它已集中船只于太平洋，调坂垣为朝鲜司令官，从中国抽调一部分军队赴满洲，都是进攻苏

联的准备。我们的任务是尽力拖住日本，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则是配合苏联作战，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六）国民党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是站在同情苏联的方面，国民政府又已与德意断绝外交关系，藉以对抗德意承认汪精卫，这些都是好的，正确的。但国民党中一部分人，仍在对苏联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他们希望早日爆发日苏战争，以便减轻日本对于自己的压迫，同时各地反共活动亦仍在继续进行。虽然如此，但是今天国际形势的主要变化，特别是苏英协定和苏美接近，都在推动中苏关系的进步与国共关系的好转。我们的任务是在于促进这种进步与好转（当然不是说应过早的订立中苏军事同盟）。对于英美在华人员应该积极拉拢，促进国际统一战线。而对于国内任何反苏反共的言论或行动，则必须给予适当的坚决的打击。

中央书记处

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九日）

关于罗斯福邱吉尔宣言及行将召集的莫斯科会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如下：

八月十四日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及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联合宣言及提议在莫斯科召集三国会议，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罗邱宣言及其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表示了英美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决心，这种决心是完全有利于苏联，有利于英美，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的。因为过去与现在的最大危险，是英美内部一部分亲法西斯的反动派，企图违背人民意志，接受法西斯和平，但此宣言拒绝了这种和平。或者主张隔岸观火，让苏联独负消耗法西斯的重担，以便将来乘机取利，但罗邱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以便具体分配战争任务与战争资材之行动，则打击了这种消极的企图。只要英美承认“解除各侵略国武装是必要的”，主张“纳粹的最后崩溃”，同意分配战争任务与战争资材，便保证了苏联与英美的胜利，保证了中国与全世界的胜利。斯大林在其七月三日的著名演说中所谓苏联信守条约德国毁约攻苏之事实，造成了一个长期政治因素，这种因素实为军事胜利的基础，这一真理，在此次罗邱宣言中及召集莫斯科会议的提议中，完全证明了。罗邱宣言及其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特别表明了美国对于参加反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已经下了决心。而美国的这种决心，即是表明了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线已经在政治上完成，而莫斯科会议则将在组织上完成之。法西斯侵略阵线，已经处于孤立状态中，法西斯失败的前途已经确定。目前的这一形势，在一九三九年秋季欧战爆发之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当时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虽然力主组织保障国际安全的反法西斯阵线，但当时英美方面还存在着害人害己的慕尼黑政策，只在残酷战争的教训之后，这一错误政策才改变过来。从直接的因素说来，这是苏联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红军阻止了德军的攻势，使得罗斯福邱吉尔有勇气举行了此次会议，发表了此次宣言。这又是英美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打击了英美内部一部分亲法西斯的反动派，使得罗斯福邱吉尔敢于拒绝法西斯和平的引诱，发表了此次伸张人类正义的宣言，决定了英美苏三大强国坚固联合这种具有政治远见的政策。这又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中国阻止了日本法西斯匪军的进攻，使得英美有勇气声明解除一切侵略国的武装。宣言未提日本之名，宣言的第四条暗示可与日本通商及供给原料，第七条暗示允许日本移民，仍在企图拉拢日本现状维持派，表示其愿与日本妥协的一面，但宣言的第二条反对强制变更领土，第三条主张恢复被剥夺权利的国家，特别是第八条承认解除一切侵略国武装的必要性，这些都是积极反日的。总之，全中国人民都欢迎英美宣言，欢迎行将在莫斯科召集的英美苏三国会议。中国人民相信，这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中国人民的任务在于坚持团结与抗战，克服抗日阵线内部企图破坏团结抗战的反

动因素，积极组织对日寇的反攻。中国内部存在着敌人的第五纵队，这就是亲日派及亲德派，他们违背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在国内倡言反共，完全是响应希特勒的“反布尔塞维克十字军”，为日本法西斯肃清道路。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大团结实行建立之时，此辈第五纵队如尚毫无觉悟，继续其反共反人民反民族反人类的罪恶行为，必为全国全世界所不齿。我们相信，只要全国人民增强努力，肃清第五纵队，则团结便能巩固，抗战便能坚持，反攻便能实现，中国是有资格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而成为一个有力的方面军的。全中国与全人类的命运关系于这一向法西斯主义的决斗，中国各党派应该善处此种千载难逢的时机，团结全国人民，一致向好的进步的方向努力，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深切期望的。

[附] 罗斯福邱吉尔共同宣言（大西洋宪章）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及英王陛下在联合王国的政府代表首相邱吉尔兹已会晤，认为宜将两国国家政策中的若干共同原则加以宣布，彼等对世界更好的起来的希望即寄托于这些原则。

第一：两国不求领土或其他方面之扩张；

第二：两国不愿目睹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不相符合之领土变更；

第三：两国尊重一切人民选择其生活所在之政府的形式之权利，凡主权及自治业已横遭剥夺者，两国愿睹其恢复；

第四：两国将在适当尊重现行义务之情形下，努力促使所有国家，不论大小，无论胜败均能依平等条件取得其经济繁荣所必需之世界贸易及原料；

第五：两国希望促成所有国家间在经济方面之最充分的合作，其目的在使所有各国均获得劳动标准之改善、经济之进步与社会之安全；

第六：在纳粹暴政最后摧毁以后，两国希望目睹和平将告建立，此种和平将予所有国家以在其本国疆土内安居之道，并将保证全世界人类悉可度其终生而免于恐惧与匮乏；

第七：此种和平应使全人类能在公海及大洋上来往而不受阻挠；

第八：两国相信全世界所有国家鉴于现实及精神上之原因，必须终于放弃使用武力。倘在本国国境以外以侵略威胁他国、或可能以侵略威胁他国之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军备则将来和平即不能保持，故两国相信在更广泛与永久之普遍安全制度建立以前，解除此等国家的武装实属必要。两国并愿协助及鼓励其他将减轻爱好和平人民之沉重军备负担的一切可行之措施。

（转自《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

[附] 莫洛托夫在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的闭幕词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日)

比维布鲁克勋爵，哈里曼先生，各代表团团员们，诸位专家们：

我们的会议，在几天中间，已顺利地完成了它的工作。所有当前一切问题，都已达到了全场一致的决议。

因此，请让我代表苏联代表团，向英美代表团，向我们所有的一切专家们，首先应该向比维布鲁克勋爵和哈里曼先生，表示诚恳的感激，他们精力过人，欣然从事，又都具有敏腕。我们这次会议，由于他们帮助，所以才能得到这样显著的成功。

斯大林同志密切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切工作，这是完成这次会议的必要的条件，一方面足以保证现在行将结束的会议获得成功，一方面更足以保证会议以后必能产生最好的效果。

在这几天中间，我们大家都有机会看出了：我们伟大的爱自由的各国人民的生存攸关的利益，已使我们各国团结到如何密切而且有决定意义的程度了；结果使我们在目前正对希特勒恶党的德国进行的历史斗争中，表现出亲密的合作，希特勒恶党的德国，惨酷地奴役各国人民，对外国领土实行侵略的占领，它原来就是靠这样过活的。

目前的会议，是由我们时代的著名政治家——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的发起而召开的。因此，我们应该对于他们表示我们深切的感佩。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发起人的目的，就是要用他们的物质资源来援助苏联抵抗法西斯的进攻，用联合的力量来击败希特勒主义。

关于这一方面，必须着重指出：不仅对纳粹德国作战的大小不列颠，甚至非交战国的美利坚，也一样地认清了有消灭希特勒主义的必要，有用雄厚惊人的物质资源援助苏联完成这件大业的必要。

象英美苏这样的强国的力量的大联合，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呈现着的这样大联合，就已大致预定了我们对希特勒匪徒的斗争必然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不管希特勒匪徒在战线的这一阵地或那一阵地取得了多少暂时的胜利，而最后的胜利总一定是我们的！

莫斯科会议已由它的决议案昭示我们：供给苏联国防之用的兵器和最重要的物资，先前就已开始运来的，今后更应该而必定广泛的经常的运来，这些运来的飞机、坦克、和其他军器配备以及原料，将来必定增加，重要性必定逐渐扩大，在这里希特勒匪徒的估计又失败了。

希特勒违背了他自己的心意，反而加速各主要民主国家的共同努力以对付纳粹霸王，因为纳粹霸王不仅对于已经变成了被进攻的牺牲者的那些国家，而且对于在最近将来也就要被进攻的那些国家，都是致命的危险的东西。

苏英美三国代表现行会议，已把当前关于实际援助苏联对希特勒德国作战的一切问题这么一致而迅速地通盘解决了，我们在这件事实当中看出了：友邦的认识是异常正确的，他们都已认清目前正是苏联首当其冲地跟德国法西斯流氓群全面搏斗的时候。我们在这件事实当中看出的保证是：这种援助一定会很迅速地给予我们的，而且规模一定会更加不断地扩大，会跟迫令我们应战的范围完全适应的。

不管希特勒侵略者掠夺自己的人民和被征服的各国，能掠夺到几何，又不管他们用九牛二虎的力量掠夺欧洲，首先从法国开始，他们迫害法国已一年多了，一直掠夺到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依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已变成了希特勒对苏联作新的冒险行动的军事准备根据地了——所有这些掠夺的赃物都要崩成齑粉的！所有这些掠夺的赃物，也决不能够有象我们三个伟大而富强的国家这么雄厚的资源，将直接用来消灭残忍嗜血的希特勒主义，用来清除今日德国社会中的这些渣滓的势力。

我们的会议将在为击败希特勒这个各国人民的刺客而进行的光辉的战斗史里，大书特书永垂不朽！

对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单是切齿痛恨，是不够的；单是一心希望他们劫数难逃，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知道，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进攻、抢夺，我们都要把他们打垮，对他们迎头痛击，以便把所有各族人民所一致咒诅的这批犯罪的暴徒和侵略者的政权永远扑灭。要达到这个目的，就特别需要打破他们的阴谋诡计，这种阴谋诡计的真正本质，就是他们要把他们的敌国挨次地、逐一地个别击破。

这次会议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事实上它已昭示我们：现在应怎样毅然决然地打破了希特勒匪徒的这些阴谋诡计。爱自由的各国人民，由苏英美做先锋，已形成了反希特勒的强大阵线。自尊自大的希特勒，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强有力的各国大联合，他还不曾受到过这种抗拒的威力。我们一点也不怀疑：我们的伟大的反希特勒阵线的实力是会迅速地增强，天下决没有能够打破这种反希特勒阵线的力量。这类国家的大联合已终于形成起来对付希特勒主义了，这种大同盟必将想出种种方法来把欧洲纳粹脓疮，以及它对于一切爱独立和自由的各国人民的威胁，通通从地面上刮除得干干净净。

受了希特勒侵略者最严重的而且最凶暴的打击，这是苏联的逆运，不过我们看出我们对希特勒主义进行艰苦斗争的意义，全世界各国人民已逐渐认识清楚。

苏联在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现在尽解放者的使命，不仅为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解放，而且更为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全世界各国人民宣布对苏联所负重大使命的有力裁判的时候就要到了。今天各友邦的代表人士，已这么广泛地一致承认苏联所负使命的重大了。各友邦的援助，我们深切的了解而且异常珍重。

苏联各族人民，不得不遭遇残忍嗜血的希特勒匪徒不止一次的猛烈攻击，而且在这种战斗里我们已作了重要的牺牲。然而，这种斗争决不曾打破了我们的意志，却使我们的意志更无限地增强了。不顾一切的艰难困苦，在对法西斯主义作战中，我们的军队正发展成不可轻视的力量了，必定能够支持下去，必定能够保卫自己的事业，保卫自己人民的自由，保卫自己的苏维埃国土。

我们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已博得了他国人民的崇高的赞美，他国人民，很自然地，都把我们的斗争，看做是为了所有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共同事业而进行的斗争，所有爱自由的各国人民方面，都对于我们的斗争表示同情和积极的援助，所以用这样飞快的步调不断发展的，正是这个缘故呀！

我要代表苏联政府代表团，并代表所有苏维埃人民，向英美两国代表提出保证：我们对希特勒德国斗争的意志是不屈不挠的！我们对所有一切爱自由的各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必然能取得胜利，我们必胜的信念又是决不可动摇的！（全场鼓掌。）

（转自《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

本月8日日本法西斯政府已经对英美两国宣战，轰炸夏威夷、菲律宾、香港与新加坡，陆军在马来亚北部登陆。在日本宣战后，美国及英国亦已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日本法西斯这种新的侵略行为是与他十年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也是与德意法西斯对于欧洲对于苏联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在罗斯多夫胜利，伟大的苏联红军已经开始进入对德反攻阶段的情况之下，在英美两大强国具有丰富资源与极大军力的情况之下，在我们中国已经在日本侧面英勇奋战五年之久的情况之下，在德意日三国资源将届枯竭内部人心动摇的情况之下，即使希特勒墨索里尼尚能逞凶于一时，即使日本法西斯于其在太平洋作战的初期可能获得许多胜利，并可能截断我滇缅路，还可能对我举行残酷的战争，但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为了这个唯一的目的，必须实现如下各项重要任务：

（一）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

（二）全国军队积极打击敌人，并积极准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

（三）八路军及新四军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的牵制敌人。

（四）向日本军队，日本人民，向朝鲜台湾安南各民族，向中国沦陷区的人民，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更加广大的宣传鼓动，为建立日本内部的反法西斯阵线而斗争。

（五）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合作，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争论，恢复新四军，发给八路军饷弹。

（六）制裁亲日派与亲德派，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

（七）实行民主政治，使全中国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的代表都能在政治组织上担负抗战建国的责任。

（八）加强南洋及各地华侨同胞的内部团结，反对一部分人的挑拨离间行为，同时全体华侨应与各友邦政府及各本地民族协同一致，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1941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

（一）如同本党中央对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所说，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因此，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应当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应当建立宗主国政府与土著民族的亲密合作，同时应当改善各土著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组织其民众，提高其积极性，并开展一切日本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没有这些，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

（二）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

（三）必须大大的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华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团结全体华侨，团结其各阶层各党派，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宣传并拥护祖国的团结抗战，赞助并参加当地政府一切抗日的设施与行动。应该纠正侨胞中及一部分共产党员中的过左倾向，要求他们与当地中国使馆、领事馆及国民党部合作。但对亲日亲德分子分裂侨胞团结妨害抗日工作的行为，必须坚决的但是适当的反对之。

（四）必须努力开展华南敌占区、海南岛、越南及日本在南洋一切占领区域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应尽可能与各抗日友军及英美等抗日友邦的军事行动协同一致，及取得他们在各方面的赞助。游击队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应该符合于反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应该注意防止并纠正各种左的倾向。

（五）在南洋各地的工作，应与当地民族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纠正存在着的左的倾向，广大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附] 国民党政府对德意日宣战的通告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

(一) 对日宣战的通告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二) 对德意宣战的通告

自去年九月德意志意大利与日本订立三国同盟以来，同恶共济，已成一侵略集团，德意两国始则承认伪满，继复承认南京伪组织，中国政府业经正式宣布与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最近德意和日本竟扩大其侵略行动，破坏全太平洋之和平，此实为国际正义之蟊贼，人类文明之公敌，中国政府及人民对此确难再予容忍，兹正式宣布，自中华民国卅年十二月九日午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附]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

巴拿马、波兰、南非联邦、南斯拉夫共同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

对于具体表现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之共同宣言即通称的大西洋宪章中的目的原则之共同纲领，业经予以赞同。

深信为保卫生存、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并保全其本国与其他各国中之人权与正义起见，完全战胜敌国，实有必要，并深信各签字国家正从事于对抗企图征服世界之野蛮与残暴的力量之共同斗争。

兹特宣言如下：

（一）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

（二）每一政府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

凡正在或行将提供物质援助与贡献以参加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之其他国家，均得加入上述宣言。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签字于华盛顿

（本宣言签字国二十六国，如上所列。）

其后加入者二十一国，其国名与通知加入之日期如下：

墨西哥	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
菲律宾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日
阿比西尼亚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伊拉克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
巴西	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
玻利维亚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伊朗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
哥伦比亚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利比里亚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法国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厄瓜多尔	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
秘鲁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
智利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
巴拉圭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
委内瑞拉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六日
乌拉圭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土耳其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埃及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沙特阿拉伯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叙利亚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黎巴嫩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转自《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

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

一　一般问题

(一)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二)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因此必须反对悲观失望，害怕困难，对游击战争消极，对敌屈服的右倾观点，同时又应反对空喊运动战（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空喊决战，急燥盲动，缺乏忍耐持久的韧性的“左”倾观点。

(三)在这一新阶段中，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在根据地建立时期，集中主要注意力于主力军之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然而最近敌我形势改变了，因此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我们的观点还停留在前一阶段上（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及运动战的可能绝对减少，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项英在前一阶段就主张精兵主义是错误的，但如我们在现在阶段还不提出主力的精兵主义，也将犯错误。

(四)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之骨干（即民兵，模范自卫队及青抗先或青年自卫队）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而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百分之三左右。当然这些比率是大概的，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而具体化。为坚持对敌斗争，我根据地之党政军民学各种组织，必须一致努力，来进行上述的军事建设。

二　地方军及军区问题

(一)主力军与地方军之间虽有区别，但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般的说，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区别，在于前者是精干的正规部队，担任较大的战斗任务；后者是游击性极大的地方部队，担任分散游击的任务。前者是统一指挥的，不限于地区的部队。后者是分散指挥的，限于一定地区的部队。

(二)在根据地创立与扩大的阶段，集中全力扩大主力，主力兼军区地方军之指挥，建制亦属主力军，是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已变，故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关系也要改变。地方军应有独立的建制及指挥机关，即军区与军分区。但主力帮助地方武装之责任，不但仍旧不变，且应较前加重。主力军在缩编（不是扩编而是缩编）与充实自己的编制时，应依照前面“一般问题”中所说的比率，以相当部分部队划归地方军建制（但部队名义不一定要改），主力军应给地方军以许多的干部、枪械、弹药等等。在作战时，主力军应规定地方军的一般作战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军是受主力军指挥的。主力应帮助地方军训练部队。但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建制又是彼此独立的，主力军绝对不应该吞并地方军。至于主力军按照比率，遇有损失应加补充时，须由自卫队、民兵、地方三方面酌量动员抽补，以维持相互间应有之比率为原则。

(三)地方军之数量，按照前述比率建设之，但一般最低数目，仍有特别指示之必要。兹规定区应有约五十人枪的区游击队，县应有约二百人枪的县游击营，分区应有约二千人枪的独立营团。区游击队归区的党政机关指挥；县游击营归县的党政机关指挥；分区则应成立指挥部，不由主力兼，地委书记应兼分区政委；军区则由主力兼，或单独成立指挥，但无论主力是否兼任军区一级，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建制仍是各自独立的。在战争频繁地区，区武装应坚持本区，县武装坚持本县，分区武装坚持本分区，反对逃跑主义（因真正情况不利，暂时移动者，不在此例）及随便调跑。在根据地腹地，区县游击队应同时受分区指挥，到游击区去活动，以锻炼自己和准备将来。在山岳中心地区，过去敌人少到的，应估计到今后必到，迅速建立区县武装，不可再缓，但其人员武装数量，可较少于平原地区及边境地区。

(四)地方军必须真正地方化，其主要成份尤其主要干部应是本地的，故培养本地干部，由地方党输送优秀的本地干部到地方军去，乃是头一等的重要任务。地方军之斗争方法、政治工作、服装等等，均应适合本地情况（即尊重地方性游击性）。故空喊正规化，机械的将主力的一套搬运到地方军中去的办法，是不妥当的；限制地方军之独立活动，授以不能胜任的作战任务的指挥方法，亦是不妥当的。

三　自卫队及民兵问题

(一)为加强各根据地广大民众的自卫武力，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必须更加认真的建立自卫队和民兵；这是目前敌后根据地军事建设上一个极大的问题。但迄今各根据地（除晋察冀外）在这一工作上尚未收到应有的成绩。今后务须加紧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否则各根据地必将遭受莫大的损害。

(二)自卫队和民兵（包括模范自卫队和青抗先）都是广大民众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根据

地、不脱离生产的武装自卫组织，但二者的范围与任务却互有不同。在根据地内凡年在十六岁至五十五岁者，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均应登记，编为一般自卫队队员或妇女自卫队队员（当然要注意政治动员，不能单靠强制）。此种自卫队之基本任务是进行群众游击战争，维持根据地内的治安，担任抗战勤务（如运输、担架、送信、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等）。

（三）民兵则是自卫队的骨干，它是下层人民武装中的高级组织，是由模范自卫队与青年抗敌先锋队两种群众性的组织，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所有身强力壮、愿意武装杀敌的男子，均可按自愿原则加入。其任务是侦察敌情，独立自主的作战，及配合主力作战，袭扰敌人，封锁与围困敌人的据点，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少数敌人与武装汉奸之活动，在敌人进攻时领导自卫队掩护群众转移等。

（四）自卫队是全民的群众组织，应按队员居住地区编队，分为中队、分队、小队，人数可不划一。而民兵的编制，则应在可能范围内力求各单位有比较整齐的人数，以便于作战与训练。

（五）自卫队与民兵应由各级（由边区到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统一领导。这种委员会是由各级人民武装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民主集中的组织，不应采取委派办法。在边区范围内，在武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民兵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县区村各级应分设队部，内部生活应悉依民主原则，各级负责人员均应由选举产生，切勿委派。

（六）整个下属人民武装均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内部生活的民主制度，军政机关不得干涉与代替。但在执行各项基本任务时，应由政府经过同级队部指挥之。民兵平时在总的意图下，应受政府指挥，进行独立自主的活动；在配合主力作战时，应接受正规军或游击队的指挥。各级武委会也不能干涉各种人民武装组织的独立性，其权力只在于统一指挥、武器分配、统一经费与统一教育。

（七）自卫队的武器主要的是大刀与梭标。民兵的武器主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新旧枪械（快枪、鸟枪），手榴弹（各根据地甚至各县均应设手榴弹厂，大量制造手榴弹，分配民兵每人二个至四个），地雷，土炮，挨丝炮等。同时在民兵中应专门进行对敌铁道、矿山、火车、公路、工厂的破坏技术训练，以便开展群众性破坏工作。主力军务须有计划的拨出一批枪支武装民兵，千万不可吝惜。手榴弹与地雷这两种主要武器尤应大量制造，普遍发给。

（八）自卫队和民兵的干部，应该是土生土长，与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各地区应从地方上有计划的抽调大批干部，给以专门训练。各地抗大分校或其他军事学校，应负起这个责任来。

（九）最后，中央军委特再重复指出，民兵建设与自卫队建设的中心一环，在于民主集中制度的建立，任何官办委派，都会妨害其发展，妨害其自动性积极性的发扬。同时应指出，在分配任务时，应估计到民兵是人民武装的基干部分，应使用于对敌斗争方面，而一般的抗战勤务，则应多由自卫队担任之。

四　关于军队与民兵的武器问题

（一）敌后抗战的武器补充日益困难：国民党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也很小；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且日寇“扫荡”频繁，后方不巩固，根据地财力亦日见涸竭，故兵工生产日益不易。这种情形应当引起我们

的极大注意。

(二)在敌我工业技术水平悬殊与根据地极不巩固之条件下，我们的兵工生产当然处于劣势地位，欲求山地敌我装备平等，大规模建设军事工业及希望新式武器之生产等，都是无实现可能的空想。在目前条件下，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大量发给军队、民兵及居民，以便到处与敌斗争，以量胜质。假若对于大量生产这种群众性的、较低级、较落后的武装忽视，而集中力量于制造步枪、机枪、炮等进步武器，则将来一定会吃大亏的。

(三)在大量制造手榴弹地雷等的方针下，必须：

1. 不仅主力军应设炸弹厂以供主力需要，地方军及民兵指挥机关亦应在分区及各县设立炸弹厂，以供自己的需要。这些炸弹厂规模应小，应分散办理，分别隶属于地方军及民兵的各级指挥机关或各级政府，但主力军的兵工厂应在技术上给各地方军及民兵的炸弹厂以各种帮助。

2. 不惜重价延聘制造手榴弹的工人技师，并开办炸弹工人技师训练班，以培养此种专门人才。

3. 搜集铁与硫磺等制造炸弹的原料。

4. 炸弹之生产要力求充足，除供给主力及地方武装外，特别要做到民兵每人两个手榴弹。

5. 民兵中应普及使用手榴弹之教育，主力军及地方军应随时随地派出干部以此教练民兵及居民。

6. 多造各式地雷专给民兵使用。

(四)此外民兵及居民并应尽量采用一切其他落后的武器如梭标、土炮、土枪等等，并设法制造之。

(五)主力军除炸弹厂外并应努力解决翻造子弹的问题，即采取黑色火药亦可。延安三酸厂，可给附近根据地以无烟火药的帮助。

(六)中央军委特再重复的强调群众性落后性武器——手榴弹、地雷、土炮等——之重要性。我们一无飞机、大炮、坦克，再则我们的步枪、机枪质量也差，子弹也日益困难；想要单靠我们自己力量办到有极优良的步枪、机枪，有极充足的子弹，在目前条件下，已是完全的空谈，更不必说飞机、大炮、坦克了。因此，只有下决心依靠群众、民兵及部队之抗日坚决性、积极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众性的落后武器，依靠这些武器的数量，使敌人到处因我们的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而疲于奔命，同时主力军除炸弹外并积极设法修理机械与充实自己的子弹，只有这样，才是在今天坚持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唯一道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全国同胞们！全体将士们！

在抗战五周年的日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至诚向全国同胞、全体将士致民族解放的敬礼，向死难的志士致深切的哀悼，向负伤的将士致热烈的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以同样的心怀向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战友们致民主的胜利的敬礼。

抗战第六个年头开始的时候，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是处在胜利的前夜。在民主同盟国方面，我们看见：苏联前线的胜利，后方的巩固，红军的英勇，人民的积极，英美同盟国军火生产的扩大，人民抗战情绪的高涨，海陆空军的壮大，第二条战线的积极准备，苏英同盟、苏美协定的成立，反侵略国家更进一步的大团结。所有这些，都说明苏英美同盟国今年战胜希特勒及其欧洲伙伴，是有充分把握的。

在法西斯轴心国方面，我们看见：德国东线春季夏季攻势的破产，空中优势的丧失，德意人民的不满，被占领国人民的反抗，军火生产的下降，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战线上死伤的浩大，人力的不足。而德意的东方伙伴——日本，则战线延长，兵力分散，经济枯竭，运输困难，而其致命伤则在树敌甚多，无一获得解决。所有这些都说明，法西斯轴心已日益接近失败死亡的末路。

世界战争中胜败谁属，已很明显，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我们应有此信心，应为这个目标而共同奋斗。尤感兴奋的，不仅胜败谁属已定，而且战后世界的动向亦有了明确的方针。去年八月大西洋宪章的宣布，今年一月二十六国的宣言，最近苏英同盟条约及苏美协定的签订，都规定战后的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不扩张领土，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人民有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不让法西斯侵略主义再有抬头的可能。凡此一切，都被中苏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所共同承认，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希望，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拥护这些宣言，我们愿意本着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各爱国党派协同一致，参加战后新世界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之下，摆在我国抗战面前有两大问题，即：（一）如何争取时间，克服困难，以达抗日的最后胜利；（二）如何对目前的抗战及对战后中国的建设取得各党派的一致意见，以便更好的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就是时间与团结的两大问题。

在时间问题上，如果说苏英美三国今年有打败希特勒的把握，那么中英美三国明年便有打败日寇的把握，如果日寇敢于背信弃义的侵犯苏联，则强大的苏联远东军必能给日寇以严

重打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到胜利的路虽则很短，却尚有极大的困难。日寇还在“扫荡”敌后与进攻正面，日寇还在挑拨中国内部的团结，抗战营垒中等待心理与侥幸心理还是存在，国共关系还是很不经常，财政经济的困难还是很大。抗战第六年虽是接近胜利的一年，然而也是抗战以来存在着更大困难的一年，稍一不慎，稍一懈怠，我们已往的成绩就有丧失的危险。我们一定要警戒这个危险，我们一定要熬过这个困难的年头，方能争取快要到来的胜利；为此，必须全国同心合力，争取时间。中国人民已经与日本帝国主义苦战了五年，还须以排除万难坚忍卓绝的精神熬过今明两年，这一难关渡过，胜利就在前面。

在团结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统一的和平的中国，而不是分裂的内部互相战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既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既不是只顾一部分人的经济利益，而使大多数人受苦的中国，也不是以暴力没收土地没收工厂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的中国。总之，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中国共产党声明：自抗战开始我们就是为着共同抗战并共同建设这样的新中国而奋斗。远在民国2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宣言上，就宣布：“（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五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忠实于自己的诺言，并且把这些诺言具体化。诸如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共产党坚持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的合作政策，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上发布切合情况的施政纲领，土地政策，劳动政策，文化政策，并实行政治上的三三制等等，莫不是根据这些诺言的精神与原则而实施的。我们现在再一次声明，这些诺言的精神与原则，这些纲领与政策，不仅适合于抗战时期，而且适合于战后的建设时期，中共誓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为私利所昏迷的人们，才不分皂白，乱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破坏抗战，在抗战后企图独霸中国或赤化中国。当此抗战接近胜利之时，全国人民不但要有争取最后胜利的共同方针，而且要有战后建设中国的共同方针，以便建立互信，泯除猜疑，一致为着争取最后胜利与一致为着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繁荣的、各党各派合作的战后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认为：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认为：为着上述目的，必须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以任何挑拨离间的机会。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按照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改善内政，使人民更踊跃的为抗战而服务，才能战胜日寇，并为战后新中国的建设树立前提。

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坚定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克服悲观失望的情绪，消除等待侥幸

的心理，一切为着抗战的胜利，一切为着反攻的实施而奋斗，一切不利于抗战的言论与行动是应该取缔的。

同胞们！将士们！抗战五年了！五年中我们中国人民表现了无限的英勇、坚忍、刻苦、耐劳、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精神。我们坚决的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继续这种精神，一直到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设起独立自由民主繁盛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1942年7月7日《解放日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在抗战五周年的日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致亲切的慰问与崇高的敬礼！

同志们！五年来，你们是很辛苦了！在全国抗战的配合之下，你们创造了很多的抗日根据地，你们坚持了艰难的敌后游击战争，你们拖住了日寇在华的一半兵力，你们组织了千百万群众，你们保护了华北华中千百万民众的生命、财产与自由，你们表现了英勇奋斗和艰苦牺牲的精神。没有敌后游击战争，全国抗战便不能支持五年；抗战能有今天的局面，你们是有功劳的。

在抗战的第六个年头，敌后斗争是会比过去更加困难了。敌人的“扫荡”会更加频繁，敌人的堡垒与封锁线会更加多，敌人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会更加残酷，我们的地区可能暂时缩小，我们的经济可能更困难，我们的牺牲与损失也可能更大。

同志们！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大的，我们要认识这些困难。但是我们在困难面前绝不悲观，绝不失望，绝不屈服。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从来是在困难中生长的，从来是不怕困难的，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我们今天的困难是胜利前的困难，党中央曾经指出过，今年可以打败德国，明年可以打败日本，现在再让我们向同志们讲清楚这个道理。

苏联英美与反侵略同盟国在今年内打败希特勒法西斯是具备了充分的条件。请看：

苏联与同盟国共有人口十五万万，德国与其他侵略国只有二万万七千万。

苏联与同盟国共有土地一万万平方公里，德国与其他侵略国只有五百万平方公里。

美国英国苏联等同盟国月出飞机九千六百架，德国与其他侵略国月出飞机三千九百架。

美国英国苏联等同盟国月出坦克八千三百辆，德国与其他侵略国月出坦克三千辆。

加之苏联红军与英美军队是保卫自己的国土，士气日盛；德国是侵略别人，士气日衰。苏英美人民抗战积极性日益提高，德国人民则悲观失望。苏英美后方巩固，德国本国及其占领地日益不安。苏英美最近又订了同盟条约，第二条战线在今年内建立，德国会两面受敌，德国东线战争已陷于僵局，苏联红军则不断的取得胜利。斯大林同志在五一节的命令中，苏联人民在他的行动中，英美在建立第二条战线的准备中，都预计在今年——1942年战胜希特勒。

我们在明年打败日本，同样具备充分的条件。日本兵力更加分散了，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虽然占了些便宜，可是到处都要兵，都要运输联络，力量不集中了。你们在前线不是看

见四十岁的日本老兵及十七岁的日本娃娃兵吗？日本经济也更加困难了，你们不是看见日本兵士穿的吃的都比过去坏了吗？日本不仅与中国为敌，而且已经与英美及很多民主国为敌了，向日本宣战的有二十四个国家。在打垮德国及其欧洲伙伴以后，英美就可集中全力对付日本，那时配合中国的力量，日本的崩溃与失败就会到来。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严重的，但是暂时的，牺牲是重大的，但胜利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全体同志的责任，就在熬过困难的两年，迎接将来的胜利。

为克服困难，为迎接胜利，我们应当怎样呢？

我们应当：坚定我们的抗战意志，反对悲观失望，我们要有信心，要相互勉励，要共同奋斗。

我们应当：坚持游击战争，时时警惕，刻刻准备，不仅军队英勇作战，而且帮助老百姓，组织民兵，到处打敌人，疲劳敌人，消灭敌人。

我们应当：始终与老百姓在一起，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与自由，遵守纪律，不脱离群众，不浪费民力，要向老百姓做宣传工作，要救护敌占区的人民。要牢牢记住：假如老百姓拥护我们，日寇就无法打垮我们，假如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会失败。

我们应当：不仅与敌伪军作战，还要对敌伪军做宣传。敌军士兵也是工人农民，伪军官兵都是中国人，我们要向他们发传单、写标语，争取他们同情我们，反对敌人。

我们应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敌后战斗要与正面战斗更好的配合起来。

我们应当：在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中起模范作用，我们是共产党员，是革命军人，应当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不怕危险，不叫困难，率领大家奋斗到底。

我们应当：加强根据地内部的团结，我们与老百姓的团结，老百姓间各阶层的团结，我们与友党友军的团结，军队中官兵的团结，军队与地方的团结，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团结，新党员与老党员的团结，遇到困难，大家一同克服，不要推诿，不要埋怨。我们的团结是最巩固的堡垒。

同志们！五年来日本强盗占领了我们很多的土地，烧掉了我们很美丽的村庄，杀掉了我们很多的同胞，强奸了我们很多的姐妹，抓走了我们很多的壮丁，我们的田园荒芜了，我们的亲戚朋友死掉了，万恶的日寇打破了中国人民原来的和平生活，使我们不能不忍受长期战争的痛苦。同志们！报仇啊！斗争啊！再鼓一把劲吧，一直把日寇全部赶出中国，恢复和创造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和平的繁盛的新中国！

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

熬过最后难关的两年，就会有最后胜利！

反对悲观失望！反对麻木不仁！

我们始终要同老百姓在一起！

大家团结起来，团结是战胜日寇最重要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1942年7月7日《解放日报》）

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在北方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彭 德 怀

今年三月以来，敌寇在全华北举行了一个所谓“治安强化运动”，这个运动是敌寇企图确实掌握占领区的阴谋的开展，在战略指导上是表示着一个基本的转变，在具体政策上则较前更加毒辣、野蛮。我们的许多领导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部分损失。今天召集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的指示，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在全党同志中发展一个普遍的研究讨论热潮，我在这里仅根据华北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原则来供同志们参考。

壹、华北敌寇活动的一般概况

(甲)“治安强化”运动的政治阴谋内容：

(一)敌寇的“治安强化”运动的内容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其一切行动均以政治为中心，一切围绕在政治的周围。过去敌人虽然早已定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的口号，但认真的强烈的这样的实行起来，还是在今年三月“治安强化”运动开始以后。对这一点，我们过去认识的并不深刻，因而使得在某些地区遭受了可以避免的某些损失，这必须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

(二)“治安强化”运动的基本政治目的，是使中国殖民地化，以达其奴役与掠夺中国人民的本质。为了达到以上的基本政治目的，“治安强化”运动的政治中心口号是“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过去敌寇还喊“反共灭党”，今天则叫喊反共，其用意就是想藉此离间中国人民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藉此争取中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藉此麻痺一部分落后分子，藉此挑拨中国各阶级各阶层间之关系，以各个打击中国人民，便利于达到其侵略中国最本质的目的——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的人力财力与物力。

别的不谈，单指日寇掠夺我们人民的统计上，就可以看出惊人的庞大的数字。根据敌人公布，在一九三七年壮丁出关有三十二万三千六百八十九人，一九三八年有五十万零一千六百八十六人，一九三九年有九十五万四千八百八十二人，一九四〇年有一百二十万人，四年共计有二百九十八万零二百五十七人。这些壮丁大部分是用武力抓走的，亦有部分是被欺

骗出关的，今年敌寇预计出关壮丁数目约一百十万人，据我们观察，他到处强拉壮丁，这个数目也是可以达到的，“人”是我们民族抗战的最基本的宝物，四百万人出关，这是极其值得我们注意，必须对敌占区青年加以救护。

(三)敌寇为了达到其“治安强化”的目的，采取了有组织的侵略政策，其内容是：

(1)有计划有步骤的强化伪军、伪政权。在这里敌寇的基本认识是没有伪军就没有伪政权，没有伪政权也就没有“强化治安”，因此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敌寇首先从事于强化伪军与伪政权，其进行的方法是有步骤的逐渐的伪化，如在强化伪军方面，首先成立“灭共自卫队”（老百姓名之为棒棒队），然后“保安队”“警备队”，最后成为正规的伪治安军。在伪政权方面，最初只要你马马虎虎维持一下，甚至还要你去应付八路军，俨然替中国人民想办法似的，使你上钩，即进一步“强化维持”，然后再成立正式伪政权，建立村、区、县、道、自上而下的一套系统。

(2)强化保甲制度，以巩固其对乡村的统治。在这方面敌寇继承了中国过去一切反革命经验，此外，还进行划小村治，筑寨并村，清查户口，建立门牌，颁发身分证明书等等一套加强统治的办法。所有以上这些办法的用费，统统取诸人民身上。

(3)开始统一华北各地的封建迷信组织。在天津敌寇组织了佛教总会，在这个佛教总会领导之下，有各种会门及其他迷信团体，利用人民的各种宗教习惯，进行普遍的汉奸活动。

(4)强制与利诱青年去组织特务性的新民会、兴亚会、爱护村，甚至收买为敌人的暗探，特别对小学教员更用各种方法收买。为了达到欺骗收买青年知识分子的目的，敌寇在华北过去一个时期曾经开办过上千人训练班。敌人善于利用青年爱好美观整齐及好动的心理，给以整洁的服装用具、开运动会、悬赏征文及进行其他各种竞赛，无微不至的争取青年。

(5)引诱收买我党我军极少数坏分子叛变投敌。对这些分子，敌寇敢于大量使用，我们某些同志对叛徒分子采取了简单的方式，恰给敌人造成了利用叛徒分子的良好机会。

(四)在进行“治安强化”中，敌寇的宣传中心是“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灭党口号则已取消了。为达到宣传目的的成功，敌寇不惜采取最毒辣最野蛮的办法，强制青年受训（从中威胁利诱）、垄断舆论、进行武断宣传。其宣传方法善于抓住某一具体问题和扩大我方某些个别弱点 瓦解八路军时，对抗属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的儿子当兵死了，你会绝种。”宣传八路军是“辈子兵”。在根据地内，如在黎城暴动中提出“不完粮，不纳税”，简单具体，适合落后人民的心理，离间政府与人民间的关系。我们根据地内物质生活困难，敌寇尽量扩大宣传。国内存在着的某些不团结现象，敌寇亦利用之尽量扩大国共矛盾，散布失败情绪。

(五)“治安强化”运动在经济上的表现，是统治垄断、吞并工商业、强迫入股；勒种鸦片、棉花，强迫收买、收税、统制粮食、实行管场制度，即是指定打麦场所，派人看守，将收获物送敌寇所规定的仓库，每人只能留一个月粮，以达到其绝对统制物资、进一步封锁根据地之目的。目前正开始实行“配给制度”，仓库网已普遍建立。

(乙)随着“治安强化”运动的残酷的军事阴谋：

(一)大修公路，在铁路公路的两旁普遍的掘沟，（二丈宽，至浅有一丈二尺深）。筑碉筑墙，其工程之大，浪费民力之多，总计起来远胜于万里长城。路旁有沟的公路，将近三千公里。

敌寇进行这样大的工程，其目的就是要缩小我根据地，隔绝我各根据地间的交通，在这

种形势下，过去我们强调的各根据地间之经济交流，事实上已受到很大的障碍。因此今天我们进行一切经济建设，不应再存依赖其他根据地的心理，每个战略根据地，均应从自力更生上着眼，否则将会感到更严重的困难。

(二)敌寇的军事指导是由短促的扫荡，进到长期的扫荡，由分散的扫荡，进到集中极优势兵力的扫荡，由线式的扫荡进到纵深的扫荡，由分区围攻进到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进到步步为营，由分进合击进到铁壁合围，由无组织的烧杀抢掠，进到有组织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

(三)依靠其灵活的通信联络与周密的情报组织，实行夜袭奔袭，跃进式的建立据点。

(四)敌寇上述办法，其目的完全是为进到隔绝我各个根据地，打击与消灭我抗日实力，消灭我抗日根据地，以便确实掌握沦陷区。这一毒辣的阴谋，显然并未达到目的，但有了相当的成就，却是不容忽视的。

(丙)两期“治安强化”运动中，敌宣传方针及其已得的收获：

(一)日寇的强化治安运动已经进行了两期，现在又开始了第三期。（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一期自今年三月下旬起至六月下旬止，其中心是宣传反共反八路军，建立东亚新秩序，挑拨国共磨擦，散布抗日失败情绪，进行调查统计工作，开始肃清点线内的不稳分子（有民族意识者），巩固点线；相当强制的训练青年与轮训各种伪干部。第二期自七月初起至十月下旬止，其中心是强调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隔绝各根据地间的联络，繁殖点线，依据点线向外扩张，以达其缩紧我根据地之目的。其在第一期中所进行的一切，在第二期中仍继续进行，并有了发展。第三期自十一月一日开始，预计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结束。其中心是强力统制物资，完全控制人民一切生活物资与日用必需品，实行所谓配给制度。日寇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其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纲要中写着的方针是：“扩大已往两次治安运动之成果，并将其有机的展开，求得治安强化之彻底，而专心放在经济方面，求得经济封锁之彻底，重要物资的增产和获得，以达到增强皇军之战斗意志之目的”。

(二)在以上所指出的过去两期治安强化运动中，在割断我根据地方面，在封锁我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敌人均有了相当的收获。一年来我根据地缩小了约六分之一。特别是在统制言论、进行武断宣传、散布失败情绪方面，在收买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方面，在制造汉奸利用叛徒方面，敌人都有了不少的收获，取得了相当一部分的成绩。

(丁)在敌寇高度压迫摧残与屠杀下华北人民的表现：

(一)在敌人强化统治区与正在强化统治区的人民多数表示苦闷，表现于全村逃亡与全家自杀事件的不断发生。有的地方人民自动不维持，有的地方人民自动破路，都表示出华北敌占区人民已经难以照旧生活下去（但注意并不是日寇已经难以统治下去）。在这方面感觉最敏锐的特别是敌占区的青年对八路军的同情与拥护的情绪，以及要求武装斗争的情绪，均在增涨着。

(二)另一部分少数敌占区人民则表现消沉，对抗战胜利前途表示失望，少数的知识分子被敌威胁利诱，加入新民会兴亚会，亦有少数堕落的知识分子被敌收买充当敌寇的特务。

(三)在敌人强化伪军伪组织方针下，一方面表现伪军伪组织比以前更加活跃，另一方面也表现于伪军伪组织中的新的动摇的增长，六七八九四个月中伪军瓦解反正的数目较任何同时间内都要大，伪军伪组织内两面派的生长也相当普遍。

贰、敌寇对不同区域的统治办法

(甲)对已强化的统治区的统治办法：已强化的统治区，这指的是主要城市与交通命脉及其附近地区。在这些地区，其表面秩序大体上已经恢复，但特务的恐怖统治、浪人诈索、土匪流氓的活动，仍是非常严重的，所谓恢复了表面秩序，仅仅是停止了公开屠村屠城的恐怖，而利用密布的特务与已排斥了不稳分子的伪组织来代替“皇军”的公开屠杀而已，一般的掠夺均经过伪组织比较有组织的进行，极端混乱的现象已停止。这些区域内的各种伪组织，如新民会、兴亚会、以至封建团体，均带有特务性质，日寇在不过分刺激中国人感情原则下，尽量利用汉奸出头，而自己则做后台老板，甚至同中国人交朋友，故意说些不满意的话，或吸食鸦片，装成腐化样子（其中也有真腐化的），以进行其特务活动。对知识分子，一般的采用麻痹、收买、恐怖的方法。

(乙)对开始强化统治区域的统治办法：这些区域多半是过去我游击区，对这些区域首先是高度镇压，摧残打击人民抗日情绪，消灭人民抗日意志，使人民在绝望中给予若干活命的希望。统治开始时，要求的条件并不高，最初只要维持就好，然后慢慢一步步逼上伪化与特务化的道路。在人民中则造成一种互相猜疑，互相监督，互不相信，人人自危的空气，组织灭共自卫队，棒棒队，施以压迫，到根据地内烧杀掠夺，造成地方械斗，使人民互相对立，以达其逐渐扩大其统治与摧毁我根据地经济的目的，特务活动则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同时进行。

(丙)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办法：对我抗日根据地在进攻时，完全采取毁灭政策，平时则尽力进行特务活动，特别在进攻前，特务活动更为加紧，特务活动主要利用一切封建组织（离卦道、八卦道、长民道、日新会等）掩护。各地我党过去对这一点注意的很不够，没有把普遍的除奸教育提高到应有的地位；另一偏向，则又过于夸大奸细活动，这也是有害的。

(丁)敌人统治的基本方法：

(一)收买流氓，利用汉奸叛徒，麻痹部分的落后知识分子，以达其“以华乱华”“以华治华”的毒计。

(二)利用与挑拨伪组织及一切中国人的矛盾并用各种方法掌握这种矛盾。

(三)在总结了四年统治华北与统治朝鲜和东四省的经验教训以后，制造这一套强制的组织办法，这套办法的毒辣处是在于其严密的组织机构。

(四)但不论其如何善于“以华治华”，不论如何善于利用与掌握中国人之间的矛盾，不论其如何善于总结经验、制造强制的组织办法，日寇进行的民族压迫的落后性质，决定了他仍然不能跳出威胁利诱的老套之外，目前只不过将这套把戏玩得更熟练，更具体，更显露其东方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残暴而已。想以此挽救其政治之无法救药的缺陷，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肯细心研究、切实了解具体情况、耐心进行艰苦工作，敌寇的统治方法并不是无法打破的。

叁、从全局来看敌后环境

(甲)帝国主义战争还未进行得彻底、还未将法西斯希特勒的力量削弱到应有的程度，即爆发了反苏战争，这决定了苏德战争的长期性，同时也应重新认识中日战争的长期性。中日

战争实质上是全人类反法西斯蒂战争的一部分，苏德战争，苏联是一定能够胜利的；中日战争，中国也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乙)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使日寇陷于空前的孤立，在他南进北进均感困难的目前，西进的可能严重存在，这更增加了我们敌后坚持抗战的负担。

(丙)由于中日战争目前正处在相持阶段中，在敌后敌我均须进行巩固深入工作。在敌人方面是要确实掌握占领区，准备更顺利的机动；而我则是坚持与巩固根据地，多方面积蓄力量，克服困难，准备持久。为达到以上目的，敌我双方均必须破坏对方。敌人采用的是一套强制的办法，威胁利诱的民族压迫，以求达其对中国的完全殖民地统治。而我则必须破坏敌人这种阴谋，才能坚持与巩固根据地，积蓄力量持久战胜敌人。这说明了今后敌我间各方面的斗争必然要空前尖锐、残酷。不经过这种斗争就休想有最后胜利。

(丁)从敌我力量对比上看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华北人口我占四分之一，敌占四分之三，我根据地内约有人口二千二百万人，敌占区内约有人口六千万人（内中一部分是敌我游击区）。

华北面积我占十分之六，敌占十分之四，华北城市我占百分之二(华北四百三十七个县城我占十个)，敌占百分之九十八，我占区贫穷，敌占区富庶，人烟也较稠密。

(二)军事力量：敌在华北有九个师团和十四个独立旅团，共三十二万五千人：与八路军作战者有二十六万五千人（在时局急变下还可能增减若干），此外还有伪军十一万七千人。平均每重要据点中（小的碉堡在外），有日军八十五人，伪军三十八人。我之兵力与敌数量大致相等，但由于技术装备之极不相称，因此在战斗力上表现敌强我弱。

(三)由于战斗力上的敌强我弱，产生了战争的游击性与根据地的游击性（注意并不是流动性），同时产生了今后必然遇到的更大的人力物力的困难。全国进入相持阶段的特点，敌后区游击战争是更加频繁与艰苦，根据地的游击性更增加了。

(四)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华北人民大多数住在敌占区内，而由于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又长期使我们不能收复这些地区，同时由于敌人堡垒主义的发展，根据地的游击性质成分的增加，又必然存在着广大的敌我争夺区，这一切都在说明敌占区和接敌区工作以及敌伪军工作（见中央八月四日指示）今天必须提到重要的地位，应成为今后一切工作布置的着眼点。

(戊)胜利的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条件：

(一)国际形势与我有利，目前已经没有“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有的是反法西斯阵线形成趋势。虽然必须还要经过残酷的长期斗争，但反法西斯阵线是有一切条件能够胜利的。近几个月来日寇在国际上的孤立是空前的，这种形势已经使日寇陷于严重困难的处境中。

(二)全国配合作战。中国抗战阵容中各个组成部分，在抗战积极程度上，虽不能完全一致，甚至还有小部分的掉队；但基本的全国抗战形势，却是不会变更的。同时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正在严重的发展着。美英援华较前积极，便是具体例证。

(三)敌后根据地地区广大，各根据地可以互相配合，敌人兵力不足，这种形势是与内战期间不同的，内战时是敌人包围我们，今天则是敌我互相包围。我占面积大，且华北有利山地大部为我控制，敌人兵力始终不敷分配。

(四)民族革命战争有广大民族社会基础，敌虽控制主要人口，但这只有军事上的形式上的控制，敌占区绝对大多数人民是拥护抗战、反对日寇的。

(五)有共产党、八路军成为团聚人民的核心，以及我党正确政策的领导。

根据以上五点，从总的方面看，敌在目前虽尚占优势，但仅是相对的优势，并非绝对的优势，即此相对的优势，亦仅是军事上及经济上的优势，而在一般政治上，在国际形势上，在得到人民的拥护上，我们均占优势。

肆、坚持敌后的总方针下，三个基本中心工作任务

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开展敌占区接敌区的群众工作，坚持根据地工作，这是我们目前从各方面积蓄力量，准备持久的三个基本中心工作。虽然坚持根据地工作是主要的，但没有伪军伪组织及敌占区接敌区群众工作的开展，想要打破敌人的各种封锁，破坏敌人“以华乱华”，“以华治华”的阴谋是困难的，而且坚持根据地斗争必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要想顺利的坚持敌后根据地长期斗争，必须把三个工作任务有机的联系起来，因此一切工作布置都应该从此着眼。

（甲）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

（一）在敌寇的“治安强化”运动中，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派普遍的发现与生长起来。这固然部分的由于敌人的强化统治、特务人员的监督、以强迫改编改组所激起。但基本上还是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

（1）中日矛盾：由于敌人的民族压迫与掠夺，由于敌人对中国人民的摧残与侮辱，引起伪军伪组织中国人的普遍不安。这种民族矛盾是无法消除的。

（2）我全国坚持抗战，特别是敌后的坚持。过去许多汉奸认为，日寇一下子就可以灭亡中国，经过四年抗战后，这些人已逐渐改变其观点，敌人天天宣传“剿共”胜利，天天宣传国共矛盾；同时也正是宣传全中国抗战，宣传全中国人民不甘屈服，敌寇的破绽，是不难为稍有“知识”的汉奸看穿，而发生怀疑与动摇的。

（3）国际局势对日非常不利。在这种形势下，敌人的更大冒险势所难免倘若敌人南进或北进，将更会促使伪军伪组织的更大动摇。

（4）敌强我弱的特点，基本上还未转变，这使得一般伪组织汉奸还不愿立刻跑到我们这面来，而暂时保持两面派的态度。

以上四点是伪军伪组织内某些汉奸所发生动摇的基本原因，随着国际与国内局势的变化，两面派亦将随之而变化。

（二）两面派的特点是两面的，照顾敌人又照顾我们，动摇于两者之间其出发点虽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但他这样做对革命却是有利的，我们的目的是推动两面派发展，使他对敌人是应付，而对我们是真诚。这就发生了对两面派的工作问题，发生了对两面派领导的方式与方法问题。

（三）如何领导两面派？

（1）首先要了解两面派的特点及其所处的环境，基本的由于敌强我弱，所以两面派对敌人是公开的合法的，而对我们是秘密的、不合法的，他只能以秘密掩护的方法卫护抗日分子去执行其革命任务，对敌人他是必须应付的，应付的本身也就是一种斗争。

（2）其次，必须替两面派找寻办法应付敌人，在敌人压迫严重时，应顾虑他的苦衷，在某一时期可以允许他把革命的一方面缩小到极小的限度。要爱护两面派，严格替他保守秘密。

（3）最后要帮助两面派逐渐进步，尊重其人格，不应强迫自首或写悔过书，对之一般的

应采取宽大的办法。

(四)一切伪军伪组织都是敌寇的傀儡组织，我们应公开宣传反对之，从政治上打击之，在群众中孤立之。孤立伪军伪组织就是孤立敌人。对死心踏地的汉奸，我们应执行正确的锄奸政策，坚决予以镇压。但同时要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爱护中国人”的基本口号下，去争取他们。对伪军应打其最坏的，而不是无分别的一律加以打击。打的精神放在争取方面，七擒七纵的办法是极有深刻意义的。关于敌伪工作，中央八月四日已有详细指示，不重述。

(乙)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的群众工作：

(一)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的群众工作的方针：

(1)团结一切中国人，保卫一切中国人的利益，利用一切合法，开展救国工作，所有工农兵学商土匪会门佛教会，以及其他凡属有群众的组织，不论其性质如何，群众基础大小我们都应打入进行工作。许多地方工作，仅限于伪军伪组织的上层分子方面，根本忽视群众工作，这是错误的，并且是危险的。

(2)一切应替人民利益着想，人民少受一分损失，即民族多保存一分元气。一切要从长期打算，要秘密的建立地下组织基础，积蓄力量；反对急燥，痛快一时，许多地区工作，由于不耐心而破坏。这种教训是不应重复的。

(3)为着团聚敌占区与接敌区的广大群众，必须广泛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与群众站在一起，启发群众，共同商讨应付鬼子欺骗鬼子的方法；去逐渐提高群众的认识，团结多数的群众。只要真实为着群众的利益，群众是最为自己的利益保守秘密的。否认一切合法斗争是不对的。机械的固执的坚决斗争，不承认在强大敌人面前一时的策略上的应付敌人，也是不对的。这种应付正是为着长期斗争，为着把斗争引到胜利。“铁头英雄”一定会脱离群众。

(4)同时还必须反对某些同志的单凭自己主观愿望，不具体分析敌我力量对比的现象。他们或者机械的估计局部的敌我力量，而忽视了全局；或者看到了少数先进分子对敌愤慨，而不了解多数群众的情绪，与其落后程度；或者只看到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一面，而忽视了敌人还有强大力量统治的另一方面；或者忽视了敌强我弱的形势的转变，还需要长期斗争，全国反攻的时期还没有到来的事实。这样单凭主观的愿望片面的观察问题，急性病，不肯耐心长期隐蔽的工作，是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的最大障碍。

(二)敌占区与接敌区的斗争方式方法问题：

(1)在敌占区的工作，基本上是长期隐蔽，建立地下党的组织基础，一般的灵活的运用合法斗争。但在辽阔的乡村内，敌寇的统治不能象城市中一样的严密，因此，还有进行某些非法斗争的可能。极小型的秘密的武装组织，也是可能存在的。不管采取何种斗争方式（合法和非法的），在斗争方法上必须是短促的突然袭击，乘敌伪不注意中求得其某些部分胜利；那怕是微小的胜利，对于提高群众情绪，教育群众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当斗争胜利，必须适可而止；防止群众的斗争扩大拖长，因而暴露，遭到不应有的打击，这是必须注意的。斗争一经发动而又不可能胜利时，是应即时说服群众，暂时忍耐，立即停止斗争，潜伏或有计划的退却，以保存实力。

(2)在过去为我游击区或根据地，今日为敌占领之区域，群众一般的受抗日洗礼较深，敌寇的武断宣传较难发生作用；再加上我游击队经常活动，破路翻车时常给以影响。在这些区域，利用乡村的散漫性，仍有组织秘密小型武装的较多可能，在隐蔽、短促伪装斗争（如

假借八路军名义）等复杂斗争方式下，在根据地抗日游击队公开活动掩护下，利用这种武装在某种限度内改变敌人态度，镇压汉奸敌探，是必要与可能的。

（3）根据地内沿边区之游击队，以及部分的正规军，应当有计划的经常的到敌占区与接敌区游击，袭扰敌人，打击死心汉奸，配合秘密活动。过去经验证明，凡属这些游击队积极活动的地区，就是敌人统治不易巩固的地区，忽视这种游击活动，是错误的。

（三）知识分子是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的桥梁。

（1）我们的根据地，一般的是地方贫苦文化落后的区域，知识分子感到非常缺乏；而在敌占区内，我们的争取知识分子工作也做得非常不够。敌人所占是文化发达的城市，又采取了欺骗争夺知识分子的方针。对此必须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

（2）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有知识，而且多以知识为他自己的职业，无论革命与反革命的统治，均必须有其自己的知识分子，否则他们的事业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半出身于中间阶层，因此他们有一定的地位，和与社会各阶层的密切连系。多数受过科学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上进心，追求光明的先途，尤富于爱国的热情，不愿在暴力前屈服，老年知识分子，富有社会经验，其中有正义感者，尤易为人景仰，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对知识分子，无论其为青年老年，均应尊重其人格及其思想习惯，从中去了解他们，帮助影响他们，不可操之过急。对老年知识分子，尤应注意礼貌，说话须入情入理，不宜夸张鼓动。一般的说，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是苦闷的，他们急愿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愿意找到出路。如果我们不能争取到这些人同情，那只能怪我们自己的无能。

（3）敌人争取知识分子的办法，是威胁利诱兼施，目的是麻痹其民族意识，使成为统治中国的工具。为达此目的，敌人各式各样的大批训练青年知识分子，训练成为军官或收买充当特务，强迫引诱参加新民会、兴亚会和伪政权，提高教员待迂，提高其地位，创造汉奸理论（新民主义、尊孔等），并举行运动会及各项比赛，以团结拢络知识分子。

在敌人这种毒辣办法下，不可免的有少数落后知识分子为其收买，甚至成为汉奸。但大多数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决不会在敌人强迫训练毒打、恐吓、暗杀前屈服，敌人的腐烂现象，国际有利于我的形势，中国军队的活动，残酷的民族压迫，都是摆在面前的铁的事实，绝非日寇武断宣传所能完全蒙蔽了的。我们如果执行正确的政策，进行艰苦的工作，是一定能争取这些知识分子为民族服务的。坚决的争取知识分子，不要为任何表面现象所动摇。

（4）要争取敌占区知识分子，首先是关心他们一般的切身生活，解决他们切身的困难问题，介绍给他们新知识书籍，有民族意识的小说，组织读书会，学术研究会，研究鲁迅的论文和小说、新民主主义、持久战、三民主义、游击战争、中国历史、及其他各种知识。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与之交朋友，说服、感动、启发他与敌不合作运动，共同商量对付敌人的方法，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强迫受训，多采取开会讨论方式以启发之，绝不要主观的自以为是的给以难堪的态度，一切是诚心为着他们进步，替他们保守秘密。只有这样，才能认真的团结知识分子在我们的周围，有了知识分子团结在我们的周围，才能谈得上团结一切中国人。知识分子是与社会上其他各阶层都有着密切联系的阶层，他们是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的桥梁。

（四）反对敌人新的自首阴谋。

（1）敌在华北自首阴谋的新发展。

一、一九四〇年夏在冀中游击区敌占区，强迫群众写反共口号，填反共自愿书，买回心票，企图从政治上降低我党信仰，造成群众与我党对立，胁迫共产党自首，发现在群众中的我党党员，摧残干部。敌之这种政治阴谋为我党中央及北方局正确对策所粉碎，为群众反对所粉碎。

二、从本年三月强化治安运动起把这一政治阴谋更加强化，采取更多的无耻的办法：

1．利用叛徒汉奸威胁我干部家属，迫我干部回家，或秘密换得我干部归顺投降。

2．捕捉我工作人员，强迫自首。不必申明反共，只要承认给敌作事立即释放。

3．利用奸细引诱干部腐化，制造谣言，使干部上下级相互怀疑。

4．给自首分子以表面的信任，给以汉奸职位，无用时则弃置或秘密处决，但主要以秘密监视迫之供其利用，以发展与兴亚会，特务，并寻找我党内动摇分子，策动相互秘密自首。

5．敌人这种阴谋，在某些地区，如太行的二分区，冀南某些分区等均收到相当大的收获。给予我们工作上不少的困难，破坏了我们不少的组织，在群众中散布了不少的坏影响，使群众对我干部怀疑，不敢深信不敢接近，不敢说实话，怕有叛变投敌而害及本身。

（2）一般叛变分子的表现：

一、有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原为升官发财而来，现敌后斗争益见艰苦，因而叛变者，叛变后其遭遇较好者，破坏我党组织危害抗战较积极，但当反动资本用尽，因而不被重视时，这些叛变分子亦有狡免死走狗烹之畏惧而生动摇者。

二、因家属被捕而动摇自首者，亦有因自己被捕因怕死而自首者，其内心并不愿意自首，自首后表示苦闷，此类分子多半不积极替敌寇作事，甚至消极动摇，仍愿回到抗日革命营垒中来。

三、有经不起敌之利诱（金钱美女），和其家属之劝降，因而自首者，在自首后所遭遇的处境，并不能令之满足，因而表现失望。

四、一般的叛变分子，经过抗日和我党的洗礼，见着敌寇的残暴落后，敌伪间矛盾和国际形势对敌不利，我坚决与敌斗争，如此等等，使得多数叛变分子动摇苦闷，又想返回抗战企图将功赎罪者，事实一再证明，此类分子为数不少。

（3）如何从反叛变分子的斗争中争取叛变分子？

一、在任何情况下，应公开宣传反对汉奸及汉奸行为。抓紧敌寇每一罪恶事实，广泛宣传，说明汉奸依附敌寇之无耻与无前途，提高气节教育，注意抓住具体事实，如冀中回民支队长母亲的光荣例子，以教育干部及群众。

二、一般应宣传延安二十一条及北方局对晋冀鲁豫边区公布的十五条纲领，对一切叛变分子，一经反悟回到祖国，一律不侮辱其人格，不咎既往，并予以法律保证。

三、对于不同分子应采取不同的政策：

1．对积极的叛变分子，应告以万事应留后路，争取其动摇。如经过多次争取而不可能时，应坚决捕捉，公开在敌占区当众处决，宣布其历来罪恶与我们历次争取其回到祖国的苦心与事实，以示抗日政府与军队仁至义尽。争取敌占区多数人之同情与拥护。

2．对动摇的叛变分子，应坚决争取之。说明抗日政府军队对他的谅解，说明他心理上的苦闷与矛盾，一经争取回头抗日，即应爱惜之，此种分子可能成为开展抗日工作的部分基础。

3．对于先积极后消极的叛变分子，应告以对于叛变分子的政策，只要回头不咎既往，争

取其中立。

4．在群众中支部同志以群众面貌被迫自首，而并未破坏党的组织与危害抗日工作者，不应视为叛变分子，经过考察后准其恢复党的关系，但必须向党内党外群众广泛深入的解释，使群众懂得这一阴谋毒计，使群众了解这是为了坚持秘密抗日工作，应付与欺骗鬼子的办法，在敌人未来强迫自首前，事先率领群众或个人去假自首脱离群众，破坏党的威信，这是错误的，应严格制止。但有些游击区（或叫接敌区）群众实在受不起敌人一再摧残镇压，要求去对付（意思是假自首欺骗鬼子），我们党坚持不允，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而遭到敌人的毒手，这也是错误的。

5．我同志在被捕后意志坚决，并未泄漏党任何秘密，敌为逐渐软化，不要求公开声明反共，只要承认替日寇做事，即行释放。在释之后未作危害党反抗日利益事情，跑回根据地自动向党报告者，不应视同叛变分子，应认为是当时应付敌人的办法。其党籍经过县委以上考查后，可以恢复。

6．本人在根据地，家属在敌占区受到敌人威胁，敌如诺言只要其本人回家，并不必声明反共，我们应认为这是敌寇诱降政策，应说服同志坚决拒绝。如未得到党的允许，自动回家者，即使暂时无反党事实，亦不能承认其党籍，但在未妨害革命抗日以前，可以认为革命抗日同情分子。

四、对于叛变自首分子应按其具体情况，不能采取简单方式，致为敌寇利用。如某旅锄奸部杀害一个决心回头，而且已做抗日工作的叛变分子，使其他叛变后而动摇的分子，裹足不前，增加了开展敌占区工作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丙)坚持根据地工作：

(一)坚持根据地的三大任务，是武装建设、政权建设、党与群众工作的建设，这三大任务仍应继续，但是具体工作的重心有些不同。

(二)目前的工作重心是：

(1)目前武装建设的重心。由于敌我装备的悬殊，敌寇广泛的采用堡垒主义，普遍的修路掘沟，逐渐的紧缩与割裂我根据地，因此运动战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甚至在平原已经不可能。游击战的比重大大增加，普遍的游击战，已成为敌后最基本的战争形式。无前后方之别的游击战争环境，要求武装与人民进一步的紧密配合，因此，今天武装建设的重心是地方武装建设。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建设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一般应做到全体人民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为标准，把游击战争的开展成为普遍的群众运动，成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助手。学习昔西轮番队的经验，参加的群众自己约定三个月一换，三月期满以后，乙某即自动替换甲某归家耕种，乙某期满，甲某又去替换，家事相互照顾，精壮的群众得此轮番训练，可能成为将来走到义务兵制的桥梁。解决民兵干部，建设民兵政治工作，解决民兵武装，广泛的采用旧式武装，以数量来克服我们质量上的弱点。为达到地方武装民兵确切的开展，加强军区，军分区军事政治机构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拥护朱德同志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同志应当学会组织武装，领导武装斗争；培养地方群众领袖与武装斗争是不可分离的。为着密切各方面的统一与配合，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县委以一人兼县游击队政治领导者。这一制度在太行区证明是正确的。其次谈到正规军，今天的正规军，基本上应着重于提高质量，学习游击战，反对不适合战争环境的军事公式主义与形式主义。在政治上应加强政策教育，群众工作教育和党的教育，任何党

员应过支部生活，反对某些党员不过党的生活，反对忽视政策教育，某些兵团连级干部百分之七十不懂得二五减租，这是多么严重的现象。各战略根据地应抽出一定数目的干部，加以深造，开办陆军中学，学期以两年半至三年为标准，开始时期以国文自然科学为主，使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变为现实。

（2）政权建设。今天的重心是进一步充实其内容的问题。今年一年，可以说是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最有成绩的一年，所差的是内容还不够充实。充实内容这就是建设政权的各种政府，健全各级政权的组织机构，创造适合新机构的大众的民主的作风，在民族革命中，而不是在彻底的民主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容易保留着脱离大众的官僚主义的作风。我们所要的，是活泼的，有组织有能力的，适应战争环境的，群众拥护的政权机关。对于某些落后地区的政权机构，仍应积极的进行改造。

（3）党与群众工作的建设。今天的重心应放在建设和巩固支部上面，使支部真能成为发动领导与掌握群众斗争的核心，我们不应怕群众起来，怕群众太左，问题是如何领导群众，是怎样能掌握群众，克服群众左的偏向的问题，因为怕群众左就不去充分的发动群众是错误的。

加强地委领导，同时要健全县委适应目前敌后战争环境。区党委分局，要把一切精力放在了解具体情况与掌握政策上。机关要小，改变庞大机关主义作风，机关愈大，本机关事情愈多，就放松了深刻了解下面的情况与研究掌握政策。这样必然与下级脱离，引起上下级关系不密切，更不适宜游击战争环境。领导人要有时间去思想问题，有时要跑到下面，细心的了解具体情形，要适时总结经验。

（4）在经济政策上必须纠正过左的空谈主义。有人说今天根据地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叫作什么非资本主义的经济，似乎今天根据地的经济，已经到了从资本主义的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从这种理论出发，就会否认今天根据地社会中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存在，就会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就会否认还有地租与剩余价值剥削的存在，就会否认公营事业一切合理制度。如果不承认公营事业中还需要有剩余，那就是否认了公营事业的再生产与发展，也就否认了对抗日战争的供给。华北根据地内大多数公营事业蚀本，基本的是这种思想作祟。公营事业的正当剩余，用于发展大生产或对抗日的供给，这是符合民族革命利益的，也就是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其次就是管理经营的不良，这是必须立即克服与纠正的。

新民主主义，不否认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不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

我们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如何坚持统一战线，战胜日寇。因此在农村中基本的是使贫农生活适当改善，逐渐上升扩大中农富农的中间阶层，限制富农发展，害怕资本主义发展，是根本错误的。

我们当前是限止大地主的发展，使大地主逐渐消弱，但不是消灭大地主。为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坚决实行减租减息，与逐渐走向统一累进税收的制度。在工业方面，我们要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承认阶级与剥削的存在，所反对的仅是超经济的剥削与政治上的不平等。抗战前这些区域的煤矿工业等，每日做十四小时工作，工人无集会结社的自由，今天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因此我们应注意工人生活的适当改善，政治的平等。因此应实行九小时至十小时工作制，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工人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支部在工

厂的基本任务，是保证抗日民主政府法令的坚决执行，发挥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节省原料，克服浪费，增加生产，提高民族的政治觉悟，强化对日寇的斗争，而不是强调经济的与阶级的斗争。最后因为敌寇对本区大扫荡已开始，敌离此仅三十里了，各地许多宝贵的经验，因时间紧迫未加阐述，根据地建设中还有许多重要节目，也只好留待下回再来报告与讨论。此次会议就很简略的在这里结束。今后由于我们工作任务要适合战争环境，在各方面都提出许多新问题来，还希望到会同志回去后，利用扫荡每一空间分途负责，加以发挥。我感到我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二点，一个是确定我们根据地的游击性比以前加重（但不是流动性），要求武装斗争与人民进一步的紧密结合。一个是将开展的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和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提到适当的重要地位。只有从这两点基本认识作为决定政策与工作布置的出发点．才能认真粉碎敌寇的新阴谋，才能胜利的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才能完成党中央给予华北党与八路军艰苦的光荣的任务

［附］敌寇在华北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

经过一九四〇年全年的激烈战斗，边区的军事力量有相当消弱（敌人的伤亡更大，与我军相较为九与七之比），但政治上却日趋巩固，各项建设工作和全面的对敌斗争，日益加强。

在敌人方面，自从遭受了百团大战的震荡以后，也重新估计了敌后各根据地的力量及其对敌伪统治的威胁，集中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用以对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并转而采取了“治安强化”的新战略方针，对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穷凶极恶的进攻。

敌我双方工作都走向深入，双方都动员了最大的力量，投入战斗，斗争进入空前尖锐的阶段。

所谓“治安强化”，就是过去的“治安肃正”计划的发展，也就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一战略方针的进一步实施。它的基本目的就是首先隔绝我各个根据地，打击与消灭我抗日实力，进而消灭我抗日根据地，以便确实掌握沦陷区。奴役沦陷区的人民，掠夺沦陷区的财力、物力，完成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对全中国的占领。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从一九四一年三月起，到一九四二年秋季止，不到两年之内，敌人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后，敌人为了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计划，这种进攻更疯狂到了极点。

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每次都有其不同的口号和重点，而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前后衔接，循序展开。其规模是一次比一次扩大，作法是一次比一次野蛮，手段也一次比一次毒辣。

根据“治安强化”的方针，敌人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

区”（游击区）和“非治安区”（指根据地）三种地区，分别采取各种办法，实行统制和进攻。

对“治安区”，侧重于“清乡”，强化保甲制度，厉行大编乡制，划小村治，筑寨、并村，清查户口，建立门牌，颁发身份证明书，以加强其殖民地统治；在伪组织内部实行“清政”，肃清不稳分子，但又尽量利用汉奸出头，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建立伪保甲自卫团和警备队，实行“爱护村民连坐法”，以强化“乡村自卫力量”，并大肆抓丁，加强正规的伪“治安军”。此外，在经济上统制垄断，吞并工商业强迫入股；勒种鸦片、棉花，强迫收买；统制粮食，甚至指定打粮食的场所，派人看守，把打下的粮食都送到敌人所指定的仓库中去，每人只准留一个月的口粮；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火柴、煤油等，实行“配给制度”，以求绝对统制物资，进一步封锁根据地。

对游击区及接敌区，着重于“封锁”、“蚕食”，以特务与武装结合，恐怖与怀柔兼施的办法，步步进迫，威胁人民“接头”、“维持”，建立伪政权。“蚕食”与“扫荡”不同。“蚕食”时用的兵力一般不很大，而侧重于乘我之隙，找寻我工作薄弱或发生错误时，事先布置特务，发动秘密“维持”，一旦时机成熟，便乘虚而入，突然跃进，构成据点和封锁线，或造成无人区。敌人到处大修公路，在铁路、公路两侧，普遍掘沟、筑墙、修建碉堡，以为其进行“蚕食”的依托，以推广其占领面，隔绝各根据地间的交通，隔绝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配合行动，便于其各个击破和层层进逼。

对根据地，则进行连续的“扫荡”和有组织的烧杀（即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以彻底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复灭一切抗日力量。“扫荡”的方式，也由短促突击式的进攻，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分散的“扫荡”，进而为集中极优势兵力的“扫荡”；由长驱直入的线式围攻，进到步步为营的纵深的“扫荡”。这种“扫荡”在战术上的特点，便是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等。敌人还摸仿了我军的游击战术，利用它灵活的通讯联络及周密的情报组织，深入根据地的腹心，反复连续地奇袭、奔袭，攻击我领导机关，毁灭我后勤生产部门，并大量派遣汉奸或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策动暴动，实行内外夹攻。

这样，敌人就把巩固其占领区与对我进行经常性的边地“蚕食”的压缩，与腹地“扫荡”的摧毁，有机地配合起来。

“治安强化运动”的实施范围是全华北区，其在本区的表现是：

“扫荡”的次数加多了，“扫荡”的兵力增强了，“扫荡”的时间也更加延长了。总计一九三九、一九四〇两年中，敌人对本区的兵力在万人以上的大规模进攻和“扫荡”共计十次，而一九四一年一、二、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较大“扫荡”即有九次，小规模的“扫荡”与袭扰达二百五十三次；一九四二年的第四、五两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大规模“扫荡”达十次，小“扫荡”及袭扰增至二百六十二次，边沿地区的袭击与骚扰尚不计在内。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的敌人对冀鲁豫泰西区的“扫荡”，连续了三个月。战役刚告结束，就又对鲁西北和冀南展开了长期的“扫荡”。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开始的对冀南区的大“扫荡”，敌人出动兵力达三万人，时间延续了一个半月。同年五月至六月对太行区的“铁壁合围”，敌人一次即出动兵力四万人，在敌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岗村宁次直接指挥下，陆空联合向根据地腹心地带进袭。我们的统率机关，尤其是后勤部门，在精兵简政之后，还没有做到组织轻捷化，行动战斗化，因而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

长左权同志，就是在这一战役中殉国的。

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敌人对根据地的包围、封锁更严密了。敌人在根据地周围和内部的公路、据点、封锁沟墙繁殖极快。一九三九年，冀南全区计有敌据点五十余处，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有二百四十六处，一九四一年三月便增至三百二十九处，五月三百六十九处，一九四二年“四二九”大“扫荡”后，敌人在冀南的据点，突然增至八百多个，稍后更增至一千一百余个。冀南全区平均每十四个村庄就有敌人一个据点。形势最严重的地区如宁南等县，平均每三个村一个堡垒。敌人在冀南修复和新筑的公路，一九四〇年底，计长四千华里；一九四一年春增至五千余华里；到一九四二年“四二九”以后，便增至九千余华里了。在同一期间，封锁沟墙增加到约三千二百余华里。

太行区及其周围的据点，一九三九年为一九八个，一九四〇年增至二五五个，一九四一年后再增加到七百多个。连面积较小的太岳区，据点也增加到三百二十个之多。平汉线敌人，在百团大战以后就沿铁路构筑了第一道对太行区的封锁线。到一九四一年五月，敌人从第一道封锁线向前跃进了三十至五十里，然后北起获鹿，经过元氏的南佐和赞皇城，内邱的柳林，邢台的三王村及沙河的赵店，武安的营井、和村，磁县的彭城，南到安阳的观台、水冶，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一九四二年五月后，敌人再跃进了二十至四十里，南起武安的任家岭，经沙河的功德旺，邢台的西坚固，内丘的神头，临城的台峪，赞皇的院头镇、北正村，北达元氏西北的仙翁寨，又构筑了第三道封锁线。这些封锁线上，平均每八百公尺就有一个碉堡。这样，敌人共向铁路西侧延伸了平均在六十华里以上，冀南与太行的交通全被割断。

在日、伪、顽、土匪及会道门武装多方面的夹攻中成长巩固起来的冀鲁豫区，日军的长驻兵力虽较太行、冀南为少，但大股伪军却相当的多（如伪军文大可、孙良诚、杜叔等部，均在万人以上）。而且，这一地区是华北的南方门户，国民党的磨擦大军经常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进犯。因此，尽管敌人的进攻是自北而南，冀中、冀南成为本区的有力屏障。但整个形势，并未因此而有所缓和。至于北缘的直南、泰西等分区，形势的紧张，斗争的尖锐，则早已不下于冀南了。

敌人为构筑这些封锁线、据点和碉堡所使用的器材、劳力，绝大部分都是就地取给的。这就形成了对敌后人民经济生活的极大破坏和最沉重的掠夺。

且以冀南为例算一算这笔账。

截至一九四三年，冀南区共有敌碉堡据点一千一百〇三个，（平汉、津浦、德石等铁路干线上的据点碉堡未计在内）按密度说，平均每十五平方公里左右即有一个。以一个据点占地十五亩计，共占地一万六千五百四十五亩。敌人修筑的公路及封锁沟墙，共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华里，平均宽三丈，每里占地九亩，共占地十一万八千五百三十亩。连上述据点占地总计为十三万五千〇七十五亩。以二亩地养活一口人计算，单是这一项，便剥夺了六万七千五百三十七个人的衣食权利。从劳动力方面看，按平常劳力平均五十个工可修公路一里；路沟墙平均阔三尺，深一丈五尺，每日每人可挖五立方丈，那末，每里即须一千六百二十个工；每个碉堡按三十个左右的人力一个月修成计，约须一千个工。把三方面综合计算，据当时的估计，冀南人民，单是为敌人修路、挖沟、修据点，即须出工七百六十三万六千多个。

对根据地人民的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的“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其残酷程度，只有日本帝国主义的盟友希特勒在欧洲的残酷屠杀行为差可比拟。

对敌后根据地施行血洗政策，把整个乡村夷为平地，把新生的婴儿杀死在鲜血淋漓、肢体破碎的母亲的旁边，把成千上万的和平人民，完全埋葬在血泊中，这种种令人发指的兽行，是日本侵略者所一贯采取的“政策”。（中略）

对劳动人口的掠夺和劳动力的榨取规模是惊人的。

据当时缴获的敌人文件证明，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六年中敌寇由华北区捕捉和诱骗出关的壮丁共达五百二十九万人，其中有二百三十万是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两年中去的。边区人口在华北各根据地中占较高的比例，被掠夺的人口也一定最多。

敌人对根据地或游击区进行“扫荡”或“清剿”时，于屠杀之余，也大批抓丁。一九四二年春季，冀南敌人“清剿”广（宗）平（乡）区，一次即捕去壮丁两千人。平乡有一次被捉壮丁七千人。

经常性的劳动力榨取，其规模也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方式，一种是前述修路、挖沟、筑碉等军事工程的强制劳役，再就是据点附近的村庄负担的日常劳役。有些地区，敌人公然规定，不论有事无事，据点附近的村庄每日都要派出一定数目的民伕、牲口，到据点“支差”。对于民力的浪费，这是一个不下于前述大规模劳役的消耗。比如太行邢台土岭据点，“经常要五匹牲口支差（五个人，三天一换），专往城里运给养、买东西。另外，每天还要八十个民伕担水、打柴，二十五个民伕劈柴烧火。”（前引“控诉敌寇暴行”第四十五页）

劳役负担多末严重地消耗了农村的生产时间，从下述几个村的统计中可以窥见一斑。根据当时中共冀南区党委所提供的材料：冀南钜鹿大韩寨共五百户，一九四三年三月出伕一千三百八十九人，每户平均二·七个；冀县北冯村全村一百九十户，同年七月份出伕七六六个，每户平均出四个；新河西千庄一百六十户，同年六月出伕七五六个，每户平均四·七个；钜鹿大吕寨情况最为严重，全村三百户，同年五月共出伕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三个，每户平均五十一个。如将上述代表几种情况的四村合计，共一一五〇户，一个月出伕一万八千二百九十四个，每户每月平均六伕。也就是一个主要劳力平均五分之一的时间要为敌人做苦工。当时冀南全区人口为五、四七八、五九九人，资敌人口近五百万，以同一比例计算下来，每年应为三亿六千万个工。太行区邢台“大板沟，一九四〇年二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百九十天），共被敌征服劳役一二、二三七工。崔家庄等村共三十五户，一一六人，同时期内共出六二三八工。沙河西赵村一三〇户，五二三人，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至七月十三日，共出二二三〇工，纸坊二一〇户，九八〇人，同时期内共出一六、七四〇工，这四个村每天都有八分之一的人口给敌寇做苦工。如果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口（敌人规定的支差年龄）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三，那末，每个在这个年龄内的男人，平均每个月就有十五天为敌寇作了无代价的劳役”。（前引“控诉敌寇暴行”第四十四——四十五页）

在矿区，敌人公然制造奴隶劳动。如井陉煤矿，敌人要强征了青石岭以西十二个村民伕一千四百人，替他们当矿工，当然这完全是无偿劳动。

有一些劳役，实际上是变象的虐杀。

一九四一年冬季，冀南敌人强征滏阳河两岸的老百姓挖河。因怕工作不力，就命令人们剥掉棉衣，赤膊工作。并且每天把最后到来的那个民伕当众处死，以警告大家不得迟到。

一九四二年五月，敌人进“剿”沙河。由邢台、永年、沙河三县强征壮丁一万三千余人“随军服役”。“先后四十多天，打死累死饿死及被敌杀死的共一千二百余人。”（前引“控诉敌寇暴行”第四十五页）

一九四二年，太行二分区昔（阳）西敌人修城时，征发了全区八岁到六十岁的全部男丁，每天每人给米六两，不许回家，不少人因困饿而倒毙，尸体就被埋到城壕里边。

敌人掠夺以至毁灭我人力，削弱农村劳动力的另一毒辣手段，是胁迫青壮年参加伪军。这种情况，以豫北、冀南为最严重。冀南全区伪军最多时数近四万。据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中统计，永智（原清平县）全县人口十七万，伪军家属即占四万。豫北无全面统计，但从局部地区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伪军及土匪武装所吸收的劳动人口如果不超过至少也不下于冀南。根据中共太行区党委一九四六年的调查，沁阳西向村，参加伪军及土匪武装的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七点四；修武五个区的统计，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十，占全部青壮年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因敌人扩大伪军及土匪武装而给予人民的损害，不能仅以被征去的壮丁数目来表示。因为这种做法，既使生产劳动转变成以破毁为职业的力量，同时又实现了敌人“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给日本侵略者增加了羽翼和爪牙。

敌人在“毁灭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政策下，经常地大批掠夺与残杀耕畜，这也是敌人摧毁根据地劳动生产力的一种重要手段。许多农村的牲畜，在一次“扫荡”中被杀害了大半，在另一次“扫荡”中则被完全灭绝。如一九四〇年冬季“扫荡”，太岳区的沁源一县，就被拉走牲口七千头。

物质的劫夺与诈取同样是毁灭性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铨木少将下令‘讨伐’河北省永年县一带，这次‘讨伐’的目的，乃在于掠夺棉花，在队伍出发前，每一个中队里，都配备了一个日本纺织会社驻临洺关的职员，到作战结束后，就抢到了几万担的棉花，并且还把很多牛、马、大车，也都抢了来，……”（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新华日报”太行版，日本解放联盟太行支部“日军暴行座谈记录”）。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敌人“清剿”德石路南地区，枣（强）南二、三、五、七四个区，一万二千户、六万一千多口人的物资损失是：“粮食一万三千六百六十石，牲口九百二十七头，猪一千三百十九口，鸡二万二千七百〇九只，……被敲诈勒索现款二十一万〇六百多元”（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三日华北“新华日报”冀南通讯）。

因为粮食是保证军需民食的最主要物资，自然也就成为敌人抢夺的最主要目标。敌人的口号就是“决战第一、吃饭第一”。所以，敌人集中了最大的力量，并不惜支付最大代价来掠夺粮食。一九四二年，敌人打算在华北抢粮二千万石。当年夏季，太行区驻敌在太谷、榆次、祁县、沁县、武乡、襄垣、潞城等县，均提出了抢粮目标：多则两三万石，少则七、八千石，秋季更增至每县八、九万石。一九四二年敌人第四、第五两次“治安强化运动”的重点，就是掠夺粮食。一九四三年三月，山西敌伪拟在四、五、六三个月内，抢粮五十八万石。敌人对根据地的许多“扫荡”，几乎全是为了抢夺粮食。敌人甚至先将敌占区、游击区人民的粮食抢光，然后迫使饥民随敌人到根据地抢粮。

以上是对根据地腹心地区的掠夺手段。对敌占区和游击区，除了强盗般的抢劫外，敌人更通过伪政权，巧立名目，敲骨吸髓地诈取。（中略）

因此，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敌人的“治安强化”活动，虽然并未达到其预期的目的，但确有了相当成就。一九四一年中边区根据地缩小了六分之一，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退缩局面还未停止。根据地已大致被敌分割。在冀南平原上，敌人构成了封锁严密的格子

网，解放区已从大片的根据地变为小块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太行、太岳山岳根据地也显著缩小，而且游击性也增强了。太行沿平汉线的一、六分区，都变成游击根据地，正太沿线的二分区也被敌人所分割。全太行区在一九四〇年面积为十万零六百六十二平方里，一九四二年五月竟下降至八万一千二百九十平方里。太岳区形势最严重的时候，全区无一完整县，所有的十二个县政府，都聚集在沁源，而沁源的县城也被敌人占领了。

（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

（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

陈　毅

一、敌伪清乡的意义和作用

（一）敌伪清乡是要彻底肃清敌伪占领区的抗战势力，企图由梅花式的点线的占领展开为全地区的面的占领，是扩大和巩固其统治的具体行动。伪方宣称清乡的成败就是中日合作与和平运动的成败，并且是伪国民政府政治强化的试金石。

（二）敌伪清乡之实施是和顽固分子的反共政策有其互相策应的作用，苏北清乡正在皖变后不久，并与苏北华北的扫荡相呼应，敌伪宣称："此次清乡扫荡打击重建之新四军，系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

（三）敌后广大地区仍在中国人民与军队手中，而八路军新四军控制的地区都是敌人心脏，使之受严重的威胁，因此必须进一步的深入根据地来打击我军，尤其是京沪铁路两侧及长江两岸，为敌我必争之地，所以首先必须肃清这些地区，这些地区财富丰饶，故敌人不采残酷的摧毁政策，是企图占领以后供其征发剥削。故苏南清乡与华北之残酷扫荡不同，因此敌人提出和平清乡，不流血清乡，以及在清乡第一期结束时又提出长期清乡，带怀柔欺骗的机动清乡等等。

（四）苏德战争爆发后敌寇为要应付新的战争形势和进行新的军事冒险，所以必须消灭和减轻其重要战略据点及主要交通线周围的威胁，以期达到调动兵力时，不会根本影响到其占领地区之巩固。

二、敌伪清乡的具体方案

一九四一年五月汪逆去东京觐见日皇，成立了五万万元大借款归来，即在南京伪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逆任委员长，周佛海与陈公博为副委员长，伪特务部长李士群为秘书长，实际主持对苏南的清乡工作。据第一次清乡行政会议上提出之具体方案为：

（一）实现国民政府下真正的和平地区，减轻日军的警备力，代之以自体的警备力。

（二）政府独立的强化。

（三）和平地区的扩大，组织特务工作，保安团，以期加强清乡地区的生产，并确立扬子江下流的治安。

（四）由伪南京政府拨款六千万元作清乡经费，首先训练各种清乡人材，如特务、行政、

警察、封锁、情报、保甲、宣传、税收等部门，每一部门予以三个月专门训练，汪逆自谓系采取过去庐山训练办法，充分研究过去剿共经验。受训练人材一部份征调苏南当地的，一部份是外地的，两者混合，互相监督，由汪逆及伪政府顾问部长亲任讲授。这种训练传于去年三月在南京开始，受训人员计在二千名以上六月初训练完毕，并在训练期间即在南京苏州等城市发动城市清乡，实地演习，并实地考核各受训人材，是否忠实于敌伪。

(五)六月初调集敌寇两个师团兵力，伪军六个师，总计敌伪兵力计六万人，以全力兜剿我军十八旅苏常太三县地区，采用闪击战，使我猝不及防，不能漏网。

(六)清乡办法之类别：

1．政治清乡：反共，摧毁民众团体及我地方组织，摧残一切抗战势力，对顽军及顽化伪军同样在清除之列，强调伪军之伪中央系统化，对杂牌伪军实行编并，敌寇与汪周陈四方面，各人均企图建立自己嫡系军队，实行争夺，作收买拉拢之竞争，对地方帮会势力，及两面派势力同样予以打击，促其进一步伪化，总之以对付我党势力为主，围绕着此中心连带解决其他问题，以达到完全控制苏南之目的。

2．军事清乡：以强大兵力寻我主力决战，兜剿包抄，使我军无法转移，被迫作战，对反抗进军之村庄，实行大烧大杀，警一以戒百，一切民间新旧武器登记后，全部听其调用，或加以没收，抽壮丁，编反共自卫队。

3．行政清乡：建立新的保甲制度，原有保甲及县区行政人员，一律于敌寇进军时全部调南京受训，一个不留，全部在一天内换上新的人员，这因为敌寇恐伪方人员上下与我方有关系，故用此截钉断铁方法，断绝线索，使我方得不着任何消息，和足以利用的机会，设立了望台，守望哨，断绝往来，严查居民及行人。

4．经济清乡：抽田亩捐，整理赋税，藉口调整被共党紊乱之主佃关系、代地主收租，或全部没收，或发还一部，或发还一小部（地主认为共产党只减租，敌伪则全部没收，极为痛恨），统制货物进出，统一税收，禁止各伪方系统走私，漏税，或私设关卡。

5．特务清乡：普遍建立情报网，责令每村坊报告消息，亲眷往来，均需报告，登记户口，早晚点名，看手足，查口音，拍照，稍有可疑即逮捕，原先之良民证，通行证，均在清乡期内无效，另发清乡证，每张纳费五元，经过严格手续才发给，厉行自首政策，清乡地区整村整乡进行自首，抓住我方工作人员，则勒令自首，供出我军活动地点、埋藏物资、群众团体负责人及会员姓名、地方党组织，务求彻底破坏。

6．文化清乡：宣传大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复古读经，提倡佛教等。散布各种美丽画片刊物，及肉麻文学作品，并普遍设赌场妓馆烟室推销白面海洛英。

7．心理清乡与精神清乡：汪逆在南京清乡准备会上演说谓：反对两种倾向。第一种利用和运保存实力，暗通渝共。第二种不认识友帮之伟大，不诚心帮助，怕上当，失掉和运成功之信心。此两种均应反对，以两面派为最危险，故应首先进行心理清乡，思想清乡。因此特别努力欺骗宣传工作，如说新四军是俄国军队。新四军焦土政策，造成人民生活不安。新四军遭英美国民党日本联合反对，一定不成功。国共摩擦，抗战一定失败。归化汪先生与日本合作救国等。同时利用小惠，散发掳掠品，将甲地抢掠品到乙地散发，进行部份平粜。

三、清乡的实施及其特点

(一)清乡所依靠的社会基础：一、利用对我不满的一部份地主资产阶级。二、利用中间

阶层的动摇分子。三、利用一部份叛徒及动摇落后群众。四、利用有反共成见的顽固分子。五、利用一部份失业的旧行政工作人员，及老乡保甲长。六、利用地痞流氓烟鬼赌鬼等游民阶层。

（二）清乡的主持表面以伪逆为主，敌寇为辅。敌寇以武力配合外，其他一切行政、治安、经济的恢复，概由伪逆出面。

（三）特别强调政治，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由汪逆提供内战剿共的经验：

（四）计划周密，准备充分，在未清乡之前，首先在政治上动员，进行各种欺骗宣传，以便扩大清乡影响和动摇清乡区的民心，但又不立即进行，以松懈我之准备，而造成突然动作的条件。

（五）苏南的清乡第一期为苏、常、太（去年七月到九月），第二期为澄、锡、虞（去年十月到十二月），第三期再向西南推进，为武进江阴西部（本年一月至四月），第四期为丹阳镇江，拟于本年三月开始，因准备不及而推延，拟于六月开始。

四、清乡军事上的部署与战术

甲、封锁政策：一、大范围的封锁，依靠主要的交通线和据点以控制人员物品。二、各区封锁，主要依靠河流和市镇据点与桥梁的控制，时间多在夜间突然实行，通常由甲区到乙区的挨次进行搜索我军目标。三、道路封锁，在城市和市镇之间的大道，用竹木排塞，电网拦阻（江南每一较大市镇均有电灯工厂），只留几条行人道，检查甚严，除开放时间外，平时禁绝来往。四、此种竹篱笆之工程甚大，封锁绵亘十余县，破不胜破，破坏处居民即遭烧杀，并限期修复。

乙、间谍手段：一、威胁群众报告新四军的消息，否则就要毒打烧杀。二、诱引农村青年做特务间谍工作。三、收买地痞流氓作为间谍工作的主要基础。四、勒逼被俘人员担任带路侦察。

丙、战术特点：一、扩展据点外又有所谓流动据点，深入根据地内监视我军行动。二、在清剿时，敌伪分工以伪军任封锁、守备、巡查，敌人则任进攻。三、对我战斗初则以威胁驱逐为主，但在我处于不利情况时，则集结兵力求得歼灭我军。四、篦梳式的巡逻搜索，水上由汽艇担任，主要河流经常有一二只汽艇游划，陆上由机器脚踏车和徒步便衣队，三五十人为一队，在大小路上循环来往，担任搜索游击，如发觉我军目标，即行层层包围，严密监视，等后续部队来到，正式进攻。五、对村庄经常在拂晓前完成包围，到天明时进入村庄，把所有老百姓叫出来，排队查问，区别口音，看手背和肩膀。六、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突然包围的动作，打击我军，有时也采取埋伏，伏击我军转移的部队。七、利用无线电音响，听取我指挥机关之所在，实行奔袭。八、突然进行全区域的包围，然后下乡搜索，即所谓先撒网后捉鱼，亦即利用所谓抽乾塘水后捉鱼的反共旧经验。九、伪装我军散失人员，夜间到群众家叫门，以查明谁是我军之同情者，予以屠杀或逼其自首，以能供出线索，指认我军潜伏人员埋藏物品为自首条件。

五、清乡实施中之转折和敌友我及人民中间之反映

一、先说敌伪方面：

1. 敌伪清乡于去年七月开始到八月初即行大体结束了苏、常、太清乡计划，八月中即转兵力进行对澄、锡、虞（即江阴无锡常熟交界地），九月底完成了第一期计划，十月第二期开始，十二月底完成了江阴以西及武进部份。第一期苏、常、太清乡为狂风暴雨式的军事清乡，差不多等于华北之三光政策，我方又无经验猝不及防，人民三年来在我军民主政策之下，享受了安定生活，故一时也突然转不过来应付敌伪。第二期对澄锡虞之清乡，则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敌寇有事于南洋，无法以两师团兵力进行强大清乡包围，不得不改为以一联队兵力配合伪军进行，于是此军事清乡乃转变为政治清乡，又见第一期清乡我方转移很快，敌无可求战，强大兵力，亦无用处，同时第一期三个月清乡用费，估计达三千万元以上，敌伪方面实难支持，不得不缩小范围，改为所谓机动清乡，只能小规模分区着手，以旧行政区为单位，逐次进行，这是敌寇受全局牵制，兵力不足、兵力分散两大弱点之不得已的暴露。

2. 第二期对澄锡虞清乡实施中，敌伪以力量不足而改为机动清乡时，其部署又有变更，即是划全区为三个区域，第一种所谓匪区，即我之中心地区，进行与苏常太同样的军事清乡，以屠杀镇压抢掠为主，第二种地区即所谓半匪区，以归化手段，特务清乡为主，主要是责令居民自首，以钱粮赎罪，违者才用大兵下乡镇压，第三种是和平区，即敌伪据点附近，以文化清乡、行政清乡为主，进行顺民训练。尔后第三期对武进丹阳之清乡，其部署亦系照抄机动清乡之计划。

3. 在第一期清乡，汪精卫、周佛海、陈壁君、陈公博等大汉奸联袂到苏州前线主持，清乡计划完成，伪方即以此报功，自诩其善于反共制共，并诩“渝方制共反为共所制，一切反共同志应集中在汪先生领导之下，这是清乡的宝贵教训”云云.（伪中华日报社论）。

二、次说友方与人民方面：

1. 苏南敌后友军为忠救军集团。原为杜月笙等创设，依据苏南青红帮的基础，后移戴笠管理后，即与我军挑衅并暗通伪方，不少部份接收伪军委任，企图利用敌军，向我扫荡，实行借刀杀人之毒计。清乡开始时，敌伪先以联合制共稳其心，清乡中期，即勒令忠救调苏州受训，否则逮捕其首领，改编其部队，计胡肇汉包汉生杨忠等十馀部队，计五千余人，无一漏网者，事后有人逃到我军地方，始悔悟过去反共之非计，愿与我合作杀敌。

2. 地方人士中一部份人在减租息运动中因我之某种过左办法不满意于我，初期受敌伪引诱，以为借敌伪清乡可以恢复其旧有统治，故初期替敌伪卖力，敌伪进军后，不仅不信任他们，反以通共罪加以勒索，并代其收租等，于是乃大悔悟，纷纷派代表要求新四军复原，在敌伪军与新四军对比之下，他们认识了真理和光明。

三、我方在清乡初期因无经验猝不及防，又加战术指导上的缺点，是受了相当的损失，约当于实力的五分之一。间谍告密和叛徒带路，是使我军受损失最大的原因，损失于战场及转移上比率并不大。我军在军事部署上的缺点：

(一)清乡开始时主力和地方部队均因轻视敌之进攻，视为一般性的季候扫荡，未能有充分准备，尤其未能断然转移致有一部遭受合击受了损失。

(二)在转移时留下坚持部队因不机动灵活，死守老套，亦受损失，但有一个部队在无法

转移时，即留原地分散坚持，始终保留至现在。

（三）在苏南我军只有主力及不大的地方武装，人民武装更无基础，主力转移即失依靠，而主力又处在孤单作战状态，此外地方党政，习于公开的机关工作方式，对武装斗争、秘密斗争、合法斗争，不能综合掌握，环境骤变即手忙足乱，以致自己受了损失。

六、反清乡的经验

（一）清乡与一般扫荡不同，要清楚认识，扫荡带短期性或季候性，带着战术或战役性质。而清乡是长时间的精密的篦梳，其目的不仅在于打击我之主力，而且要使我之地区彻底伪化，故集中力量软硬兼施以彻底破坏我地方党及民众团体为敌伪清乡之特点，是带着战略性质的。

（二）汪逆伪政权在清乡的作用，应有清楚的认识，不能与过去一般扫荡同等看待，敌寇充分利用内战反共经验，我之对策亦采用南方三年游击战坚持的经验，使游击战与地方秘密工作配合收效甚大。

（三）对党的政策应正确的执行，要扩大交朋友工作，在政策上执行过左便容易造成我之孤立，如对某些土顽势力，衹强调斗争，而疏忽争取与联合，则给敌人以利用的机会，正确的完整统一战线政策是反清乡的锐利的政治武器。

（四）对敌伪间，和伪军伪组织间的内部矛盾，应经常研究利用，敌伪在反共中虽行动一致，但其派别系统分歧，常常彼此对立，我们未从这方面灵活利用是一失着。

（五）对反间谍反特工工作，应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并研究普遍而严密的有效对策。

（六）在战略战术上没有争取主动，特别在清乡前敌伪开始封锁，我军未进行交通破坏战，摧毁其某些据点以牵制敌人，清乡开始，我军友邻地区的配合策应极不得力，虽然有些地区获得出击胜利，但不关痛痒，故敌伪断然不顾，仍能执行其原定计划，但另一面，我出击之胜利虽未解苏常太之围，而又确乎开辟了太湖沿岸之新区域，恢复茅山地区之失地，得失亦足相抵，此为极宝贵教训之一。

（七）在反清乡斗争中，锻炼了我们的党政军民，证明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尚不是完全巩固的，应从失利中学习教训，这方面如有所得，必能补赔我们的所失。

（八）在组织部署上：一、地方党政机关在清乡前应进行断然转移，转到非清乡地区，只留一部灰色人员隐蔽坚持，并经常转移住地，带干粮、住桑园、住田间不入民房，尽可能通过同情分子，来保持与群众的联系及斗争情绪，灵活运用两面派办法。二、以抗日特工反对敌伪特工，以暗杀狙击手段镇压叛徒及下乡特工。三人一组，行动后即分散隐蔽昼伏夜出最有效。三、敌伪清乡结束后我地方工作人员应立即派人回原地带小部队恢复工作，伪化过久则难于恢复。四、苏南不应有主力与地方军之分，主力应地方化，地方部队更应群众化，一切以适应游击环境为主。各地方党政群众团体应学习掌握各种斗争方式如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或秘密的等等。

七、结　　语

一、我六师十八旅及东路特委各行政专署在反清乡斗争中基本上保持了我之主力，及党政群众团体的干部大多数，还开辟了新区恢复了非清乡地区的失地，锻炼了自己，增强坚持

苏南敌后前线的信心，我苏常太之局部损失，不是敌伪如何厉害，而由于我初期之无经验，以及准备不充分，和某方面的疏失所致，以后即逐渐纠正，故使敌伪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之清乡即逐渐减弱其凶焰，而我之坚持力量乃逐渐上升，这是敌后抗战能坚持能胜利之又一证明。

二、敌伪之大举清乡不是能轻易举行的，他是要受一定时间一定地区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的，根据反清乡经验，我能掌握正确的军事方针和正确的政治方针，则战胜清乡是有保证的，要反对清乡斗争中、某些同志中的悲观失望情绪，夸大清乡声势，敌伪每一出动，皆视为清乡又来了，“检到封皮就是信”自己吓自己，这于斗争是极有害的。

三、敌伪清乡目的，在于造成巩固的殖民地，以苏南为模范区，首先实验，故苏南清乡后，在其他地方也多少蹈袭故智，因此我党亦应采取更好的对策，夸大清乡作用固不可，忽视其作用亦大有害，敌伪将统治台湾的经验，将扫荡华北的经验，将内战剿共的经验综合运用，故我们更不能忽视，敌之策略为上层利用汪逆，下层利用流氓帮会，更多寻找民族抗战内部的弱点，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全民武装方针，为反对敌伪政治清乡的最好武器，苏南我党我军的统战政策，某些方面过左，这是政治上的弱点，是被敌伪利用了去，主力部队太孤单，人民离开主力即无掩护，民兵自卫军没有开始建设，这个军事弱点亦为敌伪所乘，从这两方面去补救，便是我们反清乡斗争的基本总结。（二月七日完稿）

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某同志的答复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

彭　德　怀

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种新的形势。其中几个具体问题特说明如下：

（一）平原抗日根据地在某些地区已经起了质的变化。

由于在平原地区敌我斗争进入空前紧张，空前尖锐，使我平原抗日根据地在某些地区性质上起了变化，成为游击根据地。其主要标志是：

子、我大块抗日根据地被敌逐渐分割成为许多小块地区。敌依据密布的公路碉堡封锁沟，随时可以对某一地区进行扫荡，而我为敌之堡垒封锁沟墙的限制，大兵团的活动困难，甚至根本不能活动，以致在平原地区结束了运动战，进入分散的普遍的群众性质的抗日游击战争。这种新的形势估划在平原地区要有相当长期的，甚至在某些平原地区不到战略反攻难以改变。

丑、过去是大块根据地。敌仅有点的占领，尚未分割细碎，故我有一套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而且可以有系统有步骤而且是齐一步调的向敌作正规的各种战斗，今天进行这样统一与规模巨大的斗争已增加极多困难，但如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及时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仍能进行一定限度的各种斗争。武装斗争虽然是主要的，但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亦有其一定的作用与地位，并且必须使之配合武装斗争，才能保卫和坚持平原游击根据地。

寅、如果不承认平原某些地区，抗日根据地在性质上已经起了变化，就不会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也就是不能及时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与发展，采取新的方法进行斗争，结果必然使小块游击根据地不能坚持走向失败．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抗日游击战争在新的形势下仍能坚持，平原游击根据地仍能存在，公开的武装斗争仍是主要的，结果也会走到另一错误方向，即只保留极少数的党员完全转入地下非法的地位，实质上是放弃平原的坚持，走到全部撤退，假若如此，则对山岳区根据地的坚持会增加其严重的困难，这将走上严重的错误。

（二）坚持平原游击根据地公开武装斗争的条件：

子、敌兵力不够分配，只能对我分区围攻清剿，不能在全国华北向我各个抗日根据地同时进攻，即对我某一战略区扫荡，其清剿亦须再分区进行。这是因为敌在华北的军事实力与我比较并非绝对优势，只占相对优势；敌之这一优势主要的表现于技术、战略方面，其政治素质随着战争的持久而降低，战斗力已不如前，军队数量敌并非优势。不过于敌掌握了交通要道，所以能够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内集中相当大的兵力以取得优势，但这种优势是有时

间性与地域性的，还不能在全华北同时普遍的取得这样优势。即在平原地区亦不能同时取得这样优势。这也就是敌虽对一定地区可以进行极疯狂的扫荡，却在另一区，兵力又感不足，顾此失彼，成为敌人长期苦恼的事。我应灵活的掌握敌人这一缺点，相互密切配合，成为坚持华北，坚持平原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

敌人之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残酷的掠夺，军队纪律败坏，更易于激起我全民的反抗，造成深刻的民族矛盾，这一矛盾非但不会降弱，反因敌之各种压迫加紧，民族矛盾激烈的增加与深刻化，被屈服了的只是极少数人，这又是我们坚持斗争的另一重要条件。

丑、我在华北环军事实力上虽占相对劣势，但在政治上却占绝对优势，所谓敌强我弱也只限于军事方面，因敌我军事实力暂时的不平衡，目前难以甚至不可能在军事上给敌人应有的或决定的打击，只能采取积极的游击战争，袭敌弱点，给敌以必须的打击，从各方面去削弱敌人，达到熬时间的目的。这种分散作战的形势，在平原较山地更为显著；山区根据地内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集中较大兵力，予敌人以某些歼灭的打击，敌我军事实力对比虽是如此，但由于我在政治上占绝对优势，所以不但在山区根据地可以坚持，即在平原被敌分割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在不犯政策上的错误的原则下，亦肯定的可以坚持，不过局面较为困难，斗争更为复杂；要求平原领导同志更细心的研究具体对策，就一定能达到熬时间直到最后胜利。

因为敌兵力不足，与我军事力量对比只占相对的优势，和政治上占绝对优势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游击战争的形势，在不同地区，同一时间此起彼落，此落彼起，具有极大的变化性，我们必须善于掌握具体的变化，及时而又非常灵活的改变具体的斗争策略，抛弃死硬的公式，才能够便坚持，得到胜利。

寅、全华北领土我占到二分之一强，且绝大部分的是落后的农村，一般生活条件很低。故我能自由迴旋，行动无多大拘束，与敌作战可以采取无固定（有固定的地区）；战线的游击行动使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不可能消灭我们。纵敌发展堡垒据点，使其对我扫荡增加某些便利，但也正因为堡垒据点的增加，兵力愈益分散，更难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对付我们。兵力不足是敌先天性的弱点，这一矛盾，不仅现在即是将来敌人亦绝对无办法解决。

卯、游击战争必须要有根据地，否则即脆弱无力，且难持久。没有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实质上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其作用不过仅等于军事别动队或武装侦察队而已。这将使武装斗争与群众一般斗争隔离；只要游击队单纯的军事活动，其结果必然忽视群众利益与发动群众，名之名单纯军事行动亦未为不可。游击战争必须与群众的政治、经济的要求密切的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群众拥护，才能坚强有力坚持，才能持久与发展，才能完成一定的政治任务。

至于以为在平原应是合法的、隐蔽的斗争为目的、实质上是不承认平原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存在，取消了公开的武装斗争，其结果是必然退出平原，这绝不能称之为坚持平原，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意见。

(三)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问题

子、在日寇法西斯刺刀下与殖民地政策下，不应幻想存在合法斗争为主，因为客观上不会存在着这种事实。过去某些地方自己解除民兵武装，组织黑团，取消抗日政府代以维持会，这都是严重的错误。虽然在某些地区，根据具体情况，估计敌须久占我实无法再坚持公开斗争，一切合法公开的抗日组织亦不能继续公开存在时，是允许转入地下或撤退。在此情况下，应预作准备，设法打入伪组织，掌握欺骗敌人的和平斗争，掩护抗日工作的进行，侦察敌情，收集情报，协助公开的武装斗争 。另行一切伪组织的两面政策，对敌是公开的合法的，对我

是秘密的非法的，两面政策的实质是利用敌人所许可的合法组织形式，进行欺骗敌人的斗争，因此这并不是合法斗争。如果错认两面政策是合法斗争，在政治上是麻痹了自己，在工作上也会弄出乱子来。

丑、但合法斗争亦非绝无可能，如利用敌伪矛盾及敌某些怀柔阴谋。如敌在某一时期、地点（敌占区）为麻痹我人民，故意惩戒最坏的个别奸伪时，我即可领导人民请愿，反对最坏的奸伪，利用打击其他汉奸，使之觉得无出路，敌寇如不允许，我即揭破敌人假面具，增加民族仇恨，是可能的必要的。但一般说足资为我利用作为合法斗争的机会是很少的。敌人是要灭亡我们，奴役我们，绝不会允许什么合法的反日斗争，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会陷到机会主义的泥坑里。

寅、打入一切伪组织尤其是打入伪军中工作，绝不应放松，要利用一切可能去进行，目的在于争取伪军伪组织对敌欺骗应付，对我真诚帮助，这种打入敌之合法组织里工作，不能叫做合法斗争，因为敌人绝不会允许抗日分子进入其统治的武装力量与组织里，进行抗日工作，所以对敌仍是非法的。

卯、如将自己的抗日武装改编成伪军，是把自己合法的抗日权利取消，换得不合法的铐镣，这是非常错误的。这种思想与作法发展下去，可能走到所谓“曲线救国”的危险途径，必须加以反对。

辰、在敌占区建立小型的秘密武装，直接依靠于群众中政治觉悟最高的分子，和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是可以存在的。他们可以采取隐蔽的伪装的方式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镇压汉奸可以减少群众的负担与打击敌伪甚至骚扰苛索，威胁敌伪改变某些态度。所谓隐蔽斗争，即是不要大张旗鼓，所谓伪装斗争，即是假八路军、某地公开抗日政府的名义，缩小自己的目标。

(四)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方式是复杂的，又是密切配合的，主要是公开的武装斗争与秘密的各种斗争的结合。（如何结合从略）。

北方局对于彭德怀同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几个问题答复”的意见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

我们讨论后，除一致同意外，有如下的说明：

（一）坚持华北，是我党我军不可动摇的方针，为了坚持华北，不仅要坚持山地，而且要坚持平原，山地与平原是不可分离的。冀中对晋察冀边区的作用，不仅在物质上给以调剂山地，而且，冀中如不能坚持，北狱区必受到严重的威胁，困难必更加增多，人民负担必致因冀中兵向山地转移而感严重，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应当从冀中与北狱区不可分离的观点上来认识这个问题。

（二）过去我们认为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这与彭德怀同志所指出的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并不矛盾。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而且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即是说，首先要控制华北，巩固华北，不仅是为了目前的战争，而且是为了将来日苏战争的准备。我们对华北的形势的估计是严重的，我们的一些工作也正是向着迎接今后华北更严重的局面来布置的。

（三）敌在军事上占有相对的优势，但兵力不足的困难无法克服。因此，敌只能集中兵力扫荡我一个地区，不能在全华北同时进行扫荡。同时，我们应当承认这种形势，承认我冀中平原的某些地区，在敌人这种优势之下，已经变质。但我们必须同时认识敌人，敌人这种优势只是相对的，认识此落彼起此起彼落的形势，正是我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重要特点。我在政治上的优势是绝对的，虽然冀中某些变质地区，在敌之残酷统治下，群众情绪可能受到打击，部分群众可能一时被敌征服。但群众的仇日情绪在日益增加，敌人的民族侵略政策，无法转变我在政治上的优势。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许多文章好做，我们才有在恶劣情况下坚持分散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可能。

（四）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坚持根据地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如果取消了武装斗争，就不能算作根据地或游击根据地，只能算作敌占区，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是不够的。今后敌对冀中严重扫荡，虽然根据地起了大的变化，但我们在冀中坚持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冀南在各种条件上不如冀中，但冀南的游击战争仍在坚持，冀东比冀中相差很远，敌人逐次对冀东扫荡不可谓不严重，但冀东在区域上已恢复了四分之三。即按目前七分区情况，村游击小组仍在积极活动，在镇压汉奸叛徒上起了作用，也可以说明在冀中坚持武装斗争的可能与必要。冀中十分区在去秋为敌控制，我主力全部退出，只以极小的游击队艰苦坚持游击战争，但在今天，敌对冀中扫荡时我一部兵力又重新进入十分区，开拓了较大的游击区域，这也是说明平原游击战争中此起彼落此落彼起的形势。目前冀中扫荡已过去，敌人正在进行长期的

清剿过程中，树立伪军伪政权，建立敌伪秩序，摧毁我组织力量，企图把我从所依靠的基础上打垮，这是目前敌我斗争的重心。

(五)目前冀中应注意两种倾向：其一认为根据地可以迅速恢复过去规模，不承认这次敌对冀中扫荡的特点，在冀中部分地区业已变质，全区形势一般都较前严重的事实，不认识目前我们主要是保存力量，熬时间，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另一种倾向是不认清保存力量与坚持冀中游击战争的连系。不了解如果冀中不能坚持，则北狱区将感到严重威胁，力量也就难以保持，只知退兵，不计坚持，并不是保持力量的最好办法（主力转移是必要的）。因为在青纱帐期间建立汉奸秩序的一切外围，则将大有利于青纱帐倒后的坚持，使冀中阵地不致丧失而变成多数小块的游击根据地。

(六)今后冀中环境，必定会比目前严重，我们在青纱帐的一切活动，主要是便于今后坚持。因此，对于今后坚持，在组织上、思想上都必须有所准备（冀中党委及冀中军区已有青纱帐工作的指示和今后工作的布置），在组织应准备青纱帐倒后，由于敌之分割封锁（使我感到更大困难的是沟的封锁，县界沟与区界沟的挖掘）而迫使我部队而高度的分散（以班排甚至更高度的分散）。

(七)应准备在这种分散条件下，地区的划分，免得大家都到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庄去，遭受敌人打击，与各级党委对武装的切实掌握等问题。在思想上，应用军区、政府、群众团体的名义，发出布告、宣言，在群众中大量散发，说明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消除目前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与敌寇的谣言。

(八)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对于纠正当前工作中的各种偏向，具有很大的意义，特别是对于目前冀中在坚持对敌斗争中各种分歧的意见与偏向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必须在县以下党委中，深入的传达与讨论，并根据彭德怀同志意见的精神，检查我们的工作。进一步提高干部与党员对于对敌斗争与坚持根据地问题的认识。

(九)对于合法斗争这个名词，在使用上过去我们没有很好的考虑，把两面政策及对敌人的一切敷衍应付，都指作合法斗争是不对的。合法斗争只是利用敌人，把能够允许的对敌人进行斗争的范围，用请愿要求等合法方式，达到某种要求的目的。在敌人的刺刀尖下，这种合法斗争的范围是很小的，以合法斗争为主，结果就会走向投降。即在敌城市和敌占区，这种合法斗争的范围也极微，过去我们一般所指的合法斗争，实质上就是两面政策，在两面政策的运用上，过去我们一般的没有什么错误，但由于名词上的混淆，就使得以往在执行过程中，个别地区存在着取消武装斗争，一切对敌人无条件让步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立即加以纠正。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

（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

《解放日报》社论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党中央曾向华北各根据地指出："日本与中国战争已四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荷及南洋等廿余国为敌"，无论"从经济的（战争资源），政治的（正义与非正义），及军事的（潜在力），各方面看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反侵略国家"，这是对于华北敌后坚持抗战基本有利的方面。同时又指出达到这个胜利，还要经过一个极艰苦残酷的斗争过程。由于日寇今天在太平洋上还占着有利的军事优势，日寇为了准备进行反苏战争，必更加紧巩固其反苏前线的华北阵地，加紧榨取华北的人力资源以供应战争；因此敌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毁灭扫荡也必更加紧，今后两年将是华北最艰苦最困难的两年。但这是达到胜利必经的困难，正如天将破晓前的黑暗，我们一方面要有在敌后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对日益增加的困难，有充分的认识，才能在精神上，在各方面工作上有很好的准备，去迎接困难与克服困难，而不致临事张惶失措，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及避免党内党外可能发生的悲观失望心理。

今年五个月来，敌人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扫荡，与积极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之艰苦与残酷，实空前未有，完全证明中央指示之正确。今天各抗日根据地的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动，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仔细的去研究了解今天情况的特点，和正确布置各方面的工作，否则就会不能前进，甚至可能受到损失。目前情况的特点，存在着增加我们困难的方面，也同时存在着有利于我们能够坚持争取胜利的方面。属于增加我们困难方面主要是：

一、敌人的据点与公路网更加稠密，以晋察冀为例，去春还只有八百多据点，现已增至一千四百六十，平均每县有十五个以上据点。在据点周围与公路铁路两旁，有多至七层的封锁沟与墙（主要的道沟，宽深各二丈，有一部份且引河水灌入，阻我不易通过），使我地区受到很大的分割，交通联系与工作指导上均增加很大困难。

二、由于敌点线增加，使敌在军事上增加了新的便利，无须用比较过去更大的兵力，即可经常进行"分区清剿"与"分割蚕食"。今后扫荡将更频繁与残酷，两个战役间的空隙将更缩短（五个月来各地区连续的扫荡与反扫荡战争已充分证明）。并增加了随时遭敌突然袭击的可能。

三、由于敌人对我根据地经济实行严格的封锁，并在扫荡中采取"彻底毁灭我军民生存条件"的"三光政策"，把一些地区完全毁灭成"无人区"。这样残酷的破坏，与五年来长期战争的负担，不能不使根据地民力凋敝，财政经济日趋困难。特别是军用器材更感缺乏。

四、由于斗争的残酷，不仅部队伤亡甚大，党政军民各级干部的伤亡也极大，特别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已成为敌人经常追踪袭击的主要目标，稍一疏忽，就有受敌人合击歼灭的危险。

五、由于某些地区党政民及地方武装的工作，还不深入，不巩固，群众游击战争的发动还非常不够；因而在今天新的情况下，表现无法应付。特别在根据地突然转为游击区或敌占区时，不善于去具体分析情况，正确掌握政策，即时转变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以致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六、由于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及敌人各种挑拨离间的欺骗活动，一部分上层分子可能在困难面前发生动摇分化。再由于我们个别地区的领导者，对于群众困难的关心与帮助不够，也可以使一部分落后群众在过度疲劳后，产生悲观失望与对我不满情绪。

我们对于上面所指出的困难，应有足够的估计和深刻的认识；畏惧困难，夸大困难，在困难面前退缩不前，这不是革命者的态度；但掩饰困难，与轻视困难，也必然会麻痹自己，放松了当前应努力完成的任务。某些地区由于对新的变动情况的研究与了解不够，因而在精神上与工作上缺少准备，当困难突然到来时，发生慌乱与不能应付的教训，必须加以研究与接受，使之不再重复。在目前新的残酷的斗争情况下，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工作：

首先是要在军事上对敌人日愈频繁的，突然的扫荡，提高空前的警惕性，更机动发挥游击战术，随时注意跳出敌人的包围合击，去消灭敌人与粉碎敌人的扫荡。特别要用最大的力量去加强民兵和地方武装的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开展破袭运动与爆炸运动，才能打击敌人的蚕食与封锁，才能使敌人行动不安，更多的疲惫敌人与减少我的损失，并造成主力打击敌人的有利机会。

其次，要改变一切组织机构，更加适合于今天残酷战争的环境，党政军的关系要做到一元化，庞大不便行动的后方机关必须缩小，同时由于长期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必须在各地适当配备能正确掌握政策独立工作的领导干部。

其三，要切实爱护节省与培养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一切工作应注意质量，坚决肃清浪费，铺张，不节省民力的现象，认真整理村财政（这是若干地区财政上浪费最大的地方），减少人民负担，并积极采用各种方法去帮助群众增加生产、改善群众生活。

其四，由于敌占区游击区有相当数量的增加，必须加强注意对这些区域工作的开展。当着某些地区估计可能转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时，应在事前即有准备，更要能够保存斗争力量，并以新的方法与敌人进行斗争。

其五，要加强对敌寇的政治攻势，敌寇五年的侵华战争，并未能灭亡中国，敌军士气已不如从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军伪组织内部更形动摇，敌占区人民遭受敌人日愈严重的掠夺（大量搜捕壮丁，实行配给制度，各种负担占整个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抗日情绪日愈增长，敌人今天在华北点线的增多，一方面虽增加其“分割扫荡”之便利，另一方面更感到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处处孤立在抗日人民大海中的危险。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向敌军伪军伪政权宣传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途，以瓦解日军，争取伪军及伪政权转向抗日。并向游击区敌占区居民扩大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

其六，要百倍加强内部团结，包括党内的团结，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这是克服一切困难，能够坚持的中心关键。党内的团结，要从这次整顿三风中，使全党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造成一致作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切实了解情况，正

确掌握政策，坚固团结在党中央正确路线周围，便能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有办法克服，不发生脱离群众，互相埋怨，悲观失望现象。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及其困难与要求，不仅要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去提高群众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以发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并且要在负担上认真爱护与节省民力,不使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要在敌人扫荡中与扫荡后，认真帮助群众转移掩藏，及对损害者实行各种救济工作。在敌占区应采取灵活的办法，以减少群众的损害。党政军各部分只有这样认真关心群众利益，才能与民众打成一片。由于敌人对华北各阶层人民日愈加重的压迫与掠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社会基础是更加扩大了，我们的政策要时时照顾到一切抗日阶层的利益，使日寇完全在中国人面前孤立起来。今天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局面，虽然比过去严重，但只要我们内部团结，政策不犯错误，我们能更进一步的依靠群众，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受敌人挑拨破坏，则一切困难都是能克服的。目前整个世界动向，又是于反侵略国家有利的，在华北敌后艰苦困难条件下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应遵照中央的号召“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学习，训练干部等），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今天的敌后战斗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

《解放日报》社论

在今年五六月间，敌人开始了以冀中平原为主要方面，太行、冀南为次要方面的战役扫荡，但由于敌兵力不足，只能纠集各交通线上的守备部队，向我进行突击性的扫荡。任凭敌人战役准备如何周密，战术运用上如何灵活，而其深入我腹地建立点线之部队，仍然受到一定程制的限制，而在我军英勇作战与不断的打击下，敌人的扫荡始终不能达到其消灭我军主力，摧毁我根据地之目的。

近来河北平原的我军已转趋活跃。冀南馆陶北阳堡战斗，我获全胜；冀中任邱边家坞战斗，将敌军官队全部歼灭；六月初深泽、无极一带的恶战，毙敌高级军官多人；单在六七两月，即歼敌七千以上。但由于敌采用奔袭我首脑机关、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以堡垒主义配合游击动作，实行其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对我薄弱区则取之竭泽而鱼的结果，我根据地内敌人的点线更加增多，我根据地的版图亦较前缩小。当此夏季扫荡告一结束之际，我们应该从错综复杂的战斗情况中，找出敌人战役指挥与战斗动作上的规律，以确定我作战指挥上的对策。

根据此次扫荡情况，敌之扫荡必经长期周密的布置，首先巩固其铁路地带以作扫荡的基地，组织爱护村警备队，并增设一与铁路平行的道沟，实行严密封锁；组织间谍特务，深入我根据地内部活动，收买封建迷信团体，侦察情报、组织暴动；同时利用铁路公路，抽出重兵以实行突击扫荡。在战术上敌虽诡诈百出，但仍不出“捕捉急袭”、“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转战驻剿”、“反伏合击”、“夜行晓袭”等战斗方式。

敌五六月夏季扫荡之结果，以及冀中冀南近来捷音的频传，证明了我们的指挥艺术与战斗力已大大提高，证明了敌军战斗力与士气的低落。敌虽行动诡密，然其动作仍须循一定的规律。只要我能掌握情况，冷静分析，判明其企图，而后决定对敌方策，即可以歼敌致胜，可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敌在交通沿线，密布点线，但其所谓“囚笼”的格子眼并不象图上那样密，而且敌之沟墙，仍便于我小部队隐蔽活动，因此在敌布置扫荡时，我仍可派出民兵游击队，深入敌占区游击活动，打击伪组织、伪警备队、自卫团，破坏其沟墙的挖筑，使敌无法利用伪军、伪警备队以换出日军，作为进行扫荡的机动部队。这样来破坏与紊乱敌之扫荡部署，并且可以制造敌之空隙，使我主力更能察明情况，作主动的战斗，或机动的转移。

扫荡中敌之捕捉急袭，近则易于为我察觉，远则难以及时捕捉且孤军突入，后援不继，粮弹不充，过度疲劳，我军如能察明情况，灵活应付，或为了保存力量，先机转移。如不及

转移，亦可依托地形工事，坚决抵抗，于敌以重大杀伤，求得在战斗中抓住敌人弱点，造成敌人空隙，到有利时，即可坚决突围，如北阳堡战斗，我军发觉敌跟踪追击，我部队还不及转移，于是赶筑工事，决心防御，战斗一直坚持到十四小时，杀伤消耗了敌军主力，待至天黑，即突出重围，我受很少损失，就是一个反敌奔袭很好的战例。

在敌向我根据地实行合围时，我中心区常常成为敌军合围合击的交会点。我军作战部队与机关混在一起，不便作战，且敌之包围纵深很大，合围圈很小。在一旦被敌合击之时，如果我不能先机突围，则必须改正我军过去驻扎必在中心区，转移必向中心区的老办法。在接敌封锁线的地方，反可择出敌较弱之一点，突出重围，纵受合击，但其纵深甚小，较易冲出。

在作战指挥上，则必力争主动，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在主动的转移与进攻中，不断的寻觅敌人的空隙与弱点，因为敌人在不断的辗转作战中，疲乏与松懈，是不可免的。而我则可利用隐蔽地形，天气昏暗，实行突然进袭，常能以小的兵力取得大的战果。小股或独立活动的部队，亦能抓住敌出巢归剿补给线及其战斗动作上的规律，实行待伏、诱伏、反伏击等动作，以短促突击，速打速决，使敌未及开展，即行解决战斗，迅速撤退。如六月间无极小吕庄战斗，任邱边家坞歼灭战，我均能于适当时机，预行设伏，而获得良好的战果，即是一个很好的先例。

战斗中灵活的分遣与集结，依靠指挥员指挥的艺术。在敌优势下，我主力则分散游击，独力作战，如遇有利时机，则实行适时集结，给敌以较大的打击；分遣的部队，则须注意自动互助。部队单纯分散而缺乏相互配合，必然会陷于挨打的地步。今天之反扫荡战斗中，不仅应注意于主力军的作战，而且应注意民兵游击队的游击战交通战坑道战的配合。因此主力军与地方军必须经常帮助民兵游击队，进行教育，带领他们作战，以锻炼其战斗力。

敌在军事扫荡之时，更加紧对接敌区实行蚕食，企图将我军限制于狭小地区迫我战斗。我军应该估计到：

在扫荡中，敌后某些点线无人守备，封锁沟墙无人巡查，警戒疏忽，城市机关庞大，必难掩护，故我突然袭击，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如在我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下，则可能给敌以重大的威胁，当敌以优势兵力深入我中心区时，我们即可抓紧敌后空虚，戒备疏忽的弱点，以主力向敌占区实行突击，配合根据地内之我军保卫我根据地之中心区，或调动敌军主力，使我根据地易于迅速恢复。

× × ×

敌后斗争愈艰苦，我们就更要加强军民团结，更加加强军民的政治教育，使大家能清楚认识目前的形势，认识“我们现在的困难是严重的，但是暂时的，牺牲是重大的，但胜利是在不远的将来。”（党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党员及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提高抗战的信心，防止可能因对目前形势估计不足而产生的急躁侥幸心理与悲观失望情绪，纠正可能因长期战争而发生的懈怠疏忽麻木不仁的现象，精细的研究战争中所引起的各种情况的变动，敏锐的洞察到敌人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并加深和扩大这种弱点。敌后的坚持必能得到我们的胜利。

[附] 在敌人疯狂进攻和严重天灾侵袭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经济惨遭破坏

——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为例——

(一) 晋 察 冀

晋察冀是从血泊里站起来的。今天这里的直上繁荣，都是昨日无穷血泪灌溉的花果。先看看昨日的血泪吧，那是旷古未有的沉重灾难。

头一项，看日寇“三光”“扫荡”“毁灭”对晋察冀有生力量摧毁的“成绩”：总计八年来敌人直接杀死我同胞七十二万六千八十八人，被敌虐待伤病致死的三十三万二千人，被抓走壮丁六十二万五千二百九十四人，耕畜损失八十六万三千五百一十五头。敌人频繁的劳役，八年来不完整统计是：游击区被抓伕要工三万万六千一百二十万个，每个劳力一月要给敌服劳役九天，多的竟达二十三天，而被敌强迫受训和伪村公所每天摊派候差的（日以四五十人计），还没算进去。此外，农具损失二千六百二十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七件，房屋仅冀热辽就被毁四百六十四万另四十六间，根据地内部，村庄房屋被烧十次的不算稀罕。

第二项，因敌破坏致使耕地面积缩减：敌人要“封锁”和“困死”晋察冀边区，于是，堡垒、公路、封锁沟墙重迭，占去大好良田一百四十万七千多亩。平山西回舍是个较富庶的村，四一年敌挖沟后，全村五分之三以上的水地和一半以上的旱地被圈在沟外。敌人早饭后开沟门，晚饭前关门，有时候好几天又不开门，使沟外土地不能及时上肥浇水耕种，于是水地变旱地，两季变一季，招致人民无穷损失。敌人又决堤放水，四四年七月，就造成冀中八九分区严重水灾，平地水深七尺，淹田亩百分之五十五。晋察冀热四省边缘地带的“无人区”和“人圈”，强人强迫那里人民丢开热爱的土地和成熟的庄稼，拖儿带女，集中到敌人指定的地点，住在他们自己被迫修筑来囚禁自己的围墙里面。热河承德等十县，总共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一十四户，就有二十一万四千一百七十九户被赶进去，承德、平泉等六县“无人区”达三千四百六十二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百分之十弱。这样，一片片繁荣的农村，竟落得个千里无人烟；一块块美好的田地，只变成个荒芜的漫野！热河“人圈”周围好大地面，乱草比人高，野兽成群，家鸡家狗家猪也变成野鸡野狗野猪。日本法西斯想把世界拉回到千万年前去！

在游击区、敌占区、日本法西斯还有繁重的捐税啊！地亩捐、人口捐、门户捐、银粮、借款……名目不下七十多种。敌寇靠伪军维持统治，伪军又多为了发财，所以就搜索枯肠想要钱的办法，比如向村里要了伪币，又以家里给边区缴统累税为名，叫一兑四换边币，然后又再叫一兑一换成伪币……这些花样数不清。勒索粮食是叫人民交“保管粮”“入大仓”，说是以后发还，实际是去而不返；又还有什么“代购粮”，更直接干脆的是抢。八年来，人

民被勒去粮款，共达二百二十三万万石！四二年十五个游击区村庄调查，各村对敌负担平均占总收入百分之六七点四三，其中有三个村达百分之百，一个村达百分之二百五十！同时，好多与敌伪勾结的汉奸、地主、买办强买强占大块的土地，有钱有势的把负担嫁在贫苦农民身上。从巩固区变成游击区的好多丧尽民族意识的地主更向农民反攻，撕毁过去减租的设施叫农民代出负担。多么富庶的冀中区，四二年“五一扫荡”后，平原上人民从过去一天三顿粮食改成了两顿谷糠、树叶。察北、热河一带，一家子冬天伙穿一身棉衣，姑娘媳妇成年穿不上裤子，客人进屋只好用锅盖遮羞……这就是所谓“王道乐土”的“风景线”！

就由于敌寇的灾害，致人民有生力量大减，元气大伤，于是连年天灾病灾也就严重：三九年边区大水灾，敌人又在冀中趁机决堤一百二十八处，致全边区十七万顷田亩被毁，冲粮食不下六十万石，波及村庄近万。冀西房屋塌六万多间，人、畜伤亡很多，灾民三百万。四二年冀西大旱，受灾三十九县，灾民十八万；四三年完县、曲阳连旱，八月初才落透雨，收成很坏；四四年大部地区风调雨顺，但滹沱河永定河下游水灾，灾民一百四十万，而且四十六县蝗灾，其中二十三县就被毁土地八十万亩，稻苞虫和蚜虫也毁了一部稻子。去年，各地到七月才落透雨，好多地区播种三四次，小麦旱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夏秋又遭数十年没有的大雹灾，受灾四十多县，雹块大的有重二三十斤的，毁禾苗一百五十万亩；秋天，反攻进军时候，忽然阴雨连绵，四十多县受灾，冲地五十六万亩，冀东被冲房屋六千间；同时候，蝗灾又发生于冀西冀中二十二个县，害田地十二万亩，冀东因水、雹、蝗灾和地震，使一百万亩土地没收成，灾民五十万；阜平全县十万人口，灾民就达二万三千。

最后，还由于敌寇野蛮烧杀和散播毒菌，八年来病灾：四一年秋敌“扫荡”后，北岳区害病的十万人，病死的仅盂县平山就一万多；四三年冬敌“扫荡”后，仅灵寿县二十四个村子七千四百人当中，就病了八百一十四个；四三年敌蚕食灵寿行唐地区，灵寿三区病人三，七八四名，死一，二九五个……

（节自水生《八年来晋察冀怎样战胜了敌祸天灾》。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353页）

（二）晋 冀 鲁 豫

延续最久，波及地域最广，造成的损失最大的灾荒是旱灾（晋、冀、鲁、豫各省，向来就是年降雨量较少常常苦旱的地区）。

一九三九年，冀南故城、景县、阜城及津浦路东各县，就因旱灾影响，籽粒无收，被灾难民达五十万人。太行区从一九四〇年以来，年年苦旱。一九四二年，五、六两专区秋禾就很少收成，只是在政府大力救济下，才没有酿成巨灾。

一九四三年，旱灾灾情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被灾面积差不多包括太行和冀南的全部（冀南灾区约为全面积的五分之四），太岳的大部，和冀鲁豫的一部分，而以太行四、五、六专区、冀南一、二、四、六专区、冀鲁豫沙区等地最为严重，成为百年来第一个大灾荒。太行三专区左权、武乡一带是灾情较轻的区域，但那里的景象，已经是够触目惊心的了！从五月底开始，八十多天没落过一个雨点。赤日炎炎，如灼如烤，水井和溪流干涸了，人畜的饮水都发生了恐慌。焦渴的土地上，布满了纵横的大裂纹，掘地三尺看不到一点湿气。茎叶上满是尘埃的禾苗，由萎黄而干枯，几乎一个火星就可以引起燎原大火。燥热得简直要燃烧起来

的空气中，飞扬着尘沙，使人窒息。田野、山林，一切都成了赭色，如果不是那恼人的炎热，人们会认为季节已经进入衰杨荒草的深秋了。

冀南一专区的大名、成安等县，自春迄秋，旱灾绵延近八个月，麦季无收，大秋也播种得很少。六专区的冀县，二专区的钜鹿等地，入秋后仍白地一片。灾情较轻的南宫，二百三十一个村子中，就有一百零七个村属于“无苗区”。全冀南区共有八百八十四万亩耕地，因旱灾未能播种。直到八月下旬，各地才普遍降雨。但农时已过，重灾区棵苗俱无，轻灾区的田禾，也大部变作一片随风摇荡的枯草。面对着这样情景，一场透雨又会有什么作用！受灾最轻的区域，加上抢种晚作物，收获量也减少三成到四成。很多地区只有二成到三成的收获。

据解放区救济总会晋冀鲁豫分会的统计，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历年因旱灾损毁的田禾，计达五千四百九十万亩，共减产一百三十一亿七千六百万斤。

有的灾荒，比如平原的水灾，虽然基本原因是受自然环境破坏（如森林砍伐，滥垦山地，蓄水湖泊的淤塞等）及夏季洪水的影响，但是成灾的直接原因，则是敌人制造灾荒的政策。一九三九年七月，敌人趁山洪暴发河水上涨的时候，先后掘开了滏阳河、运河及滹沱河的河堤，使隆平、清河、任县、枣强等三十县一片汪洋，“淹没村庄三千零八十二个，地五万五千零九十六顷，灾民约三百余万”，（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日，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对冀南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滏阳河沿岸，大陆泽（任县、南和县境）和宁晋泊一带，平地水深一丈四、五尺，直到一九四〇年春季，水还没有退尽。饥饿的群众，只能仿效我们太古时代的祖先，捞取鱼虾水藻，煮来充饥。

一九四三年秋季，苦旱后淫雨连绵，冀南人民火急地进行补种、抢种，想从旱灾的重压下舒一口气。敌人却利用秋汛，于九月二十七日，在临清的大石桥，武城的渡口驿、夏庄等处，使运河决口；并在漳河县南上村溃决了漳河河堤；在鸡泽县境掘开了滏阳河。洪水横流，大片肥沃的原野，再度陆沉。据事后调查，和一九三九年一样，氾滥的河水又波及到近三十个县，其中以三专区的管陶、六专区的武城、故城、清河等县，受灾最重。管陶全县百分之六十四的村庄，成了水区；武城全县二百二十六个村庄，被淹了一百一十个，淹地约占全县面积的五分之三；清河被淹了四分之三；故城也大部被淹。二专区的任县、隆平，简直成了滏阳河的储水湖。许多村庄，更人畜漂没，房屋倒坍，仅余一片半浸在水中的断墙败垣。当地军民进行了拚死的抢救、筑堤与疏河，才使水势稍杀，水患稍缓。而敌人却不分昼夜，驾着小艇，到处抢粮和袭击筑堤的民工，以破坏筑堤工程。

冀南的河流，大部由南而北，在冀中区汇流入海。敌人在本区的主要交通线，如德（州）石（家庄）铁路，邯（郸）大（名）、邢（台）南（宫）等公路，都是自西而东，横穿各河流。加以封锁沟墙纵横如织，既雍塞了各河流入海的通道，又开辟了无数漫溢的尾闾。所以水灾面积，极易扩大，水的宣泄，倍加困难，因而无端扩大和延长了人民的痛苦。

前引救济分会的统计，关于这一项损失的记载是：冀南、冀鲁豫历年被淹没的土地，累计为一亿一千四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七十亩，共减产粮食五十二亿六千三百万斤。

此外，如虫灾、雹灾等，也都曾经给边区人民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和灾祸。如一九三九年，冀南威县、南宫等十五县，就因虫灾使秋收减成；一九四三年秋，太行区冀西各县，虫灾使粮食与蔬菜都受了很大的损害。同年的同一季节，冀南四专区的临清、广曲、企之等县，约一千四五百平方华里的区域，发生雹灾，落雹大者如碗，人民在旱灾余威下抢种的晚

苗和蔬菜，全被砸平。这一年中，太行区的雹灾，也使该区的山货出产大为歉收。

生活条件的恶化，必然会引起疾病的流行，这就构成了另一种的灾害。据太行区左权县拐儿镇一地的调查：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三种疾病（伤寒、疟疾、疥疮）的患者，一九三九年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一，一九四〇年百分之二十一，一九四一年多达百分之二二点三，也就是说差不多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生病。这种情形，在山区是相当普遍的。

一九四三年夏秋之交，冀南区旱灾严重的时候，各种传染病也大为猖獗。冀南二专区钜鹿县，因霍乱致死的达三千人。三专区曲周县东王堡村，一百五十户中死亡六百人，就中因传染病致死的占五分之四。四专区邢济路北的威县南胡帐村，自八月五日起至十月十七日止，一百七十户中死了二百三十人；路南丘县梁二庄，在同一期间，三百户中死人四百。六专区垂杨、枣南、清河一带，疫疾的流行更为厉害，清河黄金庄，曾在一天之内死人二百。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的全区性的蝗灾，是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灾祸。这一历史性的灾祸，曾经严重地威胁着边区人民的生存，而它的扑灭，则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九四三年，敌占区平汉线两侧，磁县、武安一带，就发生过蝗灾，秋苗全被吃光。冀南在大旱之后，也普遍发生蝗灾，灾区蔓延到一专区的漳河、大名、魏县、元城、二专区的钜鹿，三专区平大路东一带，四专区的全部，五专区的景南、衡水，六专区的武城、清河、垂杨等许多县份。当时，国民党政府治下的河南，也发生了非常厉害的蝗灾。但不论国民党的河南省政府也好，或是日本殖民者也好，他们对此都无所作为。他们继承了历来统治者古老的传统，让老百姓“听天由命”。所以大批飞蝗便有机会飞进了解放区。一个突袭，就使安阳等县损失了它们秋季收成的三分之二。（中略）

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所加诸边区的灭绝人性的摧残，以及由此引起或加剧了的灾荒，双管齐下，一天天紧缩着人们生存的道路。对于这种情景，单说是生产萎缩，实在远不能给人一个残破凋零的深刻印象。

在根据地，那就是农村积蓄的迅速枯竭，劳动生产力的大量削弱，人民经济生活条件的极度恶化。还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据当时的冀太联办专员县长会议所提供的材料，冀西内丘、赞皇、临城的五个区又十八个村，壮丁平均减少了百分之八点八；冀西六县的牲畜，平均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九。太行区战前每个劳动力，平均耕地二十亩，一九四二年要耕三十到四十亩。冀南战前每四十亩地有耕牛一头，到一九四三年，平均每百亩才有一头。与此相应的，那就是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生产量的普遍降低：平均降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生活条件的贫困，几乎已经达到人类忍耐力的极限。如太岳区的沁源，大部房屋被敌人烧光，人们只能到山沟里边，穴居野处。冀南曲周张潮一带的村庄，不仅房子全被烧毁，财物全被抢光，连日常用的各种家具，也被破坏无余。脸盆打碎了，人们只能用瓦片盛一点水洗脸，饭锅只余下几口，大家只好轮流煮饭，许多人家晚上才吃早饭，每天只能一餐。

在游击区和敌占农村，那就是大批的惨死和逃亡。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太行的接敌区，就出现了“人肉胀死了野狗，荆莽侵占了田园”的“无人区”，冀西一带的无人区，宽达十里至二十里；昔（阳）西的无人区，宽达三、四十里。

一九四三年春季旱灾严重时，冀南的游击区如大名、成安、魏县一带，人民普遍以糠菜树叶为粮，除松柏以外，所有树木的叶子、树皮全被采光。在那里，毁身销骨的生活苦难，使人们的状貌都变得不同于常人。他们大都头大颈长，膛目咋舌，踉跄而行，骑步而立。人们的劳动能力已全部丧失，不仅田间操作无法进行，就是运碾推磨，担物取水，也不能胜

任。每当日出时，饥饿的人群相率斜倚仰卧，在街巷间晒太阳，很多人就在这种昏睡状态中死去。每逢市集，人们纷纷把农具和其他家具，以至锅碗盆勺、破衣烂裳，拿来出卖。有些人便死于往返的路途中，或者倒毙在市场上（垂杨县段芦头村，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的一次市集上，就倒毙三十人）。

夜间，当我们进入这些地区的时候，我们所能听到的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的村庄和家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单见野草丛丛，一片秽芜，各种什俱，如桌、凳、橱、柜之类，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这说明主人曾经把它们拿去变卖，而后来已无力放归原处。这些东西的旁边，往往就是僵卧的尸体。有些人正是在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是因为忍受不了这种苦难而自杀的。因为无人善后，自缢而死的人的尸体，一直挂在房梁上或院中的树上，黑黝黝地，加重了恐怖感。奇异的腥臭，使人难以忍耐！

在这里，很少遇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算是例外。由于食物奇缺，这些潜伏在地下的动物，也发生了饥荒。夜间行军的时候，人们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象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鼠群。据事后调查，这类地区人民的死亡率，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到十五，逃亡者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敌占区的重灾区，几乎整个整个的村庄，都被饥饿和疫疾扫光。人口死亡率，最高者达百分之四十，逃亡率最高者达百分之九十。在这一期间，全冀南区人口死亡二十万至三十万，逃亡一百万。总之，“非死即徙”。

太南、豫北的陵川，高平、晋（城）东、修武、博爱、沁阳一带，在国民党军庞炳勳、孙殿英等部（后来都成了伪军）的横征暴敛及公开的掠夺下，整个社会已濒于毁灭。据太行区党委研究室所公布的材料，陵川全县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政变前约有七万人，在国民党军统治的三年半中（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政变到一九四三年七月我军解放太南），人口死亡达一万三千三百零三人，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九点零四，即约为五分之一。高平二十八个村的统计，在同一期间，原有的一万四千四百四十六人中，有四千六百七十六人死亡，一千六百八十人逃亡，损失了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四。沁（阳）博（爱）十四个村统计，死亡及逃亡的占原有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从三千七百二十三人减为四百二十九人），其中死亡的又占多数。人民赖以进行耕作的牲畜，被宰杀殆尽。陵川全县在国民党军统治期间，牲畜从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九头减少为三千九百六十八头，损失了百分之七十点八二。高平二十八个村的统计，损失为百分之七十七点五一。沁（阳）博（爱）十四个村统计，三百零八头减到只余七头，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七点七二（“太行区社会经济调查第二集”第十一页）。

另据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央太行区党委研究室、办公室所发出的通报中指出，豫北的沁阳、博爱、武陟三个县五个村的调查结果，户数平均较战前减少了五分之一以上，最高的达百分之四十九；另六个村的统计，人口平均较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一，最多的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五。博爱全县，战前二十八万人，到解放时只剩下二十万，不算新出生的，也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八点六。前举武陟、沁阳、博爱三个县六个村的统计，牲畜平均损失了百分之六十五点五，其中一村损失净尽，两村为百分之七十，两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差不多快要灭绝了。太行八专区参议员在边区一届一次参议会的太行区会议上，曾悲愤地控诉国民党军二十七军投敌前后所给予沁阳、博爱一带人民的灾难说：那里“遍地是死尸，每家有死人，人吃人成了常事，后来连死人骨头也烧吃了。”这就是国民党军阀和敌伪控制下的太南、豫

北地区人民灾难深重的生活的写照。

当时的一个新闻记者的报导，非常形象地显示了这种悲惨的情景：

“初到豫北的人，如果登高一望，会看到一片片油绿田地，觉得秋禾还不错啊！但是走近一看，原来并不是什么苗，而是高达六尺的黄蒿，从田野长到村街中，长到房院中，到处都成了黄蒿世界。院里是青青的，房子是空空的，没有了门窗，也没有了家具，碗锅锄耙一无所有，房子的角落里不时发现死人的骨头。据乐崞姓王的老乡说：他的亲兄弟三月出门被人拉走剥吃了。玉皇庙某家女人把自己女儿送人剥了，自己分了一条腿吃。斗沟七、八家人只剩三家，当中一家是刚从外逃难回来的。观沟十四岁小孩马全林一家八口，饿死七口，只剩他一个。”（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解放日报”：“日寇劫后的豫北”）

当边区的人民子弟兵于一九四四年秋，最后扫荡了庞逆炳勳及其主人日本帝国主义在豫北的万恶统治，进入这传奇式的恐怖世界时，战士们发现村中的房屋深处，在被野兽吃剩的狼籍的尸体和一具具露着牙齿、带着头发的骨髅旁边，母狼正哺乳着它的小团。

“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诗人的悲叹，比起这触目惊心的现实情景来，完全算不得什么了。

而且，必须记住：第一，这种灾荒不是静止的，它是蔓延的，发展的。第二，随着对敌军事斗争的开展，前举那些敌伪占据的灾荒区，都逐渐被收复成为根据地了（如太南、豫北）。第三，和处理根据地的灾民问题同时，抗日政府还必须安插和救济那些从敌占区九死一生跑到根据地来寻求生路的难民。因此，边区党和政府所担负的灾荒的重压，远远超过根据地的范围。例如在一九四三年中，太行区待救灾民约三十五万人；太岳区仅二分区即有灾民十万人，占该分区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但在同一期间，由豫北、冀西敌占区和黄河以南的国民党统治区逃来太行太岳的难民，也数达二十五万人左右。

这就是边区政府和人民重建自己的经济生活的起点。

在这种旷世未闻的苦难中，边区党和人民的责任，不仅是要咬紧牙关，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对敌斗争；而且还要积蓄力量，以便时机到来，和各兄弟区和全国人民一道，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就是“组织起来”，这“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五一页），开展大生产运动。而其第一步，则是生产自救，战胜灾荒。

边区党和人民这样做了，他们胜利了！

（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强抗日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健全其领导系统。

(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五)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七)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八)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九)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

（十）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鄜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租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十一）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十二）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十四）继续进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活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材，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十五）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材，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六）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十九）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

（二十）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二十一）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

（一）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

（二）解释学习理论与参加实际工作都是每个党员不可或缺的责任。但在革命运动中，尤其领导着军队和政权的党，共产党员决不能离开各项实际工作去“专做”理论工作（虽然可以与应该有一小部人专门从事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决不能单单埋头实际工作而完全不学习理论。因此藉口学习理论而不愿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埋头实际工作而不在工作中抽暇学习理论的倾向，都必须纠正。

（三）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分配，纠正某些党员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

（四）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门家学习。他们的责任是诚心诚意的学习和熟练于自己的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同时并使每个党员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

（五）党必需加强对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中党员与非党员的领导，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

中央书记处

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建设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报告提纲

（一九四一年九月）

彭　真

我的报告，分两部分：

（一）党在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具体政策。

（二）晋察冀边区党的建设。

内容：主要是报告我们如何在晋察冀边区具体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因此：

（一）一切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只限于晋察冀边区，所提出的意见也只是根据晋察冀边区的一些经验和材料。时间是从边区创造起到本年（一九四一）二月止，约三年零三个月。只有个别问题，包括着最近的材料。

（二）报告的目的在总结我们在具体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中的经验和教训，故取材不得不选择典型，主要是工作较好，较深入的地区和一部分工作最坏的地区的。因为只有这些地区里，问题才发生得最多，表现得也最明显，因而比较容易看得出问题究应如何解决。——实际上边区工作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上）各项具体政策

一　边区内部几个主要阶层在抗战中的政治动向

（一）边区的环境与条件

首先我们谈一谈边区的环境与条件，这些决定边区各阶层人民动向的因素：

第一，我们的环境不但是敌后，而且是相持阶段的敌后，经常处在残酷的战争中。战争“是全民族抗日的”，在这里已不是一种政治上的分析，或理论上的预言。而是现实的千真万确的全体人民的实践。就在这种实际生活的体验中，各阶层人民已逐渐了解了必须团结抗日的具体真理，已逐渐了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是最适合于今天中国国情的政治，而共产党则是真正的人民之友。

其次，残酷的动荡的战争环境，给了我们很大的困难，但也给了我们以工作上的便利，

并且具体的决定了各阶层人民的政治态度与积极性。

第二，敌人占有着边区周围乃至内部的大小城市，我则拥有乡村。但敌人所拥有的基本上还只是点线，或用点线组成的网和一些小的面，而我则拥有着广大的由乡村组成的面，拥有着广大的物产和广大的人民及其田园。这一点对于某些阶层的政治态度，有着决定的意义。

第三，以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来说：在军事上、政治上，我们都占着优势，基本群众也已经翻了身，但是在经济上地主资产阶级纵然不说是仍然占有优势的话，也可说仍然有相当大的势力（详细解释见经济政策部分）。因此，它不同于此时华中敌后的情况，那里顽固派的军队在某些地方占有优势（这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有很大的影响）；它也不同于陕甘宁边区，这里已经经历了土地革命，在境内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没有经济上的优势；当然也不同于党的组织还没有普遍发展，基本群众还没有动员组织起来，因而群众还没有翻身的地区（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在群众已经翻身之后和群众未起来之前有极大的差别）。

第四，这里所说的，只适合于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能正常行使其职权，我能确定统治的区域，至敌占区及敌占优势或敌我对峙的游击区不包括在内。在这些区域内的各阶层人民和根据地内部各阶层人民的政治态度是不同的，即在同一地区内，当敌寇反复“扫荡”时，和“扫荡”被粉碎后的战役相持期间的较安定时期也不同，这里只能一般的讲。

第五，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中央各项政策是根据敌我及国内各阶级的具体关系决定的，但同样又反过来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各阶层人民在抗战中的态度。问题是很显然的，如果我们现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或者在减租减息后仍不缴租缴息，即变象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废除债务，那末地主不但不会同我们合作抗日，而且一定会联合日寇反对我们。反之，如果我们的政策正确，已投敌的地主又可争取其回来。对于民族资本家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只图改良工人生活，而使资本家根本无利可图，甚至赔本，那末即使极有民族意识的资本家也会反对我们。这种关系对于基本群众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能实际改善他们的政治和物质生活，他们便不会积极抗日，也不会积极拥护抗日政府。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我们的具体政策正确与否，对于各阶层人民的政治态度有着决定的意义，有着极大的能动性。

现在讲几个主要阶层人民的动态。

（二）各阶层人民的一般动向

第一，地主阶级。

少数大的地主，特别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失意军阀官僚有不少已投敌或者是同情敌人。

拥有极少数量的土地，纵然自耕也不能糊口，或者根本无力自耕，因而把地出租的所谓“小地主”，他们有的是老弱残废，孤儿寡妇，有的是小贩、工人或手工业者，甚至是雇农，这一部分人实质上多半是贫民，并不是真正地主。即在俄国也曾有过把分有地出租的贫农，但列宁在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中仍把他们当作贫农，并未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

如果把极少数的大地主和名实不符，实质上是贫民而不是地主的一部分“小地主”除外，那末地主阶级的态度一般是这样的：

以抗日问题来说：在根据地创造初期，很大一部分是动摇的，一部分则在较大地主的领导或影响下，采取着两面派的态度，甚至公开或秘密的勾结敌人，组成所谓联庄或会门区域，摇摆于敌我之间，对敌我均宣布中立，而在客观上则帮助了敌人。及至根据地日渐巩固，我

们的统治及基本群众的优势已经确定，党的各项政策逐渐贯彻之后，地主阶级的态度改变了，差不多全部转向抗日或同情抗日了，只有个别地主才站在敌人方面或者公开充当汉奸。问题是很有趣的，地主阶级因为是土地之主，所以不喜欢革命，甚至有些顽固。但是地主的土地是座落在乡村的。在敌占城市，我占乡村的形势下，地主阶级的土地上树立着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自然任何地主有逃往到敌占城市去的自由，但是他却搬不走他的土地；他也有充当汉奸的自由，但是这样一来，他的土地或地租立刻便有根本丧失的危险，而土地和地租却又是地主的生命。加以地主逃亡敌占区之后，要缴纳敌人以捐税，要遭受敌人的勒索，甚至妻女被奸淫，人格被污辱。凡此种种都使得地主不敢轻易投敌，甚至不得不抗日。抗战以来晋察冀边区的历史在在都证明这个浅近的真理。

再以民主问题来讲，当地主阶级的专政尚未打破，民主政治尚未确立，我之优势，特别是基本群众的优势，尚未取得，因而根据地也还没有巩固的时候，地主阶级对于民主运动是反对、仇视、至少是没有好感的。因为争取民主，实行民主的实质，就是摧毁封建的国家制度，就是打破地主阶级的专政，他们的反对是当然的。

但是基本群众翻身了，他们把地主阶级的武装拿来武装了自己或自己的队伍，把地主阶级的专政粉碎并在它的旧址上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了。这种新的政权对一切抗日的地主仍然是平等的、民主的，但是专政惯了的地主老爷们却十二万分的过不惯。于是他们用困兽一样的苦斗来抗阻这种为民族抗战所必需的民主运动的潮流。于是问题愈来愈严重了，在地主阶级的挑衅下，广大群众自己动手来教训顽固分子，甚至侵犯他们的政权、财权以至人权了。平日鱼肉乡民的土劣，开始得到了报应，压迫者开始受到压迫了。换句话说，地主阶级的专政被打破，即他们底所谓的“秩序”开始被动摇了。于是地主阶级发生极大的愤怒、忧虑和动摇。他们愤怒的是平日驯如羔羊的“无知农民，胆敢起来造反”。他们在新的民主秩序面前，像大海中迷失方向的帆船一样，惴惴然感到了前途的渺茫，因为他们不敢确信的肯定，我们和基本群众最后究竟将如何对待他们。于是他们带着愤怒、震恐、忧虑的神气，在十字街头动摇，踌躇。

但是，很快我们提出并实行了政权三三制，严格的实行保护一切抗日人民的政权、人权和财权。于是他们喜形于色了，恍然大悟的感觉到，在这样条件下，拥护和参加抗日民主政权，远比他们盲目的反对为有利。他们转而拥护民主了，有的在摇头摆尾的高唱“虽尧舜之世不如也”了——这就是地主阶级对于民主问题的具体态度。如果要问地主阶级对于民主政治“何前倨而后恭”？那他的答覆必定是：“现在我已丧失了我以前的专政，而新政权对我又还好”。

其次，关于民生问题。地主阶级的本性，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对于减租减息当然是反对的。但是，这只是说在根据地创造的初期，在基本群众未翻身之前。接着农民群众起来了，减了租、减了息还不算，有的干脆根本不缴租，不还债，连地主收地都不允许了。当然地主也不是好惹的，他想尽一切方法来报复，他曾不择手段的企图给农民以惩罚。但是他的专政丧失了，因此，他在每一度白热化的愤怒之后，总是发现他已被解除了压迫农民的武装。于是他渐渐恐慌起来了，担心农民将根本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投敌当汉奸对他又太危险，于是才开始作退一步的想法，开始承认减租减息为合理而要求依约缴租缴息了。有的在说：“不减租减息不合乎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减了租、减了息，就应该缴租缴息，不缴租、不缴息也是违犯统一战线”了。总之，这时他们已无力反对减租减息，而只斤斤于减租

减息之后农民是否应该缴租还债了。他们的头脑“清醒”了，“主张公道”了。

但是对于工人改良生活问题，除经营地主外，有些地主的态度似乎是颇为开明的。有时甚至幸灾乐祸，大慷其他人之慨，以煊耀他是如何如何的同情无产阶级，藉以缓和他们和基本群众的恶感，转移基本群众的斗争目标。但有时也乘机结合富农及中等资产阶级以共同抗拒基本群众生活改善的斗争。特别是在实行合理负担、征收公粮的时候，地主富农往往完全站在同一立场，希望“平均摊派”，并扩大“负担面”。

总之，晋察冀边区地主阶级的“开明”是在基本群众已经翻身，民主政治已经确立，他们的专政业已彻底被打破，而群众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已使地主阶级不得不让步的时候。事实证明农民地主间不经过必要的斗争与磨擦，地主阶级的开明是不可能的，地主与农民关系的调整也是困难的。

第二，富农和中等资产阶级的态度——在边区境内，没有什么大资本家，至于富农和中等资产阶级，不但对抗战积极拥护，即对实行民主亦多积极支持。但是一谈到改善民生问题就复杂化了，他们的态度不但不同于地主，即富农、中等资产阶级内部亦往往有极大的分歧。以减租来说，同时把部分土地出租的富农或商业主则和地主一样的反对，而租地耕种的富农（佃农式的富农）或工商业主则又积极拥护，最大多数是漠不关心的。再以减息而论，同时放有部分高利贷的农工商业中等资产阶级，则积极反对，而同时负有部分债务者（部分富农和工场主为维持或扩大经营，有时举债），则又表示拥护。但是，不管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有如何的差异，一提出要改善工人生活，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他们的态度往往立刻一致起来，共同进行顽强的抗拒，不择手段的阻挠，起码是不大欢迎——这就是关于富农及中等资产阶级政治动向的漫画。

第三，中农、贫农、乡村工人及一切贫苦群众（游民除外）的政治态度，也可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是在根据地创造伊始，他们的政治及组织独立性尚未真正形成，政治积极性尚未真正发扬，因此一般的说尚未脱离地主和富农的控制与影响。这时，他们是拥护抗日民主，拥护改善民生的。但是除过一部分积极分子外，却仍在瞻前顾后的观望形势，畏首畏尾，犹豫不决，表现着一副怯懦怕事的神情。有时对于已经卸掉的枷锁，似乎还有点恋恋不舍，对于已经减去的剥削也似乎仍有无限留恋，表示于心不安或十分的不惯。这种说法似乎不近情理，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有不少农民在依法公开减租减息之后，又偷偷把已减的租息照原数退回，此即所谓“明减暗不减”。有的工人在增加工资之后，又暗与雇主约定“明加暗不加”。有的工人贫农已经当选村长了，但凡事又偷偷去请示地主、士绅或雇主。装出一副可怜相去摇尾乞怜，或者祈谅。这种情形在当时，虽不是一般的，却也有着举不胜举的例子。当然并不是说他们真正不欢迎改善生活，而是由于惧怕地主、雇主报复，由于思想上的蒙昧，经验上的缺乏，还没有阶级的自觉和独立性，还没有认识自己的力量。

同样的乡村工人，也是同样的农民，但是在他们确实经过一些斗争之后（开始是自上而下发动的），逐渐真正觉悟、组织起来了。于是他们“胆敢造反”了，他们的胸挺起来了，头昂起来了，勇敢了。有的农民在减租减息之后，根本不缴租，不还债，甚至在地主讨租时，大算其糊涂账，直至算到要地主倒贴。有的在村民大会上当众指骂顽固地主而根本剥夺其选举和被选举权。有的农民开始向凶恶的地主挑衅了，有的雇农则在选举中要求其雇主投自己的票，并美其名曰“劳资合作”。……总之，以过去地主资产阶级对待他们的办法来回敬地

主、雇主了。诸如此类的例子不一而足。总之，一切都翻过来，一切都进一步想了。这代表着群众运动的一个阶段。

但是这种逾越客观条件许可范围的斗争，并没有持续好久，很快的被事实证明，这种“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无益的冲突，应该迅速终止，工农应该照顾全局。在已经获得优势，已经翻身之后，应该迅速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应该使双方的斗争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因为当前的全副武装的异族敌人正在威胁着各阶层人民的共同生存，覆巢之下无完卵，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在这里是完全平等的。这就逐渐迫使基本群众和地主资本家的态度逐渐符合于统一战线的环境与方针，俯就了当前抗日战争的需要。这个阶段是从去年我们接到中央七七三周年的指示，颁布了二十条施政纲领所谓“双十纲领”的时候开始的。

第四，游民阶层的动向——游民阶层在根据地内有着相当多的数量和种类，计有乡约、地保、退伍的保安队、警察、退职的衙役（俗称狗腿子）、狱吏、禁卒、讼棍、赌徒、惯匪、窃盗、娼妓、破鞋、毒贩、乞丐、兵痞子、人贩子、吹鼓手、巫医、神婆、算命先生、游方僧道以及职业的黑枪手等等，总之是各种靠“所谓不名誉的或不正当的职业过活”的人。他们的行径为地主资产阶级所鄙视，但极少一部分又为地主豪绅等旧势力所豢养来为虎作伥，鱼肉乡民。因此又往往为一般农民所厌恶，所惧怕。在抗战和根据地创造开始，这个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极少一部分投降敌寇成为伪军汉奸，绝大部分则积极参加了抗日运动。特别在根据地开创初期，一般群众尚在瞻前顾后的观望不前，而很多游民分子却因为消息灵通，嗅觉锐敏，既无身家之累，对现社会又很少留恋，于是首先奋起与少数积极革命分子共同作了开路先锋，在根据地的开辟中曾起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

随着根据地的发展，绝大部分游民变为抗日群众、战士乃至干部。但也有极少一部分因为各种工作，特别是财政经济制度正规化，不能任意为非作歹，任意贪污浪费，自动逃亡或在被洗刷后愤而投敌了。

一般的说来，这个阶层由于他的整个生活地位决定他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动摇阶层”。一方面他的朝不保夕的半饥饿的生活地位，使他对现状很少留恋，甚至不满意于现状，因而蕴藏有颇大的革命性，易被革命牵入运动中，并且成为很积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却又因为缺乏具体的明确的斗争对象，因而缺乏明确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建设性与坚定性，表现“破坏有馀而建设不足”，表现“有奶便是娘”的性格，因而有极少一部分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但他们的两重性是随着整个革命形势的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别的。在革命的高潮与来潮，革命斗争胜利的情况下，差不多整个游民阶层都有很大的革命性，并卷入革命运动，站在革命运动的前线。反之在革命低潮，特别是退潮与失败而反动的旧统治暂时获得巩固的时候，其中一部分又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来作反革命的活动。但不管情势如何，被收买的往往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反动统治者不可能同时也不需要收买其大部或全部。

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内，有着进步的政权，有着充分的政治条件和适当的物质力量，是可以克服他们的两面性、动摇性、争取教育并彻底改造他们的。同时也必须耐心的教育改造他们。不然便不能真正顺利的巩固一个抗日根据地，有些游民会被敌人收买，作为敌寇可恶的爪牙。

（三）反共高潮中各阶层人民的态度

国民党，大资产阶级顽固派，无论如何动摇，如何采取反动的两面政策，只要他还不投

降，则中国究竟还是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局面。因此，一般群众也还是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国共两党身上的。当然，地主资产阶级一般的会偏袒国民党；而基本群众则支持我们，偏袒我们。但在反共高潮和反磨擦斗争中，一般说这样的人最多：拥护抗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顽固派打我们，他们同情我们的自卫斗争；如果我们先进攻顽固派或者我们的反磨擦斗争作得过火一点的时候，他们又会不以为然。

地主资产阶级，特别是地主，每当国内形势严重时往往像惊弓之鸟一样，警惕性极高。他们多半不赞成国民党投降，但这不一定是简单因为要抗战到底，而且还因为惧怕国民党投降，国共分家打起内战之后，我们又会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内战时的一整套搬出来。因此往往发生很大的恐慌、动摇和震荡。这时严肃的坚持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至于一般基本群众则担心分裂，希望好转；但同时也有一部分积极分子，经不住顽固派挑衅的刺激，发生过左的倾向，不顾大局，不顾统一战线，想痛快的干一下。

民族敌人与汉奸在反共高潮中，则幸灾乐祸，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挑拨离间，企图乘机争取地主、富农以扩大日寇在华的社会基础。

(四) 简单的结论

(一)根据上面的叙述，可以明显的看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大类矛盾。第一类是中日民族矛盾，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第二类是封建势力与反封建势力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前者是国外矛盾，后者是国内矛盾。但是不管矛盾如何复杂，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是从属的，国外矛盾即中日矛盾始终还是主导的，基本的（这是一九三七年五一党大会上毛泽东同志的预见之确切的证明）。这在现在仍然是我们一切具体政策决定的基础。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同时也必需团结全民族以抗日。

(二)单以国内两种矛盾，即封建势力与反封建势力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来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后者是从属的，不但不可能，同时也不应该企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结束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或完成。前者，即封建势力与反封建势力的矛盾则是主要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可能解决，同时也必须解决——虽然要经过极复杂极曲折的过程。因为今天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阶段，故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富农经济的发展，不但不应该阻挠，而且应该给以便利。我们对于富农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般的说，今天主要的还是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还是在允许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范围内适当改良工人生活的斗争。而不是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或削弱资本主义经济的斗争，这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已讲的很清楚，但往往为人所忽略，以致把两种国内矛盾同等看待。

(三)因为国外矛盾是主要矛盾，因为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今天正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中，需要同时也可能团结全民族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因此在根据地内，我们对于封建制度，只能采取逐渐削弱的政策，而不能采取直接推翻打倒的政策。这样就使本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地主（中国封建残余的代表），虽然一方面仍然是民主革命的对象（在反封建斗争上），同时却又成为抗日的同盟者之一，成为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战的力量之一。

(四)是的，地主阶级在抗日问题上，仍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我们的同盟者，但在民主问题上，却仍然是具体的斗争对象。而富农和中等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不但是我们抗日的朋

友，而且是我们的民主革命的朋友，一部分还成为我们反封建剥削的朋友。因为我们今天所要进行和正在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富农及中等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在今天具有极不相同的政治作用和政治地位；因此，在政策上严格加以区别是必要的，否则会把两个不同性质，不同革命阶段的任务混淆起来。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决定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的根据。

二 政权建设问题

（一）根据地的建设首先要建设政权

国家中的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革命斗争中双方争夺的目标，也是最锋利的斗争武器。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创造过程中证明了这一点，在现在沿敌人点线各地区的斗争中也证明了这一点。谁要是忽视或放松这个问题，谁就是不懂得革命的根本问题，谁就是抛弃自己的战斗武器，在敌人面前缴械，在阶级斗争中如此，在民族斗争中亦如此。因此，我们认为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设中首要的问题——当然它的建设要以群众为基础，武装为骨干。

（二）边区政权改革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两重政权的阶段，也可称为动委会阶段，这是一九三八年一月边区政府成立以前的阶段，这个时期边区政权的特点尚多，但是最基本的特点，是两重政权的存在。

当时旧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如县政府、区公所……等仍然在边区某些地区残存着，但因为它过去一贯是压迫剥削民众，专门与民众作对的机关，它只有压迫民众、剥削民众的经验，没有在紧急关头动员民众，组织和武装民众以解决当前抗战需要的经验，因此这些“先知先觉”的“孔明”们所组成的政权，在压迫剥削民众时，固堪称为老练的能手，但在民族抗日战争面前，却成为只会“等因奉此”的俗物和无用的赘瘤，成为群众动员的障碍。

于是半群众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应运而生了（在冀中是救国会，冀西某些县份是自卫会……），它是动员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抗日的机关，也是决定并征收合理负担，供给部队给养，逮捕审讯汉奸，颁布减租减息、改良工人生活命令的权力机关。它负担了当时一切应该由政权负担而为残存的旧政权所不能负担的紧急任务。

当时两重政权的存在，曾引起了行政上的某些混乱，但是它在当时是必需的，因而也是正确的。阎锡山当时之所以和我们协商并断然颁布了战地动员委员会组织条例，是因为他实际感觉到这种组织在当时实为抗拒敌寇保卫山西所必需。当时在冀中、冀西、晋东北各区都不约而同的建立了类似的组织，是广大群众认为它是当时所必需。动委会成立之后，在极短的期间，即适当解决了当时抗战的一些紧迫需要，则是在事实上证明它为当时所必需，也可见它是正确的了。

问题是很显然的，当时群众还没有起来，而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政权干部又十分缺乏，没有力量在短期间对旧政权彻底加以改革。一个原来基本上在野的政党，而又处在平日毫无民主的国家，要把人民上升为统治阶级本有许多的困难，加以当时的当局又拒绝并且严防我们参加政权，或进行这种改革（当时阎锡山曾说我们不可怕，因为我们是“无政权阶级”，当

时他还不晓得动委会就是实际的政权）。这样，两重政权形式的存在就成为必需的，成为发动全面抗战的一种不得已之举了。

为什么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中国，两重政权的存在，会成为可能呢？因为民族危机严重，国外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形成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特别是在武汉失守前的全国抗日高潮中。从中国革命的国内矛盾方面来说，是处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的，因此“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在相当范围内获得了部分的成就，但是两重政权并存的局面，只能是过渡的局面，绝不能在较长期间和平相处，或维持所谓均衡。相反的，必须有一个被否定，或融化成为一个新的综合的东西。（旧政权彻底改革成为民主的行政机关，而区以上动委会则转化为全权的民意机关，在村级则成为民选的政权与治权合一的机关，在当时是可能的。

第二个阶段——边区政权统一和民选村长的阶段（从一九三八年一月边区政府成立起至一九三九年二月分局党大会），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二：

第一，是边区政权在系统上和地区上的统一——自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动委会，改革并充实各级政府后，于是边区政令完全统一，这是根据地财政统筹统支和各项政策、制度统一实行的前提，也是敌后抗战长期坚持的前提。一个远处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要想对抗具有高度组织性和极端集中行动的日本帝国主义，没有集中统一的政权，是不可能的。

第二，是普遍民选村长，当时清算村账，撤换鱼肉乡民，横行贪污的旧村长和选举新村长，曾成为极广泛的群众运动。

这个时期，政权改革的最大的特点，是只从人的改选方面来改革旧政权，还没有真正了解革命的人民不能“简单的夺取现成的国家机关而运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不了解一定性质的政权，需要完全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机构，而旧的村长制等乃是封建国家制度的基础组织，是封建国家的肢体，不能片断的割下来强装在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体躯上。可是，事实很快的教育我们，它使我们了解了不根本改革村政权的组织机构，而只是改选村长是徒劳的，许多地方轰轰烈烈改选村长的结果，最初往往是以暴易暴，新当选的仍然是劣绅土豪，于是，我们开始注意成分，但是被豪绅地主所豢养的流氓又往往出而膺选。是的，最大多数当选者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甚至是贫农和雇农，但是不久又发现他们中间有些人接二连三的被地主豪绅所收买。现在看来这是当然的，一个村政权既无民意机关管理，又无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来保障，而广大群众又因为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还不知同时也不会自觉的积极的起来监督，在这样情况下，新当选的村长，一部分变成鱼肉乡民的新土劣或为土劣地主所收买，是不可避免的。经过了许多波折之后，我们逐渐了然于政权彻底改革的“先决条件，是破坏和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并非简单撤换或改选一两个政权工作人员所可奏效。

第三个阶段——开始改革政权组织机构的阶段。

前一时期政权工作的经验，已经开始证明必须进一步改革政权组织机构，但是还不知道政权组织机构究应如何改革。六中全会时在延安找到了毛泽东同志写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两篇文章，它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并使边区政权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

1． 建立区村代表会——村政权是政权的基础组织，它对于政权的重要性等于支部组织之对于党。如果村政权不改革，则一切好的政策和制度，一到村级就往往变了质，顶好的善政变成顶坏的苛政。关于村政权的重要，阎锡山是十分清楚的，他主张所谓“村本政治”，

国民党特务人员也同样懂得，当我们在冀中建立区村代表会时，某县国民党在其文件中说“共产党撤换专员县长没有关系，中央军一过来立刻可以撤换，若村和区都建立了民主选举的代表会就糟了，就不容易取消了”。此外国民党在各地雷厉风行的推行保甲制，也正证明他们充分懂得村政权的重要。但我们在晋察冀边区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开始普遍建立村代表会，才部分的建立起区代表会，而村长则仍由村民大会选举。

2. 从边区直至村，各部门建立完整的行政机构，从政权的组织机构上扫除便利于官僚主义的组织形式。旧政府的组织机构，是头大脚小的，国民政府有极复杂完备和庞大的分工与组织机构，而村级却只有一个村长，区则只有区长和少数助理员，因此国民政府一切政令一到县级或区级即往往“寿终正寝”变成了废纸，为了彻底清除这种积弊，我们从边区政府起到村政府，都建立了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和司法等五个工作部门，从上至下的建立起完整的工作系统，特别是在村级并且建立了民政、财政、教育、生产和调解（实即村政府的司法机关）等五个委员会，这不仅使政府系统的工作部门和能力越到下级越强，而且可以吸收全村庄各阶层积极分子参加，使工作易于完成，使边区政府的每一政令和指示，易于贯彻到村。

3. 旧日的行政区（县以下的）是很大的，一个区所管的村庄如此之多（有多至几百个村者），而所辖地区如此之广（山地），这不仅使区政府无法深入领导和检查村政府的工作，而且使村民不易行使其民主权利，仅仅村民到区政府所在地去开会当日不能往返，必须在外留宿，就是一件大事。因此我们普遍实行了小区制度，一个县把原来的四个至五个区，划为六个到十个区。这样就使区政府容易领导村，村民容易了解区政府及本区的一切情形，人民到区政府去办事，区政府工作人员到各村进行工作，当天可以往返，因而，工作效能和速率大大提高，而人民亦容易管理区政权，它与区村代表会的建立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4. 建立公安局——在前一期已经废除了旧日的警察制度，普遍组织了人民自卫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民警”，但不久发现这样是不够的，只靠自卫队不能完善的维持革命的秩序，还需一种专门的公安机关与“民警”相配合。于是，各级政府又建立了公安局，它是各级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是清除汉奸，警卫地方治安和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财权等的治安机关。它的工作基础不是建筑在旧日的宪兵、警察、保安队之类的爪牙上面，而是依靠广大的人民，不脱离生产，不支薪俸的锄奸团（公开的）和政治警察（秘密的）及广大的自卫队和民兵，它领导这些组织并与之密切配合以进行工作。

第四个阶段——边区政权改革的现阶段。上述各种改革，自然使边区政权建设又前进了一步，但是严重的缺点仍多：

第一，边区和县级仍无正式的民意机关，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县长、区长尚未定期实行民选，久而久之，旧官僚“为民之上”的压迫或限制人民的习气在无形中复活着，生长着。

第二，成为封建政治制度残余的村长、邻长、闾长制与民主的村代表会同时并存的结果，证明这种封建的僵尸，阻挠和束缚村代表会，不能发挥作用，简直等于虚设。

第三，政府机关中的骈枝重复机关，仍然残存或逐渐形成着，冗员亦逐渐加多。因而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亦日益严重——冗员们吃了饭没事做，专门咬文嚼字，在形式上讲究。

诸如此类的缺点之废除，和边区各级政府及民意机关之进一步的改革，使边区政权建设进入了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从去年夏季开始的。

（三）现阶段边区政权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即孙中山所谓政权与治权，苏联所谓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管理或行政机关的关系问题。当时，有人主张两者都应由全民投票，直接选举、罢免，两者应该是平行的、平等的关系，实际是互相牵掣的关系。这种制度，表面上是极其民主的，实际上则是在极其民主的形式下，偷偷剥夺人民的真正民主权利。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最民主的政权制度，其实是资产阶级用以实行其阶级专政的陈旧腐朽的国家形式，戴着民主的假面具的专政形式。

我们去年（一九四〇）四月扩大干部会，驳斥和否决了这种意见，决定民意机关应是全权的民意机关，各级政府行政委员会或其首长应由民意机关选举，并由民意机关罢免。政府对民意机关（边区参议会及县议会等）的决定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民意机关不仅有选举、罢免政府行政人员之权，且有创制、复决之权，它应该是同级政府的“上司”。

第二个问题是政体问题，是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有人抄了国民党的老调，主张“政权在于民主，治权在于集中”。事实上，一切只有民主而无集中的民意机关，只能作为一党专政的装饰品，只有集中而无民主的政府行政机关，必然是最易官僚主义化，最易脱离群众，甚至背叛民众，压迫民众的政权，是最危险的政权。

我们坚持了民意机关与政府行政机关都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组织原则，坚持了《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对于政体问题所给予的指示。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公民权的问题。

当时有人主张顽固分子无选举权，在有的县（游击区工作较好的县）的村选中曾编过“顽固队”，这显然是错误的。三三制的政权说不要反共分子，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剥夺顽固分子的公民权，选举和被选举权，只是说我们可以不选他，按照民主原则和他竞选，多数群众实际不选他，如果竞选结果他们当了选，那末，不但要容许他们参加三三制的政权，而且要承认他们的权利，纵然成为四四制即四个四分之一，也应听之。一般说，在我们和进步分子占优势的前提下，个别顽固分子当选，对我们实害少而利多。

有人主张当选区长、县长，必须有两年以上的行政经验，这也是错误的。这一条规定的实质，就是实际上剥夺了广大群众的被选举权。因为广大的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是几乎全体都无两年以上的行政经验的，而没有两年以上的行政经验即不能当选，不能当选就不能有行政经验，因而政权只好让一群旧官吏包办……所以实质上这种主张是坏透了的。

还有人主张军人没有被选举权，又有人主张吸鸦片的没有公民权，或只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更有人主张公民权须加以居住年限的限制，都是不妥当的，都被否决了，最后我们决定除神经病和被边区各级政府依法判决褫夺公民权者以外，一切年满十八岁之公民均有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四个问题，民意机关及行政机关实行定期改选，使公民得以定期考核并选举其公仆，使当选者不敢违犯民意一意孤行，不致因任职过久，易于忘本，变成“为民之上”凌驾于万民之上的旧官僚。

第五个问题，各级民意机关（由村代表至边区参议员）均按普遍平等原则由公民直接选举，行政机关则由民意机关选举，并确定选民对于其所选的代表、民意机关对于所选的行政人员，有随时召回即撤换权，而且规定此种召回，不必另有法律根据或理由，只须原来的选

民或选举机关过半数通过即可。

第六个问题，是废除了旧的，以户为单位的村行政制度，因为这种以户为单位的旧的村长制、族长制、保甲制、牌户制等，都是封建宗法社会之残余，都是剥削家长以外一切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家庭成员的民主权利的封建制度。不废除这种制度，便无所谓真正平等的公民权。为避免形式的突出，仍保持了村长的名义，但它在本质上已与旧村长完全不同了。

第七个问题，根据简单、明了、易学、易行的原则，重新厘定科学的公文程式，澈底扫除旧的文牍主义，抛弃繁琐的贵族式的公文程式。这些华而不实的废物，是旧的官僚师爷们盘据要津，阻挠新的优秀干部和广大人民参加政权的一种工具，它使大批新干部的提拔和当选遭受困难，它使工作迟缓，行政效率甚低。

第八个问题，合并与取消一切重叠骈枝的机关，这不但节省了大批干部，并且使上下级关系比较直接，工作速度大大提高。减少了政府机关中官僚主义生长发展的机会。

（四）关于目前边区各级政权组织机构

根据上述各项确定的原则，我们规定边区各级政权组织机构，主要是各级民意机关与行政机构的关系如下。边区一级的组织机构：

第一，边区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边区参议会。系由普选产生（已选妥尚未开会）。在参议会闭会期间设有驻会议员（议长、副议长及秘书长为当然驻会议员），以办理议会日常事务，实际是参议会的主席团。

第二，边区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是边区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由边区参议会选举，罢免，对边区参议会一切决议有服从义务

县级政权——县设县议会，县议会与县长之关系，相当于边区参议会与边区行政委员会之关系，县长由县议会选举，罢免；科长仍由上级委任，因为今天县政权的干部流动性还很大，特别是科长，好的不断的提拔为县长，不称职的又需要继续撤换（目前尚无如此多的称职的科长），因此除在县议会设驻会议员，县政府，县长与科长形成政务会议，讨论处理行政事务外，尚未设立县行政委员会。

专区及县以下的区——专区不是一级政权，因此不设民意机关，专员仍由上级委任。至县以下之区，已建立民意机关，即区代表会，它是否需要继续存在的问题，在去年四月分局党大会即提出，当时决定本届区代表会任务完毕将各地实施经验总结后，再作最后决定。因为我们关于区代表会的工作经验还很少，区级将来或者根本不要民意机关，或者区级民意机关与政府机关合而为一，区代表会主席兼区长，目前尚难决定。

村级政权组织机构——政权的细胞组织，基础组织。

第一，村设村代表会，代表由各公民小组在村民大会上当众普选，各公民小组对其代表可随时撤换，但选出后该代表即领导原来选他的公民小组，公民有事，即各找其代表，现在，有时老太婆有地无法耕，抗属无牲口，贫民无种籽，儿媳受婆婆虐待……也在找其代表设法了。实际上村代表会的系统，不仅是村的民意机关，同时又是村级一个全民的组织形式。各村公民小组，多者四十五人，最少者十五人，在一个村内十五人则一律十五人，四十五人则一律四十五人，各个公民权利完全平等。

第二，村设村长及副村长，由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兼，另有民政、财政、教育、生产、

调解等五个委员会，最近又增加了治安委员会。各委员会主任由代表互选，委员则不限代表。这样可以大量吸收村中各阶层的积极分子参加（包括开明士绅）。

第三，由村长、村副、各委员会主任、自卫队队长、秘书等组成村公所，实际上是村行政委员会。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

第四，闾长制取消后，闾仍保持为村以下之行政区域。每闾由各代表组织代表团，并互选一代表主任。村公所有事找主任代表，再经过各代表领导全村的公民。公民有事，则各找其代表，亦经同样系统来解决。除财力、物力征发仍依户口进行外，村中一切行政，一律通过上述之代表系统，以公民个人为单位进行，根本废除以户口为单位的封建的行政制度。

第五，村代表究竟由村公民大会选举好，还是由公民小组在村民大会上分组选举好？这个问题曾引起过争论，我们以为现在还是由公民小组选举好。这样，公民更容易行使其召回权，更易使各阶层人民均有机会选出其代表，并行使其公民意志和权利。关于边区及县级选举单位亦然。

（五）在普选中各阶层人民的斗争

（甲）此次普选中各阶层人民竞选与斗争，是异常激烈的，首先，从各个阶层公民参加选举的比例来看，据冀中区的定南、深极、安平、饶阳、博野、清宛、蠡县等七个县的统计是这样的（这七个县是边区商品经济比较发展，民众文化水准比较高，选举工作进行比较好的地区）：

阶层性别等 \ 百分比 \ 政权级别		村代表选举	区代表选举
参选公民平均%		83.9	81.9
性别	男	84.9	83.1
	女	82.9	80.89
年龄	青年	90.7	91.79
	壮年	87.6	86.58
	老年	74.9	71.24
阶层	工人	93.1	94.23
	贫农	85.5	85.92
	中农	82.7	79.02
	富农	83.7	72.56
	地主	90.7	84.6
	商人	56.7	50.02
文化程度	文盲	86.2（工人贫农）	84.05
	小学	81.8（中农）	79.85
	中学	60.2	60.02
	大学	60.9	58.92

第一，以性别来看，女公民参加选举的比例在村选为八二·九%，在区选为八〇·八九%，仅低于男子约二%，这可以看到农村广大妇女为了争取自身政治及社会解放，已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

第二，以年龄来看，青年公民积极性最高，在村选为九〇·七%，在区选为九一·七九%。素日毫无政治地位的乡村青年，所以如此积极参选，不但反映着他们的抗日积极性，而且表示着他们反对封建斗争的积极性。

第三，以阶层的区别来看，工人积极性最高，在村选为九三·一%，在区选为九四·二三%。贫农的积极性占第三位，在村选为八五·五%，在区选为八五·九二%，这表示着乡村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民主斗争中和在抗战中的积极性与领导作用，表示着工人和贫农在政治及经济生活改善后，政治积极性已大大提高，并且以极大的注意力关心着政权。惧怕地主、资产阶级取消民主政治，又恢复其封建野蛮的专政。

地主公民参加选举的比例，在村选为九〇·七%，在区选为八四·六%，其比例仅低于工人；其积极性占第二位。这反映着地主与农民斗争之激烈。但有的同志竟认为这是顽固分子的反攻，因而发生惧怕，是不对的，其实，这正表示我党三三制政权及保护一切抗日人民的政权、人权、财权的具体政策，已使地主、资产阶级从反对的态度转而拥护抗日民主的政权。已从根本反对我们非法的斗争转向参加我们所领导的政权与我们进行合法的斗争。民主政权的巩固，已使地主不得不转变其对政权的态度与斗争方式了。

至于富农参加选举的比例比中农还要高，并不是因为富农在抗战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比中农还积极，而是表示着抗战中农村阶级斗争仍然异常激烈（虽然与战前比较已改变了斗争形式）。把它与工人和贫农在选举中的积极性来对照，可以明显的看出在普选中两个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

从上面可以看出商人的积极性最差，这不仅因为举行选举时有些商人因为经商在外，未能参加，而且因为我们过去对商人征税较轻，各种减租减息和改良工人生活的斗争，对商人的影响远不如对地主富农来得直接和深刻。

第四，以文化水平来看，文化水平越高的积极性似乎越差，其原因有二：第一，文盲中多工人、贫农，文盲参加选举的比例最大，这在形式上是文化水准的差别，实质上是阶级关系的差别。其次，因为今天尚未离开家庭留于村中的大、中学生，有一部分是政治上比较落后，甚至是顽固的分子（当然有一些还可争取教育），比较进步的大、中学生早已离开了家庭参加了党、政、军、民各级的领导工作。同时一般大、中学生，对于在村选、区选中自己是否投票，似乎看得无关重要。此外，还因为在乡村中大、中学生的数量很小，有一个不参加选举，即影响比例很大。

从上述统计和分析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各阶层人民在民主斗争上，一般说是很积极的，从此可以看出根据地民主政权之日渐巩固。

（乙）竞选中的斗争方式，一般尚能按照民主原则，进行合法的竞选。很多地主在普选准备过程中，极力表示开明，甚至临时举办慈善公益事业（如赈济贫困，捐款修渠、修堤、办学等），并极力表示与区村干部接近，表示要为民族、为人民牺牲奋斗，以收买人心，缓和其平日所造成的与群众的恶感。有的地主为了竞选，一天可以奔走十余村，作竞选活动或讲演，但也有在竞选大会上，要求工农群众的候选人当场报告国内外形势，解释政权组织条例或选举法等从中挑剔，使工农领袖当场出丑，或公开秘密攻击工农群众领袖平日的某些不检

行为，使之落选的；或者见失败之势已明，就迅速转而争取中间分子合作或协助其竞选，因为在地主阶级看来，中间分子，即使“最左的”即最开明的士绅当选，也比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当选要好些。但也有些地方的地主阶级在竞选业已失利时，集中投票力量选举一二精明强干的顽固分子出台，准备在新的民意机关中展开激烈斗争。只有极少数的顽固分子，才对普选运动暗加阻挠破坏，或勾结敌人扰乱摧残。

基本群众因为自己拥有多数，有恃而无恐，对选举法尚能严格遵守，但在斗争激烈的地区，违法操纵把持的事实也偶有所闻，有的在开票结果或中途发现失利时，临时宣布为试选，有的不预先宣布选举日期，只秘密通知各团体群众，乘逢集逢会，土劣离家之机会，突然进行选举，用所谓“调虎离山”之计，使顽固分子落选；有的则临时始按预定计划，不民主的划分公民小组，把顽固的集团编散，以所谓“满天星”的编法，使顽固分子束手无策，也有故意把票写错、唱错、计错者。有的雇农甚至强迫雇主选自己，并美其名曰“劳资合作”。……但这都只是个别的现象。

至于预选和选举大会上当场开展反顽固斗争，虽非违法，但也以不在此时进行为好（应在平日进行）。因为既进行普选就应当很严肃的遵照民主原则、法治精神来进行。这样可以巩固扩大统一战线，更密切的团结全民族，可以用铁一般的行动证明新民主主义政治远优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使广大人民在其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体验和了解民主政治远比专制政治为好。另一方面有不少的士绅地主（并不一定顽固），恰巧在怀疑我们是不是真意实行民主、是不是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来代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使他们的人权、政权、财权完全失掉保障。因此，我们在根据地内的普选中必须严格遵照法治和民主精神进行，纵然暂时遭受部分失利，亦在所不惜，因为这是平日群众工作的问题，临时使用阴谋伎俩反会丧失群众的同情，影响抗战团结。

我们的普选是从村选开始，然后进行区级、县级和边区级的选举。当村选进行时基本群众态度很狭隘，独占的倾向极浓厚，非常怕地主，特别顽固分子当选复辟，又来压迫他们（甚至对中间分子也不放心）。同时，初次竞选，特别是作竞选讲演，对工农群众是一件生疏而且困难的事情。及至村选的结果，基本群众仍占着绝对优势，同时又有了竞选的经验了（村选已有多次，但真正的普选，去年还是第一次）。因此，一切选举中的工作和竞争都稍好了。

（六）从选举的结果看各阶层人民的政治地位

根据前面所引的七个县的统计，选举结果是这样（见下页表）：

1． 以阶级关系来看，在我们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前，这个区域的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现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了。

以工人和贫农，即乡村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当选的比例来说，在村代表会议中占四九·二%，区代表会中占四四·六%，在县议会中则占三〇·五%。按上述统计，占全体公民五四·八%的工人和贫农公民，而当选的比例则仅占四九·二%——三〇·五%。就是说工人和贫农当选的比例即其在政权中之地位尚低于其在公民数量中所占的比重，但工人和贫农已把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之一部，则是极其明显了。

但只是从这一点还不能说明各阶层在普选中的政治地位之变化，必须把中农、典型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在民意机关中所占的地位，与工人、贫农所占地位合起看，问题才更加明显。

冀中定南、安平、深极、饶阳、博野、蠡县、清宛七县村、区、县选举结果统计表

项别	职别	村选 人口	村选 参选公民(%)	村选 各阶层参选(%)	村选 当选代表(%)	村选 村主席秘书成分(%)	村选 各委员会主任	区选 参选公民(%)	区选 各阶层参选(%)	区选 当选区代表(%)	区选 主席秘书	区选 区长	县选 参选公民(%)	县选 各阶层参选(%)	县选 当选议员(%)	县选 议长秘书	县选 县长
平均百分比		100.0	100.0	83.9	100.0	100.0	100.0	100.0	81.99	100.0	100.0	100.0	100.0	78.3	100.0	100.0	100.0
性别	男	48.2	49.9	84.9	78.7	92.9	92.8	50.58	83.10	87.2	84.35	94.12	50.3	79.1	84.1	85.7	100.0
	女	51.8	50.1	82.9	21.3	7.1	7.2	49.42	80.89	12.8	15.65	5.88	49.7	77.6	15.9	14.3	0
年龄	青年		26.1	90.7	28.5	30.6	27.6	25.19	91.79	32.8	47.61	21.58	25.5	88.6	37.8	38.1	42.8
	壮年	25.1	42.3	87.6	55.2	51.5	55.2	42.08	86.58	56.9	46.28	76.48	42.9	84.3	50.6	57.1	57.2
	老年	25.3	31.6	74.9	16.3	17.9	17.2	32.36	71.24	10.3	6.13	1.94	31.6	65.5	11.6	4.8	0
社会成分	工人	4.7	6.9	93.1	7.5	5.9	7.6	7.06	94.23	6.2	4.76	3.18	7.1	90.5	4.1	0	0
	贫农	46.8	47.9	85.5	41.7	39.2	40.1	49.49	85.92	38.4	35.37	35.29	50.3	83.3	26.4	14.3	14.4
	中农	38.6	37.3	82.7	37.9	45.8	40.2	36.53	79.02	47.0	53.06	58.89	35.8	74.1	51.6	61.9	42.8
	富农	6.3	5.6	83.7	7.8	7.4	6.7	4.93	72.56	7.1	6.8	1.94	4.8	67.0	14.6	23.8	42.8
	地主	0.2	0.1	90.7	0.3	0.2	0.1	0.15	84.60	0.6	0	0	0.2	78.4	3.1	0	0
	商人	3.4	2.2	56.7	4.8	1.5	5.3	1.84	50.02	0.7	0	0	1.8	48.5	0.2	0	0
文化程度	不识字	54.1	55.3	86.2	37.0	19.0	17.6	55.46	84.05	17.4	4.76	3.88	55.6	80.3	5.6	0	0
	小学程度	44.7	44.2	81.8	60.8	75.6	80.0	44.06	79.85	75.2	79.59	74.54	43.8	76.1	56.8	33.3	0
	中学程度	1.1	0.4	60.2	2.1	5.1	2.3	0.39	60.02	7.1	15.65	21.58	0.4	58.6	33.0	61.9	100.0
	大学程度	0.1	0.1	60.9	0.1	0.3	0.1	0.09	58.92	0.3	0	0	0.2	58.1	4.6	4.8	0

备考：

一、本表系根据冀中七个县的数字统计出来的。

二、这七个县是冀中工作较好的县份，也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富农经营比较发达的地区，故地主阶级的比重较小，在这一点上它不是典型的材料。

在同一统计中，中农当选的代表或议员，在村代表会议占三七·九%，在区代表会为四七%，在县议会为五一·六%，若把工人、贫农和中农当选人数合计，则其在各级民意机关中所占比重是：在村代表会为八七·一%，在区代表会为九一·六%，在县议会为八二·一%，即占了绝对的压倒的多数。

地主、富农、商人在这些县份当选的比例是：在村代表会中为一二·九%，在区代表会为八·四%，在县议会为一七·九%，但他们在公民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则仅为七·九%，显然他们当选的比例还远大过他们在公民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同时他们的代表或议员的知识经验和活动能力又远比工农出身者为强。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少数人的专政已被打破，却是无可置辩的事实。至于工人和贫农当选的比例之所以越到高级越减小，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要力求实行政权三三制，以及工人贫农因文化程度关系，越到高级越难当选，越难胜任。另一方面，在政治觉悟程度较低的工人和贫农看来，村政权对于他们似乎还更重要些，因此在村选中他们极不愿意让票与中间分子，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让自己的领袖落选（这里要附带说明一点，这七个县是阶级斗争较剧烈的地区）。

2. 以年龄来说，在国民党专政时期，老年壮年地位较高，青年在政权中则几乎毫无地位可言，今天则恰恰相反，在村选中，老年公民的比例占三一·八%，而老年当选到政权机关的比例，在村代表会则只占一六·三%，在区代表会只占一〇·三%，在县议会则占一一·六%，当选议长、副议长者则只占四·八%，当选县长的则一个没有（当然战争环境中工作坚苦，老年体力不支也有关系），而青年则不同。青年公民只占村选公民总数的二五·一%，其在各级政权中的地位则是：在村代表会为二八·五%，在村主席、秘书中为三〇·六%，在区代表中为三二·八%，在区代表会主席、秘书中则占四七·六一%，在区长中则占二一·五八%，在县议员中则占三七·八%，当选县长者则为四二·八%。这也是封建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已开始被打破的表现之一。

3. "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标帜"，因为她们解放最困难。这一点在此次普选中也表现得极清楚。占全体公民五〇·一%的妇女公民，在村代表会中只占二一·三%，在区代表会中只占一二·八%，在区代表会主席、秘书中只占一五·六五%，而区长则占五·八八%，在县议会中，则只占一五·九%，在县议长、秘书中则只占一四·三%。这表示妇女在政权中的地位，仍相当低下，但以之与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前妇女毫无政治地位的情况相比较，已经提高很多了。

（七）关于政权三三制的执行问题

第一，政权三三制是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组织成分的一种政治规定，是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方针，它可以当作政治纲领或用其他形式来公布，却不能用国家的法律明文来规定，在法律条文上规定三三制，是和真正平等普选的民主原则相违背的。

第二，在草率的粗枝大叶的民选中或间接的选举中，三三制较易实行，在平等的、直接的、真正的民主普选中，要想百分之百的实现，则是极大的困难，至多只能偶然百分之百的实现而已。问题是很显然的，我们既不能圈定，又不能指定，须让广大公民群众自由投票决定。投票结果如何，在未开票之前，则是一个未知数。在去年的普选中，为了争取三三制的切实实现，我们曾尽了相当的努力（虽然还很不够），但普选的结果，百分之百实现三三制的地方极少，甚至可以说没有，现在举北獄即五台区十三个县议会的统计来看：

一九四〇年民主选举县议员成分比例表

（五、唐、满、代、崞、定、曲、完、平、建、阜、涞、行等十三县的统计）

项目 县别	县议员 数　目	共产党员		进步分子		中间分子		备　考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五　台	60	27	45.00	24	40.00	9	15.00	
唐　县	63	25	39.68	22	34.92	16	25.4	
满　城	45	26	57.8	8	17.8	11	24.4	
代　县	45	27	60.0	9	20.0	9	20.0	
崞　县	35	20	57.1	7	20.0	8	22.9	
定　襄	33	12	36.36	12	36.36	9	27.28	
曲　阳	56	28	50.0	12	21.43	16	28.57	
完　县	44	15	34.09	15	34.09	14	31.82	
平　山	67	27	40.29	33	49.25	7	10.45	
建　平	72	25	34.72	25	34.72	22	30.56	
阜　平	36	22	60.0	7	20.0	7	20.0	
涞　源	49	34	69.38	8	16.32	7	14.28	
行　唐	51	38	74.5	4	7.84	9	17.65	
合　计	656	326	49.7	186	28.35	144	21.95	

在上述十三个县议会中，完全实现了三三制的一个也没有。党员在县议会的比例，至少占三四·〇九%（完县），多至七四·五%（行唐）。进步分子当选比例，多者四〇%，少者只[illegible]·八%。至于中间分子在县议会的比例一般多低于三分之一，十三县的平均数只有二一·九五%，至多者只占三一·八二%，最少者只占一〇·四五%。

若按前面所举冀中区七个县议会的统计，工人贫农的议员三〇·五%，而地主、富农、商人议员只一七·九%，亦可完全肯定七县县议会议员之成分离三三制亦远。

再以北岳区十二个县的区代表会的统计来看：

晋察冀北嶽区一九四〇年区级民主选举

易、满、五、崞、定、完、唐、建、阜、涞、平等十二县区代表成分比例表

县别＼项别	区代表总数	共产党员		进步分子		中间分子		备考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易县	384	107	27.86	255	66.14	22	5.7	
满城	402	50	12.7	329	81.6	23	5.7	
五合	488	155	31.76	311	63.73	22	4.5	
崞县	225	104	46.22	109	48.44	12	5.32	
定县	292	125	42.8	102	34.91	65	22.25	
完县	341	139	44.98	96	30.75	106	23.93	
唐县	543	285	52.49	198	36.46	60	11.05	
行唐	417	216	51.8	164	39.3	37	8.4	
建平	156	72	46.15	42	26.92	42	26.92	
阜平	331	298	90	17	5.2	16	4.8	
涞源	256	181	70.7	72	28.12	3	1.17	
平山	396(?)	255	64.39	64	16.16	77	19.44	代表总数恐不确
合计	4231	1987	46.94	1759	41.57	485	11.49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区代表会中三三制也未完全实现，以十二县的平均数字来说，党员占区代表四六·九四%，进步分子占区代表四一·五七%，而中间分子则占一一·四九%。党员占区代表议席最多者为九〇%（阜平），最少者为一二·七%（满城，系当时工作落后的地区），进步分子所占议席最多者为八一·六%（满城），最少者为五·二%（阜平），而中间分子所占议席最少者则只占一·一七%（涞源）。

若以前面所引冀中七个县区代表会的统计来看，其比例是这样，工人贫农所占议席为四四·六%，而地主、富农、商人所占议席总数只有八·四%。

总之，普选结果，完全符合于三三制者极少，甚至一处都没有（由上级委任之行政人员可以完全实行三三制）。

第三，但是是否可以从此得出结论说三三制的规定是错误的或不必要的呢？决不，这种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它使全党在普选中有了明确的努力的方向，预防并纠正了党员在政权方面排斥非党干部、排斥中间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与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相反的党员或工农专政的倾向。选举结果虽尚未完全实现三三制，但非党人士之比重，特别是中间分子的比重，已大大增加，而且当选的党员议员还可用辞职的方法减少，以弥补选举中的缺憾。这样就使地主资产阶级容易脱离日寇的反动宣传和顽固分子挑拨离间的影响，比较安心的与我们合作抗战，支持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因为三三制这种政治规定是用简单的数目字表现出来的，所以异常明确，容易使党员及各界人士了解和执行，并以之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来对照比较权衡其利弊、是非。因此纵然中间分子当选者远不及三分之一，而三三制政权之意义和作用，仍能适当的发挥。同时，党对政权三三制的规定本来不是带绝对性的死的教条式的公式，乃是实际行动的指针。

第四，三三制的规定，不可能普遍的严格的实现，但因党员超过三分之一时，可以提出

辞职，故大体的实现是可能的，但必须说明它的实现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

1．党的组织必须有相当普遍的发展，特别是村政权的三三制的实现，起码是需要每个村有支部，而且每个支部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只是村公所及其五个——六个委员会即有政权工作人员三十余人）。

2．必须基本群众已经动员起来，已经翻了身，有了相当的组织和政治觉悟，并且有了他们自己的领袖。否则，选举结果，特别是村选结果，政权往往仍为地主豪绅所把持，或顽固分子与我们势均力敌，三三制仍不能实现。为了实行三三制，有时不得不首先集中力量打破旧的地主阶级专政，打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3．基本群众优势已经确定，工农生活已经适当改善后，阶级关系须有适当调整（如减租减息，缴租缴息之类）。否则，仍不易实现。阜平是边区党的工作较好的县份，然区选结果，党员竟占了代表总数的九〇%。原因并不是下级党在选举中未坚决执行三三制方针，而是因为该县在去年选举时，乡村阶级斗争正异常剧烈，尚未适当调节，加以中间分子平日缺乏为人民服务的表现，而党员坚决的为人民服务的行动，已获得了群众的热烈拥护。故基本群众无论如何均不愿让票予中间分子，结果在某些地区，党员虽曾投票选举中间分子，而所有群众却几乎全部投了党员的票。

第五，三三制开始执行后，收效极大，许多原来反对我们的地主，态度转变了。有的地主说："这才有我们的世界了，我们有点干头了"。有的说："过去村公所尽都是帝国主义，现在仁义了"。有的地主说："边区上了轨道了"。或者说："边区的章程越来越好了"。有的地主在摇头摆尾的唱："虽尧舜之世不如也"了。……事实已经证明，政权三三制是巩固抗日团结、巩固抗日根据地及其政权的有力武器，它是今天所必需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八）关于普选中的具体工作

关于普选中的具体工作是很繁重的，若以村为例，如事前如何普遍进行政治动员，如何进行公民登记，如何审查并公布公民资格，如何划分公民小组，如何提候选人，开预选大会，如何正式开会选举，选举完毕后，代表会如何开会，旧村长如何交代，新村长如何宣布工作计划，开始工作等等，是一些极复杂的工作，为节省篇幅，此处从略。

（九）关于政权问题的结论

——我们已经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国家制度。

第一，"特殊的武装队伍"、"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工具"。今天边区除了边区子弟兵以外，已没有任何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党派的特殊武装，而公安局则百分之百的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并且取消了旧的警察、保安队，而代之以不脱离生产的"全民的民警"(自卫队、锄奸团等）。

第二，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都只许统治阶级独占着特殊武装，却不允许民众有"自动的武装"，更不消说特殊的武装了，现在我们已把边区境内地主阶级的全部武装拿来武装了人民，建立了人民的特殊武装，也普遍建立了革命"民众自动的武装"。一切剥削阶级掌握的国家，他的"特殊武装是……与武装人民，人民自动的武装组织，不能直接符合的"。恩格斯曾说："法国每次革命之后……掌握国家权柄的资产者，第一个先决问题，就是解决工人的武装"，在这里，列宁说："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就是国家问题的实质"。现在，

在边区内部，我们不但把地主阶级的武装用来武装了全体人民，而且民众的特殊武装与民众自动武装密切结合起来，相依为命。这也是政权性质，已经有了本质转变的铁证。

第三，革命阶级“不能简单的夺取现成的国家机关而运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一切真正民众革命的先决条件，便是破坏和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关”。我们在碰了许多钉子之后，才逐渐了解地主阶级传下来的政权机构是只适合于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却不便于实行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根据党中央的方针，现在已用逐步改革的办法，实质上摧毁了旧的封建的政权组织机构，建立了新的关系的民意和行政机关（当然还有许多缺点），实行了各个抗日阶级的联合专政。

第四，从政权的组织成分来说，各级行政机关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合计都在过半数以上。至于民意机关，根据前述七县统计，工人和贫农在村为四九·二％，区为四四·六％，县为三〇·五％，若再加上中农，合计起来，则村为八七·一％，区为九一·六％，县为九二·一％。可见政权组织成分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工农群众已经把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与左翼地主和中等资产阶级共同管理政权，管理国事了。已经把一个封建的国家制度摧毁，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了。

第五，根据上面的事实，可以肯定的说，推翻封建政治制度的民主革命，不但为抗战所必需，而且可以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在我军占优势的根据地内，逐渐实现。但是这种改革是采取的逐渐改良的政策，而不是一举而彻底推翻的政策。

第六，在抗战中所建立的民主政权，只能是包括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政权，具体讲，就是三三制的政权，它所建立的秩序，只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秩序，对于一切汉奸、反对派则实行专政，而对于一切抗日人民则实行民主，严格保障其人权、政权、特别是财权、地权等的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使抗战的各阶层不至在无益的斗争中同归于尽，而亲密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第七，抗日民主政权，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三三制的。但这并不是说，在政权内部各阶级的实力必须平衡，必须势均力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统一战线要想巩固，必须基本群众在其中占着优势，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并巩固地主及中等资产阶级与我们抗日合作，使他们确定的拥护民主政权，使政权的逐步和平改革成为可能。因为根据地政权的改革——摧毁旧的封建的国家制度，建立新的民主政治的政权，虽因在抗战过程中，可以采用和平改革的方针，但斗争仍然是异常剧烈的，所谓和平者，只是指斗争形式而言。

第八，三三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民族斗争的武器，是镇压敌伪汉奸活动，抵抗异民族侵略的武器。但是，是否可以说，这种政权对于各个抗日阶层之间的斗争，没有意义，或者是维持各阶级均衡的中立的东西呢？绝对不是，只是说它今天的主要作用，是民族斗争武器（若从世界革命的广义的阶级意义来说，抗日战争同样带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事实上，某一个或几个阶级如果在政权中占了优势，当然会同时把国家这副武器，用来进行阶级斗争，这是可能的，也是许可的。但是必须说明政权的这种当作狭义的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在今天是从属的，不应妨碍它成为民族斗争武器之作用。前者必须服从后者，否则不利于民族抗战，同时即不利于在政权中占优势的阶级。但这只是从政权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它当前所负的主要任务来讲，并不是说我们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只有如此的机能，或只能负担抗日的任务。事实上优势是决定本质的东西。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工人和农民或者地主和资产阶级）在政权中若占了优势，它仍然会使政权同时起着它的阶级压迫的作用。并在

一定场合下（必要时）完全转化为阶级压迫的武器，用以彻底解决国内的某种矛盾。

三　关于经济政策（略）

四　土地政策

（一）“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但在实质上又是农民战争”，若以支持战争的组织成分来讲，它是“全民族抗日的”，它需要组成全民族的广泛统一战线以抗敌，否则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在实质上它又是“农民战争”，因为“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自觉积极的参加与支持，任何抗日根据地的创造与坚持都是不可能的。一切失掉农民的抗战，必然成为无民抗战和最后必然失败的抗战。

但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是异常黑暗贫困而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不改善他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物质生活，从经济上给以援助，他们便没有精力与心情参加抗日战争。地主阶级则是封建残余的代表，是剥削农民和压迫农民的阶级，因此他们对农民的任何生活改善都抱着敌视的态度，这样就促进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的尖锐化。农民这种斗争，是为了农民，同时也是为了民族，为了抗战。

（二）土地问题不仅是地主与农民的问题，而且是一部分富农与贫农之间的问题。是的，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富农与地主阶级基本上处于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富农并不像地主那样完全与生产过程脱离，对于社会生产自身来说成为寄生的赘疣，他是生产的组织者、管理者，并且是劳动的直接参加者。他们的经营则是较进步的经营，较之贫农中农所经营的土地有较高的生产力，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可以不断的扩大再生产。因此在土地政策中必须把他们与地主加以原则的区别。但是他们与贫农之间，因为高利贷和日工雇佣等关系，因为部分土地出租的关系，因为水利灌溉等关系，往往造成不断的矛盾与纠纷。但是在目前根据地的土地关系中，主要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而不是贫农与富农的关系问题。或者说，贫农与富农的关系在这里只是从属的、附带的常常被牵连的问题。

（三）抗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支持，需要广泛而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而敌后根据地（处在乡村）统一战线的两个主角则是地主和农民。农民是抗日的主力，抗日的支柱，而地主则是现在不可缺少和不能丧失的抗日同盟者。他们要合作抗日，可是又有基本上不可调解的矛盾，即是复杂的土地关系。这样就形成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复杂尖锐的斗争，形成了国外矛盾与国内矛盾错综交织着的网。

（四）边区农民与地主间关于土地问题的斗争（这里只指狭义的土地关系，因为广义的还应该包括着争夺政权的斗争）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政府及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利用行政方式，发动减租减息的阶段。这时地主阶级的态度是防御的、抗拒的，有的被迫减轻了租息，有的则阳奉阴违。农民则畏首畏尾，欲减而又有所顾虑，有的或竟在地主的威胁欺骗下，约定“明减暗不减”，偷偷又把已经减掉的租息如数送还。这时党的政策倒并不是右的，但以基本群众自身的实践来说，右的偏向却多于左的，干部的偏向则是左的多于右的。

第二个阶段，这是我们明白提出争取并发展党的优势，特别是发展基本群众（对于地主阶级）的优势的阶段，特别是“七七”二周年后普遍开展了反顽固斗争的阶段。这时基本群

众已经真正翻身了，已经自觉的起来斗争了，广大的农民群众的斗争，这时主要的已经不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发动”，而是广泛的深入的“自下而上的”起来了，就是说他们翻了身了。当时反顽固斗争的怒潮，弥漫了整个的边区，声势浩大，土劣震恐。于是一部分农民开始不缴租不还债了。有的把赎地换约运动，变成无偿收地运动了，变成废除债务运动了。这时地主阶级在形式上变成“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了，于是他们开始转向非法的斗争和隐蔽斗争。地主豪绅自动赈灾济贫的奇迹出现了，自动给佃户娶妻或把女儿下嫁于佃户的趣闻也出现了，口口声声拥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地主出现了。但同时勾结敌人、屠杀农民、搜捕区村政民工作人员的惨剧在个别地区也发生了，各种受敌伪利用或准备迎敌的迷信团体、秘密会社开始在发展了。……这些虽然是只存在了一个极短期间的局面，却代表着边区土地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千钧一发，紧张逾恒，而其实是一个基本上不能避免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地主与农民间以及农民相互间已提出了无数的问题，一一都摆在了党的面前，要求迅速给予解答，中央“七七”三周年的指示则又给了我们以很具体的指示，于是我们在一九四〇年的“八一三”便颁布了二十条施政纲领（边区人民称为双十纲领），提出了地主债主须减租减息，佃户债户须依约缴租还债；提出了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及缔结与解除契约之自由。以照顾全局，调节地主农民利害关系的形式，巩固了农民已得的利益，和缓了地主农民间的紧张局势，巩固了地主与我们的抗日合作。而地主与农民的斗争也由非法而转入合法，由秘密的转入了公开的，带危害性的斗争与斗争形式停止了。但另一方面斗争也就因暴露而表面化了。因此从表面看来地主在反攻了（如控告佃户不缴租，控告债户不还债……）。其实正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关系和斗争在抗日民主政治的秩序下步入正轨了。

(五)那末在上述二、三两阶段中，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是减租二五％和租额不能超过总收获量千分之三七五的问题——边区的基本地区已经普遍实行了减租二五％，若地租原为农民收获总量之一半，那末在减租二五％后，租额恰当于土地收获总量的千分之三七五。这是国民政府曾用法律形式规定的（收获总量是指正产物的收获总量），因此边区政府在第二次修正的减租减息条令中，曾以法律明令公布，我们的二十条施政纲领中亦曾提出该项规定。事实上，这种规定只在限制过重的封建地租的剥削，只在农民斗争的一定阶段上，为了以法律的武器强制地主减租（因为它是国民政府的规定），才确实有其必要，确实有进步的意义。但是这种规定并不能一般的适用。因为地有水地、旱地、平地、坡地……等，总之好地坏地之别，而耕种则有“粗耕”“细耕”之分。种植五谷与培植园艺相比较其所需的劳动量相差甚远，因此收获总量亦相差甚远，此外，有的地主则供给佃户以耕畜、农具、种籽、肥料，乃至房屋。有的地主则除供给佃农以土地外，只坐收地租。诸如此类的差别，都使这一规定执行起来十分困难。这是一。其次，据北岳区本年夏季极不完全的调查和大体的估计，目前晋察冀边区的地租，一般仅等于土地收获总量二〇——二五％，就是说已低于千分之三七五。因此，该项规定已在边区开始失掉其意义了。

尚未实行减租之新地区，仍应按战前租额减去百分之二五，这样简单易行。在流动性较大斗争极残酷的地区，以酌量少减为适宜，并不一定实行千分之三七五的规定。总之，这一规定只在一定条件和一定时期才有意义，不可能一般的采用。

第二，是钱租粮租问题——因为战争中粮价大涨，“钱租粮租”问题，已成了地主农民间极大的纠纷，原则上应该加以调节，似以改为半实物地租为适宜。但钱与粮如何折法，是

一个极大的斗争。地主要按战前粮价折，佃户则要求按今天的粮价折。自然地主有地主的理由，但佃户也有佃户的一篇道理。若单就地租形态而论，货币地租在地租形态的发展史上，是较进步的形态。但是当边区地主把自然地租强制的转变为货币地租时，它并不是为着使地租形态进步，而是为着加重对于佃户的剥削。第一，钱租多半是"上搭租"，即预缴租，往往是不管收获丰歉都要如数先缴的地租。第二，农民是缺钱的，为了预交地租有时需要借贷，因而要受高利贷的重利盘剥；而放债者又往往是租给佃户土地的同一地主。第三，佃户在麦收或秋收后，为了偿还地主的高利贷，又往往按极低的价格把钱租折成粮食交于地主。因此，今天地主提出改钱租为粮租时，农民便向地主说："过去改为钱租时我们也吃过亏，吃亏便宜都是你自找"。这的确也"言之成理"。

实际上，如果租佃契约期满，应该在互让而又有利改善民生的条件下，适当改为粮租或半钱半粮租。当然，这种更改农民多少要吃一点亏，但是对于抗战团结甚至将来对于农民都是有利的（战后和平期间粮价会跌）。在这里应该劝农民从大处着眼。

第三个问题是永佃权问题——保障农民永佃权的口号曾有人提过，并且因为得到广大佃农的拥护而流行很广，因而成为似乎普遍适用的东西。实际上这个口号若一般的提出并不完全妥当。在前述第二阶段中表现最明显，农民在减租后仍不交租，并且藉口保障永佃权，拒绝地主收地，实际即变相的暂时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的佃农已无力耕种，任土地陷于半荒芜状态。有的地主因贫而不能自养，需要自耕以糊口，但永佃权却一律不允地主收地自耕或转租。显然问题是应该这样解决的：

1．原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永佃权约定者，如所谓"卖马不离槽"，或者移民时地主或政府赋予农民以永佃权或曾由佃户出资购得永佃权，或因开荒而获得永佃权，又或以主仆关系地主曾无形给佃户以永佃权，……总之，以某种关系而获得永佃权即所谓"田面"者，应保障佃户有永佃权。地主则有处置其"田底"即土地所有权之自由，无处置"田面"即土地租佃关系之自由。

2．原无永佃权之约定者，地主对其土地依约有处置之自由。

3．农民佃耕已久，而又无租佃期限之规定者，如发生纠纷，应尊重当地民众之习惯。但在抗战期间，地主收地时必须顾及农民之生活。若地主确因贫困而收地自耕，原则上应该允许地主收地。惟地主若以该项土地出典出卖时，原佃户以同样条件应有优先权。

4．将土地收回自耕之地主，若在短期内重将原地出租时，原佃户以同样租佃条件应有优先权。

在抗战初期，所谓一切佃户均有永佃权之口号，在当时曾成为农民用来防止地主因减租而无端收地之有力武器。但在根据地日渐巩固，斗争日渐深入，需要厘定抗日民主政治下正常的租佃关系时，便不能不加以调整订正了。

第四，减租后的交租问题——前面已经讲过，在第二个阶段某些地方的个别农民曾根本不交地租，这是不合乎统一战线和党的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的。因此，我们双十纲领中曾明白提出"在减租减息后，佃户须依约缴租"，这一主张得到了广大地主的拥护，但也招致了部分农民乃至部分党员干部的不满。有的农民同志说："党怎么越来越右了"。党员甚至说："不要我们的上边叛变了吧，怎么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还主张农民必须缴租……"。因此，有的干部曾认为这一规定是不对的。其实，我们既已宣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主张减租，则减租之后的依约缴租，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义务。再以整个抗战及敌后抗日根据地

的需要来讲，不能争取地主合作，抗战即无法坚持，同时在客观上、主观上地主也要求和我们共同抗日，可是如果农民根本不缴租，则地主即决不能继续与农民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会破裂或缩小。故我们主张减租之后，“佃户须依约缴租”。

但是，这里我们须以极大的注意力顾及到农民，他们往往是见小利而忘大谋的。往往因为“贪小便宜吃大亏”。在这里如果以强迫命令代替了艰苦说服解释工作，那就会使我们与农民脱节，而农民对于大的政治问题，有时是不用口来说话，而用消极的抵制、不合作来表示态度的。因此在处理该类问题时，方针应该极明确，而执行的步骤方法，特别是具体解决某个农民和地主的问题时，必须极端谨慎。

第五，所谓“典当地问题”实即典地和抵押地问题，二者是有严重区别的，但我们过去曾有一个时期把二者混为一谈。

1．抵押地（有些地方也称作当地，各地名称不但不统一，而且极矛盾），它实际是有抵押的高利贷。把土地押出者，实际是债户，即债务者，有些是破落户地主，但恐怕最多的是贫困的农民。押入者则是债主，即高利贷的债权者。但一般的说，债户在缔约后，虽把土地抵押于债主，实际上所交的只是土地的抵押契约，并不把土地立即交给地主。同时约期一般的很短，届期如债户能依约还债，则土地抵押契约照例解除，照例撤回，否则土地即归债权者所有（至于债务者会不会将土地变卖以偿债，那是另一件事情）。过去有些军阀官僚，曾以此掠夺广大农民的土地。此类高利贷者，农民认为是“伤天害理的”。显然的，抵押地发生纠纷时，我们应站在债务者即土地押出者一方面。

2．典地则不同，它的内容是这样，典出土地的人，以一定的典价和年限把土地出典。典入土地者在此期间即获得土地使用权，并且可以转典（此外并不缴租，因此它并不是押租制度）。条约期满（多在三年以上），原典主可以原典价赎回土地。期满之后，典主亦可不赎地而继续无限期的延长典约，而土地所有权则仍旧保持。个别地区的习惯逾六十年不赎者，典户才能取得原典地的所有权。民国初年及以前农民典地并不纳税，俗称“不税契”（田赋仍由原典主缴纳），故民间有呼之为“白契地”（卖地须税契故俗称之为“红契地”）者，为区别于买地，个别地方之农民亦有称之为“活契地”者（买地称为“死契地”即不能再赎之意）。

出典土地的人，一般的是破落户地主或破产的农民，他需要货币，却又不愿根本卖掉其土地，而租出又所得租金太少不能济急，于是以土地出典，换得一定期间对于一定数量货币的使用权（不给息）。

典入土地者，多半是贫农、中农和一部分暴发户的富农。他们需要土地耕种，但又缺乏足够的购买土地的货币，而租地耕种又诸多不便（不能很好的培植改良土地，不能作固定的较长期的使用……），于是只好典地。至于一般的老富农是不喜欢典地的，他宁愿多出钱买地。有些富农之所以有不少的典地，多半是在他由贫农、中农上升为富农的期间典入的。但在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特别是产棉产花生的地区，部分富农和经营地主为了不断的扩大其为市场的生产，亦有临时典耕土地者。一般地主典地（典入）的事情却很少见。

从以上诸点，可以充分看出典地和抵押地无论在内容上或其所表示的阶级关系上，都有着极大的区别的。典地的内容当然可以分解为更简单的两种因素来考察，把它看成是一种变相借贷（视典主为债户，视典户为债主）和租佃（视典主为地主，视典户为佃户）即两种对立关系的有机的结合，一种特殊的结合。这样典主即变成地主兼债户，而典户则变为佃户兼

债主，而以利息代替了地租，或以地租偿付了利息，即地租和利息成为一个东西的两方面。但结果他仍然是和抵押地的关系不同的。

3．因此，我们对于抵押土地，应以减息条例，站在反高利贷的观点上，以清理债务的眼光去处置。而对典地的纠纷，却只能按其习惯与条约进行调解。如果说我们应以减息的原则去支持典主，同样我们也应该以主张减租的观点来支持典户。这样将使我们真正陷入了不可调解的矛盾中。去年我们的减租减息条例中，最根本的缺点，就是把两种极不相同的东西（典地与抵押地），当作同一的东西，以处置高利贷的观点去处置。因而一切问题都错了，而执行中的错误还不算（如有的农民把已卖脱的田地当作"典当地"收回，三十年以上的所谓"典当地"也收回，而赎地又只换约不给现款，在减息后又仍不还债等等）。

第六，减息还债问题。减息和减租一样，都具有压迫货币资本、压迫游资转入工农商业经营之作用。具有改善农民及手工业者的生活，推动生产发展之作用。但利息率究竟以多少为适当，这却是一个很难普遍规定的问题。在晋察冀边区一开始即规定普遍实行一分起息即年利一分，并已普遍执行。但以今天根据地（乡村）经济情况来说，仍以中央规定的年利一分半为适宜。就是年利一分半，农民仍很不容易获得借款。

但是在上述二、三阶段中，边区所发生的问题，已不是减息问题，而是减息之后，部分农民根本不还债的问题，旧的债务纠纷如何清理，以及农民如何获得借贷的问题。我们是这样处理的：

1．在减息之后，债户必须依约还债或缴息，否则不但纷争不一，会影响抗战团结，影响抗日根据地的秩序，而且会使新的借贷更加困难或根本停止。

2．凡旧的债务业已正式清结或实际完结者，应不再翻案。目前仍在纠纷中的债务，只能依改良贫苦人民生活、调节各抗日阶层人民利益的精神去调解。目前晋察冀边区政府依国民政府民法债权编所定的清理债务原则现在仍继续采用着。

3．农民借贷困难，不仅受减息影响，而且是因为战争环境太流动，政府税则有时变动，富有者的窖藏不愿暴露。因此除实行减息缴息保障一切抗日人民之人权、政权、财权外，政府正在大量举办低利借贷。这有很大的作用。

(六)群众已经起来后最危险的是左的倾向。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往往反映到党内，成为忽视农民日常生活改善，忽视农民之切实组织与动员，及一切只要地主与农民联合抗日，而不要农民对地主斗争的右的倾向。这种倾向，当抗日根据地创造的初期，在个别地方曾经成为主要的危险。但是在基本群众已经翻身，根据地已经巩固之后，最危险的，足以危害统一战线及根据地之巩固的，已经不是右的危险，而是社会政策中左的倾向：

第一种左的倾向，是因为地主阶级在抗战过程中的两面性，而根本怀疑到地主阶级抗日的可能性。认为想争取地主抗日是一种妄想，他们没有真正了解到日寇对华的侵略战，既同时危害到地主阶级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其一切政治权利，地主便有了很大的可能共同抗日。而所谓战争是民族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不应因为惧怕或厌恶地主阶级在抗战中的两面性，而放弃我们争取他们抗日的艰苦的工作，以致把可以共同抗日的朋友（纵然是暂时的），抛弃给日本强盗，听其成为日寇侵华的内应。

第二种左的倾向，是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向当作整个地主阶级的动向，把整个地主阶级看成是单一的东西，不了解地主阶级中也有各种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害关系与政治动

向。因此，每当反共高潮发生，大地主对抗战表现动摇时，即以为整个地主阶级将叛变投敌，以为“统一战线将从此简单化”，应该把地主阶级除外，改变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他们不了解，纵然不幸突然事变发生，坚决支持反共战争变节投敌的地主，仍将是极少数的大地主，这时党越加需要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政策，以争取多数，孤立日寇、汉奸、亲日派而彻底击溃之。

第三种左的倾向，是违犯党的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的政策，无端侵犯地主的人权。违犯我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保护地主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政策，而无端侵犯地主富有者的财权。如个别地区减租减息后佃户债户未依约缴租缴息。清理典当地、抵押地，变成无偿赎地或以极不公平之代价赎地。清理旧债变成废除债务等。

第四种左的倾向，是个别地方党的领导机关，把党曾提过的宣传纲领，如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当作当前的具体行动纲领，因而变相的没收地主土地。或者不分首从，一律没收汉奸的土地。甚至以对付汉奸的政策，对付投降派顽固派，而没收其财产土地。以至根本违犯了党的路线或政策。

第五种左的倾向，是把地主与富农、地主经济与富农经济看成是一样的东西。对富农经营实际也采取限制削弱的政策。过去我抗日根据地内贫农虽大量上升为中农，而中农上升为富农的过程却表现了不应有的迟滞，与此有关。

第六种左的倾向（从阶级关系上来讲是左的，从发展生产上来讲是右的），是改善人民生活，始终停止在改变佃东间、劳资间分配关系的阶段，尚未充分利用发展生产发展国民经济，从增加物力财力方面来充裕并改善人民的生活，即从发展生产的方面来改善人民生活。目前一切已经适当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地区，必须转移改善农民生活的重心于发展生产方面，否则抗战团结及根据地的自力更生的坚持，断难持久。

上述各种左的倾向，虽然是个别的，却是危险的，必须预防或纠正。不然，将危害到抗日根据地的生存与持久的坚持。

五　劳动政策（略）

六　关于边区金融问题（略）

七　财政问题（略）

（下）党的建设

一　党的开辟和大量发展时期（略）

二　党的巩固时期（略）

三　支部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略）

附　志

这份报告是一九四一年秋写成的。它所反映的是当时晋察冀边区的一些具体政策和党的建设情况。此次付印前略有文字修改。

彭　真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抗战以来，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在各根据地实行以后，曾经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支持了敌后的抗战。凡在比较普遍比较认真比较彻底的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障交租交息的地方，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而且能够保持工作的经常状态，安定社会的生活秩序，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但是这一政策，在许多根据地内还没有普遍的认真的彻底的实行。在有些根据地内，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实行了减租减息，而在另一部分地方，或者还只把减租减息当作一种宣传口号，即未发布命令，更未动手实行。或者虽已由政府发布了法令，形式上减了租息，实际并未认真去做，发生了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在这些地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发扬，也就不能真正将群众组织起来，造成热烈抗日的基础。在这些地方，抗日根据地就无法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扫荡，变成软弱无力的地区，但是在另外若干地方，则又犯了某些左的错误，虽然这种错误只发生在一部分地方，并且经过中央指示后已经大体上纠正了，但是还有引起各地同志加以注意之必要。当此抗战进入更加艰苦的时期，要求各根据地更加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更加团结一切抗日阶层来坚持敌后的长期斗争。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一总结的决定。另有关于执行土地政策的具体办法，作为附件，随此决定一并发下，以供各地采用。务望各地同志加以研究，认真执行。

(一)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数、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

(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

(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

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

（四）上述三条基本原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四年以来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正确的处理土地问题，才能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而使日寇完全陷于孤立。一切过左过右的偏向，都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五）在农村统一战线中，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例如地主反对或妨碍农民关于民主民生的要求等，必须按照上述原则作适当的处理。双方的合理要求必须满足，但双方都应服从于整个民族抗战的利益。在处理农村纠纷中，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是站在农民或地主的某一方面，而是根据上述基本原则，采取调节双方利益的方针。

（六）三三制政权，就是调节各抗日阶级内部关系的合理的政治形式。这一制度，必须在参议会系统中与政府系统中坚决的认真的普遍的实行。认为这一制度不过是一种敷衍党外人士的办法的那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七）政府法令应有两方面的规定，不应畸轻畸重。一方面，要规定地主应该普遍的减租减息，不得抗不实行。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不得抗不缴纳。一方面要规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地主依法有对自己土地出卖、出典、抵押及作其他处置之权。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当地主作这些处置之时，必须顾及农民的生活。一切有关土地及债务的契约的缔结，须依双方自愿，契约期满，任何一方有解约之自由。

（八）抗日经费，除赤贫者外，一切阶级的人民均须按照累进的原则向政府交纳，不得畸轻畸重，不得抗拒不交。

（九）减租减息实行之后，给予了提高农业生产的必要的前提，而农业生产是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的生产，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用最大力量推动发展之。政府应举行大量的农业贷款，以解决农民借贷的困难。

（十）农救会的任务，在减租减息之前，主要的是协助政府实行减租减息的法令。在减租减息之后，主要的是协助政府调节农村纠纷与发展农业生产，而不是以自己的决定代替政府的法令，不是以农救代替政府。在调解农村纠纷的任务上，应取仲裁的方式，而不是专断的方式。在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上，应动员所有农救会员起模范的领导的作用。

（十一）既然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是我党土地政策的第一个方面，既然各根据地内尚有许多地方并未普遍的认真的彻底的实行减租减息，而其原因，不是地主抗不实行，就是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因此，各根据地内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对自己工作加以严格的检查，派员下乡分途巡视各地实行的程度，加以周密的调查研究，全般的总结各地经验，发扬正确实行的例子，批评官僚主义的例子。须知发布口号、发布法令与实行口号、实行法令之间，是常常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的，如不严惩官僚主义，反对右倾观点，就无法使口号法令见之实行。

（十二）既然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是我党土地政策的第二个方面，既然各根据地内曾经发生过忽视这一方面的左倾错误，而其原因，不是农民不了解我

党的土地政策，就是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我党的政策。为着防止今后重复这种错误，就必须在党内、在农民群众中明确的解释党的政策，使他们明白现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是与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有根本区别的，使他们不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应把眼前利益与将来利益联系起来，把局部利益与全民族利益联系起来。必须劝告农民，在实行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正如在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的问题上，必须劝告地主不应该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要顾及将来与全民族的利益，是一样的。

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邓　小　平

大会的三个报告，经过几天的小组讨论和十一天的大会讨论，特别是彭德怀同志对大会的指示，一般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我完全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报告和发言，罗瑞卿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的发言，并认为大会的报告与精神是完全符合于《北方局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的精神。

第一部分　过去的检讨

过去工作检讨的目的，在于研究过去工作的规律，提出真正的经验教训，作为今后工作的借镜，不是埋怨，不是懊悔，也不是为着其他。因此，我同意罗瑞卿同志的意见，检查过去工作的标准应该是：

甲、不是从局部看问题，而要从全面去看问题；

乙、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去看问题，而不是笼统的一般的去看问题；

丙、任何事物都有其认识与发展的过程，简单拿今天的认识去批判过去是不妥当的；

丁、检查应是各方面的，但应着重于自我反省，特别要区别是指导方针的错误，或者是执行中的偏向。

唯有从这样的标准，才能得出真正的经验教训，也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工作才有好处。

在报告和讨论中都提到黎城会议，对于黎城会议的正确估价是什么呢？

首先要看黎城会议所处的环境，是刚在反顽大磨擦之后，形成了严重的干部蛮干的左的行为，影响了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当时是在大发展之后，几个区域的政权没有统一，武装部队单位很多，骈枝林立，战斗力不足，是一个泛滥状态；民生凋敝，人民生产情绪不高。黎城会议解决了这些问题，它的功迹表现在：

甲、确定了建设与巩固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明确观念，解释了中央关于巩固根据地的三个基本环节（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特别注意在大磨擦之后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明确了统一战线的观念。

乙、执行了北局四〇年四月三大建设（建党、建军、建政）的方针，提出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精神，初步确定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开始财政经济的建设，规定了许多“爱护

民力发扬民力”的具体办法，并获得很大成绩，打定了几年坚持斗争的基础。

丙、纠正了当时的混乱，克服了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巩固了各阶层的团结。

丁、实行了政权军队的统一，建政、建军收到相当大的成绩，政权威信大大提高，军队战斗力大大增强。

所以我们说黎城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有其显著的功迹。

但是黎城会议也有其缺点或错误，在部分问题上有其片面性，表现在：

甲、没有估计到群众运动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多少带有平均方式，当时虽也提到减租减息，“建党以进一步依靠群众为核心”，并规定了巩固群众组织的任务，但没有足够认识到当时许多地方发动群众工作很差，没有把群众运动提高在应有的位置，而以群众运动为三大建设的灵魂，所以影响到黎城会议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群众工作的消沉。

乙、在纠正混乱的左的现象中，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大转弯，须要一个艰苦的教育说服过程，更没有从思想根本上去揭发左的实质和其危险性，以教育党和干部，当时虽也提出了纠正左中要注意“组织、教育、纪律”三个办法，但更多的着重了行政的组织的办法，所以在各地执行中产生了严重的偏向，特别由于未从根本揭发左的思想的危险性，左的错误仍然在新的问题新的条件下又复发起来。

丙、武装政策在严紧组织提高战斗力建设正规军是收到不小成绩的。但在武装建设上是不够全面的。如在黎城会议上提出野战军队与地方武装自卫队建设及其后规定军区组织纲要对于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强调不够。这是由于对敌后游击战争的分量估计不够，以致在黎城会议之后，特别是在百团大战和茂林事变之后发生了对于地方武装的编并与放任两方面的错误。

这些问题，在黎城会议本身决定中，除地方武装问题外，是找不出错误根据的。但因为在大转弯时许多问题解释不够，对于可能发生的偏向防止不够，特别是教育不够，结果在执行中发生了不少偏向，这正是黎城会议的毛病。

所以我们说：黎城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缺点和错误是部分的。夸大了黎城会议的错误，说它泼冷水，忽视了当时的情况，忽视了执行中的检查，是不妥当的，是不会有教育意义的。

黎城会议的缺点和错误，经过四个月之后，在同年九月的北局高干会议是得到纠正的。北局高干会议对于群众工作提到足够的分量，在传达高干会议的四〇年十二月县级干部会议上还有专门的群众工作报告，提出与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认为过去在指导上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太行军政党委起）各级党部对北局指示的研究与贯彻很差，因而放过了四一年的大好时机。有人说过去我们没有象今天这样认识划定一个阶段来发动群众，是的，假如过去特别是四〇年、四一年划定一个阶段来作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当然会好些，但是必须了解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而且不等于一定要划出一个阶段才能发动群众。假如我们对于中央北局历次发动群众的指示，真正体会研究和执行，我们今天又是什么状况呢？很明显的，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武装问题，北局高干会议上左权同志曾有专门的发言（这是北局审查过的发言），强调了游击战争，北局军分会历来指导敌后的军事原则，是掌握到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原则的，即使黎城会议中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一些偏向，北局高干会议也是得到纠正的，而且四一年初一二九师的领导同志即曾公开作了自我批评的，我们不仅指出有编并错误，而且有放任错误，可是此后个别地方去年下半年仍有编并

错误（中条区）放任现象虽有不少纠正，但对地方武装仍然注意不够。所以，在一个正确原则确定之后，还有一个执行的问题。有人说四〇年下半年和四一年上半年的严重退缩，就是因为武装政策发生偏向的恶果，是的，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如只看到这一点，而无视当时对敌占区敌伪军工作之忽视，和在敌占区政策运用的偏向（如只需索不做工作）等等，能否得出正确的教训呢？我以为也是不可能的。人民武装的建设，自四一年提出加强民兵建设后，是有成绩的，但如根据彭德怀同志提出的民兵三个建设标准（(一)战斗与生产的结合；(二)支部掌握民兵；(三)教育。）来检查我们的民兵工作，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严重的弱点，特别是太行三五分区某些区域×××夺取民兵，昔阳和顺敌人夺取民兵，不少地方党员不愿参加民兵，一般教育中的形式主义等等，是值得我们严重警惕与纠正的，党员军事化的口号，是要我们去贯彻的。至于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还应根据德怀同志的指示，加以严重注意的必要，必须承认军队爱护与帮助地方工作还是不够的，而党政在提高八路军决死队的地位方面，也是不够的，这都是对于武装与人民结合（特别敌人一贯在做军民分离的勾当）以及根据地武装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的结果，德怀同志指出：华北党对武装重要性的观念一般是不深刻的，这点值得我们很好注意，不仅地方同志，军队同志一样要注意。

反倾向问题，黎城会议反左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执行中是有偏向的，黎城会议本身的缺点就在于它没有强调教育，从思想上去反左，揭发左的根源，所以我们看到反左中右的生长，看到在今天执行中央土地政策中，某些同志某些区域左的观念的复发，这是我们真正的教训。黎城会议后不久（六月初），我们即发现了部分区域对锄奸的放任，提出了要纠正，也只采取了一些组织办法，收效不大，这正重复了同样教训。有人问：今天看来，冀南这一阶段主要是左还是右呢？我想，北局四一年三月会议的回答是正确的，冀南是左右摇摆，这一问题是左，另一问题是右，同一问题此时是左彼时是右，或此地是左，彼地是右，而主要是左，即在群众工作上，也有左有右，讨逆后发生了严重的干部包办蛮干的左，同时对于改善基本群众生活又是右的观点，所以笼统说冀南在这一问题上是右，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应从具体问题的内容方面去区别左右，才是对的。

根据地巩固程度的估价问题，我完全同意瑞卿同志的意见，认为今天不巩固或巩固很差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是的，我们根据地建设还有很多缺点，根据地的巩固程度还未达到应有的要求，不平衡的现象还严重存在，发动群众不够，这是事实。但必须承认：我们的根据地基本上是巩固的，群众也有了相当的发动，否则不能回答为什么我们能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近六年，也会对今后坚持的条件丧失应有的信心。而且必须承认，正因为中央北局领导的正确，我们同志也没有睡觉，所以是有成绩的。

根据这些，我们从过去检查中，得到些什么经验教训呢？

第一、中央和北局的方针与指示，历来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工作中是否发生偏向，成绩的大小，完全看我们对于中央北局指示的了解和贯彻的程度来决定。正因为我们基本上执行了中央北局的正确方针，所以我们取得了几年斗争的胜利。反之，当我们对于中央北局指示了解不够研究不够贯彻不够时，我们就一定要发生错误和偏向，我们过去在群众工作武装问题上所发生的偏向和错误，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二、太行军政党委员会和几个区党委是基本上执行了中央北局方针的，但必须承认过去是有程度不同的错误和缺点的，特别是一般的对中央北局指示的贯彻太差，使工作遭受一些不应有的损失，走了一些弯路。同样，各地工作的好坏，也看他对于中央和上级指示的研

究与贯彻程度而有差别，这是应引起今后纠正的严重教训。

第三、过去我们在工作中，由于对下层的了解不够，常在决定和指导中发生偏差，今后下级报告要真实，上级了解要具体，分寸要掌握得很稳，考虑问题要成熟，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感想出发，才不致发生大的错误，要知道上级的一点偏差，都可以导成错误。

第四、检查工作应是多方面的，但应着重于自我检查，要认识自己工作成绩，尤要善于发现自己工作的弱点，加以及时的克服。上级领导机关要随时检查自己领导是否正确，下级要随时检查自己执行上级指示的程度。这才是检查工作的正确立场，也才对工作有好处，对同志有进步，要反对责人苛责己轻的观点。

第五、检查工作不是算帐，必要的责任是应追究的，但不能把责任问题提到第一位，我们是对事不对人，只有对于那些纠正不转的人或委员会，才应该而且必须提出责任问题。

第二部分　在新形势下的工作方针

对于形势的估计，在我的报告中已经说到，特别是彭德怀同志有了明确的指示，现在要说的很少。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空前有利于我们坚持敌后斗争，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有着充分的胜利条件，也有着渡过难关的严重困难，这在报告中都已说到了。我以为我们应该教育党和人民充分认识胜利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应从一些根本问题上去坚定人民的信心，才不致在局部的严重事件（如日寇可能取得的战役胜利，扫荡中的摧残等等）下，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同时，我以为尤应使党和人民深刻认识接近胜利的困难，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需要我们党政军民一致努力才能克服。这些困难是否我们认识够了呢？没有，我们许多贪污浪费现象，我们反扫荡反蚕食的经常准备还差，我们的人民武装建设还有许多缺点，我们发动群众工作还不够普遍与深入，我们在发动群众中还有一些地方照顾统战不够，我们的精兵简政工作还非常不够痛快与彻底等等，都证明了这点。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来迎接困难，渡过难关，以争取胜利。

同时，我们要懂得，在法西斯被打倒之后，国际国内会发生基本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人民，我党不仅在今天领导人民争取抗战的胜利，而且要在抗战胜利之后，在和平建国，民主自由的任务中，去巩固我们的阵地，去团结中国人民。我们在华北不仅争取敌后坚持的胜利，而且要打下基础，以巩固我党战后在华北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的努力，不仅是为了抗战的胜利，而且为了战后的建国，双重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任务当然是繁重的，可是我们必须肩负着这样的繁重任务而前进。我们中央北局的指示和三个报告，都是贯穿着今天和明天的精神的，应引起全体同志的注意。

但是必须指出，没有今天就没有明天，不渡过今天的难关，争取抗战的胜利，明天是不会到来的。在讨论中，对于今天如何克服困难一点发挥不够，这是一个缺陷。自然只看到今天，不看到明天也要发生错误也要使我们丧失明显的目标，要影响到我们的将来，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着眼于今天，同时也为了明天。譬如我们加强敌占区工作，既是为了配合今天坚持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也解决了为明天积蓄力量的任务。

这是对于形势补充说明的几句话。

其次说到我们今后的任务问题。

我们今后的方针是什么呢？北局已经给我们明白确定了：

“华北党的基本任务，在于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替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以便准备迎接伟大新时期之到来”。

实现这个基本方针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呢？应该是：

第一，贯彻实现民主政治。

这是依据于巩固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提出的严重政治任务，这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一环”（北局指示），这是贯穿于一切工作和党政民组织中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唯有民主政治，才能进一步的巩固各阶层团结，克服困难争取抗战胜利，也才能示范全国，争取人心向我，而统一战线的巩固不仅对于今天非常重要，而且对于准备战后也非常重要，巩固统战本身，就是巩固战后阵地的基本内容之一。不能设想：今天统战不巩固，能够争取抗战胜利。也不能设想：战后统战不巩固，能有我们的坚固阵地。

其次，唯有发扬民主精神和实质，才能达到充分发动群众的目的，才能实现群众自觉自动起来为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目的，也才能巩固群众的发动和群众的组织。不能设想：没有民主的干部包办，能够启发群众的自觉性，能够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不能设想：当群众既经发动之后，不提高群众到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阶段，而能够使群众形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的联合与斗争，以巩固统一战线和已得的经济政治利益。所以要“把民主斗争与民生斗争联系起来，把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反贪污浪费等等群众的经济斗争，逐渐提高到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摧毁残余的封建统治，以巩固党在斗争中既得的阵地”。（北局指示）

“在党政民系统中更加发扬民主精神，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在干部中应进行普遍的民主教育，肃清干部思想上违反民主的残余封建影响”。（北局指示）不能设想：在党政民系统中，在干部中没有民主思想与民主精神，能够发扬人民的民主精神，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不能设想：干部中没有平等民主的精神，能够发挥干部的高度的工作热忱。

所以，北局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深刻了解民主自由不仅是基本群众的要求，而且也是团结各阶层的旗帜，不仅是大多数人民今日的愿望，而且是战后全国人民的政治动向，党必须负责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胜利完成历史任务”。这正是把民主问题提为第一个任务的出发点。

其次为了贯彻民主政治，必须“有步骤的改选各级政权机关，特别是着重改选区村两级政权机关，吸收广大人民直接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真正自上而下的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示范于全国，使之与敌伪顽占区有基本上的区别”。（北局指示）改选政权机构，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去进行，在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等斗争中密切联系村政权的真正改造。在一个县大致实现减租减息之后，即可实行县选，其他县份可以年底前成立推选式的临时县议会，边区大选可在多数县份完成县选之后举行。各县村选举或推选不必同时举行。

再次，民主教育的实施，必须采取一些具体办法，民主教育本身就带有削弱封建统治的革命意义，这种意义在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说得很清楚。今天的民主教育，应贯穿于一切日常工作日常斗争中，党、政府、群众团体都应加以特别的重视，要研究出具体办法，编定材料，加以实施。

第二，依据各地区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继续发动与深入群众运动。

在群众尚未发动的区域，迅即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发动群众争取经济政治权

利的斗争，从斗争中大量发展群众组织，不应畏首畏尾延误时机。

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的区域，应继续充分发动，深入检查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等等执行程度，制止封建残余势力的任何翻案复辟的企图，同时加紧巩固群众组织，健全各个群众组织的内部生活。

在群众工作已经深入的地区，应特别着重民主建设、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建设、人民武装建设，使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提高一步。

在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则应以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一致对敌，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存民族力量，为一切工作的主要出发点。减租减息雇工增资仍有其一定程度的可能，但应采取一点一滴的方式，和说服调解的方法去实行，以不损害团结地主阶级对敌为原则。在冀南的少数基本区，则应抓住此宝贵时机，实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等法令，但不能象山地那样采取较硬性的方式，而应以说服调解为主，只有对各别过于顽固的分子才采取斗争方式。

在封建势力（土匪、民团、局子）统治的区域，目前不是在那些地方发动减租减息斗争，而应以扩大中日矛盾，扩大统一战线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我们应采取有效办法去争取上层分子，团结士绅名流和知识分子，开始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树立我们的工作基础，这应是一个相当时期内的任务。要知道今天引起了这些地方实力派的疑惧，对我们是没有丝毫好处的。

这就是不同地区不同的群众工作任务。

在各地发动群众工作中，必须贯彻统一战线的精神，今天我们处在敌后斗争非常艰苦的环境，有些区域已经相当的发动了群众，个别地区在群众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根据这些条件，在本区内不应机械的笼统的提出打的阶段或拉的阶段，而应根据不同的县区去确定打的阶段，还是拉的阶段。在打的阶段中，要善于运用打中有拉的策略指导原则，在拉的阶段中，要善于运用拉中有打的策略指导原则。打得要恰当，拉得要及时，过去个别区域随便乱打，打得过份，把削弱封建变成消灭封建地主的经济地位，是应适当纠正的，甚至说服群众自动退还一些过去曾经做得太损害地主利益的，也都是必要的，这些就是把群众运动约束于统战范围之内的道理。在群众运动中，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又要巩固统一战线，这正是党的领导的责任。

在各地群众运动中，还应贯彻运动本身的民主精神，培养群众领袖，克服干部包办的现象，同时在群众运动中联系到人民武装建设，要逐渐诱导群众进入武装斗争，发挥其生产热忱，实现民主政治，并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道理在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和大章同志的报告中都已说得很清楚，唯有这样才能巩固群众运动的胜利。

最后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巩固群众组织，必须加强群众团体的干部，调动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去主持群众团体的工作。

第三、强化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尤其是民兵建设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及群众组织中的贫苦积极分子加入民兵，扩大民兵数量，提高民兵政治质量，保障民兵在党的领导之下，武器掌握在可靠分子手中，太行三五分区某些地区×××夺取民兵武装，以及昔阳和顺敌人夺取民兵武装的现象，应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因此建议各县区党部及军区武委会应切实检查民兵的成分和支部的领导。对于某些地方民兵脱离群众的行为，应耐心的加以纠正。彭德怀同志提出建设民兵的三个原则，应切实研究和执行。对于民兵的军事教育，应着重于

现有新旧武器的使用和适合于现实战术的实地演习，反对形式主义。同时在人民武装的政治教育上发扬尚武善战保家卫国的风气。这是武装力量的准备与积蓄，现在将来都很重要。

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应动员群众积极的完成各个时期的参战任务，要使群众懂得参战勤务是与他们自己的利益不可分离的。要动员群众进行经常的备战工作，以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扫荡和清剿。

巩固现有的游击队，加强其军事政治教育，派好干部到游击队中去，以加强其领导，使之成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一方面能独立担负战斗任务，另一方面成为民兵的模范，领导民兵作战。县区长和党委书记兼任游击队长和政委，必须做到兼职又兼工作，纠正某些同志只挂名不去实际领导武装的现象。这在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保卫根据地，有极大的意义。

提高正规军的质量，加强正规军中游击战的教育尤应提高干部军事政治的素养，改善教育方式，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加强各种具体政策教育，至如文化教育在基本根据地亦须大力进行。同时要采取更有效的办法，密切军队与人民的联系，真正符合于人民子弟兵的称号。

第四、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

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大大提高群众的生产热忱，党在指导群众运动的每一步骤，都应诱导群众走向生产战线，因为发展生产是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保障。

关于根据地的财经建设，在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了，这里必须着重指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应是财经建设的基本环节，特别在今天严重的灾荒，敌人残酷的粮食掠夺、敌人的封锁、社会积蓄很少的条件下，其意义尤为重大。要估计到敌人的封锁，与对敌占区的掠夺，还会加强，如果不从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着眼，必将遇到严重的困难。过去在贸易政策上，太行区是有不少成绩的，我们应该继续发挥这些经验，用之于其他各地，但应密切注意由于敌人的警惕，必将采取新的步骤来对付我们，我们则必须在新的情况下，采取新的办法去与敌人作经济斗争，要切实了解敌人，善于钻敌人的空子，才能得到新的成就。今年赋予经济部门的财政任务是很大的，如果不注意这点，将可能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成就，而应足够估计到今后的变化，采取新的办法来完成任务。譬如掌握粮食问题是过去获得成绩的重要一环，今后还有不有这样顺利的条件呢？我以为不会如过去那样顺利了。所以，我们应注意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增加粮食的生产，掌握住根据地的余粮去同敌人斗争，特别要善于潜藏与保护粮食不被敌人挖去抢去以保障军需民食；同时必须加强农村中手工业的生产；手工业生产主要解决根据地人民自身的需要，但同时应注意输出品的生产，去以有易无，我们所谓自给自足的涵义，一方面是根据地人民需用的东西，主要是由根据地人民生产，一方面是逐渐争取输出与输入的平衡乃至相当的出超，不逐渐解决出入平衡问题，同样不能解决自给自足的问题。

农业生产的标准，应是逐渐恢复战前的产量，为此，不仅要大大发挥人民的生产热忱，把生产的领导贯穿于全年的生产过程中去，而且还应在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实现之后，要求得农村阶级关系相当稳定，就在发动群众中也应切实照顾这点，否则也要影响到生产。今年特别在灾荒区域应注意解决春耕中的各种困难问题，切实检查分局去年对春耕准备指示的执行程度，这是渡过难关的重大问题。军队和机关的生产方向，主要是农业生产。

手工业的发展，也是与群众运动不可分离的，要发动群众组织与加入合作社（主要是生产合作社或生产贸易运输信用几种作用混合的合作社），同时必须注意吸收地主富农的资金

投入生产和存储银行，这对于根据地建设有很大的好处。

其次为了建立巩固的财政基础，今天应在太行区实行统一累进税，在太岳区认真实行合理负担，准备明年实行统一累进税。统一累进税与合理负担的实施，只有在群众发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所以它是群众运动的内容之一。

反贪污浪费的斗争，应引起很大注意，那些恶棍如不加以反对和制裁，会使根据地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最后，党政军民机关和干部，应切实遵守财经政策，反对本位主义。

第五、开展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工作。

为了保卫根据地，为了积蓄力量，替反攻和战后作准备，都必须加强敌占区游击区的工作，这在我的报告中已经说得很清楚。

甲、在敌占区游击区应以团结中国人对敌，减轻人民负担，保存民族力量，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乙、进行敌占区游击区的组织工作，特别是伪军中人民中的组织工作，没有组织工作，就不能积蓄力量，对于敌占城市和交通线上的工作，应采取有效办法认真的开始。

丙、切实运用革命两面派政策，正确掌握与运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联系和配合，而以非法斗争和秘密工作为主。

丁、把政治攻势经常化，要求政治攻势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对敌斗争要求密切联系，经常的进行。

戊、提高日军工作的比重，掌握各地日本反战同盟的活动，对台鲜人的争取也须加紧。

第六、认真贯彻整风工作。

整风是一个思想革命，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去战胜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的斗争，去年虽在进行，但成绩不大，今年应切实贯彻。下面有一部分专门说这个问题。

第七、实行一元化的斗争。

必须加强一元化的领导，按照中央决议的精神和原则，把各系统统一在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问题下面也要专门说到。

第三部分　统一认识及一些具体政策

（壹）　群众工作问题

第一个问题　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在讨论中有同志提到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已经回答了。

一个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个力量，“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就决定于上述四种组织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彭德怀）这四种革命力量是缺一不可的，缺了一样都不能形成为革命根据地。这四种力量，是互相配合的，任何一部分不得力都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互相配合不好，也会使根据地受到损害。

设问：根据地的创立是先有武装吗？还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呢？这是先有鸡吗还是先有鸡蛋一样机械的提法。实际上有的地方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实行农民暴动，自己创造武装和政权，形成根据地，然后又用这个武装政权的力量去扩大根据地。创造新的根据地。有的地方则是先有了革命武装，以武装力量打开局面，建立党、政权和群众工作，形成根据地。但是不管那个在先，只有在上述四种革命力量形成起来的时候，才有革命根据地。

设问：这四种革命力量，那种更重要，那种是中心环节呢？我以为这同样是机械的提法，实际上这四种力量既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是同等重要的，假设一定要定个先后的话，则应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战争的特点，将武装放在第一位。必须懂得，只有武装没有党，政权和群众力量，武装斗争不能支持而走向失败。历史上有些区域由于单纯军事观点而失败的例子，证明了这点。只有群众运动或坚强的政权工作，而没有坚强的足够的武装或军事路线发生错误，也会使根据地失败，党政群众工作垮台，五次围剿后，退出中央苏区的例子证明了这点。没有坚强的政权工作、财经建设、除奸司法等工作无成绩，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的秩序，而且会影响到军需民食，也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太行区一九三九年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点。最后，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基础，没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党的领导不贯彻于武装政权群众等各系统中，党的领导发生错误，都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与坚持，许多例子证明了这点。所以说那种力量最重要最中心的提法是不对的。但是，是否我们应该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应同等的去注意这些工作呢？不是的，党的指导要依据于当时当地的情形，提出当时注意的中心，如政权工作薄弱就加强政权，群众工作薄弱就加强群众工作。在加强这一工作时，要有其他几种力量的配合。譬如在华北的开辟阶段与历史上的前例又有其不同特点，首先抓住以强大的八路军力量打开局面为中心，接着把中心放在建立政权，自上而下的建立发展党和群众组织，建设财政经济，建立社会秩序，都是抓住了规律性，获得了伟大成绩。譬如在巩固阶段，我们应以执行土地政策发动群众为中心，并建设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这点我们过去执行中央北局指示不够，在四○年四一年注意群众工作不够，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教训。

设问：武装、政权、群众、党四种力量如何联系与配合呢？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自己建立了党而又服从于党的领导，根据地的党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在解决这一中心工作时，要求得其他工作的配合，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武装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照顾基本群众利益与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解决军队的供给和补充。群众团体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的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提高群众到政治武装阶段，使群众形成为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这就是几种力量的配合与联系。有了武装就有了一切，或有了群众就有了一切的说法，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对的，否则是有毛病的。

还要着重说到的，我们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还要看统一战线巩固的程度这个条件来决定，这点也应引起我们注意。

以上就是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最后，设问：我们过去是否掌握住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呢？肯定的回答：一般是掌握住的，所以才有几年坚持与建设根据地的伟大成绩，否认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坚持，根据地能日趋巩固。

但是，我们有无缺点和错误呢？我们的回答：有的，如一个时间内对武装政策的偏向，相当一个时期内对群众工作的忽视，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还很不够，假如没有这些偏向，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根据地会巩固些。有人说：我们根据地还不巩固，当然是不正确的。

中央北局历来就有建设根据地的明确方针，我们的偏向或错误，就是对中央北局的指示研究不够，执行不够的结果，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教训。

今后在残酷斗争中，我们必须正确掌握根据地的规律，加深根据地的巩固程度，并以最大努力保卫我们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地，则抗日乃至反攻与民主政治的建设将无所依托，切不要忘记历史上没有根据地时候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　群众运动的规律

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党在指导群众运动中，必须掌握住这种规律。过去由于我们对中央北局的指示执行不够，所以今天的群众工作没有获得到应有的成绩。

什么是我们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的规律呢？第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二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第三是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不了解这些发展的规律，不懂得把群众运动逐渐诱导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就会使运动脱节，就不能逐步的提高群众到自为阶级的阶段，也不能保卫既得的利益。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与教育群众的问题，在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大章同志的报告中，都已经详细论及，不必赘述。

有人说：过去我们应该划定一个阶段来集中力量发动群众，没有这样做是个损失，是个缺点，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但是有人说：过去没有划定一个阶段来发动群众，就是没有掌握住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和群众运动的规律性，这种说法是不能同意的。应否划定一个阶段，是发动群众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规律性问题，不能设想任何地区任何时间都能划定一个阶段来做群众工作，譬如中共六中全会提出巩固华北，以进一步深入群众工作为中心，但并未指出要划出一个阶段来做，又如华中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但四一年还未提出划出一个阶段问题，这不等于中央与华中局没有掌握住群众运动的规律性。而且认识是发展的过程，只有在今天来看过去，我们如果在四〇、四一两年划出一个阶段来作，是最好的办法，没有这样做，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特别要指出的：过去我们对群众运动指导的主要错误，不是没有划出阶段的问题，而是没有在巩固阶段以执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等土地政策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

有人说：过去我们放过了相当的时机，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是对的，但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发动群众，不仅在抗战初期曾有广大而深入的抗日发动，反磨擦斗争中热烈的群众运动，今天冀南中国人大团结的群众运动，这些发展的政治意义丝毫不可轻视的，就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特别在去年下半年的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只是各地成绩大小不同，如太行比太岳冀南要略好些。

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但不是把历史上可能做的，机械的搬到今天来运用，而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来决定。今天太行太岳还可以划定一个时间来发动群众，但在冀南根据地变质后的广大游击根据地中（除少数基根区），就没有这个可能了，冀南今天是密切结合对敌斗争中去适当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的问题，是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而不是以减租减息雇工增资为发动群众的中心问题了。就在太行太岳区也要注意到今天敌后残酷斗争的特点，不能机械的去划分打的阶段和拉的阶段，而应是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正确运用，打的时间要求缩短，不宜过长，这是新条件对我们的要求。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是困难的，不能要求过急，时间是需要的，但认为："一年作不好有二年，二年作不好有三年"，也是不好的。太岳太行区一般应在今年内克服不平衡，做到完成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任务。冀南应大胆的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是对的，但主要是在对敌斗争中去大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而不是在执行土地政策中去大胆的发动组织群众。土地问题在冀南，无疑是应居于次要地位的，就在太行太岳，也是要约束于统一战线之内的。所以在冀南单独提出削弱封建的口号，是值得考虑的。

冀南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以为：第一，广大群众自觉的积极的参加对敌斗争，不仅先进部分，而且落后部分都参加了斗争；第二，在对敌斗争中，基本群众参加了人民武装（公开或隐蔽的），并掌握了这些武装；第三，在村政权中，基本群众有了自觉的参加，真正实现了三三制；第四，在对敌斗争中适当争取得基本群众自身的利益，并巩固了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敌；第五，有了群众自己的组织，或在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取得了基本群众的优势；第六，群众相信党和八路军，懂得只有跟着我党我军走，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

有人说：似乎这样的标准在冀南不成问题了，这只是空洞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艰苦严密而有贯彻力的组织和教育工作，这种要求是不能完全达到的。

第三个问题　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

这是一个如何把群众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的问题，是照顾既能发动群众，又能巩固各阶层团结的问题。这里只说到几点认识上的问题。

甲、把打的阶段与拉的阶段结合起来，实行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打的要恰当，拉得要及时，当然在各个县区还有划分打与拉阶段的必要，但打的阶段不宜过于拖长。在打的时候，应更多采取说理方式，争取开明分子来影响其他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即使他是假开明，也有好处，也应鼓励，只有对个别顽固分子，才经过一番孤立工作之后，实行斗争的方式。在拉的时候，要防止地主的反攻，特别要教育群众自动的去团结地主。

乙、是削弱封建，而不是消灭封建，所以打得要恰当，我们的方针是既要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过去有个别地方执行减租清债等法令时，有些过分的地方，应该纠正。政府的法令是一般的在执行中必须依据上述原则，加以恰当的执行，尤应纠正算很久以前的老账的办法。

丙、削弱封建不只是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在政治上打坍地主阶级的统治，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其本身就是削弱封建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但绝不能解释为消灭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地主阶级只要他是抗日的，不反对民主政治的，他就有参加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权利。所以我们在政治上不仅要保障群众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还要保障地

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在群众运动中不能提倡侮辱地主人格的行为，如打人唾口水等，当然群众自己这样干，是不足为奇的，但党的领导上，应防止这些现象成为风气，因为这些方法，会失掉社会同情，有碍团结地主抗日，也妨碍争取落后群众卷入斗争。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依据过去的经验证明：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非常重视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在减租减息时，大地主还比较容易接受些，一到政权问题时，就要遇到他们的严重反抗，所以没有群众自觉的参加政治斗争，要想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不可能的。

丁、团结地主抗日，只靠方式上的讲求是非常不够的，主要应在使之能够生活，能够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保障其合法的财权，否则即使我们态度很好，即使举他当了代表和参议员，都会无补于事。这点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应加以注意。

戊、群众左不可怕，只有当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与恰当纠正这些左的现象时，才是不可怕的，如果发展到破裂统一战线的地步，那是值得可怕的。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获得实现。这就说明了党的指导的作用。

己、对富农应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主要在政策法令上照顾这个原则，同时在斗争中，不能把富农与地主一样看待，过去斗争的对象，富农占的比例不小，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今天各地已经发生了某些过分的现象，应注意作适当的纠正，下面还要谈到。

最后，群众运动要求深入，但亦应注意其规模性，譬如应该讲求这一区域对另一区域斗争的声援，这一群众团体对另一群众团体斗争的声援，召开必须的一定范围的群众会，群众干部会、代表大会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使群众斗争经验教训普及，可以影响落后区，争取运动的平衡，又可以增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自信心，还可以培养群众的领袖。

第四个问题　党与群众团体

所谓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是在组织意义上讲的，在政治上必须保障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党对群众团体，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组织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也不能直接对他下政治命令，而是经过自己的党团去实现，过去我们各地对群众团体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般是包办与放松政治领导两个毛病都有的，今后应加纠正。同时提出群众组织的组织独立性时，又要防止群众团体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的倾向，防止党团脱离党的领导的闹独立性的倾向。

今后群众运动，应做到由群众团体特别是农会去出面领导，党务工作军事工作干部去作群众运动时，可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或经过群众团体的介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群众自身的组织观念，培养群众团体的威信，也唯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群众的领袖。

同时，党对群众运动的指导必须加强，要派遣很好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到群众团体去作负责工作，特别要注意加强下层群众团体的工作能力。对于各种群众团体不可能加以平均的注意，今天应特别加强党对农会工作的领导，首先健全农会的组织和生活。

各救组织在区以上仍采取救联的形式，不必变动，但在村一般应分开组织。上级救联人数尽量减少，把干部充实到下层去。

群众团体的经费，应逐渐做到自给，政府给以足够的津贴，今后群众团体的经济开支，可以自己负责，不必由政府审核。

党应用最大努力，去培养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要知道群众领袖是最值得珍贵的，没有他是不能支持最困难的斗争的。

至于各种群众组织在群众运动中的关系，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说得很清楚了。

第五个问题　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

政府对于群众运动是扶植的态度，所以不应对群众运动采取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但是群众运动应该是群众自觉自动的运动，所以政府也不要采取干涉或代替包办的态度。

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是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在我党政治领导之下的政权，他的施政纲领和法令，是符合于党的政策的，是照顾了工人农民，又照顾了地主资本家的，所以是有利于基本群众的。我们在群众运动中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等有利于基本群众的事情，就是在执行政府的法令；政府在公布了这些法令之后，还必须保障其实现。所以把群众运动和政府态度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党和群众团体在指导群众运动中，政府在扶植群众运动中，都是保证这些法令的实现，都是要把群众运动约束于政府法令之内，亦即是约束于统战范围之内，所以群众团体和政府对群众运动的立场是一致的，只是各自的岗位上有其不同的态度和作法。

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呢？

一、当这一地区还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时，应派人下乡解释政府法令，督促实行，坚决表示不准不实行的态度。

二、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实行减租减息等斗争时，政府人员应尊重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尊重群众自觉自动的阶级觉悟，不应采用自上而下的去干予，或包办群众斗争，不应利用政府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去过早结束群众斗争。这种方法虽可表面上给群众容易得到利益，但妨害了群众的自觉性，使群众不会相信自己的伟大力量，更不能提高群众到政治的阶段，这是有害的方式。

三、在群众斗争中，政府人员的工作是加强政府法令的解释工作，这实际上就帮助了群众运动。

四、当群众与地主发生争执时，政府采用“秉公办理”“坚持法令”的态度，这也实际上帮助了基本群众。

五、当群众运动中发生过左行动时，政府人员首先应通知党或群众团体加以说服纠正，或商定互相配合加以纠正，切忌简单的行政方式。但当这种左的行动影响太大，特别是为反动派利用，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时，政府亦应出面干涉制止，制止后仍须对群众进行充分的解说工作。

六、在群众运动中，政府人员应对地主士绅进行工作，主要是解释政府法令，劝说他们遵行，不能在地主面前去打击或批评群众团体及其干部，以增高地主气焰。如群众团体或干部有失理处，可以加以解释，但同时指出地主的不合理。

七、政府人员处处在群众面前尊重群众领袖，帮助培养群众领袖的信仰。

在另一方面党及群众团体在群众运动中，亦应提高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在群众中损害了政府的威信，是非常有害的。

其次，军队参加群众运动还是很重要的，过去取消民运部门是因为当时对地方工作成绩估计过高，加上军队干部有些工作方式生硬，影响到有些地区要求军队不要混乱了地方工作的步调，今天看来这是不妥当的。

今后军队不仅要派干部以群众团体的（主要是农会）面目或由群众团体介绍去参加地方工作，而且在群众斗争中，军队还应参加，这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运动，更主要是对军队本身很好的活的教育，当然在参加时，不一定要抬着机关枪和大炮。军队派到乡村工作的干部，必须统一于当地党的领导之下，在当地群众团体的工作计划下，一个步调的工作。

第六个问题　村级工作

一切工作在村，我们必须注意村级工作的领导，关于村级工作的一般原则，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都提出了。村级工作是很复杂的，各级党必须继续研究与解决村的工作问题。

我们在简政中，把行政村扩大，固然增加了工作的一些困难，但不如此会增加人民很多负担，所以不必改变，而注意于讲求在大村条件下，如何领导工作的方式。

（贰）　土地政策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个问题　减租问题

甲、战后土地产量除腹心地区的水地外，一般降低很多，因此，千分之三七五的最高租率，已不能完全适用。现在各地按照土地好坏，规定几等的租率标准，是必要的，但是在实行中，按年成交租，年成估计，往往过低，地主吃亏太大，觉得没有保障，而且实际是将固定租额（死租地）及固定的租率（活租地）取消了，这是不妥当的。

最高租率还是要定的，土地法规定的三七五最高标准，不必变更，可在最高租率内，按照土地好坏，规定各等租率标准，规定以后，应按照通常年景（一般是丰收年景的七成），死租地规定固定的租额，活租地规定固定的租率；六成以上的年景，按约定租额交租（死租地）；五成以上的年景，按欠收减免。这对争取地主，巩固团结是有好处的。至于具体的租率标准，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但须经边区政府或各地行署批准（在某些被敌人分割的地区，须经专署批准）。

乙、凡战后生产量降低的土地，应以战前的租率乘战后的产量，这样得出战后未减租前的租额，二五减租，应从此租额内减，不应从战前的租额内减，减后再与各等租率衡量。

第二个问题　退租问题

为了保证减租的彻底实施，要求地主退出减租法令颁布以后多收的租额是必要的，但今年在执行中发生了过左的偏向，如榆社发展到“折地分青”的错误，使部分地主垮台。以后退租，应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甲、从一九四〇年颁布法令后的秋租计算起，不得再按年成折合，凡以前所交之租额，一律不退。

乙、要适当扣除地主多收租额的负担部分。

丙、要照顾贫苦孤寡的出租人，不是一律退。

丁、应退租额一时出不起，可以分期退还，或由以后应交租额中扣除。但同时要防止地主的顽抗。如地主确因经济下降、群众公认无力全部退租时，应该调解，说服双方酌情减少。

第三个问题　合理负担评议的产量与定租额的产量统一问题

现在评议合理负担的产量，一般定的高；议定租额的产量，一般定的低，地主觉得自己同一的土地，有两个标准，出东西时定的高，收东西时定的低，是不合理的，表示不满意，这应加以纠正。计算合理负担的产量与评议地租的产量应统一，产量的评定一般应以平常年景（相当战后丰年的七成）为标准。

第四个问题　清债问题

今后执行上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甲、付息已超过原本二倍者，清债抽约，但超过部分，不论多寡，均不退还。超过一倍，在一倍半以下者，停利还本。超过一倍半者，补至二倍清债。

乙、清债时，现洋折价发生纠纷，可按一银元折四元冀钞计算。

丙、押地被债主侵占，债主私自税契，或强迫税契者，一九四〇年法令颁布以前，不再变更；以后的以欺骗抗日政府论，所税的契约作为无效，债务人依法清债，并依法处理其土地。

丁、小押当所抵押者，多为日用品及各种杂物，抵押期满，往往拍卖，故期满之抵押品，不应在清债之列。如押期未满，可依照清债办法清理，但押主如有特殊情形者，可照顾之。

戊、在法令公布后，除债主以冀钞高价折合现洋收息，农民利益损失过大，允许退息外，其他一概不得退息。

第五个问题　迅速争取雇工复工

因为灾荒关系，灾民流入内地，影响雇工工资及复工问题，加以某些地方群众运动中过左行为，富农对复工表示迟疑，必须抓紧时间争取复工，工资过高者，可说服雇工适当减低一些，同时，说服雇工雇佣原来工人和本地工人，免因灾民流入，增加主雇纠纷，及雇工失业。

（叁）　对敌斗争问题

第一个问题　几种地区的界说

甲、敌占区：敌占城镇点线及其附近敌人统治力量强大，而我武装不能或不能经常进入游击的区域，称为敌占区。

在敌占区积蓄力量，是以秘密的非法工作为主，但为了很好的掩护我们的非法秘密工作，必须充分的利用合法形式（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正因为它是最少可能的，所以更是可贵的。在敌占区党和革命抗日群众组织，应采取隐蔽精干政策，打入伪军伪组织进行秘密的革命工作积蓄力量，是那里的重要任务。

在敌占点线附近统治力量强大的区域，经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武装能进入作经常的游击活动时，它就变成了游击区，乃至逐渐发展成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我们应争取这种变化。

乙、游击区：我们的工作薄弱，敌人仍存相当大的控制力，或敌占优势，或敌我均势，但我武装能经常进出游击活动开展工作的区域，称为游击区。

在游击区应以非法斗争，首先是武装斗争为主，但因为敌人仍有相当大的控制力，人民也有合法斗争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敌人可能允许的很小限度的合法斗争的可能。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正确的配合起来，以保护人民利益，并从对敌斗争中，在各方面积蓄力量。

当我们工作基础打定时，这种游击区就可变为游击根据地，我们应争取这种变化，决定这种变化的条件为：是否这种区域已经形成为革命两面派的区域。

丙、游击根据地：这是我占优势的游击区，即使它不能不资敌，不能不在形式上是伪组织的一套，但在人民中，存在的仍是抗日秩序，实际上仍是抗日的组织，能顺利实行革命两面派政策，这些区域，还能进行一定程度的抗日建设工作，并成为武装政权的依托，这种区

域称为游击根据地。

游击根据地一般是资敌区，冀南现有的少数不资敌区，因为它的比重很小，也是在敌人的格子网内，所以也是游击根据地。

所谓隐蔽游击根据地，也是游击根据地的一种，其不同处仅仅是它在广大的游击区建立起来的小块抗日堡垒，故应更隐蔽，即其作法应较大块游击根据地更带隐蔽性。

游击根据地（除少数基本区）。是以非法斗争为主，并应建设一定的抗日秩序，和进行公开的武装政权的活动，要有较强的党的组织基础，成为武装政权的依托，但亦应充分利用可能的合法斗争，尤其是隐蔽游击根据地更应注意及此，更要善于隐蔽自己，才能长期坚持，而不致遭到不应有的摧毁。

游击根据地如果不巩固统一战线，不懂得以非法斗争为主，而又善于利用可能的合法斗争，不善于隐蔽自己，特别是脱离了群众，也会在敌人摧残下，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这点应引起注意。

丁、根据地：即我抗日组织抗日秩序公开存在，抗日建设能有计划进行的区域，而且是有相当范围的区域。

我们的任务是：从不断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和加强党政军民的各种建设工作，以坚持与保卫抗日根据地。

由于敌人的蚕食和扫荡，根据地游击性将逐渐增大，且有一部分根据地变为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的可能。但我们整个根据地是能够坚持与不断巩固的。

戊、在今后的残酷斗争中，区域的变化是很大的，主要是游击区增大，我们要随时掌握住这些变化，及时改变我们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

第二个问题　削弱敌人与保存自己

我们的任务是削弱敌人并保存自己，这两者不是矛盾的，而且相互配合相互联系的，忽视一面，都要发生片面性的错误。保存力量是积蓄力量的内容之一，不注意在斗争中保存力量，过分消耗自己，就会影响到斗争的坚持，削弱了自己就变动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也就是便利了敌人，我们不仅着眼于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即为今天的坚持都必须保存自己。但不削弱敌人也就不能保存自己，譬如我们武装不积极活动，既得不到人民的拥护，也会增高敌人的气焰，结果部队本身也不能巩固，并会在被动的情况下去应付敌人。又如我们在游击区敌占区不善于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结果是人民受损失，敌人得便宜。

保存自己是多方面的，包括武装力量人民利益等各方面的保存，尤其是壮丁的保存，削弱敌人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军事上消耗消灭疲困敌人，政治上瓦解削弱敌人。

保存自己削弱敌人最好方式，是军事上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政治上的革命两面政策的正确运用，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的密切联系与配合。

所以保存自己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要从积极的对敌斗争削弱敌人中才能达到的，有些人误解保存自己，把它变为苟且偷安，不积极对敌斗争。其结果不仅不能保存自己，反而要削弱自己，这是非常错误的。

同样熬时间积蓄力量的方针也是积极的，把熬时间解释为“苟延残喘”，也是错误的。

第三个问题　积极活动与隐蔽力量

积极活动与隐蔽力量也不是冲突，而是一致的，隐蔽力量，不过于刺激敌人，善于麻痹敌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非常重要，这是几年斗争的经验，但不积极活动也不能隐蔽力

量，更不能达到积蓄力量削弱敌人的目的。

在军事上，所谓不刺激敌人，是不作大规模的行动，甚至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内不作军事行动，这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但不刺激敌人隐蔽自己的意义与行动消极，没有丝毫相同之点，今天我们处在敌后残酷斗争的阶段，要想求得敌我和平共居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某些区域，应该不过于刺激敌人，引起敌人过大过多的报复扫荡和清剿是对的，如我们的隐蔽游击根据地就应如此，但一般应从积极行动中来保存自己，只是我们的行动不是大规模的，给敌人过分威胁的，而采取广泛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游击区游击根据地，我们必须作积极的游击战争，才能帮助配合革命两面派政策的运用，这在各地经验都证明了这点，就在隐蔽游击根据地，也需要有公开武装的相当活动，才能掩护其坚持与存在。

在配合邻区反扫荡时，应采取积极活动的方针，应把保卫根据地的整体观念树立起来。

在政治上，我们无论采取公开的或秘密的、合法的或非法的对敌斗争，无论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党的组织或宣传工作，都应是积极的，只要注意不暴露不突出，善于隐蔽自己。

所以隐蔽力量本身也是积极的，把隐蔽力量的原则解释为消极、不行动或少活动，都是错误的。

今后斗争中，为了实现敌进我进，熬时间积蓄力量的目的，我们还应选择适当时机，用牺牲很小的方法，打下一些小的据点，争取空间时间，都是必要的。

第四个问题　军事行动服从于政治任务

武装是对敌斗争的骨干，但军事行动必须服从于政治任务，实现一定的政治任务，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军事任务，当我们的军事胜利很大，但违犯了党的政策要求时，他反而是失败的。今后对敌斗争中，军事与政治的结合，更要密切，否则便不能胜利，尤应在指导军事斗争中加以注意。

但是，如果把武装解释为附属物也是不对的，只是在为了完成总的政治任务上，军事是服从于政治的，而在斗争形式上，武装常常居于主要的地位，如敌占区游击区以非法斗争为主，武装斗争就是非法斗争的主要形式。

所以军事行动服从于政治任务，不能解释为可以放松武装斗争，或丝毫减轻武装斗争的意义，反之，必须深刻认识没有武装，或武装力量不够，都不能坚持敌后斗争，坚持根据地，所以我们党要学会熟练管理武装、教育武装、指挥武装作战，所以我们要切实做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

不要忘记斯大林同志的话：“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人民反对武装反革命”。

第五个问题　地方武装与正规军

建设地方武装的重要性，大家是很注意了，但是对于正规军的意义，似乎又易为大家所忽视。过去我们强调了正规军，曾发生了偏向，现在强调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又要防止忽视正规军的偏向，特别在正规军地方化的实行中要加以防止。

今天强调地方武装是对的，正规军地方化也是对的，但正规军地方化不等于取消正规军或削弱他的作用，要知道地方武装有其地方的局限性，而正规军则有其战斗力强、能机动自如的长处，如果没有相当的正规军，敌人一个大队都可以在根据地到处横行，这是显然的道理，所以在正规军地方化之后，军区军分区的指导，不仅应强调地方武装人民武装的建设，而且丝毫不可放松正规军的教育管理使用和军事政治质量的提高，使之成为现在游击战争的骨干和将来反攻军队的基干与干部的源泉。

在将来反攻时，需要大批的正规军，我们今天不仅要加强现有正规军的质量，而且到反攻时，我们还必须把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军，所以游击队升级为正规军的军事建设原则本身是正确的，在反攻时还要实行的，过去的缺点则是在基本游击战的条件下，在需要广大地方武装的条件下，去编并地方武装，扩大正规军，所以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也必须弄清楚。

（肆） 财经工作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关于负担政策

只解答两个问题：一个是资产应否负担；一个是雇工工资应否负担。

资产负担自实行以来，固发生了好多问题，而且在办法中，亦有某些不合理之处，但绝不能因某些偏向之发生而根本否认资产税制。我们负担政策的基本精神，是配合着土地政策，从各方面来减轻封建剥削，使地主改变其生产方式，变成经营地主或富农的生产方式，以提高生产，这是合乎奖励富农经济的原则的。同时，在战时有时收入是不易调查的，不能不以资产税加以补助，以便增加富力，而裕税收。至于过去个别地区，用过分手段如吊打、胁迫、举拳头估计、刨窑挖洞，向地主老财硬挤存款存粮、追算多年老账等，这是不妥当的行动，除在群众运动指导中注意说服防止外，并应由政府从法令上于不妨碍群众运动助长埋伏隐瞒条件下加以适当防止，因此我同意报告所提征收资产税办法，存款中白银折合冀钞问题，应与解决土地清债问题同样，一般以每现洋一元折合四元冀钞为标准，至经济部门收买现洋，应另按一般行情而定。至于雇工工人工资，根据政策原则，不论多寡一律不课负担。尤其因目前物价高涨，雇工工人失业的现象相当严重，更不应再加以负担。

第二个问题 节约与掌握粮食救济灾荒

太行区公粮因灾荒减免原因，如照实派数征齐，尚缺一个多月的吃粮，而截至现在，秋粮还有两万多石未征起（夏粮不在内）。冀南公粮在许多地方差三四个月的吃粮。严重的灾荒威胁着我们，不仅太行连太岳冀南某些地方都将发生春荒。对这样严重的军食民食的困难，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与切实的克服办法，由大会发言所反映的情形看来，粮食浪费现象，在许多机关团体部队中，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必须立即进行纠正，各系统进行深入的教育与检查，切实执行检查粮食办法，严格执行制度，反对浪费。对游击区及游击根据地的粮款制度，酌改简易，以便贯彻执行。无论公粮民粮，要切实保护埋藏，避免损失，这应为全党的严重任务。以一切努力，配合各种工作，完成征收公粮任务，以保证军食民食。

太行太岳区在党的统一领导，各部门密切配合，进行全面的对敌斗争中，政府必须切实掌握粮食。从敌占区吸收粮食，反对敌寇掠夺，维持根据地粮价平稳，并由此来吸收根据地内一部分余粮，调剂有无。有些区域，要贯彻各种粮证制度（即购买证、运输证、售粮证）等，以切实做到合理的调剂，反对屯积走私。在灾区，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设法实行较严格的粮食管制办法。在春荒极端严重时，可以从非灾区用动员说服方式征购一部粮食，以调剂灾区，但征购办法要十分慎重，以免为奸人所乘。各级党与政府必须加强注意粮食调剂工作与领导，因为他是直接影响到民食的。

第三个问题 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对敌经济斗争

平原游击根据地财经建设工作，一切必须从开展群众性的对敌斗争出发，这在三个报告中已经指出了。现在就大会发言所提到的关于对敌经济斗争的意见，加以研究总结。

首先应该指出过去冀南一个长时期忽视对敌经济斗争工作，使冀南经济上受了很大损失，

且影响及于太行，今后必须注意。

平原的对敌经济斗争工作，地区的重点应该放在区域最广大的游击区，必须与群众利益密切联系，与反资敌斗争密切联系，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不能设想在据点林立、敌我插花的环境中，没有广大群众的配合，能进行有力的对敌经济斗争，工作重点应该先集中在某些比较重要的大宗的输出输入物资上面，而不要过分的分散我们的力量，因此出入口税率应较山地有适当的改变，掌握粮棉与黑白油的输出，有计划的减少大宗仇货之输入，应该为当前之要务。税制服从于整个对敌经济斗争的利益，不要拘拘于小利。

在组织与工作的方式上，在游击区应多采用分散及隐蔽原则，如利用分散集市、隐蔽集市以掌握市场；利用与掌握经纪（牙行）在村成交；最好广泛建立群众性的村合作社以代替集市。在基本区则可开展现已实行的交易所办法，唯亦须力求分散及隐蔽，以减少损失。一切为了团结组织商人，掌握主要物资，有计划的组织输出，掌握外汇，能多掌握到外汇，才能更多掌握输入。过去冀南对外汇观念之错误及使用之不当，要迅速改正。在游击区，通过掌握村经纪与合作社流通冀钞，并逐渐掌握伪钞，使其不成为交易的媒介，以打击伪钞扩大冀钞市场。但要认识游击区是不能避免资敌的，在敌人征收时，我们又应当使群众能得到伪钞，不致涨价，以减轻群众损失，使群众感到我们办法的好处。在敌人强迫群众组织合作社时，我们应向群众坚决揭破其阴谋，并动员群众不使其成立，在不得不成立时，应派人打入掌握配给品，使其在某些时候成为冀钞的准备金。

在平原应更多通过商人，开展贸易工作，团结与组织商人，使其有利可图，或投资合伙，以便利我工作，都是可以的。我们的目的在通过他们适当限制他们，以达到组织输出掌握外汇，并在有利条件下组织输入，扩大冀钞市场，禁用法币，打击伪钞。过去政府投资，但不派干部，完全由商人经营的合伙办法是不对的。

冀南征收公粮工作，除开负担政策及征收办法已有改进，此处不谈外，必须注意过去因征收而致伪钞流通范围扩大之惨痛教训。尤须注意将征起粮食以各种方法掌握在我们手中，并组织群众性的交通运输，运入我军常到地区，纠正过去以形式的条据交换代替收粮办法，以致存粮终为敌掠去，加重了基本区人民的负担。

第四个问题　各战略区在财政经济上的配合

一、太行区是全区的中心根据地，党政军民人数约占人口百分之×，人民负担最重，物质资财条件困难，虽在财政经济工作上摸索的较有办法，但一九四三年的军政预算，仍有不少部分是赤字，毫无着落，冀南太岳两区人数较少，党政军民的人数只占百分之×，财政经济工作虽未严加整理，环境虽逐渐变化日趋困难，但物质资财的优良条件是存在着的，只要党加强领导，全党对于财经工作加强注意，是可以获得进一步的成绩的。决定冀南太岳二区四三年财政基本上是自给原则，不责成解款，但必须尽可能的在外汇工作上，帮助太行区，以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具体办法已经决定，责成冀南太岳的党负责完成任务。

二、通货管理制度。（略）

三、各区域冀钞价值不一致，物价悬殊不齐，这对全区财经工作配合上有莫大妨碍，责成冀南太岳两区对冀钞价值争取提高与太行区平衡，最好还能比太行区高，对伪钞全区应努力协同配合于今年内打倒之。（下略）

第五个问题　关于加强财经工作一元化领导

为了统一各区实现一元化对敌经济斗争，在边府行署和专署之下，应设一财经委员会，

县可斟酌当地经济形势设立，不普遍组织，财经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之下，以政府面貌出现，参加人员包含政府财经部门银行及军队后勤人员，均由党委慎重决定，然后以政府决议组织之，公开受政府领导（可以吸收少数党外财经人员参加）是一权力机关，但不干涉各部门内部工作，其决定可由各参加之系统执行，并可直接对下级财经委员会做指示，与各级工商部门银行设共同的监察委员，以便进一步统一配合，各地银行之资金分配及发行计划应统一于总行。各战略区工商办事处及银行，应接受总局总行关于全区之总的计划方针之领导，关于各区的具体计划和工作，在配合总局总行的方针之下，由各地党委就近领导。责成冀南太岳两区党委对于银行和工商部门加强领导，调补健全干部，定期检查工作，加强政策教育与政治生活。

第六个问题　认真研究敌人了解敌人

我们的财经建设，离开对敌经济斗争是不可能获得成绩的，因此，我们必须切实了解敌人，才能钻敌人的空子，利用敌人的弱点，来实现我们的任务。敌人是很厉害的巧妙的，我们不应满足于过去部分的成就，而必须不断研究敌人，采取不同办法去对敌作经济斗争，以建设我们的财政经济。

（伍）　其　他　问　题

第一个问题　×××问题

甲、在任何地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员共同建设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以共同团结对敌斗争，但要严格区别×××和特务分子。

乙、在根据地对×××问题的方策，详见《太行区×××问题》小册子，那里一般问题都已解决了，大家可以研究，今后各地对此问题，应加强调查研究工作。

丙、在敌占区游击区对×××问题要处理得很郑重，主要是团结×××对敌斗争，但要达到团结目的，必须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斗争过程。对于顽固反共分子，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孤立工作，只有当他们在群众面前孤立了的条件之下，才能达到共同团结对敌的目的。因此，我们不能采取简单的方式，必须深刻认识这是一个群众问题，如果处理得当，既获得群众的同情，又孤立了顽固反共分子，取得我们政治上的优势。反之，如果处置不当，必然失掉群众的社会的同情，使我们在政治上丧失地位，反而帮助了他们，孤立了自己。

丁、对于顽特必须采取孤立打击和争取其中动摇分子的方针，对于破坏分子和借刀杀人的分子，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所以对于顽特不能只是简单的打击问题，更重要是政治上的孤立，打击最坏的家伙，也要得到群众的同情，引起其内部的分化，也便争取其中的动摇分子。对于破坏分子借刀杀人分子的镇压，也不能只是一个镇压问题，而必须认识这同样是群众问题，只办其中对革命抗日危害最大、为群众所最痛恨的首要分子，对次要分子可采取自首、向群众悔过自新及交保等方式，简单化是没有好处的。在敌占区游击区捕捉处办这种分子时，除紧急情况外，必须得到地委和分区政治部的批准。

戊、在伪军伪组织中，对××的对策。（略）

第二个问题　除奸防谍问题

甲、在除奸防谍问题上，必须大大提高我们的警惕性，必须足够认识敌特×特对我们的危害性，而今天我们的锄奸保卫工作，始终还是我们工作最薄弱的一环；无论经验上干部质量上，我们远不及敌人和×特，军队如此，地方更差。特别要指出的，我们的政治机关及地

方党部，对此工作的领导，很多是忽视的，有不少同志借口不懂锄奸工作来掩盖其忽视的实质，必须反对，必须纠正，今后党及政治机关应加强这个工作的领导。

乙、我们应该区别敌特和×特，在处理上应有轻重程度上的不同，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不能解释为我们可以放松对×特的注意，忽视×特对我们的危害性，我们对敌特×特在注意上应是同等的，特别要严防敌特尤其是×特的内奸政策。

丙、要切实执行锄奸工作的群众路线，我们在技术上方法上远不如敌特×特，但我们有着政治上的优势，即广大群众拥护我们，要求锄奸防谍，当群众懂得这是他们自己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生无限的力量，使破坏分子将无容身之地。我们必须善于发挥这种优势，要向群众做不断的锄奸防谍宣传和教育，建立普遍而又精干的群众除奸防谍网，处理人犯要经过群众路线，这是动员与教育群众锄奸的最好的办法之一。这些问题过去都曾决定了一些办法，问题是要认真的做到。

丁、党及政治机关，特别是地方党，必须加强锄奸（公安）司法部门的领导，加强其干部，经常讨论与检查其工作。对司法部门必须有新的认识，过去忽视是不对的而且是危险的，如果被敌人抓住了司法机关，一定会给我们以很大的损害。

戊、党在指导锄奸司法部门工作中，必须切实掌握党的除奸政策，中心问题是：把除奸工作成为群众运动；打击少数最坏家伙，分化与争取其动摇分子；不要把除奸工作技术化神秘化，而要认识这是一个尖锐的政治斗争。

第三个问题　灾荒问题

甲、冀南部分区域的灾荒，应引起严重注意，一方面要从对敌斗争中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要研究出具体办法解决灾民的困难，提议由冀南区党委作专门的讨论。

乙、太行太岳有大批的外来灾民，一方面增加了根据地的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开辟灾区工作的条件，所以我们应：一、用劝阻方法停止灾民继续入境，但应给以少数路费。二、已入境灾民可动员一批到敌占区去，但须进行很好的解释工作，并指示其到敌占区后如何生活，不为敌人利用，我还应主动的计划在敌占区或游击区安插一些灾民，并动员敌占区游击区人民爱护与帮助他们。三、特别是对已入境的灾民，应用大力安插他们，动员根据地人民帮助他们，用热忱感动他们，给以可能的援助，同时应调出一批灾区干部进行灾民工作。四、到春耕时应有计划的组织灾民回乡。

丙、太行太岳的部分灾区，应特别注意继续解决灾民困难，特别是春耕时的困难。

第四个问题　爱护军队问题

甲、党、政府及群众团体，必须不断教育群众，造成群众爱护人民子弟兵的风气，军队本身必须爱护人民的利益，严格群众纪律，取得人民的信仰。

乙、优抗工作要照过去政府颁布的条例，认真做到。对友军的抗属，亦应同等待遇，但须有友军正式公函证明，才能确定其抗属地位。

第四部分　造成整风运动的热潮

（壹）整风，是我们党进行思想革命的斗争。整风对于改造我们的党及全体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方法，提高他们的工作效能与品质，加强与巩固全党的团结，加强全党与党外人士的团结，以及转变我们的工作作风等，均有伟大的革命意义。今天检查我们一年来关于整风工作的进行，无论地方与军队中党的组织，一般说来，读了二十二种文件，开始学习与调查研

究实事求是的工作，然而仅只是开始，还未能热烈响应中央与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的号召与决定。各级党在接到中央关于整风的决定与指示后，也作了一些决定指示和计划，然而这些决定与计划，许多未曾联系实际贯彻下去，而在整风本身，也曾发生了不少歪风。如从整风的范围上来讲，目前主要尚停滞于少数领导机关的工作干部中，在地方党地委以上、部队旅以上的许多主要负责干部，均未能在整风中先起核心的示范作用。多是只整别人不整自己、或采取自流的旁观的态度。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易造成雷厉风行的整风运动，这是一。其次，从整风的内容与实质上讲，一般对于整风重点，是在进行思想改造的意义认识不够，不了解党内一切歪风的来源，都是我们思想上有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各式各样不正确思想来的。因此，过去在整风工作进行中，无重点的“为整风而整风”的现象，是严重存在着的，这是二。第三、如果从整风的方法方式上讲，一般是偏重于书本理论（这当然是重要的）的整风，不注意同实际工作相联系，从实际工作去检讨与纠正许多三风不正的事实，因而过去的整风表现空洞与干燥无味，缺乏生动的实际内容。总之，过去我们对于整风的意义是认识不够深刻的，对于整风的领导和布置是主观主义的，所以过去的整风运动，不易得着顺利正确的开展。

（贰）为要顺利的进行整风，必须首先要了解敌后环境与敌后党的组织的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敌后的地方党，无论太行、太岳与冀南，虽然在抗战前已有少数的组织，但基本上是在抗战以后大量发展起来的。就全体党员及干部的成分来讲，党员几乎百分之百是农民，党的分区委以上的干部，以及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干部，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骨干是很少的。就这些干部的质量讲，由于新的干部多，革命的斗争与党的锻炼，特别是思想意识的锻炼，是很差的，一小部分党龄稍长的干部，也因敌后环境长期独立工作的结果，严格的党与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也是很不够的。

第二、敌后部队中党的组织（指本战略区的部队而言），虽然团旅以上干部，大都是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但广大的中下层干部，也主要是在战后生长起来的。这些新老干部几乎全部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出身，农民和知识分子固有的特点，是会不时表现出不正确倾向的。同时再加上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统一战线与分散游击的战争环境，一些党外非无产阶级乃至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很容易反映与浸透到我们部队中来的。

第三、敌后的环境，是残酷与频繁的对敌斗争环境，特别是平原游击根据地，更是几乎每天都处在战斗中。这样的环境，无论军队党与地方党，特别是军队中的同志，他们的生活是流动与不固定的，一般是分散多而集中少，工作非常繁忙。这种特殊环境，也形成了整风运动的困难。

第四、目前党内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的思想方法和思想意识，如在政治上自作聪明、搬弄教条、不尊重、不研究、不执行上级决定与指示；在认识与解决问题的态度上，决定工作的方法上，许多是主观主义、平均主义、片面夸大、自以为是而不照顾全局与整个形势，只是强调其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因而经常发生片面的倾向；在思想意识上，是任意发展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来对抗和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自私自利，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随便无原则无分寸的批评上级，责备下级，任意进行小广播，而对于自己却缺乏自我的应有的严格的批评与检讨；在组织问题上，强调自己的独立与特殊，发展本位主义，对上级要求绝对民主，感觉党内民主不够，对下级则强调“集中领导”，实

际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思想：不遵守组织原则，互相排斥攻击，经常闹无原则的纠纷；在工作作风上，缺乏实事求是的苦干精神，眼睛向上，轻视下层工作，不愿到实际工作中去接近群众，包办代替别人工作，满足于表面的现象等等。以上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各式各样不正确倾向，虽不是在每个同志身上全部表现出来，虽其程度的轻重大小不同，然而它在党内（包括地方党与军队党组织）严重存在，却是不可掩饰的事实。这种存在，不仅在党的下层组织与干部中，而主要的要引起我们足够注意的，是在我们党的上层领导机关与我们的高级干部，亦同样是犯着这些思想毛病的。别的具体事实例证我们暂且不提，单拿这次我们高干会议的某些发言中，即可以充分说明我们思想方法和思想意识是有不少严重的毛病存在，而可以引起工作的损失的，是应该在党内洗一个澡的。我们整风的目的与实质，实际即是要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及其思想方法，来战胜与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所以整风是建设党，使党进一步布尔塞维克化的最重要的步骤，这正是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把整风提为目前中心任务的理由。

（叁）根据我们过去整风的缺点，敌后战争环境，和本区党的组织及思想方法上的一些缺点，因而我们目前对于整风工作的进行，应着重在：

1． 在整风的内容方面，主要着重于学风的深入研究与检讨，即主要着重于我们思想方法与思想意识的改造，因为思想方法打通了，其他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而改造我们思想方法的重点，又必须着重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和自作聪明，而实际是一知半解的教条主义，农民落后思想的平均主义与利己主义等等思想，必须从思想方法上给予纠正和改造。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将整风运动提高到思想革命的原则高度，以引起大家足够的注意与认识整风的重大意义，从此来展开与一切不正确思想的斗争，切实改造我们许多不正确的思想方法，提倡与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过去我们有些部分，先整党风，是一种避难就易，轻重倒置的错误，必须纠正。

2． 在整风的对象方面，重点应放在地方党地委专署一级，军队旅与分区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这是主要的整风对象。此外地方党县一级，与部队中团一级的干部，也必须进行整风学习，但他们的工作是比较更为繁忙与复杂，学习的可能时间是要少一些的，因此，各区党委的党校，特别是太行与太岳，必须尽可能的抽出一批县级干部来进行集体整风的轮训；一般不能脱离工作岗位的县级干部，对于给予整风的要求和分量，一般是应减轻一些。地方党分区一级与军队党营连级的干部，亦应进行整风学习，内容更要简单而通俗，一般可采用上课讨论与反省的方式，其不能笔记者，可用集体座谈和领导干部针对其思想进行个别谈话的方法。同时必须遵照北局野政整风指示的办法：文化程度高而缺乏实际工作锻炼者，主要应着重到下层去进行实际工作；文化程度低者，主要采取上课教育的办法，特别着重于文化学习。

为什么我们目前整风对象的重点是放在地委与旅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呢？这不仅在于先“整己”而后才能“整人”的模范作用，而且最主要的是高级领导机关与高级领导干部对于工作指导的一言一行之错，特别是以其错误思想及方法来分析政治问题，决定重大的斗争策略，其影响所及，绝非一个普通同志所可比拟。如果我们在整风中，将整个党的领导干部的错误思想都纠正了，那么下层同志的错误思想是比较容易纠正的。为此，我们在目前的整风运动中，必须着重从高级领导机关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同时也只有这样的作法，才能使得我们的整风运动有了核心与模范作用，才能雷厉风行的推动整风运动前进，克服那些敷敷衍

衍，只整别人，不整自己的不正风气。

3． 整风运动的具体进行步骤及其方式与方法又应该怎样呢？

第一、整风运动的进行，必须注意敌后战争环境的特点，不能机械采取延安的方式来进行。必须注意将整风与战争结合起来，即是说在频繁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进行整风，一般是不易按步就班、很有规律的进行，主要善于利用与抓紧战争中和繁忙工作中的一切空隙来进行。

第二、整风运动的进行，必须注意与当前斗争的各种实际工作相结合，更要着重与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因为只有实际参加到这些斗争中去，才能将我们书本上理论的学习，取得实际工作的联系，充实其活生生的内容，并从实际工作中去检查与证实书本上理论的学习是否正确，和纠正许多三风不正的东西。今后领导机关对于实际工作的布置、检查和总结，都必须以整风的态度去进行，随时帮助同志如何把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在流动性很大的区域，可以采用学完一部分检查一部分工作的方法，以免时作时辍，长期停留不易前进的毛病。

第三、整风运动的进行，必须将自己所学的文件与自己的工作业务相结合，以便于将自己研究文件之所得，来检讨与审查自己所负担的工作的成绩与缺点，及其获得成绩与发生错误缺点的原因。

第四、整风的进度与要求，不在多，而在精，不在走马观花，而在追根究底，贯彻始终，对下面进行整风教育，要少用名词，注意通俗化。

第五、整风的反省笔记，必须注意其经常性的继续坚持下去，扼要的简略的记载，这对于我们整风进度的检查与对于自己思想的改进，都是很有帮助的。

第六、过去我们对于整党与审查干部的工作，一般是形式主义的专从组织上审查，所以收效甚微，为着更精确的审查与鉴定干部的品质，特别是县以上干部的审查与鉴定，必须依据整风的精神，主要从思想上来给予鉴定。

（肆）整风运动在不同地区的进度和时间上的要求：

第一、太行与太岳的高级干部，必须争取在今年以内，除了着重于学风部分的深刻研究与学习，并作出总结以外，对于党风与文风的学习，亦要利用时间加以必要的研究。在冀南则要求只完成学风这一部分的学习。

第二、太行与太岳的县一级的干部，除利用党校进行有计划的集体整风外，必须规定若干文件，利用工作空隙时间，努力学习并记笔记。在冀南县以下干部，则着重于上课、个人自修，工作小组与学习小组结合的方式去进行，认为平原不能整风学习是不对的。

第三、所有高级干部的整风与反省笔记，必须遵照北局野政的整风要求，每月交上级党委审查，或由上级党委抽调审阅。

（伍）为使整风运动形成一个热烈的浪潮，并使这一任务坚持与贯彻下去，在组织与领导上，必须将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结合起来，由各级党委与部队中的主要负责同志来担任这一工作的领导，不能将整风领导交给秘书或其他同志，并要把这一工作，当成一九四三年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将它经常提到自己工作的日程上来。

第五部分　加强一元化的领导和团结

加强全党团结，加强党的统一领导，这不仅是党的组织的铁的原则，更重要是我们处于

残酷游击战争的敌后环境，如果不特别强调党内团结与统一领导，是无法战胜强大敌人，渡过今天的困难，并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的。因此，中央一再指示我们要加强统一领导，加强全党团结，特别是去年中央十二月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更是特别强调了统一领导的问题。

过去本战略区的党，在执行中央统一领导与加强党内团结这一点上，无论地方组织与军队组织，政府中党团和群众团体中党团，纵然在组织与领导上基本是团结与统一的，但在统一与团结的精神上仍是不够的。这种统一与团结的精神不够，不仅表现在平常工作中之步伐不齐、互相埋怨、互相包办代替与牵掣；宗派主义与本位主义；新干部与老干部、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仍有不协调的现象，实质上是在影响与妨害我们党的加强团结与统一领导。即在这次大会发言中，亦可以看出以下问题，须得提出来弄清楚的：

第一个问题　是军队中党的组织与地方党在加强团结与加强一元化斗争中互相关系的问题

这两个系统组织的党，要求得在精神上的进一步团结与领导上的一元化，首先彼此应本着党与革命的团结互助的精神，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谅解。在地方党方面，必须强调爱护我们自己的军队。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这由于我们本战略区的正规武装，不是土生土长，一手由地方党经过残酷斗争而创造起来的，即是说现有本战略区的正规武装，名义上虽称晋冀豫的子弟兵，然而严格说来，这个武装与地方，实际还未建立起真正血肉不能分离的关系。因此，地方党的同志对于自己武装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对于自己军队的爱护也是不够的。关于这一点，必须要引起地方党的极大注意。在军队党的组织方面，由于一般领导干部比较强，经过革命的锻炼比较多，而且手中掌握了枪杆子，所以对于一切彼此关系问题的处理，都更要冷静沉着，不要感情用事（地方党也是一样）。所以，今后在地方党、政府、群众团体和人民中，要造成拥军风气；而在军队中，则应造成拥政爱民尊重地方党的风气。对于一些分歧问题解决的态度，不应以对立的立场来出现，要严格约束自己干部，不要听取片面之言，要反对地方党的同志随便乱说军队党的同志“简单”，或者军队党的同志随便乱说地方党的同志“讨厌麻烦”。其实是各自工作性质与各自工作对象不同，因而它的工作范围与工作作风，也无法要求完全是一样的。我们不应片面的看问题，如果从各自业务的全部工作范围讲，军事工作绝不是简单的。一些同志的随便说军队干部“简单”，或者军队干部说地方干部“迟缓”不懂得打仗等，都是带有片面性的不正确的意见。其次，军队组织与地方党组织，在对敌斗争上，尚未能完全统一，军队敌工部下面的一些敌伪组织与敌伪工作，和地方党的点线部工作与敌占区工作等，彼此分工不清，使得我们的敌伪工作发生混乱，削弱了我们的统一的对敌斗争力量。为此今后地方党与军队党对于对敌斗争，应切实统一与明确的分工；地方党成立敌占区工作部将点线工作等都归并于敌占区工作部，他的任务主要是开辟与建立敌占区工作。军队中敌工部和情报机关的下层组织，如敌工站、情报站等，主要归军队系统领导，属于军队政治工作范围，党的统一领导应经过政治机关去实现。地方党和军队政治机关的对敌斗争的各种委员会应该取消，但为着加强某些三角地带的共同对敌斗争，几个相邻地区的党部，是可以共同组织对敌斗争委员会的。

第二个问题　是党与群众团体的正确关系问题

前面已经说到，这里只说如何建立正确关系问题：

甲、在群众团体方面，应该依照党的全面工作来布置自己的工作，尊重党的领导，不能将群众工作与其他工作分离与孤立起来，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对于下级的领导，只能在党给

予党团的总方针之下去机动的建立群众团体自己的独立工作。绝不能因为强调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及其独立工作的建立，而提出了与党的方针相违反的工作方针。

乙、在党委方面，应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但应加强其领导。不能随便调动群众团体干部，特别是经过选举或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党对于群众团体的领导，只能经过群众团体的党团，不能随便包办代替，直接干涉群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克服群众团体中的党化作风。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建立党委与群众团体的关系。

其次，是群众团体本身，工农青妇和文化团体武委会等如何分工结合与配合，以及青救妇救与党委下面的青委妇委的关系问题，亦必须求得正确的解决。过去各群众团体互相争会员争领导的现象，是相当普遍存在的，现在这样的现象，虽然逐渐的减少了，但在目前，深入根据地群众工作及人民武装建设中，新的问题又发生出来了，群众团体的党团，以及党委下面的青妇委，都感觉党委只照顾全盘工作，给予青妇委以及整个群众团体的独立工作性不够，而工农青妇之间，也因各自强调自己独立工作的关系，而产生了不协调的现象，譬如加强农会工作，则有意无意的把青年妇女工作忽视了，青年妇女干部也认为既以农会为中心，似乎青妇工作就不好做了，因而消极不安，想改行做其他工作。这种不照顾全盘工作，互相埋怨、互相不满的不经常现象，是必须注意克服的。在民兵方面，有些同志误解中央精兵简政的政策，因而对于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也采取限制的政策，也是必须克服的。今后必须：

甲、在我们的认识上，应该了解群众团体的独立工作性，在整个党的全部工作中，有其一定的限度，党应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建立群众团体的独立工作，并不等于群众团体的党团向党闹独立性，也不等于群众团体可以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群众工作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此，党委领导下的整个群众工作，只是党委领导下的全盘工作的一部分，而青委与妇委，以及其领导下的青年和妇女工作，只是党委组织的一部分，只是群众工作中的一部分，如果各自强调自己的方面，各自都感觉自己的独立性不够，各自都唯我独尊，都要求他人来配合我，而我自己不去配合别人，这样发展的前途，一定要走到各自为政的互相对立与互相埋怨和不满。

乙、究竟在工农青妇和武委会与文化团体中，以谁为主体，或谁来配合谁呢？这一个问题的解答，要看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来决定。一般讲，农村中的群众工作，毫无疑义的是以农民工作为主要的，特别是刚在发动群众的初期，许多落后区域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先着手于农民群众的发动。在这一个阶段中，除了特殊情形者外，一般青年和妇女的工作，应放在配合的地位，不能单独强调自己的工作。但在先进区，即广大农民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的地区，应将青年妇女工作提到更高的地位，我们的农会就应很好的领导其全体会员来主动积极的援助和配合青年妇女工作的开展。工会工作也应按工作地区组织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工作重心，在工人多的区域，则应以工人斗争为主，取得其他群众团体的配合；在工人少的区域，则应从配合农民斗争中，来改善工人生活，加强工会工作。上面这样的划分，是指一般情形来讲的，绝不要了解成阶段论，譬如在以农会工作为中心时，发生了青年、妇女的斗争，此时则应以青救妇救为领导斗争的中心，农会则积极的声援与配合。人民武装尤其是民兵工作的开展，也是一样的，只要有我们工作基础的地方，都可以进行民兵建设的工作，以便于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保护群众利益，但要将民兵工作做得更好，更有广泛的基础，以及出于自愿和积极的，也只有在广大农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之后，才有可能。

第三个问题　是党与政权的统一领导问题

关于党与政权的关系问题，除了一部分下层党委（特别是区村）尚有包办代替政权工作，或个别政权工作同志还有不尊重党委领导的现象以外，一般在专区一级以上的党政关系是经常正确的。现在有碍于统一领导而须要提出来解决的，是政府的工商、粮食和银行等财经部门与党的组织关系，还须进一步的加以调整。这些部门的组织，自然都是政府重要组织部分，党对于这些部门的领导，应经过政府的党团和这些部门的监察委员（党代表），在这些部门中，可以成立机关支部，这种机关支部的任务，主要是教育党员与保证这些部门的行政任务的完成，它不应在这些部分的分局、分行和分站中去形成独立的垂直领导系统，各地的分局、分行和分站中党的工作，应由该分局、分行、分站所在地的党部经过监委会领导，监委一般可参加当地党委，以便于更好监督与检查他们的工作，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党与政府的领导分开，才不致于形成双重领导，或者受政府领导，又不受政府领导，受党领导，又不受党领导的怪现象，使得这些组织抓着这种空隙实行两面应付，甚至可能发生两面欺骗蒙蔽的行为。此外，政府的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也应力求统一，一般应将经济区划服从或附属于行政区划，不能把他对立起来，妨碍了政府统一的行政领导。

以上三个问题，主要是讲的党政军民互相关系于一元化的问题，而且特别侧重于互相间一些具体关系问题的解决。关于一元化的其他问题，已经在前三个报告中说得很多了，故不再重复。要把一元化的领导做得更好，单从组织上来解决问题是不够的，要不要条例是无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弄清我们对一元化的认识。我们有些同志对一元化的认识还不够，狭隘的宗派主义、本位主义，把党务工作看成是党的全部工作，党务工作高于其他党的工作等倾向，还是严重存在的。其次，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无论是军队的或地方的，真正文武双全的很少，这些同志虽然思想意识很好，谁也很愿意照顾全面，能从大处着眼，然而有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些都是形成真正一元化领导的困难。

我们要把一元化领导真正做好，必须首先在我们思想意识上，要有对于一元化的进一步的认识，要有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利己主义的精神，要有照顾全面的眼光和为着整个党的利益打算的观念。我们担负一元化领导的同志，必须加强自我学习，提高自己的全面工作的能力。军队干部担任领导的同志，必须加强自己对于地方党、群众工作、政权和财经问题等学问的学习，以便加强自己的全面的领导能力。同样，地方干部担任领导的同志，也必须加强军事知识的学习，以便增加自己处理军事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一元化的领导，由组织的统一，进到思想上的统一，达到我们形式与实质都是一元化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统一领导更有力量。

第四个问题　是关于党内民主的问题

在这次大会发言中，有的同志提到在群众工作中应是无条件的民主，以及在党内感觉民主不够，不能很好的商讨问题，因此提出了“领导武装的党更要民主一些”的意见。所谓无条件民主的问题，显然是超越现实的空想，此处不说，只谈一个党内民主的问题。我们党内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绝不是离开了集中的所谓一般无条件的民主。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领导原则。民主与集中是不能单独强调一面或把他分开和孤立起来看的。我们党内的所以要民主，正是为着意志的集中和组织的集中。如果只有民主而没有集中，那就使党变成无组织、无战斗力的一盘散沙。相反的，如果只有集中而无民主，那就不是民主集中，而是个人或少数人的独裁与垄断，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不会发挥起来，党的意志也不会统一起来。过去本区党内民主一般是不够的，应该提高，但我们党内的民主，

是有一定限度的，即是说我们的每一个问题在未决定之前，以及各级领导机关，在未组成与选出之前，或者我们对于上级领导机关有不同的意见与批评，大家都在一定的组织原则之下，事先有充分民主的发言权选举权，和一切建议与批评的权利。但问题一经决定，领导机关一经选出，或上级领导机关对于下级党或个人所提意见与批评，有了正式答复时，即不管自己同意与不同意，均须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与领导原则，我们绝不能因为多数或上级不同意我的意见，而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认为党内无民主或民主不够，或在背后进行小广播，或对于上级进行无原则、无分寸、不经过任何组织系统而任意在下层诋毁批评领导机关，这是对于民主的错误认识，这不是民主，而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倾向，这样的小广播与批评，不但不懂得党内民主，容易损害领导机关的威信，而且对于自己，也无一点好处。

至于所谓“宁使军队更民主些不要使地方党更不民主些”的意见，也是不妥当的。如果说军队干部领导地方党时，注意地方党的民主问题，当然是对的，但不能把军队的集中与党的集中，军队中的民主与党内的民主混淆起来。党是民主集中的组织，无论地方与军队都是一样，但党内民主视条件不同而有其伸缩性，地方党的民主一般是比较广泛些，军队则不然，他完全是由上而下的集中组织，因而军队党的民主是有限度的，否则即会损毁与减弱军队的战斗力。地方党与军队党，因其性质不同，所以在领导作风上也是两样的，拿领导地方党那一套作风去领导军队，自然是不适合的，反之，如果拿指挥军队作战的那一套领导方式来领导地方党，自然也同样是不适合的。这里应该注意的问题，不是削弱军队的集中来增强地方党的民主，也不是要将地方党变成军队那样集中，这都是不可能与不应该的。无论地方党同志对于军队的领导，或军队组织的同志对于地方工作的领导，都必须采取适合于军队、或适合于地方工作的领导方式，绝不能采取同样的方式去领导不同的工作。至于如何运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建文件中都说得很清楚，此地不说了。

第五个问题　是关于在一元化领导下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首先，即是为着上下级的一元化都做的更好一些，上级党委的一切工作意见的决定，最好能取得同级军政民等的了解与一致后，才往下传达和执行，否则上级意见不统一，将各人一套不同的办法与决定指示下去，将使下面无所适从，也损害了领导的威信。

其次，为着加强党政军民一元化的领导，党委在处理问题时，不能只听片面的意见，必须要大公无私的，很客观冷静的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大家意见的一致，以加强一元化的领导。

再次，所谓领导，并不等于事无巨细的管理一切、指挥一切。我们一些高级领导机关的领导责任，不能太具体的规定下级党委的工作，因为这样太刻板的具体规定，有时是会束缚下级党委在执行时的机动性的。因此，上级党委对于下级党委领导的责任，主要是提供一定的工作方针、原则和执行的办法，使下级党委有一定的机动余地（机动并不等于无原则或者甚至于不执行），同时下级必须坚决执行上级党委所提出的工作原则与工作方针。

再次，我们地方党的工作作风，必须力求战斗化。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联系着我们争取时间因素的。今年是我们接近胜利的一年，我们不仅要准备反攻，而且还要准备战后，我们的工作任务是繁重的，然而我们的工作时间是很短促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作风上，不能以牛车的速度来处理问题，准备我们的反攻和战后，而必须要采取战斗化的作风，改善很多地方“习惯”的迟缓作风，特别是开会方式的改善，以努力争取宝贵的时间，迅速的准

备我们的一切。

再次，在加强我们一元化领导上，必须足够估计我们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及其思想意识在党内影响与作用。因为某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不仅爱在党内闹无原则的纠纷，产生各式各样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夸大自己、看不起别人、喜欢反对上级、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要求党内无条件的民主、在工作顺利开展时，易于发生左的思想，在工作困难和环境严重时，又易走到悲观失望的途径等等。我们在领导上，都必须给以足够的估计与认识，切不要为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所包围，所蒙蔽、所威胁、所屈服，必须要站在党的坚定立场来给以教育、斗争和克服。

最后，为着完成以上繁重任务，加强同级、上下级党委的团结，加强新老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团结，加强军队组织与地方组织的团结，克服一切互相埋怨、互相轻视的现象，以及防止敌伪顽固分子对我们团结的挑拨破坏等，都是十分必要的。总之，敌后目前残酷斗争的任务，战后繁重工作的准备，都要求我们将全党团结的象钢铁一样，站在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面，为渡过目前困难，及加紧战后准备而斗争。

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五年余以来，我们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与敌伪作艰苦的斗争，克服了无数的困难，获得了辉煌的成绩，主要是依靠着八路军新四军与广大的人民，而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妇女工作是有成绩的。可是由于我们在妇女工作中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充分的群众观点，缺乏深入下层、埋头苦干、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没有深刻认识经济建设对于坚持抗战、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没有把经济工作看作为妇女最适宜的工作，没有把握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没有切实调查研究妇女的具体情况，不深知她们的情绪，不顾及她们家务的牵累、生理的限制与生活的困难，不考虑当时当地的妇女能做什么、必需做什么，就根据主观的意图去提出妇女运动的口号，规定计划，成立团体，要妇女经常出来开会，对她们作不必要的动员，浪费她们一些人力物力，致使工作一般化，组织形式化，缺乏真实的群众基础。这种脱离妇女群众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倾向，是使妇女工作停滞不能更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原因。

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

为实现上述的方针，各地妇女的工作作风、方式、方法，须有彻底的转变。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妇女群众的生活、需要、情绪，顾及主观能力与客观条件，选择中心地区开展工作，逐渐影响临近地区，以至于推动全局。因此：（一）各地妇委妇救要以研究组织农村妇女个体与集体的生产为首要工作，深入村庄，教育帮助与解决农村妇女参加生产战线中的困难，农村妇女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妇女工作的尺度；（二）农村妇女能纺织、能养蚕、能种地、能煮饭、能喂猪、能理家……应按照各地具体情形来作计划，但她们的生产计划，一定要和她们家庭的生产计划结合起来，不可能妇女孤立的去做，不要重复过去某些地区只从形式上、数字上标榜妇女开了多少荒、建立妇女林等没有实际内容的缺点，要动员妇女实实在在参加到广大群众的生产中去；（三）根据妇女群众的需要进行组织，纠正过去有名无实的组织方式，以生产合作及各种生产方式（如纺织小组等）去组织她们，这些组

织应该成为妇救或妇联的基本组织，而不是办一些有名无实的空团体、空机关；（四）尽量减少对农村妇女不必要的动员，减少开会，爱惜她们的人力物力，使她们有更大力量从事生产；（五）妨碍身体健康致影响生产的，如小脚及不注意卫生等，应当鼓励妇女改革之；（六）对于妇女文化的政治的教育，应通过生产方式去进行，如提高生产技术，认识有关生产的文字，编制在生产时歌唱的小调等；（七）妇女干部要消除轻视经济、生产工作的错误观点，必须了解生产不仅是各根据地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而且妇女工作者要密切与巩固和农村群众的联系，只有从深入农村中去组织妇女生产、解决其生产困难、增加其经济利益着手。要做到此点，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公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公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今年纪念"三八"节的方针，就是动员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工作，各地应按具体情形规定详细办法。

（原载1943年2月26日《解放日报》）

中央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北方局转晋东南党委：

党委工委报告，已收到，内容很好。希望今后根据中央调查研究决定，深入调查各种具体情况，经常报告，以便向你们提供意见。在报告中证明职工会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并向深入工作方面发展：但另一方面，尚有许多弱点，主要表现在对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特点（战争，农村，新民主主义政权）认识不足，因而对劳动政策了解不深刻，工作缺乏中心和经常性，党政军民关系有些不正常，所以职工会工作还不够深入巩固。望工委考虑下列意见，改进职工会工作：

一 关于工资问题

敌占区高于我区的工资额，是因为敌占点线平原交通便利，工业品来源较易，而某些农产品价格则较我区高，因此一般生活水准亦较我区高。我区经济落后，且不断受敌破坏掠夺封锁。因而，相对的名义工资必然高于我区，此种现象，敌我形势未根本改变前是很难彻底转变的，就在平常状态农村工资也低于城市工资的，因此，我们不能采取提高工资与敌竞争劳动力的政策。在我工作不深入，党政军关系不正常，敌人高价吸收工人下，部分劳动力的外流是必然会发生的。我们只有深入群众工作，团结职工，提高政治教育，适当改善工人生活与社会地位，改善党政军民关系，从政治上来对抗敌人的奴役政策与引诱政策。

由于战时的破坏，根据地生产缩小，而需要则增加，因此在根据地内把战前生活与现在比较作为改善工人生活标准是不妥当的。目前改善工人生活，只能依据战争环境及各地生产及生活水准之不同，来规定工资。农村成年工人，一般以维持本人生活外，还能养活一个人为原则。因此规定各地同等的工资是不可能的。

公营工厂工人工资如果把各种优待价值算入工资之内，则实际工资并不比农村工人低得多少。至于某些公营工厂工资稍低于农村工人工资的原因，是由于公营工厂的生产主要不是为了营业获利，而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加上抗战经费的困难，在长期战争环境中，此种现象是很难免的。因此，职工在军事工业及公营工厂中工作，是一种抗战义务性的光荣劳动，党的支部和工会应在这一方面作深入的解释工作，加强政治教育，提高职工政治认识与技能，改善其社会地位，协同党政军改进工厂管理方法，发扬民主，调剂职工关系，在可能范围内改善物质生活，来团结职工安定工人生活。减少工资问题的纠纷，最好采用物品本位的工资

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仍以计件制为宜。

二　农村劳资关系问题

农村雇主不愿雇用工会积极分子，多找小山沟出来的落后农民，或少年工人的现象，除某些雇主抱有恐惧工人斗争心理之外，同时由于工会会员中积极分子，各种会议活动时间过多，耽误生产，甚至恃势凌人，要求过高，此种现象若不改正，不仅雇主不雇工会会员及积极分子，而且将降低农村生产，妨害工人团结，养成工人惰性，造成工人失业，工会脱离群众等危险。雇工积极分子所提出的“多种，早锄，多收好抗日”的口号及生产互助小组，应广泛宣传与实行，才能发展生产，改善工人生活，协调劳资关系。对于企图利用我们政策的改正，而向工人进攻的雇主（如多分配雇工负担等）应根据具体事实，进行调解，必要时请求政府仲裁。总之，我们必须从劳资双方均能获益为原则，去适当改善工人生活，照顾各阶层利益的观点出发，坚决克服狭隘的行会利益的思想。

三　关于工时问题

一切公私工厂作坊必须依据中央的指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至于雇工手艺工人亦只能按原来的生产习惯，酌量减少一二小时，工会开会及开短期训练班，应于例假休息时间举行，不能占用生产时间，还须遵守劳动纪律，及劳动合同，以便发展生产，维持劳资双方友好关系，保障团结抗战。

四　职工负担与支差问题

应执行政府各阶级公平负担的政策，但因职工没有副产，其免征点可以在保证维持职工生活条件下，可提交当地参议会讨论，以减轻某些生活特别困难之职工的负担。因雇工劳动既已出卖给雇主，其支差应属于雇主方面，但战争动员，则一切职工，应一律执行。

五　职工会的组织形式

主观的把产业城市的组织形式机械的搬到农村来，如你们在地方总工会下成立各业总工会（生产的、矿工的），一县之内成立矿工工会，产业工会，直属各业总工会的领导，当然是不适当的（至于某些县分矿工集中较多者则仍可成立矿工产业工会）。因为地区辽阔多山的农村中，工人稀少已不易领导，再加上组织上的分离，不管在组织上深入工作上，都是不利的。农村中的零散矿工与雇工羊工，应统一于县工会之内，直属于总工会领导，否则不仅浪费人力金钱，而且会使工会成为形式主义，脱离实际，障碍深入工作。工委应提交各业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向群众解释清楚，改变上述组织形式，把工作交由总工会执行，各业干部则参加总工会的领导。

至于按行政系统组织的产业联合组织（如后勤军工行署等），为适合党政工的配合，仍可以保存，直属总工会，此种组织的改变，不是削弱产业工人工作，而是加强总工会对产业

工会矿工工会的领导。

六　职工会的主要工作任务

职工会应以提高劳动热忱，严守劳动纪律，提高职工技术，保证生产，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党政工会必须协同进行政治、文化、技术教育，根据工人的具体特点，决定这三种教育的分量，使生产与学习适当地配合起来，以安定和提高工人的生产情绪。

工会教育工作，及日常活动应注意时间的节制与工人兴趣，除工厂煤矿，必须单独进行工作外，一般应集中于村镇：民革室民众学校及各救共同活动，调剂各救关系，纠正借口在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口号之下，工会工作突出和骄傲现象，工会会议至多一月举行一次，内容着重抗战工作，劳动政策的检讨，鼓励学习发展生产，教育的中心则以学习技术识字为主。

工人武装组织，均应集中于武委会领导。工会应积极参加武委会工作，工会内不应单独成立武装部及单独之部队。

工会工作应尽量发挥民主，在组织与领导上，必须反对共产党员包办的现象。在各级工会领导机关，应实行共产党员与一般工人之比例只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尽量吸收不脱离生产的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各级领导机关，使群众与领导机关的联系更加密切。

为实行精兵简政方针，节省人力物力，工会应尽量培养不脱离生产的干部，向减少职业干部方向发展，职业干部应以少而精为原则。

严格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学习内容，政治方面以党的政策、政府法令，职运历史策略及实际调查的研究为中心。日常教育应以提高生产技术及文化水平与科学知识为主。一般干部训练，工会不必单独办训练班，必要时可在党校及其它学校设立职干班，其教育内容，亦应以上列科目为原则。

某些工会组织与军政民关系不甚融洽的现象，工会应自主地力求改善，克服狭隘的偏见，凡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可会商召集适当的联席会议解决之，这是今天晋东南职工会急待解决的问题。

（原载1942年5月1日《解放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的是统一的，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争的局面，配合了全国的抗战。然而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由于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实际上是党政军民系统中党员干部的关系），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等。这些不协调的现象，妨害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妨害我党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加以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据点的增强，上下级联系的困难，抗战的地方性与游击性的增大，要求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军区、分区）活动的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的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为此目的，中央特作如下之决定：

（1）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党政军委员会的设立，在根据地创立时期是必要的正确的）。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但不是联席会议），因此它的成分，必须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党委之常委亦应包括党务、政府及军队三方面的负责干部），而不应全部或绝大多数委员都是党务工作者。各级党委的工作应当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

（2）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系统与上下级隶属关系仍旧存在。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法令，上级军事领导的命令、训令，上级民众团体的决定（以上文件之重要者必须经过各该机关党员负责人交同级党委批准，或事先商

得党委负责人同意，然后颁发，但不是一切都要批准），不仅下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须无条件执行，不得假借无上级党委指示而违抗或搁置。下级党委对上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之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报告上级党委。在遵照各组织上级的决议解决具体问题而党委内部发生争论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解决之。政府、军队、民众团体负责人即使不同意多数意见，亦必须执行同级党委的决定，但可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上级有关机关。

（3）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之。区党委、地委，由军队与地方的党组织的统一的代表大会选出，经上级批准之。区党委、地委，应包含地方党的组织，军队党的干部与政府党团的负责人。主力军是否参加县委，由各地按具体情况决定之。县委（无主力军参加之县委）及区委，只包含地方党、地方军及政府的党的负责人。各级党委书记，应选择能掌握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的同志担任之。因此，党委书记不仅须懂得党务，还必须懂得战争和政权工作。区党委书记人选，由中央局分局议定，经中央批准之，地委书记人选，由区党委议定，经分局中央局批准之。为统一地方党与军队党的领导，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区、分区（师或旅）政委，另设副书记，管理党务工作。如军区、分区政委被选为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则可设副政委，专管军队工作。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应照顾各方面工作，除兼政委外，再不宜兼任其他具体工作。如有个别特殊情况党委书记不必兼政委或政委不必兼党委书记时，须得上级党委或中央批准。军队中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成为同级党委（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的一个部门，与其他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平等权利和义务，不隶属其他部门或委员会，但与其他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不同，仍保持其上下级直接领导和隶属关系。军事政策（如扩兵建军原则、政治工作等等）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如反扫荡的战略战役计划及总结等），须交党委会讨论，但具体军事行动由司令员政治委员（即党委书记）决定之（司令员与政委对军事行动之最后决定权依照政治工作条例），无限制的民主讨论只会引导军事行动的失败。军队主要人员的任免，仍须经过军事机关依照已定规则进行之。

（4）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主力军应以巩固和坚持各所在根据地为其第一等任务。主力军固有全国性，但同时具有地方性。过去有些根据地领导不统一，主要的是由于该地主力军某些领导同志对于该根据地之建立与坚持缺乏正确的统一的认识，因而其所实行的某些政策（如军事建设中之地方武装问题，扩兵问题，财政经济政策问题中之统筹统支等）只注意了主力军，而忽视了根据地整个工作的配合，因而与地方党地方政府发生争执。同时有些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对于一切服从战争的认识不深刻，对主力军之人员补充，粮食及物质保证，优抗及反逃亡斗争，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因而使军队与地方党政间的关系不协调。今后为了实现根据地领导一元化，除实现以党委为各地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外，还必须纠正某些地方主力军，某些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人思想上政策上的一些错误。实行中央关于根据地的各种政策，实行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几号指示。今后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对于驻扎所在地的下级党委与下级政府（如县、区、乡）的决定，亦必须执行。如有不同意处，可报告上级党委与上级政府。并应当经常的彼此联系，彼此帮助。主力军的军事措施，如军事行动、布置及戒严令等等，地方党政民机关必须遵照实行。主力军应当负有保护党政民机关的责任，凡因军队之疏忽与漠不关心因而使党政民机关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时，军队负责人应当受到处分。今后，如有争执，首先应当就地协同解决，并将争论及解决经过报告上级，反对各个组织只是向上告状，而不在本地当面商

谈解决问题的办法。

（5）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党委与政权系统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下级党委无权改变或不执行上级参议会及政府的决定与法令，党的机关及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党应进行政治工作以提高参议会及政府的威信，党的干部与党员违反参议会及政府法令时，党的组织应给以严厉的处分。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党团必须服从同级党委；但党团的工作作风必须刷新，不是强制党外人士服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说服与政治工作。在党团万一没有说服参议会及政府的大多数因而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假如党团同志因为自己的意见与同级党委有分歧因而不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这是党团同志违反党纪行为，应当受到指斥与处分。党必须派遣得力的干部到参议会及政府中工作，一切忽视政权工作，把干部堆在党的机关中的现象，必须纠正。在实行三三制时，党员在政权系统中的数量减少，但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质量必须大大提高。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服从党委与党团的决议、决定与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在这里，应特别提出，党对三三制政权之领导的实现，有赖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之言论行动的一致及其对党的决定的绝对服从，所以严整政权系统中党员及党员干部的党纪是有严重意义的。党委在调动政权系统中的党员时要慎重，还必须经过党员实行向政权机关辞职的手续。政府军队的关系必须改善，军队中应进行拥护政府的教育；政府应保证军队的给养及运输，军队的首长应被选为政府委员及参议员。军队应成为尊重政权执行法令的模范，军人的违法行动，军事机关必须严格处分。军人除以公民及政府委员、参议员资格对参议会及政府发表意见外，一切军人及军事机关无权干涉参议会及政府的内部工作。但军队政治机关，必须尽可能的帮助政府工作。

（6）民众团体是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委员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民众团体中的党团问题与政府中党团同。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请求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如民众团体违反政府法令时，政府可加以处分，甚至解散，此外一律不干涉民众团体的生活与工作。民众团体应号召民众，拥护政府和军队，帮助抗战动员工作。但民众团体并非政权机关，不得代替政府行政及对人民执行逮捕、审讯、判决等事宜。军队与民众团体应相互帮助，但不应相互干涉。

（7）在游击区，因为它的特殊性，领导的一元化不仅是在相互关系上应有所确定，而且在党政军民的机构上在必要时亦须一元化。党委、政府、民众团体的机关，可与军队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合并，党政民干部在军队或游击队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如正副军事指挥员、政委及政治部各种工作），战时参加军队与游击队工作，战斗空隙时则仍执行其原来的党政民的职务（如党委书记、县长、工会主席）。

（8）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

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凡带地方性质的不违反上级及中央决定的不在此例）。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之决议、决定、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其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级和中央请示，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

在这里，应当再一次的提醒各根据地党政军民领导同志的注意，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各级领导同志的文章应经过同级党委或党团适当人员的审阅。分局委员以上、师以上负责人的文章，凡带有全国及全党意义的，应事先将主要内容报告或电告中央。各地不应再直接对外广播，应统一于延安新华社。应当深刻认识，一个党的负责高级干部，不经过同级或上级一定组织的同意，而擅自发表政见，是何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何等妨碍党的统一的恶劣行为！

（9）为统一根据地的领导，为改进党政军民关系，必须在党政军民各系统党员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整顿三风，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在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央决定与毛泽东同志报告，教育干部识大体，顾大局，号召干部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干部懂得全局，不陷于局部和本位的偏向，而懂得全体与局部、上级与下级、这一局部与那一局部间的正确关系。要加强党政军民各组织中的教育工作，使全体同志认识领导一元化及根据地革命秩序与革命法令的重要性。在这里，应特别警惕军队干部：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在一般情况之下，军队干部应负较大的责任，军队手中有枪，容易独断独行，轻视党政，不守纪律，自由行动，破坏群众利益。因此，军队中军政干部必须特别约束部下，检点自己。必须号召自己的部下，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政府，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与政府的法令。同时，又应纠正某些党员和干部中的不合事实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党委及党的机关中工作才叫党的工作，其实一切党员和党的干部不管其执行的是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是党的工作，在党的机关中的工作，只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务工作）。党员服从党的领导，是服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某些党员空喊或曲解服从党的领导，而对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则不认真研究，不认真执行，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10）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要在全党中说明，假若军队削弱，假若战争失败，则根据地无法存在，党政军民都会塌台。因此，党委、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体人民，都有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义务。军队的人员补充，粮食、服装、弹药的供给与运输，营舍的让予，伤病残废人员的输送、看护与保养，抗日军人家属的优待等等，党委及政府、民众团体，都有随时加以解决的责任，一切漠不关心的现象，都是极端错误的有害的。在军队本身，则应深深了解：没有党、政府、民众团体的配合，光杆军队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战的。因此，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教育，做到能爱惜根据地，爱惜人力物力，尊重党政，加强军纪，给党政民以必要的帮助。军队的人员与物质补充、运输、优抗等等，必须依照政府法令、规章去做；乱来一顿，只会损害抗战，于军队本身也是不利的。

（11）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决定的原则，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与此有关的各种细则，以政府法令、军队条例、党团规则、民众团体章程等等方式规定之，以解决统一领导的许多具体问题。制定后须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

各抗日根据地发布的施政纲领或其他文件，曾宣布：对敌人、汉奸及其他一切破坏分子等，在被俘被捕后，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予以自新之路。这里是提示了镇压与宽大两个政策，并非片面地只有一个宽大政策。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是除外于宽大政策的，这就是镇压政策。这样同时提示的两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实行的。但各地有些同志只作片面的了解，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对于一切破坏民族利益的分子，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凡属破坏抗日政府、抗日军队、抗日人民、抗日政党的利益者，都是破坏民族利益的分子，对于此类破坏分子如不采取坚决镇压政策，即无异帮助敌人。对于此类分子采取放任态度，并谬托于宽大政策，是完全不正确的，是脱离群众的。凡在此类分子的行为上已经证明是坚决破坏民族利益者，即应依法严惩。绝对不应放任。只有那些真正表示悔改者，才应采取宽大政策。而对于一切曾有破坏行为，但是真正表示改悔、确有证据者，我们则必须采取宽大政策。在实施时，又必须区别首要分子与协从分子。在首要分子中，真心表示改悔者也是可能的，也是有过的。但在胁从分子中，真心表示改悔的可能性最大，过去经验证明也最多。根据此种情形，我们在惩治破坏分子时，主要的应是惩治那些首要分子，其次才是惩治那些胁从分子。同时，我们的宽大政策，主要的是施于胁从分子，其次才是施于首要分子。总之，以表示真心改悔与否为决定政策的标准。

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应根据本件作明确正当的解释，并根据此种解释去实事求是地、有分别地实行镇压政策与宽大政策。而镇压与宽大是必须同时注意，不可缺一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

一、拥护军队是边区人民与政府应尽的责任

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武装，是本质上最好的军队，有高度的政治认识与战斗能力，有优良的作风与传统。

八路军不仅坚持了华北抗战，在全国抗战中起了支柱作用，而陕甘宁边区的保卫，人民民主民生利益的保护，亦全赖有八路军之镇守。

近年来边区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八路军的生产自给，曾大大的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今年军队自给平均每人至三千五百元之多），既能打仗，又能生产，更是难得可贵的军队。

总之，八路军是值得政府和人民拥护的军队；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与义务。

二、过去拥军工作有严重的缺点

过去政府与人民对于拥军虽做了些工作，也有一些成绩，但还存在着不少的甚至是严重的缺点：

（一）由于数年来边区处在比较和平的环境，在一部分人民和政府人员中间，存在着与滋长着忽视拥军的观念，忘记了一切服从革命战争的原则，甚至把爱护人民利益与爱护军队对立起来，这是极端错误的。

（二）在近年边区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中，一部分人员往往只了解与照顾本身的困难，而不甚了解与照顾军队的困难，不关心或不积极帮助军队解决困难，如对于粮草的供给与运输，担架的输送，生产的帮助等，采取被动的应付的态度；当军政或军民关系发生缺点或误会时，某些政府人员没有首先检查本身，批评与责备自己，并向人民作积极的解释；反而采取观望态度，或推脱责任，有时甚至夸大军队的缺点，埋怨军队，而把自己率领人民帮助军队的责任忘记了。

（三）对于优待抗属做的很不够，特别严重的是“重工轻抗”，优工比优抗好；此外还有“人在情在”“近比远好”“在比亡好”的现象；而对于抗属离婚问题，也有处理不适当的。这些严重缺点，大大的妨碍了军队的巩固工作。

（四）对于潜逃战士没有积极的帮助归队，而采取旁观态度，甚至有把潜逃战士留在地方工作或为之包庇的。

三、必须积极改善和加强拥军工作

（一）要使干部认识，拥军的意义和重要性，要通过干部向群众作广泛深入的解释，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保卫边区保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如果没有八路军就没有边区，人民利益也无法保障；各级政府和人民必须把爱护与帮助军队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经常注意尽到自己的责任。把那种爱护人民利益与爱护军队对立的观点，与对军队的困难漠不关心，有问题不当面提出协商解决、只是埋怨的自由主义态度，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都应该彻底的改正。

（二）关于粮草的供给与运输，政府应领导人民积极的主动的提出适当办法，竭力给军队以帮助。

（三）对于军队生产中的困难，政府须帮助其解决。

（四）军队遇有换防调动，各级政府应发动群众欢送欢迎，慰劳慰问；又须于每年阴历年节前后对驻军举行隆重慰劳慰问一次。

（五）要根据新订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具体检查各地优抗工作，把各地抗属调查清楚，根据具体情形采取代耕包耕救济等办法，保证抗属生活不低于一般群众生活水平。应在优抗工作上做到贫先于富，远近一样，亡存一样，尤其要把优工比优抗好的现象倒转过来。反对对优抗工作上的任何忽视现象，同时要注意教育组织和帮助抗属积极参加生产，奖励生产中的模范抗属。

（六）各级政府应把帮助归队工作当作自己的任务，应彻底执行“陕甘宁边区动员潜逃及逾假不归战士归队办法”。

（七）军政军民关系上发生纠纷时，政府负责人应以“厚责于己而薄责于人”的态度协同军队负责人就地解决，解决不了的呈报上级解决之。

（八）各级政府应将本决定和留守兵团司令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及最近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新订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关于动员潜逃及逾假不归战士归队办法、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条例、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办法，配合起来作详细具体的讨论，并请军队派人参加，切实检查当地的拥军工作，总结经验，纠正缺点，以进一步增强军政民的团结。

（九）拟定今年二月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具体办法同留守兵团政治部商办之。

（十）各级政府应将拥军工作看成经常重要的工作，给以定期的切实的检查，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对此工作漠不关心毫无成绩者，应给批评，指责和惩罚。

（原载1943年1月16日《解放日报》）

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边区政府，是边区人民和边区部队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它的一切措施，均是为了人民、为了抗战利益的，所以它是一个模范的民主政府。在边区物质极困难的情况下，边区政府领导人民积极生产，征收救国公粮，帮助军队解决粮食被服困难，支持前方抗战。边区部队之所以能够发展与巩固，是有赖于边区政府的扶植和领导的。

边区人民，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他们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生产，缴纳救国公粮，为军队、为抗战，尽了应有的力量。边区军队与边区人民，象鱼和水一样，是分不开的，军队脱离了人民，就无法打胜仗，无法存在。边区部队之所以能够存在与发展，就是有赖于边区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边区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边区人民是很好的人民，这样的政府与人民，我们军队应该拥护它，保卫它，爱护它。拥护政府，拥护人民，是我们革命军队的责任，是响应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具体表现。

过去五年来，边区部队对于拥政爱民的工作，一般的是做得有些成绩，军队和政府人民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完成了保卫边区的任务。但是由于边区遭受着严重的经济封锁，物质条件异常困难，以及军队本身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因而造成了军政民关系某些不融洽的现象，军队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在部队中，存在着与生长着忽视拥政爱民的观念，忘记了过去红军的优良传统，把军队与政府人民有时对立起来，某些人员存在着军阀主义的残余思想，把军队看成为高于政府和人民，丧失了革命军队的品质，于是违犯政府法令，自高自大，不尊重政府，侵犯群众利益、违犯群众纪律等行为，时有发生。这些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相当严重。各级军事政治机关，必须深自检讨，彻底纠正。必须提高全军爱护根据地、建设根据地、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认识，使党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为此目的，各级军政机关必须执行如下决定：

（一）必须使全体指战员认识拥政爱民的重要意义，军队应该坚决执行政府法令。边区部队与边区人民是血肉相关不可分离的，军队离开人民就无法存在。在部队中，须加强政策法令的教育，对于政府的各种法令，通过干部向战士进行深入的解释，务使每个指战员不仅懂得各种法令的内容，而且要认真执行，对于过去不尊重政府，只顾自己，不顾政府法令，不顾群众利益的思想与行为，必须予以彻底纠正。

（二）军队须尊重各级政府机关，对于政府负责人，应以本部队首长同样看待，不得轻视与污辱。军队无权逮捕政府人员与人民。

（三）军队有保护政府的责任，在边境地区发生敌情匪情时，必须即时通知当地党政民机关。如地方机关受敌人或土匪袭击或包围时，当地驻军应机动的派队援救。政府机关派人去边境区工作或运送重要财物时，驻军应派遣必要的武装掩护或护送，使之安全的顺利的完成任务。

（四）军队有帮助政府之责，政府的各种困难，军队应竭力设法解决。军队应积极参加生产，解决粮食被服及日常需要，以减轻政府与人民的负担。对于政府的各种号召及动员，如春耕、秋收、冬学、建立民兵等，军队应协助政府机关，对人民进行深入的解释，帮助其工作的顺利完成。

（五）军队与人民须建立密切关系，爱护人民，尊重群众的人权财权，不得侵犯人民一针一线的利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必须了解与尊重民情风格，举行与人民送节礼祝寿拜年与婚丧等应酬，以建立与人民的良好感情。

（六）军队须帮助人民的春耕夏耘秋收，首先应帮助抗属，不得索取任何报酬。

（七）严整部队纪律，加强部队纪律教育，使全体指战员自觉的遵守群众纪律。部队行动时，应加强纪律检查，借物送还，损坏的东西要赔偿，驻地打扫干净。部队生产时，应严守“生产运动中应守规则”，“公营商店守则”。进行归队运动时，应遵守“动员潜逃战士及逾期不归战士归队办法”。部队调动时，应与当地党政民机关开联席会议，检讨军政民关系，虚心听取地方机关及人民的意见。对于部队中违犯纪律的人员，必须批评与斗争，严重的必须予以应有的纪律制裁。

（八）各部队，尤其是政治机关，应有计划的帮助地方学校教育、民众教育、民兵建设等工作。每一个指战员均应有向人民宣传的责任，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与政治觉悟。

（九）各部队卫生机关，应尽可能替人民医治疾病，首先应替抗属治病，不收医药费，并对人民进行卫生宣传，利用各种方式，向人民讲解浅显而通俗的卫生常识。

（十）军政军民关系上发生纠纷时，军队方面应负主要责任。以诚恳坦白的态度协同地方机关就地解决之；横蛮无理是不对的。如解决不了，则须呈报上级解决。即使该纠纷系地方机关或人民不对，军队方面应以和蔼谦逊态度向其解释。

（十一）各部队应将本决定与边区政府“关于拥军运动的决定”，及最近边府颁布之“调整军民关系维护革命”、“边区军民诉讼条例”、“抗属离婚处理办法”，“抗日军人抚恤条例”、“动员潜逃战士及逾假不归战士归队办法”，“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办法”等各种条例，配合起来，向指战员进行教育，切实的与本部队过去违犯政策法令、侵犯人民利益的具体事实联系起来。

（十二）拟定今年二月为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具体工作另有指示），以掀起部队拥政爱民的热潮，推动今后拥政爱民工作的开展。

（原载1943年2月1日《解放日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一）秋收已到，各根据地须责成各级党政检查减租政策实行情形。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党部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及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选出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在报上发表社论及减租运动的模范消息。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与政府的法令是领导与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自动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在减租斗争中产生农民团体，或改造农民团体。政府应站在执行减租法令及调节东佃利益的立场上。现在根据地已缩小，我党在根据地上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共生死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二）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军群众与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党部、政府及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有关明年全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及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苏区称耕田队或互助社），吴满有运动（农业劳动英雄），赵占魁运动（工业劳动英雄），黄立德运动（机关学校种菜英雄），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手工制造及部分种粮。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手工业（禁止做生意）的个人业余生产，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各地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及为着改善伙食的大师付训练班。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均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家庭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在生产运动中，不注意发展经济，只片面地注重节省开支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与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不注意全

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以为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及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及个人业余生产，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合作社看作为民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吴满有生产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放粪）推行于各地，而说吴满有方法不应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及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而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与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采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原则下，把一切全劳动力与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与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与方法。今年的全部一律彻底减租，将是明年大规模发展生产的一个刺激。而明年不论公私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实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与日用品，准备与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三）为了使党政军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与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及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与拥军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号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民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及民众团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在拥政爱民与拥军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与党政民方面自己在1943年的缺点错误，而于1944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与拥军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及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批评自己，而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四）此指示主要地说明今年减租，明年生产及明春举行拥政爱民运动的重要性。其它各项政策，迭有指示，现不重述。但应知道：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今年秋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须对十大政策作出今年一年的总结（不须开很大很长的会议，只就十大政策加以逐个检讨）。同时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如说某地不须实行拥政爱民及吴满有生产方法等），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但是只要全党同志认真地实行了十大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造成许多有利条件，达到克服困难迎庆光明之目的。我们是有一切把握克服困难的，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原载1943年10月1日《解放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甲)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的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乙)我们的党,虽然已有二十年英勇奋斗的历史,虽然已经是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这些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叛徒张国焘的结局,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训。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今天在党内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在某些个别部分中,在某些同志中是确实存在着的。上述的这些倾向，具体的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1)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2)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3)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的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的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丙)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

(1)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

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

（2）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

（3）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应当强调党内的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但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

（4）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

（5）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6）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论 党 内 斗 争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

刘 少 奇

一 引 言

同志们！

最近我们在党内提出了加强党员党性锻炼的问题。听说中央也通过了加强党性锻炼的决定，不久我们就可以收到。为了加强我们党员的党性锻炼，我们就要在党内开展一些具体的思想斗争，来反对各种违反党性的不良现象。但是我们应该怎样来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就算正确，又怎样开展就算不正确呢？这便是现在我所要讲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一个领导广大群众战斗的党。党为了要实现自己所负担的历史任务，便要和各种时期的革命的敌人斗争，便要和各种不同的革命的阶层与阶级联合。党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便没有一刻钟不是处在严重的战斗环境中。党与无产阶级是经常处在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封建残余势力的包围之中。这些其他各种阶级，便在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或在同无产阶级的联合中，经过党与无产阶级内部不稳定的成分，侵入到党与无产阶级的内心来，在思想意识上，在生活习惯上，在理论上，在行动上，经常影响党与无产阶级。这就是党内各种错误的不良的倾向之来源，这就是党内各种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这也就是党内斗争的来源。

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

我们的党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只是同党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并且也同党内的各种敌人的及非无产阶级的影响进行斗争。这两种斗争是有区别的，但都是必要的，在阶级实质上是共同的。如果我们党不进行这后一种斗争，不经常在党内进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不经常在党内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那么，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会在党内发展，就要影响与支配我们的党，就要使党不能巩固发展，就要使党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要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可能腐蚀我们的党或党的某些部分，就可能使我们的党或党的某些部分起质的变化，变为非无产阶级的组织。比如，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因为这样而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所腐化，就是因为这样而变成了资产阶级式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主要的社会支柱。所以这种党内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也不可避免的。所以那些企图避免党内斗争的想法，那些不愿批评别人错误以便换得别人也不批评自己错误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

这种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抗。在党内，由于同志间原则上的分歧与对抗，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的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所以没有思想原则分歧的党内斗争，同志间没有原则分歧的相互倾轧，就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无内容的斗争。这种无原则无内容的斗争，在党内是完全不必要的，对党是有害无益的，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切实避免的。

党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证党的行动经常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进行，保持党之无产阶级的实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为了这个目的，党内斗争还必须在两方面来进行，必须是在两条战线上来进行。因为敌人的思想是从两方面来影响党的，是从右面或者从“左”面来进攻党的，是在党内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的。因此，我们的党内斗争，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必须向这两方面斗争，才能保持我党的无产阶级的一定的实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只进行单方面的斗争，如果我们疏忽对任何一方面的警戒与斗争，那敌人就可以、而且一定从我们疏忽的一方面来进攻党，那也就不能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不能巩固党。所以党是在不断的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与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同志说：

“只有为拥护这一个或那一个原则而实行斗争，为了确立这一个或那一个斗争目标来进行斗争，为了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达到此目标的斗争方式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征服这些矛盾。在日常政务问题上，在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是可以而且应该与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做一切妥协的。可是，假使这些问题是涉及到原则上的分歧，那末，任何妥协，任何的‘中间’路线，都是无济于事的。在原则性质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不能有‘中间’路线，不是这些原则应该成为党的工作基础，便是那些原则应提在党的工作基础上。在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便是闭塞头脑的‘路线’，抹煞分歧的‘路线’，党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线’，党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线’。‘中间’路线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这是萎缩而且日趋于腐化的政党之政策。这一个政策不能不使党成为空洞的官僚主义的机关。和木偶一般，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脱离工人群众。这个道路，决不是我们的道路。”

又说：

“我们的党是在征服党内各种矛盾的过程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

这就是党内斗争的必要性。

关于党内斗争的这种必要性，关于党内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之如何要不得，在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说得很多，同志们可以去看，我在这里不多说。我现在所要说的问题，是怎样进行党内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的问题。现在大家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我不想全盘的来说明这个问题，而只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就我个人所观察到的，来提出我的意见。至于这些意见是否完全正确，还请同志们大家来讨论。

二 中共产生的特殊条件与党内斗争中的偏向

同志们！马克思、恩格斯替世界无产阶级做好了什么工作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理论上准备好了巩固的完整无缺的体系，不仅如此，他们还替无产阶级建立了独立的组织，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他们建立了第一国际，在以后又组织了第二国际及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和职工会。他们教育了并且指导了工人阶级怎样组织起来，怎样进行斗争……。

在第二国际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代），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是进行了广大的组织工作，广泛的开展了组织工人阶级的运动，在组织上是获得很大的成功。不过当时是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人阶级的组织也是在这种和平时期建立起来的，党与工会之间的区别还不很明确。特别从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第二国际在考茨基辈领导之下，对党内机会主义采取不可允许的调和路线，以致机会主义腐蚀了第二国际各国党。这种党与工会，一到帝国主义时代，一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显出它不能担负无产阶级在新时期中所应该担负的革命的任务，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不能不走到破产与没落。

列宁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不同，这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快要死亡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时代要求无产阶级建立坚强的、战斗的政党，建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完全巩固和统一的，并和无产阶级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政党，依靠这样的党，才能胜利的去进行极端严重的革命斗争。因此，列宁除在各方面恢复与发展了马、恩的学说而外，还特别创立了一个完备的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学说。关于我们党的建设的学说体系，基本上是列宁创立的。这个党的建设的学说，是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完全不可分离的。

列宁创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时期的条件是怎样呢？

在当时，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大战的追近，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追近；而在另一方面，拥有广大组织的第二国际下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还不愿意也不敢去准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进攻，因此，第二国际各国党，在组织上也就是散漫的，派别分歧的，不能进行稍为严重的战斗，因此也就完全不能适合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要求。当时各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如劳资合作的理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发展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可以经过议会斗争掌握政权、不必经过革命，因而不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等等），而且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也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国党及俄国的少数党，主张党的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政党降低到普通工人组织的水平，主张党内不要严密的组织与严格的纪律，主张无原则的党内和平，容许党内的派别（具有不同思想和组织系统的派别）存在等，对于第二国际各国党来说，党的统一与纪律，党内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是不可理解的，是完全不需要的。这便是第二国际各国党在组织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一些主要的具体表现。

在当时，还有俄国的经济主义派，欧洲（如法国）的工团主义派等，他们主张工人阶级不要有政党的组织，拒绝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或把工人阶级的政党附属在职工会之下，主张“工会独立”，否认党对于工会的领导作用……。

在当时，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任务摆在面前，要求有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去领导广大群众，执行这种任务；另一方面，拥有数百万党员和工会会员的第二国际各国党又是那样的不成，那样的不能战斗，而且有组织上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想支持着这种组织上的落后与散漫。这便是列宁建设布尔塞维克党的时期之具体的重要条件。

列宁在上述这种条件下，为了建设一个能够胜任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统一与巩固的政党，就不能不集中力量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尤其不能不反对他们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列宁的布尔塞维克党最初与孟塞维克的分歧，就是在组织问题——入党条件问题上的分歧。列宁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的建设的学说，是在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是在反对经济主义派、工团主义派不要工人政党的理论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所以在列宁的党的建设的学说上，就充满了反对各种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充满了反对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的理论，反对把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普通工人组织水平的理论，反对党内的无原则的和平，反对党内的派别组织与派别活动等。列宁并在反对这些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确定了：党是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勇敢、最进步的分子组织起来的最先进的部队，最有组织的部队，最有纪律的部队，而且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有党的组织，而且有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以致政府、军队等等的组织，然而党是无产阶级这一切组织中的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能够指导其他一切的组织。因此，列宁就把党和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明确的区别开来了。列宁并且确定了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有统一的铁的纪律。这些党的组织原则，是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学说之主要内容。

列宁主要是在反对党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来建设党的。而主要不是在反对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来建设党，这种情况，在十月革命以前，确是如此。当时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还没有发生，或者还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机会主义，所以在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中，充满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即是充满了反对不要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反对无原则的党内和平，反对不要党内的思想斗争及害怕自我批评，反对党内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反对工会独立主义等。这是由于列宁建设党的时期之具体条件中产生的。

但是，如果我们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具体条件，那就和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那时候的条件完全不相同。

第一、中国党的建设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是在俄国布尔塞维克已经取得胜利，有了活的榜样以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的。

第二、中国党从开始到现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

第三、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容许工人阶级和平的议会斗争，也没有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

第四、在中国党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成分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并有若干游民成分，这是中国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由于前面四个条件，就使我们中国党的建设，一开始在主观上就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和道路进行的。布尔塞维克党的一些组织原则，在我们多数的党员中就能背诵出来。而社会民主党的那些传统与习惯，在我们党内是没有的。因此，就使我们走了许多直路。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的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因此在我们党内公开提出系统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是还没有的。认为不要自我批评，不要党内斗

争，不要严格的组织与纪律，不要工人政党及工会独立等等主张，在党内是不能公开发展的。虽则我们党内的思想斗争是还有不够的地方，但那还是由于理论水平的低下，不能看出原则上的分歧，或者是被党内个别负责人采用非常办法压制自我批评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党内有什么系统的反对党内斗争的理论。

但是建立我们中国党的时期的这些特殊条件与特殊情况，是发生两方面的影响的：一方面是好的，使我们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列宁式的中国共产党，在主观上严格的遵循着列宁的原则，这个党一开始就有严格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伴随着，因此使我党进步得很快，这是推动我党进步的一种原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个极端，犯了另一个错误，就是常常使我们党内的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毫无限制的斗下去，走到了另一个偏向，“左”倾的偏向……。

许多同志是机械的错误的了解列宁的原则，把列宁的原则绝对化。他们认为：党在组织上的高度集中，就否定了党内的民主；党内斗争的必要，就否定了党内和平；党为无产阶级组织之最高形式——在政治上领导其他一切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就否定了工会及其他工人的与劳苦群众的组织之独立性；统一的铁的纪律，就消灭了党员个人的个性及党员的自动性与创造性……。

许多同志是死记着列宁的原则，认为党内斗争是必要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是要不得的。但他们是机械的死板的运用这些原则，他们以为在党内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应该而且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是斗争得愈凶愈好。党内斗争的方式，党内批评的方式，愈激烈愈尖刻就愈好。同志间在党内的对抗，愈尖锐就愈好。不然，就会要犯自由主义、调和主义的错误。为了要证明自己没有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并证明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布尔塞维克”起见，他们就离开时间空间的具体条件，在党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如是，这些人也就成为党内斗争中没有立场的“打手”，无原则的“斗争家”，嗜好斗争的“斗殴家”，为斗争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丑事，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是“十足的布尔塞维克”，而只能证明他们对于布尔塞维克的侮辱，并把布尔塞维克的名词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

许多同志不了解：党内斗争是原则的斗争，是为拥护这一个或那一个原则而实行斗争，为确立这一个或那一个斗争目标来进行斗争，为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达此目标的斗争方式而斗争。他们不懂得：在日常政务问题上，在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是可以而且应该与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做一切妥协的。他们不懂得与不了解：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确立斗争目标的问题上，在选择达此目标的斗争方式的问题上，是应该和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而在日常政务问题上，在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只要这些问题不涉及原则上的分歧，就不应该和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实行不调和的斗争，而应该做一切的妥协。这些正是列宁、斯大林的党所固有的作风，但是没有被我们许多同志学到。他们在这些应作一切妥协的问题上，也实行不妥协的斗争，于是他们就没有不对抗的问题，没有不对抗的时候，没有不对抗的人。一切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他们都要实行对抗，强使其绝对的相同，他们是一切都不妥协，绝对不妥协。他们把一切的矛盾都看成对抗，对抗是一切，这就是他们的绝对主义。

许多同志不了解：什么是原则，什么是属于原则的问题，什么是党的战略计划与策略路线，并抓住这些原则问题，这些关于战略计划与策略路线问题上的分歧，来进行斗争。他们的

理论水平与政治经验，还是格外的低下，他们还抓不到这些关系重大的问题，并为了这些问题来进行争论。然而他们又死死记得在党内是要斗争的，不斗争是不对的。他们虽抓不到这些重大问题，不能从原则上去提出问题，可是他们还是要斗争的。于是他们就只能抓住个别的现象，个别的问题，与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来实行无内容、无原则的斗争与争论了，并因此而造成同志间的不团结，互相对抗，及组织上的分歧。这种党内斗争中的恶劣现象，在我们党内是存在的。

上述这些，是中国党内斗争中的一种偏向，是在中国党内特别严重的（在外国党内虽然也有）一种偏向，是党内斗争进行得过火、进行得毫无限制，走到另一个极端——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否定党内民主，否定原则上一致的党内和平，否定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的相对的独立性，否定党员的个性及其自动性、创造性等)。这是由于中国党的特殊环境与特殊条件产生的。

在这里，还要说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原则斗争没有被中国党的许多同志所注意这一种事实。十月革命后，俄国党内产生了“左”派共产主义的一派，他们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在以后又有关于工会问题的论争。十月革命以前，在布尔塞维克内部虽也有过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召回派一派人，但不久即被克服，不如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左”派共产主义的严重。俄国这一“左”派不久也被列宁克服了。但在西欧各国又产生了“左”派共产主义，他们提出“不做任何妥协”的口号,反对参加国会,反对合法斗争，反对与社会民主党左翼进行必要的联合。在这种情形下，列宁就在1920年 4 月间写了“共产主义‘左’派的幼稚病”一书，以纠正这种倾向。因为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从前不相信无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的，现在有了活的事实，给了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就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左”倾机会主义，以为革命可以不经过任何迂回道路，一个早晨就可以胜利。这种情绪，中国党内正是发生过，在某些时期内并且占了统治的地位。犯这种错误的人们完全不注意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书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反对迂回，反对等待，提倡少数先锋队可以不顾广大群众还没有跟得上来的事实，就实行冒险的进攻，反而骂其他的人为“右倾机会主义”。一切组织上右倾或“左”倾的机会主义，都是从政治上的右倾或“左”倾而来的。中国党内既在某些时期犯过政治上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于是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这种错误。而特别是在内战时期犯过冒险的“左”倾错误，于是在组织上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就产生了。

因此，在中国党内斗争问题上，如果可以这样来分的话，那末就存在着以下三种倾向：第一是党内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第二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党的组织上及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第三是党内无原则的纠纷与斗争。

以上三种偏向，在本质上说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党内无原则的纠纷和斗争及党内的过火斗争与自由主义都不是马列主义，都是反马列主义的表现形态，上述三种倾向是仅就其形式来分的。

这就是中共产生的特殊条件与党内斗争中的偏向。

三　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之表现

同志们！在上述三种党内斗争的偏向中，第一种自由主义的偏向，我今天不准备来讲。虽然我并不是认为目前党内自由主义的偏向不严重，目前反对自由主义不重要，我也还不能

相信同志们对于自由主义这一种倾向及其在各种具体问题上的表现，是已经彻底弄清楚了的，我想许多同志是还没有彻底弄清楚的。但我今天不准备讲它，下次有机会时再讲。我只提出党内自由主义倾向在最近是有些发展，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党内斗争中一种主要的倾向，党内思想斗争是开展得不够。因此，就使得党内许多错误的倾向，不良的现象，不能及时得到有力的纠正，党的纪律也逐渐的松懈起来，这是很不好的。这是由于最近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及新党员加入到党内来，他们是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到党内来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还没有受到无产阶级铁的纪律的锻炼；同时，过去犯过“左”倾错误及党内过火斗争错误的许多同志，在今天他们又反转过来犯右倾错误，犯自由主义错误。长期统一战线的环境，资产阶级影响党内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则用一切方法发展与拥护党内的自由主义。因此，就使得党内自由主义的倾向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在加强党性锻炼的斗争中必须严格反对的一种倾向。比如有些同志看见别人犯错误不说，怕人报复；好朋友犯错误不说，相互隐瞒；当面不说，背后乱说；随便批评、发牢骚、小广播等……这些现象，在党内是相当普遍存在的。还有特别严重的一种现象，最近也在党内产生，就是有一种人，生怕别人向党内上级报告他们的缺点与错误，怕人告状。一方面，他们不能禁止自己不犯已经知道的错误，他们要明知故犯；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禁止别的党员向党向上级报告及在会议上批评他们。他们做了一些错误的不正当的事情，犯了错误，但他们不肯将错误揭露，以便改正他们的错误及缺点。他们讳病忌医，他们不知道只有将错误揭露才能改正错误的真理，他们要隐蔽错误，把错误当作比什么宝贝还要珍贵的隐藏起来，于是他们就不只是要想办法来禁止别人的眼睛不敢正视他们的错误，他们还要想办法来禁止别人的嘴巴不敢向党向上级报告他们的错误，取消别人以完全正当的组织方式在党内说话与批评的权利。他们恐吓其他的同志说：“你敢于向上面报告，那我就会对你不起的！我要揍你的！揍你这个喜欢向上面拍马屁溜勾子的东西！”痛恨那些向上面报告及讲过他们错误的同志，而永记在心，并要想办法报复。这种现象是完全失了党员气味的恶劣表现。他们要隔离党的领导机关与党员群众的联系，以便他们能够在党内为非作恶。这种现象是应严格禁止的。

任何党员看见其他党员犯错误或其他一切不利于党的事情，必须向党向上级报告，不报告是不对的。报告是完全对的。禁止别人向党向上级报告自己的缺点错误，是完全非法的，党内是绝不能容许的。当然党的领导机关在得到这种报告后，应调查清楚事实，审慎处理，而不能单凭一面之辞，轻率的随便的处理。

目前党内的思想斗争应该适当的开展，这是我们已经决定了的。因此，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在某些党的环节，犯自由主义错误特别严重的地方，应该根据事实，开展反对自由主义的具体斗争，克服这种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几年前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举出了党内十一种自由主义的现象，至今仍保持其效力，你们应细心研究，并遵从这个文章来纠正与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同时，在我们党的建设的课程上，也会要详细讲到自由主义的。所以我今天不来讲它。我现在只来讲第二第三种偏向；因为这两种偏向是从来没有人在党内系统讲过的。

党内机械的过火的斗争，表现在一些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以下的一些事实上：

第一，在地方党及部队党内，经常举行所谓“斗争会”，甚至在政府机关及群众团体等非党组织中也经常举行这种“斗争会”。这种“斗争会”是预先布置好了的，主要的不是为了检讨工作，而是要打击某某人，不是首先“对事”而是首先“对人”斗争，主要的不是向

某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原则进行斗争，而是向某人斗争。所谓“斗争张三或李四”，目的就是要打击某某犯了错误的同志。“斗争会”的实质，是一种同志的审判会，主要的不是从思想上去解决什么问题，而是要从组织上去解决问题，去压服某些敢于坚持自己不同意见（这种意见不一定是真正不对的）的同志，或调皮捣蛋的同志。而且在每一次“斗争会”对被斗争的人，大多数必有组织结论。很明白，这种斗争方式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首先，“斗争会”这个名词就不对，就不通。既有所谓“斗争的会”，那末是不是还有所谓完全“无斗争的会”呢？如果我们把某些“会”认为是专门进行斗争的会，又把另一些“会”认为是完全不进行斗争的会，那就是一种极大观念上的糊涂！在这里，证明许多同志是不懂得斗争的绝对性及普遍性的。是把斗争与教育机械的分开的。

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党与教育犯了错误的同志。所以党内斗争本身就是一种党内不可缺少的教育；而党内的教育也是一种党内斗争，一种比较温和的斗争。因此教育与斗争是不能分开看的，斗争即是一种教育，教育即是一种斗争，机械的分开是不对的。

其次，这种斗争会，是党内宗派主义及对干部对同志实行错误的打击政策之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为了要打击被斗争的同志，而不是为了要帮助、教育或挽救犯错误的同志。主要的是对人斗争，而思想上的分歧与对抗，反而被忽略了。因此这种“斗争会”常常不能真正加强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反而常常加深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分歧，加深党内不团结的现象，无原则的纠纷，及助长党内宗派主义的发展。

至于在非党的机关团体中举行这种“斗争会”，那更是不对的。

第二，党内机械的过火的斗争形式，还表现在：有些同志以为党内斗争是斗争得愈凶就愈好，问题提得愈严重愈好，搜集别人的错误愈多愈好，名词用得愈多愈好，给别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批评的语句愈尖刻愈好，批评与斗争的方式和态度愈严峻愈粗暴就愈好——讲话的声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凶、牙齿露出来愈长……就以为是愈好，就以为是“最革命不过”的了。他们在党内斗争与自我批评中不讲求适当，不讲求分寸，不讲求适可而止，毫无限制的斗下去。很明白，这也是完全不对的！

第三，有些同志还不了解：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是要在思想上求得一致才能保持与加强党内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是要从思想上、原则上去解决问题之后，才能在组织上、行动上解决问题。然而要在思想上、原则上求得一致与解决问题，要去克服别人不正确的原则，要去纠正别人不正确的原则，要去转变别人的思想，要去纠正别人久已相信的原则、观点与成见，就不是那样容易的事，就不是采用那样简单的办法，三言两语，或一场斗争会所能做到的，不是采用单纯的压迫手段与强迫办法所能做到的。而是须要经过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与各种复杂的斗争，经过相当长期的教育与斗争及革命的实践，才能够得到的。有些同志不是这样来认识党内斗争的实质，而是把党内斗争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认为党内斗争只是一种组织上的形式上的对抗，只是一种简单的打架或者骂人，只是一种吵嘴或者角力，而不是要从思想上、原则上去求得真正的一致与解决问题。或者认为党内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是可以用这种简单机械庸俗的办法来解决的。很明白，这是完全错误的！

由于这些同志不是要从思想上、原则上去克服党内的分歧，去纠正某些不正确的倾向与

现象，来保持或达到党内的统一，而是企图用一种简单的组织上的办法，用一种对党员的压迫手段、打击政策与惩办制度来达到或保持党内的统一，所以他们就产生各种错误的过火的党内斗争方式，所以他们就不是细心的，周到的，从原则上、思想上去说服同志，而是采用一种单纯的组织上的办法，敌对的方式，甚至行政上的办法去压服同志，吓住同志。他们随便对同志作组织结论，在组织上去处罚同志，而且用资产阶级的平均的法律观点，惨痛的处罚党内的同志——即是不论何种党员犯了多大的错误，不管其承认及改正与否，按照党法均须给以多大的处罚。这就形成党内的惩办制度。他们常用开展斗争的办法，去开展工作，推动工作；故意去寻找“斗争对象”（党内的同志）作为机会主义的代表者来开展斗争，牺牲与打击这一个或这几个同志，“杀鸡给狗看”，以推动其他的干部党员去努力工作，完成任务。他们故意搜集斗争对象的缺点错误，形式的、片断的摘录他不大妥当的言论行动，把这些缺点错误和不大妥当的言论行动又孤立起来看，当作就是这个同志的全部。把这个同志个别的缺点错误夸大起来，替他构成为机会主义的系统，在党内同志中造成对这个同志极不好的印象，激动起党内一切仇恨机会主义的心理，向着这个同志来斗争。于是“死老虎人人可打”，一些人的报复心理也发展起来，揭发他一切的错误缺点，任意提到原则的高度。甚至捏造一些事实，凭着主观的猜疑及完全不可靠的谣言，乱加这个同志以各种罪状等等，结果是非把这个同志弄得昏头昏脑不可。这样做了之后，他们还不大允许这个被打击的同志起来做任何的辩护。如果他有辩护的话，那末又说他故意辩护错误，承认错误不彻底等等，再加以打击。不允许被打击的同志在服从组织的条件下，保留意见，不允许向上级控诉，一定要被打击的同志当时认错。如果被打击的同志一切都承认了的话，那末思想上、原则上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又是不大注意的。所以在党内也发生过这种事实，即某些同志在斗争中承认错误过多。为了免遭打击起见，不如一切都承认好些。错误虽承认了，实际上他自己也还是不懂得的。在这里也就证明这种斗争方法不能培养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顽强性。

第四，是将党内斗争方法与党外斗争方法不加区别的混淆起来。有些同志，将党内斗争的方法机械的搬到党外的非党的群众团体及机关中去使用，用党内斗争方法，去向非党干部和群众斗争；另外有些同志，用党外斗争方法，对敌人对异己分子斗争的方法，来向党内的同志斗争，用对付敌人与异己分子的办法，来对付党内的同志。一切挑拨离间，阴谋诡计都使用上来，行政上的办法——例如监视、逮捕、监禁、审判等也运用到党内斗争中来。如有些同志在锄奸工作中所犯的过“左”错误，大半就是没有将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严格区别开来的结果，是把党内思想斗争与锄奸工作混淆起来的结果。党内也往往有敌人的奸细暗藏着，对于这种暗藏的敌人是必须根据事实进行斗争，把他们揭露出来与驱逐出党的；但这与共产党员犯错误需要进行教育性的斗争完全是两件事，必须把二者区别清楚。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斗争的方法和斗争的形式必须区别开来。

还有些同志（其实这已经不能称为同志）则公然依靠与假借党外的力量来进行党内斗争，向党要挟和恐吓。如有些人，依仗他们一部分的工作成绩，依仗他们的部队和枪杆子，依仗他们在群众中的信仰或某一部分的统一战线关系等，而向党向上级机关进行斗争，要挟上级机关及党接受他们的要求与意见，向党闹独立性，向党宣告独立。或者利用党外的、甚至资产阶级的、敌人的报纸杂志及各种会议，来批评党，向党的上级机关，及向某些同志和干部进行斗争。很明显的，这是与另外一些人依仗党的势力去强迫、命令、压迫党外的群众，去向党外人进行敲诈勒索，是一样严重的错误。这些人是站在党外来向党斗争，因此他

们虽尚挂着共产党员的名，却已经完全离开党的立场，成为党的敌对者。

第五，我们党内的许多问题都是在会议上解决，或经过会议解决，这是好的。但各个组织中，有许多会议是没有经过准备与预先调查研究的工作的，常常在会议上发生许多不同的意见与争论，而一切会议又必由最负责的参加者来做结论，一切会议的结论又等于决议，在这里也常发生许多毛病。我看见有些会议上的争论，最后逼到指导员或支部书记或其他负责同志来做结论。但这个负责同志自己是完全无把握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弄清的，然而事情是逼来了，非做结论不可，否则不能做负责同志。这个负责同志只得来做结论，有的则表现非常狼狈与汗流浃背，粗率的把结论做下来，而这个结论也即等于决议，事情就照这个结论决定下来，这当然是要发生许多错误的。有些同志，当着他们对问题还没有把握决定的时候，他们不肯说明自己还没有把握，还要求一个考虑与研究的时间，或向上级请示的时期，而要顾全面子，保持地位，硬说自己是已有把握的，随便决定下来，结果常常不是正确的。这种情形，也应该纠正。

我们一切同志对一切的问题，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党内的问题，不是依靠蛮横所能解决的。一切会议应该有结论，但不能决定的事情，或尚有疑问、尚未弄清的问题，就不应随便决定。决定的事情一定要是自己相信的，如果自己还无把握相信的事情，可以保留下来再加以研究或请示。会议的结论，不一定要参加会议最负责的同志来做，谁报告，在讨论之后，即由谁做结论。但这个同志的结论不一定等于决议，会议的决定可以和这个同志的结论不一样。在苏联共产党内的作风也是如此的。

以上这些，就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一些重要的表现。

我在以上所说的，当然是一些最坏的典型，不能说我们过去的和现在的党内斗争普遍都是如此的。但这种党内斗争的方式确实是存在的，且曾经在一个时期是占着统治地位的，成为主要的党内斗争方式。

在这种不正确不恰当的党内斗争之下，曾经在党内造成了什么结果呢？是曾经在党内造成了以下一些恶果的：

第一，助长了党内的家长制。个别的领导者及领导机关，在这种党内斗争方式之下，压迫着许多党员不敢说话，不敢批评，在党内形成个人或少数人的独断。

第二，另一方面，又助长了党内极端民主的倾向及自由主义的发展。许多党员平时不敢说话，不敢批评，表现党内一种形式上的和平与统一。但是一到矛盾无法继续隐蔽下去的时候，一到情况严重与错误暴露出来以后，即又乱批评乱斗争一场，形成为党内的对抗与分裂及组织上的纷扰，很难收拾。这也就是党内家长制的反面表现。

第三，影响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生活不能正确的建立，党内民主生活的不经常、不正规或极端的缺乏。

第四，阻止党员同志们积极性、自动性及创造性的发扬，削弱党员对党对工作的负责精神，影响同志们不敢积极负责，不敢放手工作，放手创造，不细心去考虑研究问题与情况，养成他们照办公事、人云亦云的作风。

第五，助长党内宗派主义的发展，无原则派别斗争的发展，造成党内害怕批评与斗争的心理，养成某些同志“独善其身”的保守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第六，给托派奸细反革命分子以破坏党的更多机会，给反革命进攻我党以更多的口实。托派奸细分子特别利用党内的矛盾，不大正确的党内斗争，来进行破坏党的活动，来争取那

些受打击的对党不满的分子。而反革命则利用党内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来进行宣传煽动，影响党外的同情者及党内不稳定的成分来进行挑拨离间，破坏党内的团结与统一。

上述这些恶果，在党内是曾经造成过的，而且还有一部分遗留到现在尚未把它们消除。

这种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方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经造成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给党的损失很大。现在我党高级领导机关中，虽是已经纠正过来了，在全党现在也不是一种统治的斗争方式，但在某些中下级组织中，在某些个别组织中，这种斗争方式则至今还未完全纠正，还相当普遍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继续着。因此，这个组织中的生活仍然是不经常的。因此，我们必须严格指出这种偏向，以便在我们的组织中彻底肃清它。以便我们的同志不要重复这种错误，以便正确的切实的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推动我们的党前进。

四　关于党内的无原则斗争

同志们！我现在来讲党内斗争中另一种偏向——党内无原则的斗争。这种现象在中国党内，是特别普遍与严重存在的。在外国党内虽然也有一种所谓“闲谈运动”，但我想还没有中国党内这样严重吧。所以我们对这种现象，必须使同志们认识清楚，并采取必要的办法来对付，否则对党内的团结和工作上的妨碍是太大了。

什么是党内的无原则纠纷与无原则斗争呢？

我认为党内的以下几种纠纷和斗争是属于无原则的，即是离开我们党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利益之共同立场和原则的。

第一，有些同志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整个党的利益上来提出问题，来和其他同志进行斗争，而是站在个人利益或派别利益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来和党内其他同志进行斗争。就是说，他们在进行党内斗争中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因此他们对于问题的观点、处理方针和办法，也是不正确的。一切事情的处理，只要对他们个人或少数人有利，他们就赞成就主张，如果对他们个人或少数人不利，他们就反对，就不赞成。至于是否对党对革命有利？他们是不管的，或摆在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因此，这种人主张什么或反对什么，都是没有原则的，离开党与革命的原则的。或者说：他们的原则不是党的原则与革命的原则，只是他们个人利益的原则。如果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个人利益为原则的话，那末，各个人的利益与原则必然矛盾，必然相互斗争。

比如在你们中间就有人为了伕子的问题，马匹的问题，吃饭穿衣及生病打针的问题，没有提升自己职位的问题等，曾经发生一些争论和斗争，就是属于这种个人的无原则的问题。同志们不是一般提出伕子、马匹、吃饭、穿衣及打针应该怎样支配的原则才对党对大家有利，要党及学校采取；而是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不给我伕子、马匹？为什么不给我打针？为什么不提升我的职位？为什么不给我好的饭吃？好的衣穿？一切以“我”个人为中心，从“我”个人的立场出发，在党内造成纠纷，进行斗争。那末只要给他个人满足了，即使支配的再不合理一点，他也可以不管的。这就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

又比如同志们反对浪费吧！有些同志是站在党的利益与党的立场上来反对浪费的，因此他们提出各种违反节约原则的浪费现象来加以批评反对，并提出节约的意见要党采取。这是很对的。但另外有些同志就不是站在党的利益与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反对浪费，因此他们就这样提出问题：某人浪费了多少，某人某人又吃了什么，穿了什么，用了什么……，为什么我

就不能这样吃，这样穿，这样用呢？难道我的资格不老吗？对党无功吗？因此他在反对浪费的口号之下，起来斗争了。原因就是别人浪费了，而他自己还没有浪费到。这也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

比如在皖东，曾经规定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员有少数的薪水，于是就有一些同志要求到政府机关去工作，目的就是想自己也要得到这一点薪水。不允许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在反对政府机关人员有薪水的口号之下起来斗争了。他们也并不是在原则上提出应如何来规定政府机关人员的生活，来加以商讨。这也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

第二，有些同志不是为了把党的事情弄好，甚至是为了把党的事情弄坏，或其他目的，来在党内起纠纷，进行斗争。目的是不正确的。这也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比如有些同志为了个人爱出风头，为了个人地位及个人面子，甚至为了报复别人以泄恨，在党内闹纠纷，和其他同志斗争，以捣乱其他同志的工作和计划，破坏党内的秩序与团结，而不顾及当时的情况与条件等，就是属于这种无原则斗争的。

第三，有些同志不是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要党采纳，或要党放弃，而只是凭自己的感情与喜怒来提出问题与进行斗争，为了一时的痛快，为了发脾气舒感慨，而要骂人和气愤，这也是一种无原则斗争。另外有些同志由于他们的经验与理论水平低，不能从原则上提出问题来争论，而只是在一些个别的零碎的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不涉及原则的日常政务问题上，来和其他的同志作绝不妥协的争论，但并未涉及到一般的原则问题，因此这也是一种不应坚持的无原则斗争。比如，有些同志对于某一次的战斗，某一次的行动，某一个斗争形式，某一个组织方式等发生相互对立的意见，而不涉及到一般的战术原则与战略计划及一般的行动方针与一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各持己见的不停止的争论下去。他们的问题提得不正确。因此常不能有正确的结论，或是无论怎样都可以的，因此就常成为一种无结论的清谈。

第四，是不择手段，不依照正当的组织手续来进行党内斗争。在党内无原则的拉拢或打击同志；在同志间进行挑拨离间，阴谋诡计及陷害同志等；或者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对党不负责任的乱批评、乱广播，及造谣、撒谎、诬蔑同志等。

以上这些，都是无原则斗争。其次，还有一些同志，在原则斗争中夹杂无原则斗争的若干成分，或者在原则斗争的大旗掩护下进行着无原则的斗争。另有些同志特别着重的注意某人与某人争吵，某人与某人的关系不正常等，而不注意他们争论的实质。

党内这一切的无原则斗争，都是不好的，对党有害无益的。

同志们又问什么是原则？什么是不涉及原则问题的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什么是日常政务问题？以及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不应坚持己见，而应与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做一切妥协？

同志们！这些问题确是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什么是原则呢？

如果纯粹从理论上来讲，所谓原则就是事物发展的一般法则。特殊的事物有特殊的发展法则。相同的事物有大体上相同的发展法则。我们所谓原则问题也就是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法则作为我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问题。如果我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一般法则有错，我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有错，那我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就必然要发生错误。如果我们认识某一类问题的发展法则有错，那末我们处理这一类问题的方法也必然要发生错误。所

以我们对原则问题是不能马虎的。如果在原则上发生错误，那就不只是要发生个别的错误，而会发生系统的、一贯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上的错误。

什么是不涉及原则问题的日常政务问题及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呢？

这大半是一些个别的问题，是一些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我们说要发动与组织群众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大家都同意，而发动与组织群众又须集中由群众团体来领导，部队也应该协助与参加群众工作，这些都是原则问题，我们大家都同意，即我们在原则上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有的同志主张将部队的民运队及民运部暂时取消，将这些工作人员派到群众团体中去工作，另有同志则主张部队民运队，不应取消。有些同志主张群众团体应分为四部办事，另有同志主张分五部办事，这些就都是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都不是原则问题。

又比如，我们敌后抗战，今天的一般战术原则是分散的游击战争。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没有分歧的话，那末就是我们没有战术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但有一次由于各种情况的逼迫或者由于对他们特别有利的情况发生，我们某个指挥员打了一次胜利的或失败的运动战，那末，这也是不涉及原则问题的个别的实际问题。只要这个指挥员没有在敌后打运动战的原则的观点，那末即使这一次二次战斗是错误的，也只是个别的错误，或者是由于特殊情况的发生，这个指挥员打得并不错，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些个别的纯粹实际的问题上来坚持己见，争个不休。

又比如，在今天我军装备条件下，原则上是不应强攻敌人的坚固工事与中心城市的。如果对于这一个原则我们没有分歧的话，那末某一个工事，某一个城市，因为有特殊的条件，或有特殊的必要，我们又去打下来了。这也是不涉及原则问题的个别实际问题。但如果因为打下了这一个工事，这一个城市，就说一切敌人工事与敌占城市今天我们都可以去打，这就成为原则问题了。在内战时期，曾有同志主张打大城市，指挥红军向某些大城市进攻，这就是涉及原则问题的实际问题。因为他们去打这些大城市是在原则上主张红军应该向大城市进攻。在这种涉及原则问题的实际问题上，我们即不应该在原则上妥协，而仍应在原则上主张不打大城市。

一切具体的实际的问题，常有几个解决的办法。由这里到那里，常有几条实际的可走的路。这些办法，这些道路，对我们当时情况又各有利弊，有的办法和道路对我们是最有利的，但包含有危险性，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不如采取次好的办法和道路。所以在这些具体的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发生有不同的意见，只要不涉及到原则上成为问题，我们就要善于妥协，善于让步，善于接受与同意别人的意见，“善与人同”，然后事情才能畅快的办理，问题才能爽快的决定；而不应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总是要别人放弃意见，总是要别人来将就自己，总是要别人照自己的意见办理，这样反而要拖延问题的解决，妨害工作的进行，增加党内纠纷与清谈的倾向，妨害同志间的相互团结。这就是为什么在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应与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做一切妥协的缘故。

由此可知，什么是不涉及原则问题的日常政务问题，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呢？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们的斗争目标及达到此目标的斗争方式的问题，就是那些不关涉到我们的战略策略的问题，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们的一般立场与具体立场的问题，上面举过的各种例子，就都是这样的问题。

总之，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总原则，是党与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一切要服从这个总原

则。一切违反这个总原则的主张，意见和行动都是要反对的。各种原则之中，又有大原则与小原则之分，我们的规律，是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小原则服从大原则。在一切原则上的分歧是不能调和妥协的，必须彻底争论清楚，求得一致。然而在一切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上，就不应死不妥协，就不应过分着重的斗争与争论，否则也要妨碍工作与妨害团结的。

我曾经听见一个同志说，在党内斗争中只要我的政治主张是“对的”，在组织上即使错误一点是不要紧的，是次要问题，因此他认为在党内斗争中可以采取各种不合组织纪律的手段向反对者斗争。这种说法，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他把正确的政治路线与正确的组织路线对抗起来看，他不知道捣乱党内的秩序与组织，就是犯了一个最严重的原则的错误；特别在今天妨害与破坏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就是最大的帮助了敌人，最大妨害了党与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就是犯了比其他原则错误更加严重的错误。在这里，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同志都要善于比较、善于区别各种原则问题在当时对党的利害的轻重关系，根据小原则服从大原则、部分服从整体的法则，来决定在什么原则问题上应暂时让步不坚持，在什么原则问题上则坚持不让步。为了保持党内团结和统一，有时对于某些关系不大重要不大紧急的原则问题，我们也是应该和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暂时妥协的，暂时不提出这些问题，不在这些问题上坚持争论，而着重在当时关系重大的紧急问题上。这当然不是原则上的调和与中间路线，而是实际行动上的妥协及服从多数决定。

以上就是关于党内的无原则斗争问题。

党内无原则斗争以及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是从那里产生出来的呢？它们的根源是什么呢？这是以下一些根源中产生出来的。

第一，是党内同志的理论水平一般还很低，许多方面的经验还不够，全党的领袖与中心很久没有实际的形成，党在各地方的领袖与中心则至今还很少实际的形成。

第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多，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疯狂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报复性，经常影响到党内斗争。

第三，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同志间客观的相互商讨问题的作风未形成，粗糙的主观的判断与处理问题的作风仍然严重存在着。

第四，投机分子混入到党内来、以及某种投机心理在党内一部分同志中的存在。他们常常为了证明自己的“布尔塞维克化”，而故意要“左”一些，以为“左”要比右好点，或者为了打击别人，以便抬高自己。

第五，托派奸细反革命分子混入到党内来，利用党内斗争来破坏党。内奸托派常常在党的旗帜掩盖之下故意打击某些同志，在打击之后，又要另一个内奸托派分子去吸收这些被打击的同志作内奸加入托派。

以上这些就是产生党内斗争中上述各种倾向的根源。

我们的党从最初就有严格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很好的。在党内斗争中有许多是做得对的，恰当的。因此我们的党在许多次的党内斗争中都有成绩，都使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有些提高。不可否认的，这些批评与党内斗争是推动我们党进步的原动力，如果没有它，是不行的。然而我们同样的不可否认，在我们党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是存在着上述各种典型的偏向和错误，在党内斗争中有许多是进行得不正确的。因此，就使我们在过去党内斗争中费去了很大的代价。因此，我们在今天就应该如何的来惩前毖后，如何使过去所费去的很大的代价使它不是虚费的，如何从研究过去党内斗争的历史

教训中来求得党的大的进步。

以更少的代价和痛苦换得党内斗争更大的成绩和党的更大的进步，这就是我们今天从研究中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中所应确定的今后党内斗争的方针。但这就需要我们彻底纠正过去党内斗争中各种偏向和错误，需要我们切实的适当的去进行党内斗争。

五　怎样进行党内斗争

同志们！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要怎样来正确的适当的进行党内斗争呢？

关于这个问题，联共党及各国党均有很多经验，中国党也有很多经验。列宁、斯大林有很多指示，党的中央也有很多指示。关于这些，同志们应该去细心的研究，将来在党的建设上也要讲的，所以我今天不来讲那些。我只就中国党内斗争的经验提出以下一些意见来，作为同志们的参考。

第一，首先，同志们要了解：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我们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而绝不可以草率从事的。必须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完全是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及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与理解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必须自己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问题弄清楚，实行系统的调查并研究，同时还必须是有组织的、有领导的、有准备的去进行。

同志们应该知道：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能纠正人家不正确的立场；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然后才能矫正别人的不正派。所谓“必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

只有自己首先不动摇，然后才能帮助动摇的人，克服人家的动摇。

只有自己有正确的原则，正确的理论，然后才能克服人家不正确的原则与不正确的理论。

只有自己对于原则问题的明确性，才能改正人家的不明确。只有自己了解问题的实际材料更多，更有系统的研究了问题，然后才能给其他的同志并给党以更多的帮助。

如果有同志不是这样，如果自己首先就不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没有把握到正确的原则，没有按照原则去观察客观情况与系统的研究问题，甚至只要有个别的缺点与在某些地方的不够明确，那在党内斗争中都不能克服人家不正确的东西。如果还要鲁莽的去斗争，那就可能走到不正确的路上去。

只有客观的铁的事实，只有在实践中已证明了的经验，只有真理，能够战胜一切。

我们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不是为了要削弱党的组织与团结，削弱党的纪律与党的威信，妨害党的工作的进行；相反的，是为了加强党的组织与团结，提高党的纪律与威信，推动党的工作的进行；因此党内斗争不能任其自流的发展，形成极端民主的现象。在党内既不能容许家长制的存在，也不能容许极端民主现象的产生。这是党内生活不经常的两个极端的表现。

党内斗争，是要用对党对革命最高的负责态度来进行的。

第二，同志们要了解党内斗争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不同思想不同原则上的对抗。思想原则上界限的明确划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在斗争的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该尽可能的不对抗，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争论。尽可能不采取组织手段及做组织结论。尽可能完全采用诚恳、坦白、正面的教育的态度去进行，

去求得思想上、原则上的一致。只有在必不得已的时候，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可以采取对抗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手段。党的一切组织，在适当的限度内，都有完全的权力对任何坚持错误的党员做组织上的结论，党的纪律的执行与组织手段的采用，在一定的情况之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手段不可轻易采用，不可滥用。单是在组织上处罚同志多，并不能提高党的纪律。党的纪律，党的统一、主要的也不是靠处罚同志来维持（如果要这样才能维持，那就是党的一种危机了）。而主要的是依靠党在思想上、原则上的真正一致，依靠大多数党员的自觉性来维持的。我们只要在思想上、原则上最后弄明白了，如有必要，组织结论是最容易做出来的。我们不要一分钟可以决定开除某些同志的党籍，或宣布自己脱党。

同志中不同思想不同原则上的坚持、对抗与争论，和同志们对于党的组织上的服从，对于多数与上级的服从，是不可分离的；否则就没有党的统一与行动上的一致。同志们决不可以因为在原则上坚持己见，就在组织上与党对抗，就不服从多数与上级，就去自由行动。这是违反党的基本纪律的。

原则上、思想上的对抗，与组织上方式上尽可能的不对抗，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许多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一方面没有思想上与原则上明确的对抗与分歧，但另一方面，在组织上及斗争方式上又对抗得一塌糊涂，斗争得一塌糊涂，争得面红耳赤，骂得狗血淋头，斗得两方面不见面，仇恨种下很深，然而在他们之间竟找不出原则上、思想上的明确分歧来。

第三，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就有布尔塞维克的尺度。一切过分的批评，扩大人家的错误，滥给别人戴大帽子，都是不对的。党内斗争不是斗得愈厉害愈好，而应有适当限度，应讲求适当，“过”与“不及”都是要不得的。

指出与批评别人的错误要抓住中心，要着重最重要的问题，给以系统的明确的解释，才能解决问题。而不要枝枝节节的搜集人家许多错误的现象，及似是而非的事实，简单给以暴露了事。这会使人感觉你故意找他的错误，攻击与打击他。

当你们估计或批评某个同志时，你们不应仅仅指出他的缺点错误当做他的全部，你们还应指出他的成绩、功劳、长处及他正确的主张，即使他的主张只有一点或一部分是正确的，你们也必须替他指出，不可抹煞。这样才能给这个同志以全盘的估计与批评，才能帮助他进步，使他服气。

适当的批评，适当的态度和适当的方式反对“过”与“不及”，这就是我们在党内斗争中所应采取的方法。

第四，在党内外一般的停止斗争会的举行。应从总结工作、检查工作中来指出各种缺点错误。应该首先“对事”，然后“对人”。应该首先把事实弄清楚，把问题弄明白，把错误与缺点的性质、严重程度、产生的原因弄清楚，然后再指出对这些缺点错误的负责人，主要的、次要的由谁负责，而不要首先去追究错误的负责人。只要犯错误的同志不是有意的，并且真正在了解错误，改正错误，那我们就应该欢迎，就不应再事斤斤计较。在党内斗争中，对干部与同志的打击政策，攻击别人与打击别人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这与剥削阶级对劳动者的鞭子政策、压迫政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我们的政策是同志间的互相帮助与互相检讨。

对于某些特别调皮捣蛋、经常违反决定、违反纪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同志，对于他

们，原则问题还说不上、也说不通的时候，那末，个别的举行一些同志审判会，也并不是不可以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把它普遍化就是不对的。

第五，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在鉴定同志及对同志做组织结论的时候，通常均应通知本人，当面做结论。如果他不服，在经过辩论之后，应向上级申诉（一切在处罚后表示不服者，即使他本人不愿上诉，党的组织亦应代他上诉）。任何党的组织，不能禁止任何同志在被处罚后向上级申诉。党员的上诉权不能剥夺。一切的上诉书，任何党的组织不能扣压，关于思想原则问题，党员并可越级直接向中央或高级党委上诉。不过上诉的同志应该在下面充分说明自己的主张和理由、分歧的意见何在？弄清楚之后，才去上诉，不能在下面不说，到上面又乱说，蒙混上级，企图取巧，一切案件上诉之后，决定权即在上级，上级党委可取消、或减轻、或加重下级党委对同志的处罚。

在思想原则上，经过争论之后，如果还未在党内最后的取得一致，是可以通过多数决定的。在多数决定之后，少数同志如果还有不同的意见，在组织上行动上绝对服从多数的条件之下，是有权利保留自己意见的。

一定数量的下级党委或同志要求上级党委及领导机关召集适当的会议检查工作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上级党委应该召集会议来检查。

第六，应使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有明确的界限，同时建立适当的联系。不要将党内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外去使用，也不要将党外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内来使用，更不要利用党外的力量和条件来向党进行斗争与恐吓。一切党员要严重的注意和警惕，不要使暗藏的托派奸细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来进行破坏党的活动，一切党员在党内斗争中，不要被这些分子所利用。这只有严格的遵守党内纪律及正确的进行党内斗争，才能做到。

在党内，只能允许合法的斗争，只能允许思想斗争，一切违犯党章党纪的斗争方式，都是不能允许的。

第七，禁止党内的无原则纠纷。这须规定以下的一些办法：

（一）一切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及各个党的组织，如有意见，只能向相当的党的组织提出及批评，不允许在群众中乱说。

（二）一切党员对其他党员及党的负责人如有意见，只能当面批评，或在一定的组织中批评，不允许乱谈。

（三）一切党员或下级党委对上级党委如有意见，只能向上级党委提出，或要求召集会议检查，或向上级的党委控告，不允许乱说，或向下级传达。

（四）一切党员如果发现其他党员有不正当的行为及危害党的利益的行为时，必须向相当的党的组织报告，不得隐瞒或互相包庇。

（五）一切党员应大家提倡正气，提倡正派，反对邪气，反对一切不正派的言论与行为，给那些喜说闲话，喜欢广播、喜打听人家的秘密、喜造谣言的党员以严重的斥责。党的领导机关应该随时通令：禁止党员相互谈论某些一定的问题。

（六）各级领导机关应随时找那些喜欢说人闲话、喜闹无原则纠纷的同志来谈话，给以纠正及警告或其他处分。

（七）各级党委应尊重每个党员提出的意见，应经常召集会议，讨论问题，检讨工作，给党员以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

对于无原则纠纷，应该一般的禁止，不应去判断是非，因为是无原则纠纷，所以是无是

非可以判断的。

当着我们去解决同志间无原则纠纷的时候，决不要单从纠纷的本身去解决，而应该去检讨与总结那里的工作，正面的原则的去提出那里今后的任务、工作方针、路线和计划等。在这种总结、任务、方针、路线和计划中，批评到某些同志不正确的意见，然后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是否还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同志们还有不同的意见，那就变为原则的争论，把同志间的无原则争论提到原则争论的高度。如果同志们在原则上没有不同的意见了，就要求同志们大家在这种总结任务和方针之下，团结起来，一致为完成这种任务与计划而斗争。其他一切的无原则问题，要求同志们抛弃。应该从总结过去的工作、解决当前的任务、推动当前的工作中去解决无原则的纠纷。否则，无原则纠纷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我们决不要用审判官的态度去解决无原则的纠纷，这是无法判断、无法解决的。如果你判断不当，双方都是会不满意的，纠纷会继续存在的。

至如某人对某人信任不够，某人对某人尚有若干怀疑等等，这些问题一般不应提出来讨论，因为讨论是无益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在工作中、斗争中、实践中，才能解决，才能证明某人是可信任的，某人是无可怀疑的。

如果有同志在原则斗争中夹杂着若干无原则成分，那末我们只着重和他讨论原则问题，无原则问题不应着重去讨论，否则就会淹没原则问题。

如果有同志在原则斗争的掩盖之下去进行无原则斗争，那我们一方面应指出他在原则上对的方面，不要"以人废言"；同时也应适当的指出他的立场与手段的不正确，以免将原则斗争引上无原则斗争。

总而言之，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与斗争。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否则不行。道理讲清楚了，一切都好办，都容易办。我们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判别各种道理是否正确的尺度、是党与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从整个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切道理，一切主张，对于党与无产阶级的战斗有利的，对整个党与无产阶级的战斗长远有利益的，都是对的。不利的，都是不对的。无道理可讲的斗争，讲不出道理的斗争，就是无原则的斗争。不讲道理或讲不清道理，都是不对的，都不能得到正确结论的，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道理讲清楚了，最后还不能得到一致的话，那末谁个是违犯党与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也就清楚了，对于坚持错误的同志，采取组织结论就有必要了，问题就好解决了。为了要讲清楚道理，要能讲清楚道理，党内民主就是必要的，平心静气互相商讨的作风就是必要的。虚心学习，提高同志们的理论水准，弄清楚情况，调查清楚事实，细心研究问题等，更是必要的。粗心大意，主观主义，人云亦云，脱离实际，不查清楚事实……是绝不能讲清楚道理的。既不讲道理，或讲不清楚道理，结果就只有依靠蛮横，依靠手段，依靠组织上所赋予的权力，甚至依靠欺骗，来解决问题了。党内民主就更无必要了；因为党内民主，就是为了大家来把道理讲清楚之后，以便一致行动的。

我在这里所谓之"道理"，当然不是那些空洞的似是而非的道理，而是那些实际事实与被实践所证明了的真正的道理。某些知识分子是好讲空道理和歪道理的。他们不要事实也可以讲一大篇，从地下可以讲到天上，这是一种空谈、党八股，对党对革命是只有害处毫无益处的。所以在提倡讲道理的作风中，又必须反对空谈与党八股，提倡那些从实际出发的又是为了实践的客观的唯物的道理。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是唯物的"。

一切要讲道理！不讲道理是不行的！道理讲错了也是不行的！空谈更是不行的！这当然有些为难，但只有如此，才能够得上布尔塞维克。

布尔塞维克是讲道理的，是真理的支持者，是明白道理并且好好的和别人讲道理的一种人，而不是蛮不讲理的无理性的斗争家。

同志们！这就是我所提出的怎样进行党内斗争的一些方法。

我想我们同志应该依照这些方法去进行党内斗争，去反对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去检查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干部的党性。使我们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进一步的巩固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六　关于党校内部斗争的检讨（略）

附注：这篇文章因由电报发到延安，所以错字很多，今特校正，并稍加修改付印，望读者注意。

刘少奇注　1943年2月15日

（转自《整风文献》1949年5月订正本）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

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与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的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1）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2）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3）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

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4）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5）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予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6）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甲）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成份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

（乙）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丙）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

（丁）在不妨碍各同志所负主要工作任务的条件下进行此种学习。

中央书记处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本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为了这个目的，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于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则）的学习，借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端恶劣的毛病。

(二)各学校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具体目的，亦是缺点之一。为此特规定：

(甲)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

(乙)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

(丙)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

(丁)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

上述各校的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必须与各校具体目的相适合。

(三)为加强各校的具体领导及使各校教育与中央各实际工作部门联系起来，决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各校主管机关，应把自己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该机关业务的重要部分。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

(四)为实现各校具体目的，使党的有限精力财力收到最大效果，各校对招收学生应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各校及其主管机关应重新审查学生成分，凡不合各校具体目的的学生，以分

配工作或转学他处为原则。

（五）改善教员质量是学校办好的一个决定条件。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身担任指导。对现有各校教员，应根据新的标准分别审查处理之。中宣部应给各校专任教员以实际帮助，提高他们的质量。对教员的政治的与物质的待遇，应改善之。

（六）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是不可能的。凡文化水平太低而又需要与可能学习的县级营级以上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应先补习文化。这种补习，不应只限于识字之多少，而应包含阅读写作能力，历史地理常识，社会政治常识与自然科学常识的获得。文化班编制的标准，应依照学生的文化水平，而不依照其工作职位。

（七）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例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的等等）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比例应依各校情况决定之。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百分之五十（不需补习文化之学校，则专门课应占百分之八十），文化课程应占百分之三十，政治课应占百分之二十。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

（八）凡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的研究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在教学中，陕甘宁边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实际材料，应经过各种调查研究的方式充分的利用之。

（九）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学校当局及教员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学生的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这里所说的应用，是指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

（十）在学校政治教材方面，应该充分利用解放日报、中央文件及中央各部委出版的材料书，各种必要的课本及辅助读物，应该有计划的编印或翻印。中央宣传部应协同出版机关及财政机关制定1942年有关教育的出版计划及经费预算，交中央批准实行。

（十一）各校学生生活及教育设备，应按现有条件作必要的改善。

（十二）学校行政组织以短小精干为原则。学校内党支部的任务，是在保证学校教育计划的完成，纠正支部与行政并立的不正确现象。支部对学校行政的建议，可经党的路线提出，但不能出于干涉。在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内，应纠正党员包办一切的党化作风。

（十三）应在学校内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纪律、自励自治、团结互助的学风，而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好高骛远、武断盲从、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及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恶习。关于这种学风的养成，教职员应该以身作则。

（十四）本决定适用于延安。但本决定中的一切基本原则，同时亦适用于各抗日根据地。

（原载1941年12月20日《解放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同时，着重的认真的办理干部学校，抽调许多干部，进入各种干部学校，施以系统的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任务，对此决不应该稍有忽视；但最广大数量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还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财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办理很多的干部学校；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需的与可能的教育，实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该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门的充分注意。游击战争的特点，不但允许我们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的。

（二）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没有强调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则是很高的。政治教育虽一般的注意了，但或则不得其法，或则轻重不分，或则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则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则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

（三）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

（甲）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不论从事军事、政治、党务、文化、教育、宣传、组织、民运、锄奸、财政、经济、金融、医药、卫生及其他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必须学会与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每一部门的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必须指导所属干部有秩序的进行学习。而各级党委各级政治部及其宣传教育部门则负总领导的责任。其学习范围，包括如下五项。第一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例如军事部门精密调查敌友我三方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择其要点，编成教材，用以教育军事干部。其余类推。第二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例如财政工作人员应熟习财政政策与财政法令，锄奸工作人员应熟习锄奸政策与锄奸法令。其余类推。第三是关于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例如党的组织部门研究党的组织工作与干部工作的经验，加以分析和综合，抽出要点，写成文件，教育所属干部。其余类推。第四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识。例如党的宣传部门将

我党二十年宣传鼓动工作及其政策的变化发展，加以叙述与总结，编成教材，教育宣传工作干部。其余类推。第五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科学知识。例如军事干部研究军事学，医务干部研究医学等，每一部门均须研究自己的理论。对于上列各项业务学习，各部门领导机关负有供给教材、指导学习及考查成绩的责任，务使所属干部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逐渐达到学会与精通自己职业之目的。轻视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观点是错误的。

（乙）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二项。关于进行时事教育的办法，包括督促所属干部看报，对所属干部讲解时事问题，及以地区或部门为单位召集干部作时事报告等项。关于进行一般政策教育的办法，或为一切干部所应普遍学习的，例如将中央对时局宣言，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关于调查研究决定，及边区施政纲领等，督促干部阅读，加以解释及讨论等；或为虽与本部门业务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有使所属干部加以研究之必要者，例如向军事指挥员解释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等。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必须指出，好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倾向，也是不对的。又须指出，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虽为一切干部所必习，但其分量轻重应依各部门工作性质而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医生、技术专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其分量应该减轻，而对于党务工作人员，宣传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等，则其分量应该加重。关于政治教育缺乏经常性的毛病，党政军宣传教育部门应有计划地克服之。

（丙）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对于他们，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其教育与学习范围，暂定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课，宣传教育部门应负责解决课本问题。其教育学习办法，在环境许可的地方，必须一律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或一机关独办，或数机关合办，或采取轮训制，轮流抽调干部集中一地学习，都是好的。在这些补习班或补习学校中应有专任的教职员，辅之以兼任的教职员，在环境不许可的地方，则用小组学习制，以该机关某一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减少其日常工作使他兼任教员，亦可专用教员。文化班或文化学校，可分为初级的及中级的两种。初级班为不识文字及粗识文字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高小程度为合格。中级班为已有相当于高小程度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中学程度为合格。干部分班应以文化程度为标准，不以职位为标准。此外，某些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干部，虽属知识分子，但尚有补习国文及文法之必要者，则用小组学习制或其他办法补习之。为着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应在党政军机关内提高文化教员的地位，最好的文化教员应受到极大的欢迎与优待。对办理文化教育有功的人员应受到奖励。

（丁）高级及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例如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与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其具体进行，应采取高级学习组与中级学习组的办法，以自学为主，

加以集体的讨论与指导。

（四）四种教育的时间分配及课程分配，使之互相联系而不互相冲突与脱节，由党政军宣传教育部门负责调理之。

（五）不论任何工作部门，也不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一切材料均须由领导机关加以审查，任何包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毒素的东西，均须严格地加以清除或批评。

（六）在职干部教育是长期的，以发展其业务而不妨碍其业务并不妨碍干部健康为原则，在前方，尤其不应妨碍战争。在情况许可的地方或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在情况不许可的地方或部门，学习时间可以伸缩。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

（七）实行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订定之。

（八）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应以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上面。为着干部教育而需用的人员（教员与职员），应加以严格的审查，并应首先调给之。各级领导人员有参加教课的责任。为着干部教育而需用的经费，应最大量地供给之。

（九）对于从事干部教育的人员，尤其是教员，应加以教育。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订之。

（原载1942年3月2日《解放日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

（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

（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

（丙）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就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要把党的政策，党的工作，抗日战争，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党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

（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在党报上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的论争，可以容许一切非党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或建议的言论发表。另一方面，要有对于敌人的思想的批判。

（戊）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

中 宣 部

（原载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

去年七月以来，中央关于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及其他决定，最近毛泽东同志关于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及反党八股的报告，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为了使干部充分掌握中央决定与毛泽东同志报告的精神和实质，并在工作中运用这一武器，必须认识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的问题，如果以为讨论一次就解决了问题，是没有那样容易的事情的。

鉴于前次讨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和调查研究决定的经验，其缺点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行政领导机关很少有准备的有计划的组织这一讨论，而让一般支部自行讨论。其结果，多数支部只做到就文件讨论文件，没有了解文件的精神和实质，更没有进一步发挥这些文件，即是根据文件的精神实质来检讨本部门的工作及每个同志的工作与思想，发扬其成绩，纠正其错误，巩固党内团结，创造正确作风。但要这样做，单靠一般支部进行讨论是不可能的，单责备支部也是不可以的，首先必须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的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又鉴于个别机关虽是由行政方面领导讨论并检查工作，但没有在干部中预先研究清楚，酝酿成熟，及周密考虑各方面情况，以致发生某些不适当现象，今后亦应避免此种情形。因此，本部对于研究及讨论中央决定与毛泽东同志报告的方法，特有如下的决定：

(一)各机关各学校对于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为此目的，各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在考察别人时亦是如此，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察，避免有害的片面性。明哲保身、有话不说的态度是不对的，避开自己、专攻别人的态度也是不对的。

(二)各部门的(包括党的和行政的)负责人，在研究及讨论中央文件时，应有准备有计划的来领导这一研究讨论过程。然后好好的想一想本部门及本人的工作，并与他人交换意见，拟定检查工作的计划。然后着手检查本部门及每个干部的工作。然后做出改进工作的结论。这是由研究到检查到结论的不可缺少的程序。在检查工作时，不要泛泛的检查，而要切实的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而且要检查下面的与各个侧面的。不只是揭发与纠正缺点及错误方面，而且要发扬与巩固成绩和正确方面，并要估计到那一方面是主要的，那一方面是次要的。如

此，方能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与思想作风。

（三）讨论及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同时并重，不可偏废。只有上面领导，而不启发下面的积极性，是不能彻底讨论文件与检查工作的。只有下面的积极性，而没有上面的领导，会使讨论与检查脱离正确方向。发扬民主的程度又要依据各机关不同性质的情况有所伸缩。在某些机关内应组织检查委员会，此委员会内包括该机关领导同志及从工作人员中吸收的人员。在某些学校中，除领导人当然参加并负领导责任外，可以用选举方式，从学生中选出若干人参加委员会。在讨论中要发展争论，在规定检查期间内，不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都得自由发表，不得加以抑制。但领导方面应善于注意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不得将错误意见变成结论。

（四）研究、讨论与检查的目标是为着彻底了解中央文件的内容，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一切与此目的相违反的言论及行动，都是不正确的。因此，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一切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警语，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想改正，想求进步，即使是在进步中尚不免有错误，也应鼓励他，帮助他。要欢迎每一同志的微小进步，以此去争取他的完全进步。要使同志们懂得，我们是为此目的而去使用批评武器的。

（五）研究中央指定文件的时间，各机关规定为三个月，学校规定为两个月，然后开始检查工作。其检查工作时间，由各机关学校自行规定，取得上级同意。个别机关学校已经实行检查并得中央同意者，不在此例。

（六）在讨论与检查期间内可以出墙报，并设墙报委员会领导之。

（七）有非党人员共同工作的机关，应与非党人员一道进行讨论与检查。

（八）各机关学校讨论及检查工作的最后结论，须由上级机关批准，其重要者须得中央批准。各机关学校自己做结论后，在上级或中央尚未批准之前，对结论有不同意见者，允许向上级或中央申述其意见。但一经批准，便须服从。

（九）政府中、军队中的党组织研究及讨论中央文件的办法，完全适用本决定。但检查工作的民主范围，须依情况有所增减，其办法由西北局及总政治部规定之。

（十）参加讨论文件与检查工作者以干部及阅读中央文件者为限，学校中包括学生在内。

（十一）为了考察干部及学生是否确实了解中央文件及本决定的内容与意义，本部决定举行普遍考试一次，其办法另定。

（十二）规定下列十八个文件为干部（学生在内）考试的范围：（1）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2）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3）康生两次报告；（4）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5）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6）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决定；（7）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决定；（8）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9）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10）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11）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12）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13）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14）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15）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6）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17）宣传指南小册；（18）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五一节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今年五一正当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及中国人民抗战均已进入严重阶段，因此今年纪念五一必须与国际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斗争及我国人民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同时应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改造各根据地工会工作，深入肃清职工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的残余。在职工运动中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于不估计今天根据地职工运动的环境：经济落后工业缺乏的农村，敌人反复扫荡的战争环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的特点，硬将产业城市职工运动的一套办法搬到根据地来，不管有无工人及有多少工人，在乡村中普遍建立工会，有些地方甚至建立各种产业和职工总工会，并进行尖锐对立的斗争，这就是职工运动中主观主义的实质。职工运动中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于：某些工会中党员包办工会。当工人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时，派员发动工人组织工会是正确的，但工人群众已经起来，就应当实行民主选举工会领导机关；吸收非党职工参加工会领导机关中工作，然而，不少工会工作的党员仍继续包办的作风，以致造成某些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职工运动中的党八股表现于工作计划宣传教育的不切实际，特别在教育方面，在某些公营工厂工人教育中不问对象，夸夸其谈，大讲经济学，马列主义，哲学，而轻视与业务有关的技术教育，忽视反对行会主义思想及工人中某些狭隘思想的教育工作。

为克服职工运动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残余，第一必须进行客观环境的调查研究，研究具体的工作环境，研究劳资关系在抗战中的变化，分别研究每个资本家和雇主，研究公营工厂管理制度和生产技术的改进，研究工人成分在抗战中的变化；第二必须注意吸收工人中积极分子，特别是熟练工人参加工会工作，发扬工会民主作风，吸收他们检查工会工作，只有经过他们才能团结全体职工。为着吸收熟练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工作，在工会领导机关中，应实行共产党员最多只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第三必须克服空洞的工作作风及夸夸其谈的教育内容、方式、方法，去教育一般工人群众。

整顿三风是改变思想作风的长期斗争，并不是经过一个五一动员就能解决问题的，而只是经过五一动员作为我们工作的开始。因此进行这一工作必须有充分的领导和组织，各职委和工会党团必须根据中宣部决定与实际情况规定自己学习检查工作的计划。

我们着重指出，整顿三风，必须与目前抗战动员配合起来，在目前抗战形势日益困难，敌人反复扫荡的战斗日益残酷，需要我们具有百倍坚定的信心和斗争意志，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武装组织，和各种生产建设，克服这一困难局面，只有这样去纪念五一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将会变成应景式的纪念。

五一纪念仪式，应以节省人力、物力为原则，各根据地可按照当地情况召集五一群众纪念大会或晚会。上述工作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原载1942年４月22日《解放日报》）

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

（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日）

《解放日报》社论

两条战线斗争，这口号我们是听得很熟了。共产党是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不和错误的偏向作斗争，正确的路线就不能执行，党也就不能发展。侵犯党的正确路线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错误思想的来源只有一个，而表现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左的，一种是右的。要保证正确路线的执行，就要反对两方面的偏向。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办法，是从全面的思想方法来的。所谓全面，就是要照顾到两面，不能只看见一面。两条战线斗争的精神就是反主观主义的精神。任何事情，没有两条战线的斗争，都办不好。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更非贯彻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可。

我们党二十一年发展的历史，就是两条战线斗争的历史。反对陈独秀主义，反对李立三路线，遵义会议，开除张国焘，就是最重要最特出的例子。经过了这些斗争，我们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才得提高，党的战斗力，才得加强。但在某些党员中，对于两条战线斗争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不够普遍，因此，当整顿三风进行之时，对此问题，还有加以说明和提倡的必要。

整顿三风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掌握二十二个文件中的正确方针，来检查全党思想的，工作的实践，发扬其正确的，纠正其错误的。这里首先是照顾到这样的两方面，又要掌握理论，又要改造实践。整顿三风，就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活生生的统一。只顾理论，不顾实践（象过去有些地方离开工作讨论文件那样）是不对的。只顾实践，不顾理论（象最近延安个别机关未将方针研究清楚就开始检查工作那样）也是不对的。四月三日中宣部决定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将掌握理论与检查工作，正确结合起来。既反对不顾理论，又反对不顾实践，这就是中宣部决定的主要思想脉络，而这是充满着两条战线斗争精神的。

现在是延安各机关学校集中力量研究文件的时候。研究文件的目的，是掌握文件的精神和实质，不仅懂得，而且会用。中宣部决定告诉我们，对于文件，必须精读。有些同志只有粗枝大叶的习惯，却没有精读的习惯。所以要精读就要反对走马观花，“一目十行”的办法。但有些人在精读时，又走过了头。他们把注意力放到字句的钻研和争辩上去了。结果，变成了咬文嚼字，在词句上钻牛角的偏向，这也是不对的。精读不是粗枝大叶，但也不是咬文嚼字。这两种办法都不能掌握文件的精神和实质，所以都是应当反对的。中宣部决定又告诉我们，研究文件要和反省自己联系起来，才能将文件领会贯通。而这里也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就文件研究文件，研究来研究去，还是文件是文件，自己是自己，不发生关系。另一种偏向，则是对自己作了不恰当的估价，弄到失去了信心，这也是不对的。

整顿三风的第一步，是研究文件，第二步是检查工作。在检查时，也要反对两种偏向。不能把眼睛只望着上面，以为整顿三风仅仅是检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没有什么关系。但也不能只检查下面同志，而不检查领导者。检查的范围，是整个机关和学校的工作，同时还有每个同志。检查中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仅纠正缺点，而且要发扬优点。有些同志以为检查就是揭露缺点，优点可以不说。不知专门讲缺点，使人感觉一无是处，只能破坏工作信心，所以必须发扬优点。

要保证研究文件和检查工作进行得好，还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是有正确的批评。民主集中制就是既要民主，又要集中。只有下面的民主，没有上面的领导，就要造成无政府状态，什么事情也办不好。反之，只有上面的领导，没有下面的民主，则缺点无从揭发，工作就不能改进。至于民主程度的伸缩，则要看斗争的具体条件，一切以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为标准。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在许可讨论的过程中，在问题未决定以前，任何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都可在一定的时机与地点发表，一经决定，则任何人必须无条件服从。这里也是需要两方面注意的。

关于批评的方法，中宣部决定指示我们，一方面要严正，彻底，尖锐，同时又要诚恳坦白，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如果没有前者，则错误不能彻底揭露，会变为无原则的和平共居，结果不能帮助同志，也不能团结同志。如果没有后者，则批评必至过火，必至有损于党，也是不能帮助与团结同志的。在对人和对己问题上，也是一样。专攻别人，避开自己，不对；明哲保身，有话不说，也不对。这里也是要从两面来进行斗争的。

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不是折衷主义的方法。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对在时间中运动着的事物规定一个适如其分的相对的安定性，它反对过右的与过左的两种说法，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与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质相违的，都是主观主义的。折衷主义则是庸俗的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调和主义的方法，它调和矛盾的两个侧面，求得和平共居而不解决矛盾，它不能规定事物的性质，而只举出事物互相矛盾的标志。

所以我们党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反对不正确思想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侵犯，使党能够得到在正确路线基础上的统一。而折衷主义则决不能得到这种统一。

因此，两条战线斗争，是不能给人乱戴帽子的。这个斗争的进行，要有最大限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提倡同志们勇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勇于怀疑和勇于批评的精神。但决不能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弄得到处都是偏向，到处都要斗争。在两条战线斗争上任何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都可打击党员群众活跃的积极的精神，对党都是不利的。

正确的两条战线斗争，是党的生活中一天不可缺少的东西。在整顿三风进行中，必须加以提倡，并且正确实行，以保证我党伟大改造运动的成功。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

整顿三风学习运动，从四月二十日在延安进行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成绩（参看解放日报社论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已广播），根据延安的经验，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全党干部党员思想的改造和工作的改进都是有极重大意义的。因此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有计划的领导这一学习运动

关于整风学习运动的进行和计划，除参考四月三日中宣部的决定外，根据延安的经验，应采取下列的办法：

（一）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成立学习总委员会，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

（二）凡能阅读文件者均吸收参加，分成小组。

（三）一切干部学校凡能阅读文件者，暂行停止一切其他课目（军事学校则暂行减少军事课目），专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

（四）机关部队凡能阅读文件者，均应尽可能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学习时间，延安规定每日上午为学习时间，各地应依具体情况而定。但必须注意，不要忘记战争环境，不要忘记敌人的可能袭击。

（五）依情况之可能，出版学习报刊（油印或铅印）讨论问题解答问题。并依情况之可能各机关学校出版墙报。

（六）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时期中，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

（七）学习时期规定为四个月到五个月，从何时起由各地自定，各地因情况不同，学习时期可以依具体情况伸缩之。

（八）有些已经开始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地方，其领导办法如果是与本指示及四三决定相符合的则照原计划进行。如果是不符合的则须加以改变。

（九）附件一，中央直属系统学习计划，附件二，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作为各地领导学习的参考。

（附件一）　中央直属系统四个月研究廿二文件的计划

四月廿日起，浏览全部文件，作为粗读阶段，其中讨论过四三决定和毛主席二月一日的报告。五月廿日起为精读阶段，计划如下：

——从五月二十日起到九月二十日止——

甲、整顿学风问题（反主观主义）：一、毛主席二月一号整顿三风报告（参考二月廿二日解放日报康生同志的传达）；二、毛主席关于改造学习报告；三、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论布尔塞维克化第二条（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三星期）；四、中央调查研究决定；五、农村调查序言二；六、古田会议决议中论唯心观念；七、论布尔塞维克化第三、四条（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一星期）；八、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教育政策部分；九、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决定；十、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一星期）。

乙、整顿党风问题（反宗派主义）：一、毛主席二月一号报告中反宗派主义部分；二、中央增强党性决定（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一星期）；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五、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六、论布尔塞维克化第九条（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三星期）；七、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八、反自由主义；九、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十、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民主；十一、联共党史第三、四、五条，论布尔塞维克化第八、十、十一条（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二星期）；十二、毛主席在参议会演说；十三、联共党史结束语第六条，论布尔塞维克化第六、七条（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一星期）。

丙、整顿文风问题（反党八股）：一、毛主席二月八日反党八股报告（参考三月八日解放日报康生同志的传达），（研究时间为一星期）；二、宣传指南（研究时间为一星期）。

丁、综合研究：一、毛主席改造学习报告；二、毛主席二月一号与二月八号报告；三、联共党史结束语全部；四、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全部；五、中宣部“四三”决定；六、斯大林领导与检查（以上文件研究时间为三星期）。

以上甲乙丙丁四项从五月二十日起到九月二十日止，共研究时间十七星期。

九月二十一日到九月三十日为考试与总结学习经验，准备检查工作时期。

附记：

一、以上计划，关于文件之编列与时间多少系大体规定，具体实施，各单位按具体情形之不同，可予伸缩增减。二、在五月二十日以前已讨论之文件可再加以复习。三、此计划适合于所有阅读文件之干部，至于需上文化课者，仍按以前所规定之八个文件，各分委酌情增加自行规定进行之。

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

（附件二）　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

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全延安学习。由中央总学习会每周或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会中讨论学习问题，并通知时事政治及工作等问题。中央直属机关成立一分区学习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同志负责，各机关成立学习分会。军委直属系统成立一分区学习委员会，由王主任、陈云负责，下成立几个中心学习组，如参谋部中心学习组、政治部中心学习组、后勤部中心学习组、专家中心学习组等，各机关部队成立学习分会。边区系统成立分区学习委员会，任弼时、高岗负责。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级干部均成立中心学习组（甲组），自己把文件学好来领导其他干部学习。此外有中级学习班（乙组）与普通学习组（丙组）。甲组人数较少，但是领导的中心。乙组人数最多，都是中级干部，是学习运动中，最应注意的部分，甲组同志应分别参加之。丙组人数不很多，是文化较低组，又应该学习文件的若干干部，则采取上课的办法为主。延安共有一万零九十八人参加这次的整风学习。

（原载1942年6月12日《解放日报》）

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

——为党的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

刘　少　奇

中国共产党，中国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进步的政党，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是二十二个周年了。这是伟大的二十二年。在世界上，在中国，无数的伟大事变，是在这二十二年中经过的。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三次伟大的革命战争。第一次大革命与北伐战争及现在还在进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是与中国国民党共同进行的，而十年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战争，则是在我党单独领导之下进行的。这三次革命战争对于我党来说是没有间断的一直连续进行到现在。许多共产党员十多年来就一直没有放下过武器。在这一点上也就说明白：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是与武装斗争分离不开的。

我们的党，在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连续不断的全国性的革命战争中，是经过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的：它经过了多次的胜利，也经过了多次的挫败。它是走着非常迂迴曲折的道路，以至于今日。但它还能够屹立于伟大中华民国的国土上，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与历史事变中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唯其因为它是走过了各种迂迴曲折的道路，经过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所以他也就把自己锻炼得特别坚强，它也就具有各方面的特别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可以说，它在这二十二年中比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共产党都经历了更多的重大事变，有更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论是武装的与群众的，国内战争的与国际战争的，公开的与秘密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党外的与党内的……各种复杂形式的革命斗争，我们的党都经验过了，都有丰富的经验。而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我们的党有各方面的极端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把它总结起来。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来很好的总结我们党在各方面的斗争经验，还是今天我们全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为这些经验的马列主义的总结，是团结全党、教育全党、提高全党以至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环。只要我们的党员能够真正懂得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那他们就会要增加无限的信心与勇气，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工作大大的推向前进，把我们的党大大的推向前进。他们就能够避免许多在历史上已经犯过的错误，把他们的工作过程与革命过程缩短许多倍。必须用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革命者，用中国党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党员，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实际的效果。如果抛开如此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如果轻视我们

党二十二年来在伟大历史事变中的斗争经验，不用心研究这些经验，不用心向这些经验学习，而只去学习离开我们较远的外国革命经验，那就是轻重倒置，那就要使我们再走许多弯路，再受许多挫折。

二十二年来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是极丰富的，是各方面的。现在我不能一一加以说明。但是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真正的布尔塞维克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中国也有许多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然而何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何者又是假的马克思主义与假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是在中国革命群众中，并在中国共产党内多年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是有真假之分的。这种真假之分，并不以各人的主观自命为标准，而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如果我们的党员不了解这种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标准，而不自觉的盲从在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去进行革命，那是再危险也没有了的事。这种经验应该是我们党的各种痛苦经验中最痛苦的一个经验。过去我们党遭遇了许多不应有的挫折和失败，走了许多不必走的弯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党内存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党员不自觉的盲从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以致使这些人占住了某些组织某些运动的指导地位，甚至在某种时候占住了全党的指导地位，因而把革命运动引上痛苦的困难的道路。这是我们全体党员必须引为深戒的一个痛苦经验。

中国共产党员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以及宣传组织工作的能力，并不弱于任何一国的共产党。我们对于各种工作，历来就是做得很好的。可以几十万几百万的组织群众，可以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可以在敌后那种艰苦与没有任何援助的条件下组织根据地坚持抗战六七年……。中国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与艰苦工作精神，是很可钦佩的。然而我们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关于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思想上的准备，是很不够的。在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就是在革命运动的指导上还不免发生错误，因而就使运动遭到部分的有时甚至是严重的不应有的损失。这一个历史教训，我们必须记取，并且必须在今后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对于革命运动的指导在各方面不发生严重原则的错误，那就等于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我们有很好的革命精神与艰苦工作精神，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一般又是很好的，只要加上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指导，那革命就一定要逐步的走向胜利。

然而，要怎样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各方面对于革命运动的指导不发生严重原则的错误呢?这就须要我们的党员首先是我们的干部能够辨别马列主义和各种马列主义者的真假，就须要在革命的队伍中，在党内，粉碎各种假马列主义的体系及其派别，就须要很好总结我党二十二年来丰富的历史经验，就须要很好的进行学习，提高我们的嗅觉，就须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的环节和部门中去。

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在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就有真假两派马克思主义者。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充满着这两派马克思主义者斗争的历史，那末，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也同样的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的充满着这两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这是我们一切党员必须彻底认识明白的。

还在二十多年前，斯大林就很恰切的描写过这两派马克思主义者。这对于中国也是很恰切的，现把他的全文引在下面：

“现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底旗帜下面做工作，都是把自己当作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派。可是，这两派人究竟还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在两派中间，还横着一条鸿沟，因为，两派人底工作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派人，照例只是在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照例只是在口头上得意地宣扬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会或者不愿意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会或者不愿意实行马克思主义，他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活泼的革命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板的公式。他们不拿经验、不拿实际工作的计算来做工作的根据，却拿那些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摘录下来的语句来做工作的根据。他们不在分析实际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针，却在相同的事情和历史上相象的事情里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针。言行不符——这就是这一派人的基本弊病。因此，他们总是灰心失望，始终都是不满意于那个常常欺骗他们的'厄运'。这一派人的名字，便是孟塞维主义（在俄国），就是机会主义（在欧洲）。梯什科（约西里斯）同志在伦敦代表大会上给了这派人一个很中肯的估计，他说：这派人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

第二派人却正是相反，第二派人把问题的重心，由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而移到实行马克思主义，移到将马克思主义化为实际。规定适合于环境的方法和手段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因环境发生变更而变更这些方法和手段，这就是这一派人所最注意的事情，这一派人不是在历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象的事情里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针，而是由研究周围的情形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针。在工作时，他们不是拿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是拿实际经验来做根据，拿经验来审查自己的每一步的工作，在自己的错误中来学习和教训别人去建设新生活。所以，在这一派人的工作中，言行总是一致的。马克思的学说，完全保证着自己的活泼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说过，我们不应当仅限于说明世界，而且应当更进一步去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遵守这几句话的。马克思的这几句话，完全和这一派人相符合。这一派人的名字，就是布尔塞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人的组织者和领袖，便是列宁。"（"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解放社版，一九——二一页）

斯大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这两派人虽然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做工作，都把自己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两派人的工作方法，也就是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一派人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孟塞维主义与机会主义者，他们照例只在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口头上宣扬马克思主义，而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会实行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公式教条。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不拿经验与对实际工作的计算来做根据，而拿书本来做根据。他们在决定指示和方针的时候，不是从分析具体实际生活中去求得，而是从书本上、从历史上相象的事情或相同的事情里面去求得。他们言行不符，口讲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做得就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是欺骗他们的，他们总是灰心失望，死气沉沉。

另一派人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列宁主义者，布尔塞维主义者。他们是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将马克思主义化为实际。他们特别注意规定适合环境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变更。他们在决定指示和方针的时候，不是在历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象的事情里面去求得，而是由调查研究周围的情况中去求得。在工作时，他们不拿书本上的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拿实践的经验来做根据，并拿经验来审查自己每一步工作，在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和教训别人来推动工作前进。这派人言行一致，口讲马克思主义，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仅说明世界，而最着重的是去改造世界。他们经常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活泼的、革命的力量。

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内，历来也就是存在的。前一种假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陈独秀、彭述之和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李立三路线，就是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是教条主义。这些东西，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孟塞维主义，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后一种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年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

我们的同志和干部必须明白，必须提高警惕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存在着一条孟塞维主义的路线及其思想体系的。从陈独秀、彭述之、李立三以及后来的各种机会主义与教条主义，他们在各个时期中的各种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在组织上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联系，然而他们的实质，他们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是有其一贯系统的，他们给予党的损害，给予中国革命的损害，是十分严重的。中国的孟塞维主义，除托陈派有其欧洲托派衣钵真传外，其他形态的孟塞维主义，是并没有欧洲社会民主党及俄国孟塞维克的衣钵真传的；而是从中国社会的小资产阶级中，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自己生长出来的。所以这些人与欧洲社会民主党及俄国孟塞维克比较起来，在形式上有许多特点。这就是中国的孟塞维主义在形式上是以"反孟塞维主义"出现的，是以"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国际路线"等等形式和词句出现的。他们在这些美丽的形式和革命的词句掩盖下，来进行实际的反对列宁主义——布尔塞维主义的斗争，来宣传与实行实质上的孟塞维主义。再由于我们许多党员和干部的理论水平低下，嗅觉不高，不能在实质上辨别其为孟塞维主义，就常常为他们那些美丽的形式与革命的词句所蒙蔽。他们就常常能够一时的取得许多党员和干部的赞成，而攫取到党的或某些部分的领导地位。他们还特别发展半封建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并与中国社会中的流氓手段相结合，如是他们在党内的为害就特别严重，就特别表现其肤浅庸俗，表现其两极性与两面性。这就是中国孟塞维主义的主要特点。

中国党没有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但存在着中国的孟塞维主义体系的传统。

要识别这种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假布尔塞维克，是不能仅仅从他们的词句，从他们表现的形式，去识别的。他们可以在言语上表现得比什么人都有更多的马列主义，在形式上也可以表现得比什么人都更革命、更艰苦、殷勤与和蔼。然而他们最怕实践的考验，最怕用批评的精神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因此，必须从他们的实践中，从他们的工作中，从他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中，从他们工作结果的检查中，去识别这种人，去暴露这种人的真相。因为他们是口讲的马列主义者，而不是实际行动的马列主义者，他们的实际行动照例是不受马列主义原理的严格指导的，他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总是拿书本子来做根据，拿马、恩、列、斯的成语，拿什么决议上的条文来做根据，即是拿一般的概念、一般的理论来做根据，而不拿实践中的经验和对于实际工作的计算来做根据。他们在决定问题、决定方针的时候，总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调查研究周围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公式出发，从历史上的类比出发，或者从苏联、从西欧各国、从其他什么相象事情出发。他们在实践中是唯心论者。因此，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是常常要犯错误的，他们是不能最后把工作做好的，他们在实践中的结果，是必然要与他们最初的愿望、最初在口头上的宣言相违反的，如果你注意到他们的工作方法，用批评的精神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及其结果时，就要暴露他们的本质。毛泽东同志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对于这种人是有过严格批评的。

然而，这种人的危险性，就在于他们那大堆的马列主义的词句、布尔塞维克的外衣及其先

天的两面性，他们可以吓唬、蒙骗许多工农同志及幼稚的青年同志，甚至就是很老练、很有工作经验、但理论上的识别能力还很差的同志，也常常被他们所欺骗所俘虏，因而他们就可以把党的事业弄到很危险的地步。

党的过去的历史，是充满着布尔塞维克路线与孟塞维克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存在着这样两条路线和两种传统的。一个是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另一个是孟塞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前一个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后一个是以党内各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这两条路线，两个传统，是经过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内容是极端丰富的。在这种斗争中，党内的错误路线，孟塞维克的路线，虽然也曾经在几个短的时期内占了上风、得到过暂时的胜利、但大多数的情形总还是把错误路线克服下去。我们的党虽然常常克服工作中的错误路线，但在思想上的孟塞维主义的体系，总是没有彻底被克服过，没有彻底被清算过，没有给它以致命的粉碎的打击。因此，这种思想，这种传统，总还是在党内残存着，到了某种时期某种条件之下，它又发展猖獗起来，又危害我们的党。

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的残余，应该很好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只有这样，才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能实现我们党的队伍的统一和纪律，才能保证我们全党经常的正确的领导，才能在今后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我们就不能在今后艰苦复杂伟大的时代中，很好实现我们先进政党的历史使命。

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反映，是它的一种高级表现形态，是成了某种体系的。要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的思想及其体系，就要在党内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清除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就要使我们的党员能够在一切形态上区别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做了，有些地方还正在做。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去年以来所号召的整顿三风的运动。这种整风运动，是党在二十二年的历史中空前未有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批评运动。它把我们的党向布尔塞维克的道路上空前的推进了。我们应该在整风的这种基础上，进而总结我们二十二年来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思想体系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残余，把我们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提到更高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在党的建设上今天的中心任务。

中国党的历史，应该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党内各派机会主义的历史，决不能成为党的历史。党内孟塞维主义的体系及其传统，决不能成为党在思想上的体系及其传统。党的历史，是与这种体系传统斗争并将其克服粉碎的历史。为了肃清这种传统的残余，给这种传统以暴露，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没有必要替它掩蔽，替它否认。这对于党是有害无益的。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

但是，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应该更加提高警惕性的，就是年来我们的敌人派遣了他们一些特务分子混进到我们党内来。这些人也是以马列主义伪装起来在党内出现的。他们与前一种假马列主义者是有区别的。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对于这种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必须把他们清查出来。这就是要在党内分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而在党内肃清孟塞维主义的残

余，则是在党内分清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这两种界限，都应该分清楚，但分清的方法和手段应该不同。前一种是用审查干部和党员的方法来分清楚，而后一种则是用整风与总结经验的方法来分清楚。

用马列主义来清算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及其体系，清查内奸，这是我们目前巩固党提高党的两大工作。这两大工作的胜利完成，我们就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自己，我们就能以完全巩固、完全准备好了的姿态，迎接伟大光明时期的到来。

掌握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武器，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的残余，我们是不可被战胜的。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化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的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的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待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它威逼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样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的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

首长负责，就是将大多数有问题的人，留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信任与责成当地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审查（但若干被坏人掌握的部门不在此例，对于这些部门，必须首先改造领导）。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这个工作的。对于有问题的人，责成普通机关，即各党政军民学机关自己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八十；送反省机关，例如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十；送保卫机关，例如社会部、保安处、军法处处理的（逮捕审讯）约占百分之十。三者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又互相交流，某些人由普通机关送入反省及保卫机关，某些人在反省与审查清楚并表示改悔之后，又由反省及保卫机关送回普通机关。凡在普通机关及反省机关的特务分子及嫌疑分子，大多数均照常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及学习岗位上，仅为保障机密，防止破坏及自杀，才将某些人移动工作，或加以监视。各机关学校均严密地组织自己的自卫军，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员携带通行证得互相出入外，一切有问题的人都暂时禁止个人外出自由，只许随大众集体行动。

自己动手，就是从当地最高负责同志至各伙食单位的首长，均须亲自参加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及研究，以便收集经验，指导运动。空口指挥，坐着不动的官僚主义态度是错误的。

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就是从每一伙食单位的全体人员中以最可靠的一个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绕着他组织几个小核心，再围绕着小核心组织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围绕着这些核心的乃是广大的群众。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均须经过核心组的谈话与群众的质问、劝说、斗争及开展热烈的坦白运动。各级核心，即是各级学习委员会及支部委员会与小组长，这些人须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从整风及审查干部过程中，逐渐的形成起来的。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各级领导人员，除在当时当地一般地提出审查任务并推动大家去做之外，还必须选择个别单位，集中力量，给予突破，才能取得经验，造出范例，推动其余。然后再对所有各单位一个一个的给以具体的总结与指示。经常不断耐烦耐劳，审查工作才能彻底收效，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调查研究，就是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人员平日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在慎重考虑后的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的，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分清是非轻重，就是用调查研究方法，第一分清其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它党派的人们，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及犯错误者）与两条心的人混为一谈；第二分清其犯罪之轻重，或者是情节很轻的普通分子（占多数）或者是情节较重的中等分子，或者情节很重的头等分子（后二者占少数）。不可以为凡被提出的，一定都是特务，或都是重要特务。每一个被提出的人，虽被提出或被逮捕，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及是轻是重，全靠我们用调查研究方法，搜集材料，加以分析，才能清楚，这就是分清是非，分清轻重的任务。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

争取失足者，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审查出二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应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则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分子是能够被我们争取转变为一条心的，许多人转变的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争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

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况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是比杀掉为有利的。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豫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培养干部，就是应该从一切参加审查及被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察、讯问、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论与技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四千至八千人，善于这一套。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至八月止，延安头一期参加审查工作的一万干部及数千杂务人员中，已经培养出二千多个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保卫工作神秘化的观点，才能使特务不易再侵入，才能为将来准备大批的锄奸干部，肃清、争取并改造许多的特务破坏分子。在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应该包括党员与特务两部分人在内，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培养共产党员（这当然是主要的），而且要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这个政策，日本及国民党也是很早就采取了，用以对付共产党，并且收到了成效。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好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

教育群众，就是在此次审查干部以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中，一定要发动广大群众与核心骨干一起进行。这样不但培养了干部，而且使群众有了充分的经验，积极性发扬了，眼睛打开了，觉悟性提高了，党才真正巩固了。如果没有群众的发动、参加、受锻炼与提高觉悟，党的真正巩固是不可能的。脱离群众，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审查干部，也一定是达不到目的的。我党在过去审查干部问题上所犯极端恶劣的形式主义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组织问题上的右倾观点与审查干部时的脱离群众。为了培养干部与教育群众，一般的上级不可代替下级，此地不可代替彼地。例如中央局或区党委，如果代替下级审查一切有问题的人，一则全部代替是不可能的，二则即使可能（例如代替下级审查大部分干部），也会使地委、县委、区委及乡村支部袖手旁观，毫无审查干部、审查党员、审查其它坏人肃清特务分子的经验，并使有问题的人脱离当地群众，脱离工作岗位，而不易审查清楚。从沦陷区调人来根据地审查是必要的，在根据地内抽调一部分人集中审查（例如进党校、抗大、开整风班）也是必要的；但一般的代替下级，代替他处，则是错误的。为了防止下级发生偏向，上级事前应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并派人下去帮助，调人上来研究，密切注意，毫不放松，这样就可以解决偏向的问题。

以上指出了主要的方针与经验，希望各地同志研究采用，并依据你们的具体环境，创造你们自己的经验。

根据各地材料，各地整风须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审查干部可在整风中掺杂着进行，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经验，并巩固这些机关，然后逐渐推广于其它部门及其它地方，决不可普遍地同时进行。在那些还没有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在领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的部门地方，便决不可轻易发动审查干部。这类地方，仍然应该着重整风或改造领导，准备审查干部的必要条件。

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

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地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原载 1943年10月22日《解放日报》）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个真理已为各根据地的无数事实所证实。因此各根据地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把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问题，看成是有普遍原则性的，而非仅适用于某一特殊地区或若干特殊个人的问题。无论是在前方后方，也无论已否参加实际工作，都应该找到适当和充分的时间，召集一定的会议，讨论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联系各地区各个人的实际，展开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各地方与部队中党的领导机关，应该普遍负责领导所属范围内文艺工作者的这个学习运动，并检讨本身过去对文艺工作的自由主义或认识不足等缺点。须知只有经过这个学习与批评，才能使真正属于人民群众的文艺与文艺家成为可能，而这种革命文艺与革命文艺家的产生，对于根据地人民事业是有重要意义的。又须知在今天的文艺战线上，与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其他战线一样，不但存在着保持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分子，而且还混有若干为敌人反动派所派遣的奸细破坏分子，他们过去利用我们的尊重文化人（这是对的）与若干同志中的自由主义倾向（这是错的），散布思想毒素，进行反对人民的破坏革命队伍与革命文艺队伍的纯洁性的活动；不经过认真的学习运动并使这些分子觉悟，则文艺事业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巩固都将遇到困难。

（三）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其他部门的工作虽不能放弃或忽视，但一般地应以这两项工作为中心。内容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这是融戏剧、文学、音乐、跳舞甚至美术于一炉的艺术形式，包括各种新旧形式与地方形式），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其已发展者则应加强指导，使其逐渐提高。各根据地有演出与战争完全无关的大型话剧和宣传

封建秩序的旧剧者，这是一种错误，除确为专门研究工作的需要者外，应该停止或改造其内容。报纸是今天根据地干部与群众最主要最普遍最经常的读物，报纸上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长短通讯，在紧张的战争中是作者对读者的最好贡献，同时对作者自己的学习与创作的准备也有大的益处。那种轻视新闻工作，或对这一工作敷衍从事，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宣传而不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态度，应该纠正。由于过去许多根据地的文艺运动都曾不适当地强调提高，故在执行这两项工作或其他任何工作中，目前的方针都应该特别着重普及方面，如戏剧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应放在指导地方与部队的群众剧团或群众戏剧活动，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在这一方面，专门化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刻觉悟到过去对这个任务的不认识或认识不足，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今后应以十分的热情与恒心来开始这个工作，在陕甘宁边区工农（首先是工农干部，八路军与工厂工人）的学习条件较好，更应以大力有系统地进行之。

(四)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中央总学委对此已有明确指示。鉴于根据地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受过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文艺的深刻影响的，在他们中间尤须深入地宣传这个文件。

中共中央宣传部

(原载1943年11月8日《解放日报》)

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提纲——

贺　龙

（一）　为什么要提出整军？

1．这与全党一样，因为我们部队还存在着三风不正的残余，为了克服三风不正的残余，执行中央的号召，达到改进工作，团结全党全军的目的，我们需要整军。

2．因为我们要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根据边区人力物力的情况，我们要贯彻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使部队达到精兵的目的，（部队组织精干，质量提高），把边区建设好，把全国友军团结好，来支持前线抗战，准备反攻。

3．根据党中央“九一”决定党的领导一元化思想，要求边区军队统一在党西北中央局领导下，以及所有建制部队在联防司令部统一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统一作风，整顿编制，所以也需要整军。

我们总的目的，在于使军队更进一步正规化、党军化。

（二）　整军要整些什么？

抗战五年来，边区部队在党中央、军委、西北局、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和培植之下，由于我们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及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奋斗，已经胜利的完成了保卫边区的任务。并且在建军及生产建设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由于边区环境的特点，以及主观上的种种原因，我们部队中产生了一种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是严重的，是普遍增长着的。部队在政策思想上、组织原则上、工作作风上，各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与弱点，甚至有原则错误。其表现：

1．在政策思想方面：

甲、有些同志还不能有系统的了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存在着等待发展形势之到来，希望打出去的思想，耐不过艰苦坚持的局面，缺乏长期保卫边区的决心。这种观点既不符合当前实情，又不适合党的团结抗战，并在抗战后还需要争取合作建国的政策。这种“左”的思想，必然影响放松部队艰苦巩固工作、生产建设工作，使部队情绪降低，逃亡严重，战斗力相对削弱。也就会不愿去彻底执行精兵简政，和不直接参加边区的建设，也就会因为人数减少，经济困难，而埋怨上级，责骂党与政府。这是违犯党的基本政策的思想，是必须克服的。

乙、由于对统一战线思想缺乏深刻了解，也同样影响到对建设根据地缺乏深刻认识，因

而没有深刻认识到部队参加生产，也就是为了建设根据地。边区部队所处环境，与前方部队大有不同，前方部队主要是战斗任务，供给不能不主要的依靠政府解决；边区部队是后方环境，一般说生产与教育任务，就等于战斗任务。同时军队有庞大生产力，是必须而且是能够生产自给的。解决军队的困难，也就解决了根据地困难的重要部分，也就是实际的参加了根据地的建设，也就是完成了党提出建设根据地的任务。不从军队积极参加生产来解决困难着眼，而以各种困难的不能解决，埋怨党与政府，责备老百姓，是错误的。同时有些同志不把军队生产服从根据地建设的目的，发生只为自己，不顾政策法令，只有分散，而无集中，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等偏向。这也就是使根据地建设受到障碍，使军民关系不协调，以致无法实现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这个错误观点，也是必须克服的。

丙、由于对统一战线政策及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均缺乏有系统的深刻的认识，因而对其他许多政策问题，在我们部队许多干部中认识也不深刻，或者根本不懂得，甚至采取漠视态度。因而违犯政策的事件，层出不穷，在边区建设上，部队建军上，以及团结友军及各党派人士上，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这种忽视各种政策法令的现象，必须在部队中进行深刻的政策教育，来加以克服，否则是表现我们政治上的软弱，将不能实现我党的政策，这是我们领导干部所应该警惕的。

2. 在组织原则方面：

甲、一元化思想，亦就是统一的思想，在我们干部中甚至于领导干部中，过去了解是不深刻的，甚至不愿意去了解。中央“九一”决定中指示过去有些根据地领导不统一，主要的是由于该地主力军某些领导同志，对于该根据地之建立与坚持，缺乏正确统一认识。边区过去领导的不统一，如中央指示出的应由军队负主要责任。不号召全体指战员拥护边区及政府、保卫边区人民，以及不知协调军队与党政关系及军民关系等错误观念，这些都是妨碍党的领导统一，妨碍党的团结。过去部队某些干部中，对西北中央局的领导不够尊重，以及个别的只说拥护党中央，不说拥护边区政府，认为1939年以前的政府是好的，1939年以后的政府是不好的，以及军队某些干部对地方工作人员的蛮横态度，所有这些错误观念，正是军队与党政隔离，甚至于对党政对立的具体表现。这种“军权高于一切”或者“三权鼎立”的思想，也就是闹独立性的思想，都是反统一、反一元化的思想，必须加以压制，才能使军队干部加强党性，象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达到党的领导统一，实现一元化。

乙、在干部关系上，正如毛主席在开幕日的演说中所提出的，存在着自由主义倾向，曲解宽大为放任，不了解“治军要严”的基本原则，因而对干部有许多毛病没有抓紧，采取了放纵的态度，这就是使部队某些干部发生了许多严重问题（如警五团长政委与供给主任的关系）。

3. 在领导作风方面：

甲、对上对下的态度上，表现着对上拖延，对下马虎的作风。在我们部队某些同志中，存在着对上级指示决定，缺乏细心的研究讨论与坚决执行的态度，没有把下面情形更多的反映给上级，对下面情况缺乏周密详细的了解，甚至不愿意去了解和揭露弱点，满足于自己的成绩，对下面的痛痒不关心（如严重的贪污腐化逃亡等现象）。这种缺乏紧张严肃的作风，是妨碍工作的进行，甚至于直接影响战斗力的。

乙、在工作作风上，表现部队中有很浓厚的形式主义，讲的多，做的少，计划多，报告多，工作少，麻烦多，成为部队作风上的普遍现象（如连队要填四十几种表）。以计划为成

绩，缺乏真实的检查总结，因此工作中的真实情形不能反映，也就无法贯彻决议和指示，也就无法发现病症，改进工作。

总之，这都是表现我们部队中还存在着三风不正的残余，障碍我们贯彻精兵简政与实现一元化领导制度的执行。不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克服这些弱点，也就不能实现整军的目的，使边区部队进一步正规化、党军化。

产生这些严重现象的原因，客观环境不能说是主要的。后方环境固然可以影响部队疲惫、厌倦与安于现状，经济困难固然也就可使部队降低情绪，组织松散，但如果主观上能积极加以注意，这些现象是可以克服的。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后方环境来加强部队的建设与整训，使部队更加提高，这是前方部队所不能享受的。经济虽然困难，但我们可以利用边区的资源，运用部队的庞大生产力，来加以解决。因此这都不能说是主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领导上要负责，我们的干部要负责，因为我们没有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没有深刻去了解情况，没有抓住边区部队的特点，没有规定自己的办法，没有同坏的现象作斗争，反而放任坏现象，这些才是根本的原因。上述这些三风不正的残余，就要我们加以整顿，这就是我们提出整军的主要根据。

（三）　怎样来进行整军？

1． 从思想上来整军：

要在部队中开展反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使所有军队干部深刻了解我党领导下革命军队所应具备的本质与军队干部的应具备的品质，坚决克服军阀主义倾向。

要教育部队了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贯彻党中央“七七宣言”的思想，要使部队明确认识并执行长期保卫边区与建设根据地的任务，要号召全体指战员拥护中央与西北中央局，拥护边区政府，爱护老百姓，真实的拥护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只有明确的转变过去思想上的错误，才能保证党的精兵简政政策与一元化制度的执行。

2． 实行精兵政策，部队进行改编：

原有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实行改编与合编，以充实主力并统一领导。机关人员裁减，充实下层，取消勤务员，调整干部，抽调一批干部送到军事学院受训，一批老弱残废及编余人员，适当处置并分配参加生产。在此，要注意解释工作（如部队不愿编散，老干部感觉无出路，不愿取消勤务员及参加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怪话），使这次整编减少不好的影响。

3． 执行一元化制度，划分军队防区：

执行党中央“九一”决定，将部队重新划分防区，各旅担负一定防区，与党政配合，组成分区司令部，分区政委由地委书记兼任，军队中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成为同级党委的一个部，但仍保持其上下级直接领导和隶属关系。军事政策（如扩兵及建军原则，政治工作）与军事行动，大政方针（如军队工作计划及总结等）须交党委会讨论，但具体军事行动，由司令员政委决定之。这样统一在地委领导下，参加根据地建设，及担负军事防务，执行上级决定。

4． 进行部队整训：

除担任一定防区之部队外，各旅集结一个团整训，进行半年到八个月的有计划的训练。守备部队一样利用时间整训。政治上根据部队实际情况，进行整风及政策教育。干部战士都

应加多时间并增拨经费进行文化教育。坚决执行××颁布的军事教育计划，使部队战术技术水平都提高一步，野外演习及体育运动还要提倡。在此需要党政给以帮助（如整训部队的房屋及柴炭之解决等）。

5．响应毛主席及朱总司令的号召，积极参加生产。在部队中再来一次生产动员，每个军人都有劳动力，都是生产者，都应参加生产运动，应当有信心自己养活自己，做到完全自给自足。各部队都准备学三五九旅，实行“南泥湾政策”。要以参加生产为光荣，参加生产就是执行党的路线，完成党的任务，谁没有完成生产任务，谁也就没有很好的执行党的路线。同时，各分区拟订各分区全分区人员生产计划，统一收入支出，规定节约办法，注意爱惜公物教育，严格供给制度，来达到生产供给方面的统一。避免各自为政，本位主义，贪污浪费的现象。再则还要执行毛主席的号召，帮助中央机关解决困难，反对只顾下不顾上的现象。

6．要求全体党员和指战员，注意巩固我们的部队。我们今天人员精而少，加上经济困难，民族敌人和反共顽固分子，都以破坏我军为目标。我们部队中过去存在对于部队巩固的悲观失望情绪，放任自流的惰性，以及拖延疲怠的迟钝性，均需加以克服，才能很好的与奸细破坏分子作斗争。要把爱护部属人员如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战士亦如爱护干部一样（因为今天的老战士都是将来的干部）来保证现有人员不再减员。要很好的依照归队条例进行归队，协助政府执行优抗，来巩固军队情绪，提高战斗力。

7．刷新政治工作：

（1）政治工作应该保证此次整军任务的完成。号召全体指战员参加此次整风运动，执行精兵简政，拥护一元化领导制度。从思想上、组织上来保证整军（已有整军计划，全军应按照执行，来保证联政提出的整编、整训、整风三大任务的实现）。

（2）改造政治工作作风，反对形式主义。要废除许多繁杂多头的计划与报告，取消多样形式而无内容的连队组织，要减少表册（由司令部统一规定几种表）。使政治工作能有紧张的、踏实的、生动活跃的精神。

（3）政治工作要注意提高党的质量，与地方党一样实行精党政策。加强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纪律上的领导作用；使党员确实先进的战士，不使党员降低于战士的水平。不要求党员一定要占战士的40—45%，而要求党员合乎一定的标准。我们军队精党亦应如地方党员一样。在最好党员的基础上，提高中等的，坚决洗刷少数落后的及坏分子（怎样精党，由政治部讨论具体办法训示各部执行之）。

（4）政治机关组织上亦要精简，提高工作效能，加强政治工作威信。要确定军政委员会与总支委工作范围与关系，要注意健全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政治委员要能确实研究并掌握政策，这样来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政治委员制度，提高政治工作的威信。同样要求各级指挥员注意提高政治机关及工作人员威信，不容许有丝毫削弱政治机关及政工人员威信的现象。要知道今天政治机关的威信不够高（许多同志感觉政工威信不如红军时代高），固然政治工作本身有弱点，但某些指挥员照顾不够，甚至阻碍亦是很重要的原因。

（5）要有生产政治工作保证计划，这是全军主要任务之一。生产任务不完成，政治工作亦是无法进行得好的，不可忽视。

最后，政治工作应加强部队教育，但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教育，要注意巩固部队，上面讲过，不再多说。

8．供给卫生机关，也要注意加强领导，几年来供给人员组织生产是有成绩的，应该给

以表扬，并且继续鼓励他们，积极领导部队参加生产，完成军队自给的任务。应该调些好的干部参加领导生产供给工作。应加强供给人员的教育（应该专门研究政府法令与政策）。鉴定供给人员的党性，是以能照顾政策，能赚钱多，用钱少为原则。至于少数供给人员的贪污腐化，应加检查撤换。

卫生人员亦应注意加强充实人员，提高技术，解决必需的用具，很好的进行保健工作，来保证部队人员的健康与伤病人员的安全。

9． 号召全军遵守纪律，执行拥护政府、爱护老百姓的决定（此问题将来还有整关系问题专讲）。现在要讲的是：

我们部队中过去的确纪律松懈，对党与政府不尊重，随意破坏政府法令，打骂老百姓及政府人员，损害群众利益等现象是数不胜数。固然亦有某些客观困难，以及缺乏统一的制度与规定来约束，但军队领导上某些干部对党政不尊重，采取蛮横、侮辱的态度是错误的，在团结的责任上来说，是要负更多责任的。如果说政府同老百姓会压迫欺侮军队，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找不到的，是说不通的。何况边区政府边区人民与八路军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呢？如果说今日的政府与人民不如一九三九年以前的政府与人民好，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今天的问题是军民兼顾。老百姓是要发展私有财产的，我们要教育与组织他们分私为公，老百姓今天要发展私，才能更多的为公。我们军队在开辟时，负有建立政府组织人民的责任，在今天就应负责引导教育人民，不这样做，只站在旁边责骂政府不好，老百姓落后，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负责任的消极的表现。以上这些现象，严格说来，这是军阀的态度，是党性阶级性不坚强的显著表现，这不是我们党军的光荣，而是我们党军的耻辱。这是必须受到严格批评与处罚的。以后要求干部首先遵守纪律，尊重政府的法令政策，部队中战士犯纪律，首先找干部，干部犯了纪律要加倍处罚，这样才能制止目前违犯纪律的混乱现象。目前应按照规定进行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运动，并且规定了许多军队应遵守的法令规则，在部队中要很好的传达解释，使军队与政府、人民关系，在高级干部会议后有一新的转变，完全转换军队对政府对人民的态度。在这次会议中，在回去以后的许多会议上，都须本着自我批评精神来批评军队的缺点错误，对政府与人民中某些缺点，即使怎样的严重，亦应该善意的提议，而不能恶意的报复与攻击，这才是一个革命军人对待革命政府革命人民的正当态度，不然就是军阀的态度。至于某些损害人民财物的事件，尚未赔偿或退回，应立即赔偿或退回。在此还需向到会干部建议，处置违犯纪律事件，也要注意处分情况及性质，有些是由于部队确实迫于困难，而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应设法解决其困难问题，否则不能停止犯纪律的事件。某些仇视八路军的顽固分子，对军队的侮辱与不满，也要来加以适当批评。

10．最后讲到团结全边区周围的友军和全国的友军问题。

我们把边区建设好，把军队建设好，如果不能团结友军，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过去少数干部打出去的观念，是与团结友军的方针相违反的，这必然放松我们团结友军的工作，这就不是党中央团结友军争取时局好转的方针，这是不符合今天党的政策的。

如果我们讲要忠实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边区周围几十万友军，都需要我们团结的，我们不去做，还讲什么忠实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呢？

党中央今天的政策，是决心争取抗战合作，战后合作。那我们对友军亦应照这个方针做，我们过去对这种工作重视不够，部队中对团结友军（不是破坏友军）工作的教育亦不够，都需要我们加以注意，这必须在思想上来转变（以后办法再讨论交各部执行），要把团结友军

看作很重要的问题来执行。

最后再着重说说干部问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在干部关系上我们要执行毛主席指示，反对自由主义。

二、在这次整编中，对于部队中严重贪污腐化的干部要撤换，要提拔一批历年来艰苦工作，积极负责、政治上开展的干部，要做到尝罚严明。

三、要注意在整编中克服宗派主义倾向（如最近因干部调动发生有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及一些干部因不满批评而散布小广播“某某有宗派主义”等）。

四、要在干部配备上，做到每个连配备一个知识分子，把各级司令部政治机关多余的知识分子，分配到连队中去。

五、要注意提拔培养本地干部，但要认真培养教育，而不是用客气态度来团结。

凡此所讲，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在全军执行，因为我们八路军有很好的品质，我们是全国最好的军队，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与人民结合的军队，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军队，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发扬我们光荣的传统，克服自己的弱点，完成整军的任务。

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四月）

谭　政

一　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

从一九四二年冬季西北中央局召集的高干会及军政干部会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一九四三年的一年，是边区部队大进步的一年。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边区部队内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确立了一个以西北局为首的，包括边区党政军民在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领导系统，并且发扬了联系群众的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

还在前年高干会时，我党中央及西北局各同志就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有革命优良传统的军队，是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全国境内一部分最好的军队。而在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是在基本上完成了党与上级给与他们的任务的，是执行了党与上级的路线的。但是同时又指出：我们的部队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一些偏向，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偏向，犯这种毛病的程度各有差别，而当前的任务是一致起来纠正这种偏向，发扬优良作风，改变不良作风，以便更好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更好地执行党与上级的政治任务，更好地进行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一年以来，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指示，并在基本上完成了指示所给予的任务的。

一年工作的结果，在军党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民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干部上下级关系上，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上及各部分军队间的友好关系上，都有显著的进步，这些都是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曾经借以表现它的地方。在军党关系上（所谓军党关系，即是说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我们不但建立了在边区范围内以西北局为中心，在各分区范围内以地委为中心，同时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级关系的统一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也趋于一致了。在军队与政府，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经过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运动，特别是从一九四三年二月以来，军队方面坚决实行了自我批评，实行了坦白运动，将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一切不良现象，都讲出来，彻底改变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对民众关系不好者，实行改善关系，归还借物，赔偿损失，争论事件错在军队者实行向民众赔礼道歉；军队又大规模地从事生产自给运动，改善了给养，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军队又以大量的劳动力帮助民众生产；这样就使我们的军政军民关系大大的改善了。在军队内部关系

上，无论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凡属存在缺点的，均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连队军人坦白大会上，将官兵关系上，连队生活上，个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现象，不满心理，都讲出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增进了亲切友爱的空气，纠正了各种不良现象，平复了不满心理，团结了军队内部。所有这些方面，虽然至今仍然存留着若干缺点，并不能说已经完全克服，但和一年前比较，显然是大不相同了。总而言之，部队中多少存在着的以脱离群众为其主要特点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是基本上被克服了。

在上述这些改造与进步的情形之下，部队的情绪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部队中存在着的若干消极情绪与不良行为，现在一般均已消失，而为新的情绪所代替了。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与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这种热情与朝气，从去年春季开始高涨，一直延续到现在。从去年的开荒、锄草、秋收，往后又紧接着转入整训，中间经过七月间的战斗动员。其特点是：紧张性、普遍性与持久性。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进取心的，在生产中，在拥政爱民中，在冬季整训中，都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成批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学习者出现了，许多的模范班、排、模范连队出现了。部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是增强了。经过精简改编之后，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现象是被改变了，若干官兵脱节的现象，是被克服了；违反纪律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

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某些环节上的领导作风有了大的转变，军阀主义作风与教条主义作风都受到了批判。现在极大地发扬起来的作风，是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了。

所以我们说，去年一年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作风大进步的一年。由于有了这种进步，才获得了去年一年真正伟大的成绩，获得了在我们部队中实行整顿三风的成绩，精兵简政的成绩，拥政爱民的成绩，生产运动的成绩，防止奸细的成绩与冬季整训的成绩。如果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进步，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陕甘宁边区部队的特点，就是它是后方留守的部队。它守备了数百里河防，但因前方部队的英勇作战敌人还不敢越河进攻。这些都是和前方部队不同的。但其他一切则都大体相同。特别是在领导作风问题上，陕甘宁边区的进步，可以为一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所仿效。我们是怎样取得这种进步的呢？

这种领导作风的进步，其过程是从军党关系到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从军队总的领导关系到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而论，又是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从干部到士兵，从党员到非党员。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各方面的一系列的进步，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去做；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首先抓住军队总的领导关系，亦即抓住高级领导干部，使之打通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作风，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导，作为推动一般干部，影响士兵群众的前提，而是只从下级与士兵身上求解决；如果我们的同志在领导上确有毛病，而在检讨这些毛病时，却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不肯揭露自己的错误；那末，这种伟大的进步就将成为不可能，至少是不会有这样大与这样快的成绩。去年一年的经验证明，凡是依照这种精神与这种方法做去的，成绩就很大，进步就很快。反之，成绩就不大，进步就是很慢的。

去年的经验证明，干部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极其重要，也是极其艰巨的。干部的思想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进步之后，工作的进步才是真正可靠的进步，而如若离开思想进步去求什么工作上的进步，便必然只会是表面的与形式的。在一定物

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个真理，已为去年的经验所完全证实。如果我们要从若干错误的领导作风变到正确的领导作风，要从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表现得最典型的部队，在改变这种作风之后，就能飞跃地前进，要使落后分子改变为积极分子，要使自由主义的空气改变为原则立场的空气，要使不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改变为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如此等等，都是要从人们思想的进步才能进到行动的进步。差不多可以说，思想的进步过程，就是工作的进步过程，就是群众情绪的进步过程。那里的思想改造做得愈彻底，那里的工作，那里的群众情绪，那里的工作作风的进步也就愈彻底。

根据去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对于犯有错误的人们改造其思想，是应该有步骤的，大体上应该是：第一步，揭露错误；第二步，反省错误；第三步，改正错误。没有前两个步骤，就不可能实现后一个步骤。在一切存在着毛病的部队中，三个步骤中，头一个是首先重要的。没有这个步骤，或这个步骤进行得不彻底，就是说，不揭露错误的本质，不对明明错了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批评，就不能警惕干部，就不能发动干部对于检讨错误，批评错误的积极性。而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不揭露错误，就无法测知他对自己错误的态度，就无法使他进行自我反省，即使反省，也会多是表面的、应付的、没有下决心的，因而要他改正是不可能的。去年，边区各地部队曾经检讨过那里的错误，检讨那里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开过坦白大会，进行斗争反对军阀主义偏向以及那种对于这个偏向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即所谓自由主义的态度，一次没有做好的又来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果然是做好了。那些至今还没有做好的，便是对于揭露错误做得不彻底，或做得不适当。

但是这里所谓揭露错误，是有方针，并有具体目标的，而不是轻率的随意的指责。我们的方针就是教育干部，改造干部，就是教育士兵，改造士兵，而不是毁伤干部，谩骂干部，而不是毁伤士兵，谩骂士兵。只要犯错误的同志大胆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并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不采取过火的斗争方法，不采取处罚与打击的方法。在整个整风运动中，我们是执行了这个方针的，除了少数几个真正的坏分子外，对一切有毛病的同志，都是没有执行纪律处分的。一时转变不了的，在整风班及干部队慢慢进行改造。我们这样做，是收到了效果的，大部分有毛病的人都转变过来了，许多人并且转变得很好。干部中缺乏和蔼态度，缺乏勤勤恳恳教育士兵的态度，缺乏问寒问暖关心士兵生活的态度，缺乏关心民众疾苦的态度，缺乏廉洁奉公态度的人，现在是改变了，学好了，干部学好了，士兵也学好了。士兵中的二流子变为好人了，想开小差的不开小差了，不满的满意了，破坏纪律的遵守纪律了，懒怠的勤劳了。总之，不论官兵，都面目一新了。这里，我引一个边区部队中的典型例子来说明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性。

下面是一个部队的工作报告：

“思想上的转变，可以部队中积极分子的增多和落后分子的减少来说明。在去年三月刚整编时，党员积极分子只有七十七人，非党积极分子只有三十一人。而到去年十二月，党员积极分子增加为一百六十二人，非党积极分子增加为九十五人。刚整编时，党员落后分子有五十五人，非党落后分子有八十二人。去年十二月，党员落后分子减少为八人，非党落后分子减少为十五人。可见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干部中贪污浪费，私人做生意，只顾自己享受，不关心士兵生活的现象是被克服了。例如，一九四一年，那时采取了单纯处罚的方法，对于犯贪污浪费等错误的干部撤消了十多个，其中计有营长两名，政教两名，连长两名，政指两名，卫生队长一名，民运干事一名。

但在一九四二年，同样的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如果依然采取单纯的处罚方法的话，那就要撤换更多的人，并且事情也一定不会变好。但在一九四三年，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废止了单纯处罚的方法，采取了改造思想的方法，一个人也没有撤换。经过整风与反省，经过坦白大会，经过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过去犯错误的人都在这种伟大的运动中转变过来了，还是这些人，但是一个整年中没有再发现一个再犯严重错误的人。”

上述的这个部队，是边区部队中工作与纪律最不好的部队，这是极坏的典型。但因为揭发了错误，展开了群众的自我批评，改变了领导作风，提出了正确的积极的任务，并且掌握了治病救人的方针，便很快的转变过来了。至于大多数工作基础好的或较好部队，一经按照正确方针认真整顿，其进步更是很快的。

由此可见，工作的做好，纪律的维持，是建筑在领导正确与群众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领导正确这个条件，正如列宁所说："整饬纪律的企图，将不免流为空谈和虚妄。"而在领导正确这个条件一经获得之后，就要着重群众的自觉，去年的经验，也完全证明这一点。过去许多领导机关，对于干部及群众中发生的消极现象，不去检查领导，不去从转变领导着手；不去掌握思想，不去从改造思想着手；并且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不去从爱护观点出发促其反省与自觉，而只会用简单的处罚方法，实在都是不正确的。因此，只有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揭露具体的错误到督促犯错误者（包括干部与士兵）反省自己的错误，勤勤恳恳地好心好意地推动他们自动的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一个路线，才是完全正确的路线。

这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废。但是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达到自我批评的目的。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部队中以改造思想为目的的整风运动中，斗争目标，是集中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与对此偏向的自由主义态度上面，所谓揭露错误也就是揭露这些，这些目标以外的东西，只是联系着它（可以联系与需要联系的），而不去强调它。不要企图同时改正一切不良的东西，而应集中力量批判最主要的一点，其余就会迎刃而解。在一定的斗争目标下，对于联系具体的人一点来说，也只应该选择典型，不应该采取平均主义。这种典型的批评方法与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与最有教育意义的正确方法；平均主义的批评方法与教育方法，则是最没有力量、最没有教育意义的错误方法。

去年一年，我们在部队的实践中，发扬了统一领导的思想，拥政爱民的思想，生产自给的思想，提高军事技术的思想与防止奸细分子的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教育与实践中，不但军阀主义偏向受到了批判，教条主义偏向也就同时受到了批判。我们的军政干部，在进行工作时，已经能够不受教条主义作风所束缚，抛弃了脱离实际，专尚空谈；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那些不良作风，而懂得了遇事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并懂得了选择典型与抓住典型的方法；懂得了不但要注意事件的形式，尤其要注意事件的内容；懂得了不但要照顾少数，尤其要照顾多数。在进行教育时，懂得采取启发诱导与检讨反省的方法；懂得宣传张治国的作风与门善德的作风；懂得组织张治国运动与门善德运动。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教育工作，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平均主义、孤立主义的束缚中，从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中，解放出来。

去年一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领导作风上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其共同结果，都是脱离群众，而教条主义则特别表现于脱离具体的实践，而以抽象的空喊与形式的整齐为满足。反之，去年工作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绩，还因为我们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之时，我们

就从基本上克服了教条主义的领导方法。采取了我党中央所指示的正确的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每一运动，每一工作，都是先使组成领导核心的各级主要干部先懂得，然后采取群众路线，通过群众，去进行思想动员与舆论动员，使一般干部与广大群众也懂得，然后才动手去做。在动员的过程中，都是根据各旅各团的情况去规定各旅各团的总计划（一般号召），然后根据这种旅团的计划及各单位的情况去更具体地规定班排连营的计划，以至每一个人的计划（具体指导）。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根据实践经验去检查这些计划，并修正这些计划，使高了的减低些，低了的提高些（具体指导）。在动员过程中，又是使政治工作同志与军事工作同志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每一部队中最有威信的首长的统一指导下，协同一致地去做，故无各自为政之弊。

去年许多大的工作，都采取了革命竞赛的方式。但当群众的情绪还没有感觉到需要实行竞赛的时候，就不应发动竞赛。当这种竞赛情绪在群众中酝酿到大体上成熟了的时机，便应立即号召竞赛，并用一切力量组织这种竞赛。这种时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仅积极分子方面精神上已有充分准备，而且中间分子方面（他们往往占多数）与落后分子方面，也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准备，否则竞赛便会变成少数人突出，只是少数人在做，不是多数人能做起来的。去年生产运动开始时，有些部队发动竞赛的时机选择得不适当，发动过早，只看到少数积极分子的情绪，没有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情绪，结果这种竞赛的号召便落了空。后来照顾了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重新组织竞赛，便得了成功。在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中，凡是不但照顾了中间分子，而且照顾了落后分子的，竞赛热情就愈弄愈高，竞赛规模就愈弄愈大，一直坚持到底，完全成了群众自己的事业，不要领导方面的督促。我们必须懂得，在各种人们的觉悟程度上，中间分子比较积极分子是有距离的，落后分子比较中间分子又是有距离的，领导的任务，就是在于团结积极分子，吸引中间分子，鼓励落后分子。而我们团结积极分子的全部目的，就是在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一道儿前进。离开这个目的，积极分子就失去作用，我们组织积极分子的工作，就是多余的事。因此，在任何一个带群众性的运动中，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上，在我们的组织步骤上，首要的问题，是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问题，要从中间分子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出发，要选择为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也能接受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要适应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进度，而规定整个运动的进度，例如，我们在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组织张治国运动，郝树才运动，胡青山运动，赵占奎运动（不是职工运动的赵占魁），武生华运动，冯振增运动，冯国玉运动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因为这些部队中的先进战士与先进的初级下级干部，是本部队生产运动或整训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为本部队战士群众所熟知与亲眼见到，容易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容易为他们所理解，容易激起他们的上进心。因为群众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来体会问题，不是从口号来体会问题的。如果我们的鼓动是脱离具体人物、具体事迹的鼓动，便无法使群众了解，无法激起他们的上进心。但是当我们鼓励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向先进分子看齐时，必须不忘记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特点。例如在生产劳作形式上，必须依据体力强弱，并采取相当的自愿原则，将劳动力划分为甲乙丙三等，采取不同内容与不同程度的劳作形式，较之平均主义的与完全命令式的劳作形式，就会更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分别，我们就会要脱离群众。

在改造落后分子的工作中，主要应采取耐心感化的方法，禁用单纯惩办的方法。对于逃

兵也不是单纯惩办方法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采用教育感化方法，更要绝对禁止枪毙逃兵。在这里，首长们从爱护观点出发的亲切谈话是最有效力的，一定要把这种首长谈话与群众中的自我检讨自我教育配合起来，才能发生更大的效力。单纯的惩办，甚至打骂的方法，只是一种脱离群众而毫无效果的方法。军队中一定要废止漫骂与肉刑，坚决执行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古田会议的决议，一定要把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治病救人出发的勤勤恳恳好心好意的教育感化工作，去代替漫骂与肉刑（打人），去代替单纯的处罚方法，并且一定要把漫骂与肉刑以外的、必要的、即按照实情必不可少的正当处罚方法，也减少到最低限度，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形之下，决不轻易采用处罚方法。

一年的经验是很多的，我在这里讲得很不完全，例如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生产运动，练兵运动与防奸运动，均有各自的宝贵经验，我在这里没有一一说到。我所指出的，只有一些共通的主要的经验。并且也不是说，我们部队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已经全部的与最后的克服了，不，不是这样。我们部队中存在着的军阀主义偏向只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将它表现在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干部上下级关系，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关系，以及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上的显著不良倾向加以克服，基本上改善了各种关系，并不是说这些关系已经完全的最后的改善。要使各种关系获得更加完满的改善，并使之巩固起来，成为根深蒂固坚强不拔的东西，我们还须继续做很多的工作。至于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教条主义作风，在过去一年中也是受到了批判的，但是还没有全部克服，尤其是从历史检讨这种问题，过去我们还没有做。下面我就想就全军的历史问题加以检讨，而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教条主义作风与实事求是作风两种作风的比较与分析，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的比较与分析。至于军事工作方面的教条主义偏向，这里暂时不去提它。

二 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拿了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国内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过去的红军中与现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更是这样做的。共产党人在这三个时期的革命军队中所做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都是收到了成效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

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他不但是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做的，许多的军事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也都参加了这种工作。同样，许多的政治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军事工作。这在内战时期是如此的，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的。

以内战时期来说，我们军队在其初期是创造的时期，其中期是发展的时期，其后期是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其成绩的时期，政治工作也有其创造、发展与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某些成绩的情形。特别是在内战初期与中期，在对敌斗争的政治工作上，在协调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的政治工作上，总之一句话，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工作上是有很多的创造，以至于到今天还成为我们军队一部分优良传统。

以抗战时期来说，其初期是生动活泼的，是有伟大成绩的。在这时期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于自己的周围，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大量的民族敌人，以至于能够协助处在正面阵地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保障了中华民族不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击败，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在抗战的中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整个军队继续执行了党的路线，与党的许多具体政策，以至于能够抗击了日寇侵华军队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至于能够击破敌伪军无数次的反复的残酷的“扫荡”，能够有效地对付其杀光抢光烧光的所谓三光政策，能够使被敌人再度夺去的许多中国土地，又被我军再度夺回来，能够忍受史无前例的没有政府接济、缺乏武器、缺乏弹药、缺乏药品、缺乏粮食被服的无限困苦。而为中华民族，为同盟各国，坚持了一条中国大陆上最重要最有力的抗日战线，这些也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

总之，不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整个军队的成绩是伟大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成绩也是伟大的。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也和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与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一样，他们是有功劳的，是对中国人民有了光荣的贡献的。

但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这里只说政治工作），是存在过与存在着缺点的，我们应该采取自我批评态度，检讨这些缺点，克服这些缺点，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例如，当我们提到政治工作中的传统的时候，若干同志往往存在着一种模糊观念，似乎认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切传统都是好的，都是优良传统，因而对于过去的传统作风，缺乏批判的态度。因此，就不免对于某些不好的东西与某些不适合于我们军队当时情况的东西，也都奉为天经地义，当作所谓优良传统在发扬。而对政治工作历史上曾经积累起来的许多真正好的经验，真正好的传统，却又被忽视，被抹煞。

我们的政治工作，在内战后期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就其积极方面说来，这时期的政治工作，曾经执行了反对人民敌人的政策，曾有过许多成绩。这种成绩，主要表现在对敌斗争方面，例如关于鼓励官兵的英勇斗争，关于争取俘虏等。在团结军队内部与团结人民方面也有其成绩。例如，关于争取人民参加军队，军队的更加有秩序，军队中许多好的政治教育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居民工作中的许多好的工作等。（这种成绩主要是表现在中央苏区，及其他几个区域军队中，在另外某些军队中，由于个别同志在政治领导与政治工作领导上的绝对错误，就不但看不出这种成绩，反而摧毁了原有的成绩）但是，就其消极方面说来，却又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这种教条主义作风，在军事工

作特别是在军事教育工作中也是存在的，这里不去论列）。这种教条主义，在我们工作中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某些同志之所以或多或少地犯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表现，就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只凭主观臆想办事，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当时军队的实际，机械地搬运外国经验，不适当地强调当时军队的正规化，割断我们军队的斗争史，这些同志喜欢从口头上，从形式上强调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但是在实际上，却放松了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实际上不甚重视与不甚强调我们军队所应该认真倡导与认真实行的真正的军党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级一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一致，各部分军队间的一致等等基本思想，不是严肃地认真地把这些思想列为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工作方向，而是把这些基本内容、基本方向，当作不甚重要的东西，却从形式方面重视了与强调了许多不应该重视不应该强调的东西。

这种作风发展下去，其结果势必产生这样的情形：争取群众的任务有些被轻视了。军队的三大任务，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改变了提法，或被认为不必要了。军队内部团结一致的工作也有些放松了。党政军民关系也不去力求亲密了。军队不尊重党政，军队打骂民众，侵犯民众利益的现象，以及军队内部官长对士兵的打骂现象，虽有指责，也不甚得力了。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减弱了，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在潜滋暗长了。由于山头主义与本位主义的发展，军队的这一部分可以不照顾那一部分，主力部队可以不照顾地方部队与民兵，模范队伍可以不照顾落后队伍，从而在主力部队的若干同志中（这里军事政治后勤三种工作同志都有），生长了一股骄气，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只爱说成绩，不爱说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惧怕别人批评，也惧怕作自我批评，有些则更发展到对党与上级的领导机关闹独立性的恶劣现象。所有这些情形，有些在抗战时期有了改变，有些在抗战时期先有发展，后有改变，有些则至今还没有改变。

在党内生活上，内战后期曾经普遍采用了过火斗争的方针，缺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军队中的党内生活，也发生过这种不正常的情形，以致许多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打击。抗战时期，这种情形有了改变，但其残余没有肃清，还发生过若干错误地打击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的情形。

在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虽然基本上是团结的，但是存在过某些不协调的情形。在内战后期，曾经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委员制度，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在实际上是在不适当地强调所谓军事工作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党性的差别，对于军事工作者与政治工作者之间，缺乏合作精神的提倡，是这种不协调情形的来源之一。但是这种不协调，不能一概责备政治工作人员方面，有些时候军事工作人员也要负责任。

在抗战初期，曾经一时迁就国民党，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这是错误的。后来改正了，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这是很对的。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特别是在那些政治工作比较薄弱的部队，这样的强调十分必要。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为战争、生产与群众工作而斗争等）与当前具体任务（如反扫荡、

反蚕食，生产运动，整训运动，防止奸细，整顿三风，统一领导，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改善军党、军政、军民、官兵、上下级、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等，依当前需要而作具体布置）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如果在这方面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军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是不对的，那便会是产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显得空虚的原因。任何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都是根据情况与任务而产生的，是从属于一定情况与任务的，是应该依据情况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的，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也是如此。所以，如果离开军队的具体任务去谈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把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与整个军队的具体任务相分离，并把它看成绝对的东西，那是不能不变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的。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有些同志是认识不清楚的，如果现在还有这种情形，便应加以纠正。

应该指出，所有上述一切缺点，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都不是一切部队同样具备的，其间轻重大小，互不相同，正如各部队的优良成绩，优良传统，也是各有特点，互不相同一样。我们的军队始终是革命的军队，其有缺点，好似一个壮健的人有时生了一点疾病一样，很快就会治好的。

还应指出，上述这些缺点，也不能认为都是由于教条主义产生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小资产阶级的广大与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教条主义思想的存在与没有被肃清，我们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则是其主观的原因。一九四二年整顿三风以及实施各种改变以来，这些缺点就逐渐减轻了，某些整风深入的部队，这些缺点就更少了。

还应指出，军队中的教条主义，和内战后期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当时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则军队是不会单独产生这样严重的教条主义的。

还应指出，当我们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着重在某些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在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今后工作的借鉴。还应知道，我们的军队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的思想认识也是向前发展的，某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或是已经进步了，或是正在进步中，或是一经指出就可能使之进步，根据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我们应该团结一切从事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的同志，不分彼此，共同工作。

但是应使我们的同志深刻认识，如果我们不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革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如果我们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我们就会无力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去教育军队，就会无力巩固正当的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就会无力克服军队上下级之间，军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以及军队与地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也就会无力克服军阀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恶劣倾向。反之，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善于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善于调查研究，善于联系群众，那么，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般任务就能完成，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就能达到。中国革命的经验，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经验，都在证明这一论断。

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我们军队的任务，不只是一个单纯地对敌斗争的任务，四军古田决议中已经明确的规定了这一点。由于我们军队的特殊环境，我们在内战时期，曾经规

定以作战、筹款与做群众工作作为军队的三大任务。自然，作战是被放在第一位，在战争时期，其他一切都是服从于战争的。但是，如果放弃后二项工作，就不适合于我们的环境。在内战的初期与中期，我们军队曾经艰苦地但是光荣地执行了上述三大任务、这也就是说，在根据地没有建立之前，曾经协同地方党政建立根据地，而在根据地建立之后，又曾经协助地方党政巩固根据地。这样的任务，就是在抗日战争中也是没有改变的，大家知道，如果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协助当地人民，协助当地党政建立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试问这样强大的民族敌人（全部侵华敌军的百分之五十八与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都担负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身上），这样长期艰苦的战争，怎能支持呢？不过在抗战时期，筹款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提出了军队进行生产运动的任务，借以改善军队生活与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于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今天的任务，就变成战争、生产与做群众工作这样三大任务了。如果把这样三个任务，缩小成为一个单纯的作战任务，那就不能适合我们的特殊环境。

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为着实现军队的三大任务，过去的军队三项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并建立在巩固基础之上。必须使八路军新四军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中央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领导，才能使军队不走偏向，达到协和全国军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革命军队的内部，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方针，不能是分门别户、各自为政的方针，不能是互相轻视、互相妨碍的方针。凡属革命军队，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除应强调专精自己本业，并指出如果不注意本业则是不正确倾向这一点之外，还应提倡，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同志应学习政治工作，参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同志则应学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并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准备去参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或竟改变现有工作职位去做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而在军事工作、后勤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则应强调彼此的合作。不错，这些工作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因此才分为几种工作。但是这些工作都是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一个目的，这些工作的进行又必须取得和谐的合作。因此，凡是能巩固这种合作的，即应受到赞扬，而如果是妨碍这种合作的，即应受到批评与指责。

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下，革命军队内部的争论问题，只应该是思想倾向与政策方针的原则性的争论，只应该是正确原则克服不正确原则的争论，并且只是因为这种争论，是有助于巩固党的领导，巩固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及其他各种关系，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任何的争论都应该完全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而如果是多少离开这种立场的争论与对立，就都是无原则的，是不应该允许其存在的。

在我们军队中，应该把尊重工农出身的干部与尊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尊重老干部与尊重新干部的方针，同时提了出来，并使这些干部很好的结合起来。应该使人们懂得工农干部的长处，我们军队中有大批的工农干部，他们已在历史上形成为军队中一部分起主要领导作用的骨干，正是我们军队的优点与特点（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中也是这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忠诚可靠的，并特别能吃苦耐劳，英勇奋斗，轻视工农干部的思想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时，又应该使人们懂得革命知识分子的长处，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就不能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忠诚可靠的，他们的缺点，经过锻炼（特别是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是能够改造的，轻视知识分

子的思想也是不正确的(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中，也是这样)。无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都有他们自己的短处，都不应该骄傲，而应互相学习其长处，去掉自己的短处。

军队中的老干部是军队的主要骨干，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如此坚强的军队。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老干部，轻视老干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同时，应该尊重新干部，因为新干部是我们军队的新鲜血液，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军队的发展与壮大，轻视新干部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新老干部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而老干部尤应随时随地，特别表示欢迎与尊重新干部的态度，以便于从各方面吸收新干部加入我们抗日的军队，壮大我们的抗日力量。

从地方工作中吸收到军队来工作的干部，新的与老的，工农出身的与知识分子出身的都有，这是扩大军队干部的一大来源，我们应该表示尊重、欢迎与和气地同他们一道工作的态度。他们初来时，在工作上有些不习惯，不熟练，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善于帮助他们。

我们军队中，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原有军队干部与新来地方干部的关系，这些问题上，是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的，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宗派主义观点，是应该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没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士气；没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敌军官兵。应该使我们军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懂得，在战斗时，集中一切力量去压倒敌人，迫使敌人投降，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应坚决的歼灭他们，或俘虏他们，这就是我们军队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我们军队非常宝贵的历史传统，今后应该在我们军队中大大提倡，大大发扬。但是在战斗解决以后，对待俘虏的政策，就不是这样，这里应该转变为说服态度，从思想教育上、物质待遇上、政治态度上争取他们，将我们在战斗前与战斗中对于敌军的宣传变为事实，借以瓦解敌人的队伍。拿中国的老话说，如果前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么，后一种态度就可以叫做“王道”（革命的王道）。如果拿前一种态度应用于后一种情况，那是不对的。分别而又同时发扬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应把这一点更大的发扬起来。

如果说对敌人是用“霸道”，那么，对同志、对士兵、对人民、对朋友，就是用“王道”。对前者是打击，是消灭；对后者是尊重，是说服。如果不去学会分别这两者，如果把对待敌人的态度有时稍微误用了去对待同志、士兵、人民与朋友，那就是犯了极大错误。严格地分别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同样应当予以大大的发扬。

在我们军队的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比重上，应依照部队的具体情况去规定。依照具体的需要，在一个时间内，对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侧重。例如，在部队政治教育特别缺乏时，应当多费时间、多费精力去着重进行政治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般地说来，在分配二者的时间上，军事教育应占的比较多些，政治教育及文化教育则应占的比较少些，不可拿许多不必要的繁琐的会议、汇报去占据军事训练的时间。许多政治教育工作与政工会议，则多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去做。这种时间上的分配，决不能被误解为是降低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恰好相反，我们认为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使人们懂得，认真的政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任何轻视政治工作的观点，都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有些部队中将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及其他政治工作活动占去了太多了的时间，减弱了军事训练的时间，这是应当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的比重上，政治教育应占第一位，文化教育则占第二位，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情绪，政治认识与政治质量，但革命军队的文化水平，是应该提高的，不能误认为只要政治，不要文化，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去进行识字运动及其他文化活动。在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情况下，文化教育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应多加些力量去做。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是以工农为其基本成分的。但是我们绝不拒绝从地主富农资本家阶级出身而真心愿意献身于抗日战争、真心愿意服从共产党领导的那些人们，参加我们的军队。这些人们的缺点，甚至严重的缺点，那是会有的，放任这些缺点是不对的。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不是排斥或歧视他们，而是欢迎他们与尊重他们，和他们一起奋斗，在奋斗过程中逐渐地帮助他们克服其缺点。

对于军队中的二流子（流氓），应和对于地方上的二流子一样，采取改造与感化的政策。听任二流子习惯存在，是不对的，单纯地排斥与洗刷二流子，也是不对的。绝大多数的二流子是可以经过教育，变为好人的，只要我们的政策方法不犯错误

对于会门与土匪，也应采取逐渐地有步骤地感化与改造他们的政策，不能是单纯地排斥与打击的政策。除非我们尽了一切力量去争取，而某些会门或土匪还是坚决站在敌人方面反对我们，才可以采取某种打击手段。但在打击之后，又应继之以争取。

抗战时期，各种对敌伪斗争的政治工作，争取敌伪军俘虏的政治工作，武装工作队的政治工作，争取广大民众加入军队的政治工作，组织民兵与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到军队中来的政治工作，团结地主资本家阶级和我们一道抗战的政治工作，团结少数民族的政治工作，以及其他作得有成绩的工作，凡属有积极意义的，都应该继续坚持与加以发扬。

如果我们部队中对于上述各项问题发生了思想上的偏向，那就应当加以纠正。

此外，在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中（同时也在军事工作中），还有几个毛病，在前面虽已提到，但是没有着重说清楚的，需要在这里说清楚。这些毛病并不是每个部队都是一样地存在与一样地严重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在去年一年中又已经给了许多的改造。但是这些毛病是这样显著与这样引人注目，使我们不得不提出来加以分析，以期唤起同志们注意，加以彻底的克服。

那些毛病呢？第一个毛病，就是形式主义。常有这样的情形，当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他们的计划常是随时可用、随地可用的照例文章，他们只知道习惯了的一套老公式，不知道依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种形式主义。

在我们的政治教育问题上（军事教育上也有某些相同），我们教的东西与战士们需要的东西，有些是不相符合的。例如，有些同志在战士面前专门喜欢谈论国际大势与国内大势，却不愿意谈论本地本军与本连本队的大势。把这种自己所最清楚的同时又是战士群众最需要最欢迎的具体事物，抛弃不谈，却喜欢向战士们输送大批的抽象概念。又如，有些同志常常喜欢凭空教导战士们要守纪律，要做模范，要英勇坚决，却不愿意把现成的、活的、动人的模范人物，英勇事迹，讲给战士们听。似乎这样的东西，没有讲的价值，只有大批概念，才是无价之宝。在这种情形下，教育的内容即是教条主义的，教授法、学习法、测验法也是教条主义的。教的人不管被教的人懂不懂，只管教下去，为的是要“完成计划”。学的人也就只得把听课当做一种负担，当做一门差事，虚应故事，从来也不知道要联系自己与反省自己。在测验的时候，只知算问答的分数，不知看实际的行动。这种情形，在许多部队中存在

着。在这些部队中，不但对战士的教育如此，对党员的教育也是如此，不但对政治教育如此，对文化教育也是如此。不重内容，但重形式的形式主义作风，成了我们宣教工作的一个严重毛病。这种情形，就陕甘宁边区说来，一九四三年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在干部的思想上，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的。

我们的有些支部工作，也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有些同志，当他们去检查支部工作、讨论支部工作的时候，当一个支部书记在布置自己工作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会议与汇报，名曰"建立会议制度"，"建立汇报制度"。会议与汇报执行得好的，就是"模范"，不好的，就不是模范，几乎把会议与汇报当做中心，当做一切。因此，支部忙于开会，党员忙于到会，结果是大家讨厌开会。为什么如此？因为这种会议是毫无内容的，枯燥无味的。战士们讨厌这种汇报，因为这种汇报多是消极地向战士们找岔子，反映所谓"怪话"，因此，引起群众不满。这种所谓会议与汇报，只是使支委脱离党员，党员脱离群众，象这样的支部工作，是没有法子做好的。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如果不是按照每一部队的特殊机能（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卫生队、运输队等等）及每一任务的特点（作战、训练、生产、做群众工作等等），去进行不同内容与不同形式的政治工作，而是对于什么都做成一样的政治工作，那就是一种很厉害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在若干部队中是存在的，是这些部队的政治工作所以缺乏生气的原因。

有些部队中写报告填表格的制度，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上级机关规定许多报告项目与表格形式，生硬地要求下级（特别是营连）去做去填。在此种要求下，下级只得拚命地做上去，填上去。但是这些东西的内容，大都千篇一律，很少实用，徒费精力。上级得了这种东西又往往堆在一起，不加分析与整理，结果化为废纸，无所用之。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我们军队中的许多组织形式是不合实际需要的。例如，有些政治工作机关分了很多的部与科，收罗很多的人堆在机关里，结果人员越多，工作越少，忙的多是一些琐碎的形式上的工作，真正的领导工作反而做得少了。又如连队中的工作网、十人团、青年队、政治战士，也变成了形式上好看，实际上无用的东西。

总之，凡属不合实际需要、徒具形式的工作方式与组织形式，都属于这一类，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个毛病，就是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是指我们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不知道抓住中心；检查工作时，不知道找典型；解决问题时，不知道从某一个关节着手。以至他们的许多计划，常常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早已成了日常习惯的业务，也要列入所谓计划之内，把一些不关痛痒的东西和主要的东西同时并列在一起，这样搅在一团，毫无眉目的所谓"工作计划"，完全失去了工作计划的意义。有些部队的同志不知道，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只应该有一项为当时情况所要求的中心工作，而以其他若干必不可少的工作附属之，而是同时发动做很多项工作，想在这很多项工作中获得成绩。但其结果则是一项也做得不彻底，一项也得不到满意的成绩。我们有些同志在检查工作时，可以把所有的连队都跑一遍，把政治工作的各个项目都考查一遍。但是结果呢？仍然没有发现问题，没有分析问题，没有找出事件的症结，加以恰当的解决。所谓"总结工作经验"，变成了一句空话。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工作方法，其原意是想样样做好，但其结果一样也做不好。这种平均主义方法，同形式主义一样，其性质是主观主义的，因为它是从主观臆想出发，不是从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

第三个毛病，就是重号召不重组织，以一般号召代替具体指导，换句话讲，就是空喊。我们看到有些同志提出的号召是不适当的，他们没有估计那里的工作性质，没有顾及那里的群众情绪，他们所号召的东西，并不是那个部队实际上所需要的东西。即使号召是正确的，我们也看到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自己发出的号召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二个号召接着又来。在那里，许多工作是在号召上打圈子，永远停留在号召的阶段，许多工作常常是有头无尾的。这是对工作的开玩笑态度，极端不庄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对政治工作，对领导机关，都只会损失威信，得不到任何好结果。与此相反，我们应该根据“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原则，一经提出号召，就应组织实行，并在实行中，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其余。如果没有具体指导，则所谓一般号召，就是自己给自己取消了。

第四个毛病，就是有些同志的孤立主义。不是人家孤立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这些同志，首先，不把政治工作看作是群众工作，不从群众观点出发，不采取群众路线，不组织群众行动，宁愿将政治工作锁在狭隘的圈子里，只有少数政治工作人员在做，在忙，广大群众却在那里闲着。许多事是可以而且应该协同军事工作同志一起去做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找人家，宁愿使工作老是抓不开。至于动员了群众的，也有这种情形，在那里，不知道照顾群众的需要，而是违背这种需要，不知道考察群众的情绪，而是忽视群众的情绪。从而关于领导群众的艺术问题，关于如何团结积极分子，巩固中间分子，提高落后分子的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群众的联系问题，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互相配合的问题等等，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或者完全被忽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不能不一般化与简单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变成了少数人脱离群众而孤立起来的所谓“工作”。此外，有些同志在解决问题时，不凭自己的本领，不凭自己勤于向上级、向下级、向群众去商量、去学习，借以取得知识、取得经验，而只凭自己的工作职位，只凭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以至于不得不把事情弄坏，有时甚至毫无办法，只好拿大帽子压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是孤立主义的方法。

总起来说：形式主义的作风、平均主义的作风、空喊的作风与孤立主义的作风，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是革命军队的作风。它同党的作风，革命军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我们的政治工作曾经有过很好的传统，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具体表现。过去工作中，凡是继承了并发扬了这种传统的，那里的工作就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与创造性，反之，就表现死板僵化，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毫无力量。现在在陕甘宁边区部队中，在整个八路军新四军中，都有很多生动活泼的创造。在长期抗战中，产生了很多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他们没有形式主义，也没有平均主义，没有空喊，也没有孤立主义，他们是实事求是与联系群众的。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应该表扬他们，应该展开每一个部队中学习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干部中群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无限的，只要我们善于把任务提出来，善于启发他们，善于鼓励他们，他们就会蓬蓬勃勃地活跃起来，发扬自己的成绩，纠正自己的缺点。即使在过去工作中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也会在这个群众运动中改正过来。经验已给我们证明：干部中群众中蕴藏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极性，一经被启发，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那时来看我们过去的缺点，就会显得不过是象太阳中的一些黑点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本来是太阳，这个太阳是要照耀全世界的。

三　（略）

关于发展农业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毛　泽　东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既是边区经济与财政的总方针，那末，在经济方面过去是如何做的，有些什么成绩，有些什么缺点，今后应取什么方针，就是首先重要的问题了。

边区的经济，分为民营公营两大方面。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关系：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支持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数万党政军的生活费与事业费的主要部分，以便减少取之于民，休养民力，便于将来紧急需要时的取给。在这里适用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

如果我们的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但是单靠人民交纳租税，还是不能解决抗战建国的需要；特别是在边区地广人稀的条件下，人民的租税与政府的支出之间，长期地存在着一个大矛盾。所以，我们又必须用极大注意力去经营公营经济，这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与我们的一切机关学校在自己肩上担负着的一个极大的任务。数年来在这方面我们有了很大的成绩，一九四三年我们还要造出更大的成绩，以便直接解决抗战建国的需要。公营经济愈发展，则人民负担就可愈减少，这又是培养民力的一个方法。而联合与通融民营与公营经济这两方面的工具，则是金融。

民营经济有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事业、盐业与商业。这里先说农业。

边区的农业，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下降的。那时的延安、安塞、保安、甘泉、华池以及东三县等，均有许多荒地。华池、保安两县交界地方有个长约二百余里的二家川，只住有二、三十户人家。保安的乌鸦寺、张家岔，在同治年间已无人烟。甘泉的傅村川，延安的金盆湾及马市川一大半，皆成荒地。边区棉花完全停止了种植。牲口破坏更大：羊子只剩四、五十万头，牛、驴只剩十余万头。纺织、驮盐等副业，亦同样被破坏了，尤其纺织几乎完全停顿了。食盐的输出，到一九三八年才有七万驮。由此可见，边区的农业在那个时期是衰落的时期。只在中央红军来到边区，内战停止；土匪肃清，使农民得以安居乐业；"左"的经济政策被纠正；休养生息的税收政策被提出；以及党政号召发展农业的影响，使农民的生产情绪大大的提高：才使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

下面是近四年来开荒、植棉与牲畜发展的统计：

年　别	开荒亩数	植棉亩数	牲		畜
			牛	驴	羊
1939	1,002,774	3,767	150,892	124,935	1,171,366
1940	698,989	15,177	193,238	235,054	1,723,037
1941	390,087	39,078	242,914	227,001	1,724,203
1942	281,423	94,403			
合　计	2,373,263				

说明：1．牲口的统计，葭、米二县未计入；一九三九年的牲口数，清涧等七县是将一九四〇年的数目加在里面的。

2．开荒是逐年所开数目。植棉与牲口是逐年统计之全边区所有数。

这个统计指明：边区的耕地是逐年扩大，植棉亩数是逐年加多，牲畜是逐年发展，并且实际有的数目比统计表上的数目还要多些。因此，从前许多荒地，现在变成了熟地。如二家川现有一百余户居民，全川荒地都变成了熟地。乌鸦寺、张家岔现在也住满了。延安县过去十一个区均有荒地，现在只有金盆、柳林两个区，中区半个区，姚店区一个乡有荒地。延安在一九三九年还只有耕地三十万亩左右，一九四二年就有耕地六十九万九千五百三十六亩。安塞、安定、延川、延长等县过去均有许多荒地，现在很少了。一九四〇年以前，边区还从洛川及河东买粮。现在则不但不要从外边买粮，且有部分余粮向榆林一带输出。一部分人口从外地移来，牲畜也增加了，并不感到粮缺。从这种种事实看来，边区粮食已能自给，是无疑问的了。

植棉不但恢复了革命前的最盛时期，而且发展了。例如：延川的永坪、永胜、禹居等区，从前是不种棉的，现在均种起来了。延安从前不种棉，现在也种起来了。因为种棉比种粮利大，一亩地的棉花，平均收成可值七百元以上，如种粮食则只值二百余元，是三与一之比。一九三九年种棉面积还仅三千七百余亩，至一九四二年就有九万四千余亩，产量已达一百四十万斤，这个成绩是很大的。但全边区需要量是三百万斤，这就是今后的任务。

牲畜的发展也很快。例如：延安在一九三七年只有羊八千多，现有六万以上。华池在一九三七年只有羊七万左右，现有十二万多。延川东阳区三乡张家河，在土地革命前只有羊五群（那里没有牧场，每群只能有三、五十头），现有十三群。牛驴的发展比内战时差不多增加了三分之二。因此，一九四〇及一九四一两年能输出食盐五十万驮。假如没有牛驴的增加，这项食盐是很难运出的。

但农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较普遍、成绩较多的要算直属各县及陇东，特别是延安、安塞、甘泉、华池、曲子和东三县。因为这里土地多，人口少，气候也不错。以运盐为副业也是这些县分多。同时，公家消费最多的也在这一带。没有发展的要算警备区，因为那里人口多、土地少，扩大耕地不可能。那里多少有些成绩的，是逐渐恢复了家庭纺织业；并向延安一带有些移民，相当地调剂了人口与土地的配备。

另一方面，发展的速度也不同。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发展是快些，特别是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有很大发展。例如：开荒在这两年有一百七十万亩。一九四〇年，羊增加近六十

万，牛驴增加五万多。但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的开荒，只有六十余万亩，仅及前两年的三分之一强。一九四一年的羊比一九四〇年还减少了，牛驴只增加一万余头（实际是减少了）。但在这两年，棉花和纺织又往前发展了。

以上是边区农业发展的概况。下面讲一讲边区农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在国内和平未建立前，农业是衰落的，以后是发展的。这种发展是怎样得来的呢？除了中央红军到达，土匪肃清，和平实现，农民能安居乐业外，还有以下原因：

第一是纠正了经济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因为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因经济政策的“左”，怕发展生产。另方面，因为农业经过革命前后的破坏，基础很弱，妨碍发展。中央实行纠正“左”的政策，打破了农民怕发展生产的倾向，农民愿意增加耕具，富农敢于安伙子，雇长工，休养生息政策恢复了元气，便利了农民的再生产；同时粮价高，副业利大，也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热忱，使农业迅速发展，并打下了一九四一年征收公粮二十万担与公草二千六百万斤的基础。

第二是发展生产的号召。例如：一九三九年中央召开的干部生产动员大会，第二次边区党代表大会，第一次参议会，第一次农展会，均有发展生产的号召，这些号召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首先推动了干部，经过干部深入了群众，动员了男、女、老、幼以及二流子均参加生产，增加了劳动力，最后地打破了农民怕发展生产的心理。因此一九三九年的开荒数达到一百万亩以上；真正向外面买进牲口来，也是那一年为最多。

第三是移民政策。最近四年中耕地扩大二百三十五万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土地多的区域大批地吸收了移民，增加了人口。例如：延安在一九三七年只有人口三万四千，现有人口七万左右（延市在内）。因此该县的耕地，由三十万亩左右，增至七十万亩左右。安塞在一九三六年只有人口二万左右。现有人口四万以上。甘泉原只有八千余人，现有一万四千余人。延长在一九三九年只有人口二万五千，现有三万二千余。延川荒地最少，但从一九三八年到现在，也增加人口一万余。华池在一九三八年只有三万五千人，现有四万余人，其他如保安、安定、靖边、陇东、关中各县的人口均有增加。这些增来的人口，以横山、榆林、神木，府谷为多，其次是警备区，均是自动移来的，不是由政府组织来的。他们之所以自愿来，是因为有土地，有优待；各县又组织老户在粮食、工具、窑洞上的帮助等；同时又有富农接纳安伙子，也便利了移民。移民增加，不但耕地面积扩大了，也发展了牲畜，繁荣了商业。所以移民是发展农业的条件之一。

第四是奖励政策。移民三年不收公粮，并减少其他义务负担。棉农中有种棉利益不及种粮利益的，由政府赔偿。从边区外面买进来的牲口，第一年减少一定数量的公粮。还有两次农展会对于劳动英雄的奖励，也发生了很大效果。例如：延安的吴满有、卯克呼，甘泉的杜发福，都是经过第一次农展会奖励过的，他们现在都成了很好的富农，缴公粮均在五担以上（边区一担三百斤），并在农村中推动了其他农户发展生产。所有这些，均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粮食与棉花的发展。

第五是减少劳动力的浪费与调剂劳动力。内战时，因忙于战争，不暇生产，土地荒芜。和平实现后，又有自卫军经常的训练与放哨，还有各种会议，故每个壮丁一个月至少要耽误三个工。后来将这种误工减少了。同时，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公粮收的少，义务运输公粮也不多，误工较少，最近几年中农村中的札工（有工头，集体为人家做临时工）、变工（群众互助性质，也是集体做工）发展了，调剂了劳动力。又动员了“二流子”参加生产，妇女参

加生产的也多了。所有这些，就帮助了边区农业的发展。

第六是农贷政策。以前没有农贷，但有休养生息政策的帮助。现在公粮加重了，特别是百分之八十的农户都要交公粮，一部分（大致有三分之一）缺乏耕牛、农具和粮食的农户，必须有贷款的帮助。并且为了在某种必须发展的农业（如植棉）、农村副业（如纺织）与某些必须更多发展的地区，给以农贷尤为必要。一九四二年农贷虽然只放出四百余万，其中耕牛贷款只有一百五十余万，但在此项贷款帮助下，买了耕牛二千六百余头，又买了近五千个农具，又发展了植棉，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帮助。但因财力有限，只能按照政府的财力来贷款，还不能按照农户的需要来贷款，但少有比没有总要好些，总有些调剂的作用。

上面讲的是农业发展的几个主要原因。下面再讲到我们工作中的几个主要教训。

第一，要因地因时制宜。农业的地区与时间不同，发展的方法也不同。例如警备区没有荒地（除清涧有少数），耕地不能扩大；羊子为牧地限制，发展有限；运盐又缺乏驮牲；减租政策又未彻底；因此，那里的粮食没有增产，副业除纺织外亦未发展。但是多锄草、多施肥、多犁地的深耕（改良作法）办法，虽在那里早已实行，也还应该根据现状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尽可能的增产。但是这种办法，若拿在土地多、人口少、作法粗的区域去用，便少实效。因为这些办法都要增加劳动力。在后一种地区的农民看来，深耕不如多种地，多施肥不如多开荒；尤其在雨水少的区域，多种地是较强的。所以改良农作法的口号，现时在后一种区域一般是少实效的。在这些区域，目前真正增加产量，最主要的还是靠开荒。如果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六年间，增加的耕地约有三百万亩，则一九四二年的收获量比一九三六年至少增加了粗粮五十万担，合细粮二十五万担（每担三百斤）。如果一九四二年边区的粮食产量估计为一百五十万担细粮，则六年来因耕地增加而增产的粮食，就占了总数的六分之一。此项增加的耕地，部分属于移民的开荒，部分属于老户扩大的耕地。由此可知，我们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一种地区以深耕为主，另一种地区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时间上也要有分别：在有荒可开时，以奖励开荒为主；在荒地开尽晚，就要转为以奖励深耕为主了。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间要有分别，就是在一县、一区、有时甚至在一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分别。例如一乡之中，某几村荒地多，就应鼓励开荒，其几村荒地少或无荒地，就应鼓励深耕。在时间上，尚有荒地时，该乡就应鼓励开荒，荒地开完，该乡就应鼓励深耕。但是我们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虽然一方面是有成绩的；但在另一方面，确又有许多工作是空洞的，一般化的。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知道周密研究客观情况，根据不同地方与不同时间，提出确定的要求，解决增产的条件。过去曾一般地提出深耕、开荒、修水利及增产四十万担或二十万担的口号，实际则包含着许多的主观主义，许多农民对于这些口号是没有兴趣与影响的。从此得出结论：今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解决问题。

第二，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农民至今还是重租重息，减租减息的政策没有彻底执行。农民一面要向地主负担租息，一面要向政府负担公粮公款，自己所得太少，提不起生产的积极性，也就不可能增加生产量。从此得出结论：我们要认真执行减租减息的法令。

第三，公粮增加与新收公草、羊子税及运公盐的影响，使农民生产情绪降低。例如：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两年农民所出公粮公草公盐甚大，而两年农民所扩大的耕地就只有六十余万亩，仅占一九三九年的十分之六。牲口在一九四一年实际上没有增加，羊子反而减少了（当然瘟疫有关系）。移民也减少了，一九四二年移民只有四、八四三户，并有三、五二七

户老户发生迁徙，原因主要是怕负担。还有一个原因：在公粮征收方法上，是按实物收获而不是按地亩多寡累进，这种办法，在平均负担上来说是合理的，但对促进农业投资是有妨碍的。因为同样的土地，收成多，要多出，收成少，可少出，甚至不出，这样就会降低农民在土地上投资的积极性。如按地亩征收，这点便可纠正，中、富农的积极性更会提高，对于贫农也无妨害。从此得出结论：公粮公草要有限度，同时要改善征税标准，方能促进农业生产。

第四，政策应贯彻执行。例如：移民与植棉，规定三年免收公粮，但实际又向移民"欢迎"公粮，棉地也征收公粮一半；从外地买进的牲口，原规定第一年减少一定数目的公粮，也未实行；还有奖励生产条例也未完全实行。所有这些，不但影响政府威信，而且会降低农民的积极性。从此得出结论：今后凡属政府颁布的法令，必须坚决实行。

第五，调剂劳动力及其他许多帮助农民的办法，如变工、札工等，关系增进农业甚大，但是除一部地方和延安等县外，我们还没有去加以组织和发扬。各县干部，固然有许多同志是在那里积极努力地替人民打主意，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发展生产的好办法，造出了许多的模范例子；但在另外许多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们缺乏实事求是与积极努力的精神，他们缺乏创造性，他们觉得农业上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或者不知从何着手，于是只提出"春耕"、"秋收"等空洞口号，自己采取消极态度，让农民自流地去干，政府只是事后登记一下。但实际上要做的事很多，很多好办法都可以想出来。例如：延安县在一九四二年春耕时，一部分农民情绪很低，发生了移走、或者分家、或者卖牲口准备缩小生产的现象。这些现象，在缺乏积极精神与缺乏创造性的同志看来，是没有办法的，只好听天由命，让其坏下去。但延安县的同志们却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消极态度，也没有官僚主义。他们能够抓住问题的要点，采取积极的办法，克服了困难。当时党与政府做了在宣传上、在粮食调剂上，在窑洞和农具调剂上的许多工作。后来，不但生产没有缩小，反而增加了八万余亩耕地。这一实例证明：我们的地方党与地方政府在农业上有很多的工作可做与应做，而且只要扼要、得法，一做就会生效。从此得出结论：干部要有克服困难的积极精神，要同群众联系一起，根据群众的需要，创造生动的办法，解决群众的问题，决不可有消极态度与官僚主义。

为了使我们的同志对于这一个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解决群众困难的极重要问题上获得一个明确的观点，特将延安县同志关于他们如何解决开荒问题、如何解决难民问题与如何解决二流子问题的报告，揭载于此，以供众览。

（中略）

我们引了延安县党政领导同志们的这个报告，不是偶然的，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塞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象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我们看，延安同志们对于工作是怎样充满了负责精神的："一九四二年农具贷款放迟了一个时期，早一天早开多少荒地！""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制订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

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象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么！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边区各县同志中象延安同志这样或差不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

以上是过去边区农业的总结，以下来说一九四三年的任务。

农业方面的主要要求是增产粮食和棉花（副业另说）。按照目前粮食与棉花的需要，并为争取部分粮食棉花出口，还要求我们动员农民群众增产二十万担细粮及增产一百六十万斤棉花。这个要求究竟有无希望呢？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六年之间，估计约开荒三百万亩，增产粗粮五十万担，那末，可否在今后数年内，再从开荒及其他方法上增产粗粮四十万担或细粮二十万担呢？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之间，棉地已达九万余亩，棉花已达一百四十万斤，那末，可否于今后数年内增加棉地十余万亩，增产棉花一百六十万斤呢？

我们认为是完全可能的。

农民如能增产细粮二十万担，那末，即使如一九四一年那样交出二十万担公粮，农民还是只以增产部分交给公家，自己可保有相等于原来的全部收获量。至于棉花，即使将来要酌量收税，农民也可保有绝大部分的收获量，解决边区的纱布问题。

应该实行一些什么切实有效、而不是空洞夸张的政策才可达到上述要求呢？根据过去经验，下列八项政策是必须执行的：(一)减租减息；(二)增开荒地；(三)推广植棉；(四)不违农时；(五)调剂劳动力；(六)增加农贷；(七)提高技术；(八)实行累进税。下面我们就来逐项加以申述。

我们的第一项农业政策就是减租减息。边区一百四十万人口中，约有一半是分过土地的，其余一半则未分过，如绥米警备区、陇东、鄜县及三边的许多地方都是。在这些地区，应依政府法令实行减租减息，这是增加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极其重要的方针。在减租减息后，农民对地主负担减轻，自己的保有量增加，生产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加，生产量也可增加了。关于这一项，西北局与边府已有具体决定，这里就不多说。

我们的第二项农业政策就是增开荒地。根据荒地多的地方农民认为深耕不如开荒的要求，我们应在一切有荒地的县、区、乡组织农民多开荒地，以期增产粮食。开荒除老户抛熟垦新所开者外，主要靠招集移民来开，移民条件现在是有的，各县应做很大的组织工作。各县应根据可能条件分别新户老户，规定具体任务。照延安县的办法，订立每家耕种计划。这种计划，应将开荒地、种熟地一概包括在内。一九四三年全边区增产粮食数目拟定为细粮八万担，从人民与军队、开荒与改良农作法各方面来完成它。

我们的第三项农业政策就是推广植棉。全边区需棉三百万斤，如果平均每亩能收净花二十斤，只需棉地十五万亩。如果每亩只能收净花十五斤，或者还要少，便需棉地二十万亩。我们可照后一种估计准备棉地。但因新棉户缺乏经验与信心，纵然扩大植棉面积，收成必不见佳，故不宜在一九四三年一年内完成全部需棉数目，而以一九四三年增辟棉地五万六千亩，连前九万四千亩，共计十五万亩，以期产花二百二十五万斤为适宜。种植此项面积的棉籽、棉地均无问题，但轧花设备很不够。以每架轧花机平均每日轧花六十斤计，需轧花机三百架，方能在半年内将三百万斤花轧出来。一九四三年有二百二十五万斤花要轧，需机二百余架。

但现只有破旧轧花机约一百架，每日能用的还不过五十架。如以五十架轧二百万斤，需要两个整年。故解决轧花问题，是推广植棉政策中包含着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再则，目前边区农民尚不会榨棉油。二百万斤棉花便有四百万斤棉籽，每百斤可榨油十二斤。如榨油能解决，则棉农收益增加，植棉积极性亦可增加了。根据如上要求，一九四三年政府关于推广植棉应做的工作有如下列：（一）实地分配有棉地的农户种足十五万亩棉地，并帮助棉户准备棉种、肥料及种棉经验，有耕牛农具困难的给予贷款。（二）制造轧花机及轧花机零件，供给棉农，并帮助棉农修理旧机。同时组织棉农向外地购买轧花机，政府酌予贷款帮助。用这些办法解决轧花问题。（三）研究棉油榨法，使棉农能将四百万斤棉籽榨出四十八万斤油来（每斤十五元，值一千零八十万元）。（四）组织公私合办的棉业合作社，经营轧花、打包、销售及榨油等事业。（五）奖励优秀棉农，介绍种棉、轧花等优良经验，借以增进棉农的积极性，提高棉产的数量与质量。

我们的第四项农业政策就是不违农时，即在农忙时允许农民停止一切无关农业的开会与动员。在陕甘宁边区环境内，农忙时期应该停止农民群众除农业以外的任何开会与动员，借以节省人力畜力，使之全部用到农业生产上去。必要的开会与动员，应当利用农隙。过去那种开会太多与动员太多的错误是应该纠正的。

我们的第五项农业政策是调剂劳动力。这里有奖励移民、劳动互助、动员妇女、动员二流子、着重优抗、生产给假、军队帮助等项办法，都是有助于劳动力的调剂的。

关于奖励移民，要靠政府和人民配合来做。其办法是：（一）由绥米警备区党政负责组织五千个劳动力的移民向直属各县开荒；但须在自愿原则下，并进行各方面的宣传组织工作。（二）政府准备部分粮食借给必须帮助的移民，另外酌予农具贷款，并切实实行免征三年公粮的优待办法。（三）发动老户帮助新户，如借粮、让熟地、借窑洞等；但此项借助应允许出借人享受利息，利率由双方自由决定。（四）组织基础好的农户吸收最穷苦的移民伙种。租率亦不过于低抑，使老户乐于接纳。（五）对外地移民，应经过和外地有关系的老户去号召。边境各县应有专人负责接待，替他们介绍至有荒地的地区去安插。例如近日有河南灾民六百至陇东，即应好生接待他们。

关于劳动互助。这就是说，在一村之内，或几村之间，不但每一农家孤立地自己替自己耕种土地，而且于农忙时实行相互帮助。例如以自愿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为一组，有劳动力的出劳动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出多，少的出少，轮流地并集体地替本组各家耕种、锄草、收割，秋收结账，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由少出的按农村工价补给工钱。这个办法叫做劳动互助，从前江西苏区普遍实行的劳动互助社或耕田队，就是用这个办法组织起来的。人口密集的乡村，还可集合多少互助组为一互助社，组有组长副组长，社有社长副社长，组与组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在必要与可能时，社与社之间亦可有些调剂。这就是农民群众的劳动合作社，效力极大，不但可使劳动力缺乏的农家能够及时下种、及时锄草与及时收割，就是那些劳动力不缺的农家，也可因集体劳动而使耕种、锄草、收割更为有利。此种办法是完全有益无害的，我们应大大提倡。边区有些地方已经实行的变工，就是这种办法。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社，大大地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此外还有一种札工，也为边区农民所欢迎，其法不是劳动互助，而是一种赶农忙的佣工组织，也是几个人或更多人为一组，向需要的人家受雇而集体地做工，一家做完再往他家，亦能调剂劳动力。各地对外来札工应予以帮助。例如帮助找工做等。

关于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边区妇女虽多小脚，但仍然是仅次于男子的广大的劳动力，她们可以参加各种辅助的农业劳动。如种菜、播种、锄草、喂牲、送饭、挑水、收割等，有些还能做主要劳动。她们过去已经相当普遍地参加了，今后还应广为宣传、劝告、发动她们的劳动热忱，借以增加农产。边区党的与群众的妇女组织领导机关的同志们，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工作方向，感觉无事可做。其实她们的第一个任务就应是研究与帮助边区妇女群众广大地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使一切多少可以从事劳动的妇女都走上生产战线，和男子一同解决增加生产的大问题。边区还有很大一部分妇女没有放脚，大大妨碍劳动生产，应用宣传与强制两种办法，在数年之内，使她们放脚。今后无论何人，不许再为幼女包脚。

关于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此事在过去数年已有显著成绩，各县在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后，二流子人数大大减少了。但是一切尚有二流子的地方，必须在一九四三年用说服与强制两种方法全部动员他们加入生产战线。延安县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的经验，是布尔塞维克的好经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人民的拥护，巩固社会的安宁。

关于着重优抗。过去事实上是优工第一，优抗第二，这是很不正确的现象。现应倒过来，优抗变为第一，把人民的代耕制，首先认真地替那些缺乏劳动力的抗日军人家属（不分我友）耕种土地，其次才是替那些真正缺乏劳动力的党政工作人员的家属耕种土地。在劳动互助社（变工）组织成功的地方，可以委托互助社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生产放假。这就是说，当农忙时，边区某些家境困难的党政工作人员，应每年允许他们回家二次，每次若干天，从事家庭生产。边区的小学、中学农忙时必须停课，让学生及本地教员回家帮助生产，这也是调剂劳动力之一法。

关于军队帮助。当农忙时，边区军队一律就驻地附近替农民耕种若干天，锄草若干天，收割若干天，而不收受任何的报酬（吃自己饭），一则可以调剂劳动力，二则可以借此密切军民关系。军队的政治工作部门，应当计划这一工作。

所有上述七项调剂劳动力的办法，如果实行得好，对边区的农业生产是有很大帮助的。其中特别是劳动互助社的办法最为重要，应在全边区普遍实行起来。

我们的第六项农业政策，就是增加农贷。一九四二年政府放了耕牛、植棉、水利等几种贷款，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帮助一部分农民解决了困难。边区农民中，有三分之一缺乏耕牛农具，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要使农业获得发展，帮助这个极大数量的农民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里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农贷。一九四二年由边区银行主持在延安、甘泉、鄜县、安塞、子长、固临、志丹等七县共计八千零二十五户农家中，放了一百五十八万元关于耕牛与农具的贷款，加上农民自己集合的资金一百零三万余元，共买耕牛二千六百七十二头，农具四千九百八十件，增开荒地十万余亩，估计可增产粗粮二万六千余担。另外在延安、延川、固临三县，放了植棉及棉花青苗贷款一百五十三万元，扩大了植棉面积五万一千余亩，估计可增产棉花八十七万斤。根据一九四二年农贷的成绩，除本年已放收回的三百一十一万元应继续贷与农民外，一九四三年还应增加一千七百万元，连前共计二千零十一万元，其中以一千四百万元办理农具耕牛贷款，以三百万元办理植棉贷款。根据一九四二年放款的经验，一九四三年的农贷实施，应注意下列各项：(一)贷款应放给荒地多的区域内有劳动力而缺乏耕牛农具或缺乏粮食接济的新旧移民及老户贫农以及土地种的多而无钱雇人锄草的农家。(二)经过物资局试办从外地买部分耕牛及适用的镢、铧，或帮助农民

自已去买，举行实物借贷。这样才是真正增加了边区的耕牛农具。否则，农民拿了边钞只能从边区富农地主手中购买耕牛农具，还只是从边区内部起了调剂耕牛耕具的作用，没有起增加耕牛农具的作用。（三）明年农贷既已增加，应相当地改变今年集中延安周围数县放款的方针，而以适当部分发到绥米、陇东、三边、关中各地去。但亦不应取平均主义，而要有计划地放在荒地多、需款迫切、而又能生产获利的那些县区与农家。（四）放款的组织要改善，即应经过当地区乡政府及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合作社去放款。因此，要使区乡干部认识农贷对于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不要将农贷看作赈灾救济，不可采取平均分配政策及不负责任的态度。（五）放款的手续要简单，要用当地农民已经习惯的借贷办法，不用“借款申请书”等手续。（六）在农贷的总数二千零十一万元中，划出三百万元，专作棉花与麦子的青苗贷款，借户在棉麦收获后以实物还款。这种贷款虽指定为棉麦青苗贷款，但农民可自由使用。这种贷款公私两用，政府可以收回实物，农民可以减少高利贷的剥削。（七）放款要不违农时。财厅及银行应即速筹划，以便在今年阴历年底以前发放贷款总数之半，即一千万元。

我们的第七项农业政策就是提高农业技术。这里说的提高技术，是说从边区现有的农业技术与农民生产知识出发，依可能办到的事项从事研究，以便帮助农民对于粮棉各项主要生产事业有所改良，达到增产目的。某些改良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已有了相当的经验，对这方面缺乏信心、缺乏热情是不对的，但夸大改良可能性以为边区可以实行现代化的大规模农业技术，则是没有根据的。

在这方面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做的呢？我们认为下列各项是应该做的：（一）兴修有效的水利。举靖边为例。靖边只长城区杨桥畔一地即有二万五千亩地可以修成水地，他们已修五千亩，一九四三年还要再修。据靖边同志说：旱地一亩只能收一斗细粮。但水地一亩年种庄稼三次：先种春麦，收八斗，合细粮四斗；次种黑豆，收四斗，合细粮二斗；次种罗卜，收二千斤，每斤价三毛，值六百元，按每斗细粮值一百五十元计，合细粮四斗。三项共合细粮一担，正当旱地收获的十倍。故靖边农民常常自豪地说：“先种麦子插黑豆，黑豆林里带萝卜”。修水地的重要问题是地权分配问题，动员民力问题，组织领导问题与壕坝工程问题，四者有一不当，即不能成功，一九四二年靖边同志领导农民在把兔湾、杨桥畔等地方打了六个坝，依坝作壕，引水灌地。他们事先替地主与农民按三七分地、四六分地或对半分地解决了地权问题，发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据靖边同志说：“只要解决地权问题，农民是容易号召的。如我们修十处水地，除原有农民二百余户外，新号召来的有百余户，其中有从友区来的三十多户。”又说：“修水地，政府贷款固然重要，但主要地要靠组织民力、吸收游资。靖边一九四二年兴修五千亩水地，共用工28,560个，平均每亩地用工5.7个；共用款858,000元，其中公家贷款210,000元，吸收游资648,000元。当然这个游资绝大部分是老百姓以工代款的。”关于组织领导，靖边同志说：“我们对兴修水地的领导，采取下列两种办法：一种是就地物色好的农民三人至五人组织水利委员会，负责调剂劳动力与调剂劳动工具等。但其中常因地权问题、水利使用问题等难解决，障碍水利工程之进行，故尚须有第二种办法，即政府派干部协助领导，解决群众中的争执问题。县府除水利局外，另外派了三个干部分管十处工程的领导。”靖边同志们还决定于一九四三年继续在杨桥畔修四千亩水地。但因该地原来只有居民六十户，一九四二年移来四十余户，共计百余户，劳动力还成大问题。故决定于一九四三年招来移民一百户，现已开始打窑洞，准备住的地方。“对于处理这一百户移民是一个大工作，因为他们多是从横山来的，多是难民，故还需相当的代价，才可完成。

若移民到达，加上当地人力，一九四三年再修四千亩是不成问题的。”此外，靖边同志还修了一种水漫地。所谓水漫地，“就是处在三面高山一面天沟之间的大块平地，有的二三千亩，有的二三百亩。此种土地，土质很好，但上面堆着砂砾，妨碍禾苗，并使土质变坏。”修这种水漫地的办法，“就是沿天沟一面畔上打起很坚固的坝，栽上沙柳与宁条子（冬天可供羊吃），使当年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水，不叫从天沟流去，全漫在地上，泥质既厚，肥料又多，又富水分，极宜庄稼；并使地面年年扩大，把山沟都漫成平滩，生产面积也扩大了。”这种水漫地比旱地收成多到一倍以上，“如旱地一垧（边区延安一带每垧三亩，靖边一带每垧五亩）打粗粮一担，水漫地就可打二担或三担。”这种水漫地的修筑，是靖边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春耕动员时才发现的，故还只在两处地方试修，修了一千亩。他们准备于一九四三年在好几处地方同时修筑，共计面积一万三千余亩。据说“全县共可修筑水漫地五万至六万亩”。我们详举靖边这一实例，证明兴修水利并不是没有希望，在有些地方是有修水利的条件的，特别是靖边同志这种认真努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各县效法。各县水利情况虽不会与靖边相同，但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与人民的努力，在真正有利的条件下，也可开发若干水利事业。政府于一九四三年应拨出二百万元，在靖边之杨畔桥、鄜县之葫芦河等处进行水利贷款。(二)推广优良品种。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例如光华农场已经试验成功了的狼尾谷，产量高，不怕虫蚀、鸟啄，随地可种，他们的洋芋产量也较普通为高，应向农民提倡种植。先在每县各择一二个区令一部分农民试种，如觉土壤、气候颇宜，即可普遍推广，以期增产。(三)鼓励从事秋开荒、秋翻地。因为秋开荒、秋翻地，可以减少虫害，可以促使土壤风化，又可保持水分，增加来年的收成。(四)在劳动互助社组织推广之后，鼓励农民多锄一二次草。锄草的作用不但在于去草助苗，而且在于蓄水耐旱。如多锄一二次，即使施肥不多，亦可增加收获量。(五)由建厅及五个专署筹划，在一九四三年夏冬两季，五区分别举行五个展览会。根据边区两次农展经验，改善农展布置，介绍与鼓励农民模范成绩，推广吴满有式的劳动与得法的农业生产运动。一九四三年各区农展，要有军队及机关学校农业生产成绩的参加，借以鼓励军队及机关学校的农业生产，并达军民联合之目的。(六)《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一九四三年应大大提倡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使在三个区域内产生很多的吴满有。(七)边区的小学及中学应设农业常识课，并应编制包含边区实际农业常识的冬学课本，以达改良农业增加农产的目的。(八)建厅应召集专家，着手研究从梢山流出的柳根水，加以科学的处理，以免人民吃了成“拐子”。这个问题如能解决，则靠近梢山的许多沃野可以诱人耕种，变成大量的良田。

我们的第八项农业政策是实行农业累进税。过去的农业税是采取救国公粮的形式，虽然也是按累进原则征收的，但是每年征收总数多少不一，每年每家征粮数自然也就多少不一。一九四一年发生摊派现象。一九四二年虽改取评议制较为公平，但不公平的现象还是有的。主要缺点是税率不确定，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议政府于一九四三年进行人民土地的调查与登记，依次制定一种简明的农业累进税则，依一定土地量按质分等计算税率，使农民能够按照自己耕地的量与质计算交税数目。农民有了这个计算，就可计算他全年全家收支的比例，就可放手进行生产，而增加生产积极性，保证粮食的增产；政府征税时也就不发生不公平的问题了。一九四三年这个准备工作完成后，一九四四年就可实行征收累进税。有些准备工作完成得早的县，可于一九四三年先行试办。

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违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与准备

实行累进税——这八项，就是我们在一九四三年可以做、必须做、并会切实有效的农业政策。除累进税一项一九四三年是做准备工作或只在几县试办外，其余七项，应即全部实施。其中有许多在一九四二年冬季就要动手做，否则时间误过，就会变成空话。

上面这些，就是我们对于过去民营农业工作的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农业工作方针。下面再说与农业密切联系着的农村副业，如畜牧业、手工业等。

（转自《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原新华书店1949年2月版）

关于发展自给工业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毛　泽　东

前面所说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与盐业，都是人民的经济事业，党与政府就其可能与必需的范围内给以指导与帮助，使其有所发展，解决人民的需要；同时，即由人民以租税的形式交出一部分给政府，保障一部分政府的需要（如公粮、公盐及其他税收）；又以买卖的形式交出一部分给政府，保障又一部分政府的需要（如棉花、棉纱、棉布、羊毛等）；其基本性质是属于人民经营的。只有盐业一项，因有政府盐业公司经营的四万驮盐的运销及直接解决公用食盐约五千驮，故有一部分（约当全部盐业七分之一）是属于公营的。

全部公营经济事业包括下列三部分：（一）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二）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三）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些就是直接保障党政军人员的生活资料及其事业经费的供给的。这一部分的供给量，依一九四二年的计算及一九四三年的预算看来，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包括公粮在内）。故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的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有其历史的与现时的原因。还在内战时，中共中央曾经为了战争需要而在江西苏区建立了一部分公营工商业。那时，为了补助伙食之不足，也曾经发动过各机关学校种菜养猪的事。那时，只有军队还无生产的经验。那时，因为江西农民比较富庶的条件，还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解决粮食。这是历史的原因。抗战以来，我们是处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对于我们的军队，初则只给很少一点饷，继则完全断绝，边区也被封锁，迫得我们不得不从事生产自给，维持抗战的需要。这是现时的原因。

抗战以来，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那时，在军队方面，由于经费不足，开始了生产运动。但在那时，我们还只是令一部分部队试作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其目的只是借以改良战士们的生活，还没有企图借以解决一般的财政供给。后来看见试办的战士们在做这些工作中生了成效，他们果然能于教育之暇做出许多生产工作来了，他们的生活果然改良了，他们因生活改良，逃亡现象也减少了；由于看见这些成效，我们就把这个经验普遍地应用到那时留守边区的部队，由留守处下命令叫各部队都学着这样做。但也还是为着改良生活的目的，不是为着解决一般需要的目的。那时政府方面，开始注意建立了几个小的工厂；但对机关学校，则连种菜、养猪我们也还没有叫他们做。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间的关系不如从前了；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增多，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由于这个原因，追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那时，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

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曾经指出这样简单的道理：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么？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那时我们又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里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十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他人，为什么我们反不如这样的农家呢？我们的军队全部都是劳动力，没有女人、没有老人小人，又没有租税重负，为什么还会发生饿饭的事？我们有政府这样的权力机关，为什么还不能解决自己的衣食住用问题？我们考察一下从古代的人类到今天的贫农，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并且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两只手，我们也可以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这个考察很重要，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这时，我们提出的任务比一九三八年不同了，不是仅仅为了改良生活，而是解决一般需要的一部分。动员的范围也不限于军队，而是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律进行生产，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号召。“开荒歌”是那时唱出来的，“生产大合唱”也是那时产生的。这一号召，不仅动员了几万党政军学人员，也动员了边区的老百姓，这年老百姓开荒达一百万亩之多。这一号召又传播到了华北，在战场上作战的八路军也有许多在战斗间隙中从事生产的。这是我们的生产自给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及一九四〇三个整年。在这一阶段中，政府的工业建设发展了一步，军队与机关学校发展了农业生产。

一九四一年至此次高干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为第二阶段，生产自给的基础已经坚固地打下了。在这两年中，人员增多了，许多人因外边蹲不住来到边区要吃饭，为了增强河防三五九旅也来了，军队增加了，而外援全断，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只能完全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而在取之于己这一方面，两年努力的结果，从总量上说来，是超过了取之于民那一方面的。这一阶段的经验，使我们发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城”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

已经过去了的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部队、机关、学校着重于农业，政府则发展了工业。第二阶段则着重了商业，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需要，除一部分部队与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的方针外，其余都讲究做生意，没有象在第一阶段那样的重视农业了；但政府、部队与机关学校都发展了工业与手工业。此次高干会后将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因为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

关于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三部分公营经济的分类，仅就主管经营一点而言，不是指经济性质而言；故我们在下面讲到自给工业时，准备将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工业统一地讲在一起；而在论述军队与机关学校的自给经济时，再将个别的工业生产加以说明。但因全部公营工业中，政府经营的占着主要部分（政府纺织厂占全部公营纺织年产二万二千余

匹布的百分之五十六，政府纸厂出品占全部公营纸产量的百分之七十，政府肥皂厂出品则占全部边区肥皂产量的百分之七十），故将自给工业归入政府部分来讲，也是合理的。

同一自给工业，为什么要这样地分散经营呢？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的数百职工大部分都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又原料分散，交通不便，也是分散经营的重要原因。例如被服工业，为解决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各地党政军人员的被服需要，自宜就地产布（或买布）就地缝制为有利，决不应集中在延安一处缝制。由于这些原故，我们利用各部门为着解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地集中起来，无限制的分散是不利的。这种集中，目前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例如：中央管理局的团结纺织厂，后勤的交通纺织厂，已经拨交政府管理，就是一例。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可免的，分散所以利用各部门的积极性使之建立起来，集中所以使各部门得到更好的供给。但尤其重要的，是分散经营不应该忘记集中领导，这就是使计划统一，供销衔接，经营合理与分配恰当之必不可少的步骤，我们过去在这一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今后必须加以调整。总起来说，我们的方针就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不但工业是这样，农业商业也是这样的。

在这里，对于所有的公营农工商业，都要区别两种形式：一种是大的，一种是小的，大的应该集中，小的应该分散。例如：由各伙食单位，或几个伙食单位联合，为着解决自己日常伙食费、被服费、办公费之不足，而进行种菜、喂猪、打柴、烧炭等农作事业，做鞋、打毛线衣、开小磨坊等手工业，与为着消费目的及为着赚点小利解决公费之目的而进行的合作社事业及小贩商业，所有这些，就都是应该奖励其分散经营的。这些都必须分散，到处进行，到处发展。这些都是不可能集中，因此也就不应该集中的。这是一种形式。但是还有另一种形式。例如：为着解决军队全旅全团一定数额的粮食而进行的大农业计划，即屯田计划；为着解决多数机关的粮菜需要而经营的大农场；为着解决全旅全团或多数机关的被服需要与日用品需要而经营的大作坊、大工厂；为着解决全旅全团或多数机关的事业经费而经营的大商业；所有这些，就必须有统一的计划，集中的管理，严格的节制，不能听凭他们各自为政、毫无拘束地去干。在应该集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而是由这样的一个机关（现在是边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办事处），根据全体及各部分的需要与经营的可能条件，作出统一的计划，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在党政军的每一大系统里，又有统一计划与分别经营的事。所有这些，就是边区公营经济中的“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全貌。

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过去五年的公营经济事业，有了非常巨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民族，都是值得宝贵的，这就是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经济的模型，这种模型之所以为新式，就是说，它不是俾士麦式的旧型的国家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最新型的国家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或三民主义的国家经济。

又我们所谓公营自给工业，在目前还未达到自给的全部需要量，还谈不到以其余力解决人民的需要。还只能由党政予以组织推动，由人民自己动手去解决。目前我们的一切努力，只是争取在二三年内完全满足自给的需要，特别是布匹的需要，不要妄想在目前条件下可以

有什么了不起的发展，这样想是要害事的。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论述五年来我们的公营经济事业，先说自给工业。

我们之注意公营工业的建设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在这一年，边区政府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工厂、造纸工厂、被服工厂、农具工厂及八路军制药厂。这些工厂到后来，大部分都起了很大的倡导作用。这时，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十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沈先生本人亦来边区工作。从这时起，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材，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一九三九年边区经济开始被封锁，工业品的输入受到限制，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动手”“自立更生”的号召。边区政府于是年一月举行了农业展览会之后，又于五一劳动节举行了工业展览会，激起了发展工业的热忱。政府与后勤部先后派人到西安采买机器材料。又在延安、安塞两处组织纺织合作社及榨油、瓷窑等生产合作社。从西安买来的机器材料虽不充足，但已成了数年来发展边区工业的主要物质力量之一。这一年又设立了新华化学工厂、光华制药厂，在延安十里铺开始探采厚层煤矿。

一九四〇年的工业发展是在生产上达到“半自给”的政策下进行的，确定以发展轻工业为主。一月间举行了第二次工业展览会，检阅了我们工厂的力量。银行借款一百万元扩大工厂资金，建立正规厂址，继续购买材料。二月间，中央提出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九月间，朱总司令提倡纺毛运动，发展了一部分毛纺织事业。许多大的机关学校部队都积极筹设工厂，派人到原有工厂学习技术，研究管理办法，奠定了一九四一年猛进发展工业的基础。

一九四一年中央提出“由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下，银行增借三百万元，政府亦投资五十万元于各公营工厂；许多机关、部队亦均筹款设厂。三八节曾举行生产展览。十二月银行大楼落成，由银行主持又办了一次工业展览。兹列举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在一九四二年所设各厂，以见此时各单位对于发展工业之努力，虽则这些工业都是规模不大的手工工厂及规模很小的手工业：

1．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开办新中国纺织厂，实验工厂，木器制造厂，木工厂，第一炭厂，第二炭厂，瓷窑，被服厂，资金总数二十余万元，人员二百二十余人；

2．中央组织部开办胜利毛厂，胜利木工厂；

3．中央宣传部开办七一磨房；

4．马列学院开办团结纺织厂；

5．中央党校开办中山纺织厂；

6．自然科学院开办毡房，磨房，酒精厂，玻璃厂，机械厂；

7．鲁艺、陕公、青干、女大均有工厂；

8．中央出版发行部办有新华木工厂，被服厂；

9．教导大队办有延园纸厂。

上述中央直属系统即办有工厂二十七处，全部人员四百七十七人，资金总额四十余万元，大都是为着经济自给的目的而进行的。

此外，经建部、留守处、保安司令部、边区财政经济处、三八五旅、各专署，均办有若干单位的小工厂。三五九旅所办大光纺织厂产量较大。三五九旅各团，亦均自行办有棉或毛的小型纺织厂。

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的工业建设，是在发展着；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给一九四二年的巩固工作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一整个时期的建设是带着盲目性的，在许多人员的头脑中缺乏清醒的了解，只知道现在，不知道将来，只知道分散经营，不知道统一领导，充分地表现了一种无政府状态。由于这种情况，致使各工厂有的只建筑了房屋便完事，有的开工不久便告结束，有的合并于其他工厂，继续保存下来的只有一部分。至一九四二年，就延安附近的纺织业来说，只有难民、交通、团结三大厂及兴华、公益两小厂保存下来。这一段“之”字路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家只能从自己走过的路上得到经验。但在有了这一段经验之后，从新从事工业建设的，就应避免再走这一类“之”字路才好。

一九四二年，建设厅确定“巩固现有公营工厂，发展农村手工业”的方针；政府对工业的投资达一百七十万元。农村民间手工业至本年已很发达，如绥德手拉织布机达六、七百架；其他地区如制毡、硝皮、打铁等也有发展。特别是公私纺织业发展得快，其困难也特别多。为了保护纺织业的发展，减低棉花、洋纱进口税至百分之一，增加布匹进口税至百分之十五。银行在绥德组织“永昌土布产销公司”，投资二百万元，发棉花，收纱布，奖励农妇纺纱织布。由于民间家庭织布有了发展，私营的小型资本主义式的纺织生产合作社的布多无销路，土纱供给也感困难，这些纺织生产合作社遂不得不缩小经营范围；或化整为零，将机件分散民间，改为家庭副业。公营纺织厂因主要是供给公用，自能维持；但棉花与纱的供给亦感困难。公营造纸业振华总分两厂，本年完成了供给出版局三千令马兰纸的任务。利华第一第二厂，原定二千五百令，计划未完成，本年产量不超过五百令。其他公营纸厂，则因纸无销路，颇感困难。公营毛织厂出品如毛毡，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政府自己不用，部分输出，部分卖给部队；其精制毛线特别受人欢迎，且有厚利。自九月起，交通、兴华、团结三纺织厂，利华一二纸厂，都由中央及后勤系统移交边区政府管理。为保证一九四三年纺织原料，本年已开始向东三县收买棉花，计划收买量为七十五万斤。为保证造纸原料，向甘泉、延安、安塞、安定等县征收马兰草七十三万斤。各厂人员补充，须待精简工作实行时才能解决。

一九四二年，特别是此次高干会，是边区一切公营经济，就中也是公营工业，开始清除盲目性，清除无政府状态，而增加自觉性，实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经营之重要时期。虽然中央还在一九四〇年二月间就已指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但直到一九四二年才引起同志们的注意，直到此次高干会才得到全体一致的承认。五年的实践经验，使我们大进一步了。高干会后，各种公营经济均将加以调整，使之达到比较健全的发展，工业也是如此。

以上，我们将边区五年工业历史作了一个简略的说明。截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们已有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七类工业。其中，纺织工厂十八个，资金二千六百九十万元，职工一千四百二十七人；被服及制鞋工厂八个，资金一百万零一千一百元，职工四百零五人；造纸工厂十二个，资金四百一十万元，职工四百三十七人；印刷工厂三个，资金五百二十万元，职工三百七十九人；化学工厂（制药、肥皂、皮革、陶瓷、石油等）十二个，资金一千七百零三万元，职工六百七十四人；工具制造工厂九个，资金三百六十六万二千七百九十二元，职工二百三十七人；煤炭厂十二个，资金一百七十七万七千零七十元，职工四百三十二人。以上七类共计工厂六十二个，资金五千九百六十七万零九百六十二元，职工三千九百九十一人。我们的这一点工业虽然还是小小的，大部分又还是手工工场业，机器工业只占着一个小部分，但已费了整个五年的努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起了保障供给、调节物价的作用。从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是一定可以起更大作用的。

我们的最主要的自给工业是纺织工业与被服工业，这是几万军队与机关学校人员每年布匹被服赖以自给的地方，否则我们就要受冻。我们的纺织厂一九四二年已能产布二万二千余匹，但我们的需要量是四万至五万匹，尚须作极大努力才能达到自给目的。但要发展纺织工业，必须实行如下的政策：（一）提高布匹进口税，保护土布；同时，部队及机关学校要一律采用边区出产的土布。（二）普遍倡导民间妇女纺纱和纺毛，保证工厂纱线原料的供给，同时即增加群众的收入。（三）解决供销问题。无论公营、私营或家庭副业之能否发展，主要系于供销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在原料方面，目前棉花棉纱还不能自给，来源不经常；又因交通不便，分配上有困难；须要解决到使棉纱生产者随时可以买得棉花，使布匹生产者随时可以买得棉纱。成品方面：布匹和毛织品销路不经常，需要使生产者能在适当市价下随时推销其成品。这个问题必须集合财政机关、商业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的协同力量，才能解决。（四）关于被服供给问题，须照财政厅在一九四二年所实行的办法，既能节省经费，又能及时有衣穿。

我们的造纸工业现在已能年产五千多令马兰纸，一九四三年可增至七千令，已够全部印刷之用。但须（一）统一纸的生产与供给。马兰纸除供印刷外，尚不适于普遍使用，印刷部门若不要，即售不出。目下即有这种现象：印厂纸不够用，纸厂则成品堆积售不出，资金周转不灵，影响生产。一九四三年应统一收买与供给，由固定机关与纸厂发生经济关系，以解决此种供求不协调的矛盾。（二）提高纸的质量。依据现有的生产设备与技术条件，纸的质量还可提高，但要多费人工与原料。就其作用与意义上说，费用略大也是值得的。另一方面，应研究改进造纸工具，以提高生产效能。

我们的印刷工业是现代化的文化工具，大量书报赖其供给。一九四二年，中央、八路、西北三厂生产五千一百六十万字，一九四三年可增至五千三百六十万字。但须添置器材，保障纸的供给。

我们的化学工业就是药品、肥皂、皮革、陶瓷、玻璃、酒精、火柴、石油等业。药品有八路军制药厂及光华制药厂，能供给军用及公用中西两类药品之一部分，尚不能完全自给。一九四三年应研究边区出产之药材，并设法购买原料，以期增产必需药品。肥皂有新华、大光两厂，出品日增，质量亦好，除自用外，还可外销。新华工厂，一九四三年可产价值七百万元之肥皂四十二万条，有发展前途。制革厂规模不大，材料昂贵，不能多发展。如能采取边区出产之植物材料制造军用皮革，便有发展前途。陶瓷有三个小窑，制造日用与工业用之瓷器。玻璃已试验成功，决定设厂制造。酒精已能自造，供工业及医务之用。火柴尚未能解决磷的问题，正在研究从兽骨取磷。此外，尚有延长石油，亦能年产少许，以供军用，其中白蜡油可供日用。总之，化学工业须择其可供急需或有利可图者扩充之或兴办之，其他则不必办。

我们的工具制造业是为着制造纺纱机、织布机、弹花机、轧花机、造纸机件、大车、木工工具及农具等而设的，多属手工工具，但是十分需要，应研究改良，予以发展。

我们的石炭业集中于延安、关中等处，多为日用目的，规模虽小，但属必需。

边区缺铁，妨碍工具及农具之制造与改良。近在关中试验，有成功希望，如能制铁，则解决边区一大问题。

边区全部公营自给工业略如上述。不论纺织、造纸、被服、印刷、化学、工具、煤业均有相当的发展前途，先求完全解决军需公需，准求供给一部分民需。为此目的，我们在一九四三年应有如下的改革计划：

（一）增加资本（数目另定），由各有关机关拟具具体计划，经财经办事处审定，分别投放于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业、煤铁业、石油业、某些部分化学工业及某些调查研究事项，有计划地促进自给工业的发展。

（二）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过去提出的“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因没有切实执行，致使建厅管的财厅管的军队管的机关管的各部分工业之间，缺乏计划性，生产过于分散，又缺乏工作检查，浪费人力物力。一九四三年应由财经办事处建立统一的领导，首先要使所有公营工业，不论是属于那一部门管理的，均须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在这个统一计划上，统一地筹划原料与粮草的供给，产量的定数，销路的衔接。在原料供给上，要解决由于地区分散、原料不集中和有些原料仰给外来，而使许多工厂随时都闹原料恐慌的现象。在粮草供给上，应由财厅经过一定的核算办法，供给各厂以所需的食粮及草料，以免各厂负责人分散其管理生产的注意力。在产量与销路问题上，应由财厅及各有关机关，在财经办事处统一计划下，给予各厂以一定数额的生产任务，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成品有一定机关按时接收，解决产销之间的矛盾现象。在这个统一的计划性上，要实行各业间的互相协助，消灭互相孤立甚或互相妨碍的本位主义。在这个统一的计划上，要实行统一的检查，对各业各厂有奖励，有批评，使工作差的赶上好的。总之，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问题，必须彻底地努力地解决之。

（三）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为此必须：第一，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困难，妨碍生产。第二，每一工厂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结束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糊涂现象。第三，依照各厂具体情况，使有些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第四，每一工厂的生产，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很久不去检查。第五，每一工厂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

（四）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目前我们有许多工厂在组织上非常不合理，人员众多，组织庞大，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人员的分配不适当，以及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我们的小工厂上面，这些现象必须迅速改变，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一切工厂，应依自己经济的盈亏以为事业的消长。一切从业员的薪给，应由工厂自己的盈利解决，而不支领公粮公衣与公家的津贴费。其次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军工生产暂时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亦应有计件奖励制度。再其次，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

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三方面要组织统一的委员会，首先使行政人员、行政工作、生产计划走上正轨，而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再其次。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

(五)充实与扩大纺织厂，增加布匹产量，争取在一九四四年公用布匹的完全自给。改善毛织品，除供军用外，扩大出口量。制定关于被服的布匹与缝制的标准。保证棉衣与被褥能用二年。

(六)整理造纸厂，改善纸质，使能完全适用于印刷与办公，做到在一九四四年印刷与办公纸张的完全自给。

(七)增加煤油出产，保障煤油自给，并争取一部分出口。设法造磷或买磷，使火柴厂有一部分开工。其他工业，择急需者或有利可图者继续进行，或予扩充。凡不适合保障供给原则及无利可图的企业，实行合并或关闭。

(转自《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原新华书店1949年2月版)

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毛　泽　东

政府、军队、机关三部分公营经济中，从直接解决需要的最迅速与最大量说来，究竟那一部分是最主要的呢？依几年的经验看来，军队是最主要的。因为军队是比较更有组织性与比较具有更多劳动力的集团，他们只要没有直接的作战任务，就可以将他们除教育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从事劳动；而在我们目前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劳动力是经济事业中的决定的条件。所以军队的生产事业，成了三部分公营经济中的最主要的部分。

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生产运动，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比之机关学校要早一年。一九三九年，军队与机关学校一同进行了生产运动。一九四〇年，三五九旅担任河防，参加了这个生产运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军队与机关学校一样，增加了生产自给的任务，而军队担负的责任是更大的，在生产自给的总量中，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这几年军队的生活资料及事业经费主要地不是由他们自己解决而要仰给政府，那是不能设想的。他们在党中央及西北局的"生产自给"的号召之下，在战斗、警戒与训练的紧张任务之中，完成了他们的生产自给任务。虽然各部分军队所处的客观条件有好有坏，担负的勤务有多有少，努力的程度有高有低，从事生产的方法有优有劣，因之所得的成绩也有大有小；但是一般地说来，都是完成了任务的。他们都以极少的资本，落后的技术条件，发展了农业、手工业、运输业与商业，有些还开设了规模较大的纺织及造纸工厂。在这两年中，政府向军队的生产事业上的投资，一共不过六、七百万元；但是他们在两年中，不但保障了价值三万万元以上的供给，还在他们所经营的农工商业中积蓄了约八千万元的资本，开辟了几万亩的土地，提供了在整个生产建设中的丰富的经验。他们不仅起了保卫边区的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作用，而且起了直接解决大数量的财政供给与帮助着发展边区经济的作用。

让我们来看一看某团一个连的生产自给情形。这个连在一九四一年的收入与支出如下表：

一九四一年的收入（元）		一九四一年支出（元）	
驮石炭	698.20	杂支	1,312.00
驮盐	772.45	骡二头	2,850.00
锯木板	3,265.40	驴一头	574.00
砍木椽	630.00	汗衣六百套	600.00
贩猪	738.00	鞋面每人二双	405.50
骡马店	2,256.00	毛巾八十七条	128.00
贩玉米	998.20	草烟	179.00

收入		支出	
出口生意	935.60	盆	90.00
杂货生意	481.25	生产工具	181.00
油（840斤）	16,800.00	油	16,880.00
肉（1610斤）	16,100.00	肉	16,100.00
菜（4690斤）	4,690.00	菜	4,690.00
木炭（5000斤）	500.00	木炭	500.00
柴（25550斤）	2,555.00	柴	2,555.00
领生产资本	750.00	伙食补助	3,771.00
领办公杂支	360.00	五个月津贴	567.50
领生产补助费	2,855.00	擦枪费	22.00
领伙食补助费	3,771.00	缴单衣费	100.00
		发过年费	146.00
		办公	339.00
		马干	540.00
总计	59,156.10	总计	52,530.00
收支相抵净存	6,626.10元		

上表支出数五万二千五百三十元中，除去上级所发生产资本七百五十元，办公杂支三百六十元，生产补助费二千八百五十五元，团供给处补助伙食三千七百七十一元，共七千七百三十六元，该连自己由生产解决之数达四万四千零四十四元，而所存资金可继续为下年生产之用者尚未计算在内。

依此计算，每团以十个连计，即自给经费四十四万零四百四十元。

尚有团部，团直属队及三个营部所经营之生产自给，如下表：

团部	197,425
团直属	27,149
一营	12,777
二营	18,629
三营	7,408
合计	263,388

上述连、营、团生产自给合计七十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元，该团全年总支出（粮食及一部分被服在外）为八十九万六千八百三十八元，尚差十八万五千五百一十元，由上级补足，故该团自给数占百分之七十九，上级补足数只占百分之二十一。若加上旅部的很大数量的生产自给，则全旅自给数当超过百分之八十甚远。

下列材料是留守处对于留守兵团的五年生产总结，可以看出军队生产自给的一般情形。

留守兵团五年生产总结

甲、五年生产自给概况

留守兵团，由于抗战以来的新的困难环境，在毛主席生产号召之下，从一九三八年秋季

开始进行生产运动。这时候生产还不是担任自给的任务，仅仅是补助生活必需上的不够。当时我们只能给部队每人每天发菜钱五分，粮食一斤半，以当时市价每元能买蔬菜三、四十斤，清油二斤，柴火一百斤计算，如以每连一百人计，每天共只有五元菜钱，买到蔬菜就买不到油盐柴火，买到油盐柴火就买不到蔬菜，猪肉更加吃不上了。在被服方面，当时很少见到一个衣裳不打补钉的战士。子弹袋破烂得不能装子弹，装在挂包里。有的夏天穿棉衣，冬天穿短裤。有的雪地打赤脚下操，有的连破烂的皮带裹腿也找不到。这些就是当时军队的物质生活情形。

这时生产运动的办法是：(一)开合作社；(二)大量种菜；(三)开磨坊、喂猪、养羊、做豆腐、生豆芽；(四)发动各个战士学会做鞋；(五)打毛衣、毛袜、毛鞋、手套；(六)提倡节约，防止浪费。一九三八年半年生产结果，超过了计划，战士生活大加改善。例如保证了蔬菜的自给；每周可吃两餐猪肉；部分的解决了毛衣、毛袜、手套、鞋子，补充了挂包、子弹袋、皮带、裹腿等。

由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所得到的很有意义的生产成绩，提高了部队的生产热忱和信心，故能于一九三九年提出更大的生产自给任务，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一九三九年规定部队在农业上，除种菜外，还要种粮食，要完成四千七百担粮食生产的任务。一九三九年的生产主要是农业，全年开垦了二万五千一百三十六亩荒地。起初估计一亩能收二斗细粮。共可收四千九百八十六担细粮。但由于荒地初垦，农具不足，领导的经验不一致，部分地方又遭受天灾，结果只收到二千五百九十担细粮。此时部队尚无大的资金，商业还未开始。

一九四〇年，规定部队的生产任务是要各部解决一个半月的粮食，计三千四百担，是年部队开地二万零六百七十九亩七分，应得细粮四千一百三十六担。由于收成不佳，只收二千四百担。各部为完成任务计，加上打盐、挖甘草、伐树（关中），并经营商业。从这些辅助生产中，全留守兵团获利共二百二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六元一角六分，加上农业的收获，仍然解决了一个半月粮食的任务，并且还解决了部分的装备补充。

一九四一年，全体部队经费预算为四百四十七万九千五百三十六元四角，规定负担生产任务四十万元。但结果完全与此不同，经费需要是增多了，生产自给任务更超过远甚。是年生产，主要在朱总司令号召下抽出六个营打盐，共打了五万六千九百六十六驮，值二十三万六千四百零八元九角。农业生产，开地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亩六分，收获杂粮一千一百七十担。商业生产：合计赢利一千二百零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二元七毛二分。由于物价高涨，纸币跌落，全年所有经常费与被服费，共支出七百八十八万一千七百五十七元一角七分（一团和关中部队的收支均未列入）。全年伙食费，平均以每人每天五角计，除公家发给一角外，自行解决四角，共计二百五十九万二千元。以上经常费被服费和伙食费三项，合计一千零四十七万三千七百五十七元一角七分，较原定预算超过五百六十七万三千八百零四元三角五分。除以生产所得支给外，尚有盈余。

一九四二年，经费预算（粮食、被服在外）为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六百三十六元，担任帮助中央经费二百五十万元。本年生产计划为一千二百四十万元。到八月止（八月以后尚未统计），商业获利三千八百九十六万九千二百三十元二角，工业获利四十三万一千七百七十三元四角，总共获利三千九百四十万零一千零四元六角。

到六月止，领到经常费一百四十四万零五十八元六角，领第一套单衣补助费二十万零六千八百二十五元。实际开支：经常费七百七十五万零五百九十八元八角五分，被服补助费三

百零六万七千七百三十元六角，伙食补助费（公家每人每日发七角，实支三元）半年九百一十八万元。下半年冬季被服，各旅团大部分由自己解决，计有第二套单衣、半数棉衣，百分之四十的棉被及绑带、子弹袋、炸弹包、棉鞋、单鞋等八项，共计一千二百六十四万一千二百元。其他如冬季烤火木炭，均由各单位自行解决。牲口草料：一九四一年度自己解决马干费两月，一九四二年财厅发马草平均八个月，放青两月，一般地自己割马草两月，约可节省一百二十万元。又如一九四二年马料预算是一万一千担，按财厅规定一斗细粮作二斗马料计算，不够，全年须添补二千七百五十担，按每担五百元计，须一百三十七万五千元。

五年中从事生产的结果，除解决每年的经常费，被服费与伙食费外，现在所存的财产计有：商业基金二千四百万元；运输牲口五百五十六头（耕牛在外，警一团五团亦未统计）值一千七百二十三万二千元；工厂资本七十一万二千元；总计三千五百九十四万四千元。

（注：以上总结，未包括三五九旅及保安部队在内。）

乙、几点经验教训

（一）几年来边区部队之所以能够实行生产自给，解决很大的问题，是由于部队的庞大的劳动力和更好的组织力，以及边区内具有丰富的物力可资开发的原故。这一经验，证明了部队充分可能做到自给自足。又由于几年来部队自给问题的解决，生产信心的提高，使部队认识了生产自给为建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认识了生产自给是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最好办法。

（二）部队的生产建设，就是边区整个经济建设之一部分。过去部队虽在生产事业上努力的完全了任务，这是很好的，但在思想上没有强调与建设边区的联系，因此对于发展农工业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建家立业的精神还差；统一建设的思想也就模糊；甚至各自为政，破坏法令纪律的现象严重地发生了。这些缺点，今后必须坚决地毫不留情地加以纠正。

（三）在生产方法落后的条件下，生产基础主要应建立在各个单位的劳动力和各个单位的经济基础上。因此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应当是保护这些单位的生产事业，在政府的统一政策之下，准其充分发展，并有利可图。因为这样，才对于生产事业的发展更有组织，更有力量，更能团结和合理，更能统一地和封锁作斗争。我们部队在生产上的重大缺点是注重了商业而忽视了农业，今后应该提高和奖励农业方面的生产。

（四）在部队生产事业中，应抓紧思想领导，建立和健全生产中的各项制度及领导机关，纠正并防止干部各自为政，贪污腐化，大吃大用，铺张扬厉，不讲节省，不求实效等等极坏的弊病。

以上就是我们的意见。

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比较更好些。首先，三五九旅的领导同志掌握了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与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利用了勤务较少的条件，又利用了南泥湾适合农业、绥德警备区适合轻工业的环境，动员了广大的人力，在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很大的经济自给任务，建立了农业、工业、运输业与商业的一系列的比较完备的企业，打下了一个能够达到完全自给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他们掌握了农业为主这一点，使得他们的经济基础建设在稳固的地盘之上。其次，三五九旅进行了如下各项具体的经济建设活动：（一）他们在一九四〇年经营的粮食生产是失败了，但他们并不灰心，一九四一年继续经营，就获得很大成绩，一九四二年就更有基础了。他们开辟了二万五千亩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种粮食、种菜、种麻、种旱烟，解决了部队的蔬菜、灯油、打草鞋的

麻、战士们吃的旱烟，又补足了粮食、菜油、马料、马草之一部分。这样，只要两年工夫，就可打下全旅所有各连队的农业经济的基础。而且官兵全体进行劳作的时间，一年中不过两个月，尚有十个月时间进行部队的训练，并不妨碍操课。如果照该旅现在想出的新办法，即每连建立一个六至七人的专门的农业劳动小组，战士大众只在农忙期间突击帮助，则训练时间更多。(二)利用农场发展畜牧事业。一九四二年全旅经常养猪约二千头，可以解决部队食用的肉与油。因战士们肉食较多，又节省了粮食。另外，组织一批人去采柴、烧炭、锯木板，不但解决了自用的燃料及建筑材料，且可以其剩余出卖。(三)他们又建设了工业及手工业。一九四一年，他们从部队中抽出一批战士及勤务员建立大光纺织厂、大光肥皂厂，供自用外，还有“大光”出品在市场上出售。他们又在绥德及南泥湾等地开创了盐井十个，炭井一个，木厂二个，铁厂三个，磨房六所，粉房八所，榨油房一所。又利用战士们操余课后的时间动员他们纺毛线，用柳条榆条编织各种用具、用桦树皮作写字板，作菜盒，作点灯器。这些战士们的劳作，不但是为着全体的，而且也是于他们个人有利的。该旅规定：凡动用国家工具的手工劳动，以其结果的五分之四归公，五分之一归私；凡不动用公家工具的，则以三分之二归公，三分之一归私。这种办法，一方面解决了公用物品的需要，一方面不啻增加了战士们的津贴。(四)他们又建立了有力的运输业。现在他们有一个拥有六百头驮骡的运输队，完全从事运盐运货。在绥德、三边、延安之间沿途建立了十个骡马店，安置了一批老弱人员。(五)他们的商业机关是大光商店，本店外有十个分店，一九四二年九个月获利六百余万元。但这种商业在该旅总生产量六千万元（延安市价）中只占百分之十强的数目。(六)该旅实行了统一的生产计划、生产制度与供给制度。全旅的生产计划由旅部制定。有的由旅部直接经营，例如较大规模的工业、运输业与商业；有的由各团直至连队经营，例如农业、畜牧业、小的工商业。由旅至连，按级检查。生产制度亦由旅部规定，上述战士纺毛线的办法，即是一例。供给制度亦保持统一，农工运商各业虽由各部分分别经营，但凡属一定数目以上的开支，必须呈报上级批准，下级不得自由支用，这样就免除了因自由支用生产结果而发生的苦乐不均的现象与浪费现象，保障全旅的团结。(七)他们不但发展了大量的生产，而且厉行了节约政策。例如：规定两年发三套单衣，三年发两套棉衣，一切被服，发新的交旧的，不交不发。又发针线给战士，衣服破了，自己缝补。这样一来，被服大为耐用，战士们更加爱惜自己的被服，大大地节省了被服费。又如前面说的令战士用桦树皮做写字板、做菜盒、做点灯器，发羊毛给战士打毛袜、手套等事，不但增加了日用品，同时即节省了关于这些物品的购买费。全旅一切房屋建筑及器具修理，均由部队中人自己动手，不向外面请工。所有这些，不但节省了大批经费的开支，而且在全体官兵中养成一种爱惜公物，注意实效、反对浪费、不讲铺张的朴素的作风。

（中略）

从上列种种材料看来，即可知道我们军队的生产自给，毫无疑义地是有巨大成绩的。这个成绩是依靠了什么才达到的呢？是依靠了干部们的积极领导与战士们的劳动热忱才达到的。干部们是自觉地为了克服革命过程中的困难而去积极地指导生产运动的。战士们也是自觉地为了克服革命过程中的困难而去参加生产劳动的。没有这两种人的自觉性，没有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不是为了什么无聊的事业，而是为了神圣的革命需要，假如他们没有这种感觉，那末，是无法完成这种艰苦的生产任务的。假如他们感觉自己是被雇佣的一分子，假如他们感觉从事生产是与他们自己的利益无关的，是与共同的革命事

业无关的，那末，这种生产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以上讲过了我们军队在生产自给方面的极好的经验与极大的成绩。以下再讲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不但是军队的，也是机关学校的。这些缺点中，有些在过去时期是难于避免的，但在有了五年经验之后，就应该有所改变了。有些则已成了严重的弊病，如不改变，则将转过来妨碍党与革命的利益。

这些缺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缺点，就是一部分军队及一部分机关学校，为了要迅速解决迫切的自给问题，比较地或特别地重视了商业，轻视了农业与工业。他们不知道只有农业与工业是产生价值的，商业不过是流通过程，它本身不能产生任何的价值。鉴于过去的教训，一九四三年的生产任务，一切部队一切机关学校都要将重点逐渐转到农业、工业与运输业上去；而在我们的条件下，特别重要的是农业。因为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大部分需要的东西是农产品（正粮、杂粮、蔬菜、麻、肉食、植物油、动物油、棉花、马草、木料、柴火等）；农产品又可以出口换取工业品。如果我们再从事一部分可能与必要的手工业（纺纱、纺毛、做鞋、织毛线衣、挖炭、锯木头、榨油等）及较大的轻工业（纺织业、造纸业等），则可以很大部分地解决我们的日常需要，并可争取出卖。

第二个缺点，就是缺乏统一的计划与统一的检查。下面多少单位各自为政，上面没有或缺少在政策原则上与工作内容上的统一的指导、统一的计划与统一的检查，致使各部分不知道什么事是不应该做的，或者明知故犯。于是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的事也发生了；破坏政策原则，破坏政府法令的事也发生了；侵害人民利益的事也发生了；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不但没有协助，反而互相斗争，互相妨碍的事也发生了；瞒上不瞒下，瞒上又瞒下，打埋伏，说谎话的现象也发生了；极端浪费，一掷千金，但求铺张，不求实效的现象也发生了。尤其严重的，是在一部分干部之间发生了贪污赌博等极端恶劣的现象。有个别的干部是被物质所诱惑，因而不愿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神圣事业，完全腐化了；另有若干干部则起了霉，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才能恢复健康。所有这些坏事，所有这些弊端，在一部分军队与一部分机关学校的干部中，都是或多或少地发生过的。今后所有军队与机关学校的一切上级领导机关，必须着重于照顾全局，掌握政策，对所属各单位的生产活动一定要有统一的计划，统一的检查，绝对不容许再有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破坏政策，破坏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单位互相斗争，互相妨碍，以及干部中贪污浪费赌博等现象再行发生。如果有这类现象发生，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这就是经济工作中的整顿三风，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

第三个缺点，就是有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或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但是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

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很好地协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由于我们有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至其他许多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做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经济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得很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的条件的，我们必须重新分工。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就，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

第四个缺点，就是过去有些部队或机关在生产任务的分配上，没有上下级的分工，从旅部到连队，从上级机关到下级机关，都允许经营商业，毫无限制，因而发生许多毛病。今后一般的商业、工业与运输业应集中在旅部、独立工作区域的团部及上级机关，并按正确原则去做，对外贸易还必须统一于物资局的指导之下。集中工作区域的团以下，任何部队的营以下，以及一般的下级机关，应指定他们从事农业，战士们与杂务工作人员们可做的手工业，以及消费合作社性质的生意或小贩生意，其余均不许他们做。

根据五年来成绩与缺点的总结，一九四三年军队各部应执行如下各项的具体任务：

（一）除大部分粮食与一部分被服由政府供给以外，大多数部队应完成一切供给的百分之八十，一部分军队（如三五九旅）则应完成百分之百，只有某些特殊情况的部队（如骑兵部队）才允许他们只担负较轻一点的生产任务，但也要想办法在一九四四年能够完成较大的任务。一切部队应准备于一九四四年更多地增加粮食与被服的自给额，以便减轻民负，休养民力。

（二）除三五九旅已经全部从事屯田及骑兵部队因特殊条件难于立即实行屯田外，其余各部，除负担守备任务外，均应以一个至几个相当数目的部队实行屯田政策，以期增加农业生产。

（三）各部由上至下应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从事生产，从旅到连按级建立生产委员会，按级举行生产与供给的集体计议与集体检查，并研究生产技术的改进，以期增进生产，改善供给，纠正一切不正常的现象。

（四）选择政治上与工作能力上比较更强的干部去管理各部门的生产与供给工作。现有的经济干部须加以审查，不称职的及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必须调动工作，有些特别严重的并须予以应得的处罚。各部一律增设生产副营长，及连的生产管理员，专门管理全营全连的生

产与分配事务。旅部团部设生产副官，管理本单位的生产工作，各级主官必须亲自计划与检查经济工作。

（五）各分区党部、政府与军队的一切经济与财政工作，在分区财经分会的领导下实行统筹统支。为着鼓励各部分生产人员与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起见，应允许从他们的生产结果中支出相当部分去改善他们的生活，除此以外，一律应做到统筹分配，免除苦乐不均的弊病。统筹分配，有在全边区范围内统筹的，有在各分区范围内统筹的，有在各系统范围内统筹的，有在一单位内统筹的，依生产性质及经营情况来决定。

（六）厉行“军民兼顾”的原则，军队、党部、政府的经济活动应与人民的经济活动取得协调，一切损害人民利益引起人民不满的事均不许作。

（七）生产与教育不可偏废，各部必须精密地计划二者的工作及其相互间的配合，恰当地分配二者的时间，使一九四三年的生产与教育均多于与好于一九四二年的生产与教育。我们有了五年的经验，一九四三年达到这个目的是完全可能的。

（八）部队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就是保障部队生产计划与教育计划的完成及在实施这两项计划时保障自己部队与党政民发生正确的关系，保障自己部队上下级的正确关系，保障经济干部的纯洁。政治工作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那末，这种政治工作就是失效的。

（转自《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原新华书店1949年2月版）

关于发展机关学校的生产事业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毛 泽 东

三部分公营经济中，军队及机关学校的生产，是直接为着自己解决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的，政府机关经营的也在内。例如边区政府各厅处的工作人员，有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经营，这是直接为着补充自己机关办公费被服费之不足及工作人员伙食费之不足的。但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则不是直接为着自己机关，而是为着党政军全体的。

延安及边区的党部机关、政府机关、民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以及许多学校，他们在整个“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下，从事农工商业的经营，是一个广大的群众性的运动，解决了财政供给上的很大问题，仅仅次于军队，值得我们慎重地总结其经验，指出其成绩及缺点，并规定一九四三年的工作方针。

军队的生产运动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有了经验，一九三九年我们就将这种经验推行于一切机关学校。一九三九年二月，开了生产动员大会，组织生产委员会为生产运动的指导机关，按各机关学校的工作或学习的不同情形，人员劳动力的强弱，规定不同的生产任务。例如：那时规定区乡工作人员的粮食须完全自给；其他机关，从中央至县，则按劳动力多少强弱，多的强的自给粮食二分之一，少的弱的自给三分之一；共要他们开荒十万零二百亩，计收细粮一万三千担。此外，规定一切机关学校的蔬菜全部自给，喂猪解决肉食，种粮有草又可解决一部分马草。当时全边区机关学校共约二万人，平均每人发生产费二元六角，共四万九千余元，作为购买耕牛农具的资金。在他们找到了土地、买到了耕牛农具之后，即全体动员从事春耕。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从来没有劳动过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连同工农出身的干部及勤务员、伙伕、马伕一起，组织在生产小组中，从事开荒种地。那时延安附近一切有荒地的山头，布满了开荒的男女，他们自动地宣布劳动纪律，提出开荒竞赛，体力强的都拿起锄头开荒，体力弱的则种菜养猪，或送饭送水。

这次生产运动的收获是：（一）全边区机关学校，共计开荒十一万三千四百十四亩，收获粗粮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五担六斗三升（合细粮五千八百三十担零一斗七升）；收获蔬菜约一百二十万斤，两项照当时市价值洋三十六万八千余元（一九四二年市价则值一千零十七万九千余元）。解决了二万人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马草的二分之一及一部分蔬菜与肉食。（二）使一万多个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第一次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懂得了什么是劳动，锻炼了他们。（三）边区老百姓看见或听见所有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及青年学生——从共产党中央委员至小勤务员，一律上山种地，感动了他们，大家热心开荒，成为历年开荒之冠。

另一方面，这年并没有完成粮食生产的规定任务，由于劳作缺乏经验，施肥、播种、锄

草有的不及时以及有些地区遇着旱灾等原因，致使开荒虽多，收获不大，只完成原定一万三千担细粮的百分之四十五。再则这时在领导上与组织上犯了平均主义的毛病，没有考虑到各工作机关各学校的不同性质。有的是给予任务太大，例如要区乡工作干部完全自给粮食，结果只能完成四分之一。有的是因为从事生产延误了工作和学习，反而不经济。有的是某些体弱的男女同志本来不能做重劳动的，也勉强劳动，身体吃亏。有的原是可从事工商业的，但当时没有指出，只单纯地全体一致地注意了农业。

一九四〇年，改正了这些缺点。首先将农业的生产任务减少了，除菜蔬肉食自给外，粮食生产则按各机关学校的不同情况，只规定自给七分之一、六分之一与四分之一。体弱的男同志及一切女同志，不要他们参加重劳动，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与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则完全不参加生产，允许雇有经验的农民参加生产并作生产的指导者。此外，由财政厅发五万元给各机关学校作资金，允许各机关学校进行工商业，并发展畜牧生产，喂猪养羊。因此一九四〇年的农业生产，除原耕土地外，没有增加。有的因劳动力不够，采取与老百姓伙种的办法；有的将一部分粮地分给别人，自己着重于种菜、喂猪；又加有些学校已迁往华北；故一九四〇年粮食收获只有细粮三千担，菜蔬九十余万斤，照当时市价估计约值三百万元。

我们的经营商业是从合作社开始的。一九三九年各机关学校就有消费合作社，并有开饮食店的。至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共有三十个合作社及食堂，资金共约六万余元。其中大的一万元，小的不过数百元，目的在于供给本机关学校的日用品，同时卖给外面谋些微之利，借以改善生活，还未担负借商业解决一般需要的任务，但是它却初步地锻炼了从事商业的干部，积累了一些经商的经验与小量的资金。

在一九三九、一九四〇两年中，机关学校还没有一般从事工业生产，只建立了一些为着自己磨面粉的磨坊，还有后勤的交通商店附设了一个打马掌的铁店，可算是机关学校手工业生产的开端。

以上算是机关学校生产自给的第一时期。以下是第二时期。

一九四〇年冬，由于边区经济被封锁，外援断绝，财政困难达于极点，整个财政供给不能不从半自给急速地转到完全自给，因此机关学校的生产任务也迅速地起了变化。

这时党政军民各机关及各学校的人员（部队在外）既不能全部从事农业，而生产自给的任务又是极端艰巨的，一方面要靠发展生产保障每天每月的供给，同时又要积累资金，建立将来自给的基础。

为着渡过这一严重的难关，党与政府采取了必要的步骤。首先是刷新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先后成立了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后勤经济建设处，边区一级的财经处，各分区各县亦令其成立生产委员会。其次，从一九四〇年冬到一九四一年春，先后由政府支付七十万元，银行借出三百万元作为各部门增加的生产资金，交给各生产自给的领导机关转发下去，加上第一时期各机关自己所积累的资金，于是大家从新布置，纷纷抽调人员，选择业务，决定以工商业为主要经营方向，农业则放在辅助地位。

下面，我们就来将这一时期内各机关学校从事工业、商业及农业的经验加以论述。

各机关学校的工业是从纺织业开始。初因边区有羊毛，一九四〇年冬，各机关学校人员在其工作或学习之余，就有手摇纺毛，一时成了运动，大家纺起来。但因原料不够；纺毛技术又不熟练，毛线不匀，费工太多；至一九四一年三月以后，就逐渐停止，而着手于建立手工纺织厂。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各个大的机关学校，均纷纷抽出勤务员通讯员到政府的难民

纺织工厂学习纺纱织布，一时如雨后春笋，办了十多个纺织工厂。缺点在没有计划性；到了下半年，这些工厂，或因原料供给与纱布销售无保障，或因流动资金不够，或因管理不善，有的停工，有的合并，有的时开时歇。例如：中央直属财经处的新中国纺织厂，先与中央组织部的胜利纺织厂合并，后与马列学院的团结纺织厂合并，仍名团结纺织厂，使经营集中起来，更有利些。鲁艺及女大的纺毛厂则实行停工，将资金移作别的事业。中财的团结纺织厂，后勤的交通纺织厂，均因种种困难，不能充分运用自己的生产力，而时开时歇，直到后来才走上轨道。这样看来 由成千成万人的手摇纺毛到建立手工工厂，由建立十多个很小的纺织厂纺毛厂到最后合并为交通、团结两厂，中间经过不断地摸索研究、改善技术与改善管理方法，这是一个从盲目性到自觉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说明了各机关学校的苦干精神，另方面也说明了当时我们对于工业经营的毫无经验。到一九四二年，交通产布三千三百三十六匹，团结产布二千七百三十六匹，成了边区的大工厂，就是这一苦干与摸索过程的宝贵的产物。

纺织厂以外，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又陆续开办了被服厂、制鞋厂、煤炭厂、木工厂、造纸厂、陶瓷厂、磨粉厂、榨油厂、丝织厂及铁器店等许多手工工厂，求达自给目的。这些工厂的资金，或是从商业资金中抽出来的，或是从银行借来的，或是从停闭自己的纺毛厂移来的。并鉴于纺织业的经验，不是那样毫无组织地干了，而是或由几个机关学校合办，或与老百姓合办，或与银行合办的，比较地有了一点秩序。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大都经过开始亏本，继能维持，最后才能获利的曲折过程，才立定了自己的基础。

一九四一年与一九四二年两年中，中财系统共计建立了大小手工工厂二十七个，共有资金四十余万元，员工四百七十七人。其中计有纺织与纺毛厂八个，资金二十一万七千元，员工一百六十一人；煤炭厂三个，资金七万元，员工六十八人；磨坊三个，资金一万五千元，员工二十一人；被服厂二个，员工四十八人（资金不详）；木厂三个，资金三万五千元，员工七十六人；制鞋厂一个，资金一万元，员工三十八人；造纸厂一个，资金二万元，员工二十九人；此外还有小的机器厂、玻璃厂、酒精厂、陶瓷厂、油灯厂、制毡厂各一个（此六厂资金人员无统计，前三厂附属在自然科学院，是实验性质）。所有上述各厂，到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实行第一次精兵简政时，重新作了调整，统归中央管理局直接管理（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取消，设立中央管理局，隶属于中央办公厅）由二十七厂裁减合并为十九厂。特别是将八个纺织厂并为团结、实验两厂，使经营集中，业务改善，就由八厂分立时或亏本或仅能维持的状态，过渡到了在一九四二年十个月中获利一百六十万元的好现象。

后勤系统下的自给工业，也是和中财系统一样，从一九四〇年冬季开始的。经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的经营，计有纺织厂一个，纸厂二个，炭厂三个，木工厂二个，丝织厂二个，石炭厂、精盐厂、陶瓷厂、被服厂、毛笔厂、铁厂、面粉厂、鞋厂、麻织厂各一个，共十九个。这些工厂的资金员工及产量尚无统计。这些工厂虽赢利不多（一九四二年十个月赢利二十万元），但有其极好的优点，即是：（一）他们是由后勤集中经营的，不是由各机关学校自由分散经营的，因此领导与检查都较深入，缺点改进也快。（二）经营的部门广，不象中财系统在开始时集中注意于纺织工业，建立了纺织厂八个之多，后勤则始终只办一个交通纺织厂，因此有余力多做别事。（三）完全是保证供给的性质，虽不赚钱，却解决了许多必需品的供给。

一九四二年十月，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中管后勤两系统合并为一，工业亦统一管理，

并作新的调整，交通、团结两个及被服厂，拨归财政厅；制药厂、酒精厂、制铁厂、玻璃厂，拨归留守处；自然科学院亦随该院一起拨交政府。其余各厂则实行裁减合并，统归中央管理局管理。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计有木工厂三个，纸厂二个，炭厂五个，鞋厂一个，油厂一个，粉厂一个，磨坊三个，大车制造厂一个，制酒厂一个，赶毡作坊三个，共大小手工业工厂作坊二十一个，可以保证中管系统全部石炭、鞋子、面粉的供给，全部木器洋铁器具的制造与修理，保障纸张与食油的一部分，被服则由政府负责供给。这就是中管（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前是中财）后勤两系统两年来在工业生产方面的积极结果。

上述经验指明：在目前条件下，机关学校经营手工业是必要的，其目的不在赚钱，而在保障必需品的供给。但工厂不是任何机关任何学校都可样样去办的，应是有计划地按工业的性质与机关学校的情况分别地择要地去办，减少盲目摸索的毛病。已有工厂须按地区按机关系统，采取裁减合并及转移等步骤，借免浪费，并使其能够发扬更大的供给作用。

前面说了，我们的同志对于商业，也是同工业一样，没有经验的，只办过一些合作社。现在要转到依靠商业获利来解决一个很大部分的供给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办才好呢？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的过程。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两年中的经营商业，是从要迅速解决困难的目的出发的，因此就不能不以各机关学校所有资金的大部分去做能图速利的生意。

一九四〇年秋到一九四一年秋这一年中，主要的是经营百货商业。有些机关学校利用他们原有的本小利微的合作社、小商店或小货摊，加以扩大，增加资金，补充人员，加入商会，正式经营商业。例如兵站的交通商店，最初只是在延安七里铺兵站门口附设的一个小纸烟店。一九三九年八月，移到延安新市场，贩卖百货外，还附设了一个中药房，一个马掌店，资金由数百元增至二万元。又如合作商店，是由抗大合作社改变的，一九四〇年六月搬到新市场，并在抗大三分校附设支店，资金由八十元增到一万九千元。后勤的百货商店，开始不过是一个资金三十元的小货摊，到一九四〇年九月，予以扩充，资金增至二万元，除做百货生意外，附设了一个染坊。许多机关学校原来没有商店的，此时亦集资调人，或独立经营，或与人合股，做起生意来了。这时各公营商店的营业主要是从绥德、定边、鄜县贩卖百货，特别是机关学校部队自己需要的布匹、纸张、文具及老百姓需要的火柴、棉花等。这一时期内，延安、绥德、定边一带，我们机关学校设立的大小商店共有六十余家之多，军队的还不在内。另有许多不设门面，靠着一二个人带二三个四五个牲口贩运货物，沿途流动出卖，叫做“走水生意”。据一九四一年十月统计，后勤商店管理委员会所辖，就有西北商店、西北菜社、兴华、合作、交通、新新、兴民、民兴、百货、军民及贩卖部等大小十四个商店，中管系统则有二十个。

这一年的商业，确实靠了它渡过了严重难关，解决了很大的供给问题。例如中央直属财经处与各机关学校，在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的商业中，依靠一百十三个员工所开共有资金二十九万六千八百元的大小二十个商店，获得了二十五万六千元的利钱，供给了各机关学校日常经费的百分之四十八。后勤系统以七十万六千元资金在同一时期得了八十一万元的利钱，供给了他们日常经费的百分之四十五。

但是这一时期的商业有一个很大的弊病。这就是由于过分分散，没有集中领导，又差不多都是做的百货生意，急于要解决每一机关学校的经费困难，因而产生出来的弊病：各自为政，互相竞争，甚至违反党的政策，影响物价与金融。同时，物价高涨，边钞跌落，外边封

锁加紧，经营出入口的百货生意，顿然显出不景气，各机关学校靠此维持经费亦发生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将机关学校的商业与军队的商业加以改造，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这个改造就已开始。一九四二年春，边区初步地实行了精兵简政，遂决定将商业完全企业化；各系统一方面整理原有商店，组织公营商店联合会，统一对于公营商店的领导，严格地贯彻法令政策，另方面扩大商业范围，进行多样营业，例如盐店、骡马店、过载行、客栈、屠宰等。经营的方式亦有改变，或几个商店合并经营；或向私人商业及合作社投资，而自己不做生意；或向政府的盐业公司、光华商店入股。这样一来，商店林立，互相竞争的弊病既可免除，维持机关学校经费的作用亦可恢复。例如：中管与后勤两系统照此方针整理的结果，从原有商店三十八个，员工一百九十六人，至一九四二年十月只存商店二十五个，员工一百零五人。十个月中，两系统以八百万元资金，获得一千六百四十四万元的利钱，占了全部生产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八。又如边区政府各厅处的生产委员会，一九四二年农商两业的收入为六十万元，其中商业三十五万元，亦占百分之五十八。又如分区及县级机关原是以农业为主的，但至一九四二年商业亦占了重要部分。

一九四三年财政经济的领导实行一元化，对于贸易统一于物资局，各机关学校要彻底实行精简，因此，各机关学校的商业必须在物资局的调节之下，分工经营土产与盐的运输，并以一部分资金与物资局合作，使公营商业更加合理化。

各机关学校的农业生产，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亦有进步。两年中，在粮食、蔬菜、牲畜、木炭及业余劳动等方面都有大的成绩。

在粮食生产方面，一九四一年，各机关学校有些还是完全自营，有些已改为和老百姓伙种，有些则经营了农场（其中亦有自营、伙种两种）。自营的方式也有所改变，不是全部工作人员上山种地了，而是以杂务人员为基础，配合一部分身强力壮的工作人员组织生产队。例如后勤系统各机关的生产队，一九四一年共种了五千二百亩粮食，中央党校则种了八百亩。和老百姓伙种的，如中组伙种二百四十亩，二八分粮，公二私八，三七分草，公七私三。经营农场的，有边府秘书处的两个农场，是采伙种办法；又有由机关学校抽出杂务人员，配备耕牛耕具，在南泥湾自己建立农场的，计后勤二、中财、中组、青干各一。各分区及各县的机关，则采取了自种、伙种并用的办法。

一九四二年，精简实施，延安许多机关学校实行合并，因此，除菜蔬自给外，粮食只取农场与伙种两法。

伙种虽带剥削性质，但老百姓特别是移民难民十分愿意，因为公家供给了种籽、耕牛、农具，租率又不算重。这种办法对于奖励移民，调剂劳动力，是有作用的。举党校为例，“党校总务处与四个移民合伙种一百垧地，老百姓四个劳动力都很强，党校出一人负领导检查之责。其办法是由党校供给农具，每人一锄一镢一镰，借牛二头，并给种籽。另借粮食，每垧细粮四升，百垧四担，言明秋后归还。收获粮草，规定谷子二八分，公二私八；糜子三七分，公三私七；杂粮四六分，公四私六；草则全归党校。是年党校计收草一万零五百斤，谷子八担三斗七升，糜子三七担一斗七升，黑豆六斗九升，小麻子四斗二升，老麻子一斗，小豆二斗。共合边钞三万一千九百二十五元。四个老百姓则收谷子三十三担四斗八升，糜子二十二担四斗，黑豆七斗五升五，小麻子六斗三，老麻子一斗五，小豆三斗，共合四万六千八百零五元。这是公私兼顾的好办法。”

建立农场亦有新经验，因为机关学校抽出的人员劳动力不强，工作时间有限制，农业技

术又不熟练，如专事种地，反而亏本。一九四二年采取下列两法：一是自营，除种粮外，兼营副业，如养牧畜、制木板等，正和三五九旅所采办法相同。一是伙种，将已有基础的农场和老百姓伙种，自己另开新场。新场第一年无利得，第二年就有了基础，又可和人伙种。举边府秘书处为例，据边府秘书处同志称："我们有东南两农场，地亩、经营法、收获量都大致相同。一九四二年南场种川地九十六垧，熟山地一百零八垧，新开荒一百三十六垧。共收粗粮二百四十四担，因是豆子玉米居多，折成细粮一百四十六担四斗，每担以一千三百元计，折钞十九万零三百二十元。又收干草一万四千斤，值一万四千元。又收菜二万斤，值二万元。三项共计二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元。原有羊一百二十八只，一九四二年新下羔羊长成八十一只，值一万元。喂猪卖了三千四百八十二元，还有十三个猪，每个以四百元计，值五千二百元。以上各项共计二十四万三千零二元。支出方面：我们是采取安伙子办法，所以一切开支，均从收获量分配，连我们派去的四个人的一切开支也包括在内。安伙子十二户，共四十五人，内全劳动力十九，半劳动力十三，无劳动力的小孩十三。共分去粗粮六十八担，折细粮四十担零八斗，每担一千三百元，共五万三千零四十元。又分去草七千斤，计七千元，二项共计六万零四十元。自己五个人（一个是残废管务，两个做饭、种菜、带种庄稼，两个揽羊、打杂），四个牛，一个驴，五个狗，共支食用粮三十担，折细粮十八担，计二万三千四百元。食用油五十斤，每斤二十六元，计一千三百元。此外，农具修理、犁、服装、津贴等计二万元。以上共计十万四千七百四十元。南场共收二十四万三千零二元，共支十万四千七百四十元，两抵余十三万八千二百六十二元。加上东场约十一万余元，两场共收约二十五万元。这两个农场，名义上是秘书处与民、财、教、建四厅合办的，实际上只拿出十个人，其中两个是雇工，一个是残废，七个是编余人员。政府有个生产委员会，管理两农场，实际也只有一人经常办事。本年因遇水灾、风灾、少收粮食约一百五十担，值十一万七千元。还有买来的萝卜、白菜种子受了骗，是假的，损失约三万元。二项共计十四万七千元，两场合计损失约二十万元。这就是说，如果不遭天灾，不买假菜种，还可多得二十万元。民、财、教、建、秘五机关工作人员共四百，对于二十五万元收入，平均每人有六百二十五元。若以秘书处一百人来说，则平均每人有二千五百元。农场今年收成虽差，但打下了明年的基础，又解决了十二户移民的生活。同时依靠这个基础，明年准备在南场扩大耕地三百垧，借以安插编余人员。原两农场仍取安伙子办法。"

各县机关粮食生产的方法，也是自种伙种两种。例如延安县一级机关共种地二百一十垧，其中九十余垧招了两户安伙子的，有五个劳动力，县委只拿出二人在农场工作。其余百余垧地，则由犯人耕种。一九四二年除安伙子分出者外，共收粗粮七十五担，合细粮四十五担，值五万八千五百元，加上草值三千元，共计六万一千五百元。

以上各例证明，自营、伙种二法兼用是正确的，一九四三年的粮食生产任务，应注意此项经验。

农业经营中，极大一项任务是种菜，因为食粮还有公粮可领，菜如不种，则二万余人将处于半饥饿状态，"无菜半年荒"，是确确实实的。

过去两年的菜蔬生产方式，是配备专门种菜人员，再配合机关学校中一部分辅助劳动。过去每年平均自给了三个月到半年的菜蔬。据后勤统计，他们各机关学校，在一九四一年共种菜地一千八百零一亩，计洋芋地一千零三十亩，白菜豆角萝卜杂菜地七百七十一亩，此七百七十一亩地到秋天又种秋白菜、秋萝卜，全年收获各种菜蔬八十七万九千斤，平均约供给

全年菜蔬的三分之一。据中管统计，一九四二年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配备了种菜人员四十名，所种菜地，计有川地三百八十八亩，山地一千九百四十一亩，共收各种菜蔬七十四万五千斤，平均自给了五个月的菜。其中管理局本身自给了九个月，延大及自然科学院均自给了八个月，中央研究院及文抗均自给了七个月。各个机关人员的菜蔬生产，各有不同情况。如关中因气候关系种得很少，平均只能自给菜蔬三个月。警备区因土地缺乏，也只能自给二、三个月。有些则因有地，且可和人伙种，如华池、志丹等县，则可做到自给半年以上。全边区机关学校的菜蔬自给，估计当在六百万元左右。

这里的问题是：机关学校在编制之外。另外配备生产人员种菜的办法究竟是否合算呢？根据中央直属各处的经验，证明是合算的。种菜最好是川地，各种青菜均可种，山地只能种洋芋豆角。川地一亩种菜，可供五个人全年食用，即每人只须年种菜地二分。山地却需一亩半，才能供一人一年之用。而一个专门种菜的人，只要施肥时有些辅助劳动，可种川地六亩。这就是说，一个专门种菜的人，配合一部分辅助劳动，可供三十个人的全年菜蔬。以每人每天需菜十二两计，每年需三百斤，三十人需九千斤，照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延安市价每斤三元，共值二万七千元，而一个专门种菜的人年支约六千元，可余二万一千元。加上必要的奖励费，至少可获二万元。因此今后各机关学校在彻底精简后，应注意调剂川地种菜，配备种菜人员，加上辅助劳动，保证自给蔬菜一半以上，乃至完全自给。

农业方面，除粮、菜外，饲养猪羊，解决肉食，也是很要紧的。

有些人以为喂猪浪费粮食，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不是喂猪浪费粮食，而是不喂猪浪费粮食。一则无猪必抛弃剩饭剩菜，而这项剩饭剩菜，在大的机关及连队里是相当多的。二则吃肉少则吃饭多，吃肉多则吃饭少，故喂猪增加肉食，不但为保持健康所必需，且在经济上亦是合算的。各机关学校过去创造了许多喂猪办法，例如中央党校指定杀猪房每天派专人到厨房来收集淘米水及菜屑喂猪；中央总务处指定专人收集碾米留下来的米屑，收集菜园收菜时抛弃下来的菜叶菜根以供猪食等。据后勤统计，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五万六千八百十四斤，照当时市价值十七万零四百四十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一斤猪肉。加上下半年，全年约值三十五万余元，据中管统计，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一九四二年至十月止，平均每月养猪二百六十五头，十个月共赚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余斤大秤的猪肉，合边钞七十万元。又如延安县一级机关，一九四二年十个月喂猪，赚了一万元。全边区机关学校饲养牲畜一项生产，照此计算，总值当在四百万元以上。

喂猪之外，如有牧地，养羊也是有利的。

一九四三年彻底精简后，可酌采三五九旅每四十人配备一个伙伕及节减勤务员的办法。将编余伙伕勤务配备到生产战线上去，可做种粮、种菜、养猪、养羊等许多事情。办大牧场从事大的畜牧事业，应于一九四三年提到重要地位。

粮、菜、畜三项之外，还有烧炭与业余劳动二项，也是值得注意的经验。例如一九四二年冬用木炭，在延安各机关学校中，完全是从本机关本学校抽出人员组织烧炭队上山烧炭来解决的，如用钱买，则所费又是一个很大数目。如中央总务处，九月间即抽勤务、伙伕、马伕四十二人，组成烧炭队，上山伐木烧炭三个月，共烧木炭一百四十五窑，完成了十四万斤木炭的任务，每斤以一元二角计，值十六万八千元。如以全边区机关学校三万人，冬春四个月，平均每日每人烧木炭一斤计，共需木炭三百六十万斤，值三百六十万元，如不自己烧炭，那里去找这一大笔经费？

还有各大机关学校杂务人员的业余劳动，也很值得注意。例如中央总务处，今年动员杂务人员修理房屋、建造围墙、架桥、修路、割马草等，共替公家节省了十一万余元。中央党校杂务人员的业余劳动，替公家节省了十三万九千余元。三五九旅一切修造都不请工，各机关学校亦应尽可能照办。一切本机关本学校的人能做的，均应动员他们去做。单以杂务人员从事业余劳动一项来说，若全边区机关学校都实行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对一切生产有成绩的人都应给予奖励，对业余劳动者也是如此。

以上就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四个年头边区各机关学校生产自给经验的总结。

据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称：中管后勤两方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两年中，从事农工商各业的资金由一百二十八万一千九百十七元增至一千一百六十九万元（此数中包括由货币跌价的增加数很大，非尽由于生产增值）。一九四二年一年的生产盈余共计二千三百八十一万元，此数除以二百三十三万元扩大一九四三年生产资金外，其余二千一百四十八万元完全用之于弥补各机关学校的伙食费、被服费与办公费。就企业分别说，农业占百分之十七，工业占百分之八，盐业占百分之七，商业占百分之六十九。就机关分别说，后勤直辖各业所得八百四十万元，中管直辖各业所得三百五十万元，后勤与中管合并后所得八十万元，各机关学校自己生产所得一千一百一十万元。若将生产自给数与人民供给数相比，则前者占百分之五十七·五，后者占百分之四十二·五。又据边区县级同志称：县级党政经费每月约一万元，自己生产自给约九千元，上级只发约一千元，前者占百分之九十，后者只占百分之十，则是更大的成绩。

总之，所有延安及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不但供给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切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公营经济的基础，使我们能够依据这个基础继续发展生产，解决今后的问题。

特别重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根据五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的经验，今后机关学校的生产必须加以改进，发扬其成绩，克服其弱点，向着健全的道路上发展，完成更大的生产自给任务。一九四三年应采取如下各项方针：

（一）实行以农业为主

甲、按照各系统各机关学校的具体情形，采取下列办法，经营农业：（1）无农场基础的，应马上动手置备耕牛、农具、或自种，或与人民伙种，收取粮食与蔬菜。（2）有农场基础的，除继续农场生产外，应扩大经营范围，安置编余人员，多营副业，如养猪羊、喂鸡鸭，锯木板等。并同老百姓合伙，增辟新的农场。在这种种办法之下，务使一九四三年的粮食生产比之上年又多又好，不得以为农业迂缓采取忽视态度。

乙、一切大小机关学校均应配备必要的专门从事种菜的人员，辅以工作人员及学生的轻劳动，按不同地区，不同气候，自给蔬菜六个月以上，并极力争取完全自给，这是改善生活的重要步骤之一。

（二）调整与发展各种手工业。按地区，按系统，按精简原则，将各部分已有相同的手工业，改为合股经营。同时根据各地区各系统的需要，建立新的手工作坊，如榨油房、酱园、

炭窑等。经营这些手工业的原则，第一必须工厂本身能自给；第二必须能获利。

（三）发展畜牧业。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都应养猪，尽可能做到按三五九旅平均每五人养一个猪的办法，增加肉食，要把增加肉食、改善生活、增进健康看成是极重要的事。此外，各大的机关学校，尤其是军队，应抽出资金，在三边、陇东、金盆湾等地，选择不防碍人民利益的地点，经营牧场，大批地畜养牛羊驴马，准备于抗战胜利边区盐业衰落时以牲畜出口代替之。

（四）发展运输业。彻底精简后，只留少数牲口保障各机关学校自己所需粮草的运输，一切多余牲口，加上可能置备的牲口，一律组织运输队，从事运盐运货。此项运输业，以能按地区按系统统筹办理，借以减少浪费为最好。

（五）整理商业。在商业为辅的方针下，按照不违反贸易政策、不做投机生意的原则，按照各系统各单位精简后的情形，实行商店的合股经营和疏散经营，取缔违反政策的商业，关闭无利可图的商店。各系统应从商业资金中抽出必要部分转入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与运输业诸方面，着实打下从农工畜运各业解决自给任务的基础，不得犹豫。

（六）应将改善机关学校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及学生们的生活看作重要的事情，各机关学校负责人为此应想种种办法。应提倡与指导杂务人员、工作人员、有孩子的母亲，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身体条件下，在自愿原则下，进行某些手工及农作的生产劳动，但不得从事商业，此项生产劳作方式，依其自愿，或组织大的生产合作社进行之，或组织生产小组进行之，或个别地进行之；公家应酌予贷款作资金，其收获均归参加劳作的人所有。凡对此事办理最好，成绩最优的负责人，均应得到奖励。凡对本机关本学校经理不善，因而使本机关本学校的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学生、母亲、孩子、病员、休养员生活太苦的那些负责人虽或改善了生活，而其方法不正当，妨碍了工作学习，破坏了政策法令的那些负责人，均应受到批评与责备。

（七）执行统一领导。切实执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所有中央一级，边区一级，专区一级，县署一级，均应建立关于统一一切生产事业的强有力的领导机关，按系统按级统一企业经营方针，统一调整各企业相互间的关系，统一检查各企业的经营方法，并在允许以相当收益归各生产单位所有的条件下，在各相当范围内，按照生产性质与经营情形，统一支配生产赢利。务必免除各自为政，盈亏不一，苦乐不均的弊病。

（八）一切农工畜运商业实行企业化，建立经济核算制度，各企业工作人员及雇员的伙食被服薪津由各企业自给，不得再由公家担负。

（九）一切生产机关（工厂商店等），不论是政府的、军队的、或机关学校的，均应实行群众化。除生产任务的分配，生产的管理与检查，生产结果的处理等以外，一切均受地方党政领导，连支部生活在内。一切生产机关的人员，要执行政策，守法纳税、脱掉军衣，穿上便服，参加地方群众活动，做边区的模范公民。

（十）由财经办事处及分区财经委，按各县系统下各机关学校的具体情况，给各系统下各机关学校以一九四三年的具体生产任务，审核与检查其生产计划，将所有各系统下各生产单位一切列在计划内责其完成的生产结果，列入财政收支，计划以外的多余生产则归各生产单位所有，作为改善生活之用。对于生产不足的单位上级应予补给。一九四二年有亏空的，应速审查，予以填补。

（十一）本书第八章“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中所指出的四个缺点，均适用于机关学

校。一切犯有相同弊病的机关学校，必须注意纠正。

（十二）要向一切在农业、工业、畜牧业、运输业、商业以及业余劳动中的劳作人员（包括雇工及伙种的老百姓）说明：他们的劳动都是为着革命的，他们做了十分光荣的事业。从他们劳动所得中分出一部分来交给公家，完全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光荣的神圣的革命事业，并不是为着任何个人增殖私产。凡在公营经济中做事的公务人员，如果他为他自己个人图谋特殊利益，在我们队伍中就叫做丧失道德的行为，在法律上就叫做犯了贪污罪。而一切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就算是有很高尚道德的人，应受到党与政府的称赞及奖励。在军队中，应将这点向战士说明。

（十三）一切做经济工作、财政工作、供给工作、总务工作的人，只要他们是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均应受到尊敬。而一切对于他们的工作采取轻视或鄙视态度的人，应当受到批评与责备。

（转自《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原新华书店1949年2月版）

论 合 作 社

——一九四三年十月在边区高干会讲话——

毛 泽 东

今年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

在过去，束缚边区生产力使之不能发展的，是边区的封建剥削关系，一半地区经过土地革命,把这种封建束缚打破了，一半地区经过减租减息之后,封建束缚减弱了，这样合起来，整个边区就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

但是，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现在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一般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体农民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那末，现有全边区的生产力就可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这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

全边区现有全劳动力三十五万个，今年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中的变工队扎工队的已有三万余人，占全劳动力总数十分之一，而临时性的劳动互助，就延安县说，有百分之七十，明年还可发展。如果各县经常的集体劳动组织能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可达十万人左右，再加上临时性的劳动互助组织能向延安看齐，还有半劳动力也参加组织，这将是一支很大的劳动军。

我们的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也带着合作社的性质。比如一个连，就是一个小合作社，一个旅就是一个大合作社。在各种部队、机关、学校合作社生产之中，杨家岭运输队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杨家岭运输队在改组前，有大车八辆，驮骡十六头，照普通情形，每日最低限度应运输物品二十七万斤，但实际运输的只有十九万斤。经费开支，则除照一般的供给标准外，每月还要贴六万元。今年在公私两利的原则下，把运输队改为运输合作社，公家以大车八辆驮骡十六头（后增为二十头）及全部用具作为八十股，运输员二十名以身份股名义作为二十股，共一百股，每月按股数二八分红；一切人员、牲口、添置等费用开支，概由合作社自行解决；替公家运输物品依照里程远近按斤给运费：运输员的生活，由运输合作社适当改善。这办法，经过解释后，全体运输员一致赞成。执行结果，运输量由每个月十九万斤，

增为三十八万九千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超过了普通的运输力百分之三十。同时，大大提高了运输员对工作的责任心和积极性，节省了许多经费和工具，又更加爱护牲口。比方，过去装粉的口袋破了碗大的洞无人管，现在运输员随身带着针线，缝补口袋；过去贪污马料是公开秘密，现在却没有这种贪污了；过去车马用具稍一损坏，就要求公家补充新的，现在只要能凑合着用，就对付着用下去；对牲口，过去是粗心大意的，现在也逐渐喂好了；运费开支，改组后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过去除照供给标准外，每月还要贴六万元，现在不用半文津贴，还每月获利数万元。

各机关采用这办法后，也得到很大的效果。管理局运输营一百头牲口，二十辆大车，在未组织合作社之前，每月运输量只有一百二十万斤，改组为合作社后，每月运输量提高到一百八十五万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请大家考虑这种合作社办法，是否可以广泛运用于我们的公营工厂及公营农场。

这一套办法，资本主义国家及国民党是不能做的，只有我们才能做。因为我们不以剥削人民为目的，我们贯彻公私兼顾的方针。

军队中如三五九旅战士的纺毛线，用柳榆树条编成各种用具，规定：凡动用公家工具的手工劳动，以其结果五分之四归公，五分之一归私；凡不动用公家工具的，则以三分之二归公，三分之一归私。这种办法，一方面解决了公用品的需要，同时无异增加了战士的津贴，也含有合作社因素。

合作社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能好办。因此，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队的负责同志要替战士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这种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打破了过去各种不正确的“学说”。也只有这种为群众的学说，才能把生产搞得好。

我愿各地同志注意提倡合作社的生产。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是一种合作社，农村的集体互助劳动又是一种合作社，此外还有包含各种业务在内的综合性合作社，被称为运盐队的运输合作社，工人们集体互助的手工业合作社。把这许多样式的合作社都发展起来，全体公私群众就会变为富裕的了，在敌后各根据地的目前困难状况，也就能够克服了。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全边区农民们、工人们、战士们、及一切机关学校的同志们！

我们一百八十五个人，是从边区农村里、工厂里、部队里和机关学校里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代表。我们来到延安开会是为了交换生产经验，互相学习本事，好在明年更大规模地发展边区生产。在开会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司令、贺师长、林、李正副主席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都那么热烈地招待我们，指导我们，和我们握手，请我们吃饭，把我们看的象自家兄弟姊妹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实在高兴，实在欢喜。在旧社会里，咱们受苦人是被人看作牛马的，可是现在劳动却变成光荣了。自从共产党领导咱们闹革命，打日本，发展生产，咱们才翻了身，再不受人压迫，还做到丰衣足食，有吃有穿，现在又当了劳动英雄，处处受人尊敬。想想从前，看看现在，咱们怎能不感谢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呢?！咱们怎能不感谢我们劳动人民的救星毛主席和各位首长呢?！在大会闭幕的时候，让我们向毛主席、向朱总司令、向高司令、向贺师长、向林、李正副主席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们说句心里的话吧：我们实在感激你们！敬爱你们！你们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句句记下，永远照着你们的话办，永远跟着你们走！

在毛主席自己动手发展生产运动的号召底下，今年一年边区的生产可是发展结实了。咱全边区一满开了一百万亩荒地，多打了十六万石细粮，安置了八千户移难民，改造了四千五百个二流子，种了十五万亩棉花，打了六十万驮盐，运输牲口比去年增加了十五六倍，办了许多象南区合作社一样的群众合作社；咱们的部队，一面对敌作战，一面自己生产，结果有的做到了部分自给，有的已经做到完全自给，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咱们的机关、学校也自己努力生产，结果自给了由百分之二十六到百分之七十六。咱们的工厂自己制造了许多日用必需品。这些大家在生产展览会上都是看到了的。咱全边区的农民、工人、士兵、学生和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凡是好好组织了劳动的家户、机关或部队，都已作到“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真正丰衣足食了。象这样美满快乐的生活，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象这样热火朝天，大家动手的群众生产运动，我们从来没听说有过。这是那里得来的呢?都是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和全边区人民努力劳动的结果。

今年的生产虽是很有成绩，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年年防荒旱，夜夜防盗贼”这句俗话。为了应付战争，防备灾旱，我们明年更要加劲生产，更要多打一些粮食。政府提出“耕三余一”的任务，我们号召全边区老百姓加倍努力，做到“耕二余一”，就是说，咱们种两年庄

稼，要长余下一年吃的粮食，好来有力量消减日本鬼子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好来防备跌下年成。

我们在二十天大会商议的结果，觉得要办到这个任务，必须实行毛主席的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必须作到：

第一、普遍发展变工、札工。全边区的农村都要向淳耀县的白塬村学习；他们把全村七十二户男女老少和牲口都组织起来长年变工，结果节省出三千个人工和驴工，每家比去年多打了一石粮食。都要向延安的吴家枣园学习；他们把全村十八户的人力都组织起来长年变工，结果多打了一百二十石粮食。都要向安塞的马家沟学习，他们组织了全村的人力、牲口变工，开荒任务超过一倍。

第二、实行移民政策，增加新的劳动力。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赤水的冯云鹏学习；他今年安置了一百七十四户共六百多个难民，帮助他们解决了一切困难，建立了十四个自然村。都要向鄜县的徐克瑞、延安的马丕恩学习；徐克瑞一个人从绥德号召了五十多户移民搬到鄜县。新来的移民难民都要努力生产，向赤水县的王向富、胡文贵学习，他们移来一年，就作到打粮一二十石，有吃有穿。都要向盐池的高仲和学习，他移来一年，打盐二千五百驮，折合粮食一百三十石，作到丰衣足食。

第三、明年要把全边区的二流子都改造成好人，一面由政府督促，一面由群众劝说。我们号召全边区的二流子，都要向盐池的刘生海学习，他过去是个二流子，没吃没穿，老婆也要离婚，自从前年春上转变之后，努力生产，到现在已经有九个牲口，打了二十多石粮食，被选举为参加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的劳动英雄，并且帮助两个二流子转变过来。

第四、发动能劳动的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我们号召全边区的劳动妇女都向米脂的郭凤英学习，她和男人一样，她能种庄稼，又会纺织。

第五、多开荒地，深耕细作，增修水利，发展副业。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延安的吴满有学习，他今年一家开了三十二垧荒地，多打了四十石粮食。都要向绥德的刘玉厚、刘培润、安塞的杨朝臣，延安的申长林，曲子的孙万福学习；他们多积粪，多上粪，多种，多锄，溜崖，盘畔，早起晚回，辛勤劳动，多打粮食。都要向志丹的马海旺学习，他自己利用空闲修好二十多亩水地，又推动全村修成六十亩水地。都要向清涧的白德学习，他一个村喂了几百条猪，开了四个粉房，还发展了其他副业。

第六、多种棉花，发动妇女纺线。凡是能种棉花的地方的老百姓，都要多种棉花，都要向吴堡的郭秉仁学习；他今年种了一亩地的棉花，收了四十四斤净花，还收了三斗芝麻，一千斤萝卜、蔓菁，并推动全村平均每家种棉花一亩。全边区的纺织妇女，都要向绥德的刘老太太学习；她除了自己努力纺线之外，还组织了一百八十多户妇女纺线。都要向绥德安锦城学习；他组织了附近六十里内的妇女纺线，一共赚了二百多石米。

第七、办好合作社。全边区的合作社，都要向延安县的刘主任学习；他办的南区合作社，给老百姓谋了几千万元的利益，老百姓人人喜欢。都要向淳耀的田荣贵学习；他在四个月内从一个乡的合作社发展成一个县的合作社，从一万元股金，发展到八百万元股金，为老百姓谋了许多利益。

第八、组织运输队，多运盐出口。盐是咱们边区的重要的出产，要繁荣边区，就要大量运盐。全边区的运输队，都要向延安县的刘永祥学习；他在南区合作社帮助下，利用公盐代金，组织了七百多条牲口的公私合作运输队，运回食盐一万八千驮。不但省下老百姓去驮盐，

而且凡是出公盐代金的人，都能分到很多红利。

第九、我们一面努力发展生产，一面还要节省粮食、储存粮食、多种洋芋，拿洋芋代替粮食，少制酒，少造糖，不要糟蹋粮食，遵守政府法令，不准粮食出口。并要学习关中劳动英雄张清益的办法，到处发起义仓运动，救济困难，防备荒年。

明年我们的部队也要加紧生产：从半自给走到全部自给。我们号召部队中每个指战员都要学习张治国、李位、胡青山、郝树才、武生华这些劳动英雄们的榜样，一面时刻准备消灭敌人，一面又不放过一点时间努力生产。他们有的一天开三四亩荒地，有的一天挖一百多斤甘草，是我们全体代表最佩服的劳动英雄。我们的工厂里要创造出更多的赵占魁运动者，每个工人都要学习赵占魁、袁光华、李凤莲等劳动英雄，学习他们努力生产，增加成品，爱护工厂，节省原料。使我们边区做到日用必需品的完全自给。我们机关学校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学习黄立德、佟玉新，要和他们一样努力生产，节省公物，使机关学校经济能达到半自给。

我们除了用一切力量和办法加紧生产以外，我们大家还要"夜夜防盗贼"。"盗"就是日本鬼子，就是时时威胁边区准备袭击我们的反动派；"贼"就是汉奸、特务的暗中破坏。我们若是不防备他们，这些"盗贼"会破坏我们的边区，破坏我们劳动的结果，破坏我们丰衣足食幸福快乐的生活，叫我们重新作牛作马。因此我们要训练自卫军，展开防奸运动，人人学放枪，打手榴弹，安地雷，盘查放哨，清查坏人，不让一个破坏分子混在边区。在这里，我们号召全边区的老百姓，都向葭县的阎开增学习；他亲自送他儿子去当民兵，为了保卫地方，保护公家工厂，他日夜不睡地查哨侦察，他领导群众破获了特务，捉拿了扰乱边区的反动便衣队。都向米脂的冯光祺学习；他为了保卫边区，自今年 4 月起就没有在家里睡过觉，他自告奋勇领导着一支自卫军，他曾破获了特务机关和破坏分子准备暴动的阴谋。他们两位，一方面是努力生产的劳动英雄，一方面又是自卫军和防奸的英雄。每个劳动英雄都要向他们看齐，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他们学习。

我们到会的代表们，都有决心把我们自己住的村乡变成模范村、模范乡。吴满有同志已做出计划，要把他的乡明年创造成模范乡，我们大家一致响应他。我们彼此已经定好互相比赛，看看那一个能争取到这个最光荣的胜利。我们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学生、机关工作人员都来互相竞赛，看谁在生产运动中走到前边。

现在天下大势正在大变化，日本鬼子快要垮台了，咱们的抗战快要胜利了。可是抗战前途还有许多困难和危险。让我们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明年更加努力，大家组织起来，加紧生产，保卫边区，做到家家户户丰衣足食，来迎接抗战的胜利吧！

（原载1943年12月17日《解放日报》）

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解放日报》社论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于本月16日闭幕了。这是继去年高干会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会议。在二十天的会议中，从各个生产战线上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的代表，总结与交换了他们丰富的生产经验，制定了明年大规模发展生产的方针和办法，发动了热烈的革命竞赛，然后带着倍增的信心回到他们原来的生产岗位上去。经过这次大会之后，我们有充分根据来期望明年边区一定会在生产战线上取得更多更巨大的胜利。这次大会将成为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些在大会通过的宣言里也可以充分看到了。

然而，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收获和它的意义还决不止此。它对于我们的干部（党、政、军、民所有干部都无例外）应当看做是一次最实际的教育，因为它对我们更充分证明与彻底解决了若干重要问题。

首先，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集中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去年高干会以来边区今年一年的工作成绩：劳动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纷纷表示他们对于边区的热爱，对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和他们的领袖的虔诚拥戴；党政军民的关系表现着空前的团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表现着空前的高涨；这一切就使边区的整个面貌呈显出一番新气象。这一切，就使我们不但不怕，而且有足够力量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对边区的进攻，或是应付国内反动派所时刻准备的对边区的突然袭击。

我们要问：这些成绩是从那里获得的呢？应当说，首先是由于我们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所指示而由去年高干会所确定的“生产是一切工作的物质基础”的方针；由于我们在高干会上把这个方针在干部思想上求得了一致，然后又把它贯彻到群众中去，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由于广大党政军民干部增强了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改进了领导作风，打击了官僚主义倾向，真正组织了一切人民、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由于我们在“自己动手”的口号下，不但解决了种种困难，而且达到了广大群众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

我们现时是处在持久的抗战环境当中，但和前方的各抗日根据地比较起来，陕甘宁边区所处的是相对的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首要的工作是建设工作，以边区建设来支持前方抗战，来推动全国的抗战建设。但是，我们究竟应当建设些什么？什么是我们全部建设的中心环节呢？这在高干会以前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没有解决的。毛泽东同志曾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就是说，我们应当

领导人民去发展生产，在发展生产中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就是我们在边区现时环境下抗战建设的中心。在陕甘宁边区，封建剥削已经消灭或是减轻了，人民群众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民主的"三三制"政权，而我们所处的又是相对的和平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可能而且必须用一切力量与办法，来领导群众大规模地发展生产。我们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生产，一方面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一方面又附带解决抗日经费问题；我们领导党、政、军、群众发展生产，一方面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一方面又可减轻人民的负担，更加改善军民关系。这样，在提高人民群众和党、政、军、群众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这些目的，我们在一年生产运动中已逐步达到了，并且证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困难，争取团结与抗战的胜利。

这个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方针，经过一年实践之后，又在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完全证明其为唯一的正确方针。象在劳动英雄大会上所表现的群众自动的拥军热潮和军民一体的亲密关系；群众对于特务破坏分子和反动派准备进攻边区所表示的最高度义愤；吴满有等劳动英雄，在他们的模范乡计划中，自动要求办理学校；以及今年的征粮工作比任何一年费力最少而完成最快等等。这些成绩，就是由于我们把领导生产工作当作中心环节，经过这个环节，推动了自卫军、防奸、文化、战斗动员、拥军等等各方面的工作。过去有的同志，以为在边区经济落后的条件下，我们在经济建设上不可能有所作为；以为领导生产不是党和政府的任务；或者轻视劳动，轻视生产工作；这些思想，现在更加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了。

其次，在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再没有那么明显地显示出劳动群众的真正智慧和创造能力。我们的世界和它的历史是劳动群众创造的，我们发展生产，如果离开广大群众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领导生产，必须是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发展生产变成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这个方向，现在也是比任何时候更加证明其正确了。边区的劳动群众，在党的号召之下，作出了许多惊人的事迹。例如：吴满有、陈德发、石明德，组织了象吴家枣园、马家沟、白塬村那样全村的变工队，提高了几乎一倍的生产力，开拓了边区农业生产的无限前途。刘建章在多年的摸索中间，创造了南区合作社式的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综合性的合作社，建立了全边区合作运动的新方向。冯云鹏以一个人的努力，安置了一百七十多户难民，又发明了许多巩固难民、了解难民的办法。张清益创造了每村共同开荒，设立义仓，推动了全关中分区的义仓运动。杨朝臣、申长林、孙万福、张振财、刘玉厚、贺保元、马海旺等人，根据现有技术基础和当地条件，创造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改良农作、兴修水利的办法，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阎开增、冯光祺创造了把生产与防奸相结合的方向，创造了许多与破坏分子斗争的办法，粉碎了特务机关的暴动阴谋，保证了群众生产运动的发展和它应得的果实。妇女中的郭凤英、刘老太婆等，积极纺织与参加农业生产，推动了附近妇女的劳动，指出了边区妇女运动的正确方向。我们的部队生产，更是世界上的奇迹。他们把打仗与生产结合，表示出他们真正是人民的和革命的军队。部队中的张治国、李位、胡青山、郝树才、武生华等人，创造了开荒挖甘草等的新纪录，推动了全军的劳动热潮，他们又是打仗的军队，又是劳动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工厂中的赵占魁、袁光华等，不断提高劳动标准，推动了全边区的赵占魁运动。机关中的黄立德、佟玉新等；创造了许多种菜与节省的办法，大大推动了各机关的自给和节省运动。盐工中的高仲和、李文焕，发明了打盐的新方法，提高了食盐产量。以上这些不胜枚举的事迹，或者需要艰巨的组织工作，或者需要个人的创造能力；然而它们却都是由这些动手动脚

的劳动者自己作出来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充分说明那些轻视群众力量，缺乏群众观点，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同志，是完全错了。领导者的责任，是在于把这些劳动人民的创造，吸收与综合起来、加以发扬，加以推广，把它变成广大的群众运动。今年边区生产成绩的获得，就是由于我们采取了这种方法的结果。这种方法，这种观点，是我们在任何工作上所必须采取的。过去有的同志曾以为经济建设只是少数财政、供给、贸易机关人员的任务，少数“专家”的任务，不须依靠群众，不须组织群众，不须发扬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不须设法造成群众的生产运动，现在完全证明是错误的了。

再次，群众虽然有力量，但如果不把他们组织起来，还不能发挥他们的力量，这在生产方面如此，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是如此。在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特别是经过了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之后，完全证明了只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把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组织起来，就会发挥出雄伟无比的力量。而目前在经济上组织人民群众的最恰当与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变工队、札工队、唐将班子一类的农业合作及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综合性的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

边区的农业，还没有、暂时也不可能改变它的个体经济和比较落后的技术基础。但是，边区农民群众在经济上所受的封建剥削已经消灭或减轻，同时，在政治上，农民群众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已经参加了政权，这就造成了一种可能，使他们能够在劳动一点上集体化起来。这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和现有技术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已经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并给将来更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造成了物质基础。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财富的增加，不是由少数私人所占有，而是为参加集体劳动的农民所共同享受。这就是它有广大发展前途的基本原因。在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凡是变工一类组织比较好的地方，农民群众的互相帮助的团结精神，就更为发扬，他们对于保卫边区和拥护军队也更为积极，他们传统的劳动习惯和劳动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变工一类的农业合作，又是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渐达到集体化的一个步骤。

边区各地的水利事业（包括水漫地埝地等等），自从提倡变工以来，也有了相当发展。只举一个例子：鄜县张村驿区三乡的水利，从国民党联保处时代就修过几个月，未修成，今春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变工队，四五天内用一百三十多个工，就修成了灌溉八十亩水地的水利。又如延安南区的信用合作社，八个月中间，仅在两个乡的范围内，就吸收了一百多万元的存款，放出三百多万元的借款，解决了当地农村的金融问题。又如延安县刘永祥式的运输合作社，今年采取了公私合作，利用公盐代金的办法，大大发展了运输牲口，完成了全县运盐任务。原来负担公盐代金的人民，不但保有了原本，而且可以分到八、九倍的红利。现在延安县的公盐代金，已不再是人民对政府所出的负担，而变成人民自己对运输合作社极有利的投资事业了。

南区合作社式的、综合性的合作社，经过今年在关中、安塞、靖边等地的办理，都收到极大效果。这种合作社，在手工业生产、妇女纺织、农民各种消费、农村信用借贷、运输、出入贸易，甚至公粮负担上，都组织了广大的农民群众，替群众谋到了极大的利益，取得了他们全体的爱戴，而成为当地农村经济的核心。

以上，无论是在农业劳动上以及水利、消费、运输、信用、手工业（包括妇女纺织）上，当它们分散为个体经营时，就显得软弱无力，没有前途。而一经适当地组织起来，合作起来，就得到空前的发展，有了广大的前途。这些经验，经过今年一年的生产运动和劳动英

雄代表大会之后，将为边区绝大多数群众所接受。因此，我们今后领导生产的中心环节，是在自愿的原则下，采取各种合作形式，来组织更广大的群众。

最后，从到会的劳动英雄代表中间，我们发现了无数的模范公民，新民主主义式的典型农民。象吴满有、陈德发、石明德等那样，不但发展自己的生产，而且组织全村的变工队，组织模范村、模范乡，推动全村全乡人人生产，人人丰衣足食。象冯云鹏、张清益那样，昼夜不停地帮助新来难民，筹划全区义仓，甚至牺牲了自己家庭的一部分生产。象阎开增、冯光琪那样，为了保卫边区，坚决地和特务破坏分子斗争。象申长林、孙万福等等那样，踊跃负担，拥护军队。象刘生海那样，从旧社会上吸烟赌博的二流子，转变成努力生产的劳动英雄。这一切，都表示边区群众的政治觉悟及团结互助精神，是大大提高了，保卫边区的斗争情绪，也空前地增长了。由于他们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得到了真实的利益，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联系在一起了。上面所举的这种公民，是在经过革命后从共产党所号召的生产运动中间（又是组织各种合作形式中间）所产生的，这是一种新型的人民，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今年春天，我们曾提出吴满有作为边区新农民的典型。现在在劳动英雄代表会上，我们看见更多的吴满有，和更丰富了与从各方面发展了的吴满有方向。在边区已经产生了很多的吴满有。这是我们伟大的收获和胜利。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在新民主主义下，才会产生这种新型的人民。紧紧地依靠这样的人民，我们将是不可被战胜的。

经过今年一年的实践，证明去冬高干会以来我们的方针，我们的办法，都是正确的。只要我们不因现有成绩而自满，只要我们随时检讨我们的缺点，并加以纠正，只要我们继续进步，我们明年一定会收到更大的成绩。

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

——一九四四年一月七日在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演——

毛　泽　东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作者！

你们开了十几天大会，总结了很多的与很好的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种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学习你们，你们是生产运动和各项建设工作的带头人。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更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领导人员与下面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到上面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你们有许多好处，有很大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与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你们的经验，这次大会做了很好的总结。这个总结文件说得很好，不但这里适用，各地也可以适用，我就不讲这些了。我想讲一点我们的经济工作。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及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给，并有盈余，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成绩。到了那时，才算学得更多，学得更好。如果那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那个地方的军政党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那个地方就会要遇到绝大的困难。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这一点好象并没有什么问题，谁不知道我们是处在农村中呢？其实不然。我们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其中有些人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在前方）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处理政治问题上，在处理军事问题上，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在处理文化问题上，在处理党务问题上，在处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问题上，常常不适当，或不大适当。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作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几年来，由于整风，由于在工作中碰了

钉子，使我们的同志有了很多进步。但是还须注意，还须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看来收效很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说，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为，如果我们从后一点出发，脱离今天的现实，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

即如我们提倡采取现有样式的军民生产运动，发生了很大的效果，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如果我们要从农村根据地上打退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并且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一切失地，这就不是短期的事情，需要准备长期战争。抗战已有八年了，农村的财富，被敌人摧残，我方消耗，都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还要坚持战争，并且还要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然后才能把日本人打出去。在这种坚持战争与准备反攻的工作中，除了军事、政治、文化等项以外，物质力量的准备，就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了。没有这个条件，现在的坚持与将来的反攻，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们是处在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同盟国出力，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外国人帮助。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那么，有些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

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生产兴趣与生产力，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与组织互助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互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我已得了华北华中各地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说：减租之后，农民兴趣大增，愿意组织如同我们这里的变工队一样的互助团体，三个人当成了四个人。如果是这样，九千万人就当成了一万万二千万人。还有两个人当成三个人的。如果不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那么，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或全体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的与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建立在新的生产力上面了。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地研究这项工作，用极大精力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及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争，不但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备大批粮食及日用品，以为反攻敌人之用。

不但要组织农民生产，而且要组织部队机关一齐生产。

由于是农民，由于是被敌人经常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机关也可能生产。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因此，我们决定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拿我们边

区说，部队机关每年需细粮（米）二十六万担（每担三百斤），取之于民的占十六万担，自己生产的占十万担，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军民两方，势必有一方要饿饭。由于展开了生产运动，现在我们不但不饿饭，而且军民两方面都吃得很好。

我们边区的机关，除粮食被服两项之外，其他用费，大部自给，有些单位则全部自给。另有许多单位，并且自给一部分粮食，一部分被服。

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及其他一切，全部自给，即自给百分之一百，不领政府一点东西。这是最高的标准，这是第一个标准，是从几年之内逐渐达到的。

前方要作战，不能采取这个标准。前方可以设立第二、第三两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除粮食、被服两项由政府供给之外，其他如油（每日五钱）、盐（五钱）、菜（一斤至一斤半）、肉（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费、办公费、杂支费、教育费、保健费、擦枪费、旱烟、鞋子、袜子、手套、毛巾、牙刷等，一概生产自给，约占全部用费百分之五十，可在两年至三年内逐渐做到。现在已有做到了的。这个标准，在巩固区内可以实行。

第三个标准，是在边沿区及游击区内实行的，他们不可能自给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给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够这样，也就很好。

总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于战斗、训练与工作的间隙，一律参加生产。部队及机关，除利用战斗、训练及工作的间隙，集体参加生产之外，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与农民伙种粮、菜。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不愿建立家务的二流子习气，那是可耻的。但须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藉以刺激生产的发展。又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方能有效地推进生产工作。

有人说：部队生产，就不能作战与训练了，机关生产，就不能工作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最近几年，我们边区部队从事大量的生产，衣食丰足，同时又进行大练兵，又有政治与文化学习，均比从前有更大的成绩，军队内部的团结与军民之间的团结，也比从前更好了。在前方，去年一年进行了大规模生产运动，可是去年一年作战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并且普遍地开始了练兵运动。机关因为生产，生活改善了，使得工作人员更安心，更有工作效率，边区和前方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机关、部队，如果有了生产自给运动，他们的战斗、训练与工作，就更加有劲，更加活跃了。他们的纪律，他们的内部团结和外部团结，也就更好了。这是我们中国长期战争的产物，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学会了这一条，我们就对一切困难都不怕了，我们将一年一年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们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们。

但是，有一点还须引起我们前方同志的注意。我们有些地方开辟不久，还颇富足，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自恃富足，不肯节省，也不肯生产。这样就很不好，他们在将来一定会吃亏的。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敌人走了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

关于工业品，陕甘宁边区决定于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

全自给。原来根本没有，或出产很少的，现在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完全不靠外面。所有这些，由公营、私营与合作社经营三方面完成任务。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西北局，对于这些抓得很紧，这是非常之对的。希望前方各地也是这样做。有许多地方，他们已经是这样做了，希望他们得到成功。

我们边区及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完全学会全部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与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完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日本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附] 抗日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参加劳动互助组织人数统计

项目 地区	劳动人口总数	组织起来的人数	组织起来的人数占劳动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陕甘宁	338,760	81,128	24%
晋绥	391,845	146,550	37.4%
晋察冀 (北岳)	5,676,940 1,000,000	562,704 200,000	9.8% 20%
晋冀鲁豫 (太岳)	700,000	70,000	10%
山东			20%
华中 (盐阜区)		117,000	

资料来源：（1）林伯渠同志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总结，“解放日报”，1944年2月8日。
（2）敌后解放区的农业生产，“解放日报”，1945年1月18日。
（3）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实业处编：1945年大生产运动总结参考材料。

（摘自《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708页。）

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全边区各工厂和生产合作社的厂长、工程师、技师、及全体职工同志们！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二百零三个人代表三十九个工厂和六个纺织合作社，在延安开会，这是边区职工战斗力量和自给工业的大检阅，二十多天的会议中间，在毛主席和西北局、边区政府各首长指导之下，总结了几年来边区工业建设的成绩和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方针和办法，这是发展边区经济，保障抗战供给的一件大事，是我们一生最痛快的事。

我们边区的工业，是在地瘠民贫，没有工业基础的农村，在经济封锁、外援断绝、缺乏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几年来我们战胜万难，白手起家，创建了纺织、冶铁、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制药、肥皂、皮革、陶瓷、火柴、石油、玻璃）、工具、石炭等各项工业。工人从七百人发展到一万二千人，特别在1943年是边区工业大进步的一年，如许多机器的制造与修理，基本化学工业的初步成功，灰铁土铁的制炼成功，陶瓷、玻璃、火柴的制造成功，石油产量的大大增加，制革、毛呢的进步，印刷、纺织、被服、造纸、肥皂等各工厂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和质量上的某些改进。现在我们已经做到：布匹自给三分之一；纸张已自给一半；石油、肥皂已全部自给，且有余力供给邻区和前方需要；冶铁、火柴、陶瓷、玻璃已准备开始大量生产；简单工具大部已能自造。这些成绩，对于边区，对于抗战，都发生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值得我们兴奋的是我们有了一些善于管理工厂的干部和二三百个赵占魁式的职工劳动英雄。

我们能够得到这些成绩是由于毛主席“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号召和“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建立经济核算制”、“改善工厂组织与管理”、“发展赵占魁运动”的指示；是由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又经过去年边区政府工厂会议把这些指示更加具体化；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和全边区工厂职工思想认识的提高和努力劳动的结果。但是我们决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我们边区的全部工业必需品还不能自给，还需要大大的努一把力；我们的产品质量仍很差，我们工厂的组织和管理仍有不合理的现象，各工厂赵占魁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这些我们在大会上虽作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更需要我们全体职工的努力，来克服缺点改进工作。

在大会上，根据现有的条件和基础确定了两年内作到工业必需品全面自给和为质量而斗争的方针任务，要做到年产大布三十一万匹，要做到炼铁及其他必需品全部自给，成品的质量都要坚固耐用，这是一个伟大艰苦的工作，经过大家商议的结果，觉得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做到：

第一，切实提高产品的质量。首先，全体职工要从思想上认识我们的产品不是为了投机取利，而是为了保证党政军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需要；正象刘少奇同志说的“制出的成品

是供给广大群众用的，如只追求数量不管质量的好坏，这就是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同时要认识质的提高，也就是量的增加，今天我们要求质量好、产量高、成本低，质量是第一位，为了提高质量，要从原料采购、成本制造和推销的全部过程都要注意配合，每项产品要有必需的标准，要有严密的制度和检查，我们的布匹，纱要纺匀、要纺紧，每方寸经纱不少于五十八根，纬纱不少于五十根，布面要平，布边要齐，无疙瘩、无窟窿、无飘纱、无当子的标准；我们的纸要做到纸面大小一致，每令马兰纸重量最高不超过二十三斤十二两，并要纸浆细匀，没有疙瘩，纸面走滑、坚韧，没有泥砂，没有皱纹和窟窿的标准。被服要式样合适、针码密、整齐坚固，鞋子要质地坚实，针码要细密，底绳要拉紧，坚决消灭“礼拜鞋”。火柴要做到耐潮湿、不爆炸，药头均匀不脱落，没有并头，没有脱杆，每匣最低不少于九十根，根根能用。重工业产品都做到坚固准确，各种产品，都要保证在一定质量下来提高产量为标准。只图数量不求质量的粗制滥造倾向，必须严格的加以纠正。

第二，要发挥职工的创造性，和大大提高生产技术。虽然在工业建设中，职工们已有不少的创造和发明。但这些创造和发明，还很不够，我们的技术还很落后，要做到全面自给和提高质量，还需要我们全体职工有充分的创造发明，来把边区没有被发掘的资源利用起来。因此，我们要学习模范工程师沈鸿同志，他埋头苦干，设计装备了许多工厂的机器，试炼灰铁成功，解决了机器的制造原料的精神，要学习军工局长李强同志，他领导、计划、布置、设计，并亲自动手，推动和帮助了边区重工业上各种主要发明和创造精神；要学习钱志道同志；他坚毅努力，刻苦经营，创立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精神；要学习华寿俊同志利用马兰草造纸和林华同志制造玻璃、陶瓷的精神；要学习尹希圣同志把制造火柴技术传授给全厂职工的精神；要学习材料厂副厂长晋川同志等创造许多通讯器材，保证通讯工具供给的精神；要学习朱次复同志设计和创造许多纺织机器的精神；要学习甘泉关中炼铁厂克服一切困难、试炼成功的精神。我们要继续发扬互助精神，重工业帮助轻工业，公营工厂帮助民营工厂，工厂、作坊帮助家庭手工业，工人帮助学徒，特别是要做到布匹自给，必须普及纺织业，各公营纺织工厂都应做模范，替纺织合作社、私人作坊培养熟练工人，供给技术和工具等。帮助纺织业不发达的各县，建立固临式安塞式的纺织合作社。在这一方面难民工厂是有成绩的，今后应继续发挥，其他工厂都应向它学习。在各工厂里都应学习边区纺织厂的技术互助办法，他们每个工人都义务的帮助几个学徒。我们向所有对边区工业有贡献的工程师和职工同志们学习，反对保守技术的行会主义思想和技术的宗派倾向，我们欢迎一切工业技术人员到工厂中来，让专家们的科学知识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结合起来，把我们的技术、聪明智慧都贡献给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建设，欢迎边区知识分子学习工业，欢迎边区人民参加工厂，欢迎边区以外的工商业家来边区开办工厂，把边区工业建设向前推进一步。

第三，要进一步改善工厂的组织和管理。一年来我们的工厂组织管理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有些工厂，还没有做到毛主席指示的工厂企业化，还存在机关化、纪律松懈和内部混乱的状态，有些工厂的领导上，还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的作风，这对于发展边区工业是很大的碍碍，必须很快的纠正。我们要做到组织机构上短小精干，要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制。根据毛主席关于合作的指示，公营工厂要执行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的方针和建立适合工厂实际需要的劳动纪律和各种制度。正确的实行领导一元化，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团结全厂职工，要学习石油厂厂长陈振夏同志，他埋头苦干以身作则，关心工人生活，注意职工教育，亲身参加生产，虚心向群众学习采石油的技术，恢复旧井，打出新井，大大提高了石油产量。要学习难

民工厂厂长吴生秀同志，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同志和新华化学厂厂长金直夫同志，他们都熟悉业务团结工人，重新组织和配备了劳动力，建立了各种切合工厂需要的劳动纪律和各种制度。我们要学习实验工厂厂长和职员都直接参加生产的精神。我们要使一切工厂的管理合理化，全体职工都有责任切实执行与遵守工厂的各种规则与制度，和帮助工厂管理制度与领导作风的改进，肃清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提高职工积极性和生产热忱，达到全厂职工团结，一致把工厂办好。

第四，要发展与坚持赵占魁运动。赵占魁运动也就是劳动英雄运动，其目的是建立职工新的劳动态度，发挥创造，提高技术，发扬级阶的团结互助，为产量高、质量好、成本低、完成工业建设任务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中央印刷厂，他们全厂人员，普遍参加了赵占魁运动，每个人每个部门都有定期的具体计划，按期检查，随时注意和改善工人生活，伙食上花的少吃的好，文化娱乐活跃，使赵占魁运动能坚持下去：要学习新华化学厂，他们随时纠正工人中的偏向，及时奖励新的发明改进；要学习难民工厂，他们普遍参加赵运，个人、小组、部门都订了生产、学习、节约、储蓄的计划，他们创办青年文化班教育工人，使生产学习与改造思想结合起来；要学习边区纺织厂，他们实行职工经济技术文化各方面的互助，研究了许多节省原料的办法。我们要向各产业部门、各工厂自己的劳动英雄学习，全边区工人都应学习边区工人的旗帜赵占魁，学习他不怕困难，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始终如一，胜不骄，败不馁，从来不为个人名誉地位打算的革命品质；学习他的不断提高技术，改进质量，爱护原料工具，教育工人学徒的精神，要学习做工三十七年石油厂老英雄刘考生同志，他精通业务，遇到困难奋不顾身，把工厂当做自己的家庭，他做什么都比别人质量好产量多，并节省原料器材，经常教育工人，象教育自己的子弟一样。要学习难民工厂袁广发同志，他以一个在革命部队七次负伤的残废在工厂工作，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待遇和地位，他精通业务，能很好的组织生产，始终积极工作，舍己为人，团结群众。要学习兵工厂劳动英雄孙云龙、范明谦积极生产，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努力节约的精神。要学习工艺实习厂黄海霖、王河海等同志努力创造，积极工作，帮助别人，自己学习的精神。要学习女工劳动英雄李凤莲，她参加革命十年来始终安心业务，积极工作，自己生产数量多质量好，并团结群众，教育二流子转变，组织与推动别人的生产。要学习青工劳动英雄曹国兴，他有优越的创造才能，高度的劳动热忱，对工厂热爱，对原料节省。我们要学习所有的劳动英雄，展开革命竞赛，把赵占魁运动提高一步，创造模范部门，模范工厂和培养无数的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

全边区工厂的职工同志们！毛主席告诉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发展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工人数目虽小，但是最有发展最富有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让我们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之下，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吧！我们一定能完成两年内工业品完全自给和改善质量的任务，我们以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来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原载1944年7月30日《解放日报》）

[附] 边区工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过去曾是一个被叫做“地瘠民贫”的区域，工业是非常落后的。民间仅有一

些小手工作坊和盐池炭窑。农村家庭纺织业也因为外来纱布的大量涌入而销声匿迹。可以说，一切日用品都是仰赖外间输入的。

一九三八年，我们开始注意了自给工业的建设，首由边区政府创办难民纺织工厂、振华造纸厂、兴华制革厂、被服工厂、农具工厂及八路军制药厂，起了倡导作用。一九三九年工业品的输入受到限制，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边区政府于五一劳动节举行工业展览会以资激励发展工业外，复先后设立了新华化学厂及光华制药厂，并在延安十里铺开始探采厚层煤矿。一九四〇年党中央提出“半自给”政策与“集中领导、分散经营”方针，动员了党、政、军、民、学为边区主要工业必需品的自给而奋斗，纷纷筹设工厂；朱总司令提倡纺毛运动，部分发展了纺织事业。一九四一年党中央提出“由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的政策，工业发展遂呈突飞猛晋之势，党中央直属机关学校新办大小工厂即达二十七处之多，给下一年的巩固工作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一整个时期（指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编者）的建设是带着盲目性的，在许多人员的头脑中缺乏清醒的了解，只知道现在，不知道将来，只知道分散经营，不知道统一领导，充分地表现了一种无政府状态。”（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建设厅确定“巩固现有公营工厂，发展农村手工业”的方针，开始清除盲目性与无政府状态，而增加自觉性，实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经营。政府对工业的投资达一百七十万元，农村民间手工业已有很大发展。

一九四三年，就成了大进步的一年。

首先是纺织工业。全边区现有公营纺织工厂二十三家，工徒一、三五七人，织机四四九架，共产大疋布三二、九六八疋。与四二年二万二千余疋比较，增加百分之四九．七，与四二(?)年一万八千余疋比较，增加百分之八三，而于三八年一千二百余疋比较，增加数竟达百分之二七四．六二。我们的需要量是四万至五万疋（民用在外）差不多已快达到自给目的了。

这就是说，纺织工业是在发展中。以难民工厂为例，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这一趋势。该厂历年产量如下：三八年一二〇疋；三九年二三二九疋；四〇年二四九四疋；四一年五〇一六疋；四二年五五九八疋；去年七五二四疋，去年与前年比较，增加百分之三三．九，与三八年比较，则增加百分之七千二百七十。

这就保证了去年的被服供给，真正做到了“丰衣”。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一、采取了保护土布的政策；二、普遍提倡民间妇纺：据不完全的统计，去年全边区纺妇人数一三三、四五七，纺车一二〇、二五五，共纺纱八三五、七〇四．九斤。少部分留作自用，大部分送进了工厂，并因此相当保证了各厂纱线原料的供给等等。

其次是造纸工业：全边区现有公营造纸工厂十一处，工徒二九四人，池子七七个，去年共产纸五、六七一、三九七令，与四二年四、九八三．三八令比较，增加百分之一三．八，与四一年二、一七四、二七一令比较，增加百分之一〇六．九，而与四〇年八三三．三二令比较，则增加百分之五五二．二。已够全部印刷之用。

这就是说，造纸工业同样是在发展中。以振华分厂为例，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这一趋势。该厂历年产量如下：四一年三五〇．八令；四二年一四九四．一令；去年二〇八九．一令。去年与前年比较，增加百分之三九．八，与四二年比较，则增加百分之五九五．五。

再次是化学工业：全边区现有两个肥皂厂，三个陶瓷厂，一个石油厂，一个火柴厂，一个制药厂，二个皮革厂。拿新华化学厂来说，四二年每月平均工徒数为八四．四八，年产肥皂三一〇、六五九条；四三年每月平均工徒数为四一·一七，较四三年减少百分之五

一　一四，年产肥皂四八二、八五五条，较四二年增多百分之五五．三。其全年任务为三十七万条，超过百分之一百三十．五。与任务比较，超过数已有可观；与前年实际产量比较，进展数更属惊人。火柴是边区的新兴事业，磷的问题解决后，已在大量制造，已可全部自给了。其它各业，亦有进展。

此外，全边区公营工业尚有被服工厂十二个，炼铁工厂二个，工具厂八个，印刷厂四个，木工厂七个，煤炭业、盐业、榨油业与其他一些小作坊尚未计算在内。而所有这些企业程度虽有不同，但其向上发展的趋势则是一样的，例如炼铁，高干会前后尚在试验中，但现在已经建立二个铁厂开始提炼了。

公营工厂是边区工业的骨干，它的产品主要供给边区部队和党政机关的需要。

与公营工业相伴发展的，则是各种生产合作社——由手工生产者合作或由合作社投资成立的生产事业与私营的手工厂以及家庭手工纺织业，它们相互辅助而不是相互牵制，形成边区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以织布业（边区工业的主要部门）为例：一九三九年边区尚只一家公营工厂，工徒二一〇人，织机二三架，年产大布一、四二六疋；纺织合作社即有二家，工徒二五人，织机八架，年产大布四〇〇疋；私营工厂六家，工徒一五四人，织机五二架，年产大布三、六九〇疋；当时家庭纺织部分开始恢复，产量尚小。去年，公营织布工厂固有极大发展（见前）；织布合作社、私营工厂及家庭手工业也随着跃进，计织布合作社三七个，织机一七九架，工徒三七四人，生产大布六千疋；家庭及私营工厂织机一八、四六七架，男女职工四二、二四二人，生产大布六五、三三四疋。连同公营工厂所产，合共一〇四、三〇二疋。合作工业在年产量上增加了十五倍，家庭织布业在总产量中则占据了百分之五十六以上。说明一个问题：公营工业并不排挤小工业，相反，它们是相依为命的。

生产合作社、私营工厂及家庭手工业是边区工业的助手，它的产品主要供给人民的需要。

去年边区工业的发展，不仅标志在量的增加上，而且标志在质的改进上，最明显的就是土纱质量的改进，因此就有可能使边区布产全用土纱，首先是难民工厂试用，由此推动了其他纺织厂普遍应用。这样就杜绝了洋纱的入口。

六年来坚苦建设的结果，边区变样了，一个毫无工业基础、经济上完全依赖外面的落后地区变成了一个有许多手工工厂——有公营工厂、私营工厂、生产合作社、家庭手工业和小型手工作坊的、工业上半自给的地区了。布疋，我们已能自给全边区需要的三分之一以上；纸张，我们已能自给全边区的一半；石油，肥皂，不但已经自给，且尚有余力接济邻近地区和前方的需要；工、农业所需工具，大部已能自造；火柴有了，玻璃有了，铁也快有了。但必须记住，我们所有的大部分还不是一个完完整整的数字，我们所有的还只是这样一部分，那样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还只能做到半自给，而我们是需要全自给的。

但毕竟是一个大的成绩，成绩何由而来呢？

因为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做的，这表现在下列各方面：首先，全部自给工业已经逐渐走上统一的领导。其次，去年四月间政府召开了厂长联席会议，既检讨了曾经存在于各厂的缺点甚至错误，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具体想出了克服与改进办法，例如开始建立经济核算制，提出"当天账目，当天核对，当天过完"等等口号；开始解决供销间的矛盾现象与工厂管理、组织上的不合理现象，一方面确定工厂改为政府的供给机关，解除其产品销路上的疑虑与人力上的浪费，以便埋头生产，另一方面，供销统一，减少了采购人员。过去只难民、边区

工厂的采购机关即达七个之多，人员四十八个，现在政府系统各工厂只有一个供销处，各县由合作社代办，人员减至廿五个。工厂机关化的倾向，亦经纠正，例如化学厂一九四三年生产肥皂三一〇、六五九条，职员每月平均数达三九．五八人；四三年生产肥皂四八二、八五五条，职员每月平均数反而减至二五．五人。并加强了各厂的领导，选派得力干部出任厂长，除难民工厂外，政府所属各厂的领导骨干几已全部更换。偷盗浪费现象曾是严重地存在过的，但由于领导的加强，亦日益减少。这样，就使各工厂的领导一元化，管理制度、供销制度上走上了正规。其次，边区政府对于工业实行奖励和扶持的办法，在过去两次工业展览会上，奖励了有发明有创造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在去年更奖励了妇纺劳动英雄百五十人，这些办法鼓舞着农村纺妇、工厂职工、技师和科学工作者的往前迈进，而没有这些优秀技术干部苦心孤诣的创造（这方面，军工局有好些模范例子值得大家学习的）与广大群众劳动热忱的激发，边区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并经常增加资本分别投放于各种自给工业中，在政府的领导下，边区对于工业的投资总计已在一万万以上，光政府系统（分区在外）去年一年共投资额即达一千万元，而对于家庭纺织的投资（二百万），对于农村纺妇的投资（十余万斤棉花）以及对个别私营工厂的投资尚未计算在内，这些办法刺激着工业的向前发展。

这是关于领导方面。

成绩之所以获得，还因为赵占魁运动的展开，赵占魁运动是一种以新的劳动态度对待革命工厂的群众自觉性运动，一九四二年开始就在职工中间酝酿、发生，而一九四三年即普及于边区所有工场和作坊了。他们自动提出超过生产定额，拟定新的个人生产计划，节省原料，爱护工具，遵守劳动纪律。由于这个运动的开展，就涌现了大批劳动英雄，这在行将开幕的厂长、职工代表大会上就可以看到的；就使边区工业生产大大提高了一步，下面是几个简单的数字：边区纺织厂去春组织竞赛，全厂月产量即由八十三大疋提到百五十三大疋，增加百分之八十四。难民工厂四月份产布四八六疋，八月份即增至一〇〇六疋。宝丰纸厂五月份产纸一〇．九令，十月份即增至三八令。

这是关于工人群众方面。

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的，边区工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就如去年那样蓬勃发展的热潮中，我们却也看到了“一股逆流”：有那么一个历史悠久的毛织厂，三、四月间真正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中。以后新厂长到了，他做了些什么呢？要建立经济核算制，而他还是“我厂长说开支就开支”；行政、支部、工会要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而他却是不能开会，一开会就拍桌子，闹无原则的意气；要开展赵占魁运动，而他却是一动不动，最后竟是“厂长也不知道”；要领导一元化，而他却是“一把抓”；产量增多了，但质量降低了；成本减低了，但管理费提高了。应该说，这样的领导是完全无能的，这对于边区工业的往前发展有着极大的阻碍作用，是及须注意纠正的。

六年的工业建设，尤其去年的经验是特别丰富的，我们必须仔细总结它，我们必须从实践中得出今后关于工厂与工人合作问题，工资制度问题，工会工作与坚持赵占魁运动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厂副业问题，工厂会计问题，技术改进问题，供销问题的结论出来。只有这样，边区工业才有更巩固的阵地并由此出发更往前发展。

（原载1944年5月1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联席会决议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通过）

边区办合作社有十年了。从前办合作社没有找上好门道，公营气大，民营气小，人是委来的，钱是摊派的，偏重消费，不重生产，脱离群众，群众把合作社看成公家商店，合作社长期不能好好发展。自从出现了刘建章的南区合作社，讲究生产，讲究服务群众，党和政府又提倡民办公助，积极领导，这二年才把合作社的道路走对了。合作社有大的发展，大的进步，现在全边区县、区、乡合作社发展到四百几十个，经营单位相近一千，股金资产总计达二十余万万元。社员二十多万人，差不多每户有一个人参加合作社，比起前二年是大发展了。现在的合作社差不多有半数都闹生产，不像从前单搞消费了。群众入股多半是自愿的，不像从前强迫摊派了。合作社为群众办了许多事，和群众更加结合，不像以前脱离群众的样子了，比起前二年，也是大进步了。

现在大家都解得开：合作社不是公家商店，也不是人民负担，而是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又给群众办事情的团体，是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各阶层人民大众联合经营的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公益事业的组织，这种组织只有民办公助，才能办好，不能脱离群众，光靠上面来办。南区合作社就是在民办公助下真正为群众谋利益而发展起来的模范，它的业务有二十几种，都是给群众谋利益的。群众要穿布，布贵买不到，合作社就组织妇纺，创办织布工厂。群众要运盐，单行不方便，合作社就组织运输队，大家合伙运盐。群众吃的用的，合作社廉价出售，土产剩物，合作社收集推销，有余钱，存到合作社生利，扩大生产，要钱用到合作社低利借贷，不受熬煎，移难民要生产，合作社帮助，抗工属有困难，合作社解决，人、牲口有病，合作社医治，变工、札工合作社扶助、鳏、寡、孤、独，在合作社存款，以备养老，贫寒子弟在合作社储蓄以备娶妻，灾祸临头，合作社救济，婚丧大事，合作社帮忙，邻里纠纷，合作社调解，书信对联，合作社代笔，为防荒旱，举办义仓，为增生产，开办农场，为公众利益，植树造林，为牲畜繁殖，份牛份羊，为提高文化，办黑板报，为普及教育，办民办小学，政府农贷合作社代放，政府税收合作社代收，包运公盐，节省民力，包缴公粮，公私两便，举凡衣食住行、经济、文化、卫生保健、社会公益，合作社都替群众打算，都为群众服务，把合作社和群众利益真正结合起来了。群众都有一个家，家里办不了的事，都由合作社办，合作社就变成群众小家上面的大家，有这个大家，我们的生活才能过得更美，这是合作社的正确道路，也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全边区合作社，全边区人民，都要走这条道路。

两年当中，边区又出现了许多好合作社，绥德安锦城合作社、张丕元合作社、延市萧洪启合作社、延安曹玉科合作社、靖边田保霖合作社、鄜县安长庚合作社、吴旗陈丕秀合作社、华池侯生裕合作社、曲子李建堂合作社、安塞樊彦旺合作社、新正张清益合作社、淳耀贾恒

春合作社、盐池靳体元合作社等都办得好，这些合作社有的从来一贯办得好，有的过去不好，现在办好了，有的是进步最大发展最快的新社，它们都实行了南区合作社的方向，组织人民生产，贯彻民办公助，依靠群众发展，为群众谋利益，这种合作社在各地还有许多，还在不断的生长着，这次会议一致赞扬这种先进合作社，把它们当作榜样，全体向他们学习，并希望它们不要自满，继续前进。

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社直到现在没有办好，例如办了八九年的延安河庄区合作社、安塞旧城合作社（已由群众决定合并了）、甘泉二区合作社、办了四年的田庄合作社，以及去年办起的乌镇合作社等，他们有的长期停顿，没有发展，吃了保守脑筋的亏；有的投机操纵，高利放贷，吃了赚钱脑筋的亏；有的耀武扬威，欺压群众，吃了官僚脑筋的亏；他们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群众把他们看成“照庙和尚”。这次会议，一致批评这种落后合作社，希望他们实行反省，改正缺点，力求进步，赶上先进合作社。

当前耕三余一，全面自给，加紧生产、丰衣足食，是保卫边区、打胜日本的实际任务，合作社就要担负起这任务来组织人民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而不是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脱离群众的利益。真正替人民谋福利，把边区建设得更好，是我们合作社今后业务的基本方针，本此方针，全体一致决议实现下列任务：

一、把棉花纺织成布，用陈家楼子的纺织合作社形式、乌阳区的家庭纺织变工形式、南区的小型工厂形式、冯云鹏的轮流各村织布形式，总之，用各种适宜本地的形式，来组织纺织，你教我，我教他，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学纺纱织布，纺好纱，织好布，调剂棉花，供销土布，奖励纺纱织布英雄，组织三十万人纺织，实现穿衣自给。

二、把铁打成农具，绥德张丕元合作社，安塞二区合作社等都成立铁匠炉子，专为群众打修农具，解决群众的农具困难，这是好经验，所有的合作社都要学习他们的办法，在区上建立一个铁匠炉子，实现农具自给。

三、把边区盐好好驮运，所有合作社的运输队都要学习延安张仁和新宁杨怀智等运输队的办法，整顿牲口，加强管理，改善制度，减低成本，把边区的盐运出去，换各种必需品进来，平衡出入口贸易。

四、每区一个信用社，学习南区李生章信用社的办法，实行低利借贷，抵制探买粮和高利贷，吸收民间游资，转入生产，流通金融。

五、每区一个医药社，学习延安市大众卫生合作社的办法，不管中医、西医，不管人医、兽医，大家合作，为民服务。集中中医，传下西医，医治人疾、医治兽病，减轻人和牲口的死亡率，实现人财两旺。

六、每社一个货郎担子：学习吴堡任家沟合作社、南区合作社、吴旗金汤合作社、石峁合作社的货郎担子，深入民间，调查民情，供给用品，收买土产，便利交换。

七、每社办夜校、办冬学、办识字组、办黑板报，学习南区合作社和新正合作社的办法推广文化，普及教育。

八、举办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学习模范合作社植树造林、修桥补路、养老扶幼、救济难民、优待抗属，诸凡有关群众的福利事业，合作社都要倡办。

上面八项都是大事，只有集合民资民力才能办好，绝不能由少数人包办，一定要依靠广大群众，绝不能强迫命令，一定要自觉自愿，自古说：人上一百，五艺俱全，会写的办文化，会算的当会计，会医的办卫生，会商的办贸易，会什么就请他干什么，只要有事，不愁没人，

贯彻民办公助是我们合作社今后社务的基本方针，本此方针，全体一致决议，实行以下各条：

一、社员选举主任，主任不称职，社员有撤换之权。

二、民主公议社务，社务有毛病，社员有批评之权。

三、入社自由，出社自由，入股自由，退股自由。

四、按期算帐，按期公布，按期分红，按股分红。

五、社员一律平等，不论股金大小，都有选举权、表决权。

我们合作社又是各阶层的经济合作，凡边区公民，不论是谁都可以加入，盐池商人靳体元、米脂地主常友文、靖边士绅田保霖、鄜县商人安长庚、延安士绅曹玉科等或出力或出资，创办合作社。延安市商人席全喜等五人把全部资金和人力投入合作社，都是我们很喜欢的，我们欢迎边区各阶层各民族人士加入合作社，同心合力繁荣边区。

合作社工作是实际的革命工作，合作社人员是受人民委托而为人民服务的，是光荣的革命职业，谁看不起合作社工作，谁看不起合作社干部，谁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合作社的干部的生活必须照顾，教育必须加强，家属困难必须想法子帮助解决，使他们安心工作。但合作社人员必须真心为群众服务，绝不可脱离群众，我们全体相约：不投机，不操纵，遵守法令；不贪污，不浪费，廉洁奉公；眼睛向下，联系群众，勤俭朴素，为民服务；调查研究，精通业务，努力学习，会写会算；有成绩，不骄傲，继续进步；有毛病，不灰心，力求改正。上面说的，也就是我们合作社干部努力的方向，我们号召全边区合作社干部，一致努力，以求实现。

最后，我们号召所有的合作社都要检讨工作，改进业务，同时要在自愿的条件下大量发展社员，大量扩充股金，以适应目前发展生产的需要。所有合作社人员都要向群众宣传这次大会的方针和办法，加深群众对合作社的认识和信任。号召群众入社入股，把合作社和群众更进一步结合起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为完成合作社联席会议规定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原载1944年7月9日《解放日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二）共产国际曾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不仅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保护了那被机会主义者所糟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帮助了先进工人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支持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百折不挠地反对了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战争；而且用了它的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特别使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是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1924年，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帮助了国共合作的形成，随后又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再则，当1927年至1937年期间，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地位的时候，它又声援了中国革命的人民。最后，在1937年以来的六年抗日战争中，它又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总之，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一切时期中，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尽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给予援助的。但时至今日，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提议书上所说，因为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工人运动的继续增长；因为在当时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争取更加广泛与更加迅速的民族高潮和群众动员，借以达到彻底的完全的胜利；因为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由于这种种理由，故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由于目前战争情况，不允许召集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故由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作出此种提议。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一提议书上所说的理由，批准共产国际之解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指出：在马克思解散第一国际之后，各国工人运动是更加发展了。现在第三国际之宣布解散，无疑将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全人类的解放更加迅速的到来。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

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起，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党同志以身作则，忠心不贰，为自己民族的一切解放事业而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自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干涉各国共产党组织事宜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即遵照此种决定，没有干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事宜。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各种革命力量，是中国一切进步方面的支柱，而自抗战以来，即在敌后进行历史上空前艰苦的斗争，这些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独立创造起来的，可以说，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将继续英勇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和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合作，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措施，战胜日寇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完成独立民主新中国的大业。

（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课予的各种历史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深信我党同志必能完全一致地团结起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创造性、积极性。果能如此，那末，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还很强大，我们前进路上的困难虽然还很多，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附]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
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

一九一九年,由于绝大多数战前旧工人政党政治破产的结果,组织了共产国际，它底历史任务在于保卫马克思主义底学说,使其不为工人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分子所庸俗化及曲解;在许

多国度里，它曾帮助先进工人底先锋队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帮助他们动员劳动群众来保卫他们底经济和政治利益，来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所已准备的战争之斗争，来保卫反法西斯主义主要堡垒的苏联。共产国际曾及时地揭发了“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作为希特勒匪帮准备战争的武器底真正意义。在战前，共产国际早已不倦地暴露了希特勒匪帮在外国的卑污破坏活动，他们是以所谓共产国际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叫嚣，来掩饰这些活动的。

但是在战前，早就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既然各个国度底内部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别国度工人运动底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

世界各国发展之历史道路底深刻差别，它们社会制度底殊异，它们社会和政治发展水平与速率底不同，以及最后，工人们觉悟与组织程度底各异，也决定了每一个别国度工人阶级面前问题底不同。

过去二十五年事件底整个进程、以及共产国际所积累的经验，已经明确地证明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符合于工人运动复兴初期需要的团结工人的组织形式，日益不能适应这个运动底增长和每个国度内日益复杂的问题了，而且还证明了这个形式甚至成了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工人政党底障碍。

希特勒匪帮所掀起的世界战争，使各国间情况底差异更加尖锐，它在成为希特勒匪帮暴政承受者的国度与团结在强大反希特勒联盟中的各爱好自由人民之间，划下了深刻的界线。在希特勒匪帮集团的国度里，工人、劳动者及一切忠诚人民底基本任务，是用一切想得出的办法，从内部颠覆希特勒匪帮战争机构，帮助推翻应负战争责任的各政府，这样来协力击败这个集团。在反希特勒联盟的国度里，为求最迅速地摧毁希特勒匪帮集团和建立各民族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合作，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先进工人们底神圣责任，是用一切方法来支持这些国度政府底作战措施。同时，不能忽略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各个国度，也有它们自己底特殊任务。例如，在希特勒匪帮占领了的、和丧失了它们国家独立的国度内，进步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底基本任务，是开展正在成长为反希特勒德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武装斗争。

同时，各爱好自由人民反对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战争，已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他们不分党派、不分宗教，团结在强大的反希特勒联盟底队伍中。这个解放战争更加明显地说明了，为最迅速战胜敌人所需要的民族高潮和群众动员，是能够由各个国度工人运动底先锋队，在自己国家的体制内最好和最有成效地实现的。

一九三五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估计到国际形势及工人运动中所已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各分部在解决它们面前的问题时，有更大的伸缩性和独立性——，那时就已强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决定工人运动的一切问题时，需要“从各个国度底具体情况及特殊条件出发，同时一般地避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底内部组织事宜”。

在考虑和批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美国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队伍的决定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是遵循了这种原则的。

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者底学说指导下，从不主张保存已经变为陈旧的组织形式；他们永远是使工人运动底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服从整个工人运动底基本政治利益，服从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底特点，及由这些条件所直接产生的各种问题。他们记得伟大的马克思底榜样：马克思曾将进步的工人团结到国际工人联合会底队伍中来。而在第一国际完成

了它底历史任务、奠定了欧美各国工人政党发展底基础以后，马克思鉴于创造民族的、工人的、群众性的政党之日益增长的需要，就实行解散第一国际，因为这个组织形式不再符合这一需要了。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从上述各项考虑出发，并估计到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底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且因在目前战争过程中曾有若干分部提出解散国际工人运动指导中心——共产国际——的事实，但由于在世界战争情况下无法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由执委主席团自身提出下列提议，再经共产国际各分部加以批准："解散国际工人运动底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分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号召共产国际的一切同道者集中他们底力量于多方面的支持与积极参加反希特勒联盟各人民及国家底解放战争，以便加速摧毁劳动人民底死敌——法西斯主义及其同盟者与附庸。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哥特瓦尔德（签字）
季米特洛夫（签字）
日丹诺夫（签字）
科拉诺夫（签字）
柯波来尼格（签字）
库西宁（签字）
曼努意斯基（签字）
马尔梯（签字）
皮克（签字）
托列斯（签字）
弗洛林（签字）
爱尔柯利（签字）

此决议为下列各国共产党代表所同意：

比安柯（意大利）
多罗列斯·伊巴露丽（西班牙）
勒蒂宁（芬兰）
波克尔（罗马尼亚）
拉科西（匈牙利）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拟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一九四三年七月）

我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反对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了，当此抗战六周年纪念的伟大节日，正值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侵略同盟两大阵线发生了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愿向我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发表自己的意见。

自从万恶的法西斯各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久经艰苦斗争，但是一向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不利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改变了。这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苏联第二个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中国的六年抗战与英美过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对于日寇的打击所造成的，其中特别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起了转变整个战争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由于这些伟大的胜利，就在过去一年中造成了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的世界局面。

在反法西斯同盟国方面，现在是处在空前有利的形势中。这就是：

第一、苏英美三国的团结，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与英美在北非的第一个有计划的联合作战，而更加巩固了，法西斯侵略国想用和平诡计离间苏英美团结的企图已经完全失败，这是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具有历史意义与最值得庆幸的。

第二、苏英美战胜德意法西斯的决战，将在今后一年中展开起来。这个决战，本来在过去一年中就有可能实现的，因为英美未能实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决定，所以推迟了一年。目前则是在苏英美三国第一个联合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在苏英美三国的陆军空军与英美两国的海军已经发展成为无敌力量的时候，苏联从东线英美从西线举行第二个第三个更伟大的联合作战，给予德意法西斯以最后决定性的打击的时机，是已经成熟了。只要欧洲大陆上能够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则在今后一年中打败德意法西斯是毫无疑义的。过去一年中已经建立了打败德意法西斯的一切先决条件，今后的一年就将是一个决战的年头了。

第三、苏英美团结的巩固与对德意法西斯决战的实现，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因为侵略国的首领是希特勒，希特勒的失败就是一切法西斯的失败。有些中国人不希望同盟国先打败希特勒，或者是因为头脑不清醒，或者是因为不愿意希特勒法西斯制度归于失败，也就是不愿意日本法西斯失败，否则是不能解释的。

第四、太平洋上的形势，也因美国力量的增强，英美联军的几次作战胜利与中国的坚持作战，而转变为对同盟国有利，对日本法西斯不利。美国力量还在猛烈的增长着，日本法西斯虽然企图用其短腿和美国赛跑，但无论如何是要被打倒的。日本法西斯对于美国在一年中

制造飞机十二万五千架，坦克十二万辆，大小军舰二千艘与船舶二千万吨的生产计划，表示极大的恐慌，正是很自然的道理。

在法西斯侵略国方面，则有如下的显著的变化：

第一是法西斯侵略国已经陷入国际上完全孤立的地位。过去一年中，由于苏英美三国对于德意匪军的第一个胜利的联合打击，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对于日寇的威胁与中英美三国在太平洋上及中国战场上对于日本匪军的打击与合围，使得所有这些法西斯国家均感到死亡的威胁，于是他们就施行和平诡计，企图离间英美与苏联的神圣的同盟关系，妄想有一方能够和他们订立苟且的和平，以便他们先击破另一方，达到挽救他们自己，并整个灭亡全世界的目的。但是，此种诡计已经遭到英美与苏联一致的坚决的打击，于是不论德意法西斯，或日本法西斯，就均只剩下“无条件投降”一条死路了。法西斯国家又企图拉拢现在尚未加入战争的各中立国家。但是某些被希特勒们原来希望拉入侵略集团的中立国，现在看见侵略国大势已去，不愿加入了。某些原来倾向同盟国，但因畏惧侵略国的攻势而表现犹疑与动摇的中立国，现在也已经结束或正在结束这种犹疑与动摇。和平诡计既已破产，拉拢中立国的阴谋又不成功，这样就使一切法西斯侵略国在国际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第二是法西斯侵略国内部的团结亦已发生危机。在反侵略同盟国的军事胜利与外交胜利的打击下，就使法西斯侵略国内部的不和生长起来，并已造成了危机。这个危机，不但生长在德意两国之间，也不但生长在德国与其各附庸国之间，而且也生长在德日两国之间。由于希特勒的战争失败与外交失败，希特勒维系意大利、日本及各附庸国的威信已经突然下降。意大利内部正在生长着一种要求退出战争的力量。日本内部的极端亲德派亦已受到其他派别的排挤，只要希特勒再遭遇一二个如同斯大林格勒与北非那样的打击，日本统治阵营内的任何派别都将不敢再依靠希特勒，不敢再依靠法西斯同盟了。到了这种时候，法西斯侵略同盟不但在其外部处于完全的孤立地位，即在其内部亦将处于各个孤立的地位。这种对于日本法西斯在国际上陷入完全孤立地位的威胁，使得日本法西斯匪首东条在过去一年中，不得不向中国沦陷区及南洋各占领地的民族叛徒们提出了一种所谓“新政策”的无耻诡计，给这些叛徒们挂上“独立”的假面具，以壮自己的声势，并妄想欺骗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与印度人民。匪首东条的所谓“新政策”，不是任何什么有利于日本法西斯的情况的反映，而仅仅是日本法西斯在国际地位上已陷入完全孤立状态这一种情况的反映。

第三，过去一年反法西斯同盟的伟大胜利，又造成了法西斯侵略国家的军事危机。不管希特勒参谋部中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放弃再一次向苏联进攻的冒险计划，也不管日本参谋部中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放弃向苏联进攻或向其他方面进攻的冒险计划，但是“大势已去”的感觉是笼罩着一切法西斯的军队与人民，总的主动权是已经落入同盟国之手而离开了侵略国之手，这是毫无疑义的了。成为战争基础的物质力量，例如人力资源，军备资源与生活资源，同盟国方面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极大规模地动员起来，对于侵略国，已经占了优势；加上今后一年的动员，毫无疑义，同盟国将占到压倒的优势。而在侵略国方面，则德意的资源已经变到接近枯竭的阶段，日本在生产上亦快要达到他的顶点，这样就更加造成了一切侵略国的严重的军事危机。

第四，一切法西斯侵略国，由于他们的国际孤立，内部不和，军事危机这样许多的因素，再因为他们的残酷的惨无人道的统治，就造成了在他们国内与在他们占领区内的政治危机。一切侵略国家，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将军与士兵之间的裂口，正象火山的裂口一样，一

天一天的扩大起来，酝酿着巨大的爆炸。这是一支从法西斯脚底下轰掉法西斯的大军，其爆炸的时间，必然在法西斯的内外危机达到其顶点的时候，突然地轰发开来。我们只要回想一下1918年德奥帝国主义所处的情境，就会相信这一点。我们也只要看一看过去一年中国沦陷区的民心与日寇军队的兵心曾经发生何等样的变化，就可以推断，这样继续下去，日寇的政治危机的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了。日寇的本国人民是一座火山，日寇所统治的中国人民，南洋各地人民，朝鲜人民与台湾人民，又是许多的火山，只要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在内）给予日寇几个严重的军事打击，这些火山是会爆发起来的。

同胞们！将士们！中国抗战已经六年了，我们的抗战是在极端艰苦的情境中实行的。我们与苏英美诸同盟国不同的，他们是先进的工业国家，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我们仍然艰苦地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抗战，超过任何国家的抗战时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与全军将士的努力。在抗战第六年中，我们遇到了同盟国与侵略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变到于我们及同盟国极端有利，于侵略国极端不利的局面。在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又将遇到新的有利的变化，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决定性的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失败与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到了那时，东方法西斯的失败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也就接着会要实现了。

毫无疑义，不论西方与东方，战胜敌人与实现解放还须给出绝大的努力，如果没有这种努力，胜利与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是反对法西斯同盟的一员，处在现在这样极端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怎样努力呢？我们是一个农业国，比不上工业的先进国，但是我们有广土众民的优点，我们的人民又是富于斗争的坚忍性的，六年的抗战就是明显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才算是很好地配合苏英美各同盟国的作战，尽到我们应尽的职责呢？六年抗战中我们积累了许多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什么呢？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些经验，求得比较过去更多的成绩，借以克服现有的许多困难，并在将来对敌反攻时准备好我们的力量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

应该加强作战。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处在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他们抗击了日本匪军的半数以上，而其处境则较之正面战场要困难百倍，因此加强对于他们的援助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认为只有加强这两个战场的互相援助与特别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而在过去数年中，对于敌后战场上的绝对大多数抗战军民是没有什么援助的，正面战场作战的积极性也是很不够的，我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改进。在日寇与汪逆的阴谋勾引之下，最近数年中，高级将领率部投敌叛卖祖国者，竟达三十三人之多，未闻政府通令讨伐，由是伪军突增，日汪所谓“新政策”的欺骗，得以到处宣传，肆无忌惮，我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处置，以振军心而利抗战。为了加强作战，兵役制度的改革是急不容缓的。现行兵役制度中存在着的许多严重缺点，例如捉人、捆绑、贿买与完全缺乏政治动员等，极大地妨碍着动员广大人民上前线的要求，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迅速加以改革。

应该加强团结。我们现在不来详说过去数年中以及最近时期中在中国抗日阵线内部曾经发生的许多不应有的磨擦、冲突、妨碍、限制等等不良现象，而只希望政府能够于今后改革

这些现象。我们共产党人是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支持政府抗战的，为了克服今后抗战中的更大困难与准备配合同盟国实行对敌反攻起见，我们准备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继续进行协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改善各党派间的关系。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基础，巩固这个基础，以利抗日，以利配合各同盟国打倒整个法西斯，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

应该改良政治。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中国政治应该如何改良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曾经发表过许多次的意见了，现在来说这个问题，也还是和过去一样，认为唯一的方针是实际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日本侵华军队总共不过三十几个师团，何以我们以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国还不能战胜它或取得更大的胜利呢？难道工业不发达是唯一的理由吗？不是唯一的理由，也不是主要的理由，而是中国没有民主政治，因而没有发动全国人民的抗战积极性。中国和苏英美各国不同的，苏英美各国是抗战时间愈长久，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愈增长，中国则反之，大部分地方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受到了完全不应该的打击与限制，大大低落了，抗战第一二年中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在后来的四年中逐渐看不见了。这种政治上壅蔽抑塞的情形，如不实行必要的改革，则其对于抗战的妨碍将是不可计量的。这种情形，就产生国内各阶级间，各党派间，各民族间的许多不和睦现象，而抗战是极端需要这种和睦的。我们希望政府能于抗战第七年中，按照三民主义原则，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借以达到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间较之现状进一步的和睦关系，能够为准备反攻发动人民的积极性。

应该发展生产。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说过多次了。现在经济的严重困难已经发生，如果没有适合时宜的改革，要应付今后愈加困难的抗战与准备有力的反攻将是不可能的。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动员全国的军队一面抗战，一面生产；动员全国一切机关学校，一面工作、学习，一面生产；动员全国农民增加生产，同时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动员全国工人增加生产，同时增加工人的工资；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使之不受官僚资本与投机商业的打击；在实行这些新的经济政策时，必须首先废除一切妨碍公私生产积极性的现行财政经济政策；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发展生产借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意见。

为了争取抗战胜利而应该改革的事情是很多的，我们现在只指出上述四项，以供政府的采择。至于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本党在去年纪念抗战五周年的宣言中已经明白申述，并已获得各界同胞的赞成，这里就不多说了。

抗战愈益接近胜利，困难将愈益严重，这就愈益加重了政府与人民的责任，也愈益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特别是在敌后战场上作战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责任是超越寻常的加重了。

在六年抗战中，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敌后人民的艰苦奋斗是史无前例的。侵华敌军的半数是由他们之手抗击了六年，并且还要继续抗击下去，直至驱逐敌军出中国。他们是没有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但凭自己的忠诚与创造力达到了这样的奇迹。他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广大的土地，建立了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坚决地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联合各抗日阶层的三三制政策，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实行了奖励生产同时又保护工人的劳动政策，实行了鼓励人民爱国心与发扬人民抗战积极性的文化政策。因此引起了日寇与汪逆汉奸群的深仇大恨，誓死要消灭

他们。残酷的“扫荡”，阴险的蚕食，堡垒如林，沟墙遍地，“三光政策”与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无止息的推行，“剿共委员会”的普遍设立，都是为了要消灭他们的。敌后战场上的斗争是如此的残酷，大后方同胞或尚有不明此种情形者。

共产党员们！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们！敌后的男女同胞们！加强你们的团结，团结得如象一个人一样罢！残酷的战争只会把你们锻炼得特别勇敢，特别坚强，敌人要想把你们屈服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认真地实行精兵简政，拥政爱民与拥护军队的政策，彻底地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目的。

更好地将敌后战场上的一切主力军、游击队与民兵的配合作战组织起来，加强对于主力军、游击队与民兵的技术训练、战术训练与政治工作训练，加紧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发展武装工作队，加强反蚕食斗争。使一切军事干部与政治工作干部学会善于总结战争经验，把反“扫荡”反蚕食的艺术提到更高级的程度上来。你们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能手，你们在六年爱国战争中表现了令人钦佩的成绩，全国人民都是关心你们与寄托极大希望于你们的，因此你们要更加努力提高你们的军事艺术与政治工作艺术，以便配合正面战场上的作战，驱逐敌人出中国。

十分注意争取日军的士兵与伪军，协同日本共产党进行破坏敌伪军的工作，使这个工作极大地加强起来。组织日本工农学校，发展日人反战同盟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发展朝鲜人民的抗日武装队伍及抗日团体，使这一切力量变成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强有力的友军。

发展公营生产，一切军队，一切机关学校，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都要进行生产自给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改善自己生活，减轻民众负担的目的。发展民营生产，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学会帮助农民做安家计划，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劳动互助团体，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达到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许多根据地上卓著成效的公私生产运动，应该不疲倦地坚持发展下去。奖励劳动英雄，发展生产竞赛，反对贪污浪费，惩治懒惰分子，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一切为着战胜敌人而努力。

共产党员还要虚心学习文化，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理论，继续整风学习运动，发展自我批评，坚决地、彻底地、毫不客气与毫不容情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任何残酷的战争与繁重的工作，不应该放松你们的学习，你们应该在艰苦的长期的战争中学出超人的本领来。

敌人总是每时每刻地、千方百计地想要从你们的外部与内部破坏你们、消灭你们的，你们要十倍、百倍、千倍地提高你们的警觉性，你们要学会同敌人特务机关作斗争的一切新办法。

抗战的第六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十二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时，即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机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二十二年中，全体党员和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道，为着实现此种纲领与政策，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难，他们总是坚决前进，绝不徘徊，绝不畏缩，终于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

绝路中找到生路。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当此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到决定胜负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加强自己的责任心，发扬自己的创造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与一切努力和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1943年7月2日《解放日报》）

朱德总司令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电蒋介石等

连日以来，西安军事当局突然尽撤河防之兵，向边区周围开进，准备进攻边区。据查，第一军之第七八师、第一六七师由华阴、渭南开抵邠州、淳化；第廿八师、五十三师由韩城、郃阳开抵洛川；五十七军之第八师由西安开抵中部；驻守河防之炮兵旅以及十六军之重炮营已分别开抵耀县、淳化。第一师已撤离河防，其他部队亦正由河防阵地西开北开中。连日兵车运输络绎不绝。并在若干邻近边区地区，建筑机场，储备油弹。反共宣传亦日益肆无忌惮，日寇第五纵队托派汉奸西安特务分子张涤非辈竟敢伪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交出边区，此种宣传，实为军事行动之所谓"舆论准备"，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抗战前途，千均一发。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有鉴于此，特分电蒋委员长及胡付司令长官宗南，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兹将两电分志于下：

（一）万万火急，重庆蒋委员长，参谋部何总长，军令部徐部长钧鉴：自五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职部进迫，职部均一再退避，所有经过情形，均经呈报，并电胡副长官宗南制止在案。自六月十八日胡副长官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边境突呈战争景象，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慨自抗战以来，职军奉命改编，驰赴战场作战，六年于兹，虽毫无补给，而未尝稍懈。陕甘宁边区为职军唯一之后方，少数留守部队，亦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陈周徐郭诸联络参谋，久驻延安，以及胡副长官派来胡候二联络参谋等，实所目睹，备致赞美。讵意近日形势突变，南线友军已作发动内战之积极准备。沿固原、平凉、长武、邠县、栒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洛川、宜川之线，除原有封锁部队十余师外，近复由河防阵地调动增加之兵力不下六七个师，声言大举进攻，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边区军民闻此意外事变，莫不奔走相告，骇异莫名。窃思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心所谓危，不敢不告。除电胡副长官呼吁团结外，谨电奉陈，敬乞明示方针，不胜屏营待命之至。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卯午鱼（七月六日）

（二）限即刻到，西安胡付长官宗南兄勳鉴：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边区留守部队，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吾兄前派胡候二兄来延参观，倍致赞美。嗣接尊电，拟再派候兄驻延联络，德等当即表示欢迎。不料近日形势大变，贵方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实为德等大惑不解。谨电奉陈，即希示覆。朱德午友（七月四日）

（原载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

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

国民政府林主席，蒋委员长，各部院长官，各地方长官，各抗日将士，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及全国同胞公鉴：

正当我全国民族团结抗战已经坚持了六年，愈益接近胜利的时候，正当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主动权已经转移到苏英美同盟国方面，德日意法西斯匪帮，已迫近最后失败的时候，不意中国抗战阵营内部竟有一部分丧心病狂之日寇第五纵队，出来响应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汪精卫、王克敏的反共号召，宣称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他们包围军事长官，企图将原在抗日阵地的军队转变为反共内战的军队。他们现正积极策动内战，怂恿军事长官，调动队伍，进攻边区。最近一个月来，除原驻陕甘宁边区周围，担任封锁边区的十余师军队，早已积极准备进攻外，近日又从河防阵地，抽调抗日大军，移作进攻边区之用。根据确实消息，第一军主力第七十八师，第一六七师，已从华阴、渭南开到邠州、淳化，第九十军之第二十八师，第五十三师，已从韩城、郃阳开到洛川，第五十七军之第八师，已由西安开到中部，第十六军之重炮兵营已由河防开到耀县，原驻西安之炮兵旅，亦已开到淳化。除上述业已开动之部队外，尚有很多军队，正在待命出动。陇海铁路，咸榆公路，西兰公路，兵车运输，络绎不绝，居民惊骇，奔走相告。为了配合此种军事行动，西安的反共特务头子劳动营训导处长著名托派汉奸张涤非，竟敢公开在西安召集会议，假造民意，狂吠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最奇怪的，是堂堂的中国官方通讯机关之中央社，也将此种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于七月六日发出广播，通告中外，以为发动内战之舆论准备。内战危机，千钧一发。敌人第五纵队与中国反共分子此种丧心疯狂的举措，如果实现，不仅将破坏全国人民六年以来辛苦坚持的抗战大业，并且将严重损害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行动。日寇第五纵队包围军事长官，准备发动内战之唯一目的，就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他们此种举动，不仅背叛我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同时也背叛了同盟国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他们此种举动，实际上是替垂死的法西斯主义作支持者，是掩藏在抗战营垒内的亲日派汉奸，因为在此种时机发动内战，除了牺牲民族利益，是绝对没有其他结果的。

在过去六年抗战中，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他曾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释放蒋委员长，达到全国的团结抗战。他曾指导了八路军中新四军中及地方民众中的共产党员，团结全体军民在敌后战场上抗击了侵华敌军百分之五十的兵力，而没有得到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新四军甚至被诬为“叛军”，但是新四军至今在华中敌后战场坚持着英勇的抗战，而且至今仍然拥护国民政府，没有任何的“叛变”行为。这是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乃至日寇汉奸，无不知道

的。八路军在华北艰难百战，不予奖励，反予妨害。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新四军仅有的后方，少数留守部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全世界都无此种模范军队。陕甘宁边区的党政机关与民众团体，坚决地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联合各抗日阶层的三三制政策，使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权、•政权、财权，都有说话机会，都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使他们各得其所。现在边区已经成了全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区域，边区人民在抗战中过着民主自由与丰衣足食的生活，比较大后方的惨淡情况，何止高出百倍。不管国民政府怎样至今还没有实行承认边区的诺言，但边区政府却始终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我边区人民对于这样忠实于民族解放利益，这样坚持团结抗战，这样替边区人民做了无数好事的中国共产党，是竭其全力给予拥护的。对于边区现有的一切民主进步设施，认为不仅是关系自己切身利益，而且也是坚持抗战的可靠力量，是全国人民所同声称道的模范建设，我们将誓死保卫这块地方，不许日寇及其第五纵队的阴谋活动来加以破坏。

目前国内政治上许多反常事件，我们长久地忍隐不言，以期相忍为国，渡过难关。不料反共分子的欺压毒焰，继长增高，暴行虐政，有加无已。今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调抗战之将士，肆内战之阴谋；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党至上，专制集中；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异盗卖法西斯；放弃团结原则与统一战线原则，无异置民族于死地。指挥特务，盗窃民意，今日可以提出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明日亦何尝不可以发布讨伐令，解散八路军。凡此反常之行为，实属惟恐天下不乱，惟恐抗日胜利，惟恐民族获得解放，惟恐人民获得自由之反革命心理所表现。另一方面，对于投降敌人背叛祖国之三十三个高级将领，却一个也不责备，也不声讨，有时还替他们曲予辩护。对于象吴开先那样受敌人派遣到我抗战首都进行卖国活动的著名大汉奸，却不但不予逮捕，反而容许吴逆仍挂国民党中央委员之名，消遥法外，自由自在地进行阴谋活动。对于象张涤非那样的日寇第五纵队，在西安假造民意，声言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汉奸活动，不但不加制止，反而给他们广播消息，企图以此欺骗人民，准备军事进攻的舆论。对于今天大后方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情隔阂，民变蜂起等危险情况，则不但不思所以变计，反而一味高压，若惟恐民怨之不普遍，民变之不扩大。华北庞炳勋孙殿英诸军之复灭，其原因乃在于庞孙领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之秘密命令，尽一切力量准备进攻太行山区域之八路军（八路军已获有确实证件），丝毫不作对日寇战斗之准备，致使日寇乘虚袭击，束手受缚，叛国降敌，不敢声张，反替庞孙作辩护之词。我华中及山东之新四军八路军，苦战奋斗，敌人欲置之死地而不可得，彼乃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限期东进，务求消灭八路军新四军而后已。共产党则称之为“奸党”，新四军八路军则称之为“奸军”，试问天下有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么？今日何日？不是正当日德意法西斯国家已面临失败危机，我们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为了与反法西斯各同盟友邦的配合，需要更加加紧自己抗战行动的时候么？为什么竟从抗日前线撤回大量军队，要来进攻陕甘宁边区呢？这有什么理由呢？为什么不打日本人要打中国人呢？抗战时期，只应该团结一切力量，加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条唯一的战线，不应该制造第二条国内战线，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么？内战一开，兵连祸结，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么？为什么这样痛恨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而那样不痛恨我们的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呢？撤了河防大军来打边区，难道就忘记了日本人么？那时日本人从剿共军背后打来，你们怎么应付呢？庞炳勋孙殿英的复辙，你们难道完全忘记了么？

我们延安各界人民，今天在此开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我们竭诚向国民政府呼吁，向蒋委员长呼吁，向胡宗南副长官呼吁，向正在准备进攻边区的一切官兵呼吁，向全国同胞呼吁，请你们认清日寇第五纵队的阴谋策动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是帮助日寇侵略的。我们请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命令抗日军队仍返原防，保持团结，避免内战。我们掬诚忠告那些接受密令准备进行内战的军官和士兵，共凛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祸，鉴于过去十年内战之惨，不要打共产党，不要打八路军，不要打边区，不要枪口对内。胡宗南副长官曾云："剿共是无期徒刑"，这是一句真话。请你们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再打十年内战，能打得出什么结果呢？何况内战一开，敌人乘虚而入，中国马上就会亡国，那里有十年时间，许我们从从容容的打内战呢？我们要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逮捕著名托派汉奸日寇第五纵队分子张涤非，并惩治其破坏团结抗战的反革命活动。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逮捕日汪密使吴开先，并予公审。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明令讨伐通敌叛国的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毕载宇、吴化文、荣子恒、厉文礼、杨汝贤、李振汾、侯冠文、王廷英、杨光有、王瑞亭、赵星彩、于光辉、侯如镛、杨志希、赵瑞、杨诚、李长江、徐继泰、杨仲华、吴漱泉、王劲哉、苏振东、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任兰圃、赵天时、薛豪平、于怀安、金亦吾等三十三个将级军官，并移华中山东一带剿共之师去剿伐他们。我们要求全国爱国同胞一切抗日党派帮助我们制止内战，实现上述各要求。

我们的口号是：

(一)坚持抗战，反对内战！

(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反对国民党调动河防部队进攻边区！

(五)要求政府撤消包围边区的军队，开赴前线抗日！

(六)要求政府惩办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

(七)要求政府讨伐三十三个投敌将领！

(八)要求政府审判日本奸细吴开先！

(九)拥护中国共产党！

(十)誓死保卫抗日民主的边区！

(十一)坚决实行三民主义！

(十二)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

(十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五纵队！

(十四)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

（原载1943年7月10日《解放日报》）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词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

周　恩　来

同志们！感谢大家的欢迎。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在国际方面，我们从法兰西投降后欧陆所遭受的法西斯浩劫起，看到希特勒德国对于苏联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的疯狂进攻，一而再，再而三；看到太平洋上日本强盗对于英美所进行的闪击；看到全世界除苏联外都有法西斯第五纵队的猖獗活动。同时，我们看到苏联红军和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奋起抵抗希特勒进攻的英勇战绩和生产热忱；从列宁格勒、莫斯科保卫战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两年的冬季反攻到今年的夏季反攻，获得了举世称赞的辉煌战绩。我们也看到同盟国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阵线的形成和进步：从罗丘大西洋宪章的公布到苏英同盟苏美协定的缔结，到二十六国公约在华盛顿的签字；从英美盟军在北非的反攻和胜利直到西西里的登陆。我们又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的兴起和扩大：从欧陆被侵占国中反法西斯游击战争的发展到德意国内反法西斯的罢工示威和游行的兴起；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作到"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建立；从英美印度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恢复或被承认到日本共产党领袖岗野进同志的来延。三年来，同盟国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是由危而安，转败为胜，由被动的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这种变化主要的倚靠于苏联红军和人民的两年抵抗和三次反攻，同时，也倚靠于英美同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和在南太平洋的积极行动，倚靠于美国的巨大生产和盟国的战争动员，倚靠于中国抗战的坚持，尤其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

现在墨索里尼倒台了，意大利法西斯党解散了，世界法西斯统治在其最薄弱的一处，开始崩溃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现，曾经猖獗一时的法西斯党徒及其第五纵队的死期是一天一天逼近了。不看见意大利法西斯党员的末路么？不看见德国第五纵队在意大利的抱头鼠窜么？这就是世界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

在国内方面，这三年来，我们依然是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三年来，有人以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既已先后发生，日寇今后不攻印必攻苏，决无余暇余力来打中国，于是便以消极抗战来暗示日寇不打中国，以积极反共来推动日寇移兵攻苏。可惜此计虽巧，日寇并不完全听话。日寇有日寇的国策。他虽赞成你消极抗战，毕竟你还未投降，而且武装也未解除，所以一有间隙，一有必要，他就要打到中国头上来了。他虽更赞成你积极反共，可是你尚未全面"剿共"，而且也无法"灭共"，所以日寇还得以其在华半数以上的兵力在敌后进行"治安强化运动"，自己来"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

三年来，又有人以为太平洋战争既起，美英若不是很快的打败日寇，便要以大力来援助中国，如此，中国便可坐享其成。殊不知美英不能很快的战胜日寇，已为事实所证明。而美英援助中国，固为我们大家所切望，但他们生产不易，他们首先要援助那直接参战的部队和作战有效的地方．若作战迟疑心怀贰用的部队，必然会成为他们慎重考虑的对象。而且自从吴开先由宁奔渝，两方特务勾勾搭搭，直到昨日日寇广播竟公开的提出条件诱降，更不能不使同盟友邦有所顾虑。

三年来，还有人以为抗战只要能拖，就可拖到胜利。殊不知你要拖，敌人却不让你拖。敌人要在希特勒垮台以前至迟要在太平洋决战以前，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很明显的，而这次公开诱降，主要的就是由于墨索里尼倒台所引起。不仅敌人不让你拖，就是国内情形也不会让你拖。许多军队不开到前线，不积极作战，士气能提高么？兵役制度不改善，军队待遇不提高，战斗力能加强么？财政经济政策不改变，官僚资本不打倒，贪污腐化不惩办，囤积居奇不肃清，财政经济的破产能避免么？人民自由不取得，人民生活不改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官僚政治不肃清，排除异己的压迫政策不取消，抗战后方能够安定么？这些现象不改变或消灭，中国抗战的局面能拖到胜利么？我们的回答：要胜利不是拖而是打！要胜利不是消极的抗战而是积极的抗战！要胜利不是国内的分裂而是国内的团结！要胜利不是政治的压迫而是政治的民主！

三年来，更有人以为内政虽坏，只要特务统治加强，便可维持抗战局面到胜利。殊不知抗战是要争取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胜利，决不是为的法西斯化的特务制度的胜利。如果特务统治加强，那只是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统治开道路，决不是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开道路。

照这样，三年来，国民党当局中这些想法既都错了，那末，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的手中！

谈到抗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来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和自力更生，终年打仗，支持着这抗日的战略根据地，吸引着半数以上的在华敌人。八路军新四军有了这种抗战成绩，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这种抗日力量，难道还不值得全国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抗日力量的人，难道还不是亲日的第五纵队么？

谈到民主，三年来，我们党在边区抗日根据地，宣布施政纲领，实行人民普选的三三制，实行保护人权财权政权的民主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合理负担的农村政策，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和增强劳动生产率的劳动政策，实行志愿兵制和民兵制度，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并允许任何外人在尊重主权遵守法令的原则下，得在边区参加抗日工作和进行实业文化和宗教的活动；由此做到各根据地的自给自足直到丰衣足食的地步。这种边区，这种抗日根据地，难道还不值得全国真正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地方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边区这种根据地的人，难道还不是反民主反三民主义的法西斯蒂么？所以凡是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凡是爱国的同胞，必定会不满意于现在国民党当局中对抗战的摇摆政策，对内政的错误政策，尤其是又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必定会愿意同八路军新四军做朋友结同盟，从边区根据地采取民主政治的经验，尤其会愿意同中国共产党结成真正的统一战线。

所以这三年中，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同盟国家面前，我们国中，究竟那个是抗战积

极的军队？那个是抗战消极的军队？那里是民主政治的区域？那里是反民主政治的区域？大家心里明白。而且不仅在心里，国内外的舆论，也已经表现出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提到我们党在这三年来的伟大进步。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要有更多成就的工作。对全国说，我们党两度制止了内战的危机（皖南事变和这次进攻边区的阴谋的揭露），坚持了敌后最艰苦的游击战争，坚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撑持；因此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对国际说，我们党不仅预见三年来的国际事变而指出世界法西斯主义必趋死亡民主国家必然胜利的前途，并且也使同盟国家认识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才是真正反攻日寇大陆心脏的力量和基地。对全党全军全边区说，我们党领导的整风运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精兵简政，收获了力量上巩固的成绩。统一领导，收获了政治上一致的成绩。拥政爱民，收获了党政军民联成一体的成绩。发展生产，树立了真正自力更生的楷模。最后，审查干部，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

同志们！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不应该骄傲么？我们有了这样的领袖，不应该骄傲么？但是国内有些反共分子，竟敢无耻高叫取消中国共产党，解散中国共产党，难道他们还不是日寇汉奸的第五纵队么？他们早不提迟不提，偏偏在现在公开提出。他们故意说共产国际解散了，共产主义便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便失掉靠山，中国共产党内部便要分裂了。他们这种鬼话，有人相信么？

共产主义是不适用于中国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可以改造全世界，为什么中国会独独除外？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照妖镜，在中国人民面前，照出他们第五纵队的原形。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在中国人民面前，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现象，指出中国革命的真正道理。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他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和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他，谁就会自趋死亡。

中国共产党是失掉了靠山么？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他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我们党是群众的党，在今天，已有了八十万的党员，五十万的军队，并与近万万的群众在实际的战争的生活中血肉相连起来了 中国民族需要他，中国的人民需要他，谁能取消他、解散他？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

仅不会取消，而且要永久的存在下去！在世界法西斯主义走向死亡的道路上，应该取消应该解散的倒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那些法西斯化的中国特务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是要分裂么？反共分子一年到头日以继夜的梦想我们党会象他们一样，分成许多派系，于是遂制造许多谰言蜚语，想来中伤我们。殊不知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他，决不同于国民党可以派别纷歧，毫不统一。不错，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陈独秀张国焘还不是中共的创始者么？但当他们怙恶不悛，为党所开除的时候，他们何尝能分裂党，反而使党更加巩固了。这三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空前巩固的程度。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因为你们的造谣中伤而分裂，反而会因你们的阴谋破坏而更加警觉，更加团结，更加巩固起来！我们想，抗战愈艰难，革命愈向前发展，分裂的倒不是中国共产党，而会别有所在，并且这种例子，历史已不止一次重复了。

共产国际解散，有一事却需要特别说明，即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的更独立的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我们是坚持抗战到底的。我们认为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将日寇赶出中国去！消极的抗战，两面的政策，必致半途而废，有招致投降妥协的危险。并且只有积极的抗战，才配争取外援，才能协同盟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们是坚持国内团结的。我们仍然准备与国民党继续进行协商，共同消灭内战的危机，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但这种协商必须是真诚的平等的互让的，而不应一面谈判一面磨擦，一面信使往还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讲团结一面又要取消解散。若国民党有人将国共合作看作国共合一，以为非逼不能就范，这就是内战的动机，决非团结的道理。

我们是坚持民主进步的。我们仍然希望国民党当局改变内政的错误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也愿意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其他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力量进行合作，以坚持抗战，以推动进步。

这就是我们党的方针！

同志们！我现在回来了，我要为这个方针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附] 中国之命运（摘录）

（一九四三年三月）

蒋　介　石

五四以后，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二种思想，突然输入于我学术界

之中，流行全国。然而一般学术界对于中国的文化，大抵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西洋各界的学说，大抵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对于西洋文化，袭取了糟粕和皮毛；对于中国文化丧失了自为与自信。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他们崇拜外国是一样的，其所以各成派别，是由于外国不止于一国，外国的学说也不止一派。他们各仿一国，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门户，入主出奴。各国的学说，既不断的变迁，所以他们无论那一派的持说，也是不得不随之变化了。他们的思想，也能流行一时，他们的主张，也能鼓动民众。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没有什么根基，不过是人云亦云，所以不能不跟着他人之后，随时变化，而其所变化的，甚至不能自园其说。所以他们领导的各种学说和运动，只能暂而不能久，而且没有不是自误误人、潦倒一生的。试回想辛亥革命以来，流行一时的学说和政论，没有一派不是因袭外国的成说的。民国二年国会制、内阁制、总统制之争，只是英国、法国、美国中央政制之争。民国九年单一国与联邦国之争，也只是法国与美国地方制度之争。袁世凯的帝制，其理论根据，就要假借古德诺的一篇论文。曹锟的贿选宪法，又何尝不以德国的"威玛宪法"为兰本？至于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样抄袭附会而成的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这种风气既已构成，于是曲解自由主义和滥用共产主义的学系政派，或明目张胆，或旁敲侧击，或有意，或无意，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他们对社会作宣传如此，对国民施教育亦如此，遂使国民对中国主权的破碎，民族生机的沦没，视若固然，漠然无动于中，甚且不免附和盲从，助长其破碎，加深其沦没，而犹不自觉。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

（以上摘自第三章第二节第71—73页）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灭绝的事件，就是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汪兆铭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中及国民革命军积极的进行分化工作。中国国民党到了这种情形之下，对于容共政策，就不得不重加检讨了。这段故事，我自然不忍追述，但当时汪共同谋的内幕，我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铭利用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利用汪兆铭呢？还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这件事情始终是成了一个谜。然而汪共同谋的事实是很明显的，尤以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为最著。但当时的事实，明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违背了他个人资格入党的信约。而且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以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要乘国民革命的发展，而转化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又以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政党，不过是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要乘国民党的发展，来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陈独秀等，在"新青年""向导"各刊物里面对于这种理论，到处都是赤裸裸的表示得详尽无遗。而又在另一方面行动上，他们对国民党内部，在各种事实上，挑起了左右派系的冲突，对于一般国民与社会之间，则煽动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们又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之下，对于农工则视为属于共党独占的工具，而造成产业的停顿。其

他经济社会之损失，更不待言。尤其是当时他们对于青年乃以读书求学为反革命，以浪漫放荡为觉悟分子。他们号召青年，相率鄙弃我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礼义廉耻为顽固，孝悌忠信为腐朽，狂澜溃溢，几乎不可挽救。乃复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间，赣南湘东以及皖西豫南鄂西川陕各地，兵连祸结，闾阎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原祸始，仍不外乎是由于这汉奸汪兆铭一手造成的所谓“宁汉分裂”的一幕惨剧而来。因此国民革命军内部竟告破裂，而北伐军亦遂陷于阻滞与内讧之中。这是国民革命过程中最深刻的教训，亦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总之国家的大事，只有出于至诚，本于大公，方能成功。否则利用他人，或被他人利用，甚至于狼狈勾结，互相利用，以求得一时徼幸的成就，到了最后，毕竟是不能逃于“诚者自诚”与“不诚无物”的公例，其结果是没有不失败的。何况革命是一件国家民族惟一的大事，决无投机取巧徼幸成就的可能。我到了今日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些话呢？就是因为这一段革命的教训太痛苦了，国家的损失太大了，人民的牺牲太惨了。如果没有这六七年的内乱，则今日抗战局势，自然大不相同，就是太平洋及世界局势，亦必因之大变。敌寇决不敢向中国这样大举侵略；即使他来侵略，也早已被我们逐出国境之外，这并不是意外之事。所以这段教训是活泼泼的，是现实的，是最宝贵，最值得研讨的，是不会随事实的过去而失去其意义的。我要使国内爱国者，和有志于革命的分子，都能惩前毖后，引为殷鉴，那对于我们以后革命的前途，必有补益，故仍不得不忍痛的一述。

（以上摘自第四章第二节第94—97页）

……同时思想的灭裂，言论的纷歧，亦泯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认识之中。于是抗战之初，国内各社团各党派，即一致宣言，拥护政府，共赴国难。而中国共产党之宣言，并确切申述其四项诺言：“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取消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的职任。”当时中正发表谈话，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北伐告成之后，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遭受无穷的阻碍，国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乃日趋危殆。惟在此期间，中央政府仍本其一贯的统一御侮政策，忍辱负重，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前提。而国人昔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异见而共趋一致。足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总之，中国共产党此次发表的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例证。由此可以证明惟有三民主义为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的思想，更可以证明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惟一政党。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惟有三民主义。革命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这一点显明的事实，是应该为全国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彻底认识的。

（以上摘自第四章第四节第112—113页）

……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才可以顾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策划国家民族永久的安危。所以他们对于入党入团，有权利也有义务。同时，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有志气、有热忱、有民族思想的成年的国民和青年，有要求他们入党入团的权利，也有容许他们入党入团的义务。要知道我们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来的遗产，都要由这个党这个团来改造，来整理；亿万年子孙立命的基业，亦要由这个党这个团来开创，来充实。本党本团，为了完成继往开来的责任，所以有权利要求全国国民来共同负责，也有义务容许全国国民来共同革命。

在今天以前，我全国国民对于雪耻图强的运动，虽有一致的认识，而对于建国的方针，和立业的途径，还有纷歧的见解。到了今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初步工作，是已经做到了，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的成绩，亦已经昭著于国民的面前了。我以为时至今日，各方面爱国的革命有志之士，都应该作深切的反省，和彻底的自觉，并肩携手，共赴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亲爱精诚的同志。要知道现在的时机，真是千载一时，也是千钧一发。具体的说：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而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已取消了，则中国今后的命运乃就要决之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换言之，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如果我国内政能统一，国力能集中，而全国国民再能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奋斗，则中国的命运，就归纳于“精诚团结、奉公守法”八个字，如此中国的命运为独立，为自由。否则就是“欺诈虚伪，毁法乱行”八个字，仍如过去之封建军阀武力割据，破坏统一，妨碍建设，则中国的命运为衰落，为灭亡，不独继续为次殖民地，且使我中华民族世代子孙将尽为奴隶牛马，永无翻身之日，更无复兴之望。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应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之中。但是五十年的国民革命和五年半的全面抗战，已经创造了中国复兴的基业，无论任何反动势力，亦不能为之摇撼。……从此以后，凡违反民族利益，背逆时代潮流的武力割据，和封建反动势力，不只没有徼幸的可能，而且没有存在的余地。否则，国家的命运就要因此断送了。你看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到了今天的大时代中，而且又有我们国父的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指导的原理，岂有灭亡之理？

…………

总之，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与国家民族凝为一体的组织，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不必再加分说。但这里还有一点，应该为我国民重新申述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乃是全国国民共有共享的一个建国的总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如能成功，则中国国家方能独立。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亦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如果全国革命分子和有志青年，真正要与国家共存亡，和民族共荣辱，以国家的事业为个人的事业，以民族的生命为个人的生命，那就应该要

一致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才能够尽到国民最崇高的责任，达到人生最完备的境界，亦必如此，才得完成我们共同建国的伟大使命。

上面的说明，或不免引起国人两种感想：有一种感想，以为这不过是劝导中国国民党党外的一般人士入党。还有一种感想，更进一步，以为这是对于中国国民党党外的各种党派或各种组织，积极的有什么作用的心理，甚至消极的有什么妨碍的意思。我对于抱前一种感想的，可以率直的答复道：我期望全国革命分子，有志青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和这个义务。只要他们有救民族救国家的意志，他们就应该要自主自动的来入党入团，不必要我来劝导。我对于抱后一种感想的，也可以率直的答复道：我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与组织，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也能发展，也能成功。不过我为了国家，为了主义，亦为了人民和朋友的关系，无论为公为私，都不能够不掬我的赤忱。尽我的天职，竭诚的忠告。

我先要请教今日对中国国民党持反对态度的朋友们：你反对中国国民党，是不是因为中国国民党的主义不良？还是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不对？我以为大家对于中国国民党如果能用客观的态度，拿过去历史的事实来证明他，由现在世界的变局来分析他，就将来国家的前途来推求他，就可知道中国惟有三民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亦惟有国民革命是正大光明的路线，而且惟有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如果你认为他的政策是对的，主义是好的，他的革命于国家于民族皆有利益的，你就应该加入中国国民党、为这个主义来奋斗，为这个政策来努力。若只以为他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你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而不应该因此就反对他，破坏他，甚至不惜因破坏中国国民党，以破坏中国国家整个的生命？谁都知道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就是破坏你本身以及你世代子孙永久的生命，这个关系太大了。在现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而来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真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这样于国家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伊于胡底。你看列强苏联和英美各国尚且都希望我们民族解放进步，国家独立自由，所以他们在中国百年来所有无限的权利，和无上的势力——就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条约，到了今天都已自动的先后放弃了。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正在其政府从事抵御外侮、拚民族生命、争国家生存的时候，不去积极努力奋斗，效忠国家，反而要想乘机擅自扩充军队，割据地方来破坏抗战大计，违抗政府法令，而使他的祖国分裂不能统一，政治不能进入轨道的？须知这样长此下去，只有使国家的地位丧失，民族的生命窒息，非至国亡种灭不可，这不是太忍心了么？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碍障？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消，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不止是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我是始终主张国民政府对国内的各种意见，和各种纠纷，都要用很宽大的态度来容纳，和很合理的方法来求得解决。但是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

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么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我相信大家都是爱国家、爱民族的志士仁人，过去各方面无论其有何种歧异的见解，或有任何敌对的行动，无不可以为国家的生命，为民族的前途来消除他个人的成见，和彼此的芥蒂。使我国政治能够真正的统一，早上轨道，不致使外国人再讥笑我们是落后国家，鄙弃我们是劣等民族，更期望训政能顺利推行，宪政可尽速实施；国家成为一个平等独立的国家，人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公民。这样才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才配得上成为民主国家的政党。我们革命党人要讲实话，做实事。而且要时常记着“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格言。我以为这样集团组织，名为革命，其实是破坏革命；名为爱国，其实是忍心害国；不仅于国家民族不利，于革命建国有害，而且与你个人的前途，亦只有黑暗，一切的作为是没有不归于失败的。我很精诚很坦白的不惮重复的对各位再进忠告：大家如果仍旧保持过去态度，继续过去的作风，无异于你自己妨碍你自己的前途，阻止你自己的事业，而且使国家力量不能完全集中，建国工作不能圆满进行，真是于个人毫无利益，而于国家和民族有莫大的损失。我们须知国家的命运，正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凡是国家每一个人才，都不容他任意自弃；每一分力量，都不容他随便浪费。所以我希望大家，为国家的利益，为民族的生存，都要一德一心，共同集中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之下，一致团结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之中。因为这是大家的权利，也是大家的义务，并不是我为了中国国民党对大家有什么企图或不利的意思。大家还应该知道：五十年来，中国国民党从不因为各党派的反对或妨碍，而放弃他的革命工作，所以他才有今日初步的成功。今日以后，中国国民党亦决不因为有各党派的反对或破坏，就阻止他的革命事业，而且他非至于最后的成功不可的。我们都知道，最近五十年来，凡反对中国国民党的，无论其为如何强大的党派，或为如何雄厚的武力，尤其那过去依赖帝国主义为凭借、作后盾的军阀与党派，他最后的结果，没有不失败的。须知道这并不是中国国民党有什么特殊的力量，而乃是时代与历史的使命所造成的。这时代与历史的使命，决不是任何势力所能反对或破坏的。反对他愈力，只有使他成功愈快；破坏他愈烈，只有使他力量愈大。所以我常说：如中国国民党有自败之道，那不待有人来反对他，而他自然会失败的。否则对他的任何反对或破坏，决不会生效的。所以各方面各党派的反对，于中国国民党本身革命的事业，决不致有所损害，亦不会被其阻止。但是中国建国工作，又恐受到不良的结果，我全国国民痛苦牺牲所得的独立平等的地位，亦未免因此遭受极不利的影响。而国内才智之士，不能够共同努力于如此伟大的建国工作，且将误用其才智，错过这机会，在个人实是最可痛惜的事情；而在中国国民党，也可以说是他对大家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不得不再三的唤起大众，共同勉励。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体谅我的话是肺腑之言。

（以上摘自第七章第199—203、205—212页）

[附] 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关于反共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三日）

蒋介石

听了秘书处关于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报告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各位委员所发表的意见以后，我认为，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是这次大会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原则。假如大家同意我这看法的话，大家就应该保持我们一向在处理内政时所坚持的宽大忍耐政策，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将为我们的诚意和气度所感化，无论他们如何对我诬蔑，无论他们将如何制造麻烦。

无论若何挑衅，我们必须遵守第十次大会的宣言："凡诚恳信仰三民主义，服从法令，不妨碍抗战，不企图破坏社会秩序，并不割据我国国土违犯国法者，我中央政府不追究其过去之思想或行动，无论其为个人或团体，我们应尊重其为国服务的机会。"我们应该继续忍耐，严格地符合这个宣言的意志，诚恳希望共产党最后认识并改正他们的错误。我们应该说明，我中央政府对于中共没有什么别的特殊要求，只是希望它放弃武装割据国土的政策，放弃其过去在各地区进犯国民政府军队，因而妨碍抗战的政策。

同时，我们希望中共遵守其一九三七年宣言中所作的保证，并实现其在该文件中郑重宣布的四项诺言："（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停止共产主义运动及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其现存的政府组织，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实现全国的政治团结；（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的职责。"

假如中共能以实践其诺言来证明其确具信用，中央政府将由于其实行抗战的忠诚而再度对其友好，俾能共同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

（转自《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下卷）

[附] 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关于军事报告中涉及第十八集团军部分之决议案

（一九四三年九月）

本大会听取军事报告，关于第十八集团军与中共之报告，对于第十八集团军未能恪守军

令政令统一之义，深致痛惜，最近，蒋主席在中国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宣示中共问题应以政治方法解决之旨，重申中全会宣言所云。

“凡诚意信仰三民主义，不危害抗战之进行，不违背国家之法令，无扰乱社会之企图与武装割据之事实者，政府与社会，应不问其过去思想行动之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或个人，而一体尊重其贡献能力效忠国家之机会。”而中国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决议，亦表示殷切之期待，希望中国共产党切实遵守其在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宣言：“（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二）取消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三）取消苏维埃政府，期全国政权统一，（四）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等四项诺言。凡此表示，所以达成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之目标，以贯彻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大义，风声所播，举国翕然。本大会竭诚拥护，深望政府本此方针确实执行，以完成我神圣抗战之任务，同时更盼中国共产党及第十八集团军，痛念我国六年余来全国军民抗战牺牲之重大，与今后建国任务之艰巨，实践诺言，严守纪律，不再有妨碍统一，影响抗战之举动，悉力杀敌，以竟全功，此实国家前途所利赖，亦举国同胞之所殷望也。

（原载1943年9月27日《国民公报》）

[附] 国民党降将如毛降官如潮勾结敌伪积极反共的若干资料

一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委及重要官员投敌统计

（这里的统计限于材料来源，极不完全）

汪兆铭——中委，行政院长，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投敌后之伪职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军事委员长，中政会委员等。

陈公博——中委，实业部长。投敌后之伪职为：伪立法院长，组织部长，上海市长，军委会副委员长，中政会委员，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长等。

周佛海——中委，宣传部长。投敌后之伪职为：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储银行总裁，上海市长，军委会副委员长，中政会委员等。

褚民谊——中监委，行政院秘书长。投敌后之伪职为：伪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广东省长，宣传部长，中政会委员等。

陈　群——候补中委，内政部次长。投敌后之伪职为：伪内政部长，考试院长，江苏省长，中政会委员等。

陈壁君——中监委。投敌后伪职为：伪中政会委员。

缪　斌——候补中委，江苏省民政厅长等职。投敌后伪职为：伪军委会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中政会委员等。

何士祯——候补中委，皖省民政厅长，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投敌后之伪职为：伪中执委，国府政务参赞（特任官）等。

曾仲鸣——候补中委，行政院秘书长，铁道部次长，交通部次长。投敌后在伪府未成立前即于河内被刺身死。

庞炳勋——中监委，冀省主席，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投敌后之伪职为：伪军委会委员，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晋冀鲁豫剿共总司令等。

吴开先——中委，副组织部长。投敌后伪职不明，待查。

陈中孚——候补监委，青岛市长，晋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投敌后之伪职为：伪中监委，其他不明，待查。

恩克巴图——中监委，国民政府委员。投敌后之伪职为：伪中监委，余不明 待查。

陈孚木——候补中委，交通部政务次长，国营招商局经理。投敌后伪职为：伪中委，余不明，待查。

顾忠琛——中监委。投敌后伪职为：伪监察院院长，中政会委员。

许崇默——中监委，监察院副院长。投敌后伪职不明，待查。

傅 侗——候补监委。投敌后为伪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李福林——候补中委。投敌后伪职不明，待查。

顾孟余——中委，铁道部长，交通部长，贵州省府主席。投敌后伪职不明。

陶希圣——国民党中央大学教授。投敌后伪职为：伪教育部长，与周佛海同称为汪之“双壁”。

梅思平——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学校（党校）教授，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投敌后之伪职为：伪实业部长，内政部长，中政会委员。

汤良礼——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投敌后之伪职为：伪宣传部政务次长，中监委。

李圣五——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参事，外交部总务司长。投敌后之伪职为：伪教育部长，伪中政会委员。

陈君慧——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投敌后之伪职为：伪建设部长，实业部长，中政会委员。

丁默邨——国民政府秘书，军委会调统局第三处处长。投敌后之伪职为：伪中政会委员，中政会秘书长，社会福利部长等。

林柏生——立法院委员。投敌后之伪职为：伪宣传部部长，安徽省长，中政会委员。

周学昌——陕西省教育厅长，北平特别市教育局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南京市长等。

陈耀祖——铁道部财务司长。投敌后之伪职为：伪广东省长，广东绥靖主任，中政会委员。

赵尊岳——铁道部参事。投敌后伪职为：伪铁道部次长，宣传部长，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中政会委员。

焦 莹——天津特别市教育局长。投敌后伪职为：伪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中政会委员。

苏体仁——绥远财厅厅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山西省长，华北政委会总务厅长，内务厅长，工务督办。

刘郁芬——陕西省主席，甘肃省主席。投敌后之伪职为：伪军委会参谋总长。

陈春圃——侨务委员会常委。投敌后伪职为：伪中组部长，建设部长，广东省长，中政会委员。

叶 蓬——武汉警备司令。投敌后伪职为：伪陆军部长，军委会陆军编练总监，中政会委员。

鲍文樾——军事委员会委员。投敌后伪职为：伪陆军部长，参谋总长，中政会委员，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蔡　培——国府参事，交通部航政司长。投敌后伪职为：伪驻日大使。

蔡洪田——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投敌后为伪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中政会委员。

刘　云——苏州反省院院长。投敌后为伪中监委，特工总部第四处（即情报处）处长。

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长。投敌后初期负责伪方对日外交。

郑大章——第二集团军总指挥。投敌后任伪陆军部次长，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萧叔萱——驻日大使馆中将武官。投敌后伪职为：伪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会委员。

李士群——军委会调查统计室科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军委会调查统计部长，江苏省长，中政会委员。

孙良诚——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投敌后伪职为：伪军委会委员，开封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陈　箓——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副委员长。投敌后任伪外交部部长。

程希贤——北平军分会委员。天津特别市公安局长，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投敌后任伪开封绥靖委员会机要组长。

程锡康——外交部驻平特派员，条约委员会委员。投敌后任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

潘毓桂——津浦铁路局副局长，冀察政委会政务处长。投敌后任伪天津特别市长。

周龙光——天津市长，冀察政委会参议兼外委会委员。投敌后任伪中日经济协议会秘书长。

陈锦涛——财政部币制委员会主席。投敌后任南京伪维新政府财政部长。

何炳贤——实业部国际贸易局长。投敌后任伪陆军经理总监。

吴鹤龄——蒙藏委员会委员，蒙藏处长。投敌后任伪蒙疆政府议政委员会议长。

胡毓坤——北平军分会委员，冀察政委会委员。投敌后伪职为：伪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伪军委会驻华北委员。

门致中——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宁夏省主席，冀察政委会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投敌后任伪华北政委会绥靖总署督办，军委会委员。

余晋和——北平公安局长，厦门市长，外交部特派专员。投敌后任北平特别市长。

朱　朴——实业部农村财政整理委员，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投敌后任伪宣传部副部长。

任援道——平津警备司令，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投敌后之伪职为：伪绥靖部副部长，江苏省长，海军部长。

周迪平——津浦铁路局局长。投敌后任伪天津市长，华北建设总署督办。

许修直——内政部次长。投敌后任伪北平市长，华北电讯电话株式会社总裁。

张一鹏——江西财政厅长，司法行政部次长。投敌后任司法行政部长。

吴震修——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总经理。投敌后为伪中国银行总经理。

唐寿民——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常务董事。投敌后为伪交通银行总经理，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理事长。

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理，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投敌后为伪金城银行总经理。

朱博泉——中央银行业务局总经理。投敌后任伪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

林康侯——中央银行监事，全国总商会主席。投敌后任伪中日贸易协会理事。

李长江——苏鲁战区副总指挥。投敌后任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参院上将副院长。

项志庄——江苏省保安处长。投敌后任伪浙江省长，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摘自李石涵：《从七七到八一五》）

二　国民党石友三部通敌反共的议决案和密函

议　决　案

（一）主旨：本集团军此次北上，为遵奉总裁蒋命令，为救国家、救民众，为本身生存及发展计，为铲除妨碍抗战之共匪然后始能抗战，故目前第一阶段决定肃清共匪，第二阶段再决定执行抗战。

（二）军事实施步骤：第一步以濮县为根据地，以范县观城及清丰南乐濮阳以东地区为军事活动范围，部队先集中濮县四耻（？）给共匪以打击，并镇压民团，然后积极向外扩展；第二步训练人民，展开民运，俟其成熟巩固然后在清丰南乐濮阳以西地区，以本军全力开展之，就是稳扎稳打办法；第三步待第二步工作成熟，即与平汉路以西国军取得联络，然后再向西南中心地开展。

（三）部署：先以濮县为核心，以观城范县及濮阳以东为支援，互成牛依角之势，筑设坚固工事，并筑碉堡积极屯粮，然后在匪区内以旅（或加强团）为单位，按二三十里之和旅（就是匪犯时能相互援助）各个据为星罗布置之团队，工作事项：①首先在打击共匪搜查共产党潜伏分子，并用政治力量现徒，使本区民众统一向我；②设置情报网，连络站，使每界五里派出五人，常常外出调查匪情，并在村中外查共匪分子及探子，并维持本军军纪，该员等将姓名村落（用政治去做）造册传布各军队随时指挥之，（但不移动），此计划由参谋处详拟交县政府执行；③筑寨，每一单位据点必择形势打成五个至六个寨，由各村协助工作，只云为掩护各村用的，以资固守并屯粮；④搜得共匪重要分子，即行枪决，其被迫者，送县内由县成立感化院感化之，以示宽大。

密　函

（一）开始与日军接近后勿发生误会，彼此渐趋融洽，双方派员连络说明；

（二）飞机来时，可用白布在屋顶上铺盖，不准射击；

（三）各部队不准超界线征发给养及用武装部队活动（受匪军压迫时不在此限）；

（四）昼间连络法用识别旗（或白旗）左右摇动，夜间用红电筒连络纵灭；

（五）昼间行军应距其驻地十里（最小限制）；

（六）在黄河以南行动，应在日没前，不得在午后八时以后；

（七）本军反对匪压迫须向驻军区以外活动时，应一面活动，一面通知之；

（八）彼已通知各驻军遇我须要派部队时，即随援助（但兵力不能限）。

（节自朱德、彭德怀向蒋介石报告石友三通敌反共的马电。　1940年7月）

三　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反共计划书

编者按：本计划书共五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实施办法，第三章组织，第四章经济（附工作组织纵横系统图），第五章附则。为节省篇幅起见，其第一、第四、第五章从略，只将其第二第三两章发表于后。

第二章　实施办法

壹、操纵运用各项迷信团体实施策略：

一、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觉中从事为吾人效死。

一、收买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分子，加以训导，使在不知觉中服从本党指示，为吾人效死。

一、分别各项民众迷信团体之性质，选派本党中熟悉各该团体内幕之干练同志，假借该团体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门中之师傅、宫长、坛长、法师、道长、帮会中之前人、老头、老大、教民中之司铎、牧师、长老等，在表面要完全适合身份，不带半点色彩，跪称为该团素昔认为之圣地到来渡世救人。如对道门则称由昆仑、峨嵋、珞珈、灵鹫等地；对帮会则称由杭州、五台、印度等地；对基督教民则称由罗马、耶路撒冷、上海、天津等地，以坚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在物质方面必须予以相当之利益，而秘密以暗合法制之方法，布署劝教。以迷信方法，发给型样新奇，如假号灵丹、佛果、圣药之物品。按初一十五礼拜等日，施放银钱米粮及棺木药材寒衣小本贷款等。并经常津贴各该团体经费，变鬼之香火费用，以便其放手活动。民众头脑简单，最易感化，如此一行，则莫不为其信仰之团体效命致死，而实际则系为本党效命致死，此系开始之初步工作。

一、假借迷信方式，对道门则跪称奉无生老母，太上老君，元始天尊法语，乩训。对帮会则诡称临济法师，罗祖，翁祖，少爷鸾训，灵启。对基督教民则诡称天父耶苏圣保罗及十二门徒圣灵启示等方法。复将本党组训民众办法，秘密融化运用，虽使入钧而不自知，此为进一步之作用。

一、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

一、在进行操纵运用之过程中，应随时运用其固有组织与反抗心理，使之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了仇恨，而必须归吾人之怀抱掌握。

一、运用基督教民，向在当地之外国教师宣传中共之一切暴行，取得国际间之明了与同情。

一、有时本党工作人员可借外国教师为掩护，即不幸牵累外国教师因被牺牲，亦可激怒国际间对中共之毒恨。

一、以上不伦不类之现象，绝对避免日寇之破坏，致腹背受敌，有时反可以最机智之手段，利用日寇之注意。

一、在中共盘据较久之地，应先在其武装力量所不得到达及容易被日寇攻击之地带发展，逐渐向外扩大。

一、利用迷信方法，诡称祖师或天主命令，以收买杀戮手段，先期肃清所谓流氓无产阶级之活动。

一、利用民众家长传统心理，再假借迷信方法，转变学识幼稚思想动摇之青年，使走入正规或公开资送至都市教会学校读书，或秘密送入后方训练机关受训，以减少中共之党羽。

一、由山东省府以宣抚专员名义，选派干练人员，深入社会里层，以放账慰劳为掩护，主持指导操纵运用事宜。在未整个成功以前，以绝对机密切实避免显露与渗入民间负责人员之联系，俟全省民众团体完全为我切实掌握，一朝公开，则青天白日旗帜，将挂遍全省，非惟中共濒于没落，即日寇亦必丧胆。（？）

一、过去山东地方团体（当然是反共团体——编者），不能存在原因，完全由于不能与中央直接取得联系，得不到中央之真正接济与相当名义，即有很大成绩，不能直接报告中央取得嘉勉，是功是过无人负责过问，致形成忽视民众团体之重大错误。今后派选之负责机关，必须有独立经费及电台为主要原则。将来每个民众都感中央之深仁厚泽，每个工作努力分子，均能直接得到中央之恩惠与抚慰，以增加其事业前途之光明希望与鼓励。

一、除经济协助外，在必要及紧要时，必须配备武装与半武装之援助，选择相当地带造成牵制或抵角及内线外线形式。

一、应擦夺情形补给以近代武器弹药等件，以加强其力量。

一、城市及镇集可尽量运用帮会基督教民，广大乡村则须尽量运用道门。

一、全省可资用之道门帮会基督教民，分述如下：（从略）

贰、肃清防止工作实施策略：

一、与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相互配合，建立严格检查网，每一机关均须派有直属情报员一人至二人，秘密负责，监视侦察工作。

一、以诱骗方法施诸形迹可疑之人，以便进一步取得谈话间之认识。

一、以叮肖窃听方法，注意其往来朋友，窥听其行动。

一、严格检查邮电，以便从旁面取得切实之证件。

一、以金钱收买拉拢经侦察认为可疑者之厨役、老妈、勤务兵、及其往来之朋友。

一、每五个直属情报员，得成立一中心检察网，指派一人为主任情报员，每三日必须择一不令人注意之地点秘密集合一次，将所获情报讨论，交换意见，呈报上级核察，其有时间性者应随时呈报。

一、除直属情报员外，仍以大量金钱运用外围分子，使之告密，揭发或命令其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诽谤、殴辱、伤害已经证实之中共分子。

一、对于大奸似忠已经取本机关高级长官十分信赖之中共间谍分子，经侦有实据后，应先设阱布局，造谣栽赃，中伤陷害，揭穿其奸诈阴谋，破坏其地位与历史，然后予以断然处置，以免操切之弊。

一、选择本党中之忠勇坚强青年，再加以相当技术训练，学习，成立挺进除奸特情队，专门执行肃清工作之灭迹杀害，秘密绑捕，秘密殴辱，诽谤造谣等有效手段，彻底予以消灭或说服。

一、其他如党部应将所在地忠勇党员，组成党员特别服务哨，三民主义青年团，将团内忠勇青年，组成青年挺进军，使普遍发生肃清防止作用。

一、本党同志凡参加各机关军队工作之人员，应由中央函请表面上不十分显露色彩之上级机关，予以介绍或派遣。

一、特别服务哨及青年挺进军，均应由中央与各该机关上级商讨指导组成之。

一、执行上项任务之人员，应赋予极大威权，对取得证据及形迹可疑之反动分子，得便宜行事，本党上级须绝对负责与保障。

叁、渗入中共内部实施间谍工作：

一、选择本党内之忠勇干练党员，渗入共产党，打入其内部，用大奸似忠之表情行动，取得该党之坚决信赖后，再乘机制造分化离间造谣。拉拢之工作，遇必要时，并抱绝大牺牲决心，刺杀其重要领袖，或爆破其机关工厂整个设施。

一、运用全省不曾参加抗战，潜伏各地，在中共原则上所认为之顽固分子，予以教导津贴，使参加中共之地方民运团体，破坏基层组织，如有成效，须予以相当之奖励。

一、以利禄笼络被中共逼迫参加之动摇分子，武装与半武装者施行在中共内部捣乱及暴动。

一、收买、胁迫、拉拢在该党内被歧视虐待之土著八路军下级，俾令反抗叛变，本党应有相当之接济与援助。

一、成立兵士招待所，制订公布共产党及八路军人自首，投诚，告密，送训办法，及引导路线，规定重金奖赏及优异待遇，以收抚该党内之大量被迫逃亡分子。

一、以诱骗、造谣、栽赃陷害其内部中精华及老实分子，使之互相疑虑磨擦残害。

一、收买拉拢该党盘据区域中之三十五岁以上原来小康现在破产之民众，利用其因有传统思想及其切身利益关系，使在不觉中为吾人执行谣言之散布，思想行动之反抗工作。

一、收买在该党盘据之区域内之强盗乞丐，施行各种扰乱秩序工作。

一、收买该党内部之厨役，勤务，挑夫等，施行各种毒害刺探工作。

一、运用利用该党盘据区域内之三十岁以上之妇人，施行怠工逃亡等工作。

第三章　组　　织

一、由中央派遣合格大员为山东省宣抚使，由省府主席兼任，设立宣抚使公署，经理一切运用指挥事宜。以放账宣抚名义为掩护，丝毫不得显露本身工作之阴影，公署设省府所在地，以便与党政军取得密切之联系与互助。设置超短波电台一架，以便报告工作情形或请示机宜。此为半公开性之掩护部门，其他附属运用机关，须绝对秘密，设置于相当地带，并不得显露与总机关联系之目标。

一、宣抚使以下设干部委员会，另设他处，该会须绝对秘密，不得显露目标。

一、干部委员会之分子，由宣抚使精选本党党员中之忠勇干练者，呈请上级委任之，其人数不限，斟酌情形规定。

一、宣抚使公署，组织务求简单，设秘书主任一人，秘书若干人，因其事务繁简，设若干组及事务员若干人办理。

一、干部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由宣抚使化名某某秘密兼任。

一、干部委员会之组织，主任委员以下应设书记处，设书记长一人，禀承主任委员办理一切事宜，以下设指挥组，组训组，侦察组，经理组，挺进锄奸特情队，特种讲习班，并应运用党团关系，成立特别负责服务哨，及青年挺进军。

一、运用各项民众团体成立农民保家自卫军司令部，嘉礼教联合协进会，儒释道三教联

合协进会，天主耶苏教民联合救世军，及主妇救国联合社等。

一、全体党团中坚分子，如需要该等时，均有被征参加于部委员会工作之义务。

一、不直接隶属山东省政府之机关部队内工作人员之派遣，由宣抚使遣选相当干部，呈报上级加以特别方式之介绍或秘密指派之。

附：山东区宣抚使公署工作组织纵横系统图（从略）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7月27日）

四　太岳区三青团修正反共工作手册

前面的几句闲话：

当我团在整理之时，不幸时局逆转，工作不能按步的往下作，随时有个别同志，也就消声匿迹了，看不到有半点奋斗的精神，这实在是我党的大污点。我们不记得蒋总裁的昭示吗？吾人为万世子孙计，牺牲虽巨，无可辞，亦无可避。如果我们没有赴汤蹈火的精神，欲消灭赤祸是根本不可能的，祖宗万世之创业亦断难守成，中国历史固有道德，亦必然要沦亡。同志们，赤魔为我团之仇敌，与日寇之仇恨亦无重大的分别。同志们，努力吧，与共产党之表示合作，也不过是策略吧。

工作布置：

在未谈工作前首先声明一点，按本期工作，本来是准备一切力量迎接党军，积极消灭共党，但因国际形势的转变，日军在华南的拚死进攻，共军对我监视，再加上我团同志的不努力，不得不把硬的办法，变为软的方式，我团的工作除了整理以外，也仅有这样的几项工作。（一）建立本团干部威信；（二）破坏共产党的建设工作；（三）宣传工作。分说如下：

一、建立本团干部在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组织内的威信，我们在前次不是这样的说过吗，谁有威信，谁有群众。如果我团职员的威信建立不起来，那么一切工作等于零。不过我们建立这个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把我们领导工作的人抬高起来，不要贪多吃不烂。

甲、需要建立威信的人数的确定：（某村谁、某村谁，村名人名从略）

乙、方式方法：（一）利用旧有社会关系，过去旧有势力者。（二）用经济优势在各方面使老百姓赞扬。（三）打入共产党村中支部去掌握村中共产党员（详情口传）。（四）近几年在村中有威风者，利用抗战后建立起来的威风。（五）利用蒙族朋友，再令亲友拉拢亲友。

丙、完成期限：（一）在阴历十月底要使群众对这些人把平淡的面孔变为和爱的面孔。（二）年终要绝对的变为一呼百诺。

二、对共产党的破坏工作：

在共产党的财政上

甲、合理负担：

(一)在今年合理负担，一定要了解老百姓。不管何人出钱，是根本不愿意的。一定要使老百姓认为是共产党敲诈老百姓的变名词。

(二)利用他们的发动斗争，把抗战前有钱人的现钱，转移在抗战后使。

(三)把斗争的目标转移在外姓较好的户身上，造成多姓欺负少姓，使异性小户怕负担离开当地。

（四）（略去）

（五）保留战前的富户，消灭打击战争时期稍能挣钱的户。如战前的富户，在近几年来，由于共产党的仇视，皆采取守势不再发展。他们的合理负担，只能看见眼下挣下的，多年积蓄是看不见的。如那些在战争开始后，稍能挣钱的人（多是贫农中农），挣一元人家也能看见了，老百姓的眼皮薄，看见这些人稍活动些就眼红，凡我打入共产党农村支部的同志，一定要把这些户，以一说十，以十说百，这样一定能把这些户限止住发展，共产区的老百姓就要更穷，老百姓对共匪的输送物品就更少，靠他们自己的力量那就更少了，何能安心下去呢。

（六）在办合理负担时，要弄成秘密性的办，使老百姓怀疑，并用强迫的办法。

（七）在办理期间使群众乱闹。

合理负担工作正在开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谁要这一时努力工作，就等于作一年工作；放过这个机会，就放过机会了。

乙、对税务工作破坏：

（一）活动忽然发财的人晚上出外，随行没收，造成恐怖现状。

（二）征粮，要大斗量，交上要用小斗，物品要大秤收小秤交，就能得到些利润，老百姓还恨上级抽税。

（三）对公营事业破坏要特别严密，否则恐暴露。

（四）税卡内的人多用地痞流氓，这些人是善能走私的，可以减少税收。

（五）税卡建立私人的关系，有机会对某些人是绝对要宽容的，不要死作。

丙、破坏民主工作：

（一）利用现在抓捕道门时期，加紧宣传说，共产党就不能让群众讲道德说仁义，共产党的信仰自由根本是狗皮膏药。

（二）造成恐怖状态，使群众不发言。

（三）对村中稍有威望的，共产党称进步者的。那些家伙们，故意找事攻击，发动群众乱搞，使之不敢轻易发言。

（四）给群众乱戴帽子，说他有政治问题，使群众恐怖不说。

（五）凡属我团同志都要维护共产党独裁者干部。

（六）使各救会成为共产党的御用机关。

总之，各种工作凡属共产党搞者皆在破坏之列，上面提明的，不过是仅仅择其要者。其他照豆壁会议传达者作。要知破坏工作宗旨，是使群众对共党不信任，要破坏共产党的一件工作，即是为我党做一件工作。说到我团之正确主张，在共区内是根本难实行的，无论如何不要弄巧反成拙了。

三、宣传工作

（依照1月24日所发之宣传大纲不再另谈）

四、连络地点（从略）

五、在组织建设上不论何人，不得再行吸收，停止发展，否则恐暴露。至清理后每村最多团员不得过六人，多亦无益。其次，任家庄不设小组，因为任家庄三人皆职员，村中环境也不好，故不设。

（下面是附在手册之后一个通知）

本团本区的秘书，由吴光华同志负总责，因为各方面条件具备，共产党内也没有发觉，尤其是在群众前的威信，也如过去吴殿功同志，共产党政权上也都信仰，特务股长由张自新同志担任，不再通知，待后有问题，可到豆白谈。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7月27日）

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

周 恩 来

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读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概。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逝世已经十九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抗战本是求民族独立的，但时间快近七年，全国离反攻的真正准备还远。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十八年了，至今还没有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我党毛泽东同志老早就说过："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这个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都一致嚷出：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那反攻的准备，才能真正进行。

但是这个道理国民党人士怎样看法呢？抗战期间，国民党曾两次提出宪政问题。上一次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六中全会为回答当时国民参政会关于定期实行宪政的提议，曾决定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制宪。但是这是一时的搪塞，又加以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不久就阴消了。这一次是在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象很郑重其事的决定在抗战一年后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制宪，同时，又声明要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这一次与上一次似乎有些不同。我们共产党人一向是主张从民主途径解决国共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以争取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的，故对于这种主张，不论其中所含的诚意如何，我们总是表示欢迎。

现在，我就来说说我们对于这两件事的意见。先说宪政问题。我党历来主张现时中国应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自然，现时中国的宪政，也就应该是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了。可是，三民主义的定义，究竟拿什么做标准呢？我们以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对于三民主义定义的阐明是最正确不过了，所以孙先生称他为革命的三民主义，要拿他来建国。我们党，对孙先生这种主张，不仅拥护，而且早在实行。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抗战是实行民族主义。我们在敌后坚持，在边区建设，都完全倚靠民众，这就是"与民众深切结合"（国代宣言）。我们对境内蒙回诸民族，完全平等待遇，并承认其自治权，这就是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代宣言）。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扩大游击战争，组织

民兵，抗敌除奸，这就是实行“武力与国民相结合，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孙中山：北上宣言）。抗日政权完全是民权主义性质的。我们各抗日根据地，除汉奸外，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并行使直接民权，组织三三制的地方政府，这就是“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国代宣言）的革命民权。至于我们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劳动互助，生产节约，救灾备荒，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普及教育，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减轻人民负担，改善工农生活等政策，更无一不合乎民生主义的原则。根据这些道理，我们认为，不仅可以坚持抗战，而且可以有力量组织反攻；不仅在我们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得很有成绩，而且很可以推行于全国。执政的国民党不欲实施宪政则已，如欲实施宪政，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来做宪政的基础，而且要不怕面对事实，来看看我们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成果。

现在，各方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和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国民会议足以解决中国内乱）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有了前两条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实行。否则，那不是人民的自治，而是一党的官治。孙先生在北上宣言中说得好：“于会议（按指国民会议）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这个道理，在地方自治的乡民县民省民大会中，也完全适用。对于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应该给予他们以自治的权利。真正的地方自治实现了，全国的民主宪政自然会水到渠成。所以我们认为上述三个条件是实施宪政的必要前提，愿同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呼吁和争取其实现。

讲到宪法本身，我们同意这样的主张，就是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来建设中国。根据这个道理，就必须承认革命民权，这种民权，就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上所说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权。在现在说，凡抗日的人民及团体，均得享有这种民权，而凡卖国汉奸，则不得享有这种民权。次之，就须承认直接民权。这种民权，要用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新式代议制来实现他。又次，就须承认中国境内的民族自决权。在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范围内，是存在着汉蒙回藏等民族的事实，我们只有在承认各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下，平等的联合起来，才能成功的“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国代宣言）。再次，就须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地方自治应由乡县到省，省得自定不与国宪抵触的省宪，自选省级政府。最后，还须承认“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国代宣言）。宪政必须以实现民生幸福和繁荣为目的，这才是新民主宪政的特点，而不是旧民主的宪政。综合这些原则，就是今日中国新民主宪政之所必需，也就是我们在各抗日根据地所勉力实行的。

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我们一向主张彻底修正。对于国大代表，我们一向主张重选。因为根据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对内政策所规定，也应该赞成普遍、直接、

平等和不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而过去的国大选举完全违背这些原则。而且是内战时期的选举，为国民党一党所包办，不合抗战时期已经变更了的情况。其成分又都属于有钱有势的阶级，不能代表广大的工农平民。加以其中有大批人已叛变投敌应予通缉惩处，再无代表资格。所以应该以重新修改的选举法重新选举代表，而此种新选举法，不应有任何被选举权的不当限制，尤其不应以党义考试来限制，不应有候选人的指定，不应当由乡镇长来推选候选人，不应有对少数民族、边疆及华侨的不平等待遇，并且应容许各党派的竞选自由；这样选出来的国民大会，才有可能多少代表民意，多少实行民主宪政，否则，还是党治，不是民治。

关于时间问题，我们也一向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照我们经验，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选，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后方不能实行民选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实行。因为民主的动员是能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

现在我就来说国共关系问题。自武汉失守以来，国共关系愈变愈不经常，至去年为最紧张，但我党却始终坚持国内团结的立场，在任何时候都欢迎用政治方式合理地解决。我们和全国人民曾几次制止了内战的危机，就在去年最紧张的时候，也没有丝毫放弃我们对于团结的愿望。所以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政治解决”的声明虽然其中含有对共产党极端诬蔑的八字由头即所谓“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而不知正是相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英勇抗战，则民族与国家将不知要败坏到何等地步；但我们总还是愿意期待着。因为我们知道，不论从国际国内形势看，法西斯主义的失败是定了的，民主的趋势，正如日中天，中国不欲胜利则已，如欲胜利，必须先求国内的民主团结，然后才能获得国际的民主援助。抗战愈近反攻，这种国内团结，会愈感到需要。纵然破坏团结的顽固分子、妥协分子，还在制造摩擦，还在准备内战，而消灭共产党的心亦始终不死，但国内外大势所趋，他们的阴谋恐终难完全得逞。因之，我们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民主团结是我们与全国人民的要求，我们要求国民党保证今后再不发生有碍这种民主团结的事件。

国民党所谓“政治解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照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则谆谆要求共产党实践自己的四条诺言。我党对于自己的诺言，早已完全实践了，而且至今信守未渝。第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恐怕现在全中国，还没有另外一个地方象我们各抗日根据地为三民主义这样真正努力的，可是有些人们却说我们做的不对，好象实践了这条诺言，反而犯了罪过似的。第二条，“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七年来我们坚守不移，任何人找不出我们做的有丝毫不合这一条的地方。可是有些人们却在那里天天想推翻共产党，实行反共运动，实行没收农民土地的政策，难道这也算是要求共产党实行自己的诺言吗？第三条，“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现在我们各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就是民权政治，全国政权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统一。可是对边区却至今不予承认，难道国民党允许承认边区的诺言，便可以不实践了吗？第四条，“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这一条也是行之已久，并且成绩卓著，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就是铁证。可是毫无接济，新四军且被诬为叛军取消其番号，至今

尚未恢复。虽然如此，八路军新四军至今仍忍辱负重，艰苦奋战，以至于达到这种程度：抗击了在华全部敌军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而八路军新四军的兵力不过仅占我全国兵力的九分之一。过去及现在既然如此，将来反攻之战，我们深信，是一定可以担当极其重要的任务的。

我党这种态度，我八路军新四军这种战绩，我各抗日根据地这种建设，自信是有助于团结，有助于抗战，有助于民主和进步的。国民党如果有准备反攻实施宪政的诚意，我们希望真正从“政治解决”国共关系入手，因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内可以取信于国人，外可以取信于盟帮，抗战的胜利基础，才会从这里奠定。“政治解决”的内容，应该是双方的与公平合理的，我党愿意坚守四条诺言，但是国民党与政府也应承认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并撤消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国共两党果能本此基点，推诚相见，公平合理的解决各种问题，则不仅在蒋主席领导下，合作抗战的最后结果，必然达到驱逐日寇之目的，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也可以在蒋主席领导下，达到合作建设之目的。

我们在这个纪念孙先生的日子，热烈地希望这个目的能够达到。我们很愿意国共关系能够恢复到孙先生在世之日的那样密切的合作。我们也热望孙先生遗嘱中开国民会议的那一条，能够在不久就可实现，使民主自由的宪政，真能见之实施，而不是徒托空言，造成很不利于国家民族的局面。

(原载1944年3月14日《解放日报》)

[附]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某些报刊揭露国民党政权专制、腐败的片断资料

七年抗战证明了中国人民有强大的力量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土。但是，中国的反动派和法西斯也很嚣张。汪精卫和许多将领已经投敌；日本在我们国内许多地方越来越横行无阻；我们的国家军队有一部分被调去封锁和“防范”游击区；有些人仍然把个人利润放在民族利益之上；农民被压迫以及在国内大多数地方还没有真正的工人运动等等——这些都证明了中国的反动派和法西斯的嚣张。

(宋庆龄1944年2月8日《致美国工人们》)

* * *

今天还有人歌颂旧时代以及旧时代的人物……他们说清朝的制度好；我要问：如果是真好，清朝为什么会灭亡？这论调真太危险了！他们又喜欢推崇曾国藩，却不知道即使今日有曾国藩出现，依然拯救不了中国，最多也不过可以使今日的中国成为曾国藩时代的中国！崇尚旧，不如崇尚新，推崇曾国藩，我以为不如推崇国父。

(邵力子1944年5月7日在复旦大学讲演)

* * *

在战时或对外决定重大政策之时，则一举一动，俱属有关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决不可由一部分人或一党人甚或一党人中的一部分人，擅自决定。国家自属于全体人民，国家政策不是人民集体理智的表现，没有得到人民的同意，而擅自决定，人民对之作何感想，以及作何处置，我们是不难想象出来的。……如果在朝党或多数党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滥用权力，擅自行动，或对异已加以监视、压迫、虐待、逮捕、逐放、甚或残杀，则请问与暴政有何分别？暴政的结果如何，我们可从历史上找出来。

（孙宝毅《再生》第九十四期）

*　　　　*　　　　*

直到现在，“不依法律”侵犯人民身体自由的事实，并没有绝迹！……要真使约法不变成具文，政府不能只是下一道命令，就算了事，必须切实执行这项命令，严惩违法暴行。就人民居住迁徙自由言，训政时期约法第十条，曾规定：“人民之住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第十二条曾规定：“人民有迁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这就是说，人民的居住、迁徙自由，是不容许非法侵犯的。人民的住所不许任意侵入，人民的迁徙不许横加限制。既非法定机关，又不依法律手续，而任意侵入，甚至侵占人民住所的现象，必须消灭。既不出国境，又不到敌区，即不能限制人民迁徙、旅行的自由。

（张友渔《国讯》368期）

*　　　　*　　　　*

炎培往来各地，亲见非法逮捕拘禁，几乎到处皆有，或怀挟私怨，滥用职权，或假借公务，肆行敲诈，甚至地非监狱，人无罪名，而久久不见天日。随举一例，民国二十八年视察川康，至西昌县德昌镇，入一区署，视其拘留所，满宅拥挤，索阅被拘留者表册，有不记案由者，有不记入所年月日者，其记名死在所内者四人，逃逸者四人。问究竟被拘留几人，忽称十几，忽称二十几，负责者竟不能确答。实则远望即断不止此数，问其来源，则大都由豪家送押。被押久者已半年一年以上。其确实年月日，已不可考。此等现象，可云万方一概。机关权力愈大，非法拘禁愈多，生命保障愈少。……而上述各地黑暗惨酷之实况，不获为政府见及也。即以特种案件论，情事真实者少，虚构诬陷者多。政府何忍以少数人之故，竟使多数人受无辜之累。

（黄炎培《宪政》月刊第三号）

*　　　　*　　　　*

事实上，每一个新闻记者只能作“编修”，做他的奉命宣传工作。

所以今日的报人为了要“生活”只能低下头来丢开民众所欲说的话不说，而讳疾忌医地说：“环境卫生”成功了，“恭祝市民健康”！（《华西日报》1944年1月12日短评）

今日的报已变成十足的“公报”“伪报”，报人不仅是懒人，而且是“伪君子”，何尝得到积毫言论自由！至所报导的一切，所评论的一切，又何尝跳过“等因奉此”的公文阶段呢？因此，我们觉得在放宽审查尺度，准备宪政实行的今天，应当将反对开放言论自由的妖怪肃清，应当争取为万人安乐说话的言论自由。

（1944年2月20日《华西日报》小评）

*　　　　*　　　　*

现今听话看报，都需要高度的技术。有时“言在此而意在彼”，有时“偷关漏税”，有时“指桑骂槐”，有时“认鹿为马”。今日登讲坛者，或周旋文坛者，大半都对于此等技术甚

为熟练，而因报看文章的人亦卜之四五能心心相印。

（1944年1月17日《新中国日报》社论）

*　　　　*　　　　*

今日青年理想生活的落后，是五十年来仅见的事实。……今日青年之多种变态，岂非由于领导之错误所致？尤其是那班自命为青年导师的人，既不了解青年，青年也不了解他们，他们还要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模型去强制铸造一切的头脑，此何异在鲜活的生命组织里而注入石灰质的沉淀，使青年的生命力逐渐僵化起来，加以青年目所接，耳所闻，无非威胁利诱之勾当，青年所受实现的教训和暗示太多了，自身也就一天天变得实际起来，此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又那里能怪青年呢？……我们承认青年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应该让他们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土壤里滋生起来，因此反对任何宗教式的和公式化的思想，教育之灌输，务使青年富有创造的活力，不再是被奴役的工具。象纳粹那样箝制青年和利用青年的作风，必须打倒。

（1944年3月29日《新中国日报》社论）

*　　　　*　　　　*

最近本报迭获学生读者的投书，都说他们的学校当局以特工方式对待他们。有些学校对学生所出壁报，厉行检查制度，甚至有兴文字狱者。……“学校特务机关化，岂不是教育界不可洗雪的污点吗？……社会上种种无耻可怕的事件，一一演出于神圣的学府，这样，学生人人自危，老师痛苦已极，还谈什么教育效果，说什么培植人才！

（1944年4月9日《桂林力报》短评）

*　　　　*　　　　*

年来有多少措施在毁灭人底灵性，践踏人底尊严？……我愿我们的教育家……挺身出来维护自由教育，指出现行教育政策之危机。

（1944年4月22日《云南日报》社论）

*　　　　*　　　　*

是谁使学生的思想越来越贫乏糊涂呢？我以为这是“咎有攸归”的，这责任应由“言论自由”不存在这个现象来负。

（许无《新华日报》1944年3月1日友声）

*　　　　*　　　　*

做一个主官，一定要抓住人与钱的支配权，走马上任以后，最重要的工作是一面抓人一面抓钱。……一个人作了主官，同宗、同乡及同学便都跟随而来，树立派别，党同伐异，机关越大，派别越多，结果勾心斗角，把一个机关弄得乌烟瘴气，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工作效率，……目前机关里不仅弥漫着“三同主义”（按即指同宗、同乡、同学），而且又流行一种时髦的干部主义，我们常听说某人是我的干部，某人是他的干部，这也是很不合理的话。

现在有些机关仍不免有“绍兴师爷”的作风，就是所谓“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因而对于公事敷衍应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杨绰庵1944年1月24日《大公报》）

*　　　　*　　　　*

两千余年的专制政体，不稍变其实质，这是官僚的“功绩”。而两千余年来政治上黑幕重重，纷歧扰攘，又为政客政治所促成，今日政体虽已大变，但官僚政治依然存在，政客钻

营尤其活跃。……

（1944年2月3日《桂林力报》社论）

*　　　　*　　　　*

吏治之坏，几可以说无有甚于今日者，其最显明的表现，就是贪官污吏，到处充斥。……前面所举多及县市而止，至于县市以上，官愈大，势愈厚，而贪污数目愈为惊人者，无有（编者注：意即大官贪污，被检举者无有）。这是不是说大官尽廉，小官才贪呢？不是，政治上从没有大官真廉而小官敢贪污者。真贪污而无人告发检举。吞舟之鱼漏网，而落网者皆鼠窃狗偷之徒，大奸大恶，逍遥法外，为所欲为，所以由此产生的下级贪污，也就诛不胜诛，越来越多了。在这样吏治之下，如篦如梳，又剥又熬，民焉得不穷，国焉得不困。

（1944年5月16日《华西日报》社论）

*　　　　*　　　　*

在事实上，今天的贪吏与廉吏，我很难得区别，假使以现行的法令拿来作考量的尺度，那末，恐怕难得找出一个不犯贪污罪的，比如说"吃缺空"，法令当然是不容许的，但你能指出多少不吃缺空的衙门呢？又象如"官吏经商"法令当然是不容许的，但你又能够指出几个不作生意的官吏呢？

（1944年4月20日《华西日报》社论）

*　　　　*　　　　*

今天有能力浪费的只是少数的囤积贪污以及生财有道的特殊人物。在他们，物价的浪潮袭击不到他们，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也绝不会感受到物价的威胁。相反的，物价愈上涨，他们的荷包愈充实，渔利中饱的机会也愈多。故物价愈高，豪奢挥霍之风也愈烈。他们的豪奢是与物价成正比例发展的。贪污、浪费与高物价三者竟结不解之缘，三者互相追逐。

（1944年5月15日《华西日报》社论）

*　　　　*　　　　*

面对着社会生活贫困的状态，我们居然还能看到上层分子的任意挥霍，大兴土木，高官厚禄，恬不知耻。迎新送旧，婚寿喜庆，更是不惜大张筵席，极尽罗掘之能事，为了要逢迎长官而耗费的财力，仔细计算一下，是一定要骇人听闻的。

（1944年2月12日《新蜀报》社论）

*　　　　*　　　　*

尽管抗战日趋艰苦，战士生活艰困，亿兆人民水深火热，食草根树皮，饿殍载道；而后方玩物丧志沉迷荒淫者，却食必数万金，一衣足敷一家灾民的终年温饱，一掷万金，毫无吝色。

（1944年5月27日《云南日报》时评）

*　　　　*　　　　*

[附] 抗战后期国民党关于加强蒋介石个人独裁和加强国民党政府专制统治的几个决议和法令

(一)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授予总裁大权案

总裁在全会开幕时训示，（一）为增强抗战力量，以期与反侵略各友邦并肩作战，成为世界战争中之健全战斗员，（二）为根据总理遗教与抗战建国纲领之精神，以充实基层力量，加强国民总动员，集中全国人才，为建国根本政策，大会全体一致接受，确认此为当前最重要之根本政策除大会已另有决议之方案外，交常会根据此重大政策，在蒋总裁指导与裁决之下，整理一切法令规章，制定各项实施方案，以期迅速完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之任务，与并肩作战之各友邦共同建立世界和平。

（1941年12月23日《新蜀报》第二版）

(二) 国民党政府关于因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有关条文的命令

(国民政府令文官处)

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条文现经修正明令公布，应即通饬施行，除分令外合行抄发修正条文，令仰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

计抄发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条文一分。

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蒋中正
行政院院长　蒋中正
立法院院长　孙　科
司法院院长　居　正
考试院院长　戴传贤
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条文

第八条　国民政府以左列五院分别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

一、行政院

二、立法院
三、司法院
四、考试院
五、监察院

前项各院得依据法律发布命令

第十条　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委员二十四人至三十六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

第十一条　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第十二条　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

第十三条　国民政府主席任期三年连选得连任但于宪法实施后依法当选之总统就任时即行解职

国民政府委员任期同

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理之

第十四条　国民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依法署名行之

前项公布之法律发布之命令由关系院院长副署之

第十五条　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

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

（1943年9月15日资料第三辑第二十一册）

（三）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公布）

第一条　国民政府于战时为集中运用全国之人力物力，加强国防力量，贯彻抗战目的，制定国家总动员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政府，系指国民政府，及其所属之行政机关而言。

第三条　本法系国家总动员物资系指左列各款而言。

一、兵器弹药及其他军用器材。
二、粮食饲料及被服品料。
三、药品医药器材及其他卫生材料。
四、船舶车马及其他运输器材。
五、土木建筑器材。
六、电力与燃料。
七、通信器材。
八、前列各款器材之生产修理支配供给及保存上所需之原料与机器。
九、其他经政府临时指定之物资。

第四条　本法称国家总动员业务系指左列各款而言。

一、关于国家总动员物资之生产修理支配供给输出输入保管及必要之试验研究业务。
二、关于民生用品之专卖业务。

三、关于金融业务。

四、关于运输通信业务。

五、关于卫生及伤兵难民救护业务。

六、关于情报业务。

七、关于妇孺老弱及有必要者之迁移及救济业务。

八、关于工事构筑业务。

九、关于教育训练与宣传业务。

十、关于征购及抢先购运之业务。

十一、关于维持后方秩序并保护交通机关及防空业务。

十二、其他经政府临时指定之业务。

第五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国家总动员物资征购，或征用其一部或全部。

第六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国家总动员物资之生产贩卖，或输入者，命其储存该项物资之一定数量，在一定期间，非呈准主管机关不得自由处分。

第七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国家总动员物资之生产贩卖，使用修理储藏消费迁移或转让加以指导，管理节制或禁止。

前项指导管理节制或禁止，必要时得适用于国家总动员物资以外之民生日用品。

第八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国家总动员物资及民生日用品之交易价格数量，加以管制。

第九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在不妨碍兵役法之范围内，得使人民及其他团体从事于协助政府，或公共团体所办理之国家总动员业务。

第十条　政府征用人民从事于国家总动员业务时，应按其年龄性别，体质学识，技能经验，其原有之职业等为适当之支配。

第十一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从事者之就职退职，受雇，解雇，及其薪俸工资加以限制或调整。

第十二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必要时得对机关团体公司行号之员工及私人雇用工役之数额，加以限制。

第十三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命人民向主管机关报告其所雇用或使用之人之职务与能力，并得施以检查。

第十四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以命令预防或解决劳动纠纷，并得对于封锁工厂，罢工，怠工　及其他足以妨碍生产之行为，严行禁止。

第十五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耕地之分配，耕作力之支配，及地主与佃农之关系，加以厘定，并限期垦殖荒地。

第十六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货币之流通与汇兑之区域及人民债权之行使债务之履行加以限制。

第十七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行号资金之运用，加以管制。

第十八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银行公司工厂及其他团体行号之设立，合并增加资本，变更目的募集债款分配红利，履行债务，及其资金运用加以限制。

第十九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奖励，限制或禁止某种货物之出口或进口，并

得增征或减免进出口税。

第二十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国家总动员物资之运费，保管费，保险费，修理费，或租费加以限制。

第二十一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人民之新发明专利品，或其事业所独有之方法图案模型设备，命其报告试验，并使用之。

关于前项之使用，并得命原事业主，供给熟练技术之员工。

第二十二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其为一定之记载。

第二十三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

第二十四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人民之土地住宅或其他建筑物征用或改造之。

第二十五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经营国家总动员物资，或从事国家总动员业务者，命其拟订关于本业内之总动员计划，并举行必要之演习。

第二十六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经营国家总动员物资之生产或修理者，命其举行必要之试验与研究或停止改变原有企业，从事指定物资之生产或修理。

第二十七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经营同类之国家总动员物资，或从事同类之国家总动员业务者，命其组织同业公会，或其他职业团体，或命其加入固有之同业公会，或其他职业团体。

前项同业公会，或职业团体主管机关，应随时监督并得加以整理改善。

第二十八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对于人民因国家总动员所受之损失，得予以相当之赔偿或救济，并得设置“赔偿委员会”，本法实施停止时，原有业主或权利人，及其继承人对于原有权利有收回之权。

第二十九条　本法实施时，应设置综理推动机关，其组织另以法律定之，关于国家总动员物资及业务，仍由各主管机关管理执行。

第三十条　本法实施时，前条综理推动机关为加强国家总动员之效率起见，得呈请将有关各执行机关之组织经费权限，加以变更或调整。

第三十一条　本法实施后，政府对于违反或妨害国家总动员之法令或业务者，得加以惩罚。

前项惩罚以法律定之。

第三十二条　本法之公布实施与停止，由国民政府以命令行之。

[附]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民族工业濒于破产的若干情况

据32年九月号《金融知识》载姚曾荫物价生产与流动资金文中称：“自30年上半年起，后

方工矿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严重的阶段”。假如我们用“危机四伏”一语来形容他，并不为过。抗战最初二、三年间产业蓬勃一时的发展机会已经过去了，继之而起的现象是新设工厂数目的减少和旧有各厂的出顶及合并。其能勉强支持、努力挣扎的，也大都缩减再生产的规模，甚至实行所谓“以商养工”“以商代工”的办法。

据秦柳方氏称：“重庆的工厂本有八百七十一单位，目前停工减产者达二百七十余厂”（32年11月《中国工业》第21期《对于战后工业建设纲领的意见》）。衡阳的情况，据32年11月20日经济新闻周报称：“若干中小工厂已有无法维持而告停业者。据熟悉衡市工业界人士谈，至今年年底恐有$\frac{2}{3}$以上之工厂，宣告结束。按衡市在经济部登记之工厂共有76家，在西南居第二位”。桂林的情况，桂林大公报记者曾访问各民营工厂，“据他们（各厂负责人）说，目前各工厂的情形，最多再维持半年或一年，一年以后，北极路上，不会再看见工厂烟囱冒烟了。几架待价而沽的机器，据他说，再过几个月，他们只有打碎了机器，使他变成了废铁后出卖，其他是绝对没有办法的”（33年2月10日该报）。

以下是几个主要产业部门的危机情况：

钢铁业 32年12月24日商务日报载，重庆钢铁业加入工会的22家中“炼铁厂18家，冶钢厂4家，炼铁厂停炉者14家，4家勉强维持，冶钢已有1家完全停顿，其余3家勉强开炉，但产量则减至微乎其微。致成本加重，陷于半停顿状态”。钢铁业因滞销停产呼吁救济之声，遍于各报。

机器业 32年11月25日时事新报载，倒闭之工厂有：建筑机器厂、广和机器厂、永胜翻砂厂、上海广利铁工厂、宝泰机器厂、王鸿昌翻砂厂、黄运兴翻砂厂、华兴铁工厂、黄永兴铁工厂等10余厂，非迁川工厂会员厂倒闭者尚不在内。今年1月号中国工业载薛明剑氏（国民参政员、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允利实业工司负责人）一文称：重庆市民营机器厂共三百六十六家，“本年（32年）2、3月间各区工厂已渐有停工歇业者，至6月底止，调查确实倒闭者已达四十二家。6月以后，险象更著，因工作缺乏，周转困难而频相停工者日甚一日。以沙磁区而论，该区六十四家工厂中已有12家停业，约占全区百分之二十。再江北区工厂三十三家中，宣告倒闭者十五家，停顿者2家，合计占该区工厂百分之五十。估计目前全体工厂，正式与非正式停工者，总数已在百分之五十左右”。今年5月18日商务日报载：“最近机器工业凋落依然。4月分5月分两月内停工歇业者已达十余家，规模较大的重庆五金厂及××机器厂已告歇业，小龙坎一带停歇工厂亦在四家以上”。

衡阳的机器业，据32年11月29日大公报称：“仍在停滞中，出品量日益减弱，九十余家机械厂停工者已达二十余家，目前又有胜昌等无法支持，已告关门，尤以印刷机制造，一落千丈”。在云南，据王振芳氏谈：“最困难者，则为民营机器厂，如政府再不能有实际之援助，则此等工厂，数年来惨淡经营，恐维持不能多久矣。……至铁则积存数千吨，尚待顾主，言之不胜感慨！”（见32年10月31日《西南实业通讯》载王振芳氏在九十次“星五聚餐会”上讲演）。

采矿业 煤矿业的衰落，据32年11月10日商务日报载第二次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余名钰氏（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渝鑫钢铁厂总经理）称：“现在煤业因钢铁之减产，亦已大受影响，如本公司亦有煤矿，在重九节后仅留工人百分之十四，但所产煤已足供本钢铁厂之用”。28日该报载：“煤矿业最大困难，则为储存原料用尽，煤价太低，……现后方各小煤矿已停业者达百分之五十云”。12月23日该报又载：“嘉陵江区煤矿业各矿今冬产矿量，共

为七万五千九百吨，较上年同期最高产量八万四千二百吨，减产八千三百吨，约少产百分之九点八五。同义、新新、大同、吉利、协兴等44家，因亏折关系，已告停产，十九家亦在减产”。同日该报在经济短评中称，此次“减产和停产的煤矿家数竟达百分之七十七以上”。该区煤矿业代表在今年2月18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工商运动委员会召开的工商座谈会上称：“去年12月底已停工的厂矿有四十四家。今年春节后，续停小厂一百余家，现在继续开工的仅十五家”（33年2月19日《商务日报》）。该区至本年2月止，已共亏折一亿五千万元以上（33年4月1日《经济新闻周报》）。“单以盐井溪一区而论，六十余家就停了四十多家，正在打算关门的还不止此数”（33年5月5日《新华日报》）。该区“上月已减产一万余吨，现天府等大煤矿已在陆续裁员减工”（33年5月6日《新民报》）。

广西本为矿业很发达之区，据去年3月间该省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李新俊氏抵桂时称：“八步本为本省矿业中心，近来因政府法定收锡价格太低，矿山矿工无法维持营业，现全区厂矿百分之八十已关门，数万矿工无工可做”（32年8月《新工商》第二期千家驹：论发展工业生产）。今年2月25日桂林扫荡报载：广西“全省原有大小矿区八百余处，但陆续倒闭，现仅存一百余处，大规模机器开采之矿公司原有三十余家，又硫磺矿全省原有公司二十余家现则纷纷倒闭，无一幸存者”。4月28日广西日报载周哲平桂东之工矿业一文中，叙述该省贺富钟区的八步水岩坝矿业中心之衰落，说该地民国27年有矿厂三十余家，马力逾万，繁荣热闹有“小南洋”之称，“但自民国28年以后，已门庭冷落，繁荣场所，化为幽墟，昔日曾发出巨大力量以转动矿机之锅炉，现尚有好几个被弃置而静卧于道旁。据云大部矿机多作废铁变卖矣（因为作机器出售，手续多而反不若废铁之方便易售也）”。该区电力厂规模颇大，现因矿公司大部倒闭仅开一架电机，煤矿已大量减产。4月30日桂林扫荡报载，广西省府发表该省本年矿业情况称：“民营矿业，年来衰落特甚，最近调查，锑矿公司已全部倒闭，硝矿仅有少数人开采”，其余锡、钨、金等矿率皆勉强开业，艰苦支持”。

全国闻名的云南箇旧锡矿，衰落得尤其凄惨。据1月4日至6日商务日报的范式之感概过箇旧文中称：“往昔在城东炼锡的大炉，共达四十左右，今天则能维持开炉，照常炼锡的不到十个；往昔矿工人数已达十余万，今天仅五千余；民国27年，计年产锡一万零七百三十一吨，至今年上半年，1月至6月则共仅八百吨。……记者费时3月，亲赴老阴老阳诸山，……只见矿洞倒塌，溜口（洗炼矿砂用的）淤塞，厂区伙房，十九折卸，颓垣断壁，触目皆是。昔日各洞有多至四千至五千人者，今则只剩十余人至一百人不等，借以修补洞中穴道，免其中堕，致十百年辛勤开采所耗，有达千百万之资本，抛于一旦。至于草皮尖和冲荒尖，则几全部荒芜，荒弃于地，无人顾问，而颓败凄凉景气，几疑置身于今之战场，谁也意想不到这竟是世界第三产锡地，全国第一产锡区也。……目前箇旧大锡生产，已临总崩溃前夕，各私家厂商，百分之九十五已宣告破产或停业。……如政府不迅为救济，……则至明年今日，箇旧势将成为‘无锡’之地。

湘潭之膏盐矿据32年8月新工商第二期载吴伯卿湘潭之膏盐业文中称，该矿因收价太低，致“只有限制产量之一途，以至前年产量在二十万担以上，但去年1月至11月间，统计尚不足六万担。目前各矿商均以折本太多，不堪维持，相率停顿，现存开采者，不过五至六家而已，长此以往，膏盐之前途诚有不堪设想者矣”！

纺织业　去年7月新工商第一期载周宪文论新工商文中称：现在大后方“以纱锭而论，被弃置的数量就与开工生产者相等”。32年11月28日商务日报载，纺织业“目前主要困难厥

为原料缺乏，生产成本不敷，加以资金周转日细，工人伙食上涨不已，有若干厂家再三向政府要求，愿无条件让归国营，某纺织家曾有如下之惨痛语："请求救济之呈文不知上过多少，纺织业困难之文章写了不知几百篇，但结果困难还是困难，政府若再不设法救济，则大家只好在明年停工"。据32年12月4日商务日报载，重庆最大纱厂纱锭织机数量均在锐减，"根据去年各纱厂招待本市新闻界报告，各厂锭数变动如下表：

厂名	原有纱锭	一年前纱锭	原有布机	现有布机
裕华	43,000枚	35,000枚	500架	100架
豫丰	56,400枚	40,000枚	240架	100架
申新	5,000枚	3,000枚	100架	70架

不过到现在，各厂纱锭已减少很多，有2万枚纱锭能经常开动的厂家，只有裕华和豫丰两家了"。该文称，重庆各纱厂生产力，"每月平均可产纱四千余件，唯目前，只产纱三千余件"。今年1月号中国工业载张锡昌氏如何挽救工业生产文中称，重庆"小规模的纺纱厂都感到无法再生产，织布厂的生产也在减少，例如北碚的大明纱厂近几个月来，生产大减，原来每月可产布七千疋，现在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工人减少了三分之一，开工的织布机，仅及原数的二分之一"。3月4日新华日报载重庆纺织土布、毛巾、针织各业大小工厂该月分起大都全部歇业，失业工人四万。

昆明纺织业，据32年11月号中国工业载，陶大镛限价声中的工业文称："原有织厂30余所，一年以来竟倒闭了二十余家"。今年4月15日昆明中央日报称："第五区（云南区）纺织工业公会会员二百余家，拥有织机九千余架，惟自去年3月以来，迄未领获配纱。除一部分尚勉力挣扎外，余多陷于停顿"。今年5月7日华西日报载，缎道斯景气低沉的工业圈文中称："有名的振昆纺织厂，竟至有三分之一的机器在瞌睡。据云南日报的报导，该厂生产最高额每月曾达到六千多匹，现在则减低到500匹，困难的情形，似乎还在增加"。至于桂林，据32年11月号中国工业称，都"以原料来源受阻，商品成本加重不易支持"。

酒精业 重庆去年情况是"共有37单位……今年停工者有3单位，停而再开者有2单位，时停时开者1单位，此外有出卖照牌者，亦有放弃照牌而出让者，总计此类厂家当在三分之一以上"（11月27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今年情况更是每况愈下，3月10日新华日报载，第一区酒精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杨公庶招待记者谈称，去年年终卖厂的有$\frac{1}{3}$，今年物价涨而酒精价不许涨，以致"现时同业各厂无论有没有资力，都已无法维持，决定在月底先后停工，等原料市场变化"。

昆明原有酒精厂四十家，现仅存十家（32年9月1日《经济新闻周刊》）。云南全省极盛时有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家，现只剩十余家了（32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韶关酒精业因不堪赔累，纷纷停业，连省营的酒精厂都无法维持（33年4月14日《新华日报》）。贵州的也因原料困难纷纷停业（33年5月13日《经济新闻周刊》）。西北的咸阳酒精厂以原料及利润关系，停工几达8个月（32年10月16日《经济新闻周刊》）。成都中国酒精厂每月可出3万加仑，现仅出1万加仑（33年1月号《中国工业》载孙克鸿：成都工厂调查日记）。

炼油业 第一区植物油制炼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王震欧氏谈，该区"炼油厂国营"（按：

即国民党官营）民营各厂计有三十五家，目前仍继续开工者仅达4家，而开工四家赔累甚大，宏丰所辖油厂，每日亏蚀即达二百万元（33年4月8日《商务日报》）。

其他如火柴业，贵州“去年初制造厂计达十家，除盘县的三厂在去年就相继倒闭外，遵义的四家也于今年上季关门，其余三家都呈困顿之象”（32年11月《中国工业》）。梧州火柴厂每月原产八十箱，去年5月实施专卖后，8月分仅产二十一箱，9月分减至十七箱（3月30日桂林《大公报》社论）。

卷烟业 福建龙岩“在烟类专卖前，全县烟厂四十家左右，年产卷烟五十万枝，现仅存九家而已”（33年3月4日《经济新闻周刊》）。广西南宁月产卷烟四百箱，去年实施专卖后，至9月仅产三十箱（3月30日桂林《大公报》）。

印刷业 如重庆在年底年初三个月内印刷厂七十家停工(33年2月19日《商务日报》)。

造纸业 重庆各厂大量减产（同上报）。四川夹江县纸商因统税太重纷纷停业（32年11月12日《新新新闻》）。粤北和平县的纸产量锐减（32年4月《中国工业》）。福建顺昌槽户呼吁无法维持（33年4月19日《东南日报》）。

制糖业 据甘绩镛氏谈，川糖29年产二百九十六万一千市担，31年仅一百三十万市担，尚不及原数之半（32年10月16日《国民公报》）。

丝绸业 四川素甚发达，现已冷落不堪，川南为生产名区，极盛时有织机5千，现仅存半数（33年1月9日《商务日报》）。

以上各产业部门停工减产之情况，而减产之前途，亦必为停工。去年4月中央银行经济汇报第7卷7期载杨公庶氏生产建设中之酒精工业中称：“减产为停工之初步。盖减产以后，则人工设备无法利用，而管理费之比率增高，亦必难久维持。故各厂家为希图减少人工设备之损失，百计筹贷以谋增产，然债台高筑，息金累累。而管制机关对于此项贷款之息金并未计入核价范围，因是各厂无论增产或减产，同处不利之境，终必趋于崩溃之一途”。此虽指酒精工业而言，其他产业部门情况与此亦完全适用。

危机之另一现象，就是所谓“以商养工”，或者竟移工作商。去年7月新工商第一期载周宪文论新工商文中称，有些工厂故意延长生产品的生产过程，“本来可以3月出产的货物，现在故意延长到半年。这意义一方面等于停工减产，另方面则利用物价的逐日飞涨，借以提高生产品的卖价”，或者“‘挂羊头卖狗肉’，借筹办工厂的名义，购囤机器原料，待价而沽，这种消息常常在报上透露”。同刊载千家驹氏论当前工商业发展的动向文中亦称，“厂家宁愿缩减生产来囤积原料，因为囤积原料不但可以坐享原料涨价之利，而且可以弥补工厂虚盈实税的亏项”。同刊载杨寿标氏四川工业发展的检讨文中亦称，有些工厂“维持着工业的名义，而实际靠进出原料品代理运输事业以维持其生命，甚至徒具工厂之名，而实际与商业无异”。

去年12月19日广西日报载星期论文千家驹再论民营工业文中称：“有一种厂家是忙于找门路，讲交际，送往迎来，酒食征逐，于是银行借款，原料运输，头头是道。至若问他厂内生产状况如何，往往瞠目不知所答。也有的是请某一大有力者做董事长，这种运输、原料、资金才能不成问题，管制也管制不到他们头上。至若老老实实做工厂，然而不善于走门路的，却非关门或卖厂不可。现在一般快要关门或卖厂的厂家，大半就是这种比较老实的厂家”。所以，所谓“以商养工”或移工作商，一部分是某些投机分子的取巧行为，但一部分却是一些工业家在危机下无可奈何的挣扎的表现。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43—150页）

[附]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经济破坏的惨象

大后方农村，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压榨之下，广大农民正日益剧烈的走向饥饿、破产与死亡的境地，这只要看看下面的材料，就可以明白。但这些材料有很大部分都是官方公布的，即使非官方的，也受过官方的检查删改，实际的情形当不知严重多少倍，而且为篇幅所限，还未将大后方各省连年的灾情收进去，如湖北灾区野草也卖五元一斤，河南灾民竟至于杀子为食，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实，在今天大后方农村中已是司空见惯。大家知道天灾与人祸是分不开的，读者倘把这些反映大后方一般农村经济状况的材料，和本报过去报导过的大后方农村灾况连起来想想，就可以更加明了大后方广大农民，是处在怎样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中了。

农田面积逐年锐减

大后方十五省耕地面积，抗战前为三八九・九七五・〇〇〇亩，一九三八年为三八五・九三〇・〇〇〇亩，一九三九年为三八六・九八六・〇〇〇亩，一九四〇年为三八四・九〇四・〇〇〇亩，一九四一年为三八一・五四六・〇〇〇亩，较之抗战前减少了八・四二九・〇〇〇亩。这就是说：抗战后，大后方有八百四十余万亩的良田变成了荒地。其中作为主要粮食的大米面积更形锐减，由抗战前的二一〇・八六八・〇〇〇亩，减为一九四一年的一九七・五二三・〇〇〇亩，计减少达一千三百余万亩（其中一部分改种杂粮，一部分则直接变为荒地）。小米面积亦由抗战前的一七・二八三・〇〇〇亩，减为一九四一年的一四・二八五・〇〇〇亩，计减少几达三百万亩。（以上数字引自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逐年公布的农情报告）。

农业生产量惊人降落

大后方十五省各种作物总产量，由一九三八年的一・七二一・七五五・〇〇〇市担，减为一九四一年的一・五三六・五六〇・〇〇〇市担，计减少一万八千五百万市担。其中大米由一九三八年的七四七・五六九・〇〇〇市担，减为一九四一年的六六一・一一四・〇〇〇市担，计减少八千六百余万市担；小麦由一九三八年的二三・八一四・〇〇〇市担，减为一九四一年的一九・六四八・〇〇〇市担，计减少四百万市担，小麦由一九三八年的二〇二・九一一・〇〇〇市担，减为一九四一年的一六五・一二〇・〇〇〇市担，计减少三千七百七十九万市担（数字来源同上）。

牲畜大量死亡

大后方十五省耕牛，由一九三七年的二二・九三一・〇〇〇头，减为一九四二年的一九・九五八・〇〇〇头，计减少二百九十七万头。马由一九三七年的一・六三一・〇〇〇头，减

为一九四二年的一·二八四·〇〇〇头，计减少三十四万七千头；骡由一九三七年的一·〇六七·〇〇〇头，减为一九四〇年六九〇·〇〇〇头，计减少三十七万七千头；驴由一九三七年的二·四七七·〇〇〇头减为一九四二年的一·九八九·〇〇〇头，计减少四十八万八千头；猪由一九三七年的三九·七五九·〇〇〇只，减为一九四二年的三五·八二六·〇〇〇只，计减少三百九十三万只；羊由一九三七年的一三·一三八·〇〇〇只，减为一九四二年的一〇·七四〇·〇〇〇只，计减少二百三十九万八千只。（数字来源同上）

土 地 加 速 集 中

“社会上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向于农地，作土地的囤积居奇。据说郫县的全县土地，几乎都被某一人买光，就是重庆附近的土地，也有这种类似的现象。所以，以目前的情形而论，土地是一天天在集中，自耕农是一天天在减少。”（见《中国农民》二卷三、四期）。

“成都平原，渝巴周围，汉中天水一带，粤北湘南、桂东、黔西、浙东、赣南，以及越局未吃紧前的云南全境，以官商四集消费热闹的大都市为中心，四面辐射地发生购取土地的热潮。”（见《国民公论》五卷一期）。

“从后方到前方，从东南到西北，弥漫了暴发户争购田地的空气，后方的农村固不必举例，凡关心报章的，俯拾即是；就是前方的洞庭湖西岸的南县华容，买田很起劲，甚至连经手交易取佣金的人，也就成了几个财主，由此可以证明田地转移的激增。”（见《中国农民》七卷十一期）。

河南“在灾情最严重区域，土地价格一落千丈，有不及原价十分之一者，暴利获得者，因之大量购进，土地兼并现象正严重地滋长着。”（见三十二年一月九日《大公报》）。

“战争促进后方交通事业之发展，交通所过之区，土地投机风潮即随之而至，如峨嵋县西之龙池，某某公路甫动工，某某银行即大量圈地……，在战时加紧生产建设运动之下，已有类似圈地运动之情形在农村发生。”（见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商务日报》）。

云南西南部边境，“当地之强有力者竞相圈占荒地，只须取得土司之同意，即可将所圈荒地据为己有。作者在芒市曾见一龚姓族官所圈荒地竟达五万里以上，类似情形亦发生于遮放，猛卯各处。”（见《经济汇报》一卷七期）

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课长熊鼎盛先生称：“自抗战发生以来，经济环境顿起剧烈之变化，原有不良之土地制度，遂完全暴露其恶性现象，几至影响抗建大业，其最显而易见者，则为粮食囤积问题，土地兼并问题以及农民困苦、农村不安定种种现象……地价上涨之比例，万难与粮食增价并驾齐驱。由是土地之利厚，而土地之兼并起。加以战时游资之流入农村，而兼并之风遂更甚。售地者为受战时经济影响，不能继续经营之半自耕农、小自耕农及坐食山崩之小地主；购地者则为因粮价上涨大发国难财之豪绅土劣及一般富商大贾与满载而归之落伍军人，政客，及其他特权阶级等等。由是土地逐渐趋于集中。”（见《中农月刊》二卷九、十期）

土 地 租 押 金 飞 涨

四川“农民争寻土地耕种，地主乘势大加押租与租谷……，且地主还附收“工作租”“高粱租”“豆租”等，名目甚多。他们是越来越富了。土地集中之风愈演愈烈。”（见三十一年七月二日《大公报》）

四川“省垣附近各县乡村，近来发生租佃纠纷案件颇多，纠纷起因为地主增收押金，往年每亩十元者，现竟加至五百元至六百元。如此，租种二三十亩的佃户，竟须付出一万元至二万元的押金，普通佃户如何有此负担能力？”（见三十一年八月十日《新蜀报》）

巴县“歇马场每年当新谷收获时，亲见佃户被迫将耕牛农具卖了，以补足老板的租谷，致全家大小沦为饿殍者，十中必有二三。近来地主又在加押佃。比地租谷是每田收谷一石，地主得七五，佃户得二五，本来已高得出奇，今又肆行加租，佃农懦弱，只得吞声饮泣，一任宰割。”（见《中国农民》二卷一、二期）

璧山“本年租佃纠纷特多，换佃者尤多……佃农手中无大量现金为押金者，即自此脱离土地，无田可耕。因此佃农生活之痛苦，目前已达于极点。”（见《大公报》三十年十一月四日）

内江地主“勒令佃农增加押金与钱租，此为全县普遍现象。据谓今年佃农实交之押金与钱租，已超过战前十倍以上，苟佃农租不如意，立有被辞退之虞，县属第三区自去年以来，佃农辞佃退田之情形极为普遍。”（见《中农月刊》二卷五期）

“重庆近郊退佃加租之风仍盛，若干区域中，地主愿出佃户押租原额之三倍至十倍之款而行退佃，另以高租转佃他人”。（见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公报》）

“近几年乡村中，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也相当大。由于土地的买进卖出，因换地主而换佃的事也就特别增多，地主因农产品的高涨而加租，也常常换租。因此佃农的流动性比过去要大得多。”（见《新华日报》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以四川而论，在二十六年每百户佃农中被地主退佃者为一二·一，二十八年为一四·五，到三十年则增为二一·七。”（见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公报》）

“多变的农村关系，也象四川多变的天气一样，曾经承佃了二代三代的老佃户，也得离开佃房和佃地“过户”到新佃主，或者“过户”到都市去、码头去、工厂去、失去锄头、笠帽、蓑衣，拾起了扁担、车柄。”（见《新华日报》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四川“为租佃而涉讼的纠纷，在今天的农村，成了一种最普遍的现象。此种现象尤以川南为甚，……许多地主们只顾自己，借口政府征购实物，一面加租，一面又要把租额收足。于是乎，某县近数月来为租佃兴讼的事，几占全县民事诉讼的十分之九。”（见《新华日报》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巴县“各地主召集佃农加租换约，例如去年十担租佃、二斗大豆，今年则加至十四担租谷、三斗大豆，并云轻租系为完纳战时捐款，佃农无何，泪涔涔向地主要求减轻，地主怒形于色谓：既不承认加租，最好另佃。但地主串通一气，因此酿成租佃纠纷。地主请乡（镇）长及保长代为调解，结果要佃农照加地主要求石数。”（《大公报》三十年七月二日）

“据作者今年夏秋在川西川北调查结果，曾以乡政为单位，征询当地调解委员会负责人与翻阅调解文卷，一月中共接受调解案件八十三起，而租佃纠纷即有六十九起，占总数百分之八十强，分析纠纷的内容，大多数发自地主，总不外换佃，加租，添押、减、扣等要求……这个问题不但在四川普遍发生，就是西北东南各省，也相当严重……租额和押金的提高，实予佃农以致命的打击，租额以四川为例……水稻区域普遍增加租额，最高加四分之一，押金增至一百两，旱地区域租额最高加三分之一，押金增至二十两。陕南与陇南大致同四川相差不远……西南东南各省除云南外，如广西、浙江、江西皆盛行分租制，多数提高一成，如原来主三佃七者，今则改为主四佃六；主五佃五者，今则改为主六佃四。押金亦随之提高一成至五

成……有些人实不堪重压，或遭受无理退佃而逃往城市，另谋生路……象甘肃的某部，佃农缴租施行五家或十家连坐法，一家不缴或缴纳不清，由连坐者负责平均偿付。这么一来，逼得全体逃奔，有人亲见张掖北部有些农家，因收成不足，无法付租，常有一二人发起疏通连坐者弃乡他去，任土地荒芜。”（见《大公报》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农民分化愈趋尖锐

“抗战后物价上涨，农场经营利润较厚，一部农人扩大农场面积，多用人工肥料，企图增加收益，但另一部农人，或因人工不足（抽征壮丁），或因资金周转不灵，反紧缩其农场企业。”（见《新经济》七卷三期）

据南雄某村之调查，由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富农由十二户增为十八户，贫农由三十五户增为四十二户，雇农由六户增为十户，只中农由四十户减为二十户。由此可见阶级分化之尖锐。（以上数字引自《新华日报》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又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会二十九年之调查，亦称：“调查本年内所用人工有较前增加者，有较前减少者……每单位面积施肥数量有较前增加者，有较前减少者。”（见《农业推广通讯》三卷四期）“但就大多数农民生产状况而论，如四川人力缺乏，肥料减少，近来的庄稼远不如前十年的收成。”（见《现代农民》四卷八期）“今年的庄稼比往年做得坏些，这种情形至少在重庆的附近一带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特别是麦子长得异常矮，颜色发黄，地上杂草很多。”（见《现代农民》三卷四期）“最近一年来，因为人工的稀少和昂贵，庄稼已经做得不及往年的精细，荒废及半荒废的田地，已经在渐渐的出现。”（见《现代农民》三卷十期）

杨铭崇先生调查四川三十县农产后称：“在所经之三十县内，有三分之二以上县份之农民，极感农工缺乏及其工资剧增之苦。因此遂形成田场经营方法粗放，及有一部分耕地面积荒废等现象。推其原因，则系各县抽征壮丁服兵役、筑公路、以及逃避兵役，前往都市谋生所致也……又如施肥锄草等之次数减少，病虫害虫等之疏于防治，均能影响作物之发育生长……。产量之总额颇有低落之趋势。”（见《农报》五卷七八九期）

高利贷重利盘剥

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第四号称：调查年（一九四一年内，四川各区农户平均每户每年总收入有一、四五四元，总支出为一、七九零元，入不敷出达三三六元。“据本调查十一县二一六农家之每家平均负债额有四一七点七元”。“农民所负债额中，新债占百分之八一点五，陈债占百分之一八点五。”

又该报告第七号称：“各地农村负债之农民比比皆是，其中尤以佃农为甚。际此农村经济不振，百物飞涨之时，告贷良非易事，无产佃农需款愈急，通融资金愈见困难，加以地主与营高利贷者交加剥削，贫富阶级相差日益悬殊，农村破产，农民流亡，曰为必然之现象。”

四川“自物价波动，把粮食作为商品囤积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以后，农村借贷成为非常困难的事，川西某县有所谓“场期钱”的，三天一场，每场一百元，扣除利息十元……利息之，大无法计算，但是借的人还是不少。”（见《新华日报》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打打利抬钱，月利高到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起初这还只流行在赌场中，但在今天已经逐渐的成为农民“急救散”了！”

“最近听到一件事，据说有个农民，在前年用田契为抵押品，向一绅士借了一笔钱。今年

他因有了一些积蓄，想去赎田，而为绅士所拒说，只要他的田，并不要他的钱。他告到县政府去，无钱无势的债户，怎能抵过绅士，他没奈何，只得在火车上大哭大喊，说是没有王法。债主在任何情形下总比债户有势力些，倘若凭势力来决定谁负货币贬值的损失，那当然是，“没有王法”，农民那里想占便宜。（见星期评论十七期）

福建临参会曾接到一封闽侯公民林吉农等人的请愿书，请求严禁农村高利贷，该请愿书说：“闽侯乡村土劣，竟乘抗战时期，巧立名目，重利盘剥乡民，有则一年之内予金竟逾母金数倍，有则月息达十余分，乡民因疾病婚丧及购买肥料种子，需款甚急，逼而饮鸠止渴此种藐视法令罔顾人情乘机抢掠，致使十室九空破产倾家，卖妻鬻子者，比比皆是，其惨状具不忍闻。”（见《中国农村》七卷五期）

经济剥削变本加厉

“今年川北天旱，据调查自耕农多半雇工人车水，以维持生产；而佃农则宁愿坐视田土龟裂，不闻不问，原因是胼手胝足，原状朝不保夕，若再雇工车水，徒然增重成本负担，将来虽有收获，终被地主吞食尽，与其徒耗钱财，不若报荒还合算些。”（《新蜀报》三十年八月十八日）

“象川北今年有一时期天久无雨呈旱象，许多临河的稻田秧苗，皆长至尺许，本可利用水车抽河水救济，但因纳租方法的限制，佃农均不愿雇工抽水，让绿的禾苗自然枯死。复次，年来四川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农业改进机关，大量推广优良稻种和肥料，佃农明知确系好东西，可以增加生产，然而因土地非己所有，出产尽属地主。所以大都袖手旁观不愿热烈的接受。还有四川仁寿县，民国二十八年治螟成绩是全省之冠，计采除卵块七、七一六、二九四块，采除虫蛾蛹一、五一四、八〇六个，动员农民学生几达十万人。共增产二万市石米谷。二十九年地主忽然借词稻产田内白穗减少，收成加多，命佃农自下年起每亩加租一市斗，佃农得悉后遂不加防治，反任螟虫猖獗，问他们为什么不治，都说“治了多收谷子，还是主人的，我们多化工夫白忙一场，这又何苦呢？”最后我们还在果树区域内尝受佃农拒绝防治之事，譬如去年往成渝路沿线利用松脂合剂，义务的为农民防治柑桔红蜡介壳虫，每到一个果园，皆有人出来禁止，他说：“这果园是属于主人的，好坏不与我们相干，你要打药水需要主人到场！”我们再三的解说，终归无效。眼看好好要结果的树子都被虫子侵蚀枯萎了”（见《大公报》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著者于二十九年十一月底在岳池县城附近考察，尚见有成熟之后迄未收割的稻谷，据说是因为二十九年夏季干旱太甚，稻秧分栽太迟，所以生长欠佳，不能有丰收的希望。在收稻以前，佃客向地主要求减少租谷，而地主不肯答应，于是两方意见僵持都不让步，地主既不减少租谷，佃客就不收割。因为收割后除交谷租外，佃客所得甚少。所以终致货弃于地，无人收割，真是可惜！”（见《经济建设季刊》一卷三期）

农民挣扎于饥饿死亡线上

以一九三七年农民购买力指数为一百，则一九四二年三月陕西降为六九，福建降为四五，青海降为六三，宁夏降为六六，广西降为八二，广东降为八一，湖南降为八六，贵州降为七九，四川降为八二，江西降为九二，甘肃降为九五，云南降为九八，只有湖北仍为一百，西康稍起出为一二六。（见《中国农民》二卷一、二期）

四川农民所得物价与所付物价增涨率相差甚远，倘以一九三七年指数为一百，则一九四一年农民所得物价指数仅为一·三八三，而所付物价指数却增至二·一三七，相差几达一倍。就是说，农民必须以二倍之农产品，才能换得他所需要的物品，或者他只能得到过去所需要物品的一半。（见《新经济》六卷五期）

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第七号称："农村中农民生活多属困苦，尤以佃农为甚……——以食而言，食为人类生活中不可一日或缺，佃农之食物多为本田场所出，如玉蜀黍、甜薯及米饭等，蔬菜甚少，肉类尤为鲜见。除偶遇年节及祭祀日一尝之外，常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感，平时用以下饭者，辣椒而已。养料缺乏，面黄饥瘦，体质自不健强，幼儿充饥稽类，逐逞大腹便便营养不良之态。若遇荒旱，田内无收，食物乏绝，则取所谓"观音土"为食。至言衣着：常以当地土布为限，制备一袭，直接破烂不能缝补时，方行抛弃。鞋袜更少穿着，全年恒赤脚着草鞋，棉褥一床经数十载，尝赖之以保温暖。"

一九四一年潘鸿声先生调查川北农家生活称："现今较好者多食面条或面饼，贫苦者仅以胡豆豌豆磨碎，调制成糊状充饥，每日一餐，常虞不继。时有乡镇市场或运输途中，发现妇孺抢粮情事，平时油类菜蔬亦多无法顾及，肉食更属罕见，对于体力营养实在谈不上。"（《农业推广通讯》三卷八期）

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南充县经济调查初步报告声称："一般农民之衣着，多属土布，资料粗劣，破烂则缝补之，补而又破。现乃褴褛不堪。小孩夏日裸体，冬日不免忍冻受寒，目前川内贫苦佃农添置更属不易，农家饮食非常简苦。粗粮拌藜　为通常农家之主要食料，稻米煮稀粥，为款待宾友之佳肴，肉食品乃为婚寿嫁娶过节度岁时用之……年来天气亢旱，收成不佳，且粮价高涨，多无力购买食米，多食红薯、杂粮。目前家中无颗粒存粮者甚多，故多用目前收获之×麦充饥，其较好者多磨碎作面，或用水调制成糊状充饥，其较苦者多磨豌豆及蚕豆粉，加菜水调制成糊状充饥，其余能食米者仅少数地主官府及商人，普通生活之枯竭可见一般矣。"

据一九四三年调查，福建农民"体格均较抗战以前稍差，推其原因，即所有农民久受生活压迫，多数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尤其闽北农民更甚。"（见《中国农村》八卷十一期）

云南罗平的农民，"比较好一些的能有玉蜀黍、洋芋、蚕豆吃，甚或能享有一顿米饭，或穿一套粗布衣，虽然那套是现身无法洗濯的。至于那些住在山间的夷人苗人　们，顶少只能吃洋芋和玉米，平常是吃葛粉或草叶，男的穿兽皮或树叶，棕编成衣。"（见《中国农村》八卷三期）

广西大藤摇山的农民，"饥饿和死亡成了他亲密的朋友，在这里，终年能吃到红薯的，那算是上等之家了！大多数是吃野菜和树皮度日的。我来到崇义乡六文屯的时候，赵德富一家六口，已经吃三天野菜了。在东北乡太平村时，村长对我畅谈松摇活活饿死的故事。"（见《中国农村》八卷十一期）

保甲长鱼肉农民出征壮丁妻室被奸　农民挺而走险

"保甲长人士不齐，派钱派物既无标准，又无定额，不免爱憎由人，各自为政，如现在的乡公所，有收卖契中资的，有提堰塘鱼产的，有责成农家替公家喂鸡鸭羊免的，有征收农民牛头捐的，有派捐建校经费的，有征发成林树木的，还有斗米运动捐，保甲受训费，警备费（有了保安队、自卫队和警察，还要警备班做什？）灯油费，种种苛杂，无一不派由人民负担，其他见闻未及的恐怕不只这几样。就是人民出了钱，恐怕连名目都记不清。尤其乡镇

派保长要加倍,保长派甲长又要加倍,甲长派人民更要加倍!”(见《现代农民》四卷五期)

本年军政部通令各地称:“据报称,出征将士家属虽有明令优待,而不肖保甲土豪劣绅奸其妻室,占其财产。鬻其子女,此种情况每有发现,而贫苦无知无力之人,为恶势力所欺压,隐痛而不敢言,使民众咸视征兵为畏途。”(见《贵州日报》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各地农村政役紊乱,弊端百出,懦弱者只好忍气吞声,而顽强者则抛弃农田,挺而走险,于是农田荒芜,无人耕种,这种事实到处可见。”(见《中国农村》八卷十一期)

四川彭县“平日地方土劣敲榨剥削,鱼肉乡民,以致人民负担最重,民脂民膏吸吮殆尽……盗贼众多,绑票抢劫之事时有所闻,治安方面颇感辣手。”(见《农林新报》三十四、五、六期)

“农村近年多‘匪患’,耕牛成为抢劫对象,即使有力购牛的农民,也怕购牛。因此耕牛成为农村中一个严重的问题。”(见《新华日报》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广西“去年十一月间,全县立智乡张姓地主与赵姓佃户聚众械斗,死伤数十人。”(见《中国农村》八卷三期)

(原载1943年8月30日《解放日报》标题和插题均有所改动——编者)

[附] 国民党政府经济情况日益恶化,企图靠借外债过日子的若干资料

(一) 蒋介石为乞讨美援给罗斯福的信

我已收到高思大使转来您最近给我的电报,我很高兴知道贵恙已告痊愈。我很感激您甚至于在病中仍对于中国经济问题在努力寻求解决的办法。

在我看来,贵财政部所作的提议,不是一个同盟国对于另一个同盟国的提议,而毋宁是属于商业来往性质的。这些提议如付实施,不会增加中国在作战中的经济力量,相反地,损害中国人民对于法币的信任,只会增加中国的经济困难。要不是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最危急的阶段,我也不致于向您提出这个紧急的呼吁。我对于本战区未来危急的经济情势,加以深思熟虑之后,得到以下的结论:

(一)美国无保留的贷款十亿美元,可以使我们应付一部分明年战时预算的短绌,并以相互援助的方式,应付美国在华军事费用的一部分,例如飞机场及必要的设备的修理和建筑,美国军队的给养,作战物资的运输等等。

(二)如果贵财政部认为不能接受上项建议,我提出美国在华军队的支出,应由美国政府负担。中国中央银行将照官定汇率,美元每元合法币二十元予以兑换。因为我们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对于法币的信念,所以汇率是不能变更的。在这个由于战事变化,处于不安定的世界中,人民对于法币的信念,是一个稳定的因素。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直接地维持法币的信用,间接地使中国免于经济崩溃。由于中国经济的崩溃致中国不能继续长时的抗战,将对于

同盟国军事的情势发生严重的影响。

第二个建议，便是彻底的援助，中国军民对此将甚为感激。想到美国对于英国和俄罗斯平民都在供给粮食，这个建议和同盟国统筹分配物资的策略是完全相符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我这里可以指出：在常德战役以后，那一区域中三十万所房舍化为废墟，只剩下不到十所的建筑物。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民自从七年前抗战开始后，曾遭受了不可估计的损失。我们军民在人力、物力上的损失，足以证明我们愿意尽我们的能力和所有的一切，来供献于同盟国的作战。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五十七师，已经全部牺牲。

在开罗和您会见时，我深切的钦佩您的卓见与智慧，您完全了解敝国所面对的危急局势，同时您很热心地要想给与我们的人民以一切实际的帮助，使我们能与美国人民并肩前进，走向共同的胜利。当时，我得到很大鼓励，立即昭告中国人民，一再保证我们联合作战的团结与力量。我至今仍确信，您以同盟国领袖的身份，必愿尽您的能力来帮助中国继续作战，使它在全球战争之中尽其完全之责任。我相信，您知道我愿意尽我的能力，号召全中国人民的支持，来期待早日的胜利，而且我甚至于迟延滇缅路的重开，使得主要海陆作战装备得以转移到欧洲战场去。此事使我各阶层同胞甚为失望，他们犹记得上次缅甸战役中，所遭遇的失败的伤痕。那次的战役，过错虽不在中国方面，而其结果中国损失了大量的装备及人员。

设使贵财政部认为以上二个建议均不能同意，那末，中国将被迫采取唯一可能的途径，那就是，以它一切所有的力量继续抵抗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直至它不能抵抗时为止，这样中国亦总算尽了联合国一员的责任。在那种情形下，中国对于它的战时财政经济只得听其自然。假使如此，中国政府将没有办法满足美国在华军队的需要，因此美国在华军队，必然依靠他们自己去执行他们任何的及所有的计划，而我们非常抱歉，将处于无法再作任何物质的及财政的协助，包括军用的建筑工程在内的境地。

（原载《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下卷）

（二）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举借外债的若干统计

（一九四四年底截止）

借款名称	数额	利息	年限	用途	担保
廿六年中英整理内债借款	20,000,000英镑	五厘	二十年	整理中国内债	关税
廿六年中英广梅铁路借款	3,000,000英镑	五厘	十五年	建筑铁路	铁路收入及盐税
廿六年浦信铁路借款	4,000,000英镑	五厘		建筑铁路	铁路收入及盐税
廿六年中法金融借款	100,000,000法郎	七厘二五		法币外汇准备	关税
廿六年中英滇缅铁路借款	10,000,000英镑	五厘二	十年	建筑铁路	英商务部出口信用局担保
廿六年中捷商业信用借款	10,000,000英镑	五厘	八年	购买工业用品	原料
廿七年中法桂滇铁路借款	150,000,000法郎	七厘	十二年	建筑铁路	铁路收入及盐税
廿七年中苏第一次易货借款	50,000,000美元	六厘七五		购买材料及建设机械	茶叶
廿七年中英商业信用借款	500,000英镑	四厘	八年	购买汽车、火车等物	由英政府担保（关税）

借款名称	数额	利息	年限	用途	担保
廿七年中法叙昆铁路借款	480,000,000法郎	七厘二五	十五年	建筑铁路	铁路收入及盐税
廿七年中美桐油借款	25,000,000美元	四厘四	五年	购买汽车火车等物	中国银行保证（桐油）
廿八年中苏第二次易货借款	50,000,000美元	七厘		购买材料及建设机器	茶叶
廿八年中英币制借款	3,000,000英镑	五厘	八年	维持法币稳定汇价	关税
廿八年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借款	5,000,000英镑	二厘七五	一年并得延长	法币平准基金	由英政府担保
廿八年中比铁路材料借款	20,000,000英镑			购买铁路材料	
廿八年中美信用借款	12,800,000美元	六厘二五	八年		
廿八年中美飞机公司借款	15,000,000美元	五厘	五年	购买飞机	
廿八年中德贸易借款	120,000,000法币	六厘	七年	购买工业品	中国以原料运德售价偿还
廿八年中法材料信用借款	1,500,000英镑	六厘	七年	购买铁路材料	
廿八年中英商品借款	3,000,000英镑	五厘	五年	购买货物	商品
廿九年中苏第三次易货借款	150,000,000美元			购买材料及建设机械	
廿九年中美滇锡借款	20,000,000美元	四厘	七年	购买农工产品	中国银行担保（锡）
廿九年中美钨砂借款	25,000,000美元	五厘二五	十年	支持中国外汇	钨砂
廿九年中美新信用借款	100,000,000美元	四厘八	十年	半数用作平准基金，半数购货	中国银行担保（桐油）
廿九年中英新信用借款	10,000,000英镑	六厘五	五年	半数用作平准基金，半数购货	矿产
廿九年中苏第四次易货借款	50,000,000美元			购买材料及建设机械	茶叶
卅年中美外汇平准基金借款	50,000,000美元			平准外汇	
卅年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借款	5,000,000英镑			平准外汇	
卅年中英信用借款	5,000,000英镑			增强财力	
卅一年中美财政借款	500,000,000美元			增强财力	
卅一年中英财政借款	50,000,000英镑			增强财力	
卅一年中苏第五次易货借款	6,385,800美元			购汽车及原料	
卅二、卅三两年度未成立新外债					

注释

一、本表所列外债"除三十一年国库收入外债债款150,000,000外，其余各项外债，均未列入国库账内……作预算以外的开支，以向各有关国家购买军需器材等"。共计折合43,790,000,000元法币（一九四四年底价）

二、总计借款：150,000,000镑，折合12,000,000,000元。1,047,800,000美元，折合29,560,000,000元。1,030,000,000法郎，折合1,030,000,000元。120,000,000法币，折合时价1,200,000,000元。

三、本表完全根据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出版之"三十一年下半年国内经济概况"一书。

（全表原文转录自三卷四期金融知识，刘明夫辑）

备考	本表原辑者是在一九四五年四、五月间统计到一九四四年底为止的材料，因之一九四五年就没有记载。编者在另一处材料上发觉抗战时期美贷蒋款共九次，总额1,247,800,000美元，而这个表所列美贷仅有八项，总额747,800,000美元，恰是少了一笔500,000,000美元整数的贷款。编者曾遍查报纸材料，也未查出此笔贷款之名称、用途等具体细目，只是贷款时间可以断定是在一九四五年四、五月以后到八一、五前这三四个月内，录此备考。（李石涵）

（转自李石涵编《从"七七"到"八一五"》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附] 抗战后期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对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危机的片断评述

"（乙）国民党与蒋委员长的地位是到了过去十年来最微弱无力的地步。

"中国面临着经济崩溃。这正促成着军队和政府统治机构的解体。这是增长中的政治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蒋委员长正在失掉中国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由于在暴力侵略之下的团结一致，在抗日战争的最初两年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力量。国内的弱点逐渐抬头，与统一背反的过程正在进行。

"一、士气低落，普遍沮丧。一般地感觉到没有希望。

"二、中央政府的权力在较大城市以外的地域，正在被削弱下去。政府命令和管制的措施不能执行，归于无效。政府征集充足的粮食以供养庞大的军队和官僚，已日益困难。

"三、政府的与军事的机构，自上至下，被空前庞大的与公开的贪污所浸沉败坏。

"四、知识分子和薪水阶级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最深，有解体之危险。学术团体不单受了经济压力的折磨与沮丧；若干年来政治的控制和压制，更夺去了学者们曾有的智慧的活力和曾享有的领导作用。

"五、农民对征兵、征税和其他强制性的捐税，到处都发生不满，并且这种不满在增长之中。危机一直在增长着，过去零星爆发的抢劫和农民的不安，或将扩大范围，并配合上政治的动机。

"六、各省地方集团相互间以及与其他不满的集团，正在通同一气，积极地加强他们的地位。地方集团力量的增长中央政府力量的削弱，这就强迫中央采取了对地方集团有利的新的政治妥协。

"七、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安在增长，如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少壮派将领阴谋"。在较高的阶层里，战区司令自己培植势力圈，这样就造成了"新军阀"。

"八、国共的嫌隙不独未见消除的征兆，反随时间而更趋严重，内战之不可避免已为一般所承认的了。

"九、国民党由于其自私的政策和拒不接受积极性的批评，正在失去人民的尊敬和支持。看来它已不能以新的血液自行更新，而它的不变的领导渐趋硬化，失去感受现实的能力。为打击党内有增无减的分裂和派系主义，这个领导转而倚重于反动而不受拥戴的陈氏兄弟的

一派系。

“一〇、蒋委员长自己也表现了类似的失掉对现实的弹性并僵化了窄狭保守的观念。他的日益增长中的自大狂，和他的想在做领袖的同时做“圣人”的不幸的企图——例如“中国之命运”和他的一本关于经济的书所表示的——使他丧失了许多在中国有无比的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他的尊敬。对他的独裁的批评已日益响亮。

“国民党在它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之前，渐渐不复为中国社会中团结和进步的力量，逐渐不成为它曾经扮演的并对现代中国有过最大贡献的角色。

“（丙）国民党不单无力自动扭转难局，相反的，其政策加深了危机。

“在中国有些对战争的疲倦感，这是一定能料到的。而国民党的政策，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冲击之下和内外弱点的显著现象之前，必须说是破产了。这种实况又因最近闭幕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之不能把握局势而加深。

“一、国内政治上，国民党的各首脑把培植自己的势力放在其他一切之上。结果遂致反动力量抬头。

“国民党依然不理会国内要求民主改革的巨大政治运动。从蒋委员长的文章和党报中看出他们对民主改革没有真正的了解。宪政依然是空洞的诺言，唯一的“准备”是半情不愿地企图建立一个不受欢迎和不民主的地方自治制度，这种制度以集体负责为基础，由于日本人已在满洲及其控制的区域内运用此种制度，故招人反感。〔译者注：谅系指当时的所谓参议会。〕

“民主的主义未来的根本问题，如宪法之形成，国民大会之选举，仍由国民党来指定。在言论自由和承认非国民党集团等基本条件方面，毫无进展。甚至连对于现有的、但是无能的参政会，赋与权力和民主的性质，使在教育上和政治意义上成为有利之举，也置之不理。

“国民党绝未表现有意于松驰其目前势力所依据的权力主义的统制。对为数众多、到处都有的各秘密警察组织、宪兵队等等警察国家的饰物，完全未加摈弃或减削，反而在继续加强，作为保持国内安全的最后一着。

“二、在经济战线上，国民党不愿采取任何有效步骤，制止通货膨胀，因为这会损害地主——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的。

“它对官吏公开贪污的增加应负有责任，公开贪污是任何合理地改正财政状况的主要的阻碍之一。它不曾做任何事情以制止大规模的暴利、囤积、投机——这一切都是那些党中有权势，或有密切的政治关系的人们所干的。

“它未能有效地动员物资。所宣布的那些战时统制法令，一直变成为无用的一纸具文，或是把应改正的问题搞得更严重——如物价管制条例，考虑既欠周全，又未能好好执行，即是一例。

“它消极地听任工业以及更其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降低，因为当着投机者囤积原料比把原料经过正常的生产过程更有利时，这是必然的。

除了规模非常有限的例外，它没有实行配给，也未能管制奢侈品的制造以及许多来自日占区的奢侈品的交易。它没有考虑到这些输入品大部是用对敌人有用的战略物资换来的。

“它没有作任何有效的努力，从地主商人过高的利润和收入这个来源上增加税收，以减低预算之不敷。它任令税收机构浸沉于贪污无能，以至于只能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征来的税款缴到政府。它继续耗用大宗的国库在不作事的、无用的国民党官僚政治上。

“至多，它消极地看着通货膨胀加剧，连象积极地抛售黄金外币等治标的办法都不去尝试。

“它不肯着手对中国基本的经济问题谋解决，诸如土地所有权的更加集中，苛刻的地租具有毁坏性的高利贷和通货膨胀的影响。

“（丁）国民党这些显然的自杀政策有其党的成分与性质的根源。

“鉴于上述的种种，应适切地考究以下的问题：为什么国民党失去了领导的力量；为什么它既不自行积极对日作战，也不全心全力地与在华美军合作；为什么它已不再能统一国家。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可在目前党的成分和性质中找到。一个经典和完整的美国的看法，更见得其正确性，即在政治上：国民党是一堆保守的政治派系，主要兴趣在保持自己的实力以排斥外人，而在他们自己人之间则争夺地位。在经济上，国民党狭隘的基础在于农村的豪绅地主和军阀，政府官僚中的上层分子，以及与政府中的官僚有密切联系的商业银行家。这个基础实际上是在战时形成的。国民党已不复如过去那样地得到中国实业家们的全力支持，这一集团因日本占领沿海城市，在经济上跟着也在政治上被削弱了。

“这段对国民党的描写，与上面提出问题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

“国民党失去了它的领导，是因为这民族经过了战争的实际经验，在政治上更其觉醒，对国民党的自私的缺点认识更多，而国民党已失去了接触和不能再代表这一个民族了。

“它不能有效地抗战，因为如果不能主要地信赖人民，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抗战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必须要象抗战初期那样,发动全国的力量。在目前状况下，只有改组国民党，以及进行更广泛的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方能实现。这种民主政治，采用任何方式，并不如真正接受民主的哲学思想和态度之为重要；外国侵略者的威胁，已经不再足以刺激中国人民，只有真正的改革，才能引起人民的热忱。不过，民主政治的发长，虽则是中国继续抗战的基础，但是在目前的国民党领袖们的心目之中，总认为足以危害国民党政权的基础的，因为民主政治的发长将意味着那些保守派系势必放弃他们紧握着垄断的特权。他们宁可使抗战继续象目前那样处于被动状态，而不愿如上述那样做去（展开民主政治）。这样，他们为了自私的目的，而在牺牲着中国民族的利益。

“由于同样的理由，国民党不愿与在中国的美军在作战努力上全心全意地合作。全面的合作，必须要求更广泛的中国方面的关于军事的努力，这既非国民党所能实现，也非它所可以促成的。此外，国民党深怕美国人若大规模地广泛地与中国的作战努力直接接触，则将暴露出它自己的不活动，以及由于美国人的榜样和个人接触，将发生一种启发的影响。”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谢伟思）

（转自《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卷　标题为编者所加）

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新华社延安二十一日电**〕延安观察家关于国内战局发表评论称：最近中国两个战场的军事情势，尖锐地揭破了国民党当局所谓“军令统一”的实质是什么。在完全由国民党统帅部所指挥的正面战场，自本月二日湘敌进陷常宁后之十二日间，先后失去湘桂路沿线的祁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资源、全县七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与侧翼邵阳，均已岌岌可危。同时期中，广东敌自西江与雷州半岛两路侵陷高明、四会、肇庆、开平、新兴、廉江六城。日前自道县南犯之敌，已窜抵湖南最南部之江华、永明。由西江北犯之敌，则已进陷广西之怀集、信都。两线相距已不满一百二十哩。此种日丧一城之可耻失败，即今日所谓“服从军令”之代价。当盟国在海上竭力准备进攻菲律宾与中国海岸，在陆空竭力加强滇缅运输与轰炸日寇占领区及基本土之际，重庆腐败无能的统帅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险与盟军的困难，而给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阵地与拖延失败的机会。盖西南战场失败的严重性，首先尚不在丧师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战略的结果。广西的危急，意味着与日寇可能由此而敲昆明甚至重庆之大门。另一方面，日寇所最畏忌的盟国空军，亦因湘桂形势的急速恶化而丧失了重要的阵地，且继续感受国民党恶劣军事指挥的危害。退一步说，敌人即使仅仅打通其横贯中国之交通线，并将中国切为两半，此对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胜计。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两次演说，没有一个字道及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或如何改变造成此危机之统帅部的方针与成分，徒然一再强调其阻碍抗战胜利的所谓军令统一。殊不知所谓军令统一一语，诚如参政员王云五、胡霖两氏所说，“原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只是用什么军令去统一，如必以今日失败主义的军令来统一全国，则无非欲全国军队均向过去的河南战事与现在的湘桂战事看齐，同归于尽，而后甘心。这种亡国心理除了帮助敌人，阻碍胜利与引向失败之外，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

试一返观被国民党诬为“不服从军令”的敌后战场，则情形完全相反。这个战场的人民军队，在八九两月中，连续获得了重要胜利。山东的八路军，在八月下半月与九月上半月中，连克五城，即旧黄河口的利津、乐陵、临邑，胶东半岛尖端的文登和山东东南部的沂水，山东西南部的郓城战役，解放村镇六百余，山东东南滨海区的反“扫荡”战役，歼灭伪军陈三坎一旅，尤与正面战场的日失一城成一极鲜明的对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许多胜利，如河北八路军攻克北平城北十六哩的高丽营，攻入北平东南的青云店与西南的长辛店，以及沧州、雄县、深泽的县城和易县、徐水的城关；活动于南京、上海、宁波三角地带的新四军，攻克南京西南十六哩的六郎桥，长江北岸的石庄、张黄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及南京长兴间的溧水、溧阳三城与宁波近郊，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亦攻入广州市郊的龙眼洞。仅就沂水、文登、郓城、长兴四次胜利统计，解放的国土即达一万四千方里，或约

一千五百方哩。由于敌后最近的连续胜利，中国解放区的人口总数已由八千六百万增至九千万以上。如果所谓军令，是要抗日，要胜利，即敌后战场实为执行抗战军令的模范。但是若国民党所提议的必须将这种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将收复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获的人枪送还敌伪五分之四，才叫做“服从军令”，则这种所谓军令也者不过是天皇陛下的走狗们所发的叛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军令，中国人民将起而惩治这些实际上的卖国贼，决不许其逍遥法外。

综观中国两个战场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战场的中心问题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党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才能阻止敌人前进，挽救国家危局。至于敌后战场的中心问题则是加强武装。在这里，完全应该按照共产党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胜战，国民党仅仅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败仗这种事实，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师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9月23日）

长沙失陷后的危机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解放日报》社论

长沙于十八日失守，据军委会宣布：“我军已达成消灭敌人之任务，即按预定计划作战略上之转进。”不论如何，继洛阳之后，不及一月，又一个省城失陷了，形势之严重，为抗战七年来所未有。

日寇进攻湖南，开始于上月底，五月廿七日敌由岳阳渡新墙河南犯，十日内即窜抵长沙近郊，敌寇暂置城垣不顾，续追南退之国军，相继占领平江、浏阳、宁乡、湘潭、株州、醴陵、湘乡诸城镇，然后于十七日攻击长沙城，第二日即被占领。就正面战场而论，这一次湖南战役和武汉失守以来的历次战役不同。过去几次战役，日本人称之为“活塞”战法，早去晚归，打一下又缩回。这一次湖南战役和河南战役一样，目的在消灭我野战军，占领交通要道，并进而压迫中国政府投降。所以，中国正面战场作战决不能仍和武汉失守后五年半以来，一切应付敌人“活塞”战法一样，只用招架政策，望其活塞之自拔。这一次敌人的目的是塞死这个抗战的瓶子。死塞来了，必须有打出一条活路的政策，计划与勇气，必须抛弃军事上的招架政策与唯武器论，必须改变政治上的独裁政策与反民主论，一句话，必须从根本上改弦更张，否则是危险的。

但是中国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他们的军事政治政策仍原封不动。对于军事的失败，他们说：是因为我军缺乏现代装备所致；政府发言人张平群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声明：“我们决易地而战，以待盟国能予我更多人力及武器之援助……”这些人在敌人进攻任何一处之初即高呼要新式武器，要飞机，而在任何一处溃败之后，亦将一切责任推之于盟国供应中国新式武器的不足。可是河南与湖南作战却最雄辩地驳倒了这套议论。在河南，我军以四十万兵力，对抗不足七万的敌军（一说只有四万）；汤恩伯的装备是超过一切所谓杂牌军的，可是只有武器较差的杂牌军（刘茂恩、孙蔚如、马法五等）坚决抵抗了敌人，汤恩伯统率的几个集团军都是不战而溃，损失廿余万，这里原因究竟在武器还是在什么呢？汤恩伯根本与河南人民对立，河南人说：“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河南人把汤恩伯和蝗虫并列。汤恩伯的军队内部，官兵完全脱节，兵是捉来的，平素挨打受骂，饥疲不堪，面无人色，临战一哄而散，全无斗志。请问这样的军队拿了新式武器有什么用处呢？

讲到敌人的新式武器，在河南还有一个第三战车师团，在湖南则并未使用这种师团。在湖南是水田交错，山岭重迭，在湖北还有湖川纵横，使用不上装甲武器，中央社报导也从未提及敌方坦克或装甲部队之活动。而我六、九两战区的国军，素称精锐，装备优良。敌人有大炮机枪，我军也有大炮机枪，敌人偶有飞机配合，我军也有盟军第十四机队之全力支持。在盟机积极活动下，敌寇完全谈不上有什么制空权。在武器方面，敌我无所轩轾；然而在兵

力对比上，则我军有数倍于敌军的绝对优势；此外三湘人民素富爱国的战斗传统，正如河南一样，如果在正确的发动人民依靠人民的政策下，其力量是无穷尽的。然而我们的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人士不愿这样做，不愿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去加强战争，却一口推在缺乏新式武器上面。这种唯武器论继续提倡下去，中国正面战场，只会继续糟糕。

很可痛心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主要是中央军，差不多丧失了战斗意志，这是国民党统治人士在五年半长时期内所主持的招架政策与反民主政策造成的恶果。现在，我们的军委会还在提倡“消耗”战略，这只会引起战斗意志之更加丧失。有眼睛的人都已看到，无论在豫在湘，所见的只是我军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消耗敌人是谈不上的，消耗自己倒是实在的。

国民党统治人士的这种消耗战略，似乎是在说欲以空间换时间。在抗战初期，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尚有理由可说，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幅员辽阔虽然是我国抗战的有利条件之一，毕竟是有其限度的。如果按照现在豫湘战役这样“日蹙国百里”的纪录，则全部国土所能换到的时间，将并不会有很多。根本的问题是时间对于国民党究竟有何用处？抗战以来，国民党以我国宝贵的国土连同这国土上的国民作赌注换来的时间也不少了，单从武汉失守算起，国民党所负担的正面战场进入相持状态不是已经五年半了么？请问这样长的时间究竟作了什么用途？不是好事一样未做，坏事则做了一大堆么？你们现在又要换时间，人民要问你们又将预备作什么用呢？

唯武器论也吧，消耗论也吧，一切都是空话，现在的危机，决不令这些遁辞，可以推得掉的，其中的真正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国民党统治人士的错误政策；这个政策，正如我们所屡次说过的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来招架，敌去袖手，而注其全力于防制人民、压迫民主与反对共产党。”这个政策，在漫长的五年半中顽固执着，贯彻于其一切党政军机构中。时至今日，敌人为了救死，改变其活塞战法，为死塞战法，向中国正面战场稍作有力的进攻，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种机构就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国民党政策若无根本改变，则前途的危险可以预见，战事必继续失败，野战军必更受损失，平汉粤汉两路必被敌人打通，苏皖浙闽粤赣诸省必将为敌切断，大后方的抗战基地必将大大缩小，兵源财源必将愈益困难，国际地位必将日益低落，各种危机必将日趋尖锐。

是时候了，国民党统治人士，应该想一想自己的根本政策，中国人民有权督促你们从速改弦更张，与民更始。

目前的危机完全是在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方面，其他一切都是有利的：盟军在西欧登陆，东西南三面夹击希特勒之势已成，德寇复亡在即，远东方面，盟军不仅突破了日寇在太平洋之外防线，且已进占其内防线中马里亚纳群岛之塞班岛；在中国则有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四十七万八路军新四军、二百万民兵的英勇奋战，雄峙屹立，敌寇无可奈何，且正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拖住绝大多数敌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诚恳地希望改善国共关系。在这种种有利条件之下，万事齐备，只缺一个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我们希望国民党有一个改变，并且要快。如何改变法？改消极抗战为积极抗战，改唯武器论为武器与人民相结合，改防制人民为依靠人民，改压迫民主为实行民主，改反对共产党为加强国共团结，改依赖外力打日本为以自己动手为主配合同盟国打日本。只有如此，才算从豫湘作战中取得了教训，才能打退敌人的新进攻，才能克服单单从国民党错误政策中产生的种种危机，才有配合盟国反攻的希望。

（原载 1944年6月24日《解放日报》）

豫湘战役为什么失败？

（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

《解放日报》社论

河南战役，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以四十万号称精锐之师，打不过五、六万的敌军，乃望风溃窜，丧师失地。豫战未已，湘战又作，长沙沦陷，衡阳被围，桂林韶关受到直接的威胁。日寇正以无间的时间、深入中国正面战场有间的空间。国民党某些统治人士，对于这一次的惨败，不惟不敢正视其惨败的政治、军事的原因，而谋所以挽救之道，而且企图把责任推在旁人的身上。譬如说盟国的援助不够，八路军新四军的配合不够等等。盟国援助问题自有盟国人士可以答复，至若八路军、新四军在最近期间究竟进行了一些什么战斗，这里却应该说明一下。

日寇这一次对河南的进攻，所使用的兵力虽然不过五六万人，但在我们国土上曾进行了四五个月的准备。例如将平汉铁路向南延伸到黄河北岸（过去只能到达新乡，而新乡到开封敌已修筑了铁路，可以连接平汉与陇海），跟着便限期赶修黄河铁路，从二月起便增调军队集中在华军队于各战略要地，并尽量的征调在华日侨入伍。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敌于二月间便禁止外侨在朝鲜、满洲、中国各地的旅行，同时拆卸在华北华中各铁路支线的铁轨枕木等器材，运集在新乡、开封、武汉、信阳等地，有计划的派出机群，轰炸我陕，豫、鄂、湘、浙、赣、闽、粤各省的机场。直到四月中旬，敌在豫东、豫北、晋南、鄂中及长江下游各地，分途集中。可见入春以来，敌寇在我们国土上所进行的各种军事准备，是有足够的材料，证明敌人将有进攻中国的行动。关于敌人的此种行动，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都已随时报告了军事委员会，但是敌军进攻的目标，究竟是进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或进攻正面战场的友军？抑或同时并举？在当时则不能肯定。

八路军新四军在这种情况下，用积极行动来破坏敌人进攻的准备，反对消极的等待敌人的进攻。因此，军事上破坏敌人的集中，破坏敌人的运输，消耗敌人的兵力，破坏敌人的后方；政治上争取伪军反正，宣传敌军反战，号召人民配合作战。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入春以来的行动方针，请看看我们怎样干的。

敌军要集结机动兵力，则不能不减少守备力量，有些据点不能不用伪军来代替。因此，破坏敌人集中的有效方法，就是发动对敌伪军的攻势。经过今春攻势的结果，我军攻克或一度攻入的县城有二十四座，攻克据点碉堡一万三千余处。这二十四个县城，就是热河之宁城（二月六日），豫北之林县（四月十一日）、内黄（五月六日）冀南之清丰（五月二十九日）、赵县（三月二十一日），鲁西之朝城（二月十日）、邱县（五月二十四日），冀中之高阳（五月二十一日）、武强（六月十日）、任邱（五月八日）、肃宁（五月十三日）、安

新（五月十日）、博野（四月六日）、晋县（三月十四日）、保定（五月十三日一度攻入）石家庄（二月十七日一度攻入），山西之太谷（二月二十一日）、榆社（三月二十九日）、武乡（二月二十八日）沁水（四月三十日）、方山（四月二十九日）、定襄（六月三日），冀东之昌黎（二月十四日）苏北之涟水（二月十五日）。

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条铁路上进行积极的破坏活动，在平汉线上曾攻占许多重要的车站，如石家庄车站、定县车站、方顺桥、清风店，沙河等车站；在陇海线上，曾攻克阿湖车站；在同蒲线上，曾攻克太谷车站；在德石铁路上，曾击克晋县车站；在平宁铁路上，曾攻克昌黎车站；在白晋铁路上，曾攻克子洪车站；同时在胶济路东段及同蒲路北段，进行大量的破坏。

为之剪除日寇的爪牙，歼灭敌伪的实力，我军曾向各地伪军进行坚决的进攻。在鲁中，消灭了伪军第三方面军吴逆化文部近万人；在鲁南，消灭了伪第十军荣逆子恒部千余人，毙伪第二师长刘逆国桢，俘伪团长宋奇思等五百余人；在滨海，消灭伪军朱逆信齐部千余人；在豫北平汉路西，消灭伪二十四集团军庞逆炳勳、孙逆殿英部千余人；在平汉路东陇海路北，消灭伪第二方面军孙逆良诚部三千余人；在冀东滦县卢龙地区，消灭伪治安军千余人。

华中战场上，我军在苏中进行了著名的车桥战役，消灭敌军一个大队，伪军千余；在陇海东段，我新四军黄师，四月份消灭敌伪二千余人，伪三十六师李逆实甫部全部被歼；在津浦路陇海路南三角地区，我新四军彭师，自三月下旬到五月上旬，一个半月内，向敌伪展开大攻势，消灭敌伪二千余人，恢复了广大的国土；在鄂中监利地区，我新四军李师消灭伪军饶逆子琪部五百余人。

为了摇撼敌人的后方，我八路军曾深入的挺进到热河中部，攻占宁城；我新四军曾迫进到南京近郊，给敌伪以打击。

由于我军之积极行动，给敌寇以破坏和牵制，于是引起敌寇对我进行残暴的“报复扫荡”一月上旬，敌千八百人“扫荡”北狱；一月上旬，敌千余“扫荡”晋西北八分区；一月敌千八百“扫荡”冀东；一月下旬敌千五百“扫荡”白洋淀地区；一月下旬，敌在太行进行了二千余人的“扫荡；二月上旬，敌两千“扫荡”北狱曲阳地区；二月间，敌在鲁西进行了八千余人的连续四次“扫荡”；二月下旬至三月，敌在苏北盐阜、淮海两区进行了三千余人、十余次的“扫荡”；三月下旬，敌在淮海区进行了七千余人的“扫荡”；三月中旬，敌在苏中进行了五千余人的“扫荡”；一月上旬，敌在苏南进行了四千余人的“扫荡”；二月上旬，敌在鄂中进行了千余人的“扫荡”；在冀中，敌于二月间进行了三千余人的连续二次的“扫荡”，四月上旬，敌二千人又连续“扫荡”两次；四月初，敌五千“扫荡”鲁中；四月下旬敌二千两次“扫荡”雁北；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敌在鲁中进行五千余人的“扫荡”；二月间，在热河中部承德赤峰地区进行了一万五千人的“扫荡”；五月，敌三千“扫荡”胶东；五月下旬，敌两千“扫荡”冀南；五月上旬，敌三千人“扫荡”平北区；五月间，敌两千人扫荡”太行；六月初，敌对淮南路西进行两千人的“扫荡”。以上较大“扫荡”中，敌寇所用兵力约十三万人，但均被我先后粉碎。总计八路军新四军在破坏敌寇进攻准备的各次作战中，自一月至五月二十五日，根据极不完备的材料，共作战一万四千余次，毙俘敌伪十三万余人，伪军反正六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五万六千余支，机枪六百五十余挺，各种炮一百九十余门，掷弹筒一百三十余个，攻克据点碉堡一万三千余处，破坏火车站十九处，火车三十七列，铁路二百五十余里，汽车四百五十余辆，公路一千四百余里，桥梁四百六十座。这就是

敌后战场今春以来我军破坏敌寇进攻准备的战况。

假使有人问到，敌后战场的作战对于正面战场有什么配合，那么我们从此次在河南作战的敌军不过五六万人的数目看来，以及从敌寇在敌后战场作战的兵力有十三万人的事实看来，则八路军新四军依然牵制敌人三分之二的兵力，这是第一。第二，第一、八战区蒋、汤胡总兵力四十万，第六、九战区陈诚、薛岳总兵力亦不下四十万，然而敌在中原作战仅用五六万兵力，而在湖南则使用到十万兵力，足见华北敌后有力的进攻，迫使敌寇无法用大力于河南；而华中方面，则因大部份是友军防区，新四军在江苏的距湖南战线太远，在皖鄂的又限于敌军友军的联合攻击，不能充分发挥战力，敌人遂能利用此种局面，抽调较多的兵力（虽然也只十万人）了。

但是，无论敌后如何牵制，八路军新四军既不能被允许到正面作战，正面战场的胜负就仍不能不决定于友军。譬如河南战场，敌人既因华北的牵制而只派了五六万人，我正面友军宜可以十当一了；不幸仍然不能作到这一步，以至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如果我们来检讨一下正面战场的友军，在同一时期内有些什么活动，便发生非常令人难于置信的许多事件。我一、八战区的长官们，在敌人着着准备进攻的面前（今年春季前后）竟做出许多倒行逆施的行为。例如：（一）河南情况日益紧张，蒋鼎文不唯不增兵河南，反从河南调走三个军回陕西参加反共。（二）敌在华北调动频繁，黄河防务吃紧之际，胡宗南反调走两个军入新疆，去反对少数民族、外蒙古与苏联。这种东入潼关西出玉门的“壮举”从抗日的观点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三）敌寇在郑州北面赶修铁桥，敌机已在沿河侦炸，蒋鼎文在洛阳则召开反共会议。（四）入春以来，河南前线吃紧，河南界首为作战要地，而一战区国军竟把界首划为与敌伪通商公开走私的市场，直到情况紧张，其高级长官们的敌情判断，还以为敌军进攻目标是在界首和周家口，其目的在劫夺财物。由此可见，该地的走私规模，何等浩大。既与敌伪公开的通商来往，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就要暴露军情，一方面就使军无斗志。（五）对敌作战必须动员民众参战，才能有力的打退敌人。河南连年灾荒，千百万哀黎，草根挖尽，易子而食；而河南省政府对田赋征实，苛捐杂税，丝毫未减汤恩伯在叶县无代价的圈占民田千余亩，大征民力，摊派钜款，仅叶县就摊派了七千多万，修筑官舍，大兴土木，河南民众，怨声四起。军队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军如寇仇·因此，战争一起，老百姓便起来缴军队的枪。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究竟是谁的责任，难道还不洞若观火么？这是河南的情形。湖南战场虽不完全一样，但其反人民是一致的，而华中的反共战争，则较华北还要更严重许多倍，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这里就不多说了。这就是敌寇准备进攻期间，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两种不同的活动。一方面是警惕的主动的积极进攻，打击敌伪，收复失地，解放人民，以破坏敌之进攻准备；一方面则对敌是麻木不仁，对共则积极反对，甚至勾结敌寇，鱼肉人民。可见当前战争的失败，应负责任的不是任何别人，而正是我们友党友军的统治人士自己。

抗战以来，我国战场即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我们友党的当局向世人宣布敌后战场不存在，对敌后战场不予任何接济，而且不断加以“剿伐”。但是不说以前的事，只在今年半年的抗战中，这两个战场的真实情况，不也就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么？这两个战场战力孰强？战志孰坚？指挥孰优？人民孰爱？已十分清楚。应当昭告天下：敌寇虽然是强弩之末，但是惟有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武力与民群相结合”者，才能击败之，这是七年血战所得的不可磨灭的结论。河南、湖南战局的失利，只能从这上面去寻找。要使得今后正面战场反败为胜，

也只有从这上面去想法，怨天尤人是无用的。惟有赶快彻底改变作风，切实加强团结，并且让八路军新四军开到敌人进攻的地方去，与人民与友军共同挽救西南与西北的大危机，才是正面战场的唯一生路。

（原载1944年7月8日《解放日报》）

[附] 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关于汤恩伯在河南战场狼狈溃退的质问案及何应钦之答复

询问案十。　王参政员普涵口头询问

关于河南战事失败由于缺乏作战精神并请处分作战不力人员由

（一）军事报告中对各次战役的检讨太注重军事物质的配备忽略部队作战的精神欲求争取最后胜利必须注重作战精神不可完全信赖物质河南此次战事失利由于士兵无作战精神不能说配备不好此点请何总长加以注意

（二）河南战事失败后对负责将领之处分仅撤职及革职留任远不如湖南战事失败将领处分之能得人民同情且始终未见明令发表希望有同样公平的处分以服人心而振士气

（三）军事报告曾说豫战失败由于军民不洽既系失败原因之一希望何总长以豫战为教训此后对于各战区军需物质实行统筹统支以期战区与后方人民负担公平

询问案十六　徐参政员炳昶询问

关于河南战役中军队作战不力由

全国人民不敢要求军队以劣势武器一定打胜仗但必须达成战至最后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任务而后已此次中原会战敌人四月底发动五月一日到禹县五月五日就到龙门四五百里路不过五天就到河南大平原是在豫东这一带虽非高山但系丘陵地带这样的地形敌人绕道而行还要过一条河竟如此很快到了龙门无怪河南同胞都说军队没有作战便走湖南将士如同河南一样我们真觉不堪设想河南战事责任谁负我们知道汤恩伯在禹县经营了三年可是汤恩伯离开禹县三天后敌人才到而且河南军民不合作何以致之何来向来兵役第一出粮第一河南人民对国家向来贡献很大现在不合作不是无因今天别说胜利在望以密支那腾冲的经验来看今后正极辛苦此种撤职留任之处分人民不能了解对于战事前途深为忧虑

询问案第十、十六（均系河南战事失败原因责任问题）并案答复

关于河南战事失败原因本人前天已经报告兹再行答复如下

查胜利之因素精神固极重要但现代作战装备之优劣亦不容忽视此次河南战事敌使用兵力在十万以上并利用河南平易地形及其后方运输补给之便利抽集从来所未有之强大机械化部队向我攻击故河南会战在本质上是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闪击战与国内其他战场情形显有不同敌人既系以强大之机械化部队向我闪击故在第一线被敌突破后敌即向前猛冲而我第一线部队反落在后致我沿线守备部队力量比较薄弱虽经节节拦击但未能阻止敌之前进实非不战而退惟此次会战战区指挥失当一部分部队之作战不力无可讳言前日应钦已经报告如蒋长官之撤职汤

恩伯之撤职留任军长马励武之撤职师长傅维藩团长王翰贺一持刘明之处死刑师长戴慕贞之撤职交军法讯办（其余应处分人员已令陈长官查办中）此即系处分负责人员之措施至于汤恩伯之予以撤职留任处分实以该方面部队之善后整理恢复战力等一切事宜尚责成其收拾主持且该员自抗战以来在南口漳河台儿庄诸后均著有战功为使其知有奋勉戴罪图功故始予以撤职留任处分此种情形统帅部已经充分考虑实系权衡轻重适应事实上之需要相信该员经此失败之后必能痛自淬励力图建功以赎前愆也又贵参政员对于官兵生活情形之关切吾人异常感佩关于官兵之待遇以及军需物资统筹补给之办法政府正积极研究改善中期使军民相安以符舆望

（资料第三十八册）

〔附〕趁国民党战场的新溃败美国向蒋介石提出控制中国军队指挥权的要求

（一九四四年七—八月）

使得罗斯福总统最感焦虑的，特别是华东军事情况的这种迅速瓦解。照他看来，解决这问题的第一步骤，即委派一个美国将军，去统率中国一切军队。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总统将下列通知给蒋委员长：

"现时存在于我意见中的危急情况，亟须委派一人，予以调度中国境内所有盟军武力，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权力……我正将史迪威将军提升为上将，我建议，请你急迫地予以考虑，将他自缅甸召回，在你指导下，统率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需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我觉得中国情况如此危殆，假若彻底和迅速应用的补救方法还不立刻实行，我们的共同目标将受到不幸的挫折。"

蒋委员长在原则上，赞成这个提议，但建议第一步应由罗斯福总统派一熟悉政治以及军事问题并得到总统完全信任的美国大员到重庆来，共策进行。七月十五日总统作下列的答复：

"得悉你在原则上赞成史迪威将军得在麾下全权统率中国军队而无阻碍，我很高兴……我正物色一位有远见和政治能力的私人代表，来与你合作……但在这期间，我再促请你采取一切步骤，使史迪威将军能在最短期内取得统率权的事情，先作准备。"

紧跟着这个通知，总统于八月十日又致另一个通知：

"我提议：赫尔利将军……在你处做我的私人代表……关于调整你与史迪威将军间的关系，他必将有很大的贡献。……"

总统又提议，纳尔逊先生偕同赫尔利将军来华，处理租借与其他经济事件。蒋委员长接受了这个提议。

八月二十三日总统又在下列通知中促请蒋委员长，任命史迪威将军，统率中国一切军队：

"你同意赫尔利将军和纳尔逊先生担任他们将为我们而做的重大使命，使我很高兴。现在派

到你那里的私人代表的人选既已决定，我想我们应即时进而采取军事情况所需要的积极步骤。我促请你采取适当处置，使史迪威将军可能于最短期内，在你领导下，统率中国部队……但我确信，赫尔利将军与史迪威将军间，对于你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必会有适当的了解。至于史迪威的任命，我如此热切地坚请，因为我感觉到，如果再耽搁的话，或许会太迟了，恐怕不能阻止一个军事的灾厄，那是对于中国以及为从速打倒日本的盟军计划都不利的。……我以为由史迪威将军统率下的军队，不应有限制，凡用以保卫中国和攻击日本的军队，均应由他指挥。当敌人压迫我们，可能造成灾厄时，拒绝任何一个能杀日本人者之助，是不合理的。……我确信，赫尔利将军在促进关系上将大有帮助，从而使史迪威将军易于行使统率并易于了解有关的政治问题……”

虽然在原则上，蒋委员长原先曾表示同意，但仍未使史迪威将军担任统率职责，而两人间的关系竟愈来愈坏。九月初期左右，军事形势已变得如此恶劣，总统觉得迫不得已，又致另一通知给蒋委员长：

“读到关于中国情况的最后报告后，海陆空三部参谋长和我都相信，在最近将来，你将面临我一向引为隐忧的灾厄……在最近数月，我曾一再促请你采取急切行动，遏止向中国和你逐步移近的灾厄。现在你既还未使史迪威将军统率中国一切军队，我们面临到华东一个险要区域的失陷，可能还会发生灾厄性的后果。”

（原载《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上卷，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共中央向敌后军民致贺电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

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战斗员们，游击队员与民兵们，在战斗中负伤患病的伤病员们，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们，全体抗日同胞们：

今天是中华民国33年的新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们的英勇斗争致敬意，并向你们祝贺新年！

抗战六年半的长时期间，你们始终站在祖国的最前线。一百万的敌伪军，一年几十次的“扫荡”，烧光杀光抢光的残酷毁灭，特务分子暗杀放毒告密的恐布，粮饷弹药的缺乏，许多地方还加上天灾，但是你们毫不动摇地站在最前线。你们在去年一年打了大小几千次的仗，打死五万以上的敌伪军，打退了常常几倍几十倍的敌人进攻，打垮与歼灭了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刘桂棠的主力，收复了许多的失地，许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是扩大了。许多地区，不但胜利地进行了对敌斗争，并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还进行了人民和部队的生产运动、救灾运动、防奸运动与干部的整风学习运动。你们这种艰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是古今中外所少见的；你们吸引了侵华敌人的大多数，牵制了向正面进攻的敌人，掩护了抗战的后方，保证了最后的胜利，你们的大功劳，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各国人民也已明白。你们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爱国军队的战士，不愧为中华民族的长城；有了你们，中国才有资格与苏美英等同盟国站在一起。

在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三次会议以后，欧洲第二战场很快就要开辟了，打倒希特勒解放全欧洲的胜利很快就要在英勇红军与英美盟军的一致行动下完全实现了，因此，我们中国人民打倒日寇的胜利，也就更加确定与更加逼近了。但是在同盟国对日总反攻之前，我们必然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困难，甚至是比前更大的困难。敌人必然要更加千方百计地来摧残你们，破坏你们，但是你们是不怕困难的！你们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的锻炼，你们已经学会了怎样和敌人作斗争，而且正在学习着怎样更好地斗争。六年半的教训，使你们知道取得一切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团结，首先是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八路军新四军知道人民是自己的母亲，在抗战中间，不但为人民抵抗敌人的进攻，而且掩护人民的耕种收获，帮助人民的转移和恢复被破坏的家园，尽力减轻人民的担负和保障人民在自己的根据地得到自由解放；人民也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自己的子弟，是自己的一家人，自愿供给军队的食粮，积极参加抗战的勤务，自动进行侦察和掩护工作，普遍组织民兵配合作战；因此，你们的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团结，也是古今中外所少见的。但是困难既然继续增加，你们的团结也就需要格外增强。在不休息的战斗中，一年过去，一年又开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战士，切实检查你们自己对人民的关系还有一些什么缺陷，还有一些什么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些吧！根据地的一切人民，也切实检查你们自己对抗日军队对抗属对抗战的一切工作还有一些什么可以做得更

好些吧！一切共产党员，动员起来，更好的团结全军全民，更好地把一切坚持根据地的力量组织起来吧！在你们的铁一般的团结之下，你们今年的对敌斗争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你们的生产运动一定会在胜利的对敌斗争下得到更好的发展，你们一定会清除奸细破坏分子，把根据地十倍百倍地巩固起来。

庆祝你们已经得到的胜利和今年将要得到的更大胜利！

中华民族胜利的旗帜——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1944年1月1日《解放日报》）

毛主席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谈国内外局势

毛主席致辞

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三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我们谨祝罗斯福总统、邱吉尔首相、斯大林元帅的健康！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

关于中国国内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历次文告及其报纸。今乘诸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

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问题与答复

诸位的问题可综合为三个：

第一个问题，关于国共谈判。谈判已进行了许久，但是今天还在谈判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其他今天还无可奉告。

第二个问题，关于第二战场。日前“解放日报”社论已说明是一个新阶段，我们不准备再发表宣言。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同盟国战争合作的发展，其总的性质，现在与过去比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1942年11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期，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的阶段。接着，北非与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洲

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情况虽然甚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要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种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以互相交换意见。我要说的，就是如此。

（原载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

[附] 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

弛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敌人。此项压力已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转自《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

[附]苏美英三国德黑兰会议公报及宣言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公　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一日，三个同盟强国的领袖——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和大不列颠首相邱吉尔的会议，在德黑兰举行。参与会议的审议的，苏联方面有外交人民委员长莫洛托夫和大元帅伏罗希洛夫；美利坚合众国方面有总统特别助手霍浦金斯，驻苏大使哈里曼，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美国海军总司令金氏将军上将，美国空军参谋长安诺德将军，美军供应部长索姆威尔将军，总统私人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美国驻苏军事代表团团长德安将军；大不列颠方面有外相艾登，驻苏大使卡尔，帝国参谋总长布鲁克将军，陆军大元帅狄尔，英海军参谋总长肯宁汉海军上将，英空军参谋长空军大元帅波多尔，陆军部大臣参谋长伊斯迈将军，大不列颠驻苏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泰尔将军。

会议通过了关于三个强国在对德作战中的一致行动以及关于战后合作的宣言，还有关于伊朗的宣言。宣言的全文已经公布。

宣　言

我们——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首相——在过去这四天中，已在我们盟邦伊朗的首都德黑兰聚会，已经拟定并且认可了我们的共同政策。

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

关于战争方面——我们的军事参谋曾参加我们的圆桌讨论，我们已经议定了关于将德军

消灭的计划。我们已就将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商得完全的协议。我们在这里达到的共同默契，保证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关于和平方面——我们确信：我们的和协，必将使和平成为一种永久的和平。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以及所有联合国家负有无上的责任，要创造一种和平，这和平必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

和我们的外交顾问在一起，我们曾检讨了将来的诸问题。我们将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和我们本国的人民一样，都是用全副心灵，抱着献身的精神，要消除暴政和奴役，压迫和苦难。我们一定要欢迎他们，听他们抉择，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人世间决没有一种力量能阻碍我们由陆上消灭德国陆军，由海中消灭他们的潜艇，并且从空中消灭他们的兵工厂。我们的进攻将是毫不留情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

从这些友谊的会议出发，我们怀着信心瞻望着那么一天，那时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过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残，而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他们自己的良心而生活。

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们成了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儿分手。

斯 大 林

罗 斯 福

邱 吉 尔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在德黑兰

（转自《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

中外记者参观团各位先生：

为应各位要求，并使各位便于研究目前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具体情形起见，我向各位做一个关于敌后战场军事情况的一般介绍。

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政府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明白，就连中国人也有很多不明白。我今天要说的，就是关于敌后战场的情形。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敌后战场上，坚持了七年之久，七年抗战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紧张，并且极其复杂、曲折的。假使某些先生们要求更深入的来了解敌后抗战的实际，我可以在另外的机会再和各位作一个共同研究，现在只做一个极其简单的介绍。我的介绍的范围是：多说现状，少说历史；多说军情，少涉及其他方面。

我的介绍分为四项，即：

(一)敌后战场的敌情；

(二)敌后战场的伪情；

(三)敌后战场的友情；

(四)敌后战场的我情。

现在来说敌后战场的敌情。

我们关于敌情的知识，还不很令人满意：一则敌军变动频繁，二则我们的侦察工作还不是很强的，对于敌军的番号、编制、装备、移动的时日和方向等，不免有某些地方不能做肯定的说法，要先向各位声明一下。

我想把今年三月份的敌情材料，即敌人以一部军队进攻豫湘以前的敌情材料，把那个时候的敌军态势，作为基本态势，加以说明，然后说到尔后的敌情变化。

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每一个战场，又分为几个抗日根据地。这三大敌后战场的敌情是和友军担任的正面战场的敌情互相联系的，故须从整个敌情中分析我军与友军分担抗击的情形。

根据我们今年三月份的材料，日寇在华兵力共有三十四个半师团，约五六〇、〇〇〇人。

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计有九个师团，八个独立旅团，两个独立骑兵旅团，合计为十四个师团，约二二〇、〇〇〇人。八路军抗击了一一·七五个师团，占华北敌军兵力百分之八十四强；友军仅抗击了二·二五个师团，占百分之十六弱。其分佈区如下：计第二十六师团

（师团长柴山），分佈于大同、归绥、灵邱、朔县地区；第五十五师团（师团长待查），河北徐水、定县段平汉沿线及冀中地区；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柳川悌），山东济南、新泰、泰安、寿张、邱县、平原、德州、惠民地区；第六十二师团（师团长石井，又讯清水天），山西榆次、盂县、阳泉、沁县、长治、晋城地区；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付昌德），北平、天津、古北口、定兴、易县地区；第一百一十师团（师团长林方太郎），河北新乐、邢台段平汉沿线及德石路西段；独立第一旅团（旅团长小松淇志雄），河北河南交界之沙河、淇县、大名地区；独立第二旅团（旅团长松甫丰一），察哈尔万全、阳泉、赤城、怀来及河北涞源地区；独立第三旅团（旅团长小垣）；山西忻县、五台、繁峙、宁武地区；独立第七旅团（旅团长吉川），胶济路西段两侧及清河地区；独立第八旅团（旅团长吉本峰太郎），冀东地区；独立第九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天津、德州段津浦沿线；宫上旅团（番号待查），山东济宁、滕县、临沂、莒县地区。

以上共六个师团，七个独立旅团，全部为八路军所抗击。

此外，第三十五师团（师团长坂西利八郎），开封、滑县、新乡、博爱地区，八路军与友军各抗击百分之五十；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长野义雄），晋南三角地带，八路军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第六十九师团（师团长三蒲），山西临汾、沁源、离石、岚县地区，八路军抗击百分之七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三十。独立第五旅团（旅团长吉田银），胶东半岛，八路军抗击百分之九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十；独立骑兵第一旅团（旅团长洼田武二郎），绥远包头、固阳地区，八路军抗击百分之二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八十；独立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小原一郎），河南山东交界永城、太康、民权、城武地区，八路军抗击百分之四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六十。

如果要问：你们抗击的百分数怎样得出来的呢？这是根据敌军联队分布态势及其活动范围来计算的。例如第三十七师团其有七个联队（三个步兵联队，四个特种联队），其中有百分之七十兵力，在风陵渡、运城、垣曲一带与友军隔河对峙；有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在浮山、翼城地区，对付我八路军。但是当着敌人对我太岳区进行季候“扫荡”的时候，那敌人（第三十七师团）所使用的兵力就比百分之三十的数目还要大。

以上是华北敌寇在今年三月以前的基本态势。

在华中敌军，计十六个师团约二六〇，〇〇〇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五十九点五（九·五个师团），友军抗击百分之四十点五（六·五个师团）。计第六师团（师团长神田正中），在武汉地区；第六十师团（师团长小林述七），上海、武进间京沪路沿线，及浙江嘉兴、长兴地区；第六十四师团（师团长船引正三），江苏溧水、溧阳、如皋、阜宁、宝应地区。以上三个师团，全部为新四军所抗击。

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大贺茂），南昌、九江、瑞昌、安义地区，全部为友军所抗击。

以下十二个师团为新四军及友军所共同抗击，计：第三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豫南信阳，湖北孝感、随县、礼山地区，新四军及友军各抗击百分之五十；第十三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鄂西沙市、沙洋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第二十一师团（师团长田中之一），南京及安徽合肥、蚌埠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八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二十；第二十二师团（师团长太田），浙江金华、兰溪、东阳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九十；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澄田涞四郎），宜昌、当阳、江陵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第四十师团（师团长未详），鄂南咸宁、通

山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六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四十；第五十八师团（师团长下野一霍），鄂中锺祥、云梦、沔阳、潜江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九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十；第六十一师团（师团长不详），皖南芜湖、宣城、广德线及芜湖至湖口沿江，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六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四十；第六十五师团（师团长川岛），徐州、东海、淮安、砀山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八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二十；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中山峙），湘北岳阳、鄂南蒲圻及沿江地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第七十师团（师团长西胁宪吉），杭甬铁路沿线，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四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六十；第一百一十六师团（师团长和尔吉隆），武昌鄂城间沿江两岸，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九十，友军抗击百分之十。

华南敌军约有三个半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四个半师团（八〇、〇〇〇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约抗击了一个师团，占百分之二十二；友军抗击三个半师团，占百分之七十八。计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廉地）之一个旅团及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在滇西腾冲地区；独立第十九旅团（旅团长松井贯一），在粤东潮汕地区；独立第二十二旅团（旅团长宋山），在雷州半岛；以上二个半师团，全部为友军抗击。以下两个师团，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与友军共同抗击，计：五十七师团（师团长中野莫光），广九沿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百分之七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三十。第一百〇四师团（师团长孤田彦一），广州、从化、三水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百分之三十，友军抗击百分之七十。此外尚有海南岛的全部敌人，均为共产党所抗击，未计算在内，因为电讯中断，目前敌军数目不明，估计有一个旅团。

以上是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国共两党军队抗敌的具体情形。我们抗击了敌人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友军抗击了敌人百分之三十五点五。

可是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以来，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兵力，向中国正面战场进攻。依现有材料来看，敌寇新增侵华兵力，已知番号者有十个师团，或者尚有一部份今天还不知番号的，总之至多不过十几个师团。同时，原来在华作战总兵力三十四个半师团中，三月后调往南洋一个师团（三十五师团）。因之，目前在华总兵力为四十三个半师团（滇西一个半师团在内），或者略多一些。

此次在中国新增加的已知番号的十个师团中，有四个半师团参加正面作战，即是：第二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九师团，坦克师团，坦克旅团；有五个半师团在敌后填防，即是：第四师团，第十三旅团，第十五旅团，新编第十师团，特务旅团（旅团长福冰），申板旅团，在石家庄的某师团，铃木旅团，山本源旅团。

在这一期间，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同时有调动：如第一一〇师团，第三十七师团，独立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共抽三个师团，移到正面战场。

但是，敌寇在华北所抽出的三个师团的兵力中，其第一一〇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在已为新编师团所接替；独立第七旅团原在胶济路西端，现为中板旅团所接替；第三十七旅团原在晋南三角地区，现为第六十九师团由晋中南移接替；其原第六十九师团临汾、汾阳等地防区，现由第十三旅团及特务旅团所接替；此外，第三十五师团他调后（似已调南洋），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地区防务已由铃木旅团及第四旅团所接替。这一地带的机动兵力并未减少，而仍保有一个机动旅团（第十五旅团——驻阳泉地区）。骑兵第四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砀山地区，现为伪军张岚峰所接替。

由此可见，敌寇在华北敌后战场，虽然抽走了一批兵力，但其防务同时又为新的兵团所接替。这决不是如外间某些人士所揣测的说是华北敌军抽调以后，已成一空地似的。那里担负在共产党八路军背上的兵力，仍和原来的情况相同。

应该指出：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前，日寇的主力是向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但在武汉失守以后，日寇改变了政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残酷的进攻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整整五年半时间，日寇对国民党只有几次战役性的进攻，并无战略性的进攻，大体都是早出晚归。在此时间内，国民党的政策则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走了，袖手旁观。这个政策，就是今天河南湖南战局所以失败的原因。此种情况，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所改变，使正面战场能够配合敌后战场的作战，而结束过去的那种完全不相配合的局面。

关于敌情的介绍，大致就是如此。

现在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伪情。

这里，我先要感到惭愧，因为中国七年抗战，一面是全国绝大多数军民在庄严神圣的抗战与牺牲，一面又有一部份人，而且是不小的一部份人，卑鄙无耻的投降与作伪，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耻辱，必须予以洗雪。可是今天的伪军在敌后战场已有七十八万之多（伪警察、伪民团还不在内），成为中国抗战不可忽视的一个大敌。所以值得介绍一下。

中国伪军在一九三三年冬长城抗战的时候，就有所谓李守信、王英两部伪军（李守信是国民党骑兵第九旅的团长，王英是绥西地方武装），这是抗战以前的老伪军，现约二万人。

抗战初期，平津沦陷，齐燮元起来组织靖安自治军，当时仅四个连，到一九三八年发展到五个团，直到现在，有十二个集团军，辖三十六个步兵团，共约六万余人。

自汪精卫投降以后，华中伪军开始大发展，如李长江、杨仲华两部四万国民党军队，改变旗帜，整个投降。但是伪军的猛烈发展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抗战营垒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六十七人之多。

中国有这样多的伪军，各位也许会惊讶起来，可是这完全是事实。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会有这样多的军队投降？原因当然是可以找到的。在找原因时，或者有人要说：一九四二年那时候的形势，有：

（1）日本在南洋正在得势；

（2）苏德战场的红军还未转入进攻；

（3）日本对华采用所谓“新政策”，因为日本正有事于南洋，感觉兵力不足，乃强化汪政权代管敌后，又提倡南北合流及渝宁合流等口号。

是的，这些确是那时的情形，但是这些并不能作为大批中国军队投降的真正原因。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原因呢？

我们认为完全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不团结、不民主与赏罚颠倒，对全国军民投下一个巨大的暗影，动摇了颇大一部分军民的胜利信心。如果不指出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同在敌后，同样困难，共产党能够支持，绝无叛军，国民党则不能支持，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叛军。

关于我们政府与我们统帅部赏罚颠倒一事，只要指出一件事就明白了：山西的决死队和华中的新四军，自始至终是英勇抗战的，但是这两部分军队，却曾被我们的统帅部在派遣大军袭击，并杀死与俘去成万的官兵，又下令通缉与审判其首长，以后便宣佈他们为“叛军”；但是，国民党军队真正叛变了几十万，将级军官达六十七名之多，其中最著名者如庞炳勳、

孙殿英、孙良诚、夏楚中、公秉藩、陈孝强、吴化文、李长江、王劲哉等都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我们的政府及统帅部却不审判，不讨伐，不宣佈为叛军，反而和他们勾结，给予任务，要他们去进攻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游击队。请你们看看，这是怎样一种颠倒过来的赏罚呵！抗日者有罪，叛国者无罚，请问怎能振奋士气，又怎能叫人心服呢？

一九四三年冬，汪逆宣佈南北伪军统一指挥。将全国伪军重新编制，并加以整练。经过此次编整以后，全国伪军有了比较完整的系统。

总的说来，全国伪军可分为伪正规军及伪地方军。伪正规军的数量约有三十八万多，伪地方军约有四十万，共计全国伪军约有七十八万人，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二是由国民党军队投敌的，有百分之三十八是敌伪强拉壮丁，收编土匪、流氓编成的。此外尚有许多伪民团、警察，没有计算在内，如果一并计入，当达九十万以上。

这许多伪军在敌后起了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许多伪军为敌人负担了什么任务呢？大概说来是：

（1）配合“扫荡”；

（2）守备据点；

（3）进行清乡；

（4）补充缺额。

前三项是众所周知的。最后一项，例如敌第三十七师团自一九四三年春季以来，补充三批伪军：第一批三百余人；第二批由石家庄补充来一、五〇〇人；第三批由介休补充三千人。而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对付共产党的。

你们看，昔日的“友军”，现在倒转枪头打自己的同胞了。

根据我们对敌伪斗争的经验，证明由国民党投降的伪军反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是特别坚决的。例如孙良诚在冀鲁豫，庞炳勳在豫北，吴化文在山东，都是明证。伪军中有许多人是继续受了我们统帅部的命令，加紧进攻共产党的。例如庞炳勳、孙殿英就有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及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人员经常联络，授与反共命令。而庞炳勳在投降敌人发表叛国宣言，并被日本同盟社公佈于世以后，我们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先生，还向中央社发表谈话，称赞庞为“谋国忠诚”的人物。因此敌后伪军的大量增加，对我们坚持敌后战场及准备反攻的事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所以今天特别需要把敌后伪军情形，作一个简单介绍，唤起大家注意。

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起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

所有伪军，几乎全部都压在共产党身上，国民党是不打伪军的。只有极少数伪军，因为那里没有共产党的军队，例如在南昌附近及杭州附近之伪军，不应算入中共抗击的范围之内，但是也不能算入国民党抗击的范围之内，因为国民党是不打伪军的。

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之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担负抗击的仅占百分之十六，即不足六分之一。三月以后，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军队来华，

向河南、湖南、广东的正面战场进攻，两党分担的比重起了一个变化。但增至这三省举行进攻的部队，最多不过十几个师团，这个变化，也不算很大。

至若敌后战场以及一部分正面战场的友军和我军的关系，抗战初期还能配合作战，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以后即集中力量对中共磨擦。曾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其中只有一九四三年七月间的一次（胡宗南将军调动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因为中外舆论干涉，未爆发战争；其余两次，均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使用的兵力均近十万。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四月，在山西进攻决死队（阎锡山长官所属的部队，亦称新军）与在太行山进攻八路军。第二次，是一九四一年，在安徽进攻新四军。此外，小的或中等规模的军事磨擦，则从未间断过。即如目前山西的中条山（阎锡山长官所部），湖北的鄂东、鄂西、鄂南，安徽的皖中、皖东、皖南，浙江的东面，广东的广九沿线（以上均国民党所部），我们的友军无日不在剿共战争中。这种抗日战争中的国内战争，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四年半（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反共高潮算起）。我们曾在自卫斗争中，获得了我们各级统帅部及国民党的成千件的反共或剿共的命令训令。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把这些文件公佈于世，是因为我们始终抱着期待我们的友党友军自动地改变态度，停止国内战争，改善国共关系的心理。尽人皆知，不停止一切国内战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国要配合盟国反攻日寇，是异常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至于正面战场友军之所以大部分丧失战斗力与在敌人进攻面前表示束手无策，例如蒋鼎文将军、汤恩伯将军与胡宗南将军的数十万军队，在河南不超过七万敌人的进攻面前，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其原因，完全在于政治上反对人民，反对民主，反对共产党，外交上依赖友邦作战与依赖友邦接济，而全不振奋精神，自己动手之故。我们的友党——国民党的方针，拿几句话来概括，就是厉行专制，压迫民主，抗日依赖别人（国际依赖英美，国内依赖共产党），自己保存实力，准备铲除异己。假如这种方针不变，中国不但不能反攻，就连保存现状也是不可能的。

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时期的统计，华北约有八十万，华中约有二十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今天还在敌后的，只有三部分地方性的军队，他们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地求得自己的存在：这就是山东的赵保元、张里元及山西阎锡山长官在三个月前才由晋西南派到晋东南去进攻决死队与八路军的第六十一军，这三部分总共不过二万至三万人。

最后，要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形。

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红军。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在陕北会合时，计有官兵八万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乃奉统帅部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只承认四万五千人，发表了三个师的番号（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即开赴华北参加抗战。

新四军的前身，也是国内战争时的红军游击队，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奉统帅部命令，集中于皖南、江北两地，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辖四个支队，计有一万二千人，在华中参加抗战。

华南的中共部队，一部分是内战时期的红军改编的（海南岛），一部分是抗战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组成的（广州附近）。

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都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中共

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宣布的共赴国难宣言，他们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创立民主抗日根据地，每一由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土，都由人民选举抗日地方政府（在中国境内，只有这一种政府是真正合法的，因为它们是由人民选举，不是由党派委任的）、执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自卫军民兵游击队、发展生产、肃清汉奸等项政策，其特点就是密切的依靠人民，军队与人民痛痒相关，党政军民结合一体，向着敌伪展开进攻与防御的猛烈战斗。因为这个原故，所以他们能够战胜敌伪无数次的进攻，在毫无接济困难万分的条件下，能够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战场至七年之久。

大体说来，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期间，日本人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以其主力向正面进攻，而以第二等力量在敌后打击共产党。但自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由于中共在敌后战场展开了猛烈的战斗，日本人就改变了他的战争政策，轻视国民党，重视共产党，对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进攻共产党。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二两年，这种进攻达到非常残酷的程度，敌人的"扫荡"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治安强化"政策都是这个期间达到最高峰。其结果，我们的军队缩小了，根据地缩小了，人口由一万万降到五千万。一九四三年以来，敌人进攻的残酷虽仍是有加无已，但是我党、我军及敌后人民，却从这种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了，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正确政策（三三制、土地政策、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整顿三风、拥政爱民、发展生产、肃清特务、发展民兵等），终于打退了敌人的一切进攻。因此，一九四三年到现在，情况又好转了，军队又有四十七万，民兵有了二百余万，根据地又扩大了，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六百万，并且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我们曾经担负抗击敌伪兵力六分之五以上，经过了外间所不能想象的困苦艰难，然而什么敌人、什么困难也不曾压倒我们。

中共七年来的抗战史，几个钟头是说不完的。现在把七年来我军作战的几种重要统计分别的说一说。

以下是八路军各周年的战绩统计：

项别 \ 数目 \ 周年		第一周年 1937.9至38.5	第二周年 1938.6至39.5	第三周年 1939.6至40.5	第四周年 1940.6至41.5	第五周年 1941.6至42.5	第六周年 1942.6至43.5	第七周年 1943.6至44.5	总计
大小战斗(次)		638	2,051	6,936	6,152	12,221	22,735	23,327	74,060
毙伤俘敌伪军	毙伤敌军	34,007	31,083	64,355	50,257	50,306	55,673	65,432	351,113
	毙伤伪军	3,704	15,430	23,475	21,581	33,526	62,405	79,831	239,952
	俘日军	124	385	689	326	284	296	303	2,407
	俘伪军	2,094	7,521	15,338	15,355	17,914	31,161	59,343	148,726
	日军投诚			19	12	16	23	45	115
	伪军反正	1,366	17,935	9,180	5,178	4,306	4,728	6,948	49,641
缴获主要武器	长短枪	6,699	14,569	37,666	24,017	16,858	38,542	50,677	189,028
	轻重机枪	192	291	651	519	362	479	626	3,120
	各种炮	25	61	119	104	29	46	105	489
我军伤亡	负伤指战员	8,107	31,031	32,175	38,384	40,813	18,107	17,976	186,593
	阵亡指战员	4,432	15,048	17,012	21,348	23,034	11,378	10,934	103,186
敌伪与我伤亡比较		3：1	1：1	1.8：1	1.2：1	1.3：1	4：1	5：1	2：1

注：我阵亡指战员总数中，阵亡团以上干部四〇九名。

从这一统计表看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抗战，其战斗次数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的，这是第一。

第二，是对敌军作战，毙伤数字较大，而俘虏数字较小；对伪军作战，则俘虏较多，毙伤较少。

第三，可以看出日军投诚的事，在抗战最初两年是没有的，第三周年以后，则逐渐增加，可见我们对敌军的政治工作是收到了效果的。

第四，就敌伪与我伤亡比较的变迁来看，中间虽有波动，但自一九四二年以后，我军经过精简整训，战斗力比战争初期是大大提高了，由三比一进至五比一了。

第五，从缴获敌军的武器来看，可以看到我军在第五周年度（即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至四二年上半年），战斗是非常艰苦的，就是说，战斗次数很多，而缴获率则比第四周年减少了。

在华中方面的新四军，他们七年抗战的经过情形，大体上与八路军差不多。

下面就是新四军七年来各周年的战绩表：

项别 \ 数目 \ 周年		第一周年至第四周年 1938.5至1941.5	第五周年 1941.6至1942.5	第六周年 1942.6至1943.5	第七周年 1943.6至1944.5	总计
大小战斗		4,967	2,427	4,822	5,318	17,531
毙伤俘敌伪	毙伤敌伪	124,252	24,512	39,879	53,107	241,750
	俘虏敌伪	5,392	5,458	9,923	13,642	34,415
	敌伪投诚反正		4,825	7,921	11,320	24,066
缴获主要武器	长短枪	48,※48	13,870	28,574	53,967	124,459
	轻重机枪	1,644	301	330	376	2,651
	各种炮	60	8	12	20	100
我军伤亡	负伤指战员	36,637	10,856	8,412	9,015	64,920
	阵亡指战员	22,448	6,745	7,617	8,058	44,868
敌伪与我伤亡比较		2.1：1	1.4：1	2.5：1	3.1：1	2.2：1

※〔原文此处缺字，数字有误，按总计数推算，似应为四八，〇四八——编者〕

注：我军阵亡指战员总数中，阵亡团以上干部一四六名。

在毙伤敌人的项下应当特别指出：中共抗战七年来击毙日军之将校，根据极不完全的统计材料，计有五十五名，其中有日军中将一名，少将八名，大佐十九名，中佐二十名，少佐七名。

关于缴获武器方面，也应当指出：若将八路军、新四军所缴获的长短枪总计起来，则我军七年抗战的结果，缴获了长短枪三十二万枝以上（其中一部分是日军的，大部分是伪军的）。若按照我军人与枪的比例为五比三计算起来，光是长短枪就可以武装五十四万多人，缴获轻重机关枪及大小炮，还不算在内。但是这些武器有一部分是残破不全不能再用的。现在八路

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的武器来源有三：一是原有的；二是缴获敌伪的；三是民间武装，由人民自动组织游击队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但是我军武器弹药依然非常不够，国民政府从抗战开始即不给以必需的接济，一九四一年以后，更无只枪颗弹文钱粒米之接济，希望同盟国设法给以援助，以利配合作战。我们军队因缺乏优良武器，缺乏子弹，缺乏医药设备，而无辜死亡的人数是非常之多的。

敌后七年抗战的经验还证明，如果不组织民兵，武装民兵，训练民兵，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则敌后的长期坚持是不能设想的。

我军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的各根据地上，对民兵的建设，曾用了很大的力量，到今天止，我们敌后的民兵，已有二百多万。除华南尚无统计外，华北、华中的民兵分佈如下表：

华北		华中	
晋察冀	630,000	苏中	130,000
晋冀豫	320,000	淮南	55,000
冀鲁豫	80,000	苏北	85,000
山东	500,000	淮北	70,000
晋绥	50,000	鄂豫皖	150,000
		苏南	25,000
		皖中	25,000
		浙东	10,000
合计	1,580,000	合计	550,000
总计	2,130,000		

民兵以外，八路军新四军的正规部队及游击部队，是逐年增加的。广大敌后战场，受日寇压迫的人民，不得不武装起来进行残酷的战争，他们开始组成游击队，后来编入八路军及新四军，又复组成新的游击队。所以敌后战场的军制：是正规军、游击队与民兵三者的互相配合。有了这三者的互相配合，任何强大的敌人也无法摧毁我们。我们的友党，不愿发动民众组织民兵及游击队，单靠正规军作战，纪律又很坏，如鱼失水，如鸟失气，所以不能胜敌。兹将八路军新四军历史发展情形列表如下：

年代	八路军	新四军	合计
1937年	80,000	12,000	92,000
1938年	156,700	25,000	181,700
1939年	270,000	50,000	320,000
1940年	400,000	100,000	500,000
1941年	305,000	135,000	440,000
1942年	340,000	110,960	450,960
1943年	339,000	125,892	464,892
1944年	320,800	153,676	474,476

（正规军游击队均在内）

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我军在一九四〇年曾达到五十万，但在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年减少了，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又向上涨，至今保持四十七万多，特别是战斗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要把民族敌人打出去，并配合同盟国反攻日寇，八路军新四军还应该壮大。一部分国民党朋友把我们这种壮大抗战军队，诬称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讲这种话，实在是缺乏民族思想的表现。现在应该不是削弱八路军新四军，也不是设起种种方法去阻止它发展，而是极力扶植它，接济它，壮大它，使它更能担负配合盟军作战，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当着正面战场发生严重危机的今天，每一个具有充分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是应该有这种要求的。

我们的战绩表上，已指出七年抗战中俘虏日军与日军投诚的数目。八路军二、五二二名（这中间包括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冀东游击部队［包森支队］在遵化地区所俘的敌寇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随员六人），新四军五〇〇多名，关于这些俘虏的处置，我们的政策是：（一）送回日军去，起瓦解作用；（二）送交统帅部处置；（三）留在我军训练成为敌军工作的战士。

关于送回日军去的政策，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有重大作用的。我们的政策是不杀害俘虏，给予他们以兄弟般的待遇，听其自愿的去留，同时，又对他们进行不疲倦的反法西斯的政治教育，大胆地放他们回去，愿留下的则留下，这对于削弱敌军的战斗意志，有极大作用。

在这个政策下，我军俘虏日军的数目，年有增加，日军投诚的数目，亦年有增加。日军中反战厌战运动的生长，决不是偶然的事。这一件工作，即所谓敌军工作，我们的日本战友，首先是日本人民领袖冈野进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日军俘虏除大部分送回日军者外，由延安送去西安的俘虏数目：

一九三九年		一四人
一九四〇年		二人
一九四一年		三人
一九四二年		〇
一九四三年	第一次	一三人
	第二次	一〇人
合　　计		四二人

又由太行送往大后方去的数目，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共二十八人。此外，新四军在抗战头三年亦送往大后方若干人，尚未计算在内。

现在留在华北、华中我军内的俘虏数目（其中大部分现在是日人解放联盟盟员）如下表：

地　区		日人总数	其中盟员数
延　安		七六人	七五人
晋西北		七人	七人
晋察冀	晋察冀	二〇人	一六人
	冀　中	九人	七人
冀鲁豫	冀　南	一七人	一五人
	冀鲁豫	一五人	一三人

地区		日人总数	其中盟员数
晋冀豫	太行	三六人	二九人
	太岳	一四人	一一人
山东	滨海	一九人	一五人
	鲁中	一一人	九人
	鲁南	八人	七人
	清河	八人	六人
	胶东	一六人	一三人
以上华北合计:		二五六人	二二三人
华中(新四军)			
	四处	六六人	六六人
以上华北、华中总计:		三二二人	二八九人

应当特别指出：在这些盟员中，有原在日军的军医中尉山田一郎，现在晋东南我军中做医务工作；原在日军的步兵少尉山光美，现在我军中任步兵炮教员；另有中岛透江荣甫，在我军中任技术教员。他们均积极负责，热心工作。

我们很惭愧，由于我军的装备低劣，接济毫无，未能更多的俘虏敌人。但是我们拥有三百万大军、又得到盟邦大量金钱武器接济的友党，在整个抗战期间，他们俘虏敌人的数目，不管我们的统帅部如何夸大其词，实际上是比我们要少的，这可以将现存的俘虏一个一个去点验。他们没有敌军工作，更没有将俘虏送回去的事。他们缴获敌军枪炮的数目少于我们，俘虏敌军的数目也少于我们，教育俘虏变成反对敌人的斗士，则实际上完全没有。即如此次河南作战，以四十万大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三部分军队在河南境内者，再加五战区派至豫南增援的一部军队）对付七万日军，作战两个月（自四月十七日算起），据我们所知，不但一个俘虏兵、一枝枪、一门炮也没有缴获，反而丧地四十余县，丧军近三十万（其中大部分溃散，一部分被俘），大部分枪械被丢弃（据传仅是步枪就有十五万枝以上，其中有许多是友邦援助的），全部第一战区的粮、弹、枪、炮存储丢光。但是有些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不打日本人，专作所谓“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事。请你们看看，究竟谁人不打日本人，谁人破坏了抗战，危害了国家呢？

抗战以来，我军死伤数目，八路军近二十九万，新四军近十一万，两军合计，死和伤将近四十万人。其中阵亡团级以上干部，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八路军四〇九名，新四军一四六名。

我军在抗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国际的朋友。下面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国际友人牺牲于战争中者：

职别	姓名	籍贯
医生	诺尔曼·白求恩	加拿大
同	柯棣华	印度
太平洋学会	希伯	德国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	寺泽吉藏	日本

职别	姓名	籍贯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	令野（名不详）	日本
同	安藤清	日本秋蒲县
同	浅野清	形山县
同	黑田嗣	琦玉县
同	铃木（名不详）	兵库县
同	松野觉	广岛县
同	大野静夫	长野县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孙一峰	朝鲜平安道
同	王贤淳	同
同	韩清道	忠清道
同	朴吉东	京畿道
同	石　正	广尚道
同	陈光华	平安道
同	胡维伯	广尚道
同	金学武	咸镜道
同	金巴伦	平安道
同	文明哲	金罗道
同	韩乐山	忠清道
同	崔指南	平安道
同	李镛寅	同
同	金永信	同
同	吴　均	江原道
同	林　平	忠清道
同	韩　震	金畿道
同	金明华	平安道

说到这里，我联想到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许多援助，我全体军民是感奋不尽的。

在武器方面：我盟国帮助我们国家的东西，我们并不清楚，只是在抗战初期，统帅部曾经发给过我们一二〇挺轻机枪，六门反坦克小炮，据说是苏联的军火，可是除此以外，我们未曾得到统帅部的任何武器接济。弹药接济也自一九四〇年停止了。

在医药及器材方面：我们前后得到不少盟国团体及友人捐来的医药器材，可是还有一〇一箱药品被国民党扣在三原，至今没有收到。这两年幸有中国保卫大同盟捐来一些药品器材（其数目分配另有清单），虽然距我们需要很远，但我们很感谢盟邦朋友的援助和孙夫人领导的“中保”的热心和关切。

在运输方面：八路军前后收到摩托卡车一辆，救护车四辆，载重车四辆。新四军因原来军部在皖南，于一九四一年一月被统帅部派兵围攻，军长叶挺被俘，文件被劫，该军所得国际援助数目，已不明白。

在人力方面：我军得到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等六人，美国的

马海德大夫，奥国的夫赖大夫、罗生特大夫，苏联的阿洛夫大夫，英国的林迈可教授、班威廉教授，德国的记者希伯及米勒大夫等人，他们对我军的帮助是很多的。至于日本友人冈野进同志及其统率下的大批日本干部，则对于我军进行瓦解敌军及号召日本侨民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其成绩非常之大。华北朝鲜独立同盟自武亭同志以下的大批人员，在这方面，也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情形，当抗战初期，为了保卫黄河北段数百里的河防，巩固西北后方，曾经统帅部批准留下一部分部队在边区，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指挥这些部队。到抗战中期，敌后根据地逐渐被分割，大兵团集中作战，已极困难，为适应战争形势与减轻人民负担，我军曾进行了一次精兵简政。许多精简出来的人员，大部分在敌后转入生产，一部分调来边区学习，或参加部队，或参加生产。尔后国内政治情况一天一天更坏，边区的包围封锁更厉害，内战危机经过三次的大紧张，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我们是必须保卫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调了一部分军队（如王震旅）来边区。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作用，就是保卫河防与保卫被胡宗南将军五十万大军包围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然至今天为止，边区军队的数目不超过五万人。拿胡宗南将军和我们比较，是十个与一个的比例。现在敌军进攻河南，迫近陕西，我们的这点留守部队，除河防守兵及治安保卫外，很愿意和胡宗南将军的部队一同开赴豫陕前线去打敌人。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我们的统帅部允许边区的几万军队，开上豫陕前线，并给我们以充分发动民众配合作战的权力，而无友军友党从旁牵制、反对、袭击或截断后路的情事发生，是有把握停止敌人进攻，并把失地收复回来的。

现在说一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这是敌后坚持抗战的基本问题。没有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样残酷、严重与广大的敌后战场是不可能坚持的。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一面和敌人作浴血的战斗，一面又和根据地的人民一道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亦即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建设。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包含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艰苦工作。在这一方面，我不多说，我只说一说敌后各根据地的轮廓。

华北敌后战场，我们建立了几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东至青岛与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山海关和锦州，北至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西至黄河，南至陇海线，包括华北七省（晋、冀、察、鲁、绥、热、辽），东西长二千二百华里，南北长一千八百华里。有政令所及的人民五千多万，占全华北一万万人口百分之五十一；其中有组织的群众一千六百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一百五十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在这个区域内，共有五个大军区，即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每一个大军区内，又有几个至十几个小军区，我们名曰军分区。

华中敌后战场，我们的新四军建立了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江、浙、皖、鄂、豫、湘六省地区。包含政令所及的人口三千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百分之五十；有组织的民众九百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五十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一·七。在这个区域内，共有八个军区，即苏中军区，苏北军区，淮北军区，淮南军区，皖中军区，鄂豫皖军区，苏南军区，浙东军区。每一个大军区又各有几个小军区，同华北一样的。

华南敌后战场有两处，一在海南岛，该处是内战时期的红军根据地，抗战后改为该地抗日军，领导者为冯白驹同志，国民党部队早已撤退，该岛完全是我军与敌军斗争着。近年因电讯中断，详情不明，然从敌军消息方面，得知该岛大部为我军收复，敌人无可奈何。一在广九路沿线及广州四周，领导者曾生同志。该部现已迫近九龙，并在香港进行秘密活动，敌人很感头痛。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如果没有这些敌后战场的英勇斗争，中国的情形是不能设想的。日寇欲以华北为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欲在华中、华南搜括［刮］人力与资财，这一目的是被中共七年来坚决的、广泛的斗争基本上打塌了，在人力、棉花、煤铁与粮食的搜括［刮］上，敌人受到我军的很大打击。这件工作，不但对于中国有利，对于我们共同作战的盟邦，也是有利的。但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却被国民党统治人士诬之为“奸党”“奸军”“奸区”，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派遣军队进行攻击、包围与封锁，派遣成千的特务进行破坏工作，断绝一切接济，并遮断国际朋友对我们的援助，封锁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与民主建设的消息，不使国内人民与国际友人明白真相。所有这一切，实在是不利于抗战与不利于团结的。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出来。

关于中共抗战情况的一般介绍，今天就很简略地说到这里为止。至于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人民所以战胜日寇的政治方针，政治工作，战略战术，军队训练，经济工作，后方勤务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内容丰富，有许多适合情况出奇制胜的创造，连日本人都说“达到神奇的境地”，但不是短时所能尽述，只好待之另外的机会。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附］敌后抗日根据地介绍

百炼成钢的晋察冀边区

（敌后抗日根据地介绍之一）

孙　元　范

晋察冀边区大部处于山西与河北，此外还包括热、察、辽的南部。它是华北三大主要山区（北狱、太行、山东）之一，不仅可依靠北狱来支持平原，挺进东北，而且可以直接地西与晋绥（同蒲路为界）我军，南与太行、冀南（德石与正太两铁路为界）我军，东南方面与山东我军，取得配合与互相支援。这个区域共有一百〇八县，二千五百万人口，包括三个伪

政权：伪满、伪蒙和伪华北政委会。我们抗日政权，在北嶽、冀中、平北、冀热辽四个独立行政区域下，设有十六个专署，共管辖一百〇八县（其中有许多新设县治，除阜平一城数年苦战仍在我手外，其余县城均为敌所占），和一千八百三十多万人民。敌伪用于此区的兵力，据今年统计，有敌军九万人，伪华北治安军（及伪地方军）、伪满军、伪蒙军十万人，敌伪军共十九万人。敌伪建立据点已达四千六百余处，公路二万七千余公里，封锁沟四千四百余公里，封锁墙四百一十余公里。但尽管如此，敌人各重要铁路干线（平汉、津浦、同蒲之北段，以及平绥、北宁、平热、德石、正太等）和战略要点（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大同、万全、承德等），七年来仍无日不处于我严重威胁下。现在晋察冀和华北其他各地区一样，已经渡过了四一、四二年最困难最严重的阶段，而进入日渐恢复与扩大的新时期。北线我军已挺进至察哈尔的多伦、热河的宁城、辽宁的锦州一带。

晋察冀边区之能雄峙敌后，日益巩固和扩大，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他的代价，是无法统计的劳力、苦难、牺牲和血！现在就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斗争的岁月吧。

建立的开端

八路军七七事变后出发时，毛泽东同志给予如下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游击战，在敌后牵制敌人，建立根据地，这样正面才能支持。因此就准备派一部兵力挺进燕山山脉，深入敌后。但刚一出动，南口就失守了。随着接到军委会的命令，前往蔚县阻敌，途中蔚县又丢了。二战区又命赶到飞狐口（涞源与蔚县之间）阻敌，但师至太原，飞狐口又丢了。这时，敌人已全面逼近山西北部的国防工事，正拟突破平型关、雁门关。于是一一五师就迂迴敌后，阻止南下敌人，九月廿五日在平型关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娘子关、太原、忻口形势吃紧时，八路军急往驰援，总部率我军主力，星夜离开五台南下。这一师的副师长兼政委的聂荣臻同志，十月廿三日受命留守五台地区，创立第一个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根据地，所有的兵力是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和不完整的两个连，共二千人左右。十一月七日，以聂荣臻同志为首，奉朱彭总副司令之命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晋察冀三省边陲地带，这时处在极端混乱状态中。已熟的禾黍无人收割，平汉线上无数的难民逃至山村小镇，大军沿着铁道公路向南飞跑，大炮、机枪、步枪到处丢弃，旧政权瓦解，土匪蜂起，几个日本浪人拿着日章旗，就可以随意占领县城。然而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继续多久。那两千人的队伍旋风一样向前推进，独立团很快成了威震雁北察南一带的杨支队，骑兵营打开了冀西的游击区，政工干部组成的工作团，带着一连兵力，到处打击敌人。徒手的群众队伍被带去打扫战场，被抛弃的枪弹重新找到了它们最适当的主人。人民的情绪在逐渐好转着。但严重的问题是老百姓并没有从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如阜平的穷人还没有吃树叶的权利（树是地主的），于是地主与饥饿的农民被邀来一起谈判，农民才有了采树叶的权利。这样战地动员委员会的组织在边区每一个村落掀起了动员热潮，游击队、义勇军、自卫军蓬蓬勃勃生长起来。动委会又暂时执行了政权的任务，认真地实行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停征田赋，废除了苛捐杂税，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实行合理负担。但这还只是过渡的办法，组织起来的武装要打仗、要吃饭（十二月中北嶽四个军分区就有了一万二千多武装），三省的人民要互通有无，平汉路东西两侧的人民要求打成一片，大家渴望着一切有统一的办法。这时候只有晋东北政治主任宋劭文和盂县县长胡仁奎在坚持政权工作，他们时常和聂司令见面，都赞成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权机构。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开民国历史上新纪元的边区军

政民代表大会揭幕于阜平城，边区行政委员会的组织和人选，随即得到蒋委员长和行政院的批准。抗日的新秩序不两月就普遍建立起来了。

冀中方面，大军南撤之时，吕正操同志带领两个营向敌人后方挺进，摧毁了深泽、安国、任邱、河间、献县、安新、高阳等地的伪组织，三八年四月一日成立了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后改行署），山地与平原从此便联结起来。三九年一月一二〇师的主力曾进入冀中，进行了有名的河间歼灭战，帮助了平原游击战的展开（一二〇师主力，后经过北狱区参加了陈庄、黄土岭等战役，于晋西事变时返回晋西北）。同年六月，宋邓支队挺进平北冀东，七月九日在李运昌等同志领导下，爆发了冀东七县的抗日大起义，在十七个县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十月以后受到一些挫折。三九年春萧克同志到平西组织挺进军，继续开展平北冀东的游击战，冀东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劳军运动，丰玉一县募集子弹十九万发，蓟县捐枪二百余支，妇女和儿童几乎每人都捐赠一件礼物。辽阔的冀热辽边的抗日根据地从此建立起来。

第一次反围攻胜利

三八年春，敌人一个联队来打涞源，我们新建立的部队就转到紫荆关到涞源交通线的两翼，不断袭击敌人的运输给养，将涞源孤立起来，于是敌人驻扎了一个礼拜，懊恼地撤走了。为了配合津浦、晋南正面的战役，二月的一个夜晚，我们在平汉与津浦线上展开大破袭战，攻克望都、新乐、定县、清风店等城站，好几县的群众都参加了破路和搬运战利品。这是平型关以后的大胜利。为了进行"报复"，敌人调集了一万二千以上的兵力，四路向军区进攻，曲阳一路有五千多人，以飞机十多架掩护，配合千余骑兵，用猛烈炮火，向阜平扑来。一个黄昏，敌人从正面逼近了阜平的东郊。城内各机关和老百姓都按照指定的方向徐徐撤退，天快黑了，聂司令向最后离城的老乡说："我们暂时离开这里了。现在这是一座空城，我们不能让敌人得到半点东西。"敌人在野外停留了一夜，大炮向空城轰击到天明，第二天上午才进占阜平，但他们不敢继续深入，因为后路被切断了，其他各路配合的形势也已经完全被打破了，当天夜间敌人就慌忙退出了这座空城，分三路跑步逃奔一百多里，我们的追击部队，从两侧夹攻，猛追到曲阳地界，敌人只得爬上汽车再次逃跑。

游击战猛烈地展开着。游击队一直出现于北平的四郊，敌人吓得把城门都关了起来。敌寇汉奸的报纸于是战慄地叫喊："日军大举围攻武汉之际，肆意猖獗于晋北、察南、冀东等地……之共产军，总窠穴乃在山西省北部高峰之五台山附近，各地皆属支蔓。近益扰乱内长城线，威胁北京。……日军决心一面围攻武汉，一面进剿五台。"

敌人改变了战术，新的围攻与反围攻的战役开始了。九月二十日，八路敌人，五万兵力，向五台区域围攻。我们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对抗敌人的围攻，使敌人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战线，而常于扑空之余，遭我痛击。于是从盂县出发深入到五台的敌人被我打垮了，阵亡了一个清水少将，敌人还抬棺"凯旋"五台城。不久，我们就进行了战役的全面反攻，敌人共损失三千多人。关于这次战役，当时英政府曾来电问我外交部，外长王宠惠答称：我军仍在华北敌后坚持，五台山根据地依然屹立。

"变落后村庄为进步村庄"

敌人第一次围攻边区，我们是胜利了；但同时也暴露出我们的许多弱点：一年来我们的工作还不十分深入，许多区村政权仍为少数人把持，村长副中有许多流氓地痞，公正人士都

还不愿出来负责。在敌人的围攻中，大部份的村政权都塌台了。因此我们就提出“把山沟小道落后的村庄变为进步的村庄”的口号，号召各村组织救亡室或民革室，以发扬民主，协助村政，同时着手改革村政权：将区划小，取消编村，取消旧的家长包办的邻闾制，建立村代表会与村公所各委员会，热烈地开展村选运动。在反围攻以前，由于多年受压迫，老百姓对民主参政是没有兴趣的。区村政权改造后，老百姓懂得了：“还是民主好，大家的事大家办。”“咱们选好人当村长，能替咱们办事。”三八年村选中，选民仅占公民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而四〇年大选中，选民与公民之比平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心地区之县（如平山、灵寿等）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游击区的选举，成为团结一切抗日人民的群众运动。抗日民主政府的机构，由去年一月的边区参议会最后完成。政府人员精简百分之五十，工作效率反而提高，“统一累进税”的实施，是政权组织工作中一个最大的成就，所有边区的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一种极公平合理而又管理得很好的税制。村政权的干部一律不脱离生产，七年来无休息地艰苦工作。例如某庄村联席会主席女干部郝秀金，她那村子处于敌人三面包围，离堡垒只半里路，历年反“扫荡”反蚕食都是她领导群众转移，摧毁伪组织。去年敌人突然占领了这个村庄，到了黑夜里，天下着大雨，她还领着民兵冲进去，抢出了几万斤公粮，第二天又独自爬回村内带出文件。但是七年来，他们牺牲被捕的数目也是非常之大的，手头只有前五年（四二年止）的一个材料：据已知的有三千七八百个区以上的干部光荣的牺牲或被捕了。村级干部当更不止此数。牺牲的干部中，无一不是可歌可泣的民族好儿女。徐水县长刘萍同志，当他被敌包围后，用枪打死了几个敌人；最后他要自杀，枪弹已尽，因而被俘。敌寇汉奸先则利诱，继则加以无法形容的酷刑，刘县长却不曾有一个字的口供，他愤怒地宣布了敌寇的罪状。他绝食十天，光荣殉国。

大水灾的考验

与实际斗争相结合的民主运动，提高了群众觉悟性与组织性。因此我们经得起第一次大考验——三九年夏的大水灾。

三九年七月，淫雨为灾，河川泛滥，敌人在冀中决破了四处河堤，万里洪波，造成了数十年来边区未有的大灾。被毁良田不下十七万顷，被冲粮食不下六十万石，淹没的村庄一万多（冀中占六七五二村），人畜的伤亡也极严重。灾民三百万，到处闻哭声！可是我们有一切力量克服水灾给予我们的困难。四〇年春，政府贷款三百万元，赈济一百余万元，种子借贷四七六七石（北狱廿县），耕畜补充牛六九二一头（十四个县）……所有劳动力都参加了修滩组织。根据北狱区不完整的统计，水灾前廿一县原有滩地一七〇、四二七亩，冲毁了一四七、六二六亩，修复一三九、四九五亩。边区子弟兵全体动员，日夜帮助人民修滩，挖大渠、背石头，他们还每天节省些小米给老乡们吃。总计他们帮助修滩一一〇、〇〇〇亩，助帮春耕一八一、二七八亩，开渠一五〇道（可浇地十万亩），掘井一六〇眼。难怪阜平的老乡一看到沙河沿岸的麦秀稻秧，便念念不忘的说道：“多亏教导团，不然卅年也修不起来。”冀中区敌寇决口一百八十五处，因而救灾中心就是治水，总计四〇年全冀中军民共修险工五九处，筑堤三三条（长五二八里），堵决口一九七处，浚河九道（长一六五里），这些都是民国以来少有的大水利工程。因此冀中不但克服了三九年大水灾的灾害，并且得到四〇年的丰收。

除开敌人扩大制造的天灾之外，边区军民还经历另一种灾难。武汉失守后，反共逆流开

始增长，三八年冬，当敌寇大举进攻冀中的时候，张荫梧乘机到冀中"收复失地"，要"消灭八路军"，称八路军三纵队为"伪抗日军"。柴恩波在反"扫荡"中投敌公开当了汉奸，而张荫梧反谓柴逆为"曲线救国"。这种亲痛仇快的行为，一直继续到三九年夏，演出残杀抗日干部进攻抗日武装的悲痛事件。三九年十月，山西保安十区的白志沂率部包围广灵、灵邱县府，残杀抗日干部。涞源敌人攻陷走马驿，灵邱敌人进扰南山，我军正迎头痛击敌人之际，白志沂竟包抄我后路，终使敌寇乘机"扫荡"，大烧大杀，予雁北根据地以莫大损失。而白志沂却在敌"扫荡"中逃跑了。

百团大战之后

三八年敌人八路围攻失败后，三九年敌寇采取单刀直入，以相当优势兵力，一路深入袭击我中心地区（如灵寿之陈庄及涞源之黄土岭等役），结果为我造成大好歼灭战的机会。敌寇进攻陈庄的一个大队全部被消灭了。黄土岭之役，第一天敌人的一个大队遭我伏击，第二天旅团长阿部中将又亲自带一个大队出动"报复"，打了两天一晚，阿部随其部下葬身于黄土岭荒凉的山丘。敌人哭丧着脸说："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经过这些打击之后，敌寇不敢孤军深入了。四〇年起，敌人大量印发我们出的一些书籍，对我游击战及十年国内战争作全面研究。敌一一〇师团长桑木崇明建议普遍采用"碉堡政策"，实行所谓"极端分散配备"，以图控制平原各大村镇与山地各要点，想窒死我军。百团大战的时候，敌人的据点被拔掉了，铁路被猛烈破坏了。冀中的自卫队一夜之间将汽车路全部破坏。正太线动员了两万多民兵，编成五十个大队。

冀东曾动员八万多民众，把敌人在七八个县内的公路电线，破坏得干干净净，在封锁遵化县城二十五天中，城内敌人因燃料缺乏，把门窗都拆毁烧了，最后并托伪组织人员，愿出款十余万元，要求我们解除封锁。

百团大战之役，使敌人狼狈不堪，认识了我之力量所在。于是重新加修堡垒工事（用山炮试验是否能打入），改变战术，彻底实行三光政策，企图毁灭我人力、物力、财力。从此我根据地进入了最残酷最严重的坚持斗争的阶段。

一九四一年八月，敌酋冈村经过长期准备，对北岳实施所谓"铁壁包围"战术（纵深配备，各路挺进，层层紧缩围困，图歼灭我主力）。七万大军直扑边区，山沟小道无所不至，施用了最残酷的三光政策。"扫荡"两月，我虽遭受很大损失（被烧房屋十五万余间，损失粮食五千八百万斤，牲畜一万余头，被惨杀人民四千五百余人，被抓去东北作苦工同胞一万七千余，牺牲与被捕干部六百多人……）但冈村不能不自认失败，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时间所能奏效"。这以后，又强调"高度之分散配备"，到处筑碉立堡，挖沟打墙，堡垒之密，几至各村都有（据点周围与铁路公路两旁，有多至七层的封锁沟与墙，主要的道沟，宽深各二丈，有的且引河水灌入）。对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初则步步推进，计不得售，又以大军举行局部"扫荡"，以达其大块蚕食的目的（四二年晋冀中的"扫荡"即属此种性质）。同时又进行"总力战"的"治强运动"，制造"无人区"，集注全力于人力物力的掠夺毁灭，与进行可笑的"思想战"。四二年一年中，全边区单是我无辜同胞之被惨杀、毒打、被捕、奸污者，为数当在十万人以上。我军民一方面展开反蚕食反"扫荡"的尖锐斗争，虽一村一镇、一个山头、一道溪流、一亩地、一斗粮，敌寇想取得，都要付重大代价。（四二年五月，敌寇"扫荡"冀中，为争夺藁无县一个北候村，敌人死伤七百人。）同时提出"到敌后之敌

后去”的方针，敌人要来压缩我，我们就将圈子扩大，敌人的头伸向根据地，尾巴便被斩断。

民兵如何作战

没有民兵广泛的游击战与配合主力作战、所有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便无法取得胜利。起先有许多落后的群众是不喜欢民兵的，说民兵“惹祸”，后来这些人自己得到了民兵的好处，才转变过来。自从民兵与生产结合后，发展就更快了。现在全边区的民兵已有六十三万。

战斗、打敌人，这是民兵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在过年时，劫余的山村还是锣鼓喧天的到处有人抬着猪、羊、柿子、核桃去慰劳抗属和子弟兵。各地的敌伪军却正在忙着怎样来抢过年的食品。于是免不了有一场战斗。敌人要进村口了，村子里的人们才在子弟兵和民兵们的掩护下安然撤走。子弟兵在山头布置好阵地，民兵四面散布着，战斗就这样开始了。到处是声音：“××山头上有鬼子的机关枪”，“从这边打，这里有几个”……敌人被打得马翻人仰，看着没有办法抢到东西，要撤退了，老乡们就都跑了出来，大声叫“捉活的”！孩子们也跳着骂着，有的伪军气得向山上嚷：“有种你们敢下来”，民兵就快乐地回答：“有种，你们敢上来”。接着，手榴弹便扔下去了。

这是四一年八月反“扫荡”中大破袭战的日子，在完、唐、望三角地形的边缘，晚上，你可以听到平原的道沟里的狗叫，和更远处火车的嘶鸣。但是，在同样的时间里，和这些声音遥相应和着的，是噪杂的人声，是铁锹相击声。许多山口子里，涌出来几千几百个黑影子，好像山间浊流倾泻到平原上去。他们的铁锹像枪一样背在肩上，剪刀、小刀、小钳插在腰带上。月亮西斜时，民兵们每六个人抬一根电杆，唱着歌回来了。当他们进入安全地带时，号声也响起来了，这是胜利的收工号。敌人也许要打几枪，那号就会吹得更响。从最初敌人修了公路，挖掘了道沟以后，破击战也就从那时开始，敌人白天修，民兵们夜间去破，破一夜，敌人要修三天，就这样一直纠缠下去。青纱帐茂盛的时候，就是全面破袭战展开的时候。

这一年多以来，在反“扫荡”中更盛行的是地雷战，敌人一听到地雷便头痛，地雷是他们的死对头。去年北岳区三个月的反“扫荡”中，各县的民兵们巧妙地布置了地雷阵，到处叫敌人车毁人亡，反“扫荡”的第一个月，共毁伤了敌人汽车四十一辆，后来敌人改用坦克车开道，但是坦克车也炸毁了两辆。北泉敌人进犯独山城，前头部队卅名进了村子，被炸死廿八名。关平李家沟某家有两个南瓜，敌人来取瓜，马上三个死在瓜旁。敌人搬凳子被炸了，大街七敌人搞鼓也被炸了。在青源，敌人选择在已炸过的雷坑旁休息，又被炸死了。尤其使用了天雷爆炸（将绳子系到地雷的引火线上，绳子长短事先量好，从山顶上吊下去，刚到敌人的头部或胸部），敌人走路爬山，地雷会从头上腰间飞爆开。敌人怕地雷，不敢走正路，走麦苗地，走河滩，走山尖。在完县敌人甚至打穿墙，从墙洞里钻。……但是民兵们他们可少至一个人活动，有最大的作战机动性）的地雷是活的，是会追随敌人运动的。敌人曾宣布要以牺牲一百个“皇军”的代价，来活捉廿三岁的爆炸大王李勇。边区的孩子们到处唱着：“李勇要成千百万。”去年五月的反“扫荡”，我们把李勇的经验总结起来，又推广下去，到秋季反“扫荡”，李勇就真变成千百万了。根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北岳区秋季的反“扫荡”，伤亡在民兵手下的敌伪，共达一、八〇一名。

冀中的人民

应当说，冀中是敌后斗争最频繁、最紧张与最残酷的地区。它是四条铁路包围起来的一

块棱形的平原，所谓四战之地，里面有蛛网似的一万多公里的公路，有一千八百个敌伪据点。点线沟碉互相联结，中间空隙平均在五里上下，最大空隙没超过十五里以上。如以沟线与点碉联锁相计，全冀中即被分割为二千七百小块左右。去年十月间，敌人选择了任邱、高阳、潴龙河两岸的地区，想来一个彻底屠杀镇压（叫做建立“联庄组织”），实行所谓“淘水战术”：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要把水熬干了才好打鱼”。可是敌人虽用尽了一切血腥的“示范”，和无奇不有的刑罚，“淘水战术”还是失败了。敌人所到的村庄都空无一人；最后只好要求“八路军来了只要点火”，于是各村都普遍点起火来，四面八方都是火。敌人又只好通知：“不要点火了”。

我们都知道冀中有地道战术，这完全是人民自己创造的。最初是在据点附近开始的，因为敌人的“清剿”太频繁，人们在灶底或炕边，挖下可以藏人的洞。后来邻家与邻家从地下打通了，再进一步于是村与村之间的地道便纵横交错地打通起来。从洞里向洞口看是明的，洞口向洞里看却是黑的，这就使得敌人不敢往地道里钻。四二年五月廿八日，敌人大“扫荡”冀中时（这次“扫荡”，敌人准备了一年，冈村宁次亲自乘飞机指挥），在定南北疃村发现了地道，用毒瓦斯毒死了八百多人。为了防止各种可能的意外，地道战术日益发展：增加出口，打好几层，加强撤退与防御的组织……，总之，要达到极少可能被破坏。有一次六个干部在村子内坚持了七天战斗，某天敌人忽然发现了洞口，但不敢下去，于是用刺刀强迫伪军下去，我们的干部便向洞外放枪，敌人最后从洞口放进大量毒气，洞内的人便转入第二层地道去了，这个地道有五个口子，我们的干部安然在内坚持着自己的阵地，敌人无可奈何，只好留少数人陪着这个洞口，“守株待兔”。敌人在冀中到底杀害过多少人民，这是无法统计的。敌人只能以恐怖与虐杀来“降服”中国人，于是就要锻炼其士兵的“胆大”和残忍，甚至强迫士兵吃人肉（这点有许多外国朋友还不相信），发明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暴刑。然而冀中人民对所遭受的残害，已认作是理应发生的事情——从没有人去讨论它。经过五六年的斗争，无论男女老少，都明白一个真理：“你不杀敌人，敌人就要杀你。凡敌人所想知道的任何事情，一定是对边区不利的事情。”去年春天敌人包围安平一村时，毒打被围的老百姓，要他们指出抗日干部，结果没一个人哼声。敌人就拉出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当众严刑拷打，他的母亲便在旁边大声喊，叫他“不准说”，敌人将母亲抓往另外一个地方，这位母亲还边哭边喊：“孩子可别说呀，咱娘俩就是死在一块，也不能留骂名。”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死去活来五次，终没说出一个字。敌人无可奈何，最后指着大家说：“没法子，你们都是八路军。”

环境越困难，斗争越残酷，群众越感到需要抗日政权来保护他们。冀中抗日政权，由村到专署，在群众面前都是公开的，甚至某些敌伪汉奸也明知抗日政权的存在，而无可如何。事实证明，当群众真正结成一条心时，任何狡猾残暴的敌人也是没有办法的。

去年秋天的大胜利

去年秋季敌寇对我北岳区进行了历时最久空前残酷的“扫荡”，反“扫荡”战从九月十六到十二月十五，整整三个月才结束。敌伪动员兵力达四万多，企图用最残暴狠毒的手段，从经济上毁灭我全体军民的生存条件；破坏我秋收、秋耕与征收，洗劫我粮食、资财，毁掠我人力、物力。我们采取了各种斗争的密切结合，特别是主力与民兵的结合，内线与外线的结合，反“扫荡”与政治攻势的结合，军事斗争与其他斗争的结合，这四种结合形成了对敌寇强有力的“总力战”，保证了我们的胜利。

九月底神仙山的战斗，我守卫部队四百余抵抗了敌伪军四千多，苦战十二日，终于打退了敌人围攻。其中金龙洞战斗，敌人一千五百多，我们只是一个连，持续了八天，结果杀伤敌人一百八十三名，被地雷炸死的五十六名，我们付出代价，仅仅七人伤亡（这里面还有三人是摔坏的）。我们又创立了以神枪手组成的飞行射击组，他们配合主力狙击敌人，以极少，或几乎没有牺牲换得最大代价。民兵们的地雷战收效很大，前一个半月内，敌人因地雷伤亡的占其部队人数十分之一强。三个月残酷斗争中，涌现了无数的英雄和模范，河南区队的政治主任杨世明，三个月内毁了同蒲路机车的百分之廿五，他发明了许多破坏铁路的办法，现正为各地部队效法着。猎人李殿冰一个人杀伤了十七个敌人，他的故事也被编成剧本，在边区到处出演。今年一月的群英大会共一百零四个战斗英雄和模范。

这次反“扫荡”中，最足以表现各种复杂斗争相结合的，是秋收、秋耕、征收和救灾工作的完成。我们一方面要抢收、抢种，一方面要和敌人争夺已被抢去的粮食；主力、民兵要积极和敌人打仗，要担任警戒，有时还要亲自动手收割；我们要把握敌人各种活动的规律，要争取一切空隙。所有专署、县、区、村各级干部，都分区、分组、分村配备下去，组织群众武装护秋。除子弟兵的配合行动外，白天由基干队及游击小组与敌坚持作战，掩护群众转移休息，夜晚即分队率领凡有劳动力的男女集体收割，随收随打，随运随藏，并由粮主自行约定适当的工资制度。收后的坚壁工作，规定干部负责制。到十月中旬，大部抢收完毕。被敌人抢去之粮，则率群众夜间抢回。王快据点，一夜之间过河十二次，连续三夜，把二百多亩稻子抢收完毕，又把敌人割去的十二捆稻子也抢背回来。完县临近唐河的许多村子，只神南一个地方，就曾动员了五百多民兵，七天中抢收了一千三百亩。各地秋耕种麦的重大成绩，我们不必去公佈那些数字，然而我们可以说，去年的秋耕，在许多地区比过去的一年还好。尽管敌人如何疯狂的烧杀破坏（杀我同胞六千多，烧房屋五万四千多间，毁掠粮食二千九百多万斤，抢走耕畜一万九千多头……），我们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反“扫荡”结束，各县公粮都已次第完成。任何部队或机关无论走到怎样的穷乡僻壤，粮食供给从未有过问题；军民的冬衣都普遍得到解决，晋察冀日报在整个反“扫荡”期中，照常出版。

今年初，我们发动了空前的大生产运动。为了生息民力，坚持抗战，北狱区今年并减轻公粮×万大石（冀中、平北等区适当减轻）。去年秋季所遭受的创伤，不久就会复原过来了。

生产带来了新气象

今年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给我们各方面带来了新的气象。干部的思想转变了，人民的认识提高了。特别是提倡拨工互助，牲口贷款，实际帮助群众解决了缺乏劳力畜力的困难之后，群众的生产与战斗情绪就更加提高了。许多村子建立了催人早起的钟和鼓。村与村，组与组，甚至父与子都有竞赛。拨工组织，灵寿占全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六，盂平有三分之二的男人在拨工组里，唐县占全人口百分之十九。劳动效率有的竟提高一倍，一般都提高百分之三十左右。按户计划各地都进行了。拨工在游击区也相当普遍开展起来，有的村子的土地互相被沟墙圈成两片，于是沟外的村与沟里的换地变工，更增加了两村团结。许多过去逃荒的灾民，也都纷纷回来。数不清的游击队与拨工组结合，白天耕地，夜晚练习埋地雷。为了使第一线（最靠近敌据点的）的村庄安心工作，各地都在发动村联防制，普遍设岗哨，村干部轮流检查，一发现敌情，就互相接应。许多距敌碉堡最近的村庄，由于拨工组和战斗任务组织得好，都能昼夜抢耕抢种了。现在干部到村里，群众都争着让他们到自己家里吃饭，

自动把生产计划请干部审查，群众都自愿突击抗属的生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干部不参加农户劳动。

阜平上庄的人民，更是建立了健全的生活制度。据三月间的统计，全村一百四十五个男劳动力，参加了拨工组的已有一百人，分为廿一组；一百十八个女劳动力中，已有五十人组织起来，分为十一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另外有一个人专负责政治和文化的学习，政治没有课本，多是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或是复习夜校的课程。文化课主要是识字，拿着什么农具学什么字，干什么活儿学什么。拨工组与游击组统一起来，平时分散着的游击组，以自然村为单位，组成一个拨工组，战时以行政村为单位，过集体生活，实行集体拨工，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他们每天完工时检讨一番，七天开一次总的检讨会。每小组都有自己的包括生产、战斗和学习的纪律或公约。在紧张的生产运动中，民校仍旧坚持着，而且人数很齐全，学习情绪很高，男人晚饭后上课；青年妇女早上拨工、送粪，早饭后上民校。童子军每天把街头打扫得干干净净。妇女拨工组还订了卫生公约："早饭后，一定要扫地，刷家伙。"战时要保护鸡、猪和牲口，并看护伤病人。……

这只是给这种将战斗、生产与教育相结合的农村，描画了一个轮廓。这种新的农村生活，目前一方面是普及，一方面是内容的日见丰富。

七年来，据不完全的统计，我边区子弟兵（民兵在外）与敌战斗二万〇五百余次，粉碎敌人千人以上，十万人以下的大小"扫荡"，一百一十二次，其中历时最久最残酷的大"扫荡"共有四次：一为四一年八月，敌以十万兵力对北岳持续两个多月的"铁壁合围""扫荡"，一为四二年敌四万兵力对冀东三个多月的"扫荡"，一为同年五月，敌五万余兵力对冀中的"扫荡"，一为去年九月，敌四万兵力对北岳持续三个月的"扫荡"。总共毙伤敌伪十八万余人，缴长短枪五万八千余支，各种炮百余门，各种机枪八百五十余挺。我军亦伤亡指战员八万余名。

今年以来，敌人弱点暴露更多（兵力不足，分散配备，纪律废弛，士气下降，与伪军矛盾……）边区各地，特别是北岳与冀中，敌伪据点与堡垒大量被我攻克与逼退了（一二月份，两区共达四百五十五座）。许多敌占县城，因为惧怕我军攻袭，多把城门关闭，敌伪军不敢出城一步，伪军更如鸡卵，一碰即碎。我们恢复了许多地区，新开辟了许多地区，许多游击区已变为根据地（如冀东），冀中不但恢复了四二年"扫荡"前的局面，而且更发展了。敌人对我根据地是不会一日放松的，今后敌人必然将搞出更多的新花样，搞出更残暴的罪行。然而敌人最根本的弱点是没有人民，它是孤立的。去年"扫荡"北岳三个月，就没有一个人出来搞维持会。我们有人民，我们军民团结如一个人，这就是我们致胜的根本之道。当然，越是接近光明，斗争越是残酷，这一点，敌后军民是很明白的，我们还有许多困难待克服，冀中许多战士就靠刺刀、手榴弹和敌人拚（然而，他们还时常攻入县城），由于敌人的毁灭性破坏，许多地方军民仍感衣食不足，甚至有的还过着半穴居半露宿的生活。因为从来就是伴随着困难而生活的，一个外来的人看了也许会惊异得目瞪口呆："你们怎么打仗的？"但那些百炼成钢的军民却是习以为常了。然而，不管怎样，对这样的局面，一个有正义的人是不能容忍的。居住边区很久的国际友人林迈可先生，就表示了他的意见："晋察冀军队的效能及人民的组织既然已发展到目前的程度，那么限制着晋察冀作战努力的因素是粮食和军火。其中军火是基本的问题，因为只有有了适当数目的轻武器及弹药供给，才能使日寇出动抢劫成为得不偿失，才能使中国方面收复并完全控制除了日寇九个最大的据点以外的平原富饶区

域。如果除此以外，军队还能有摧毁堡垒的新式轻便大炮及少数空军的援助，那么敌人就可以被打退到铁路线上，并使他们不能利用华北的资源。甚至日寇沿铁路线的交通，倘使他们不大大增加其兵力，也是很难保得住的。今天同盟国还未给八路军以他们需要的比较少数的军需供给，是同盟国家对日作战努力中物资分配的失策。”

这样的意见正说出了今天边区军民的希望和要求。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7月10、11日）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敌后抗日根据地介绍之二）

（一）新四军的建立和概况

新四军的前身，是中国红军主力一九三四年冬北上抗日时留在湘、赣、闽、鄂、豫、皖各省边境的红色游击队。一九三七年十月，这个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军长叶挺领导之下，开赴华中的最前线作战，进入苏皖，直逼松沪。一九三九年以陈毅同志为首，成立了苏南指挥部，以张云逸同志为首，成立了江北指挥部，开展了大江南北的抗日游击战。自徐州、武汉相继失守，战局严重，新四军仍在敌后坚持杀敌，发展成为六个支队，稳定了华中敌后抗战的局面，使几千万人民在流离失所与惶恐悲观的情况中，获得了新的鼓励和胜利信心。

但在抗战阵营里，有一部份反共投降派，不断制造着磨擦，打击新四军，图谋消灭它。首先以武力围攻新四军在平江、确山等地办事处。一九四〇年反共派进而以大军先向我皖东江北指挥部围攻。接着，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以十万之众想要一鼓歼灭我苏北部队。陈毅同志率部北渡，解除了苏北的危机，展开了江北抗战的新局面。这时候，华中抗日政权已在淮南、苏中、苏北、苏南、苏豫皖边相继建立了。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在泾县茂林一役，我新四军军部万人在遵令北移途中被围歼，军长叶挺被俘，新四军番号被取消。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计，遂令陈毅、刘少奇、张云逸等同志重组新四军军部，并将各支队编为七个师，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之下继续坚持华中的抗战。

从此，华中新四军及其根据地，开始走上新的发展与巩固的阶段。在李仙洲部的进攻之下，新四军为了顾全大局，曾忍痛退出了苏豫皖边界，但是新四军又在淮北和皖中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时，敌寇开始向我根据地进攻与蚕食。一九四一年七月开始了盐城大“扫荡”。友党友军在皖南事变以后，经常以三十万大军从正面与敌后不断的向我进攻，向我逼进，在正面，有汤恩伯、王仲廉的大军屡次东进，李品仙集团之“围剿”我五师与七师，和顾祝同之向我苏南浙东的进攻。在敌后，有韩德勤、张淦、王劲哉、金亦吾，及苏南之“忠义救国军”等，不时配合敌伪，攻击我军。我华中根据地遭受了很大的困难，但在党中央及华中局正确领导之下，及我军民英勇的顽强战斗之中，很快的结束了敌之“扫荡”与蚕食，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并发展了新的根据地。李先念部于一九四二、四三年在幕阜山北麓及襄

河以南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浙江东部在四二年秋天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四三年冬天，苏南我军从敌寇手中把皖南的宣城，郎溪，广德等地夺取了回来。其他各区均向敌伪统治区“挤”了出去。在敌伪据点三五里以外，就是抗日政权统治的地方。

在我们的地区里，展开了普遍的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的运动。从群众斗争中彻底改造了各级政权，与彻底执行了三三制，各抗日阶层底人士均被吸收到民主政府里面来，使人民在频繁的战斗环境下能安居乐业，生活一天天变好。我们地区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群众已经组织起来了。群众性的对敌武装斗争亦随之蓬勃开展，使抗日政权更趋巩固。在苏中，我们试行了新乡制，这是敌后民主政治的新创作。

现在整个华中根据地有了七个行署，一个浙东军政民联合办事处，二十个以上的专员公署，一百四十七个县政府，在这新政权下有三千万人民，六十万的武装民兵和十五万的精锐的主力军。自从一九四二年华中局扩大会议以后，各战略地区都彻底执行了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政策，使党内外人士更加团结，同时也大大地节省了民力，提高了人民战斗的情绪，使我华中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有了坚固的群众基础。

（二）七年以来华中的对敌斗争

华中素为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它有南京、上海、武汉、徐州、杭州等中心城市。它现在变成了日寇侵华的心脏，与西侵的后方，敌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驻在这地区，敌寇据有华中以后，威胁着重庆和西安，贯通了大陆交通。七年以来，我新四军与华中人民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奔驰于华中原野，捣毁它的统治，紧紧地拉着它西进的后腿。敌寇全面控制华中的图谋，变成了泡影。这个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与华北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相互依存，相互呼应，成为中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成为颠覆敌寇在华中统治底先锋与主力。

七年以来，敌寇经常使用着十三个师团的兵力，配合着汪逆的伪中央军十一万及伪地方军十二万，来对付我新四军，想把新四军消灭。

从一九四一年起，敌寇更大规模的全面的向我进攻，首先调集两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旅团配合汪逆伪中央军针对我活跃于京沪近郊与长江下游之新四军（苏南苏中），实行空前的大“清剿”与大“扫荡”，并开始在各大市镇建筑据点。而在苏南的“清乡”区，小的村镇也建筑了稠密的点线，使我大兵团活动感到了一些困难，我地区缩小了一些。苏南我军主力退出京沪路东，苏北我退出了盐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寇的进攻更加紧张与疯狂。“清乡”与“扫荡”普遍于整个华中敌后，平均每半个月各个地区有一次“扫荡”。最频繁的一星期一次。“清乡”由苏南扩张至苏中、皖中、及武汉近郊。特别是对我苏中四分区的“清乡”绵延不断地进行，其斗争的残酷性、激烈性、尖锐性是罕见的。配合着“扫荡”与“清乡”，敌在我根据地周围的据点增至二千五百处以上，我各战略区各军分区之间交通联系地区，均为敌之公路所隔截，汽艇则穿梭于水网区，使我军活动更加困难，使我苏南、苏北、苏中、鄂豫皖边曾遭到某些缩小与损失。部队在某些个别地区只能以营或连排活动，在敌“清乡”最烈之区，只能有班排活动，便衣活动。我为适应新的斗争环境，执行党中央指示，调整了各级的组织机构，在各战略区成立了军区与军分区，统一主力与地方部队的领导，并且将一部主力兵团地方化，充实到地方部队中去。加强各地区的对敌斗争，作为坚持该地方的主力。同时深入了减租减息运动，更加提高人民斗争情绪，人民的武装组织亦因此而普遍展开，坚持各地区的一支新生力量——民兵，普遍出现于华中敌后，这样军民之间更加团结了，大大

增强了我之对敌斗争的力量。我的一元化的力量粉碎了敌之总力战。在作战时，我们紧抓住了敌伪的矛盾及其分散作战的弱点，高度的发挥了分散作战的特长，到处打击敌伪，使其处于内线作战中，同时大大发挥我政治上的优势，我灵活的反“扫荡”、反“清乡”，使敌寇穷于应付。敌在一九四三年将六个独立旅团扩编为三个新的师团，同时大大强化汪逆伪军，编整伪军，并且向残存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军事上的压力，首先击溃了苏中李明扬、陈太远的残部，继而进攻苏北韩德勤，韩部全军覆没，韩本人在我之掩护下始得逃生。鄂中的王劲哉、金亦吾在敌轻微进攻下即全部投敌。华中伪军增加了。新四军即抓住了敌寇调整的空隙，于五月底苏北淮海区发动了军事与政治的联合攻势，接着即在苏中淮北等地也展开了全面的反分割、反蚕食的攻势战，直到现在，这种攻势还在继续中。连续攻克了敌伪据点三百余处，不仅恢复了一九四二年前被蚕食之区域，而且还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如苏北比基本区扩大了百分之三十五，苏中我将敌挤到只剩原占土地的百分之十六，在淮北也开辟了新的地区）。尤其是苏中与苏南底军民，他们在敌寇“清乡”“高度强化清乡”“扩展清乡”最严重的进攻下，数年来始终坚持京沪近郊与长江下游平原水网区的游击战争，其艰苦奋斗之精神，与北平以南之冀中十分区，及天津以南之冀鲁边区之军民一样，同为模范。由于展开全面的反伪化斗争反封锁斗争底结果，华中敌伪都被围在各据点周围三、五里以内的地区中。

七年来我新四军不仅独立地与华中敌伪进行残酷的斗争，同时在战略上或战役上直接或间接的均曾配合正面国军对日作战。当皖南事变热血未干，我第五师、第四师曾有力地牵制了向豫南进攻之敌军（而当战争一结束，友军即将我苏豫皖边区抢占，赶我至津浦路东），一九四一年的郑州战役、与两度湘北战役，四二年之浙赣战役、大别山战役，四三年之湘北鄂西战役以及四四年之中原会战等，新四军均曾配合友军作战，展开对敌攻势。一九四三年春敌人“扫荡”苏北友军韩德勤部时，我第三师将士不以旧恨为念，曾不论在战前与战役的过程中均以积极的行动，配合作战，掩护转移，使敌不能不在短短的四天中草草收拾起对韩德勤部之“扫荡”，而将主力转向我盐阜区“扫荡”。

从一九三八年五月我新四军进入华中敌后到现在，据不完全的统计共粉碎了敌伪大“扫荡”一百二十余次，主力兵团作战一万七千五百余次，毙伤敌伪二十四万余人，俘虏敌伪三万四千余，缴获长短枪十二万四千余支，轻重机枪二千六百余挺、炮一百门。而华中的民族优秀的儿女——新四军的指战员四万五千名英勇地牺牲了，六万五千名光荣的负伤了。

七年的频繁的斗争，使我们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曾经进行无数次有名的战斗与战役，如卫冈伏击战，泾县攻击战，泰州讨逆战，石港攻坚战，二甃歼灭战，刘老庄壮烈的防御战，车桥歼灭战，苗何庄遭遇战，归仁集围困战以及历次反“扫荡”、反“清乡”的战役，与淮海、淮北、盐阜诸攻势战，均充分的表示了我军高度的作战技能、组织才能与指战员的英勇顽强。三千万的人民及其武装，在新四军亲密的帮助下，与敌伪斗争的技巧亦不亚于主力，他们创造了许多辉煌的英勇奇迹，如一九四二年九月如皋三万民众的暴动，四三年七月苏中四分区人民一夜破坏封锁竹篱二百余里，四四年三月宝应三万民众的破圩运动，及淮海民兵单独打退六千敌人之“扫荡”等，他们在长期的锻炼中，现在已经能够独立担负起保卫自己家乡的战斗任务。

我英勇的华中敌后军民，在对敌斗争的紧张情况中，并使生产、教育与战斗紧密的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战斗力，以准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

(三) 新四军过去一年的战斗

过去一年间，新四军的大行动有去年的夏季攻势、有争夺郎溪，广德的战斗和阻止敌寇西进河南的几次战争。

去年五月，敌人调防，我军乘其部署混乱时，发动了夏季战役的攻势，这个攻势继续了三个月，淮海区的成绩是最大的。从五月二十二日的塘沟战斗开始，三个月中，在六塘河两岸攻克了五十一个据点，消灭敌伪五千名以上，解放了二十万人民。

在夏季攻势中，我军民表现空前的团结。人民帮助军队围困敌人的据点，沭赣路上的桑墟据点被围二十八天，水井被填塞，远近人民更将一千多条死狗送到据点的周围，经炎夏的日晒雨打后，全部发酵，敌人用棉花塞住鼻子，时间长了，脸部肿胀，最后只好要求："新四军老爷，放我们走吧。"而这只是我军民团结，制造灵活的新的战术的一例而已。

在夏季攻势中，我新四军的将领和战士，表现了无比的牺牲精神。某团第四连抗击敌人十一路围攻，和敌三十五师团步兵一千七百人，骑兵四百，进行着血战，毙伤敌伪四百余以后，看到众寡不敌，就把武器折毁，和敌人肉搏，以至于全部牺牲，战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投降，没有一枝枪落在敌人的手里。而这只是我军英勇牺牲的一例而已。

去年秋末冬初，敌人由南京，溧水和溧阳一线，向南进攻，国民党的军队无力抵抗，拔步逃跑。敌人占领了郎溪，广德和宣城。敌人的这次新进攻，激怒了新四军的英雄们，他们从敌人的侧翼和后方袭击敌人，终于从他们的手中夺回了已经失去的郎溪、广德一带的一大片国土。

今年二、三月，敌进兵河南，新四军为了配合友军的作战，在各个战略地区发动了好多次巨大的战役，车桥战斗，高沟、杨口的战斗和陈家港之战，是最著名的。车桥在宝应以北，是敌人的一个强固的大据点。我在攻克这个据点的战役中，歼敌山泽大队长以下官兵六百人，活捉寇兵四十，伪军淮安保安队全部被解决。在战斗中一连串攻克敌人最强固的碉堡五十三座，显露了我军的攻坚的力量。

车桥一战之后，我又打下了高沟、杨口两要镇。高沟、杨口一役以后，黄师又攻克了陈家港，这是在灌河下游，敌人用以控制淮盐的一个主要的港口。这一役，我俘敌伪四百人，缴获食盐四十万吨。

除了这些大的战斗以外，我军反对敌伪的报复"扫荡"，"治安肃正"，"扩展清乡"的斗争，没有一天停止过，仅在今年二月份，苏中我军对敌作战达二百次，平均每天六、七次，而苏北黄师及地方武装的作战，平均每天是八次。

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敌伪每次的"扫荡"、"清乡"都失败了。敌之华中参谋本部的"清乡视察团"，曾于一月中旬到苏中"清乡"区视察，回去发表"苏中清乡实况"云："新四军反清乡工作有极坚强基础及组织，一般方式的扫荡，殊难收清乡之效。"又云："新四军在清乡区内仍有地盘，有组织，今日反抗力量异常强大，事实明显。"

敌人"清乡"，除了到老百姓家里翻箱倒柜，抢劫财物以外，从来没有挫折过我军，因此老百姓说敌人的"清乡"是"清箱"。常常正在敌人"清乡"的时候，我们的游击队和锄奸组在大城市里的大街之上把敌伪的官佐杀死，所以有的老百姓说："清乡倒把新四军清到街上来了。"

过去一年，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新四军收复了广大的国土，解放了四百万同胞。

过去一年，敌伪的士气，显著的低降。寇兵自动投降者有十四人。这是从前没有的事情。在从前，敌人不投降，不缴枪，到了绝路都自杀。现在却常常的竖起白旗，这原因，一方面固然因为我们的宣传工作有了更大的成效，一方面也是敌兵士气低落的征候。

至于伪军，更是接连不断的整营整连的反正。今年一月五日夜，伪卅四师一三五团施亚夫，在如皋亲率一营人，人枪三百，向我新四军投诚。施氏义举之后，又有龚永嘉，吴国昇，薛仁杰先后率领人枪八千，向我军投诚。大伊山和灌云县都有伪军成群结队携枪投诚的事件。伪军反正的潮流的高涨，亦为本年战局的特征之一。

在战斗的火焰里，我新四军和人民紧紧结合在一起，越炼越强了。为我军威震动的敌伪，也不断的向我归顺和投诚，新四军所到之处，是一片光明。但是在这光明中也碰到了痛心的事件，那就是国民党的一些反共顽固军，至今还是不断闹磨擦。磨擦发生于我第二师和第五师的防地，国民党李品仙部第四八军一七一师的曹茂琮去年曾向我二师进攻，妄想把我赶过津浦路的东边去。今年五月五日在河南战事吃紧时，国民党的桂军一八九师五六五团王村远部及国民党挺进第四纵队全部，以反攻为名，在大山寺，向我五师防地举行偷袭。这样的事件一直到现在还常常发生。我们常常是在友军配合敌军的夹攻中生活，但是，因为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的同心协力，我们总是打垮了敌伪，对于友军的无理攻袭进行了正当的防卫，在艰苦中坚持敌后的抗日战争。

（四）华中抗日根据地形势

华中根据地的范围

华中抗日根据地，位于中国最富饶的中部，在江淮河汉之间，东临大海，西屏武当，南迄浙赣，北至陇海，包括了江苏省的绝大部分、安徽、湖北的大部分，以及河南、浙江的一部分。这个地区（仅沦陷区）面积就有一百二十余万平方华里，人口六十余万。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新四军划分了八大战略区：

苏中区：位于江苏中部，为我新四军第一师粟裕部活动区。

淮南区：位于安徽东部，及江苏一部，为我新四军第二师罗炳辉部活动区。

苏北区：位于江苏北部，为我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活动区。

淮北区：位于安徽东北部及江苏西北之一部，为我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部活动区。

鄂豫皖区：包括湖北省东部、中部及河南南部安徽西部之沦陷区，为我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活动区。

苏南区：位于江苏南部及安徽之一部，为我新四军第六师谭震霖部活动区。

皖中区：位于安徽中部，为我新四军第七师谭希霖部活动区。

浙东区：位于浙江东部之沦陷区，为我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克希部活动区。

华中地势

沦陷区的华中，有武当、大别、大洪、桐柏、幕阜、黄山、天柱、天目、茅山、会稽诸山脉环绕于四周，中为长江三角洲，皖中和湘汉三大平原，而华中平原（即长江三角洲）则为密如蛛网的大小河流所交织。湘汉平原是湖泊区。皖中平原处在狭仄的长江沿岸。在淮北苏北，则属阜淮平原。我新四军就是驰骋在这广阔无限的平原上，艰苦地坚持了六易春秋的抗战。

华中交通状况

华中交通的发达为全国之冠，铁路有津浦、平汉、陇海、京沪、苏嘉、淮南、浙赣、江

南、粤汉、沪杭甬诸路纵横交错，津浦路将我淮南唯一的山区割裂，平汉路给予我五师部队之机动以莫大妨碍，江南路增加了我江南江北联系的一道陆地障碍，而陇海路则在我华中敌后两大战场接壤区形成一道铁栅。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尤以苏南区为最。华中敌封锁之交通线，总长约三万余华里，成为敌伪向我“扫荡”奔袭的动脉，与掠夺敌后物资的吸血管。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长江、黄河、淮河、运河、汉水诸大水襟带其间，都是对我新四军的天然封锁网，长江横贯东西，使我江南部队处于比较孤立的境地，运河由北直下长江，给我苏皖敌后东西联系以相当的阻挠，七年以来敌寇凭着这个便利的交通网，来封锁与分割我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但我新四军配合人民，实行普遍的改造地形，筑堤坝、挖道沟、破公路、埋地雷，使敌之企图归于失败。

华中经济状况

华中沦陷区，在中国经济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农业上华中是中国最富饶之区。江苏棉花居全国第一，湖北次之，皖中与湘汉平原的米粮出产冠全国，素有中国谷仓之称，中国最大的米市芜湖即位于其间。在工业方面：华中是中国资本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浙江一带，是各种企业集中之地，蚕丝、纺织、面粉等业都是全国第一。年来敌寇采用各种欺榨手段并吞了所有的工厂，并以此来作为钓饵，向中国抗战阵营内的动摇分子进行政治的诱降。新四军历年来与日寇的掠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广大的农村中展开了保卫春耕、夏收、秋收、冬藏的运动，使敌之抢掠遭到极大的障碍与打击，因此华中敌后虽经过了七年艰苦的战争环境，但我根据地仍然做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给自足，这对我坚持华中抗战是极有其重要的意义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7月13日）

战斗中成长的晋绥边区

（敌后抗日根据地介绍之三）

在七年抗战的烽火中，晋绥边区三百余万人民，经过了千锤百炼，变成了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它们胜利的果实，就是创造了屹立在西北河防前线的晋绥抗日根据地。

这块地方，东至同蒲、平绥铁路，西至包头，北面是绥远大青山和内蒙古草原，南面依托汾离公路，面积三十三万余平方华里。全境包括了山西的西北部和绥远的大部，横跨晋绥两省，控制了太原、归绥两个省城。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共辖卅六县，六个专区，二专区有神池、朔县、偏关、岢岚、五寨、保德、河曲。三专区有临县、临南、离石、方山。八专区有阳曲、交城、交西、汾阳、文水、清徐、太原、祁北、榆太、静乐、离东。六专区有静宁、宁武、忻县、崞县。五专区有右玉、右南、左云、平鲁、山朔、怀仁、大同。直属区有兴县、岚县及神府代管县。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辖九个县五个蒙旗，其中有归绥、包头、武川、陶林、凉城、集宁、丰镇等。

晋绥抗日根据地是华北各抗日地区的枢纽，是前后方的交通要道，是华北五大战略要地之一。它除西面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处外，其他方面都隔着敌人的封锁线，三面受敌包围。在敌疯狂进攻下，七年来我军经常抗击敌寇二万一千余人，抗击伪军三万七千余人，打垮敌寇七千次以上的进攻和“扫荡”，至今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县城尚有河曲、保德、偏关、岢岚、临县、兴县等六个县城。特别是这两年，我军力量日益生长，根据地日渐扩大与巩固。在这抗战进入第八年的时候，让我们回顾一下七年来晋绥军民所走的艰苦路程。

拖住了敌寇的牛尾巴

抗战爆发不到三个月，敌寇就突破了长城线，晋北守军和官吏蜂拥南退，敌骑长驱直入，情况万分紧急。八路军一二〇师在贺师长关政委领导下，赶来晋西北坚持了阵地，拖住了敌人的牛尾巴，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阻敌，配合正面友军防守忻口。十月十八日一二〇师曾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敌人汽车五百余辆，占领雁门关，占领崞县附近南北大常、王董堡，切断了敌人的后方交通，使得敌人用飞机运送弹药给养。敌人吃不到大米、白面，只好用豆子充饥，给防守忻口的友军以很大的帮助。太原失守后，我军坚持在太原附近展开了游击战争，这时候的一二〇师不但每天要和敌人作战，而且还帮助友军收容散兵，设法将人枪送回原部，连友军军长傅作义等也因我军的奋勇配合，而安全撤退至后方。

当时战地动员委员会及牺盟会在晋西北各地积极动员群众，参加抗战，民众也因为一二〇师、新四军的英勇作战，自动大批参军。一九三八年二月各军奉令反攻太原时，一二〇师担任截断同蒲路北段敌交通的任务，在十九天的激战中占领平社、高村、原平等车站，破坏铁路五六十里，桥梁十九座，使敌人一个多月不能通车。三月大同敌后宫师团以万余兵力，进占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等七县，那时一二〇师主力正在同蒲路上作战，闻讯星夜赶回，两天强行军走了三百余里，经过二十多天的血战，把敌人打退，收复宁武等七个县城，使晋西北局势转危为安。五六月间，三十五军反攻绥远，一二〇师派兵配合作战，后三十五军败退，当时敌人大肆吹牛，说“中国军队不能再到绥远”，“谁到绥远就消灭谁”，而我一二〇师就在九月间派遣了李支队配合动委会深入大青山地区，创造了绥中、绥西、绥南以及察哈尔的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现在。

民国廿七年秋，武汉失守，因为华北游击战争的开展，给敌威胁很大，敌乃回师华北实行“扫荡”。一二〇师奉朱彭总付司令命令，主力东进，协同吕正操同志领导之三纵队，保卫冀中大平原，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来回经过了十几道敌人封锁线，与晋察冀部队配合，粉碎了敌人五次大“扫荡”，进行了二百多次的战斗，其中较大的如齐会三天三夜的战斗，消灭了敌人一千多，陈庄六天五夜的战斗，消灭了敌人千余，黄土岭三天两夜的战斗，打死敌阿部中将。

一二〇师留在晋西北的三五八旅、警六团、雁北支队，则协同友军保卫晋西北，廿八年三月，粉碎了敌寇“扫荡”，收复岚县。其中较大战斗，有交城邢家庄、岚县明家庄等战斗。

新政权的建立

廿八年夏，国内第一次反共高潮渐起，留在晋西北的反动分子就提出了“饿死八路军、拖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的口号，敌寇汉奸此时拚命进行诱降与挑拨，晋绥军付师长蔡雄飞也适于此时率部投敌，形势十分严重，我军仍力持团结抗战方针，继续坚持保卫晋西北。

新旧军事件后，敌调兵遣将准备乘机占领晋西北，一二〇师主力亦于是时返回。接着经过三十八天的战斗，击溃敌春季“扫荡”，收复方山、岚县、临县三县城。

在这种情况下，晋西北抗日人民、军队、党派及群众团体，为了保卫晋西北，继续坚持抗日，乃共同建立新政权，公推国民党元老新军领袖续范亭为行署主任。

廿九年二月一日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制定并颁布了晋西北六大施政纲领，并布置了以后工作，其中心为：（一）促进宪政运动，彻底改造加强各级政治机构，实施民主政治，区村长民选，给抗日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筹备参议会，建立各级行政会议。（二）扩大抗日革命武装，加强自卫军，开展群众运动。（三）确定救济灾民难民，累进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屯集公粮等办法。

敌寇为破坏晋西北新政权的建立，四〇年初实行了空前未有过的春夏冬三次大“扫荡”。在春季“扫荡”中，敌出动五千余，占领了方山、临县、岚县，我军经过卅八天的战斗，才把敌人打退，收复了这三个县。六月七日，敌二万余进行夏季大“扫荡”，我军经过四十五天的苦战，进行了大小二百五十一次的战斗，才将敌人“扫荡”粉碎，其中最大的战斗有廿里铺战斗、米峪镇战斗。八月间百团大战开始，晋西北的一二〇师、新军及地方武装都参加了这个战役，经过五十天，我军一直打到太原、汾阳、忻州、崞县、朔县、大同附近。共进行了三百余次战斗，毙伤敌伪军六千余人，俘敌军四十七名，俘伪军三百五十名，缴获长短枪八百八十五支，炮六门，掷弹筒十四个。破坏铁路一百七十五里，公路九百四十里，桥梁七十四座，给敌人以严重打击。敌伪报复，紧接着就发动了两万多人的冬季“扫荡”，对晋西北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经过三十五天二百多次战斗，终又将敌人“扫荡”粉碎。这就是一九四〇年一年中一二〇师进行的四个大战役。

廿九年整年中部队都在行军作战，党、政、民众团体和全体人民也都围绕着坚持对敌作战而努力。政权工作，基本上是迎接战争，克服混乱，颁发并贯彻了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召开各地士绅座谈会，倾听人民意见。村政权进行了初步改选，人民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并组织了军政民慰问团，慰问了战争当中受害的同胞。

这时期，反“扫荡”战争胜利了，根据地扩大了，根据地军民经过了严重的考验，为各级政权建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村 政 权 改 选

廿九年九月，行署召开了第二次行政会议，议定三个工作中心，就是：健全村政权；开展生产建设；加强教育工作。三十年九月第三次行政会议，使晋西北的政权工作更进一步的正规化。会议根据当时政权工作的基础及晋西北军民的需要，确定财经建设为当时政权工作的突击方向。同时对于武装建设、对敌斗争及政权建设如贯彻村选、筹备参议会等作出了重要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在晋西北是彻底实行了，并受到了各阶层的热烈拥护，如民国三十年村选当中，据十一个县五十五个行政村的统计，主任代表中有百分之四十四是中农，百分之三十八是贫农、雇农和农村工人，百分之十六是地主富农；村长中百分之三十二是中农，百分之五十三是贫农，百分之十四是地主富农。晋西北行署也确定公粮征收制度，划一税收，规定除烟酒牌照税、营业税、卷烟印花税、出入口及过境税四项外，将过去旧社会的苛捐杂税一概取消。

在民主设施与人民生活改善后，人民抗战的积极性更进一步的提高了。一九四一年敌寇对晋西北进行了十七次局部“扫荡”，全区军民不但粉碎了敌寇“扫荡”，并主动出击，打了一千多次仗。各地的游击小组、青抗先、民兵都纷纷发展起来了，在每次反“扫荡”的斗争中，都能配合正规军作战，民兵的数目，一九四一年中就发展了三万人，对敌战斗六七二次。他们用的武器有步枪、手枪、手榴弹、火枪，而旧式武器如地枪、榆木炮、独角牛等也发挥了不小的威力。每次“扫荡”时，行署规定各级政府在战争中，必须领导人民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各级政府不得离开所管辖的地区，实行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的原则。

敌寇疯狂的“蚕食政策”

一九四二年是敌人“扫荡”“蚕食”晋西北最残酷的时期。一九四二年二月敌又以一万兵力，进行春季“扫荡”，采用所谓“铁壁合围”“梳篦队形”等战术。我一二〇师、新军、地方游击队以灵活的战术，经过八十四天大小二百余次的战斗，把敌“扫荡”粉碎了。四二年五月十四日敌十六旅团五十九大队村川大队，窜入兴县城，我军从大蛇头打起，一直打到白家堰，田家会。敌村川大佐、横尾中队长被我击毙，多田中队长受伤。敌军一千四百余人，除三四十人得以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我歼灭。

敌寇对晋西北的四次大扫荡及无数次小扫荡被我军粉碎了，便积极采取“蚕食政策”及总力战的斗争方式。敌人的“蚕食政策”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奸活动，建立秘密的特务情报组织，进而建立秘密的维持会。第二阶段是建立据点。第三阶段是据点建立后，加强压迫，加强掠夺，以残酷的“三光政策”与阴谋欺骗，实行所谓“强化治安”。

敌人用这一套缓慢的、零星的、隐蔽的，由秘密到公开、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敌占区而游击区而内地区逐步“蚕食”的办法，曾收到了一些效果。四二年敌人打通了岚临公路，静宁公路，按设了蒲阁寨、芝兰、岔口等数十据点，分割与缩小我根据地。并以岚县、东村、普明、寨子等据点为中心，向我内地区“蚕食”推进。

同时敌寇也进行第四次、第五次的“治安强化运动”，设立“和平团”“新民工作先锋队等”，进行特务活动。四二年十一月敌更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改为“新国民运动”。加上，由于过去我们对敌人力量与阴谋估计不足，对敌占区游击区的政策有些还不够明确，没有很大量的减轻敌占区游击区人民的负担，以及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开展还不够好等等的原因，使我在敌占区游击区的工作及反“蚕食”工作上遭到一些损失。

“把 敌 人 挤 出 去！”

为了加紧反对敌人的进攻与“蚕食”，执行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在四二年底晋西北行署规定了以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精兵简政、整顿三风为一九四三年的四大工作，并实行领导一元化，使主力精干、民兵发展的方针。四二年五月，反蚕食斗争即开始了，并已有了初步的成绩，特别是六分区、三分区，我军给敌人“蚕食政策”打击很大。除八专区未统计在内外，半年来共摧毁伪村政权维持会三六八所，仅四专署经过争取自首或停止维持的即有二百多人，在游击区、敌占区的游击活动也大加开展。

我们对敌斗争的方法：一个是加强武装工作队，把过去几重的对敌伪军工作及敌占区工作，统一起来，使我军的对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斗争，成为一个统一体，深入敌占区

活动。对敌寇“蚕食”则进行了细密的调查研究工作，从发展上了解敌人蚕食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具体分析了敌伪“维持会”的产生及参加“维持”的人物、动机及其过去和现在的态度，决定予以打击或争取。使用这种种办法的结果，我军将敌“蚕食政策”打退了。四三年春季，我军区部队展开反“蚕食”反维持斗争，共进行了大小战斗三百八十七次，收复了八百多个村庄，解放人口八万一千二百五十三名，毙伤敌伪一千三百余人，俘敌伪二百四十五人，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六挺，长短枪二百七十八支，子弹一万零五百余发。

人民的伟大创造力

在抗日民主政权抚育下，晋西北人民不仅积极参加了反“蚕食”、反“扫荡”战斗，而且创造了许多办法，产生了许多民兵英雄，坚持并建设了根据地。

宁武出色的劳动英雄与民兵英雄张初元，他适应着敌后根据地游击地区的环境与需要，在民兵和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创造了劳力与武力结合的方式，这样不仅节省了人工牛工，也粉碎了敌人抢掠扰乱的企图。一九四二年敌人抢去了他们村中五十八石粮，四三年他们组织起来后，只被抢走了两石粮。四三年全村喂了卅五个猪，全部自己吃了，敌人没抢去一个。

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呢？四二年秋天，敌人在他们村子附近安下了据点，经常来骚扰，四三年正月，为了保卫春耕，张初元（那时他是农会秘书兼民兵分队长）就把原来的民兵组织整顿和恢复起来，最初是×个民兵，以后发展到××个。旧历二月初，敌人刚摸到村边就被民兵打回去了，从此，民兵的威信遂建立了。但，民兵经常出去活动，谁给他送粪呢？后来便在民兵中想法互助，以后在锄草秋收到来时，就实行全面互助，把民兵和庄户编成一个组。民兵提出不让敌人抢去一条牛的口号，变工组则报以不荒一垧地的行动。早晨天一明，民兵和变工组都吃饭，饭后，民兵爬山警戒，变工组便下地闹庄户去了。

五寨民兵更建立联防哨制度，一遇敌情，各村民兵即相互支援。如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小河头敌伪二十余名，企图到某村抢劫，刚走到村东土山上，被我联防民兵发觉，当即发出信号，路玉小民兵小组在副队长指挥下，分成三组，一面迎击敌人，一面掩护群众转移。敌见势不佳，正想掉头逃窜，我模范民兵中队长杨二润已率领民兵赶到，各路民兵会合夹击，把敌人一直追到小河头据点附近。

去年，交西民兵神枪手崔三娃在保卫秋收和反“扫荡”战斗中，他那个民兵中队毙伤敌伪十六名。他在写给各村民兵的战斗号召信上说：“乡亲们，民兵英雄们，现在是保卫咱们庄稼的时候了，为了食粮不被敌人糟踏抢走，明年春季不饿肚子，啃苦菜，咱们来一个‘一枪打死一个鬼子’的运动吧！”

过去，民兵们对旧武器不太重视的，自从交城离石民兵用旧武器作战，发挥了可观的威力后，一般民兵除了向敌人夺取新式武器武装自己外，每人都准备了长矛，榆木炮，火枪，独角牛等武器。老乡们捐出了废铁，土枪。经过他们的创造和发明，交城民兵英雄徐力强已能制造掷弹筒，许多地方的民兵自己搜集破铜烂铁，自己制造起手榴弹来了。

甄家庄歼灭战

我军民反蚕食斗争的不断胜利，使敌伪的统治区日益缩小，我根据地日益扩大。从去年最初三个月中，各地民兵活动不完全统计，即达二二二次之多。在反维持斗争中，共摧毁伪村政权八八一个，建立我村政权五五五个，使敌据点活动范围，由三四十里缩小到五里以内。

去年九月十五日，敌第三第五十九两个旅团集敌三千多人，对我兴县保德地区反复“扫荡”，经过廿余天奋战，在甄家庄一带七天七夜战斗中，我军消灭敌人八百多，把敌人八十五大队主力全部歼灭，创造模范的运动战。后来我军更积极主动的围困与攻击敌据点。特别是今年春，我军民对同蒲铁路，神（池）五（寨）、五（寨）三（岔）、岚（县）离（石）、汾（阳）离（石）、汾（阳）太（谷）、忻（州）静（乐）、岚（县）静（乐）、武（宁武）化（宁化堡）八条公路，展开数次全面破袭，共收割电线四万零九百十四斤。

迄至四、五、六三个月内，六、八分区对敌斗争成效特著。我军共收复了六分区的石家庄、咀子上、细腰、蒲阁寨、湾子里、黄牛、王董堡。八分区的上双井、土地堂、静游、孝子渠、庄花、义安、宁固埠等，三分区的津良庄，二分区的倪家山等三十余据点。连以前收复的芝兰、岔口等，已把敌人插在我根据地内的大据点，拔除得差不多了。

生 产 建 设 运 动

从抗战爆发到一九四〇年，是晋西北遭受敌人大破坏的时期。在农业方面，那时人的劳动力比战前减少三分之一，牛减少十分之六，驴骡减少十分之八九，羊减少十分之六。土地荒芜，耕地面积仅达战前百分之八十四，山地产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量只有战前百分之三。在工业方面，民间纺织业，临县原有改良机二百多台，土机两千多台，完全停顿。

新政权创立之初，即注意了根据地建设工作。在奖励农业生产中，政府调剂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所有耕地不荒芜；实行了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减轻了农村中高额的封建剥削，刺激了生产者的热情；政府减轻了公粮负担，奖励生产、创造和发明；帮助贷粮贷款；这一切都促成了根据地的生产运动的发展。四二年和四三年还开了生产展览会及空前未有的劳动英雄大会，在会上研究了组织起来变工互助及劳力与武力结合等办法。

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廿五个县开荒卅五万五千亩。一九四二年十三个县开荒廿五万亩，三年来全边区已开荒六十万亩，兴修水地六万九千余亩，特别是今年的生产运动更是热烈，仅春耕中，各地群众已开春荒四十二万亩，机关部队开荒十八万亩。加上劳动力的大批组织起来（神府、兴县劳动力组织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深耕细作，今年可增收细粮十二石以上。

农业生产中产生了张初元、温象拴、刘文锦、刘补焕等劳动英雄。他们不仅自己生产得好，还领导了各村生产，推动了全区、全乡。他们不仅劳动得好，而且还是各地民兵领袖，张初元在开完了劳动英雄大会以后，即积极在本村附近组织生产与加强民兵工作，细腰、石家庄两据点被我收复后，他曾亲往慰问。温象拴回家后，即积极布置、动员全自然村组织生产，不顾大雪纷飞，道路泥泞，连续数日中走遍十三个自然村，曾同干部开会研究全行政村今年生产的初步计划。他们对穷苦农民都特别关心照顾，无论平时或锄草中，只要穷人没办法，他有的话都能帮助。温象拴说：“咱是从穷人里来的，咱知道穷人的苦。咱现在好了，就得帮助穷人，也和咱现在一样。”

工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民间纺织业经过几年来政府的帮助，如奖励私人投资，负担不计母金，妇女纺织不征税，私人小型纺织工厂免支抗战勤务等办法，因此纺织业也飞快的发展起来。目前，全边区已有纺车五万架、纺妇六万人，土机九千多台，快机一千三百多台，工人四万二千七百余人，每年可产布五十万六千余疋，加上出产的毛布，能达到全晋西北军民的衣服自给。

其他工业。造纸业一九四一年的产量，达到了战前十分之九，四二年已超过了战前的产

量。其他手工业作坊、矿业、油房、粉房等亦有大发展。公营工业占工业中的重要部份，一九四〇年以来，建立了修械、制铁、纺织，化学、火柴、造纸、工具、被服、印刷、制药等工厂，这些工厂产品的质和量都在不断的提高当中。

四三年五月展开的张秋凤运动，更发扬了工人生产的热忱。军区炸弹厂倒炸弹每天平均产量增加百分之廿，一般学徒亦能增产百分之十七。张秋凤领导的小组，发明了试制炮弹新法。西北化学厂，四月份生产量比过去提高百分之廿五，五月份又比四月份增加生产百分之十三。

工人的创造性也大大的发挥了，如油墨、颜料、木锭床、铁轮织布机、手摇纺纱机、油墨滚子等都一一试制成功。

部队生产方面。一九四一年军区部队开荒六万亩。三分区某旅自己开油房、豆腐房、粉房；进行造纸、织布、挖炭等生产。前年该旅已作到每八个人喂猪一口，每一伙食单位喂羊廿只，蔬菜作到全部自给。据统计，四二年一二〇师部队生产总数达二千万元。

素称贫瘠的晋绥边区，人民逐渐走向丰衣足食的境地。

民主政治

自从新政权建立以来，即遵照实行民主政治的方针，积极筹备村选。第一次行政会议上确定了村区长民选的原则；第二次行政会议上通过了村选暂行条例与村政权组织暂行条例。经过一九四一、四二年的努力，大部份地区，村选都收到了很大的成绩。四二年又试办区选。后来在这种基础上筹备了晋西北临参会的选举。

经过了一年的筹备，一九四二年十月晋西北临参会召开了。大会参议员一百四十五人，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以及抗日军人、工、农、商、学、文化界等人士。也有满、回、国际友人、朝鲜民族的代表。一四五位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只有四十七人，未及三分之一。

在临参会召开的时候，敌人曾发动了对边缘区的“扫荡”，企图破坏大会的开幕及阻止各地参议员赴会，可是各地参议员仍冒着一切的危险赶来。如朔县参议员红邦领袖蔡原老先生，已经是七十高龄，还日夜跋涉，走了七百里路，冲出平鲁、朔县敌两重包围，到会出席。岢岚六十一岁女参议员张兰女，虽已老态龙钟，还骑着毛驴，爬山越岭，走了七八天路程赶到。

经过十八天的讨论，大会通过了“巩固和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保障人权条例”，“减租交租条例”，“减息交息条例”，“扩大民兵、加强地方武装以增强对敌斗争”等一百一十二件。选举了续范亭、武新宇为行署正付主任，贺龙、刘佑卿、张文昂、白如冰、杜心源、王达成、张韶芳、张嵩轩、刘菊初、樊沚如、刘饱德、孙良臣、王缮、常耀五、武进卿、王法文、汤平、郭顺道、梁选众等十九人为政府委员，林枫、刘少白为正付议长。大会选举后，士绅参议员樊沚如说：“我们的参议会很隆重，富有民主精神，大会的选举，非常郑重，没有任何包办的地方。选举的结果，共产党员也没有超过三分之一。”大同参议员张登荣说：“开了这次大会，听了林枫先生的报告，我相信共产党是真诚坦白的，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没有了。”

敌占区的民众听说临参会开幕，更欣喜若狂。某县代表林子茂在来会途中被敌人发觉了，敌人几次追踪包围了他，可是他还是冲出了敌人几次包围，绕道前来，沿途转折了半月。敌

占区参议员赵贵庵登台说："我来自敌占区，目睹敌人烧杀劫掠，今日看到民主选出的政府，人民亲献鲜花，心中悲喜交集，不禁落泪。"阳曲沦陷区民众在给临参会送的布幛上写着："我们身在敌伪压迫下，我们的心向着临参会！"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7月16、17日）

新山东的成长

（敌后抗日根据地介绍之四）

侯森

山东地少人多，是中国会门的发源之地。会门在六十种以上，多数是农民的带反抗性的组织，有些甚至是半武装组织。许多沿海的人民更有抗倭的斗争传统，胶东的海滨现在还可找到防卫倭寇的寨堡的遗迹。民国以来，山东人与日本人结仇日深，东北沦陷，关内创痛最深切的是山东人（迄今最困难条件下，胶东每年收入东北汇款尚以万万计）。山东又是历年南北军阀混战的场所，长期处于张宗昌、韩复榘辈黑暗统治之下。深刻的民族仇恨，军阀的残暴，山大王（地主恶霸）的淫威……这一切灾难及其反抗，武装了山东人民（民间存枪卅万决不是最高估计），丰富了他们武装斗争的经验，他们无时无刻不想从这些束缚的罗网中解脱出来。

抗战爆发了，日本鬼子以前所未有的武力向山东压来了。九月底德州失守，十月中旬国军退出黄河北岸，十二月廿四日济南失守……三路军望风南逃，县长们纷纷开小差，汉奸乘机活跃，抗战无人领导，山东这时正如一只遇上飓风大浪、快要沉没的航船，山东的共产党员义不容辞地出来领航了。

徂徕山起义

远在抗战以前，从延安开会回去的山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就筹划着日寇进攻时，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敌人还没有进入山东境内，全山东各个地方党的组织便进入具体布置的阶段。敌人攻占黄河北岸的时候，省委书记黎玉同志来到泰安，和有三四十个党员的泰安县委，一起布置鲁中山区的游击战争，所有的武器是一支有毛病的盒子枪，两支"汉阳造"，除开从山西来的一位红军青年干部外，全部人员连黎同志在内，对打仗都一无所知。一九三七年的最后一天晚上（第二天敌人占领泰安），他们和一群平津流亡同学，按照计划，往徂徕山下的山阳村集合。这支三杆枪的队伍便叫做山东人民抗日自卫队第四支队第一纵队。这个村子有一个本地同志，他早就集合了四五十个农民，有二十多条土造和三支钢枪在等待着，叫做第二纵队。他们一汇合，便上山去，住在徂徕山上的一个大庙里。当时大家所有的还只是满腔热血和金石不移的决心，至于仗怎么个打法，前途到底如何等等，还是有些茫然。因为力量不足，名义还不敢公开，然而周围的老百姓却传开了，说："红军、八路军来了，有好几

千！”“咱们得救了。”于是几天之内，附近一百多农民，都抗起土枪、大刀、红缨枪上山来了，他们要参加八路军，打日本，保家乡。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往东走了几十里，和同时发动的新泰、莱芜、泗水的三个纵队相汇合，四支队就成为四五百人和一半有枪的不小的队伍了。随着试探性地在宫里、良庄等地打了几次小仗，这样名气就更闹大了。为了便于对敌斗争和动员群众，又分成南北两个纵队分散行动。三月底，北纵队打开了莱芜城，打垮了维持会，他们请专员秦启荣派人来当县长，并帮助成立保安队，一个多月以后，以反共为业的秦启荣便“过河拆桥”，驱逐北纵队出莱芜。这支好说话的，没有经验的山东本地农民和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抗日军，忍气吞声地退往博山一带。南纵队在新台公路的四槐树打了个埋伏，炸毁敌人三辆汽车，鬼子死伤四五十，这个胜仗兴奋了鲁南各阶层的人民。老百姓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他们情愿挨饿，吃红尖饼，不收老乡送来的馒头；下雪天，“官长”的鞋子都给战士穿；学生们打赤脚，吃地瓜也不叫苦……又真能和日本打硬仗。农民们对他们实在高兴，都固执地要求参加。五月间，南北纵队又在莱芜集中，近一千人了，都已经穿起新做的军装。秦启荣这家伙仍占据县城作威作福，准备打他们，说他们是“乱党”。他们再一次忍让着退到泰安莱芜的边境，主观地想“以诚动人”。对秦启荣深恶痛绝的本地老百姓，可不满意这种退让，他们都要求这支好队伍对秦启荣的无理进攻，进行必要的自卫，他们说：“你们越让，他就越欺负，和这种混蛋没道理可讲。”有的气愤愤地说：“你们打，硬馒头、肉，什么都有；不打，连尖饼都不送。”

四支队后来进入鲁南，配合徐州战役，今天就是山东人民的子弟兵——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第四旅。

能战斗、能胜利

济南失守前后，韩复榘政权、军委会别动队、地方民团，以及各种会门搞起来的武装组织，名称复杂，为数不下二百六十股，大多数是藉此要钱、要粮、或奉命限共、反共的。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开始打仗以前，全山东的各种武装组织是找不出任何民族胜利信心的。山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尽管绝大多数没有作战经验，却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团结人民和敌人坚决战斗，才能取得经验和办法。三七年底到三八年初，一个多月以内，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民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不下二三十起。

十二月廿四日的深夜，胶东的地委书记李琪同志，集合了十七个人，两支枪，在文登天佛山的小庙里，组织了一支军队。不到两个月，便发展成为六百多支枪和一千多人的队伍。三八年的二月十三日，他们以十分之一的力量，晚上九十里急行军，于第二天雪后拂晓，冲进牟平城。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将伪县长宋健吾枪毙了。下午两点钟，他们在离城不远的雷神庙歇下。敌人很快增援反攻，五辆汽车，二架飞机，共六百多人。因敌人来得太猛，有廿五个主要干部来不及撤往山中，他们就以庙内的房屋作阵地，和凶骄的敌人顽强战斗，一直打到天黑。他们之中有好几个是过去农民暴动时的神枪手，于是每一窗口、每一房顶，都发生剧烈的争夺战。外面进入山区的部队，用步枪打下了一架忘形低飞的飞机，击毁了三辆汽车，有力地援助他们。他们最后冲出重围时，李琪同志牺牲了，有十来个负伤的。敌人伤亡了五十多人，也不敢久战，仓促撤退了。这是第一次振奋胶东人心的大胜利，不但老百姓，就是在徘徊观望的国民党地方军队，也发觉敌人并不可怕。这支英雄的队伍，三月七日又攻占了福山城，汉奸武装三百多被缴械，伪县长陈昱被俘。之后不久，他们与清河来的起义队

伍（后来的八支队）汇合，恰遇敌人在龙口登陆，他们就抢先占领岸上阵地，和敌人打了一天，并用古老的土炮打沉了敌人一具小型装甲兵船，终使敌人这次未能在龙口登陆。其他地方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队伍，最初也都是这样战斗着，壮大起来。

山东的人民是纯朴而英勇的，他们根据自身的经验，选择了共产党所领导的从本地生长的八路军，作为他们战斗和生存的依靠。到三八年秋，八路军山东纵队已略具规模，成立了九个支队，共达三万人左右，攻入和收复过十几个县城，在胶东蓬莱、黄县、掖县建立了最初的抗日政权。鲁西北党的组织，更帮助了"抗战老人"范筑先，开辟了鲁西北三十多县，和由一个营发展到三十六个支队的抗日局面。

夹 攻 中 奋 斗

山东人民就这样蜂拥地武装起来了，山东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全民的姿态站立起来了。航船冲破风浪前进着，然而她还得时时防备无数的海中暗礁。

三八年秋沈鸿烈来到鲁北，他奉命与河北的鹿钟麟建立反共的"冀鲁联防"。从此山东风波横生，环境日艰，山东的人民和共产党、八路军，就长期过着两面夹击的生活，其中曲折、隐痛、艰困、忍辱，灾难一一描述。沈鸿烈首先公布对抗战团结无限危害的三条：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准扩大，要接受改编，要划定防区。随后到鲁西北挟其地位，对范筑先将军的坚决抗战和进步设施，用各种卑劣手段阻挠，最后于三八年十一月的聊城之役，驱使范筑先孤军守城，断其后援，这位民族老英雄便作了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壮烈牺牲。鲁西北的糜烂局面，直到一一五师主力于三九年春进入鲁西后，才转变过来。

三九年和四〇年是山东磨擦最频繁的时期。这时山东反共军内流行着三个口号："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另外还传布三种对待抗日人民的办法："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这一套做法，国民党反共派的将军们都忠实执行了！向八路军大小规模的进攻、活埋、暗杀……事件、几无时无地无之。如三九年四月博山的太和事件，秦启荣部惨杀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指战员三百余人，内有政治主任、营长及连排长以上干部七十多人。同年八月在莱芜的雪野，乘四支队在泰莱公路出击敌人的时候，秦启荣亲率所部向该支队雪野后方合击，使军民遭受严重损失。这里有一个山东纵队三九年六月到十二月，在顽夹击形势下的统计数字：

与敌人战斗次数二〇九，毙伤敌四、五四五名，伪二五三名，俘敌伪五三二名，缴枪一、〇三七支。我伤亡一、二四三名。

国民党反共军进攻九〇次，杀人一、三五〇名，扣人（大半无下落）八一二名，烧房子仅寿光一村达一〇〇家。

四〇年山东国民党反共军完全停止了一切抗日行动，专门对付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这一年，八路军因此所受的损失，超过对敌人反"扫荡"的损失。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动，是敌后斗争环境所决不允许的，这种不幸的局面更促起人民的觉醒：非壮大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便无法生存，无法对敌进行战斗。到四〇年底，山东已有七十多县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雏型，八路军比三八年秋扩大了两倍，群众组织已达三百万，成立了各级参议会，选举了山东最高政权机关——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后改战时行政委员会）。尽管夹攻的形势没有改变，然而山东的面貌却焕然一新了。

转变工作的关键

四一年的局面更艰难。国民党反共军公开投敌事件日益增多。敌人增加了三个独立旅团，配合十二万伪军，"扫荡"空前频繁与残酷起来，特别是十一月开始对沂蒙区两个月的大"扫荡"，和接着第二年春天对各地延时几月的轮番"扫荡"，使山东根据地的形势发生逆转：基本区缩小了，敌人占去成千的村庄：战略区被割成几块：军队和干部遭受相当的损失：特别严重的是许多群众组织遭受摧残。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形式主义、太平观念、骄傲、麻木、粗枝大叶……都露出原形。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以求进一步改善工作。转变的关键是群众工作——一切工作的基础的深入和巩固，必须从解决群众的切身困难来动员和组织他们。

经过了深广的思想动员，有一千多干部被派下去，帮助农救会开展减租减息增资运动，鼓舞和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生产关系。

四二年的秋天和冬天，给农民们带来无限的兴奋和喜悦，到处都在开群众大会，讨论减租减息的问题。佃户们在农救会领导下，编成小组，自己算好账，集体带上口袋去地主家退租。费南县的张李庄，租佃关系很多，新改选的农救会长团结了全体佃户，大家一致宣誓："一定要退回租子，谁都不要溜沟子。"八十多个佃户到了最顽固的地主王希富家里，有三十多个说了话，王希富理屈词穷，只好答应退租。这一天，有九家地主都自动答应退租。

莒南县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底四十五天中，彻底完成减租的有一六二村（包括退租、订约、取消一切额外剥削、进行教育等），减租的业主五八三户、佃户一、〇四〇户。共进行了反贪污、反恶霸、反官僚主义……等斗争一百多次，农会会员扩大四七七一人。斗争进行最热烈时，攻克了黑家岭据点，农民都携带最好的白米和鸡、肉，前去劳军。滨海其他地区退租后，农民们每天站岗放哨更为积极，对于冬学中所讲的吴满有、郑信等劳动英雄，感到很大兴趣。有的村子还大家集资为民兵购买枪枝子弹，作新衣裤。

除开对极少数最顽固地主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外，农救会进行减租减息工作一般都采取说服、调解方式。为了照顾各阶层利益，富农收入除农本按八折算负担，不能回家的地主，政府用各种方法通知其前来领地租，各地又普遍召开了主雇座谈会。雇工提出在战时要切实帮助雇主藏粮藏草，帮助人口转移；雇主则认为自改为粮食工资后，雇工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减租减息增资运动，鲁中与滨海区在四二年到四三年上半年已经基本完成，胶东、渤海、鲁南去年都次第展开和积极完成中。山东原有的和重新动员组织起来的群众（民兵、自卫队在内），去年已占基本区人口的半数。民兵总数已达五十万。贫农、中农的经济地位改善了。滨海区去年春天收容敌占区逃来难民六万多，清河垦区收容难民十一万以上。中上阶层对新的民主政权也有了信赖，许多外逃地主回家了，开明地主士绅则参加了各级三三制政权，与其他阶级一起为抗战事业奋斗。

新的英雄主义

山东八路军的武器有一半以上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他们对敌作战最感困难的是子弹缺乏，他们不得不拣子弹壳，自己设法做手工弹头，装土药，翻造使用，此外用土法造手榴弹和地雷（这些，还要供给民兵一部份）。但是落后的装备并不能妨碍八路军和民兵打漂亮仗，

他们是以新的英雄主义武装了的，这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四二年一月的郯城歼灭战，采用了集中火力，突破一处，急行奔袭的战术，在整个的攻城战中，八路军仅伤亡了七个人，然而所获的代价呢：攻下据点十余处，俘敌官兵七名，俘伪军六百余名，缴步枪八百余支，其他重要军需物品数不胜数。

同年十一月十日泰山区的反"扫荡"中，三四千敌寇紧紧包围了博山东部一座极其险要的马鞍山岗，在百米外的山头上，敌人设置了两门平射炮，对准马鞍山的寨门，不断轰击，飞机更轮番轰炸，火光、烟雾、爆炸声，笼罩了整个山岗。山上廿八个守卫者，镇静而坚定地掌握着自造步枪和土炮，抵抗攻山的敌人。从黑夜到天明，他们一息不停地坚持了两天，打死了一百多敌人。直到弹药用尽了，山顶的碎石投完了，他们只得进行白刃战，用枪托打敌人。领导战斗的王排长将最后一粒子弹打入自己的胸膛，战士们也先后携枪堕崖殉国。这种英勇牺牲的精神，感动了在山上避难的冯老先生，他向全家人说："我们不要让鬼子活捉了去。"他和他的女儿、儿媳、两个孙子都随着八路军的英雄，跳入深崖。

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去年十一月南北岱崮的保卫战。这次保卫战对粉碎敌人的"扫荡"起了决定作用。距滋阳四百廿米和二百四十米的两个崮顶，敌人用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空军中队和一个伪军团，一直疯狂进攻了十八天，炸弹炮弹花费了四十万磅以上，还用了烧夷弹和瓦斯弹，而它们的抗击者和坚持者——八路军的指战员九十三个人，面对着四十倍之敌，在伤亡上却造成了十五与一之比。最后全部人员安全突围，其中最壮烈的是南崮南门的保卫，八架飞机整日轮番轰炸，八个骡子拖的重炮昼夜集中轰击，交通壕被炸平了，掩体被炸烂了，蓄水洞里的水缸开始震裂了，个别防空洞门口塌陷了，战士们被炸得抛离地面，身体较弱的震得口鼻流血，一切都翻腾起来，但是战士们谁都不离开岗位，他们只有一个决心："门是我们的，至死没有退缩，等敌人上来，一刺刀戳下去。"受了伤的拒绝休息，每天紧张战斗的十九个钟头内吃不到饭，后来几乎喝不到一滴水。最后决定突围时，战士们能用惊诧与怀疑去听干部们的解释。

四〇年的孙祖、五井歼灭战，四一年大崮山保卫战，四二年对崮峪、南墙峪的保卫战，以及清口十八勇士的壮烈牺牲。……这些大无畏的精神，新的英雄主义，为全山东人民永远向望、永远歌唱。

七年来山东八路军伤亡是很严重的，总数在六万人以上，其中百分之五十七为干部，百分之四十五为共产党员（百分数是去年的统计）。如以步兵连计，七年来连排干部因伤亡而整批掉换者不下十余次。山东现有兵员共七万人，几乎百分之百是山东人，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东人。

山东伪军那里来的

一方面是可歌可泣的战斗，另一方面则有遗臭万年的勾当。四二年是山东国民党反共军变化最大的一年，"暗中"投敌自保，借刀杀人的办法越用越普遍，结果这些"兼桃部队"（打起抗日招牌，实际公开或半公开，接受敌人番号进行反共），都被敌人改编成正式伪军。太平洋战争初期，一度速胜论受到打击后，失败论空前增长，反共军公开投敌者接踵而至，荦荦大者，有：鲁中吴化文，滨海厉文礼、张步云，胶东秦玉堂，鲁南荣子恒，清河周胜芳，冀鲁边曹振东，湖西孙良诚等。反共军的投敌，使山东几年来伪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增减比例，成为令人极其痛心的数字。请看这个统计：伪军数——四〇年八万，四一年十二万二千，四

二年十五万七千，四三年十八万。国民党军数——四〇年十六万六千，四一年十二万，四二年八万，四三年三万（连鲁西区五万）。现在山东是华北伪军最多的地区。

去年三月李仙洲部入鲁了。三月十日李部进入鲁南的第一天夜晚，便包围了滕峄边黄子口的村民，从深夜到天亮，用崭新的新式机枪和步枪，"痛剿"民兵，并把全村的粮食抢得干干净净。十五日，该部又由南北两面，大举"围剿"，滕峄边号哭着的逃难的老百姓，这时白咳的敌人和汉奸队，也由北向南配合着进行"扫荡"。不管春荒怎样严重，李仙洲的付官们到村子里就挥动着木棒，吆喝着："没吃的也得给，就是这么回事。"老百姓偷吃一点高粱皮和树叶的"糊涂"，都成了"犯罪"行为。有些地主原企望着中央大军进山东来，现在他们伤心地唱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

由于和人民如此尖锐对立，结果粮食不继，穿不上衣服；又因进攻八路军而捉去的俘虏，被好好放回了，连伤兵都医治了，这使得在兵士们面前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诬蔑都破产了。于是李仙洲部士兵逃亡的现象严重地发展着，一个开小差的连长说，他那个连逃的只剩两个兵。李部入鲁时共二万五千人，去年八月离鲁时，仅余五千人。

在敌后的艰苦环境中，既不抗战，又和人民作对，这不仅对国家民族不利，即对于执行此种政策的人，也会"自食其果"。

进 入 新 时 期

四二年以来，山东敌伪据点增至二千五百个以上，封锁墙沟达八千四百多里，公路一万三千多里。敌人抽出一万以上的兵力经常、机动，炮火增强，兵种加多，对山东各战略分区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频繁普遍的分区"扫荡"。计四二年度大"扫荡"十九次，小"扫荡"七十九次。四三年度（第七周年）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五十次，其中九月下旬开始的，二万五千兵力的三个月轮迴"扫荡"，敌人自称为"对华六大战役之一"。经过二年的苦斗，山东八路军终于在去年秋季，将军事主动权夺取过来，配合着政治的绝对优势，在一元化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结合之下，各战略分区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敌伪展开攻势战。鲁中歼灭了山东伪军主力吴化文的大部，完全控制了沂鲁山区，使鲁中根据地联成一片。鲁南经过打死刘桂棠、刘国桢、击溃荣子恒等战役，将敌人从其所控制之我中心地区完全驱走，收复了滕峄边，并打开了邹东、滕东、郯北、郯西边联区，收复了崮口山区。滨海攻克赣榆城活捉李亚藩，完全粉碎敌人沿沭河的封锁线，南部保持了原来形势，北部有新的开展。渤海恢复了小清河以南地区，摧毁了利（津）博（兴）边封锁线，改善了冀鲁边一二分区残酷的斗争局面。胶东一般保持原状，南海方面较有开展。总计抗战第七周年，山东八路军共攻克据点八百余处，解放村庄八千余个，人民二百五十余万，收复地区三万平方里以上。

在军事和行政上，山东目前分为五个独立区域：鲁中、滨海、鲁南、胶东、渤海（冀鲁边与清河合称），共设有十七个专署（据最近材料，滨海又新设二专署），管辖九十五个县政权（包括新县治，海阳一城尚在我手）和一千三百五十万人民（全区总人口二千九百万），我们现在所指的山东根据地，其范围是津浦路以东，北迄天津与冀东衔接，南至陇海路与华中新四军为界。除渤海区为辽阔的平原外，其余各区均为群山起伏，间有小块盆地渗杂其间，其中沂蒙山区则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中心，南可协助鲁南、滨海，北（东）可支援渤海、胶东。在滨海、胶东、渤海三区，尚有为八路军所控制的七〇〇多里海岸线，其中有某些小港口可停船舶。

一年来的胜利攻势，山东根据地形势已大为改观，大部已恢复四〇年状况，并有新的开展，掌握了某些战略支点，部份改善了过去被严重分割封锁的局面，相当缩小了敌人占领地区。但敌人的兵力仍甚强大（敌伪兵力在廿万以上），战略强弱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敌人的机动力量较前更有增加，因此，优势兵力“扫荡”的突然性必然会增大，其手段也将更加残酷，某些地区也仍有被分割蚕食的可能，困难尚未过去，还有一段更加艰难的路程。今天山东的任务是巩固已得胜利，生息自己力量，不失任何打击敌人的时机，粉碎敌人更疯狂的进攻，熬过最后难关，准备迎接最后反攻的新的斗争局面。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7月21、22日）

屹立在南海上的东江与琼崖抗日根据地

（敌后抗日根据地介绍之五）

张　　樾

在华南敌后战场上，有两支抗日人民武装，和敌伪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战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琼崖抗日独立游击纵队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活跃在广九路侧与珠江三角洲上，它的作战地区包括广东的省城广州及宝安，东莞，惠阳、中山、顺德、南海、三水、番禺等县和九龙半岛。广州、香港的敌人感受它的严重的威胁。现在它已壮大成为一支拥有几千人的武装。

在海南岛上则活跃着另一支队伍——琼崖抗日独立游击纵队。它在海南岛的东北部与西北部不断围困着打击着敌人，在这个岛上，除了琼山、文昌、琼东、定安、临高、澄迈等六个县城被敌侵占外，广大富庶的乡村，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现在这两支队伍配合着广大民众抗击着敌寇，一个师团、一个旅团及广东伪绥靖军五个师及海南岛全部伪军，控制了数百里的海岸线，威胁着敌香港、广州等重要城市。五年余来，华南我部共与敌伪作战数千余次，粉碎了敌伪近二十次较大“扫荡”。它是坚持华南敌后抗战的惟一的力量。

活跃在珠江三角洲上的东江抗日游击纵队

东江抗日游击纵队，诞生已经六年了，在它的发展史上，曾经过一些胜利和挫折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敌军由大亚湾登陆，直犯惠阳，当时惠阳的守军，在敌军未到以前，已仓惶撤退，惠阳、及广九路西侧地区，就陷入了非常混乱的状态，敌寇便因此长驱直入，毫不费力的仅仅七天工夫占领了华南的最大城市——广州。

当时，广东民众对于守军的不战而退，非常愤怒。特别是敌伪残酷的破坏骚扰，使他们深深感到人民大众自己武装起来保乡卫国的重要，于是他们挖出了过去埋藏下的枪枝，拾起了溃军丢下的武装，来武装自己。

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三八年底当敌军进攻广州时，虎门要塞的守军撤退了。里面满堆着枪支炮弹，眼看着这些武器要落入敌手，虎门对面的群众便泅水过去，把十几挺轻重机枪背了出来武装了自己，把炮弹统统丢到海里。

第一支人民抗日游击队伍的参加者，有香港的工人，有当地农人，有学生，也有过去散布在东江一带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的领导者是过去在香港作工人运动的曾生同志。这一支一二百人的队伍，从三八年十一月起就在惠阳一带参加了战斗。三八年底他们威胁敌军退出了惠阳城，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抗日情绪，坚定了他们胜利的信心。不仅广大工农群众踊跃参加这个队伍，就是各阶层的抗日力量，也愿意接受他们的领导。

在三八年十月，惠阳守军曾不战而退，使惠阳一度沦陷，可是当东江抗日游击纵队从战斗中迫使敌军由惠阳撤退后，他们又开回来了，向我游击队“收复失地”，盘踞了惠州城。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取消”东江抗日游击纵队抗日的活动，经常以各种办法，阻止东江抗日游击纵队得到给养，企图使它在不断的战斗中得不到休息补充，企图使它在对敌斗争中被敌人“消灭”。

可是，他们这种阴谋失败了，因为东江抗日游击纵队有广大民众的支持、接济。

一九三九年当局忽然答应了我们过去的要求，给予番号，进行谈判，并给予新编大队第二大队的名义，但要调到兴宁整训。可是当东江游击队开到兴宁时，就爆发了坪山事变。在反动派阴谋布置下，东江抗日游击纵队一部被包围缴械了，损失了几百人枪，番号也被取消了。

后来，该部自动挺进广九路两侧抗敌，与宝安、东莞等地共产党东莞县委王作尧同志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联合起来了。到一九四一年，这两支队伍，正式成立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

对于这支新生的力量，敌人曾发动了无数次进攻，一九四一年敌寇曾以二千余兵力配合伪军不断的轮番进攻，都被我军及民众打退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来驻在广州的敌军配合一部份登陆部队，由陆路进攻香港。这时东江游击纵队就以积极的行动，配合英军进行香港保卫战。我军除了在铁路线上伏击敌军，破坏敌人运输外，更挺进九龙，给敌人后方以有力袭击。那时香港一带盛传中国游击队攻入深圳，就是指的这个部队。

港岛沦陷，东江游击纵队更出死入生的抢救沦陷区的国际友人及同胞、侨商等。许多政府人员，文化界人士及侨商，通过大鹏湾等地封锁线，经过东江游击纵队的保护，安全的到达内地。事后，许多国际友人及同胞们都写信去感谢他们的救护，并愿意以实际的援助行动来报答他们。

一九四三年后，敌对东江抗日游击纵队力量的不断生长，更感害怕，对游击队的行动，更感威胁。敌寇的对策，除了扩充伪军，把伪广东绥靖军的兵力，由两个师扩大为五个师，以便向我军进攻外，并且将华北华中的“扫荡”“清乡”办法，用之于华南。

一九四三年中，敌对我军“扫荡”的规模与残酷是空前未有的，如万人的“扫荡”东莞，十余路寇军的合击宝安沿海地区，五千人的围攻中山等等，都一一被我击退。敌每次作战后总宣布“共匪已被消灭”“王作尧被击毙”等等骗人的消息，老百姓是明白的，不用多解释，敌人下一次“扫荡”的行动中，王作尧又会在敌人公报上出现的。

经过大规模的“扫荡”，一九四四年春敌寇遂开始了“清乡”，以五十七师一部，配合

着伪广东绥靖军绝大部分（四个师）集中于广九路西侧向我东（莞）宝（安）地区“清乡”，并以伪省长陈春圃为首成立了“清乡委员会”，组织了“清乡宣传团”“政治工作团”，配合敌伪武装，进行特务活动，我东江部队以更灵活敏捷的方策迎接了这种新的斗争环境。他们一方面配合广大的人民坚持着原有阵地，打击敌伪的“清乡”部队及特务；一方面则以主力挺至敌后以先发制人的手段向敌之交通线展开出击，曾两度攻入广九路林村车站（一月四日与二月四日），二月四日突袭横沥火车站，二月十五日与二十九日两袭平潮火车站，二月十三日将广九路宝安段破坏，尤其是五月廿一日突袭九龙市炸毁敌铁桥，造成了香港九龙敌寇空前的恐慌。在我强有力的内外进攻下，使敌伪之“清乡”毫无进展。

东江游击纵队不断的处在敌伪和友军的双重进攻下。但在广大民众拥护下，把一切困难和障碍都克服了。而且本身还在不断的壮大中，它在战争中已锻炼得更坚强。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东江抗日游击纵队，通电全国，发表宣言，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以曾生、王作尧为纵队正副司令。

今年以来该部活动更趋积极，不断向广九路沿线各要点展开破袭，更竭尽一切办法，营救沦陷香港的国际友人。如今年二月下旬我军在九龙为救一美空军人员，与敌伪激战四昼夜，后来又粉碎了敌伪千余人的海陆合围。四月上旬，突袭香港，救出了印度士兵十七名。五月二十六日，我军在香港附近大亚湾营救五位美飞机师脱险，将其护送至大后方归队。据不完全统计，沦陷港岛的国际友人经我护送脱险的已有六十余人。

现在的东江抗日根据地，东接惠阳，西至三水，北达广州，南迄大海，总面积约六万平方华里，总人口约四百五十万以上。在抗日根据地中，各级政权已逐渐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如抗日互助会等），已普遍于村镇中。在我抗日政权直接领导下的群众已有一百余万。

琼崖抗日独立游击纵队坚持了孤岛抗战第六年

海南岛是我国南海上的一个大岛，面积约三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三十万（其中黎民约五十余万）。中部为五指山山脉绵亘全岛，其东北部地势大部平坦，河川纵横，森林茂盛，村落稠密，土地肥沃，且雨量充足，适于耕牧，为我国南方一个天然农场。

海南岛的形势尤为重要，它位置在南海之中，为通往越南，马来，荷属婆罗洲及菲律宾之要道。一九三九年二月敌侵占海南岛后，即积极加以开发，作为南侵的“跳板”，作为进攻南洋的“兵站基地”，可是这一切的计划，都在我琼崖抗日独立游击纵队及广大人民的打击下挫折了。海南岛抗日游击战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抗战爆发前，内战时代留在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接到了党中央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文件，就派人去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要求合作抗日，可是一直未得答复。

抗战爆发后，当局更无意守护海南岛，一九三八年初就把原驻海南岛仅有的一师兵力撤走了，只有二个保安团留在那里。海南岛人民感到敌人威胁日亟，遂自动要求武装，在民众压力下，总算谈判成功，以冯白驹同志为领导者成立了“广东琼崖抗日自卫队独立队”。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敌在海南岛登陆，先侵占琼山、海口、盈丰，再进攻儋县，并在三亚湾登陆。当地地方守军纷纷溃散，国民党官吏闻风而走，海南岛秩序非常混乱，这个时候，各地民众都要求我军去驻扎，去保护，要求我们领导进行抗战。我们的队伍，就扩充成了六个中队。

这个时候，我们不断以游击战袭击敌人。三九年五月，我军在琼山东南龙板　伏击敌汽

车一辆，将其击毁，缴获轻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六支，消灭敌军小队长以下十余名。六月我军袭击琼山西永兴市（海口通临高公路上）敌据点，把驻守敌军大部消灭，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数支。同月，琼山我军在西长村桥也取得了胜利，歼敌多名。三九年十月底，我军在澄迈南围困了敌寇设防较强的那大据点，经过一星期的围攻，敌怆惶退走。十一月我军围攻文昌西石桥学校驻守的敌军，第二天敌被迫败走。同月，我军又收复文昌以南文岭敌据点。

在我军不断打击下，敌伪发动了报复进攻。三九年九月敌军一千多人，发动了四路进攻，合击琼山地区我军。我军主力转移到外线，给了敌寇一个内外配合的夹击，把敌人打退。以后敌寇发动过大小数十次的进攻，都未得逞，后来，敌加强了驻守海南岛兵力，不断发动对我军的进攻，我军的活动更是艰苦。

我军英勇战绩，集小胜为大胜，振奋了孤岛人心，给他们以很大的感动。各学校学生纷纷要求参加军队及救亡工作，各地民间武装力量纷纷要求我们领导抗日，连远处南洋各地及香港的琼崖侨胞，在南洋各地未失陷前，也组织了救乡服务团回海南岛工作。新加坡、泰国、香港侨胞也募捐经费及药品，捐赠我军。香港华侨送来毛毯、卫生衣，新加坡侨胞曾组织"援助琼崖抗日游击队"的运动，每人每日认捐经费若干，一共捐了万多元叨币。

一九三九年底，国民党琼崖专员吴道南到了海南岛，海南岛的反动逆流就上升了。到任后不到两个月，就开始在各地抓捕共产党员及抗日进步人士，制造磨擦。把我们派去的代表杀了，并五度向我进攻，每次都被我严正的阻止着了。可是，每当敌军进攻的时候，他们就逃之夭夭。

我军在广大民众支持下，坚持了三年的孤岛上的游击战争。至一九四一年，部队已发展到数千人，成立琼崖独立游击纵队。同时，我军更积极攻击敌军，去年二月三日，我军袭击三宿敌据点。八日在龙江市埋地雷，炸毁敌汽车多辆。去年四五月，敌连续对我进行"不断的扫荡战"，我军也把它一一的粉碎了。特别是去年五月九日，盟机出动轰炸海南岛三亚湾等地后，海南岛上敌我的战斗更激烈了。

海南岛本来是敌寇南侵的兵站基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敌即以全力经营海南岛，建筑机场、仓库、兵营，并把榆林港、三亚湾等地改为潜水艇基地。海南岛上物产丰富，盛产糖、橡胶、水产、食盐。海南岛的林产茂盛，自日寇侵占海南岛后，因军事之需要，岛内森林已被积极采伐，最近因敌寇船舶缺乏，积极提倡造木船，海南岛即为敌寇建造航驶于越南、香港、广州湾一线木船的大本营，设立大规模造船厂。可是敌寇赖以维持交通的木船运输，也在我游击队及盟机威胁下，时常遭到袭击而陷于停顿。

五年来的英勇奋斗，创造了琼崖（海南岛）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一年成立的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四四年春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我在海南岛东北琼山、文昌、安定、乐会、万宁、琼东、临高、澄迈等八个县中建立了县、区、乡的民主政权，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改为抗日民主公署，在我抗日民主政权领导下的民众有一百五十多万。

现在，华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拥有三百万人民，数万的人民武装，近万的正规部队，这支人民的军队，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着，成为坚持华南敌后抗战的唯一力量。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1日）

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

(敌后抗日根据地介绍之六)

编者按：晋冀鲁豫边区，最近因作战指挥的方便，军事上已经分为两个单位，即晋冀豫（包括太行太岳）与冀鲁豫（包括原来的冀鲁豫和冀南）。

初 建 奇 功

虽然有了平型关的胜利，忻口仍然吃紧，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同志又把一二九师的一部份派遣到战云密布的雁门关一带，二十四岁的陈锡联同志，带领了七六九团的健儿，便进到靠近代县的滹沱河东岸，侧击敌人的补给线。

滹沱河的战争很紧张，敌人的飞机从朝到晚的轰炸，来势凶猛，非常使正面作战的队伍头痛。陈锡联同志决定配合友军作战，首先要搞掉敌人的飞机场。从飞机飒然而来的情况判断，机场似乎就在附近。果然在第二天便侦察出阳明堡机场的所在了。夜袭阳明堡，火烧飞机场，这名振中外的战斗，便安排在十二月十九号的夜晚。

当蒙蒙月亮躲到一团黑云中去时，三营的赵宗德营长同他一个连的战士，便悄悄偷过了哨岗而到了飞机场里了。没有见过飞机的战士们，骤然站在这些钢身的大鸟前边，抑制住狂欢而用指头敲着那钢铁的机身，试探着，而且盘算着如何夺取这些铁鸟。他们急步向前，企图先消灭盘据阳明堡的香月师团部队。然而被敌人发觉了，他们占据飞机场，敌人向飞机场开了枪，在梦中的飞机师也被惊醒，慌乱的在机身上也板开机枪，于是这一连的战士都隐蔽在机身底下，扔着手榴弹，飞机燃烧起来了，一架两架，廿四架，所有飞机全着了火，子弹的声音在火光中更密集而响亮。接着探照灯划过了黑夜的空间，从这方闪到那方，向四野搜索。站在滹沱河东岸指挥的陈锡联同志，看着他凯旋而回的部下，他欢迎着他们，充满着胜利的愉快，然而他也沉默了，跟他一起很久的忠实而勇敢的赵崇德营长与十几个战士都光荣的牺牲了。他在出发前就抱着必死的决心，留下了他的文件，和他仅有的三元钱。他们牺牲的代价是稳定了太原以北的战场，激励起更高的士气。

沿路老百姓排着酒席欢迎我们的陈锡联同志，他们呼喊着他的名字，流着泪，把儿子，把丈夫交给了他。

发 轫 在 太 行 山 上

当忻口敌人遭我中央军与八路军的前后夹击，攻势受挫时，石家庄敌人即沿正太路进攻娘子关直趋太原。友军告急。一二九师奉命驰援，刘伯承师长则由北同蒲路转赴正太路指挥，经过太原时，只领到几张不完全的地形图，文涉昔阳山地安置伤兵，也无效果。

先是三八六旅的某团于十月廿四日到达娘子关东南之七亘村，依托蒋阎战争时的旧工事备战。但特别仔细的刘师长刚由太原赶到马山村时，得此报告，便说不行，工事并不保险，

而敌人果然夜袭来了。刘师长即布置队伍并亲身漏夜赶赴七亘村去指挥，因收容失联络的少数队伍，陷入重围，距敌人只五十米达了，他仍然镇静指挥着少数队伍，箝制敌人，并坚持预定计划，要陈赓旅长率主力迂迴打击这一敌人的侧背，结果于二十六日，敌人二十师团辎重部队被抓到，打得落花流水，夺获骡马三百余匹，炮弹无数。中国制的山西省以及华北军用地图也都在此“领到”了。后来朱总司令赠送蒋委员长的一匹高大红马，也就是在此夺得来的。

这时，守娘子关旧关的第三军曾万钟部队一千余人，正被敌人包围着，也在七亘村胜仗之下解救出来。

接着，十一月二日在黄岩底打了一个伏击战，敌人在两岸悬岩之下，遭到了机关枪迫击炮突然的袭击，伤亡在七百人以上。后来在夺得的文件中，廿师团随军记者称此为“过天险的黄岩底”。

敌人廿师团先头部队，在广阳被一一五师打了以后，他的后续部队，于十一月九十两日仍经过广阳前进。一二九师便在广阳土封村一带等候着，痛打了他一头，使他不能不改变道路，转向上下龙泉西进。

这三个漂亮的胜仗，都在正太路南平行路上打的。他阻滞了敌人的前进，援助与掩护了正太路同蒲路北段友军，安全撤退到榆社平遥和汾河西岸一带休整，博得友军对我们的信任与敬佩，广大的战地民众更对我表示无限的拥护与希望。但太原则已早于十一月八日失守，平汉路上的安阳亦已陷落。

这时同蒲路也好，正太路也好，平汉路也好，大路小路上全是向西向南滚滚撤退的大军，他们拥挤在车站，拥挤在城关，拥挤在村镇，不是找不到士兵的长官，便是找不到长官的士兵，向人民要粮食，要骡马，要金银首饰，要银元钞票，人民含着泪问他们前线的情况，他们瞎吹着鬼子的厉害，而且也的确在自己恐吓着自己，其实有些人是连大炮的声音也没有听到的。总之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充分表现了当时统治者们的对日恐惧，作战指导的被动无能，弃地而走，置民不顾，而最后还要扰民，无怪华北人民对之悲愤与失望。

敌人则乘机大肆活动，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并强迫绅商成立伪维持会，收编土匪散兵，利用地方封建武装，尤其在河北山东平原，由于一九三五年冬冀察政委会特殊政权的设立，日寇魔手早已伸入，“顾问”不速而来，特务机关林立，浪人毒贩横行，爪牙密布，围砦公路着着进行。故在一占领以后，敌人能迅速建立起十余万各种伪武装组织，并嗾使当地土匪会门地方保安队自相残杀，以便利其统治。在钜鹿的保安队便同号称万人的石汝南王子克等部，排开二十里长的战线，激烈的开火；南宫枣强衡水的保安队，也和土匪葛贵斋、部伯武争地方，人民四方逃散，路断人稀，可谓历史上的大劫。

一二九师接受党中央指示，在朱彭总副司令直接指挥下，提出“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口号，乃以太行山为依托，开辟抗日基地，同时派兵出东南冀鲁豫大平原，繁殖游击战争。由于友军之放弃失地向南撤退，兼之敌人的疯狂暴行，人民悲愤异常，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八路军所到之处，即与地方党结合，得到爱国志士的协助，人民也纷纷揭竿而起。故能在对敌斗争中迅速开拓晋冀鲁豫的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晋东南

刘师长驻节辽县，陈赓旅部队则摆开在正太路与白晋路一带。晋东南有中共地方党组织，

在李菁玉、李雪峰同志领导下进行艰苦工作；而以平津流亡学生为骨干之山西新兴进步势力——牺盟会，决死队一、三、纵队，领导者为薄一波，戎伍胜，董天知，亦正在坚持不懈，且有第三行政主任公署之设。一二九师及唐天际支队与地方党结合，并与山西新进势力携手合作，亲密无间，相互帮助进步，共同维持社会秩序，抚辑流亡，安置伤病兵，发动群众，创建太行与太岳山区抗日阵地，并以之作为向东发展游击战争之依托。

敌人既占太原，亦图稍事休整。一二九师在保卫太原战斗中，炸坏了正太路，此时复向该路继续破袭，同时摧毁新成立之伪军，伪维持会，以屏障太行山区。驻防太原之敌廿四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颇为焦急，发出训令称：八路军如此"蠢动"，与其被动守备，不如集兵歼灭之，庶可一劳永逸。于是于十二月间向我发动六路围攻。围攻之初，敌先以伪军在寿阳西南之羊角崖诱我深入。而后突由正太路尤其是由两翼之和顺、长凝共出动六路，分进合击，形成马蹄形之包围。我陈赓旅在松塔花泉坚决抗击，当时王近山副团长英勇负伤，曾立调和顺以东陈锡联部队抄敌侧背，敌人在此腹背受击之下，伤亡惨重，迅即败退，围攻即告粉碎。这次战斗系一二九师单独粉碎敌人分进合击之第一次，亦即开辟根据地之肇始。

三八年二月，蒋委员长计划反攻太原石家庄，朱彭总副司令负责指挥东路军：即八路军及友军李家钰、李默庵、曾万钟、武士敏、朱怀冰诸军。一二九师则担任切断正太路，阻止敌人增援，以利友军攻取太原，乃进击旧关，设伏于井陉西南之长生口，消灭了石家庄敌人援兵两个中队，乘胜攻入井陉，在夺获敌人的武器中有巩县造的重机关枪，太原造的迫击炮。不意日寇正在此时，突调遣大军，北由太原南下，东由东阳关攻入取得长治，钳击临汾，除武士敏部曾在子洪口、李家钰部曾在长治予敌坚决抗击外，一路所向无阻，临汾于二月末即被陷落，敌并继续挥军南下，扫荡黄河北岸，与潼关、郑州对岸相持，至此一二九师奉命放弃对正太路之继续破击，回师晋中，驰援友军。

三月间，我军开始活动于邯（郸）长（治）路，主动打击敌人。邯长路为由平汉路通长治之要道，是敌人一〇八师团西进的主要补给线。我军首则袭击黎城，设伏神头，消灭由潞城向黎城运动之敌千余，敌人称这一仗为"典型的游击战"。接着又在响堂铺打了一个更为漂亮的伏袭战，这是徐副师长向前亲自指挥的。他将三个团埋伏在邯长公路响堂铺附近，等那由涉县西进的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出击，先以迫击炮机关枪猛射，紧接着用手榴弹，刺刀，向汽车猛扑，敌人吓做一团，枪炮也来不及取出，非打死即被俘，一〇八师团的一百八十辆汽车与掩护部队完全消灭，所有军用品全被虏获。由黎城东阳关来援之骑兵四百与由涉县来援之敌四百，均被我预伏部队击溃。

至此，敌已相当领略我军的厉害，并痛感兵少防宽，太行山对他的威胁太大，四月间，敌遂出动兵力三万，由博爱、邯郸、邢台、石家庄、阳泉、榆次、太谷、沁州、长治，分九路向我分进合击，企图消灭我军于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域，摧毁日益成长中之太行抗日根据地，以便节约出一部兵力去助攻开封徐州。这是日寇对我们根据地腹地之首次合击摧毁。兵行所到，大肆屠杀焚掠，不少民间妇女横遭奸污，武乡县城被毁为废墟，人民对敌恨入切骨，到处燃起复仇的火焰。朱彭总付司令指挥八路军及决死队，骑四师王奇峰部和武士敏等部，与敌周旋于太行山上，以期消灭敌人之一路。一二九师先于四月初旬在麻田给了由涉县到辽县之敌以迎头痛击，跟即活动于辽、榆、襄、武地域，最后于十六日在武乡长乐村一战获得大捷，彻底粉碎了敌九路围攻。

长乐村战斗是全国闻名的急击战斗。四月十五日夜，我军克复武乡后，敌二十五旅团一

一七联队（联队长柏崎）附骑兵辎重三千余人，向长乐村窜去，一二九师即以徐深吉部为右纵队，沿马汉脚疾进，以叶成焕部及韩先楚部为左纵队，沿巩家脑田庄急进，以七六九团为后续纵队，沿大道进迫，十六日十时，与敌激战于马家庄长乐村地带，右翼向漳河对岸之敌侧击，左翼向峪口型村猛扑，截断其后段一千五百人，七六九团则接左翼由马村向许家脑之敌攻击，又将他截成几段，敌人马伤亡，辎重毁坏，都累积在车中。激战十四小时后，由辽县来援之敌酋苫米地旅团长，率一〇五联队（联队长工藤）附骑炮工辎重三千余人，自蟠龙向我左翼反攻，妄想解长乐之围，于是全线战斗更为激烈，左翼部队与敌争夺要点，反复冲锋肉搏七八次，终将敌击退。敌人伤亡二千二百人以上，损失极大。

这里我们从夺获文件知道一件有趣的事，就是苫米地旅团长，他在"皇军"中倒可称得是一位惯战的猛将，善用"拖刀计"的人，在攻长治尤其是会攻临汾中，曾与敌"朝鲜师团"（二十师团）争胜，他是先进了临汾城，他最得意的战法就是遍烧民房以示引退，旋即回兵猛扑，或撤兵让守城者退后于路中伏击之，以是得了敌大本营赐的勋章。有他亲笔写给女儿的信，他说："天皇因我先入临汾，赐了我一个勋章，我已挂在左胸前，可是我的右肩也高了，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后来在攻陷香港的时候，他的凶恶的照像还登载在敌人的宣传品上。可是长乐战斗的失利，曾经使他受到处分。

九路围攻的粉碎，使敌更进一步认识到八路军的威力，相互告诫："华北有八路军是不能安枕的。"在山西的友军们也大为折服，从此便承认敌后是可以坚持的，纷纷派人来参观，来询问。晋东南人民的胜利信心更大为坚定，深信八路军真与华北人民共生死存亡，且确能保卫他们的家乡，保卫他们的生命财产。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从这一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冀鲁豫大平原

石家庄安阳相继陷落，平原上友军望风南撤，旧日腐败的官僚政权土崩瓦解，连国民党石家庄特务机关负责人侯如墉都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广大肥沃原野沦落敌手，人民素来无权抗日，现又被弃于日寇铁蹄之下。一二九师为结合敌后的人民共同抗战，繁殖群众游击战争，在正太路娘子关附近之七亘村战争胜利时，即开始分遣部队向平汉路作扇形推进。骑兵团东出赞皇与河北民军冀西游击队杨秀峰部会合（杨秀峰司令原系大学教授，曾在平津教育界服务多年，抗战后投笔从戎，参加保定行营工作，行营退后，他独坚留敌后，在冀西一带树起抗日旗帜。）；师随营学校与七七一团部队出动邢台磁县，先后与民军第十三支队张锡珩部、抗日义勇军平汉纵队范子侠部会合；太行山南赵基梅支队则东南下豫北之辉县，与民军四支队朱程部协力作战，三八六旅之补充团在韩东山、丁先国率领之下，于神头村战斗胜利后东南下博爱一带，在中共地方党协助下，在道清路展开游击。如此，敌被压逼于平汉路与道清路上，广大村镇均控制我手，既屏卫晋东南，又成为东出冀鲁豫大平原之前奏。

三七年十一月，本师组成一个挺进队，由孙继先、胥光翊带领，横越平汉路东进。这是由太行山开往冀鲁豫大平原的第一支武装，其任务是侦察路东情况，联络中共地方党与一切抗日组织，发动民众游击战争。挺进队一进入冀南，立时受到抗战后成立之当地八路军别动大队长李任德同志所遗留下的武装人员与人民的热烈欢迎与帮助，进行抗战活动。

冀鲁豫平原，原来就有中共地方党组织。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成立以后，为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日寇的侵华阴谋，在中共地方党领导下，以任县为中心，曾爆发十余县的抗日武装起义，并成立华北抗日游击军第一师，师长刘仲文，政委李花生，纵横活动于任县，钜鹿、尧山、隆平、南和、邢台，而大名及以南之濮县、濮阳、滑县，内黄亦揭竿响应，进行

游击。如此抗日声势，引起日寇汉奸之莫大震惊。同时清丰、濮阳、大名一带的学生运动也盛极一时，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和小学教员救国会等救亡团体；而山东的聊城师范和寿张师范，更是当时抗日活动的大本营。惜乎这些青年学生的救亡运动和农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未得到当时不抵抗主义的当局所珍惜与扶植，反被以最残酷的手段所镇压和摧残。然而抗战既起，国军南撤，地方旧政权闻风而逃，日寇到处烧杀无忌。当年未被屠杀的若干同志，又复领导群众抗战。在冀南以李任德同志为首成立八路军别动大队（李任德同志后为国民党南宫专员刘必达所杀害），并联合各界人士组织"抗日同盟"。抗日义勇军晋冀支队长赵辉楼，赵光远，跟即在束鹿起义。抗日义勇军青年纵队领导者段海洲、程元龙、陈子斌也在枣强起义。

一二九师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复组织由陈再道、李菁玉率领的东进纵队，一九三八年，再令宋任穷指挥骑兵团，先后进入冀南平原，首先揭破日寇所挑起的保安队会门土匪混战阴谋，进行调解，开始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发动与团结各方抗日力量一致抗战。一九三八年五月，为配合徐州会战，更有力地开展冀鲁豫游击战争，徐副师长向前复率主力七六九团，七七一团与一一五师之六八八团和曾国华支队，进到冀南，旋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与冀西游击队司令员杨秀峰亦先后前往冀南领导军事政治的建设。从此抗战实力雄健，声势大振，威县一战，打跑了敌清水部队，一时驰骋平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消灭伪军六七万，在卅余县的县城上，重新树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一九三八年一月先到冀南之挺进队孙继先部，再由冀南向津浦路挺进，得到鲁西北地方党帮助，发展为津浦支队，与山东坚持敌后之聊城专员范筑先老先生部队会合，协同作战。不久，该津浦支队与曾国华支队先后横过津浦路东进入天津以南旧黄河以北之冀鲁边区，与当地抗日义勇军卅一支队会合起来，三十一支队就是津南地方党集合爱国志士组成，由杨靖远同志率领，在敌人汉奸与亲日派各种力量压迫之下进行艰苦斗争，直至与这两支队会合以后才一起活动。他们在新海南皮宁洋吴桥一带一连打了几个较大的胜仗，统一战线得以开展，才创立冀鲁边的抗战局面。一九三八年七七纪念就在冀鲁边中心的乐陵庆祝了这一胜利的局面。至秋后，肖华同志入冀鲁边区统一指挥后，其局面更有进展。但一方面是我党我军结合爱国志士广大民众发展了抗日力量，实现抗战，而同时亲日派却勾结日寇汉奸，巧妙地破坏或削弱抗战事业。这首先表现在冀南八路军别动大队李任德同志被南宫专员杀害。三八年十一月，敌扫荡鲁西北，年迈苍苍的抗战老人范筑先先生，也在亲日派阴谋陷害之下，殉国聊城。开创冀鲁边之杨靖远同志，于三九年一月也被所谓"保安司令"的孙仲文所杀害。然而前仆后继，张维翰同志即接受范老先生未竟事业，加以整理组成"筑先纵队"，与敌周旋于东平湖一带，同时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李聚奎、钟汉华部，复进入该区，与筑先纵队共同坚持鲁西北。而冀鲁边抗日游击战争，也仍继续坚持发展着（三九年三月后，冀鲁边区及其部队划归山东一一五师指挥）。

至于南面以大名、清丰、内黄、濮县为中心之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上面已经说过，战前我党即有相当力量，爆发过抗日武装起义。当国军南退黄河时，我党同志即出面团结与扶持濮阳专员丁树本，共同坚持抗日，并创造民军第二路第四支队，由唐哲明同志率领，向大名滑县之敌作战，以掩护丁树本部队。三八年夏，为配合大武汉保卫战，阻止敌人修复黄河铁桥南犯郑州，刘师长亲率陈赓旅一部与三四四旅部队，依托太行山，出平汉路南段、道清路西段，与敌人战于安阳辉县新乡修武等地；同时，冀南方面，陈再道王新亭同志组织漳南纵队（包括青年纵队与一一五师之六八八团），进入临漳内黄濬县滑县活动，与当地之唐哲

明第四支队配合行动，消灭了伪军扈会禄等部，摧毁了道清路东段，成立刘汉生游击队，后来组成为黄河支队，一九三九年三月即由冀鲁豫支队首长杨得志崔天民统一指挥，再后即成为冀鲁豫军区。一二九师之赵基梅支队二十一团骑兵团编入其建制。

自三七年八路军东进，至是九个多月，辗转血战，先后克服不下六十县，驱逐日寇，摧毁伪组织，肃清土匪，安定人心，团结各种地方抗日武装，发动人民抗日组织，在广大平原上开辟了冀鲁豫大平原抗日根据地。

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火焰的燃烧，民主运动的浪潮也在各地掀起。冀鲁豫大平原，凡八路军收复的土地，当时即"还政于民"，由人民民选县长专员，建立抗日民主政治。三八年八月四日，五十几个县的军政民代表齐集南宫，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选举人民爱戴的杨秀峰宋任穷同志为正副主任，地方名流和国民党人士，因刘季兴，孟夫堂先生等，均担任重要职务。这样便初步统一了冀鲁豫大平原基本地区的行政。在合于抗战与人民要求的进步法令下，广大人民的抗日组织与抗日积极性，蓬勃的生长起来。

这时，发动于太行山上的游击战争，已经西至同蒲汾河，东达渤海，南衔黄河，北迄正太路，沧石路。一块华北较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建立起来了。

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

八路军在敌后的活动，开辟了抗日根据地，成了敌人的心腹之患。为掌握华北大陆政策中的"兵站基地"，敌在攻陷武汉以后，即放松正面战场，代之以诱降政策，把作战重点放在敌后，回援华北，陆续提出"治安肃正""治安强化""总力战"，实施"囚笼政策"。

所谓"囚笼政策"，实质上原是德国的赛克特运用来绞杀殖民地的政策，与汉奸曾国藩发扬保甲的政策，两者结合的混血儿。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后来辅之以封锁沟墙，从敌占区向我根据地构成网状压缩包围，其用意是束缚我之机动，便利他之奇袭捕捉，好用"清乡"、"蚕食"、"扫荡"三套法宝将我一鼓歼灭。

在这一战略方针之下，晋冀鲁豫边区周围敌兵增至十万以上，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正太路和同蒲路等分向两侧，向各根据地逐步修筑公路、据点、封锁沟墙。我们用举隅反三的说法，单举冀南平原地区来作例子，则大的公路有（北）平大（名）路、南（宫）石（家庄）路、邢（台）济（南）路、邯（郸）济（南）路等，尤其是德石铁路横竖割裂冀南根据地，把平原划成井字、王字、田字、菊花诸形状。四〇年底冀南共有公路八十三条，计长四千华里，四一年春天就增加到一百十六条、五千华里，而四二年便增加到六百条左右，全长近万里了。此外，并加深加宽原有河流（漳河、卫河、运河、滏阳河……都是一样）构成水网，在铁路、公路两旁挖护路沟；修补加高各旧县城，筑土围子，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县有县界沟，乡有乡界沟。至四二年底统计，封锁沟墙全长约二千余华里。在这样密如蜘蛛网的公路、河流等交通线上，敌人又修筑起大据点、小据点、大碉楼、小碉楼，四三年达到九百二十多个，最稠区域平均每四平方公里便有一个据点。冀南民谚有云："日在炮楼下，夜观炮楼灯，出门必过路，天天跑敌情"，亦可见敌情之严重。

依据这些铁道、公路、据点和封锁沟墙连结起来的"囚笼"网路，敌人便拼命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在政治上，他把铁道、公路、据点当作统治奴役中国的枷锁，实行保甲连坐，发展维持，扩张伪政权，加强特务活动，扩充伪军，要伪军来守据点当炮灰，要老百姓来看路当肉电杆。总之，给每个中国人头上加一副镣铐。在经济上，他把铁

道、公路、据点当作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大小血管和毛孔，开发资源，掠夺农产，倾销毒品，推广伪币流通，而又封锁根据地的经济贸易。在文化上，他把铁道、公路、据点，当作放毒管，强迫小学生上日语课，造“兴亚语”，散发伪宣传品，连关帝像、灶王像上也有反动标语，在乡村中演出诱人堕落诲淫海盗的戏剧、电影，盛唱中日同文同种等等。尤其是在军事上利用铁路、公路调动快速部队，从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牛刀子战术”发展到“铁壁合围”、“三角合击”、“纵横扫荡”、“反转电击”、“抉剔扫荡”等各种花样，都依靠这种“囚笼”来进行，可见“囚笼政策”，实为敌人全面进攻我们的最毒辣办法。

我们打破囚笼政策之破击、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等斗争，原是军民结合从各方面进行一元化的斗争。我们在一九三八年曾同时连续破击津浦路正太路平汉路十余次，自一九三九年起，在山地曾主动发动了显著的平辽战役、邯长战役、白晋战役、邢沙战役、榆武战役、临屯战役等诸战役，坚决破击敌人的交通线，使其“囚笼”计划为之推迟或根本流产，其中如四一年九月的邢沙战役，我军以××团的主力，突破平汉路外围的敌人封锁沟墙，直捣邢沙敌忠实爪牙高逆德林部老巢，予以彻底捣毁，高逆经营数年的兵工厂，为我付之一炬，其重要器械，则被我运来根据地。又如在四〇年至四一年间由赞皇至临城公路，敌半年多不能向前修筑，安阳水冶到武安玉泉岭南北公路，敌费时将近一年才勉强修通。邯长大道至今破碎，临屯公路始终未通。近则由破袭而收复榆社城，打断武榆公路；由破袭收复沁水城切断曲高公路，且公路一被打断，据点即无粮弹之接济，不能不被迫放弃。山地“囚笼”日在破碎，我根据地天天在扩大中。

在平原，“交通斗争”成为军民结合的广大群众运动，敌人白天修，我们晚上破，在四〇及四一年足足两年之中大小破袭几乎没有停止过。每天当太阳落下的时候，便从这个村庄，从那个村庄，走出了三五一群的，几十个一群的，几百几千个一群的，他们拿着锹、铲、锤、钳子等等，在军队掩护下，出发到铁道公路上，一面歌唱着，欢呼着，一面挥动手中的铁锹。这些破路通常是以劳动力结合战斗力有组织地进行，特别是对那些大公路的破坏，不知打了好多次仗，流了多少军民的汗血。如三九年初对石南路的破击，曾有著名的宁晋大杨庄之战；威振华北的威县香城固歼灭战，那是在破击邢临路时打的，那次消灭了三百多日军及其所乘的汽车；对于德石铁路的破击，是冀中冀南两个地区的军民互相结合以全副力量来进行的，敌于四〇年六月动工兴修，我们立时便发动破击，至十一月廿五日才勉强修通。其间敌曾派遣重兵掩护督修，但我们今天袭击这里，明天破坏那里，使敌防不胜防，疲于奔命。在全世界铁道的建筑中，以里程比较，这恐怕是“费工最大”，死人最多的一条路了。再如一九四一年五月大出击中军队结合着一万五千多老百姓，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斗，彻底平毁了敌人所称“万里长城”的自大营至冀县的长墙。此外铁路公路封锁沟壕，到处有着规模不同的破袭斗争。一九四二年以来的经常打县城袭据点，使敌人震骇于“八路军的巧妙战术”与“神出鬼没”，不能安枕。今年那里的八路军配合中原正面作战，更加紧破袭与出击，业已收复邱县，朝城、内黄、清丰各县城，打下碉堡据点二百余个，切断了敌人几条输血路，平原根据地也在天天开展中。

在敌后游击战争中，平原是要比山地格外艰苦些，因为没有山领可作屏障，尤其是像冀南那样的平原，真是一望无垠，连森林都少，只有在秋天青纱帐起时，游击队的活动才能找到些隐蔽，所以每年秋天平原地的战事便比平时加倍的热闹。在修筑公路碉堡以后，敌人便可利用交通线，以快速部队横冲直撞，给予平原上的军民以很大危害。于是在破路同时便开

展了挖道沟的运动。道沟有一定的标准与尺度，刚好能通大车，且有叉车处，挖出的泥土就堆砌在旁，加高到一人高，这村与那村衔接，里面四通八达。这样，老百姓一出门就可赶着大车进入深沟，八路军和游击队可以在道沟里隐蔽运动，并以道沟为掩体向敌人狙击。而敌人的快速部队，无论骑兵也好，汽车装甲车队也好，都失去了效用，飞机侦察不到我们，机关枪要射击的话，因为道沟弯曲徒然浪费子弹。常常敌人在地面上搜索，我们在道沟里行军，敌人还未发现我们，我们却已给以冷不防的袭击，待到敌人要摆开阵势作战时，他的对手已不知去向。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三年中，冀南挖成这样道沟凡五万多里，自一九四一年到现在，则普遍由道沟转入地道建设，更便于袭击敌人，隐蔽自己。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改变了平原地形。平原没有山，但有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我们依靠着人山困陷了敌人。

敌人建设交通的根本目的，是在企图依据铁道公路据点为基地，扫荡和消灭八路军。故“囚笼”愈密，“扫荡”愈繁，晋冀鲁豫的战争便空前的紧张起来了。一九三九、一九四〇两年，敌人对根据地大规模的进攻和“扫荡”达十次，一九四一与一九四二两年大规模“扫荡”达十九次，小规模的五百多次，而边地袭击骚扰远不在内。其中最严重的如一九三九年对晋东南的大围攻，动用兵力在五万之谱，一九三九年春、冬对冀南连续进行两次大合击，尽占平原所有城市，在平原上钉了许多梅花桩，成为敌我插花的形势。鹿钟麟先生即于三九年春日寇的合击中，被迫离开南宫，西奔太行。百团大战后及一九四一年秋对太行太岳的“毁灭扫荡”，从一九四一年六月至八月对泰西之三个月长期“扫荡”，十一月对鲁西直南的长期“扫荡”，一九四二年“四二九”与“六一二”对冀南的“铁壁合围”与五月对太行的“铁壁合围”“抉剔清剿”，这最后一次敌出动六万人，在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以陆空配合向我作大规模“合击”。我们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就在这次殉国了。但所有这些“扫荡”，都被我一二九师建儿一一所粉碎。根据地即在反“扫荡”和交通斗争的胜利声中，一天天巩固起来，且日在扩展。只有蓄意污蔑共产党八路军的人才会说：“八路军在三九年以后根本未作战”。

向敌后抗日民主的军民“收复失地”

国民党当局是曾经把华北山河人民弃如敝屣的，但当八路军深入敌后，结合人民抗战，以热血头颅从敌人手中解放出祖国领土，辛勤缔造起抗日民主根据地，并正在和敌人作艰苦斗争的时候，他们在“反共第一”方针下，却口口声声嚷着要向八路军与人民“收复失地”了。他们着着压迫，硬要八路军退过正太路沧石路以北，并集结大军约二十六个师，以中条山为基地，令非嫡系作先锋，以自己嫡系本队压阵脚，由南而北向我推进，以与日寇由北而南的“扫荡”相配合，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而日寇这时遂也改变策略，取消“剿共灭党”的口号，改为单一的“灭共”，乃至让开反共道路，成立伪县公署、保甲，以配合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双方可谓心照手应。

一九三八年秋，鹿钟麟先生奉国民党当局命令，前来华北成立冀察战区，设立河北省府，当时八路军曾竭诚欢迎，亟望精诚团结，共同坚持敌后。不意随鹿氏而来者有一大批国民党反共特务，下马伊始，即挟持鹿氏以省府名义下令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除强化原有之张荫梧、侯如墉、赵云祥、丁树本等部对我磨擦外，还由山东调石友三、高树勋等军突入冀南，由中条山黄河边调朱怀冰、庞炳勋等军以“十字军”作先行挺进太行，加重压力，从根据地腹部捣乱破坏，一心一意企图颠覆抗日民主政权，破坏抗日社会秩序。本来张、侯、石等辈，

当其尚托庇于八路军时，即已偷偷摸摸的进行破坏勾当，至此，则更明目张胆，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他们袭击八路军，暗杀八路军少数人员，活埋抗日军民家属?他们演出“双包案”，包围抗日县府，赶跑民选县长，剥夺敌后人民抗日民主权利，吊打杀害人民自己的村长，而他们又各自争委县长、区长，以至于一个县内同时有五个县长存在，人民无所适从；他们解散民众抗日团体，摧毁民众抗日组织，捕杀民众领袖与爱国青年，诬为“共匪”，“奸党”；他们敲诈勒索人民，奸淫掳掠妇女，稍一不遂，鞭笞立至，至有全家被逼上吊自杀者。民怨沸腾，群情愤慨，纷纷向抗日民主政府控诉，案如山积。而日寇汉奸闻讯，则弹冠相庆，在北平大开庆祝会。

至于反共顽固分子之与日寇勾勾搭搭，互通款曲，更是彰彰在人耳目。张荫梧之“曲线救国论”洋洋盈耳，公然奖许叛逆柴恩波，此种行为并深得某当局之赞许。石友三与敌南宫特务机关长有旧，其弟石友信代表往返平津，领取日寇意旨。侯如墉部挂着“皇协军”臂章，在石家庄招摇过市，出入如同家门。庞炳勋与平汉路伪军高德林张英武部保持切密关系，供给高逆饷弹，支持其向太行冀南蚕食，并令坚决为敌服务，以为“将来之计”。而每逢日寇“扫荡”根据地，石（友三），张（荫梧），侯（如墉），孙（良诚）诸部即大事蠢动，配合日寇，趁火打劫。

但八路军以国家民族为重，为了顾全大局，不惜委曲求全，一再忍让。十八集团军总部曾不断电请制止反共磨擦，彭副总司令曾亲往冀南访鹿钟麟，商请团结敌后军民抗战，刘师长则一再分赴各方接洽磋商，他向朱怀冰说：“我们已经退避三舍了，实再无地可退，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八路军一个师抵抗了十万日军，十余万伪军，并非怕你，不过为了团结，不忍自相残杀，要是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但这种苦口婆心的说服，不仅未获见谅。反被目为“示弱”。张荫梧更向各方宣传，说“共产党八路军害怕统一战线破裂”，以为大可欺侮。因此，石，张，侯，朱等辈进攻愈急，人民受害愈甚。

这时，人民都已感到反共投降的危机严重，连地主绅商都向八路军呼吁，说：“让不得了，再让就要亡国了！”在冀西的朱怀冰士兵也放了信来：“咱们愿意抗日，不愿意打自己人，”要我们帮助他们“脱离牢狱的世界，而走上光荣的抗日战场”。

但是，无论对于我党我军，各阶层同胞乃至其部下的呼声，反共顽固分子一概置若罔闻，这是昧着良心，一意孤行。如此延至一九三九年冬，终于在日寇诱降政策推动之下爆发了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反共特务分子的唆使之下，山西首先于十二月爆发了新旧军事变，在晋东南，金宪章孙楚突然由南北两面向坚决抗战进步的决死一、三纵队夹攻，决死三纵队四个团被解决，幸赖朱彭总付司令呼吁调解，得免延长扩大。同室操戈，至堪痛心。接着一九四〇年二三月，石友三军抵沧石路边即在冀南公开叛变，与日寇联合向我大举进攻，朱怀冰军抵正太路边，庞炳勋军入林县时，即由张荫梧，侯如墉等以邯长路南山地为基线，修筑碉堡，发动向我节节进击。至此，我已忍无可忍，被迫坚决自卫。反共是没有群众基础的，是反人民的，即石朱等部官兵亦早已痛恶石朱反共卖国罪行，故一接触之下，其内部即土崩瓦解，众叛亲离。这样，我们便抑平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打破敌伪夹击局面，使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得以巩固起来。

现在事情已经最明白不过的了：这个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不仅是民主与反民主之争，而且是抗日与投降之争。一九四〇年以后，反共顽固派以晋南豫北为基地，勾结伪军伪组织，配合敌寇，背靠敌占区，以各种方式向根据地进攻。一九四三年在日寇对华新政策的勾诱下，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决心实行进一步的“借刀杀人”政策，提出“变奸伪区（指抗日根据地）为敌占区”的丧心病狂计划。而当初的那些反共反人民的专家，磨擦英雄，如庞炳勋、孙良诚、赵瑞、杨诚等，更已陆续步高德林之后尘投入敌人怀抱，成为“和平阵营”的好手了。这是“反共第一”的必然下场。这辈家伙在投敌以后，有的番号依旧，阵地不变，西起白晋路之沁县，南经豫北之安阳临淇，东连邢台威县，南迄冀鲁豫之滑县内黄东明，对我边区虎视耽耽，在敌人“扫荡”进攻中充当开路先锋。至如背靠敌人据点，尚未投敌的六十一军，也不时向我太岳区袭击。这实在是我敌后抗日军民的一笔大负担。

惊破敌胆的百团大战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当妥协投降空气笼罩大后方，日寇阴谋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时候，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一百零三个团的兵力同时向正太、同蒲、津浦、北宁、胶济、平绥、德石等铁道干线进攻，大规模的破坏交通和歼灭敌人，打击了“囚笼政策”，拖住了敌人进攻西北、西南的后腿，挽救了当时投降妥协的逆流。

百团大战主要是交通破击战，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大半经过晋冀鲁豫边区，我们的破击重点是正太路，一二九师参加这一战役的有二十三个团，决死一、三纵队也全体行动，所以战斗最激烈在这里，牺牲最多也在这里，一共伤亡了七千将士。但敌人的损失却数倍于我，其胆寒程度也倍增了。

大战延续了三个月时间，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正太战役，一二九师担任破击正太路榆次到阳泉段。刘师长邓政委亲自指挥，以陈锡联指挥所部和范子侠部在右翼作战，进攻阳泉到寿阳一线，而寿阳到榆次的作战，则是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的部队，由陈赓指挥。各部都配备有工兵，有群众（一万余人）破路队，组织严密，分工精细。

廿号夜，我势如潮涌的健儿和民众，透过正太路外围堡垒线，以猛虎掏心之势，扑向了正太路；当敌睡梦正酣的时候，连续的电鸣的爆炸声，震动了二百里的地面，沿路所有守备据点及其部队都被毁灭，所有的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建筑物，都彻底的削平了。正太路成了我们的世界，在“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条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口号下，工兵们以缴得的敌人的炸药实施爆炸，雷鸣电闪，表现了高度的技巧，著名的九孔桑掌大铁桥炸飞了四五丈高，碎石飞出数里。自卫队们架起了一堆堆枕木，燃起了熊熊大火，蜿蜒全线。工兵们下了夹板螺丝，拔了道钉，他们便抬起铁轨送到转运站，用大车运走了，那些不能拿走的便烧毁，变成了废铁。

虎踞在阳泉大门前八里路的狮瑙山，控制着整个的正太路的咽喉，关系作战全局，我们的炮火就由这山头阵地向阳泉连珠般发射。阳泉是敌片山旅团司令部，它急疯了，便在二十一日上午，开始了凶猛的反攻，恶战在这里进行到二十九日。敌动员了其全部兵力，并武装了全部日侨，前后百余架飞机轮番的轰炸，炮火的轰啸和七昼夜的雷电急雨交鸣着。我右翼的七六九团和十四团屹然扼守在铁火的山巅上，给养运不上来，战士们一天只喝两顿南瓜汤拌炒面，进行着英勇的反击。第一天旅政治部主任卢仁杰，就在最前沿的机枪阵地负了伤，血混着雨水流遍全身。九团政治主任熊亚杰也在攻击中光荣牺牲。战士们隐蔽作战，待敌人排炮轰击后进行冲锋时，便以手榴弹刺刀来一个反冲锋，把敌人驱逐到山洪咆哮的河沟里，消灭了它。敌飞机前来助战，但它分不清地面上的部队，只有焦灼的在上空盘旋。七六九团六连被敌人一个大队包围了，连长在争夺高地的攻击中光荣阵亡，指导员便高喊着：“不要

失掉一条枪！”率领着部队以血的代价从高地把敌人驱逐出去。他们终于没有失掉一条枪！另一高地只剩下十来个战士，干部全部伤亡，一个模范战士负了轻伤犹高喊着："听我指挥，至死不退！”他们在敌人的猛攻下，坚持了五昼夜，丧胆的敌人，终于拿不下这个不屈的血肉堡垒。参战的自卫队员夜里送给养，白天在炮火底下抢运着伤兵。寿阳的三个自卫队员，跟着我们攻击部队的后面，我们一个战士被炮弹炸伤了，第一个去往下背牺牲了，第二个又英勇的上去，也牺牲了，第三个终于把伤员抢救了出来。

同样激烈的战斗，也在阳泉以西上湖据点进行着。堡垒里很多伪军，在五旅政委谢富治指挥下的十旅一个队伍坚决把它包围起来，在周围的山顶上满是伪军的家属们来叫他们的儿子回家的。正在抵抗的伪军们，听到了自己亲人的呼唤："不要给鬼子当替死鬼啦，赶快回来，我的孩子呵！”伪军们不打了，拖枪跑了过来，剩下的敌人集中在最后的碉堡后，企图作最后挣扎，谢政委把炮兵调到离敌七十米达处，两炮弹就把工事打坍，很迅速的了占领这一据点。

左翼队在二十日晚也占领了寿阳以西的主要火车站卢家庄。我军机动的迅速的占领了敌人的前沿，不歇气的突破了敌人的纵深，把七十余残敌压在一所大仓库里消灭个干净，缴获了几个大的合作社，街上一群群的老百姓在领回着敌人抢去的财物和日常用品。

正太路毁灭了，在开战时被我军监视的外围敌人得不到援助和真实的情况。四五天后，毁灭又临到他们的头上。二十五日大白天，在陈赓同志指挥下，以七七二团军队，向平定西南敌最坚强的外围冶西据点，进行了攻坚作战。一个连的突击部队，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斩断了几道铁丝网，把外壕抵抗的敌人杀死在外壕里，守敌百七十余人守住最后一个大碉堡，又施放了毒气，战士们用手榴弹束来炸散毒气，施以炮击，终于把敌人全部消灭。但是我们英勇的战士，也伤亡中毒达百名。当时在夺得文件中，看到一个准尉开战的报告说：猛扑据点的八路军，好似猛虎一般的可怕。二十八日，我又以同样攻坚的行动，在四小时内陈锡联就以七六九团部队又打下了寿阳东南敌外围据点摩落寺，没有来得及揭开毒气筒的百余名的守敌在我们的刺刀下死亡了，山炮，轻重机枪，掷弹筒等装备，成了我军攻击新的敌人的武器。此时，在平昔路破击战中，汪乃贵付旅长亦光荣负伤。

我军在二十天内胜利的完成了正太路战役计划后，便开始从正太转移。这时，敌人已大约捉摸到我主力的所在，想乘我们胶着正太路的时候，发扬装甲火车、飞机、大炮、毒气的优势。九月四日，敌七八千人，分兵五路，向晋中区从背后来迂迴我军；谁知我军早已转过身来，并未被其飞机抑留，终于在九昼夜的机动作战中，粉碎了敌人的合击阴谋，先是一日由榆太东扑的敌两个大队与我遭遇卷峪沟，三八六旅周希汉参谋长指挥十六团部队突然向敌人的侧背展开壮烈的白刃战，把优势的敌人击溃下去，这个部队的刺刀都染满了鲜血，这便是有名的卷峪沟战斗。三、四日陈锡联旅长发现从卷峪沟撤退的敌人一个大队，乃在沙峪布置了有名的伏击战、疲劳的敌人在河沟里被我打得滚来滚去，伤亡二百多人，扔下装备，逃回辽县。五日敌永野支队又走进了我陈赓旅长指挥下的毁灭圈，在双峰一带展开了歼灭战，支队大半陷入覆灭的命运，永野中佐本人也交出了性命。

与正太路作战同时，我军在平汉、白晋、同蒲诸路，尤其是正在修的德石铁路上展开破击。陈再道同志指挥冀南军区所部，把冀南大小公路破得个稀烂，尤其是对德石铁路的破击，参加民众前后达三万一千余，把路基都一段段的挖掉。平汉路由石家庄起到安阳，受到东西夹路的破击，几座铁桥都被尹旅韦旅健儿炸飞，安阳人三架飞机，也被韦旅部队付之一焚。

白敌晋路由子洪口迄长治，诸如南关、漳源、沁县等处的铁桥都只剩一副残骸，铁轨被搬走。决死三纵队，曾在潞城、微子镇、黄碾等处进行破击，与敌激烈交锋，该纵队政委董天知同志英勇殉国。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战争连绵二十余天，单在正太沿线片山旅团的德江、原田两大队全部被歼灭，其他如斋藤铃木及三十六师团之永野支队等亦歼灭过半。我军完全完成了预定计划。

破击正太路部队从作战地区撤下来，稍事休整，九月二十三日夜又展开了第二阶段作战——榆辽路战役。榆辽路是敌深入割裂太行腹地的据点公路，经营有年，构筑坚固，所屯军需粮秣够半年之用，但在我巧妙的攻坚动作下，王景、小岭底、管头、小店等据点为我一扫而光，榆辽路被彻底摧毁。原来陈锡联旅担任强袭管头至石匣线，陈赓旅及其指挥之决死队强袭王景至榆社城线。二十三晚，我即攻入了榆社城，把四百多敌人逼到东关第九中学的乌龟壳内。敌人已把这一带的地形都改变了：四周都是削壁，削壁上面围绕着几层铁丝网的堡垒群，工事的构筑是相当近代化的。我英勇的七七二团健儿，在极有组织的火网掩护之下，架起了用几条梯子接起来的云梯，并用水湿的棉被突然塞住敌人的枪火，登上并占领了四丈余的敌人的母堡，炮兵的火力神奇的在敌人集结的文庙阵地中开起血花，工兵们乘夜间实行坑道作业，把大量的炸药放在堡垒的地盘下。廿五日下午开始第三次的总攻击，敌人的主要堡垒都炸飞了，十六团的突击队突然的出现在敌人的操场上面，强迫敌人进入白刃战，除了个别漏网以外，藤田中队长的整个中队都死在它自己造成的坟墓中了。数千民众一夜中还没有把枪炮子弹胜利品搬完。在几天的攻击中，敌人每一天放毒几次，榆社终日笼罩在瓦斯的烟幕中，陈赓旅长、周希汉参谋长一日中毒数次，但敌人终挽救不了它的注定的命运的。

管头的攻击是和榆社同时举行的。敌人是片山旅团最精锐的山本中队（这位中队长充满“武士道”精神，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神，平日在训练士兵中，就常以战刀劈士兵）。我军断绝了他的水道，晚间登上陡峭的山险，便接近了敌人，经过三昼夜的恶斗，山本中队长只能率几个败兵，扔掉尸体狼藉的巢穴乘黑夜溜走了。

石匣是在廿五日开始攻击，当夜攻克，敌人照例施放了毒气，我在运动中的一个营全部中毒，陈锡联旅长亲自率领了其余部队，冒着浓烈的毒气，用几百个手榴弹解决了敌守军一个中队及所附的山炮一门。

榆辽路碉堡线就这样肃清，并消灭池边大队的三个中队。

一个半月接连不断的破击和歼灭，使华北敌陷于大混乱的局面，日伪军纷纷动摇，敌占区人心奋昂、伪政权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敌恼羞成怒，乃急调集主力三十六师团、一百一十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第九混成旅团等，并重整第四混成旅团之残兵败将，共约二万余人，首先对太行山区实行大规模的报复“扫荡”，企图乘我久战疲惫，陷我于被动态势，一逞其飞机大炮毒气的优越装备，给我以沉重的打击，以挽回一下“皇军”惨败的体面，镇定业已动荡的军心人心。于是“扫荡”与反“扫荡”大战，遂构成为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

反“扫荡”大战开始于十月六日，一直继续到年底才大体结束，其间敌人反复进行三次大合击。敌人称这次“扫荡”为“毁灭扫荡”，其高级指挥部在下给部下的命令中说：“为根绝敌人之根据地区住家及居民助敌背我之行动，实行彻底的毁灭扫荡。”敌兵正像受创的野兽，一进入根据地见人就杀，见房屋就烧，见东西就抢，武安阳邑镇首当其冲，千余间民房商铺，竟被夷为一片瓦砾。尤其是晋中区乃我军进击正太路的基地，敌人首次“扫荡”便

屠杀了一千多民众，烧毁了几百个行政村庄。敌人企图以这种恐怖的“三光政策”来震吓人民，但这只增加人民对他无比的仇恨，太行区军民更紧紧团结一起，坚持反“扫荡”直到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敌人由白晋、平汉、平辽等路分十数路出动，每路千余至三千不等，为防我夺取辽县县城，首先便合击辽县地区，其先头乃坂井部队八百余人，由武乡出发，跑得很快。我先以决死队小部随后尾击，扰乱敌人，待其进至辽榆路上之榆树疙瘩，忽鸣炮一声，伏兵四起，五旅主力出现北面高地，六旅与决死队一部则占据南面山岭，两面踞高临下向敌夹击，机枪密集扫射，把敌人打得呀呀直叫。敌赶紧临时挖掘工事，据守阵地与我们作阵地抵抗，激战了两天一晚，伤亡大半，由飞机掉下指挥员及弹药工兵器材保持残敌，后敌人四混成旅乃由阳泉调兵经辽县来援，才把这一残敌救走。

此后敌“扫荡”兵力展开，在清漳浊漳两岸往返窜扰。初则合击榆社南北之讲堂、孔家庄、寻觅我主力决战，我五旅主力在讲堂予以迎头痛击，将敌驱回段村。嗣敌即一再猛扑武乡之砖壁，期在捕捉八路军总部，迂上的却又是我野战兵团。在蟠龙、西营、王家峪、东田、韩壁数度展开激战。敌几次向砖壁冲锋，都被六旅准确的炮火压向西去，五旅又从胡峦岭打将东来，敌人在夹击之下，伤亡滚滚倒下山谷。合击总部落空后，敌即移其主力，由辽县黎城上五峰山，两面包抄会犯我水腰兵工厂，敌以大炮飞机猛攻此天险堡垒，但我军依险坚守，外线部队复不断予以侧击，结果我水腰兵工厂适时迁走未遭摧毁，而敌人所得者乃五峰山葬身之所。

太行山已到处燃起了反“扫荡”的烽火，彭副司令亲自指挥，决以乘胜之师，演成有名的关家瑙歼灭战。

十月三十日由水腰窜左会的敌三六师团冈崎大队，在我军截击、尾击下已显露了疲劳的象征，当日续被迫至武乡以东之关家堖，柳树堖一带。当夜我五、六、十旅及决死队各一部即展开了勇猛的攻击，我炮兵准确的摧毁了敌前沿阵地，我突击部队乘敌混乱的时候，迅速的冲到敌人的跟前，投入了手榴弹战斗，往返冲杀五小时，把关家堖和柳树堖的附近高地已占领了数处；第二日，在敌机轮番的轰炸下又开始了猛攻，往返肉搏四次，终于把周围有工事的高地完全占领，我英勇的范子侠旅长光荣负伤，敌我伤亡都重。但冈崎大队已消灭殆尽，所余残部顽抗，只据守阵地核心之残余，为辽县武乡之敌二千五百人负重大伤亡而救走窜逃。关家堖上面还遗留下二百八十余具尸体和三大堆人灰。

这次歼灭战胜利地结束了敌人疯狂的“扫荡”，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它所碰到的不是想像中的疲惫不堪的对手，而是仍然不可战胜的钢铁的强敌，始终不敢轻犯的太行山。从此以后，华北敌酋冈村便以“出乎意料之外”的呼声，转入“治安强化总力进攻”时期。

建立起抗日民主的堡垒

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到了那里，那里就有民主。八路军一二九师之所以能够战胜那样复杂艰辛的局面，不仅因为他们善战，有全国著称的善战将军刘伯承师长来领导，还更因为他们能够忠实执行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策，协同与团结广大人民，实施民主政治，军民密切结合在一起。

晋东南区政权在山西新进势力领导之下，由于共产党八路军的帮助与推动，一九三八年便有各级行政会议之设，吸收各界代表参加，共商政事。冀鲁豫大平原上，由于旧政权在敌

进攻时即已瓦解，我军所至，即由初步的民选产生人民自己的各级抗日政权。冀南在三九年夏陆续成立了各级参议会，重新选举过各级政府人员。一九四〇年春在全边区颁布了有名的保障人权条例，成为最初的民权约章。为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阴谋，一九四〇年八月冀南太行太岳成立了统一的行政联合办事处，筹备建立统一全边区的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到一九四一年，经由民选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包括现在的冀鲁豫区，冀南区，太行区，太岳区）的临时参议会——边区政权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它的组成是三三制的：包括各党各派各阶层代表，其中有共产党员七十二人，约三分之一稍强，其中有国民党人士不下五十人，有名的老国民党员如邢肇棠先生和宋维周先生（一个老同盟会员，年已七十多岁）作了副议长，石璜先生作了驻会参议员。邢先生是老同盟会员，在大革命时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抗战后曾任新五军副军长（军长是孙殿英），见孙殿英之勾敌殃民（那时尚未公然投敌），非常愤慨，于一九四一年毅然与孙决裂，来到边区，参加工作。他说："我是孙总理的信徒，那里有真正的三民主义，我就到那里。"他号召根据地的国民党员团结抗战，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忠实奋斗。老同盟会员石璜先生，民国初年曾作过省议员，抗战后以七十余岁高龄，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工作，扶病参加参议会会议，坚决拒绝反共顽固分子的劝诱，感动了不少对共产党有成见的人。一九四三年以年老寿终。若邢石等各先生之表现，反映着大多数正义的国民党员的意见，也反映着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是真正实现了革命的三民主义。

参议会讨论和颁布了边区施政纲领，制定各种基本法令，都贯彻着统一战线精神，照顾各阶层利益。从参议会中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并举杨秀峰为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成立边区政府，十五个政府委员中只有六个共产党员。从四一年以来，专属县府也都基本上实现了三三制。

最下层基础的村政权，则是一开始就不断进行过改造，在抗日热潮中，在反贪污反恶霸斗争中，人民大众要求自己来管理政治。四一年又进行了普遍的村选举，百分之七十五到九十的公民参加了选举，连接近敌占区的人民都兴奋的卷入民主运动。

人民对于民主权利是十分重视的，选举在每个村里，每个人都热烈的参加，不用说环境较好的地区，即以艰苦复杂的平原来说，冀南广宗刘湾头村登记公民时，偶然把刘得喜漏掉了，他理直气壮地质问着筹备村选的负责人："我是边区的抗日公民，一不是汉奸，二没有神经病，为什么不登记我？"

隆平县大柳树寨有一次因为人数不够，误选了一个素行不端的人，后来全村选民都到了，大家群起反对说："人数不足，选举不合法，应该重新选。"后来大家所爱戴的人当选了，大人小孩都向他说："好好干呀！参议员是最公正的人呀！"类如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可是，由于这时减租减息还没有普遍贯彻，群众还没有普遍深入发动起来，旧农村统治阶级压迫民众的传统恶毒还没有能廓清，所以有些地方的村政权还难能令人满意。这证明民主与民生不能分离。后来又在一九四二年普遍深入执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基础上，改选区村政权，才打下了三三制村政权的坚实基础。

现在边区已大部实行了减租减息（游击区不在内），其余则尚不够彻底。在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实现以后，生产关系得到相当调整，人民生活有了相当改善，特别是农村团结的进步与人民抗战积极性空前提高。据一九四三年太行区五个县七个村的调查：雇工和手艺工人有百分之三十五上升为贫农或中农；贫农有百分之四十七上升为中农；中农有百分之十四上升为富农。减租减息后，农民自动的向地主送交租息，雇工增资后，雇工劳动积极性提高；在

反“扫荡”中间，由于农民抗日积极性的增高，民兵活跃，保卫家乡，保卫了各阶层人的生命与财产；雇工自动帮助雇主全家转移，照常耕田，照料牲口，还到山上为雇主送水送饭，报告敌情；总之是农民与地主，雇工与雇主团结增进了。所以有些地主富农慨叹的说：“我们在租息和工资上让了些步，但在战争中却得到了双倍的利益，共产党八路军和政府的作法是对的。”不但此也，由于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生产关系得到相当调整；政府对人权、地权、财权、政权之确切保障，与广大群众生产积极性的空前提高，生产运动的热烈开展，组织互助，渡过灾荒，也使富有的人们得到好处。共产党和各阶层人民的结合，更加密切起来了。

这样适当的改善民生，增进农村团结，打下了实行真正三三制民主政治的基石，蔚成了坚强的抗日民主堡垒。

抗日与民主不可分，正因为边区老早即实施民主政治，人民有充分的自由权利，人民自己管理政治，抗日积极性的大大提高，爱护边区的创造与保卫者——一二九师，并武装起来配合作战。八路军一二九师不是孤独的，是边区人民的“自己的队伍”，自己的子弟兵，这是它所以能够克服任何艰难困苦的主要原因。

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战，军政方面厉行精兵简政，生产节约。为了打击敌人的掠夺与封锁，进行了有力的军政民一元化的对敌经济斗争。

仅太行一区就精简了脱离生产的六万多人，政府工作人员减少百分之五十多。太行区的屯粮一九四二年较之一九四一年减去九万石，一九四三年又减去七万石，如以一九四四年的屯粮额与一九四一年相较，则几乎减去了将近一半。太岳区一九四三年比一九四二年少收公粮四万多石，减少约三分之一，平原节粮比例略相当。

人民、政府、军队都努力生产，为自给自足而斗争。四年来（截至一九四二年底）全边区群众开荒扩大耕地不下四十万亩，开渠、打井、修滩增加水田约六万亩。部队于一九四〇年起就从事农业生产，去年冬天更学习陕甘宁边区，开展起空前军民开荒浪潮，部队每人种地三亩，自给一季粮食。去年到今年军民开荒数字相当大，惜尚无整个统计。为了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政府与部队曾想尽一切办法：如发行农贷（就今年说，太行区贷款就有六千万，还有贷粮，太岳区贷粮六千石，冀鲁豫贷款一千万，冀南不详）帮助劳动力，帮助牲畜，组织生产互助，帮造农具，贷给种籽，巡迴医疗疾病，节食救济贫苦，开展合作事业等。武装与生产结合，保卫春耕夏收，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作到手不离枪也不离锄。而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还是严格减少人民战时勤务，节省民力。现在人民的支差，一般每月不超过三天，农忙的时候，甚至完全停止。目今实行统一累进税，奖励生产和积蓄，所有存粮存款、羊群、副业一概不负担，土地产量超过平年的，其超过部份不负担，大大的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工业方面，于一九三九年起即开始注意。边区有小规模的兵工厂，自己挖煤制铁，能造枪弹、地雷、手榴弹、纸张、肥皂、许多文具零星日用品都能自给。有些东西，都有了代用品，如创造槐子橡壳果皮作染料，以火镰代替火柴，以自己粗制玻璃代外货，以植物油代煤油，中药制片代替西药，有些成色功效与西医无异。最发达的是制油熬盐与纺织业，植物油小盐大宗输出换回必须品。所织毛巾毛毯除自给外，还行销敌后方与抗日邻区，物美价廉，颇受各方欢迎。创造了改良纺织机，轻便榨油机，手摇磨和新式水车等。

一面从事建设根据地，同时又和敌人进行经济斗争，破坏敌人的掠夺和封锁，并进行对敌的反封锁。实行对敌统制贸易，使敌人不能得到边区一定有用的出产，远在一九三八年便禁止粮食、棉花、铁、皮等出口，换进边区的东西却是我们需要的盐、火柴、布疋、电料、军用品等。奢侈品及某些消耗品禁止入口，凡可以代用的东西，即不输入。提倡服用土货，刺激生产。物资掌握在我手里，凡出口必须换回必需品，极力减少输入，以争取出入口平衡。更用结合敌占区人民，组织敌占区商人的办法反敌封锁，敌占区的商人常常跑到我根据地来，愿意为根据地服务，敌占区人民亦用各种方法帮助根据地冲破敌封锁。目前粮食斗争是敌我生死斗争，一九四二年冬一元化对敌斗争，我们获得很大的胜利，敌人无法吸收根据地的粮食，在敌占区游击区的征粮，也为我们所破坏，群众愿意把粮食送到根据地来。

为了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我们发行了本位币——冀钞与鲁西票，它在人民中有很好的信用，它是根据地唯一的流通单位，而且推行到游击区和敌占区，许多日伪军都常常偷偷地保存冀钞，有时他们向人民勒索，不要伪钞，却要冀钞。

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打击了敌寇的掠夺，保护与发展了边区的物资与生产。

军民同命战胜三年的灾荒

根据地建立以来，几乎有一半时间在严重灾荒中，有水旱蝗雹疫五种灾，最严重的是一九三九年的大水灾，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两年的旱灾与一九四四年的蝗灾。

军民同命，战胜灾荒，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在严重战争环境中可以说是奇迹。我这里只举一些重要的斗争伟业，不是全面的。

"大水浪滔天，
十年倒有九年淹，
卖掉儿郎换把米，
卖掉妮子好上捐。
饿死黄牛打死狗，
背着包袱走天边。"

这是战前流行在冀南的一首民歌。由于统治者不理民事，不兴河工，河床常高出两岸，干流少而狭，支流多而宽，造成冀南十年倒有九年淹的情况，但一九三九年的大水，却是百年未见的灾难。原因是日寇不只带着他的"囚笼"政策，反复"扫荡"，并且挖决运河，挖决潴龙河，挖决滏阳河，加以淫雨连绵，于是洪水便迈开它的阔步，走遍了城镇和原野，二十几个县几尽成泽国，有的地方平地水深一丈四尺，田苗被淹没了，房屋被冲倒了，人民三百万，加以敌人和反共顽固军队之压榨勒索，灾民成群结队，颠沛流离。但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却在敌顽夹击中领导着人民，与人民一起，战胜了灾荒，渡过了难关，而且免除了后患。

筹粮救济，募集公债，以工代赈，沿河救灾。千百万的群众在水利委员会领导之下，在各个河流上出现了他们的行列，大地在他们的手下呻吟。敌人向滏阳河两岸"扫荡"，大炮对准河岸密集射击，或者以大军突然包围挖河的群众，汉奸在河工中造谣威胁破坏，但人民还是坚持下去了，甚至据点里面的老百姓，也参加了这个运动。这年堵口，培堤，挖河，开沟洫总约十四万丈，费工二百四十万。可以使鸡泽、永年、南和、任县、钜鹿、隆平、宁南、新河、冀县、衡水、武邑、阜城、故城、景县、清河、曲周等十七个县不再经常被淹没在大

海之中；并且可得不下三万顷水田。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冀南历史上所未有的。

刚刚把水灾救济好，人民才略告安定，一九四二年又来了空前的大旱灾，一直延长到一九四三年。这次旱灾遍及全边区各地，一半亦是敌人造成的，因为敌人的“三光政策”，使人民的积蓄濒于涸竭，一遇天灾，便缺乏互济的能力。灾荒诚属空前，只太行区五、六两专区灾民就有三十余万人；冀南、冀鲁豫尤其严重（冀鲁豫一九四三年较轻）。随着灾荒发生了一连串的社会问题。敌占区和大后方（如河南）的灾民却还纷纷向根据地逃荒，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这样，边区军队政府不仅要救济本根据地的灾荒，而且还要安置赈济外来的难民。

从发现灾情的那天起，根据地党政军民共同联合的救灾机关——旱灾救济委员会，就从上到下都组织起来了，号召全区动员起来，扑灭可怕的灾荒，提出“政府保证不饿死一个肯自救的人”。于是，在减免公粮负担，拨急赈粮急赈款，普遍成立粮食调剂所，在非灾区展开了“一把米一升糠运动”，军政民工作人员节衣缩食，来援助灾区 ……。而其根本办法则是军政民协力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如担水抢种，采集野菜树叶等代用品，补种秋菜、开荒、修滩、开渠、打井、熬盐，政府贷棉组织妇女纺织，组织运输队等。还有流通粮食，防敌防奸，安置外来难民，发动人民互助等等各种钜大的努力。雄伟的全边区军民一心一德与灾荒苦斗的热潮，以及随灾荒而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如家庭不和，离婚增多）之处理，不是这短短的文字所能报导与形容的，需要专篇来介绍。我暂不多写。

和老百姓共生死的八路军，从上到下与人民共甘苦，救济灾民，不仅在频繁的战争环境里边自己生产粮食三个月，菜蔬全年自给，一切办公用费完全自己解决，衣服完全穿旧的；更不仅前方战士粮食节到每人每日一斤三两，后方人员节到一斤，尽可能来捐助，如彭副总司令和刘师长便捐助了所有的津贴和稿费，和大家一样吃树叶、野菜，真正做到了节衣缩食；并且以有组织的军队劳动力，帮助灾民的劳力，以自己口粮借给灾民作种籽，打井种地。除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以外，那里曾经有过？

旱灾以后，蝗虫便滋生起来，一九四四年又发动了捕蝗运动，创造了历史上的奇迹。

今年春天，当一发现安阳磁武有蝗蝻的时候，军队与政府就发动挖蝗蝻。有的老百姓说：“神虫嘛，还能捉得？”巫婆也主张祭祀，遍地插旗，弄神弄鬼。共产党太行区党委就各方面紧急动员，号召党员作模范。于是党政军民一齐下手来挖捕，奖励杀蝗英雄，捕得的蝗虫换米，把杀蝗与备战、保卫麦收的工作联系起来。采取了好多组织挖捕的办法，县与县，村与村提出了竞赛，做到不毁禾苗，不损果木，既要快又要彻底，特别照顾贫苦的人家。狂潮怒浪般的活动展开了，首先是围剿蝗蝻蝗卵奏奇功：如林县二区岸峪村全村老少，四天里刨了蝗卵十多石，向政府换米九百九十六斤四两，绿豆一千零三十八斤。都村里产生了杀蝗英雄，他们村子上活捉了一万多斤。老百姓都说：“像这样大家动手，一定可以消灭蝗蝻。”又说：“八路军与抗日政府给咱想了好办法，给了咱米救荒，还给咱除了大害，真是再好没有了。”接着是展开了“剿蝻战斗”，卒能在几县范围内（太行五、六分区）斩尽杀绝。真是历史上所仅见，拿来和大后方对照一下，读者作何感想。

由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军民同心，努力和一切灾难作斗争，晋冀鲁豫边区得能排除万难，渡过三年多的困苦岁月。在和灾荒斗争之中，使军民团结得更亲密起来。困难不但不能磨倒他们，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力量，锻炼了他们的意志，提高了他们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活动在敌人的心脏里

百团大战曾给予敌人很大的震荡，使敌人不得不重新考虑问题。为了挽回百团大战后的颓势，准备和遂行太平洋战争，“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日寇于四一年二月开始，提出“治安强化运动”，更进一步的实行“总力战”。

在“治强运动”下，敌把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区”（敌我游击区），和“非治安区”（我根据地）三种，以不同手段实行统制和进攻，企图完成所谓“赤白对立”局面，而其根本目的则是奴役和掠夺华北，成为他的兵站基地。

以已制造的囚笼为基础，敌人在“治安区”着重于“清乡”，强化保甲，实施大编乡制，厉行“配给制度”，屯粮灌仓，抓丁拉夫（在冀南平乡一县就抓了四千壮丁），扩充伪军，所谓“强化乡村自卫力量”。在游击区，敌人着重于封锁蚕食，以特务与武装结合，恐怖与怀柔兼施办法，步步跃进，胁迫人民“接头”、“维持”、或者造成无人区。对于所谓“非治安区”的我根据地，敌人则进行疯狂的“扫荡”和摧毁，实行“三光政策”，制造失败情绪，与国民党内的反共特务勾结，策动会门暴动等等。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一方面以基干军队，游击队和民兵结合，坚持正面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巩固根据地既有阵地，并在边地组成游击警备地带，消除所谓“赤白对立”，更强化了反蚕食的斗争；另方面便提出：“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进军”，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占区的囚笼格子网内，在“中国人大团结一致对敌”的口号下，和人民共商保护自己、对付敌人的办法，打碎敌伪的统制掠夺机构，使人民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向敌伪组织的内部进行政治攻势，从他们的心底燃烧起反战的烈火。武装工作队出现在敌人的心脏里，飘忽无定，出没无常，人民随时可以找到它，敌人却不知道究竟它驻在那个村庄。它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结合的一元化斗争，这里有模范班长和战士，有县长或县府工作人员，有知识分子，也有敌工干部和日人反战同盟的弟兄，每个队员都是战斗员、宣传员和组织员，可以单独作战和作政治工作。他们随着斗争的发展分合自如，有时集合成一个整体，与敌人周旋，或布置检讨总结工作，以集体力量来达成某一任务；有时又分散成许多个体，进行个别活动。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很多的，随机应变，奇妙无常，毫不拘泥于一定的格式，有文的，也有武的，有动的，也有静的，有明的也有暗的，真是“静如处子，捷如狡兔”，使敌人无由捉摸。其唯一原则是：充分运用中日民族矛盾，一切为着保护人民的利益，与人民共生死存亡，绝对遵守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因此，凡是有害于敌，有利于我的事，他们都作；而凡触犯人民利益的事，那怕一点儿也好，都在忌戒之列。

看吧：敌人的心脏里，突然响起了一片“专打宪兵队、特务队、警察”的口号（因为他们是敌人统治民众最凶恶的爪牙，挑拨中国人，人各一心，互相猜忌，人民受他们的毒害最大），这口号一直传入到敌据点。死心塌地的汉奸被杀了，或者受到警告，宪兵下乡受到袭击，打死在路上，千奇百怪无恶不作的特务分子在地下甚至在城里都被绑了出来，他们的罪状，皇皇张贴在通衢要巷。于是他们不敢轻易下乡了，人民少受许多敲诈。“为甚么专打宪兵队特务队呢？”他们相互议论。检查自己是否死心事敌，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时我们便改变了口号：“专打最坏的家伙！”

敌人的据点里，突然收到电话，对面的房顶上响起了号筒，武装工作队同志在讲话，他们向日伪军上夜课，告诉他们敌我斗争和国际国内的形势。或者，伪军家属的家里，突然来

了不速之客，要他们转告其充当爪牙的子弟，少作坏事，替自己留条后路。伪军大多是本地人，他们有花名册在武工队手里，武工队就把他们的所作所为登记起来，做了好事画一个红点，做了坏事画一个黑点，名之曰“红黑簿”或“善恶录”，过一个时期公布一次，黑点点到了一定数目，就包管活不成。这样，识时务的就不得不敛声匿迹，或悄悄到我处留一个名字，在“扫荡”的时候，他们向天放枪，老远就叫起口令来，敌人要他们烧房子，他们放一把火烧掉几捆草堆；下到据点附近“清乡”，也不敢随便向老百姓要鸡蛋，纸烟，甚至同伴作了坏事，有的伪军还加禁阻，或报告我们，以脱干系。

敌人要壮丁，要组织伪自卫团，要夫子修路，尤其是要壮丁出口，这简直是可怕得很的事情，但当壮丁集合行动，半路上突然来了八路军，壮丁便被截劫走了。或者敌已把夫子驱集，在武装弹压下，烈日中修筑碉堡公路，民夫饥、渴、疲累，晕厥倒毙者有之，这时八路军又突然出现，响一枪，民夫就一哄而散，只剩孤零零的几个日军，被击毙，被缴械。

敌人要粮食，但那里却正在闹灾荒，这是实情，敌人是应该知道的，因此老百姓联合起来，坚持不给。当实在被压逼得没有办法，老百姓稍微送了一些去。但最后更多的粮食却在某一个夜晚被八路军“抢走”了（八路军帮老百姓掩藏粮食）。一九四二年敌预定在某县征粮六万石，但连抢带买，他却只得到二三千石。

当敌人抽兵“扫荡”根据地，或者是压榨奴役日甚，人民再无法忍受时，正如人民所意料的，八路军来解救他们了，上百的维持会垮了下来，伪村长都被八路军捉走“受训”去了，敌人丧失了奴役掠夺人民的手足，常常弄得连黑豆都找不上吃的。

有了武工队，敌占区游击区人民便有了依靠，有了斗争的支柱，办法更多了，信心更高了。他们在武工队的帮助下，建立了“哄鬼大同盟”，“反资敌联防线”，秘密的游击小组和“保家民团”等组织，齐心一致，和敌人作韧性的斗争。而武工队在敌后格子网内活动久了，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也就在那里生了根，创造起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单在太行一区，武工队于一九四二年就收复了敌占区一千二百一十余村，在敌人心脏中活动着。（一九四三年以来全边区开展很大，惜未得到完整统计）这是反清乡反蚕食最有效的办法。这样，我们不仅有大块的完整的抗日根据地，而且在敌人的巢穴里有许多小块的抗日基地。敌人要割裂我们，反被我们所割裂。敌人小块小块的蚕食，我们大块大块的掘发，真正是顾此失彼，腹背受敌，“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他的“治安区”，永远“安”不起来，一切抓丁，抢粮，开发，奴役计划均告失败，制造所谓“赤白对立”的梦想终成泡影。

民族英雄与劳动英雄

现在，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地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四十万，向着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目标来发展。他们一边生产，一边战斗，是民族英雄，也是劳动英雄。在广大平原和山地都燃遍了游击战争。依靠这种广大的人民武装，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发展，敌人在这火海中只有毁灭和死亡。

县、区、村各级指挥部，就是县长区长村长组织和指挥人民武装和游击队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机关。战争一来，便率领着那些包着头巾，手中拿着不同武器的雄纠纠小伙子们，参加了普遍的游击战争。敌人无论从什么地方出发，民兵们便扭着敌人，衔着敌人的尾巴，一程程用杀伤“欢送”着，一程程又迎接了去；敌人每次“扫荡”是一股牛劲的往既定目标钻的，但道路上却轰的响起地雷、石雷（石壳炸雷）、步枪、土枪、土炮，前后左右都活跃

起民兵的小型武装，敌人被消耗着，疲劳着，迷惑着，不知不觉的变成了疯子，它要集中兵力搜寻民兵决战时，往往碰上的却又是正规军，遭了更大的杀伤，甚而遭到歼灭。

民兵们手执各种的武器：步枪、手榴弹、长矛、大刀……凡是能杀伤敌人的都变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太岳区药彦明在敌人“扫荡”他的家乡锦上县时，他就用一根木棍和搜山的三个敌人突然打将起来，敌一死一伤，第三个吓得跑了。从此民兵们更有了信心，利用旧武器的药彦明运动，便风起云涌的展了开来。武乡七区民兵就用土枪突然的猛烈的打退了搜山的敌人，使得三百多老乡免掉了蹂躏。韩壁村一个老百姓用菜刀砍死了一个敌人，祁县某村三十多个人，用镢头，铁耙打跑了二十多个进犯的敌人。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扫荡”时，辽县隘峪口一个瞎子用一块砖头砸死一个掉队敌兵的事迹，直到现在，还使敌人咋舌不止。民兵拿出古老的土枪，恶狠狠的说：“像铁板似的山猪都打穿了，日本鬼总不会比铁硬吧！”

那些能背起步枪，胸前挂起手榴弹的民兵是感到最光荣的了，枪枝都被花饰着，在战斗时总是缠住敌人。伏击、袭击、急袭和袭扰，飞行射击，尤其是从掩护洞里放冷枪拉地雷，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在太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反“扫荡”中，由辽县犯武乡洪水之敌数百名，沿途已被打得头昏眼花后。熟峪的民兵在那里已等得很久了，待敌人慌慌张张距离八九十公尺时，接近河滩的两个神枪手，瞄准骑马的军官，拍拍两枪人死马倒，接着山腰上响起排子枪，敌人在混乱之后要搜他们，他们顺着从小就惯熟了的山谷溜之乎也，连影子也见不到。

敌人一驻下来，民兵们就象黄蜂一样都围袭起来，白天敌人走不动，夜间敌人睡不成。襄垣民兵在一个夜里摸进了敌人的驻地，几十个手榴弹扔进了敌人的马房，马匹死十伤十，敌人整整混乱了一夜。要是敌人扎下临时据点，那么村外的路便被切断，桥梁被破坏了，敌人要走的路都埋上了地雷，枪声不断的响着，他们只好恐怖的缩在乌龟壳内。

太行刘二堂的名字，到处被传说着，他以打狐狸、打兔子的准确射击，三枪打死了三个搜山的敌人。英勇的保卫了群众。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扫荡”，是表现群众游击战争最壮烈的日子，敌人在刘二堂神枪手底下，又伤亡了七个人，但是他和他的队员说：“不要骄傲，我们一枪一个来报销，还要努力。”新的神枪手也不断的涌现着，武乡高贵堂就以四枪打死了三个敌人，伤了一个敌人，获得了神枪手的光荣称号。

在敌人走过的路上，继续不断的有粉笔写的字：“注意！这里有铁蛋！”敌人犯了怕“铁蛋”的病，民兵们的地雷运动，尤其是配合伏击的地雷爆炸，把敌人的胆都震破了。敌人走大路，炸开来，走小路也炸，走河滩，连石头也炸开来；敌人走到村子里、院子、门上、灯头前、炕里、水井旁、草堆里……到处是布置得巧妙的地雷阵。本来地雷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敌人要捉人吗，人还未捉到，脚下的石头便轰然爆炸了。口渴极了，找水桶打水找不到，碰巧在另一地点有了一个水桶，但不等提起来，人已被炸倒了。疲倦了坐石凳，石凳就把人炸飞了。除了地雷而外，当敌人从山崖下走过时，也会有滚雷从山上滚下地来，有系着绳子的悬雷从崖上掀下，悬挂在头上开了花。布满河滩中的石头，谁知道那一个是石雷呢？顶安稳的一大块石头会忽然扑向鬼子的身上去。

敌人每次出动增加了工兵，但是工兵也不顶事。在绵上县敌人从阳城村到紫红村一天只走了十八里路，中经琴峪村时，一块大石头猛的炸开来，一百五十多个敌人向四围一散，便踏响了地枪，十九个敌人混身炸得直冒鲜血。敌人指挥官赶快在村外写了“八路村”三个字便走了。从此每碰到一块可疑的石头就命令工兵检查，画上园圈，但石头是数不胜数，刚到紫红村时，一个小队长又被石雷炸的粉身碎骨。敌人吓得又折了回去，但刚一接近琴峪村时，

又有一块石头开了花，三个敌人又被要了命，敌人从村外绕过去，村外却响着一排排步枪的子弹，七个敌人倒卧在血泊中了。敌人搜山没有搜成，三十九个敌人却丧了性命。

在边沿区民兵进行政治攻势，也配合敌占区武工队的斗争，尤其是在保护壮丁反抢粮反蚕食的斗争更见激烈和残酷，人民武装的英雄气概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白天打，晚上摸哨或巡查。赞皇接敌之线在一个时期，平均每日有一百民兵作战四次，临城的民兵每天也在打，敌人蚕食的嘴是被人民的力量斩断了。冀南民兵普遍进行地道战，使敌人心神不定，破路推墙填沟运动，使敌人的交通动脉经常陷入破坏状态中。碉堡经常处在民兵的包围中。

民兵是和正规军血肉连在一起的，他们一起组成游击集团，共同战斗，共同生活着。你分不出那是正规军，那是民兵来，从县到村有些正规军单独组成为民兵的突击队，有些正规军排、班分散下去，班分散到村的民兵中去组成了一个排或一个连。他们互相依靠，互相鼓励，越打越火热，越有力量。太行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扫荡”时，欧团的一个班长几个战士和十几个民兵，依靠着民兵的地形道路熟悉，一直顺着水渠摸进了×村敌一个中队的宿营地，班长指挥着。象沙鱼排睡在大院中的敌人惊起了。一个中队几乎全被手榴弹炸死，民兵敏捷的毫无伤亡的退走了。民兵说：“班长指挥的好。”战士们说：“民兵带路带的妙，胆量大。”

武乡的老百姓谁不知道钟营长，钟明锋。他是游击集团的优秀的指挥者，依靠着民兵，民兵也围绕着他取得了无数次辉煌的胜利，战斗一发生，钟营长一喊：“钟明锋在这里！”民兵们说：“一听钟明锋在，就觉得敌人一定会完蛋的！”太岳区某村突然被敌奔袭时，大人躲上山了，有的小孩放在家里，所有的人都挂念着孩子的着落，但敌人被打跑后，所有的小孩都被我一个战斗连安全的抱还了他们父母。冀鲁豫沙区的民兵联防配合游支，拔去了拐上据点，扩大了四十多个村子，瓦解了红会反动组织，牵制了伪军齐逆子修两个旅的兵力，这真是铁的长城。

县、区、村指挥部是一个经常的组织，战斗胜利了，它就成了人民武装建设与生产劳动的核心。人民武装人员除了普训集训之外，在闲暇的时候把村俱乐部成为唱歌游戏打棒球、打拳、劈刀、刺刀、瞄准集体活动的场所。在劳动中他们这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加上组织和领导，往往是生产运动的先锋，在和东县锄草竞赛时，普遍锄了三遍，前党城民兵领导的小组就锄了五遍。老百姓嚷着：“民兵干的凶，真顶用！”暖窑村在抢收时，组织起民兵自卫队的互助抢收队，白天割，月夜担，差不多全村庄稼，大部份由这一队人抢收回来的。民兵们平时也集体开荒以解决战时的困难。涉县下温村的民兵，经常准备着一个多月的吃喝，以便顺利的进行战斗，在边沿区民兵们一边生产，一边又掩护群众生产。昔东组织了轮番游击队，和东预防敌人经常的袭击，民兵在村西生产（敌来的方向），老百姓在村东生产，互相耕锄，民兵们保证要在敌来五里路以外，能叫老百姓安心生产，老百姓就先给民兵耕锄一天，算作耽误生产时间的预支数，如无敌情，民兵再补工。先生棠村民兵追击敌人没有赶上打，耽误了半天，民兵们说：“我们没有打上，不用算工了。”老百姓说：“虽然没有打上，但掩护了我们生产也要顶工。”襄垣南庄村民兵的割麦组，提出了上午割光，下午打光，晚上藏光的三光办法。襄垣有些不事生产的民兵，在指挥部教育下，也积极投入生产了。有些家属们说：“人家比咱们管教孩子还好呢！”

民兵是民族英雄，也是劳动英雄。和东七十个劳动英雄中就有三十个是民兵。他们是从老百姓中产生出来的，为老百姓利益战斗着，老百姓也爱护着这批英雄们。

七年来，敌人疯狂的屠杀蹂躏着中国的老百姓，焚烧着他们美丽的村庄，不屈不挠的中

国人都是自愿的在“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口号下武装起来了。人民武装，尤其是骨干的民兵原是抗日民主政权的产儿，特别是实现了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把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利益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战斗、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产党的主张是依靠人民，武装人民，因此四十万的民兵即成为根据地伟大的斗争力量，组成大军浑浑的源泉，正规军作战的耳目和手足。现在单说太行区民兵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扫荡”时，参战一四六七九人，作战二二五五次，毙伤敌伪一九〇二人，捕获敌伪间谍四七一人，解放民夫七一一人。从这数目字看来，晋冀鲁豫边区的作战胜利是和人民武装的胜利不可分的。谁要不依靠人民，不要人民武装，甘心裸体跳舞，其结局一定是失败的。

今日之晋冀鲁豫

七年过去了，经过一二九师、决死队和一一五师部队结合人民共同创立和建设了的这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所经历的斗争是极复杂而且艰苦的，仅只就战斗而言，便有三万一千余次，毙伤敌伪十九万余人，缴获长短枪六万来枝，各种炮一百七十多门，各种机枪一千一百余挺。然而我们却牺牲了最优秀的将领，忠实的共产党员，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军分区司令员范子侠、郭国言、易良品、杨宏鸣、赵义京、萧永智、李林、朱程、康俊仁，副司令陈耀元、刘治朝，旅参谋长隆世兴，分区参谋长郑前学、胡乃超，决三纵政治委员董天知，军分区政委李忠，旅政治主任姚第红，东纵政治主任邓永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洪化、陈元龙、刘诗松、夏祖盛、魏金山，团长叶成焕、丁思林、谢家庆、陈子斌、李继孔、周凯东、刘正、王汉林、曾玉良，团政委魏明伦、周正华、郭华……诸同志等。而且伤亡了久经锻炼的指战员十万七千二百人。地方工作干部牺牲者还不在内。

由于有这样多的战斗，才能从敌人手中夺得这样大的区域，全边区面积约六十万九千平方里；西抵同蒲路，西北面与我晋绥边区衔接，北至正太路、德石路，与我晋察冀军区相联系，南抵黄河（现平原方面跨陇海路），东至津浦线与我山东军区相连。人口二千五百余万，分属一百九十八个县。县城也在我手的完整县有范县、观城、濮县、清丰、内黄、朝城、榆社、林县、涉县、黎城、沁水、平顺等十二个。

全区有四个行署，二十六个专署（其中有两个是新成立的），共辖一百九十八个县政权（除旧有县治外，并设有许多新县治），辖三万二千六百余村。民兵四十余万，有组织群众五百余万。

太行太岳是山岳地带，两大山脉横贯其间，太行山为本区西部与东部平原的天然分界线，地势险要，便利于我军活动，是我军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堡垒之一。

冀南冀鲁豫一带虽属平原，但由于七年来平原作战的锻炼，及地形之改造，加上人民抗战之热情与组织，且东平盆地之湖水，占地颇大，芦草遍地，村落很多，有利于游击武装的活动与根据地之坚持。

出产以小米，小麦，高粱，玉蜀黍，豆类，棉花，皮毛，药材，山货为大宗，矿产则煤铁蕴藏很多。

在残酷斗争的七年中，由于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人民的拥护，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坚持阶段，走上了恢复巩固再扩大的时期，但预料今后尚有艰苦的斗争，全区军民正加紧准备。晋冀鲁豫全区军民在这七年的锻炼中，已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坚强堡垒，待全国总反攻到来的时候，它必将担负先锋任务，成为反攻前进的战略阵地。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14—19日）

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一）全军目前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一十万（各地报告数字恐有些不确实），欲以此在反攻前坚持与发展根据地是够用的，但欲以此在反攻时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从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从背后来的袭击），则是不够用的，要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敌人现在正向正面战场进攻，若干根据地当面敌情有某些暂时的变动；第二战场开辟，红军大举进攻，美国对日进攻更加积极等捷讯，又可长抗战之志气，灭敌人之威风，这些条件，均使我们可能与应该在敌后扩大根据地与扩大军事力量。但是就扩大军事力量一点来说，在目前时期内，除若干条件优越地区外，则仍然受着种种限制。一则目前人力物力财力仍然差不多和过去几年一样严格地限制我们，过去精兵简政正是为着适应此种限制，现在条件基本上没有变更（上层中层机构精简方针仍应坚持不变）。二则敌人从正面回师扫荡及从满洲抽兵入关都有可能，战争越接近胜利将会越困难，如同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那样再来一个极端困难时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还要准备对付使我们陷入更大困难的突然事变。所有这些可能的困难，我们均要事先作好精神上物质上与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方能有备无患。三则我军多年分散游击，极少训练，尚不巩固。我军经过了七年抗战锻炼，从这一方面来说是提高了，但是我军现在进行的是极端分散的游击战争（这是完全必要的）极少集中整训与集中作战，从这一方面来说是退步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目前除若干条件优越地区外，一般地不可能与不应该采取扩大军队的政策。我们的中心政策，是应该抓住目前时机，除对付敌伪扫荡蚕食，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展游击战争，扩大与巩固根据地，并以大力争取伪军伪警及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上的广大群众之外，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备准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目前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提高，是深入，是巩固，是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这不论对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民运工作、干部教育工作都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完成此种任务，则我们将来的大发展与我们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任务必会受到妨碍。关于军事工作方面的提高、深入与巩固，须特别唤起同志们注意。

（二）因此，我们向你们提议，在一年内，主要是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由各局各委作出全般计划，由军区军分区负责执行，利用一切可能间隙，轮番整训部队。有特别便利条件者，几个团或一个团为单位分批集中整训，无此条件者以营以连为单位分批集中整训，总使一年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都得到一次有效的大整训。

（三）整训内容分军事政治两方面。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

练兵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练兵方法，第一实行群众运动的方法，改变过去少数人包办，即司令部与教员包办的作风，而变教育为广大群众自己的事业，使群众（干部、战士、杂务人员）自觉学习，自动研究，互相帮助，互相比赛；各个人，各大小单位的群众都关心自己个人与单位的教育成绩，生怕成绩落在其他同志与其他单位的后面；使到处成为操场，到处成为课堂，时间抓得很紧，人人不甘落后，使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第二，实行学用一致的方法，改变过去教条主义的练兵方法。过去的教条主义练兵方法是使书本成为教育的唯一根据，结果使教育停止在书本范围以内，把宝贵的现实经验置之不问，教者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强迫注入，不能启发群众的积极性，表面很忙，实际上无多大成绩；学者是事不关己，反认学习是痛苦，是不必要的负担。关于过去我军的军事教育方法，当然不能说一切都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其中有许多曾经是有益处的，合乎实用的，过去的书本教育对于我军有其一方面的进步性与益处。但是过去的方法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弊病，则是事实，而且没有受到必要的批判。此次练兵，必须纠正这种错误，不是不要书本而是正确的运用书本，将书本上不合实用的加以删削，而将书本上没有包括的东西（我们的具体经验）加入进去，并且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总之练兵内容要切实用，不是为练兵而练兵，而是为战胜敌人而练兵。第三，练兵的领导方法：动员要普遍到每一个战士，使人人都了解练兵的必要，注意说服落后分子，打通思想。要使骨干与群众相结合，所有干部与战士中的积极分子在操场上都和一般战士一样操作，一样守纪律。要创造与发现典型例子，将其经验介绍给全体，并请有优良成绩的战士当教员，要以分区或以团为单位召开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练训一时期后，每个伙食单位用无记名投票法选出干部一人战士二人为代表到团部或分区去开会，总结经验，发动竞赛，奖励积极分子。关于练兵方法以及练兵内容，军委将有详细介绍，这里只指出几个方法上的要点。

（四）一年整训期内，政治工作须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根据古田决议及谭政报告，用检讨错误缺点，发扬优良成绩，发扬模范连队的经验，奖励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与模范学习者的方法，达到改造政治工作之目的。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整个整训任务的完成。

（五）上述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改造，包括全军四十七万主力军与游击队在内，均须在一年内达到大整训一次的目的。我们还有二百万民兵与更多的自卫军，他们不但是现在坚持与发展根据地配合主力军与游击队作战的决不可少与极有成效的力量，而且是将来使我军扩大一倍至数倍的主要兵源。一年大整训期内，不但要整训全部主力军与游击队，而且要整训全部民兵与自卫军。各局各委及各军区军分区，应分别作出关于主力军与游击队部分及关于民兵与自卫军部分两种整训计划，分头分区分期进行整训。在整训民兵与自卫军中，应总结民兵与自卫军的斗争经验，重新整理其编制，不足者扩大之，落后者提高之，缺乏干部者补充之，在不违农时及劳动与战斗相结合的原则下，达到全民皆兵之目的。民兵自卫军的整训方法，亦须实行群众运动，学用一致，骨干与群众相结合，介绍典型经验，发动竞赛，开英雄大会与模范学习者大会，奖励优良成绩等。各级军政党机关对民兵自卫军工作过去注意不足者，须作自我批评，军区军分区政治工作部门过去对民兵自卫军中政治工作的指导与帮助注意不足者，须立即加强注意。

（六）为着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时扩大我军一倍至数倍，对于大批训练干部，应引起各级党委及各级军事机关与政治工作机关的极大注意。现在不论主力军游击队，或是民兵自卫军，我们的干部对于技术与战术程度，对于练兵、带兵、用兵、养兵的能力，一般都不很高，有些则是很

低的；对于政治认识与政治工作，一般都有缺点，有些则是很差的，如果还不及时加以整训，势将妨碍将来重大任务的执行。但是同时，不论在我们的主力军与游击队中，或是在民兵与自卫军中，都包藏着广大勇敢聪明与有极大发展前途的干部与士兵。我们的干部与整个军队有极大的成绩，干部水平的不高及某部落后是可以克服的。在一年整训期内各局各委及各军区军分区应有一个训练干部的切实计划。分别在军区军分区及县级实行。在军区者，有抗大分校，轮训当地连长连政指以上军政干部及训练由当地党政民工作准备转入军队，担任连级以上工作之干部。再则，普通中等以上学校亦须加入军事教育课程。在军分区者应办教导队，以训练军队班长排长与民兵自卫军排长两类干部为目的。前者应包括轮训主力与游击队中的班长排长及训练由当地党政民工作准备转入军队担任班长排长工作的干部，其期限由各地酌定。后者，时间一月至二月派回本地工作。在县级者，应办民兵自卫军班长一级的教导队，轮训一月即归本乡，造成广大群众武装的干部。各地应自己创造多种训练方法，利用战斗与生产间隙去进行。

（七）请你们将关于一年大整训的任务提交所属军事机关与政治工作机关，加以研究，定出计划，开始执行。为着使这个一年大整训的计划，变为群众热烈参加的运动，并获得实效，必须在一次包括全根据地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上讲通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及其实践的方针方法，会毕并应仿照去冬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例子，所有高级干部，不分文武，一律参加，下操五天至七天（身体太差者在操场旁观），造成大整训的决心与热潮。还须注意者，时间虽定一年，但是主要应抓住今冬十一月至明春二月共四个月为整训中心关节。今秋八、九、十三个月则须训练好一部分武工队，一部分游击队及一部分主力，准备到冬季去接替其他部队，分期集中整训。民兵自卫军的分期轮训计划由你们酌定之。

（八）此外，在发展军政党公营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以一九四三年负担作标准）并十分注意保护壮丁，休养民力的原则下，应按照各地需要情形，酌量吸收若干新兵，补充连队之消耗，保存各战略区军队之总数量。如果我军在一年整训期满时能够保持全军四十七万至五十万，又获得一次大整训，那就算是很大的成功。再则，本指示所提出之整训与提高部队质量之方针，不能误解为放松上中层机构的精简，也不能误解为要改变目前部队的分散游击性，须知精简政策与分散游击政策在目前时期仍是完全需要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抗战七周年纪念口号

（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

（一）纪念七七，向全国抗战同胞致敬！向正面战场下努力作战的军队致敬！向敌后战场的八千万抗日同胞致敬！向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致敬！向沦陷区抗日同胞致敬！向援助中国抗战的美苏英盟邦致敬！

（二）纪念七七，加强抗日战争，全国军队必须积极作战，加强团结，粉碎敌人的新进攻！

（三）西南危急，西北危急，全国人民快快起来，保卫西南，保卫西北，不让敌人打通粤汉路、湘桂路，不让敌人打进潼关，把进攻的敌人打出去！

（四）要求国民政府切实改善士兵的待遇和教育，改革军事机构，提高军纪和战斗力，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五）要求国民政府保护目前大后方正在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使得这个运动得到自由发展，增加抗战的力量！

（六）要求国民政府快快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发弹发药，改进八路军新四军的装备，让八路军新四军开到河南湖南前线去，打退敌人的包围封锁与进攻！

（七）要求国民政府快快停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释放叶挺军长和一切被俘将士！释放各地被捕的共产党员，释放一切被捕的爱国志士！

（八）纪念七七，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加强全国团结，立即改革内政，立即实行民主，以便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九）要求国民政府快快实行三民主义，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动员全国人民，打退敌人的进攻，准备全国的反攻！

（十）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党禁，允许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并在加强抗战实行民主的基础上，迅速调整国共关系，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

（十一）要求国民政府废除统制经济，取缔投机操纵与囤积居奇，实行发展农业生产，奖励民营工商业，克服经济危机，培养抗战的经济基础！

（十二）纪念七七，敌后军民要再接再厉，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阻止敌人的进攻，驱逐敌人出中国！

（十三）八路军新四军，要继续积极作战，无情的歼灭敌人，加强训练，提高军事技术，更加发展民兵与游击队，更加发展武装工作队，加强瓦解敌伪的政治工作，准备变成全国反攻的先锋军！

（十四）陕甘宁边区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要继续发展生产，发展工业，发展农民的生产互助组织，发展各界人民的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公益事业的合作社，改善军民生活，准备

反攻的物质基础！

（十五）坚决实施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没有减租的彻底减租，发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驱逐日寇而奋斗！

（十六）继续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的工作，全体军民团结一致，打倒日本法西斯！

（十七）一切共产党员，要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实行三民主义与四项诺言，坚持实行三三制，坚持与美苏英亲密合作，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虚心学习，力戒骄傲，艰苦奋斗，迎接反攻，完成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任务！

（十八）沦陷区的同胞们！你们解放的时刻迫近了，继续各种形式的大小斗争，反抗日寇占领者，聚集力量，加强准备，准备在必要时以武装起义来响应将来的全国总反攻！

（十九）纪念七七，加强中国与美苏英及一切联合国的团结，争取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灭一切法西斯势力！

（二十）庆祝第二战场的胜利，庆祝苏联反攻的胜利，庆祝太平洋上的胜利，庆祝印缅前线的胜利，中国军民要与美英盟邦共同动作，积极准备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二十一）给来华作战的盟军以一切帮助！援助和救护盟邦飞行人员！

（二十二）拥护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决定，坚决实行这些决定，在目前，积极打倒法西斯，在战后，保持长期的国际和平！

（二十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伟大的保卫祖国战争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二十四）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世界万岁！

（原载1944年7月6日《解放日报》）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毛　泽　东

一九四四年快要完结了，我们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现在美国已打到雷伊泰岛，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们经过林祖涵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谈判一次，但是依然没有结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该想出许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青年们及其他各界，应该有许多人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则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都有责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经有许多党派，许多工业家、教授们、学生们，甚至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

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经验。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们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们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这里有了六十五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那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一九四五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指出的呢？

我认为，一九四五年，中国解放区应该注意如下各项：

（一）扩大解放区。无论那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外，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们的军队已经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绩，明年应该继续这样做。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该这样做。

（二）敌人的进攻“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应该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没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们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现在已经改变了，须知敌人还是强的，他决不会忘记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比敌人弱，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们占优势的时候，敌人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三）整训现有的自卫军与民兵，增强他们的战斗力。自卫军与民兵数目还不够，各地除某些个别地方不可能再扩大者外，均应尽量地扩大。九千万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应组织在自卫军中，在不脱离生产原则下，轮流担任保卫家乡与协助军队的任务。从自卫军中挑选精干分子组织民兵，或基干自卫军，在“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原则下，协同军队作战，或者独立自主的作战。九千万人民中，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万人当民兵，即是说，比现有民兵数目扩大一倍。有些地方，还没有十分重视这个工作。在这些地方，民兵的数量太少了，又缺乏整训，质量也不高，一九四五年必须改变此种情况。自卫军与民兵，均必须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不妨碍生产。在这里，变工的方法是必要的，战斗的民兵组织与生产的变工组织，往往可以互相结合。自卫军与民兵的领导机关，必须是民主选举的。只有这样，自卫军与民兵才能扩大，也才能提高战斗力。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

为十分必要。

（四）整训正规军与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应将全部军队轮番整训一次。按着新方法进行整训，举行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五）在老区域，补充原有军队的消耗数额。在新发展区域，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应该扩大军队。不论补充军队与扩大军队，均以不加重人民财政负担为条件，这一点必须谨记，如果违背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要失败的。

（六）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许多部队，现在还未重视这一工作，由于不明白这一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目前开始的一年整训计划，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应该并重，并使二者互相结合，整训开始时，还应着重于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军事整训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这一工作的实行，应在每一部队内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

（七）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进一步的改善军民关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我们解放区人民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好的，因此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巩固与发展解放区。但是，旧军队的习气，同样会传染给我们的，军民关系中的不良现象，例如军队态度横蛮，损害人民利益，纪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时常发生。同时，地方对军队帮助不够，优待抗属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现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们曾经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地方还未重视。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一切解放区，应普遍举行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一定要做出显著成绩来。已经有了成绩的，必须继续做，必须检查此两项工作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全部军队，官兵上下团结一致，从政治上铁一般的巩固起来了，加上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又加上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就有了坚强的保障了。

（八）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路线，在解放区，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政府工作中。这一方面的工作各地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各地均应总结经验。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与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

（九）减租，各地均有成绩。但是有些地方成绩少些，明减暗不减及恩赐观点，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减得太多，或在减租之后不注意交租等现象。这两种偏向，都应纠正，减租之后，租约期满的除在照顾双方利益原则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种者外，应该重订新约，使农民有地可种。老区域减租未彻底的，应该查租。新区域尚未减租的，应该发动减租。租不减是不对的，减得太过火也是不对的。凡地主因被敌人摧残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难的，政府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以从事农工商业或参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这件事当做政府工作

之一，借以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我们现在是处在农村中，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十）今年绝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生产运动，有了显著的成绩，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但是也有一部分地方还未着手进行，另有一部分地方成绩不大，再有一部分地方军队方面有成绩，人民方面缺乏成绩。一九四五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形者，可以允许减少或免除生产。必须动员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极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这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规模的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该使人民够吃够穿，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耕三余一"的口号，除被敌人摧残厉害的地方外，就是在敌后解放区，也是可能实现的。我们解放区的工业品，必须力求自给，必须争取于数年内达到全部或大部自给之目的。由公营私营与合作社经营这样三方面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和生产相辅的是节约，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经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就是错误的方针。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使精力不致于枯竭。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使一切工作人员及全体军民透彻地认识清楚，以便组织他们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公营经济中，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是在很多部门内可以实行的，并应该实行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十一）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十二）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等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十三）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广大的有能力的干部。我们现有的干部，比较从前增加很多，但是仍感不足。干部的能力也提高了，但是仍很不够，特别是下级与初级干部，不论是军队的或地方的，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工作技术的程度，一般地是不高的，有些则是很低的。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们忙于工作，领受教育的机会太少。一九四五年，各地干部教育，应该着重于训练军队的（连至班）与地方的（区乡）下级及初级干部，在职的用轮训办法，不在职的用学校办法，有计划地将他们提高一步。

（十四）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独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们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较，而不是拿我们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较。我们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

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区别的。但是，我们队伍中却有许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1）知无不言，言无不尽；（2）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们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赞的，这是很光荣的。但是我们仍有严重缺点，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弄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十五）除了上述种种以外，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续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谈判是一种办法，全国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我们解放区已做的和要做的工作，当然还有许多，但我以为目前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上述十五项，其他就从略了。各个解放区的情况与工作步骤，在许多点上互不相同，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布置工作，以便适当地完成各项任务。

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注：本文是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

［附］抗战第八周年中国两个战场的作战概况

——一年来的敌伪军事动态——

当盟军去年在太平洋上的积极反攻，粉碎了敌人的外防线又突破其内防线的时候，敌人便发动了所谓"中国大陆交通决战"，以补救其海上交通被完全切断后的危险，故自豫湘战役后，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敌又相继进行了衡阳、湘桂、粤汉等战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

指挥无能，使敌寇企图均得以逐一实现。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不断的胜利攻势，以及盟军的陆续占领菲岛、琉璜、冲绳等地，迫使敌人从去冬以来，在中国大陆进一步采取了所谓“准备大陆决战体制”的方针，在这个方针下，敌人进行了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增加兵力，并构筑坚固工事，加强沿海防务；对我粤、浙、苏、鲁等沿海解放区，则先后增调重兵，进行了许多以攻为守的不惜重大牺牲的“扫荡”，企图逐我于沿海地区之外。第二，是收缩兵力，加强机动；如在闽、浙、桂等省均先后放弃一些地区，以固守其重要点线。第三，在敌后则采取“重点配备”，以便机动应付我军的攻势作战。第四，是加强铁路运输，拆除某些铁路支线，加强干线。第五，是努力掌握伪军，加强其控制，自去年冬至现在，将许多伪军调防，使之脱离地方性，便于指挥，调换某些伪军高级指挥官，使之更顺从敌寇，以加强统一指挥，便于配合作战。最后，是撤退部分侨民，并组织侨民义勇队，准备严重局面之到来。总之，敌人这些措置的重心，是准备应付盟军登陆和我们的大陆反攻，阴谋拖延战争，寻找苟存的机会。

解放区战场的攻势作战与伟大胜利

自去秋以来，我解放区军民根据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有计划有步骤的向敌伪举行积极进攻，在旧的被占区，扩大了解放区，在新的被占区，创造了新根据地。而其攻势的猛烈，地域的普遍，敌伪损失的惨重，均是以前几年所未有。

攻势以山东沂水等战役为起点，然后普遍于敌后各战线。如果按区域来说，这就是：

【山东】鲁中区去年八月的沂水战役，收复了沂水城，打断了敌人分割我山东解放区为两半的台潍公路。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的冬季攻势，威逼了胶济、津浦两铁路，打通了徂徕山、莲花山两区的联系。今年二月向章（邱）淄（川）地区的进攻，开辟了胶济西段的南北地带。三月的蒙阴战役。曾解放了蒙阴城，拔除了敌人深入我腹地之重点。六月的讨伐厉逆文礼战役，歼灭了伪鲁东和平建国军之大部。滨海区去年七月的诸胶攻势，歼灭了伪李永平部，打通了与胶东区之联系。十一月的莒县战役，光复了莒城，与鲁中区完全联成一片。今年一月的赣（榆）北、诸(城)东攻势，巩固了沿海阵地。五月的日(照)西、赣（榆）北作战，牵制了进犯我鲁中、鲁南之敌。渤海区去年七至九月的秋季战役，光复了利津、乐陵、临邑、南皮四县城及广大国土，改变了过去的分散游击局面。今年二月的讨伪王尚志战役，歼灭了敌寇常利用以蚕食我昌邑以北地区之王匪大部。四月中至五月中讨伪张景月战役，使渤海与胶东区完全打成一片。六月蒲台和滨县战役，解放了蒲滨两城，截断了敌人的沧潍公路，巩固了我渤海军区。胶东区去年八月至九月的秋季战役，解放了荣城、文登、栖霞三城，使四个分区联结一片。今年二月讨叛国投敌的赵匪保元部，解救了七十万被荼毒的人民。鲁南区去年秋季的军政全面攻势，攻克了该区敌伪据点的80%，打通了与鲁中的联系。今年二月泗水之役，消灭了伪十军荣逆子恒全部。三至四月的讨伪王洪九战役，肃清了临（沂）费（县）公路以南之王匪，打开了与鲁中、滨海两区的新交通。五月的邳县战役，收复了邳城，肃清了邳西、峄、枣路东之敌踪。

【晋察冀】冀中区去年八、九、十月的连续攻势，拔除了敌伪据点千五百余个，解放村庄五千余，恢复了百团大战以前的局面。今年四至六月的猛烈进攻，接连解放了任邱、河间、饶阳、新镇、安平、武强、文安、深泽、献县等九城，使冀中得有广阔而自由的土地。晋冀区去年摧

毁敌人第一道据点碉堡线后，今年三月复解放了灵邱全境，现我主力正挺向大同城郊。冀察区今年的春季攻势，开辟了怀安地区，并解放了桑干河以北区域。五月收复了怀安城和涞源全境，打开了晋冀区的广大联系。冀热辽区去年我军攻势，楔入伪满境内，震撼了伪满统治，今年来又不断粉碎敌寇企图确保占领区，扩大伪化的连续“扫荡”。

【晋冀豫】太行区今年一至三月的豫北战役，开辟了道清路南、黄河以北、新汴路以西的新解放区。三月的马坊攻势，拔除了敌寇深入我二分区腹地之重点。四月的猛烈进攻，攻入了祁县，又连克陵川、左权（辽县）、和顺三城及其广大国土，严重的打击了敌人的重点配备，拔除了敌人插入我太行的尖刀平（定）辽（县）线。五月对白晋铁路举行全线大破袭，使敌交通支离破碎。太岳区去年六至九月的豫北攻势，完全控制了济（源）垣（曲）地区。今年的春季战役，肃清了豫北敌伪残余，解放同胞八十万，并连克沁源、阳城、晋县、安泽四城，又歼灭盘据闻（喜）、夏、绛地区的贾匪真一部。六月夏季攻势，攻克了夏（县）曲（沃）绛（县）翼（城）地区的三十余敌伪据点，使我五分区腹地与祁（家河）夏（县）公路以南连成一片。并与太行军民联合围困解放高平，完全打通了太行、太岳两区之广大联系。

【冀鲁豫】去年七月攻势，收复了莘县，粉碎了汶上至鄄城二百里战线上的敌伪堡垒线，于是与鲁南区联接起来。十一月战役，又收复了濮阳、寿张两城，扩大了老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今年的春季攻势，解放了大名、南乐两城及濮阳西南扩大国土。五至六月的夏季战役，连克南宫、新河、阜城、威县及再克大名等六县，近又收复枣强及故城、迫使敌人处于更狭小的点线。水东区五月挺进上蔡、商水地区，打通了与淮北、豫南两区的联系。

【晋绥】去年的秋季攻势，破毁了敌人战略要地的汾阳军事建设，并将敌分割我三、八分区的岚离公路截成数段。今年的春季战役，则彻底粉碎了岚离敌，并解放方山、岚县，五寨三县，打开了三、八分区及二分区与塞北区的联系。五月的清水河区与绥中作战，转变了塞北的长期分散游击局面。

【豫西】自去年春季之交敌人发动中原战役，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望风而逃，豫西遂沦陷于敌，我军为打击敌人，解放人民，于去秋进军豫西敌后，虽屡受国民党与敌勾结的联合攻击，但经数月苦战，已解放了二万一千余方里国土，创立了豫西新解放区。

【华中】先先是淮北区，去年的秋季攻势，开辟了涡河以北陇海路南、津浦路西的大块新解放区。今春则又解放了泗阳县，切断了敌人分割我解放区的泗（县）宿（县）和宿（县）蒙（城）公路，打开了我根据地的内部联系。苏北区去年冬粉碎敌人的分割后，今年的春季攻势，则又解放了阜宁及灌云以东的广大国土，于是拔除了敌人伸入我中心地区之重点，并巩固了沿海阵地。苏中区今年二月的兴、高、宝、盐战役，粉碎了敌人的“水网坚城”区，巩固了我苏中根据地。苏浙区去年八至十月的攻势，严重打击了伪一方面军任援道的主力，转变了过去的分散游击形势，并控制了太湖西南地区。今年更挥军南下，开辟了浙西新解放区，解放了德清、武康等城，打通与浙东区的联系。淮南区虽受国民党反共军不断进攻，但仍积极抗击敌伪，今年三月攻占了嘉山县，四月开辟了高邮湖以西地区，又打断了敌人的盱（眙）临（淮关）公路，密切了两淮的联系。鄂豫皖区自去冬深入豫南敌后，创立了遂（平）确（山）舞（阳）南新解放区，并与水东区联系起来。皖中区今年四月的芜湖城郊攻势，解放了皖东南同胞十万。于是与苏浙军区更密切的联接起来。

【湘鄂赣】继中原战役之后，敌人于去年六月继续向湘北以及湘南湘桂进攻，而国民党军队则一败于中原，再败于湘北，三败于湖南，一直败退到贵州，使广大国土与人民，沦于敌

手，我军为挽救这一为国民党所造成的严重失败危机，并援助湘鄂赣人民的抗日斗争，我军一部挺进湘北敌后打击敌人，协助当地人民成立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并创造了湘鄂赣新解放区。

【华南】江区，去年秋冬的积极破袭，曾有力的牵制了敌人向粤北的进攻。今年在敌顽的夹击中，仍积极向四周发展，严重的威胁着敌寇的南海防线。琼崖区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已从东北隅燃遍了整个岛屿，使海南岛上之敌限于困境。

此外，一年来由于我军民的密切配合，英勇善战，粉碎了敌伪百三十余次千人以上的报复、抢掠及确保点线、扰犯沿海等“扫荡”。

综括我军这一年来胜利攻势，我们解放区战场已造成了一种新的形势，就是：解放区获得了加倍的扩大，敌占区大量的缩小；战役主动权至今仍掌握在我们手中，迫使敌人处于更被动的挨打地位。我们的人口已拥有一万万，解放区面积扩至约九十万方公里，正规军壮大至近百万大军。并且由于我们的胜利，使敌伪内部情形发生变化。所谓“武士道”精神，已远非昔比，代之而起的，是悲观反战的情绪，士兵和上级官佐投诚我军与惧战而逃者日众。伪军的民族觉悟由于我之努力争取工作，已日渐提高，其反正杀敌者，累累而起。总计一年来日军投降一百〇四名，伪军反正者四万〇四百五十五名，超过抗战以来任何一个周年。我们胜利之期，是屈指可计了。

国民党战场的消极抗战与积极反共

在这一周年中，国民党战场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它与解放区战场相反，在敌人打通大陆交通的进攻下，它从河南一直败到广西。除去豫湘战役不计，从去年七月至现在，国民党丧失了国土近三十万方公里，丢弃城市一百十二座（敌撤退的三十四座在外），沦亡同胞五千四百万，损失军队几十万。败绩的过程是这样的：

豫湘战役后，敌人七月又开始向衡阳进攻，至八月九日，国民党将战略要冲之衡阳，拱手让敌，守将方先觉率部叛国投降。敌人稍事休整后，于八月二十九日又开始湘桂战役，十一月十日，广西省会桂林失守，十一日西南军事要地柳州又告失陷。敌随即向黔桂公路进攻，至十二月二日，攻占了独山，十日自南宁南下之敌与越北之敌会合，至此，敌宣告大陆交通决战结束。从衡阳至湘桂战役止历时不过半年，国民党以百万之众，战不过日寇十余万之师。结果丧师失地，祸国殃民。

今年一月敌为防备盟军登陆，十六日进攻粤南沿海，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连失博罗、惠阳、海丰、陆丰等县，使敌人控制广州沿海的企图得以实现。

一月十七日，敌人又发动了夺取赣南空军基地与打通粤汉路之战。仅半月、国民党又连失莲花、永新、遂川、始兴、南雄、仁化、上犹、南康、赣州等县及其机场。二十七日与赣州失陷同时，粤汉南段向北进攻之敌与耒阳向南进攻之敌会合于韶关。并占领了清远、英德、乐昌、宜章、郴县、曲江等县。于是粤汉交通最后被敌人完全打通。

三月敌人举行豫南鄂北战役，十倍于敌人之国民党军，从二十一日起又连失南召、方城、镇平、内乡、新野、邓县、唐河、淅川、宜城、南漳、襄阳等县，至四月八日敌人占领南阳及完全占领老河口及其机场止，这一战役基本上又告结束，敌人破坏机场与确保平汉线之企图，又得以实现。

六月一日，敌为应付将来盟军登陆，避免后顾之忧，乃向粤北赣南之七战区发动攻势，国民党又连失河源、新丰、和平、连平、信丰、龙南、定南、虔南等县，并被击溃两个军。于是赣南基地群亦被破坏，粤汉东侧敌人得到保障。

敌人为了收缩兵力，便于机动作战，巩固主要防线，自今春以来，曾于桂粤湘赣闽浙等省先后撤出了某些地区。于是国民党宣传机关大事喧嚷，说这是他们反攻的胜利，何应钦并称："华东华军的前进就是中国大反攻的第一阶段。"可是我们看一看国民党一年来的累累败绩，敌人在国民党战场上几乎想进攻某处就达到某处，企图达到什么目的，就完成什么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喧嚷，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并且，敌人在某些地区的撤退，应该估计到敌人还包含着很大政治阴谋，敌人将以此为钓饵，引诱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妥协，发动大规模内战，这是全中国人民不能不万分警惕的。

而国民党反动当局也就乘着这种机会，并仗着盟国的武器供应，假借反攻之名，向解放区军民不断进攻，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十分严重的存在着。国民党反动派现在用来包围封锁和进攻解放区军民的兵力，已由去年六七月间的六十余万增至现在的近百万。从去年的六月至今年的五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千人以上的进攻，达一百〇六次（计华北三十三次、华中四十二次，华南三十一次，千人以下的进攻几乎是不断的），使用兵力约四十万。其中大的进攻，仅以今年为例，即有：一月间皖省国民党以三师之众及地方团队进攻我皖江区。至三四月该部更大规模向我全面出击，三月，三战区以五师之众全面向我苏浙边新解放区进攻，现在计划以更多兵力向我杭、嘉、湖区攻击。三月至四月国民党曾以六个师和两个纵队，向我挺进湘北敌新占区之部队进攻。三月至四月豫西国民党以五千余人，两次攻我挺进宜阳、伊川敌后之部队，后又以三个军及各地方团队配合，全面向我豫西鲁山西北伊阳以南之敌后根据地进犯。四月间阎锡山令六个师五个纵队勾结敌伪大举进攻我太岳区，战事至今仍未停止。六月中，绥远国民党以四千余众向我绥西解放区攻击，并陆续增调部队，准备更大规模进犯。

在这些进攻中，国民党军队，甚至公开与敌伪勾结，一致对我。使我之对敌作战受到极大的牵制，亲痛仇快，莫过于此！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7月7日）

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周　恩　来

（一）梁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国共关系已有改进，并将继续改进”。如果说去年十月国民党宣布了政治解决的方针而没有进行谈判，现在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志去渝以后才开始了谈判的话，这样说，关系是比以前有了一点微小的改进。可是，梁先生又说：“谈判了三个月之后，国共问题已经有了一部分解决了。”我可以负责声明，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举例如我们要求政府恢复渝延间西延间电台通信，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在报纸上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等事，都未见有任何解决，更不用说停止封锁边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事了。

（二）梁先生认为：“根本解决问题困难很多”，又说：“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这完全是一种给国内外关心两党谈判人士一种错觉的说法。实际，双方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有着很大的距离。我们从西安事变以来，即不断向国民党建议，只有立即实行民主，才能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只有循民主的途径，才能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与解决国内其他一切政治问题。我们拥护统一，是拥护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这不仅是共产党一党的要求，而且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广大人民的要求。但是国民党统治人士与政府的观点，则完全两样，他们始终不愿意立即实行民主，至今仍坚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与限制、削弱和消灭异己的方针，用一种自大和武断的精神，只强调别人应无条件的拥护政府，拥护统一，而不许问这种统一是否对抗战民主团结有利。这就是现时双方谈判所以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

（三）梁先生又认为：“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于中共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作的事情和他们的说话相反。”梁先生此话完全与事实相反。国民党所希望于中共的，是实行其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所宣布的四项诺言。七年来，我们已经切实的实行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是有充分事实可以证明的。今年三月十二日我在延安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说中，已经详细的说到了这点。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究竟在那里呢？一句话，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以保证战后和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障碍所在。

（四）梁先生所说的过去三个月政府和中共的谈判经过，也与事实大有出入。林伯渠同志五月二日到西安后，即与王世杰、张治中两先生作初步商谈。林提议以我在三月十二日演说的基本精神，即要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要循民主途径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问题为商谈的根

据，张王不愿。张王主张先就两党目前有关的军事及边区问题商谈。对于编军数目，林提出现在分散在各敌后游击区的正规军四十七万七千多人，都是久经对日作战有成绩的部队，请政府立即予以编整。为了使问题容易解决，请先给以六个军十八个师的番号，但张王只主张编四个军十二个师。关于边区问题，张王主张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中央法令，林提出区域及现行民主制度不变，实行三民主义。关于党的问题，林要求须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关于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但一切都应按有利抗战的原则来解决。关于撤除边区军事经济封锁问题，张王允先对于商业交通予以便利等等。西安谈话主要内容，就是如此。林与张王最后一次会谈时，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双方签字，各报告其中央以备参考，然后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这个意思已在记录上注明了。林就在这个记录上首先签字，但王张未签。记录即系综合双方谈话的意见而成，显非林之一方意见，且又未经双方中央所批准，自更不能作为预备协定，这是稍具常识的人都能明了的事，而梁先生却企图指鹿为马，混淆听闻，实在令人遗憾。

(五)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志偕张王两先生飞往重庆。二十一日，我党中央即有复示给林伯渠同志，嘱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其中主要内容，关于全国政治制度者三条：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关于编军，为委曲求全计，请政府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并给以给养军火医药等接济。关于地方政府，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自治政府。关于封锁和进攻我军问题，请政府撤销对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停止对敌后我军的军事进攻。关于盟国援助问题，请政府对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按正当比例分配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此外，尚有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中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停止在报纸上对中共的造谣，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对新华日报无理检查，恢复重庆西安两办事处电台，允许两办事处工作人员有往来渝延间、西延间的自由及在该两地居住与购买生活物品之自由等等。该提案于五月二十二日送交张王，张王以条文如此写法，无异暴露国民党之罪状，拒绝转呈政府。林为尊重张王意见，转报我党中央请示。旋由我党中央复示，在文件上只写关于全国民主政治及编军、停攻、停封锁等十二条，而把请求政府停止特务反共破坏活动等八条改为口头要求，于六月五日送交张王。张王亦于同一时间将政府之提示案交林转告我党中央。但张王仍拒绝向政府转呈我党提案，嗣经多日争执，张王始于六月十五日复函称，已将我党提案转呈政府。按双方提案实有极大距离，在政府提示案中，一、关于我方所迫切要求解决的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爱国政治犯，释放叶挺等被捕人员，撤销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停止军事进攻，按比例分配盟国援华物资，停止特务活动，停止造谣诬蔑，恢复电台通讯，停止无理检查报纸，允许渝、西两办事处工作人员有走路自由及购买生活物品自由等项，一字不提；二、编军数目，只承认四个军十个师，且不顾抗战需要及敌后游击战争环境，要将十个师以外的数十万军队，“限期

取消”，并要将十个师“限期集中使用”；三、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法令，不提实行三民主义，不承认为抗日所需要并且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现行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四、对各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要求交还久已离开该地不知何往的所谓“各省政府”接管；五、要求取消各抗日根据地为着抗日需要而发行的必不可少的地方纸币。

由于两党意见距离甚远，我党中央曾邀请张王两先生来延安商谈。林伯渠同志要求回延安报告谈判经过，以便我党中央根据其报告，对于政府提示案作正式之答复，张王则称现正在请示中。三个月的谈判经过，就是如此。而梁先生竟谓：“中共并未回答政府条件，反而提出十七条对案，经过修改后改为十二条，这些条件和三个月前在西安谈判所同意的有显著不同。”这完全不合事实。事实上，我方提案在先，彼方拒绝接受，我方为委曲求全计，将提案二十条改为书面十二条、口头八条，于六月五日交付张王，彼方提示案亦于同时交付林伯渠同志，并且我们屡次表示政府提示案与我党意见相差甚远。且我党第一次提案是二十条，非十七条，后分为书面口头两部分，乃是我党中央为委曲求全而这样做的，并非“回答政府条件”。梁先生竟然抹煞事实，用意何在，殊属费解。

(六)梁先生最后说：“目前正在处于泯除蒋委员长的条件和共产党的对案之间的分歧”。我党也希望真能很快的泯除这种分歧。梁先生再三声言，肯定中国不会再有内战，这是我党所十分欢迎的。但可惜目前事实，尚与梁先生所谈不甚一致，例如：

一、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即使在最近数月，亦尚有零星的袭扰情形。

二、在华北，自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起，阎锡山的第六十一军即取得敌寇同意，最后更订了协定，从汾西地区渡过汾河，侵占汾东地区，向我决死队、八路军大举进攻，直至现在，还未停止。

三、在华中，国民党李品仙部队最近仍不断向我鄂中、皖中、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部队进攻，而这些部队正在为牵制敌人向我平汉、粤汉两路进攻而战斗着。鄂中根据地最近正因营救了两个美国飞行人员得到了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的谢函。

四、在华南，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今年曾先后救出六个美国飞行人员，可是这个区域的东江游击纵队，于五月间，又受到国民党军队罗懋勋部两千余人的进攻。

这些就是军事冲突并未停止，内战危机并未过去的证据。

总之，依照目前形势，要最后战胜日本强盗，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这种解决，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十分热烈的心情期待着这些的。

(原载 1944年 8 月13日《解放日报》)

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

林　伯　渠

各位先生！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要我报告国民政府派张文伯、王雪艇两先生与中共中央派本人双方谈判的经过，本人对此感到十分兴奋。

国共两党关系应该公平合理的调整，在现政治情况下为十分紧要的事情，不仅参政会同人注意这一问题，全国人民也十分关切。我今天要报告的就是我们与张王两先生四个月来谈判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大致有七个重要文件，主席团已印发各位，可请参考。

这次谈判，本人从延安出来抱着满腔热诚，希望能够解决问题，并很高兴在西安与张王两先生不期而晤。我们的谈判是在很友好的情形下进行的，迄今为止我们双方的谈判在原则上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虽然我们的谈判尚未最后决定，但四个月来，还无结果可以报告。

我们所要求于国民党中央的，第一个是全国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在今天民族敌人正深入国土，抗战尚在艰巨时期，必须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必须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才能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日寇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它是有力量的，它正在我国境内作最后挣扎，我们必须重视这一严重形势。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战胜日寇的力量是有的，不过没有团结起来，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今天非常迫切需要将这全部力量团结起来、发动起来。用什么方法来团结全国力量，来发动全国力量呢？我们认为应该在抗战中实行民主政治，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以拯救我们民族国家的灾难。我们主张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共所提出的十大纲领，这三大纲领真正实行，就能团结全国力量。……我党中央在抗战初期就主张实行民主，动员人民，实现全面全民的抗战，不应该是政府与军队片面抗战。我们对立即实施民主以增强全国团结抗战力量的意见，抗战以来是一贯如此主张，这次谈判也是这样提出来的。

其次，我们从国共两党关系上说，希望解决一些悬案，这些悬案主要是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方面问题。我们在敌后抗战八年，军事政治形势有很多变化。在抗战初期，当时八万红军，政府只承认编了三个师，奉命出动，渡河入晋作战，并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要我们组织些敌后游击挺进队，挺进敌后作战，我们自己看来，几年来在敌后艰苦作战，做得还好。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在晋、冀、察、热、绥、辽、鲁、豫、苏、皖、浙、鄂、粤等省敌人占领区作战，粉碎了许多伪组织，建立了许多抗日政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能够飘扬在敌人后方。我们经过七年多的作战，正规军已增加到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并组织了民

兵二百二十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先给我们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同时，在敌后已建立了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政府，管辖了八千八百万人口，我们希望政府承认这些抗日民主政权，管理和指导这些抗日政权。在党的方面，我们要求政府给中共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对其他党派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政府撤销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使边区的人员商旅能够有行动交通往返上的自由。

我们党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国民政府曾有一个提示案给我们，张王两先生要我们照中央提示案来办理，但这两者中间的差别距离很大，以至谈判到今毫无结果。本人现在仅略举几个较大的分歧之点来加以说明。

首先从军事问题来说，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正规军队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八年来在异常艰苦的敌后环境，坚持与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三大战场，抗击了绝大部分侵华的日军与伪军，并成为将来总反攻的先锋部队。为了准备反攻的需要，政府应当奖励它，增强它，首先应该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才是合理。西安谈判时我提出请求政府暂编六个军十八个师，张王两先生表示困难接受，我党中央六月四日提案请先给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而政府仍不愿答应，只允编四个军十个师。

特别是政府提示案中的编余部队“限期取销”，及已编者“限期集中”二点办法，未能顾到抗战需要与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因为这些部队是敌后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组织起来保卫家乡的抗日武装，……限期取消就等于不要敌后人民抗日，把敌后解放区再交给敌人，这自然是不应该的。

再从对敌后民选地方政府的分歧之点来看。敌后的各抗日政府，全是民权主义性质的。我们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除汉奸外，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政府由人民选举，领导着敌后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是有很大成效的，我们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些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为其所管辖的地方政府，而中央提示案则要取消，这是从抗战利益上不可理解的。

再次关于党派的公开合法地位，与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身体自由的保障等问题，依目前情形而论，并未见有何改善。我们略举几例来谈：言论自由问题，政府已表示言论尺度放宽，而实际上我们敌后近几个月来打了不少大胜仗，攻克了很多县城，这战报每月呈送军令部，始终未能发表，送新华日报也是被扣；再如人民身体自由，政府自八月一日宣布实行保障的规定，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再要求释放叶挺将军，他既非共产党员，去新四军更为政府所劝请，不应该拘禁他。我们要求释放自香港沦陷返粤被捕的廖仲凯先生公子廖承志。此外还有很多政治犯身囚监中，我们也要求释放，但都未能做到。

还有，张王两先生给本人的信中也曾责备我党不实行四项诺言，这一点也要加以说明。我们去年十二月曾在延安开会认真检查，检查结果，更证明我们对四项诺言确实完全做到了信守不渝，譬如拿第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来说，我们对民族主义的实行表现在努力抗战、齐心合力打击日寇，以及对边区境内各民族平等地位的尊重上面；我们对民权主义的实行，表现在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民选政府，实行三三制，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身体等一切自由上面；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正表现在陕甘宁边区军队和机关的生产运动，减轻人民的负担，由前年二十万石公粮减到今年只征十六万石，我们不把公家的负担，全部压在老百姓头上。第二条：“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七年来我们坚守不渝。在农

民与地主的关系中，我们是一方面保证交租交息、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我们帮助私人工业的发展，并发展合作社，做到公私兼顾，公私两利。我们也早已实践了诺言，从无也从未曾想过要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事情。第三条："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求全国政权之统一"，这在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切实在实行民权政治，我们并不曾另立中央政府，我们只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民选政府为它所管辖的地方政府，我们是赞成统一的，中国也必须统一，但统一必须是民主的统一。第四条："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责"，我们对此也是实行已久，我们的军队在敌后艰苦作战的成绩就是证明。我们的部队几年来从未得粒弹一饷的接济，而仍坚持敌后战争，……凡此事实都足以说明我们已经实践了诺言。张王两先生曾指责我们立法监察的不独立，但是我们在司法方面已做到切实保障各阶层人民的人权财权和地权等等，我们完全依靠人民来执行弹劾政府，所以我们那边绝少贪污渎职事件发生。

虽然，双方的距离还如此远，可是本人可以再度声明，中国共产党是一贯坚持团结抗日方针，耐心的期待政府观点的改变。

现在，本人再来说明一下自西安到重庆与张王两先生谈判的经过。自从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对国共关系采取政治解决方针以后，我们在延安，听到了很高兴，非常赞成。因为自民国二十九年新四军事件以后，两党关系很僵，我是参政员，也因封锁而不能出来。我们请军委会驻延联络参谋打电报出来，表明我们愿来重庆，继续谈判，经政府覆电同意后，本人因负边区政务，尚需布置春耕关系，直到四月底才能动身。在西安与张王两先生一共会谈五次，本人初见张王两先生，主要先请示政府的政治解决究竟是如何解决法？以及向他们报告边区情形。张王两先生一再要我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我当时提出以本年三月十二日国父诞辰周恩来同志的演说作谈判基础，张王两先生不赞成，他们提议先谈军事，及边区问题，我认为也可以，因先报告了中共领导下军队的数目，并问中央可以答应给我们编多少？张先生要我讲，我说请先给六个军十八个师，张王两先生认为太多，只同意四个军十二个师，以后会商几次，到最后一次会面时谈话，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纪录，双方签字，各报告其中央，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当时我就照我们双方原先约定的首先在这纪录上签字，但张王两先生未签，纪录系综合双方意见而成，张王信里说只是我个人意见，显然不是事实。

到重庆以后，我党中央即来电报提出二十项意见，由我于五月二十二日交张王两先生，请其转陈国民党中央，张王两先生认为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宣布国民党罪状，不肯接受。本人为尊重张王两先生意见起见，向我党中央请示，将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改为口头要求，由本人于六月五日送交张王两先生，张王两先生同时将政府提示案交给我，但对我党中央提案则不允收转，一直争执到六月十五日，才复信称已转呈政府，但解决办法仍照政府提示案不能变更，谈判逐呈僵局。

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先生曾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谈判停顿，中共要觉悟才好。有记者跑来问我，我于七月二日有谈话发表在新华日报，表示我党的态度是只要对于抗战团结与促进民主有利，我们都可商量。七月二十六日，梁部长又发表不合事实的谈话英文稿，我党周恩来同志于八月十三日曾发表谈话，说明谈判并无结果，并解释此事责任并非在我。但我党中央仍希望谈判能有结果，曾来电请张王两先生赴延安继续谈判。张王两先生说此事可以商量。两党谈判的经过情形大致如此。

最后，我应当声明：中国共产党很盼望把问题解决，我们所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

希望政府能一切从抗战民主团结利益出发，接受我们的合理要求。现在敌寇正在作垂死前的挣扎，我们中国的抗战要保持今天的国际光荣地位，要打败日寇，要得到永久和平，都不能坐待盟友的奋斗，需要更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需要团结与动员全国力量，才足以停止敌人的进攻及准备力量配合盟邦的反攻。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这几天参政员诸先生的各项询问，也正说明了我们政府的机构人事到政策都有很多毛病，不能适合今天抗战的要求。因此我坦白的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

（原载1944年 9 月22日《解放日报》）

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

此间权威人士顷就国共谈判经过及国民参政会派遣视察团来延一事，发表评论如下：自林伯渠同志与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两氏在西安开始谈判以来，已四月有半，在此长时期中，虽中共中央及其代表十分宽容忍耐，委曲求全，但由于政府方面对错误政策之顽固不化，对谈判缺乏诚意，玩弄手段，以致谈判毫无结果，任何一个具体问题，即使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谈判经过已在参政会报告，参政会并决议组织视察团来延，四个半月来之国共谈判由此告一段落，因之，可以把过去的谈判加以概括的评论。四月下旬，林伯渠同志赴渝之时，正是日寇在中国大陆发动攻势之始，观乎历年来国民党之错误的误国政策：军事上消极观战，依赖盟国打日本，政治上专制独裁，经济上垄断专卖，文化上压迫箝制，中国共产党中央预见到中国抗战阵营在日寇新进攻之前，将遭遇到严重的军事失败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重大危机。为避免此项危险局面计，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同志赴渝。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之立场与方针，明显的表明于6月5日提交国民政府之意见书中，该书开头即说："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问题。……"从意见书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共对于局势的冷静清楚的认识，对国家民族的重大责任感及大公至诚的态度。至国民政府方面则相反，对于目前危局，熟视无睹，轻率乐观，对于贻国家民族于此危急之局，毫无引咎自责之意。在整个谈判中，抱着自大与武断之精神，企图以国民党一党一派之私利，超越于民族利益之上，而强迫他人服从之。一看6月5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的艰危之局，没有一点表示改弦更张放弃误国政策之意。该提示案要把敌后抗战卓著功勋、抗击了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之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说，该案允编十个师，依国民党编制每师约一万人，不过十万人，其余三十七万正规军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试问这不是日本人的腔调吗？日本强盗千方百计用残酷的战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现在经过国民党政府诸公一纸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岂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头等奖赏吗？该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与敌后人民血肉相关、甘苦与共、坚决领导抗战的民主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省政府"也者究在何处呢？谁也不知道他们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们究竟与人民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们的所在地，这些所谓省政府的老爷们，只应该给他们一种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职查办"四个大字。何况还有许多卖国贼暗藏在这些所谓省政府里面呢？卖国贼庞炳勋、石友三不都是过去这类省政府的主席吗？至于委员们之投敌叛国者更不可胜计了。总之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的人们之意志的反映。说得明白一点，所谓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图私党利益，不

知民族大义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识的结晶，是每一个真正爱国者所不可能与不应该接受的，因为谁要接受这种提示案，就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者。

论到在谈判中双方的态度，中共方面一贯真诚与委曲求全，而国民党政府方面则夜郎自大，要些无赖手段。他姑不论，即举中共中央意见书之提出而论，中共中央于5月21日电林伯渠同志，提出二十条，22日林送张王，张王称："如此写法无异暴露国民党之罪状"，拒绝接受。中共中央得悉后，减为十二条，而以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6月5日，张王仍拒绝转达政府，经多日争执，始允转达。即此一端，足见中共中央为尊重对方代表之意见，不惜委曲求全，酌量减少了正式条文，而政府代表则充分暴露了无赖面目，因为如实转达对方之意见于所代表之机关，是任何谈判中充任代表者之起码的责任和义务，已经谈判而又拒绝转达对方之意见，这是任何谈判中鲜见之事例，此种态度，除称之为无赖或流氓手段外，无以名之。

此外，政府代表张治中氏及蒋介石氏本人在参政会中一再声言："中央政府所求的只是军令政令之统一"(张)。"我们中央屡次表示只求军令统一政令统一"(蒋)。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声明：我们是最坚决地拥护政令军令的统一的，但是这政令必须是代表人民意志的政令，这军令必须是有利抗战的军令。相反，如果这政令是引导国家走向法西斯暴政的政令，这军令是致使抗战失败的军令，则为任何中国的爱国者和民主战士所决不能服从，亦绝不容许其统一的，中国人民是严肃的鄙视这种反革命的"统一"滥调的。问题的核心就在国民党政府今天的政令军令正是这么一种东西，政令是法西斯的政令，军令是失败主义的军令。要用这么一种政令军令去统一一切，非特是缘木求鱼，而且如果统一了，那就会招致亡国大祸。远姑不论，即以谈判进行期间之事实为例，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薛岳，都是所谓忠实服从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的，结果是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丧师失地，涂炭生灵，贻笑天下。反之，被国民党认为"破坏军令政令统一"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在天天打胜仗，天天收复失地，这就是真正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统一。这种鲜明的对照，证明了国民党政府"军令政令"之毫无价值。因之，今日欲谈军令政令之统一，必须彻底改变军令政令之性质。欲改变军令政令之性质，必须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政策，必须彻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把那些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与法西斯分子赶出去，由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去掌握军令政令，使其能代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及人民的意志。必如此，方能真正挽救目前的危机及争取抗战胜利。必如此，方能谈得到军令政令之统一。必如此，军令政令之统一才与国家民族有利。关于改组现在抗战不力腐败无能之国民党寡头专制政府一点，林伯渠同志已于其在参政会报告中提出，可谓恰合时宜。林同志8月30日致王世杰、张治中两氏信对于国民党政府提示案之批驳，亦完全是合乎抗战、团结与民主原则的。延安人士仍希望张王二氏来延视察与谈判。至参政会推选之五位参政员来延视察，交换意见，是很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之意。

[附] 国共谈判双方来往文件

四个半月来国共谈判之经过，详情已见周恩来同志8月12日与本社记者之谈话。八月上旬以来，谈判实际上已陷于停顿，虽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同志一再催询政府代表及约请张王二

氏来延，但政府方面始终迴避推延。政府代表张治中氏在参政会上之报告，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氏 7 月26日之谈话一样，对谈判经过歪曲事实，混淆听闻。关于此类歪曲意见，除周恩来同志 8 月12日谈话所驳正者外，有林祖涵同志 8 月30日致王世杰张治中一函严予驳正。兹将此次谈判中，双方提出之两大文件及双方代表在八月间之信件，发表于后：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

（此件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由中共中央代表
林祖涵面交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

原文如下：

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已历七年，中共谋国之忠诚，抗敌之英勇，执行三民主义，实践四项诺言，拥护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先生抗战建国之始终如一，均为有目所共见。惟目前抗战形势极为严重，日寇继续进攻，而国内政治情况与国共两党关系，尚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惟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兹率直胪列如下：

（甲）关于全国政治者：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乙）关于两党悬案者：

（一）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权，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请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措施。

（三）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四）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接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自1940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文钱、粒米之接济，此种状况请予改变。

（五）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六）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撤销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七）请政府饬令军事机关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八）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光、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等，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九）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

以上各条，仅举其大且要者，中共方面诚恳希望我国民政府予以合理与尽可能迅速之解

决。诚以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今年可望获胜，东方反攻日寇，明年必可开展，而目前则日寇正在大举进攻，威胁抗日阵线，若我国共两党不但继续合作，而且能将国内政治予以刷新，党派关系予以改进，则不特于目前时局大有裨益，且于明年配合同盟国举行大规模之反攻，放下坚固之基础，愿我政府实利图之。

国民政府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之提示案

（此件亦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由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

原文如下：

33年6月5日，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

兹以林先生祖涵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作以下提示案：

（甲）关于军事问题：

（一）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

（二）该集团军应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

（三）该集团军之员额，按照国军通行编制（由军政部颁发），不得在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

（四）该集团军之人事问题，准予按照人事法规，呈报请委。

（五）该集团军之军费，由中央按照国军一致给与规定发给，并须按照经济法规办理，实行军需独立。

（六）该集团军之教育，应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校阅。

（七）该集团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凡其在各战区之内的部队，应归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整训指挥。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

（一）该边区之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二）该行政区区域，以其现有地区为范围，但必经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三）该行政区公署直隶行政院。

（四）该行政区须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应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辖专员县长等可由该主席提请中央委派。

（六）该行政区内之组织与规程，应呈请中央核准。

（七）该行政区预算，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八）该行政区暨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驻在地区，均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应与财政部协商办法处理。

（九）其他各地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

（丙）关于党的问题：

（一）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共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二）中国共产党应再表示忠实实行其四项诺言。

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致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的信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

原文如下：

自5月3日弟等与先生晤见于西安，往复商谈，至今已达三月。自6月5日弟等以中央政府提示案面交先生，为时已两月有余，迄今尚未得到中共方面之切实答复，此等情形超出弟等意料之外。政府在提出提示案以前，特命弟等赶赴西安与先生晤谈至两周之久，借以充分洞悉中共方面之意见，用意已见慎重。政府提示案之内容，不但对于去岁中共代表林彪师长所请求，基本范围已全部容纳，即对先生最近在西安所表示意见，亦已大部容纳。这是事实，只须将有关文件略予比较、分析，即可知。然立意政治解决既为中共所表示赞同，团结与统一又为中共所宣言拥护，弟等今兹实不能不敢请先生向中共主持诸公，剀切敷陈，促其接受政府提示案，并速予答复。至6月5日先生交来中共方面十二条意见，弟等于6月15日业就政府指示及弟等观感，以书面送达左右，兹因先生一再敦促弟等为更详尽之答复，因将政府意见再为先生详谈之：

（一）十二条意见中之第一、第二、第三条，涉及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与地方自治诸事。对于此类问题，政府提案中业已剀切申示两点，即在抗战期内励行中共暨一切党派所已接受之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但此种申示意义较为明确，亦较为具体。倘中共欲于此种申示之外，更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如"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等等，于事实究竟有何裨益，复为异日增加纠纷而已。盖"民主政治"云云，其他云云，中共过去或今日之所信，恐未必与国民党员乃至一般民主主义者之所信为一事也。兹愿与先生告者计有两点：

（1）中央政府之既定政策，曾在依抗战之进展，胜利之接近，与夫社会之安定，而逐渐扩大人民自治之范围，促进地方自治。

（2）政府希望中共于接受提示案后，随时提出关于励行抗战建国纲领之意见，并积极参加参政会及宪政实施协进会之工作，诚能如是，彼此之观点当不难渐趋一致，国家之与真正统一与团结庶几可以实现，政治解决云者，其根本意义亦即在此。

（二）十二条意见中，涉及军队编制数额，军队驻地，医饷军械者条。十八集团军过去规定编制，原为四万五千人，政府提示案允许编为四军十师，确属从宽核定。带兵官自行扩编军队，此事原不可为训，且政府正励行精兵政策，一般军队，均在裁减单位，于此时期独允许十八集团军扩编为四军十师，自属委曲求全之至。关于军队驻地，政府亦正考虑至再，提示案一面指示集中使用之原则，一面规定在未集中使用前，受所在地战区司令长官之整训指挥，原则与事件实情兼顾。倘如中共所提意见，抗战期间内军队防地，概为现状，试问中央何以计划反攻或指挥作战。至于军饷，提示案中业已允许第十八集团军享受与一般国军相同之待遇。军械之供给，政府当随时视反攻之需要与各军所负之任务公平合理分配。

（三）十二条意见中，列有一条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陕北边区问题，政府原予考虑，并已于提示案中，提出十分宽大之办法，借以容纳中共之意见；至其他任何地区之行政机构，自当依照提示案之指示，由各该地省政府接管，以免分歧而杜流弊。

（四）十二条意见中，尚有若干要求，或则与事实不符（如要求中央停止攻击中共某某军

队），或则与事理不合（如对中央在陕北办报等事设定某某条例），弟等已向先生口头声明，兹不赘述。至于十二条意见中所提解除陕边之"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及释放若干人犯两项要求，弟等已向先生口头声明，俟此次商谈获有切实结果后，当予考虑。总之政府对于中共方面之意见，实已尽可能范围予以容纳。至于政府之根本意愿，则在军令政令之贯彻与统一。中共提出十二条意见书时，既未将服从中央军令与政令化做条款之内，即书面之引言亦未将中共对于此一问题之今后态度为剀切鲜明之表示，弟当时不敢转电者大意在此。嗣因先生口头声明谓：中共方面对于服从军令政令决无问题，弟等乃敢以先生之口头声明与十二条书面意见一并转陈政府，此又弟等亦愿附带郑重声明者也。专此布达，诸希惠察。

王世杰、张治中

8月10日

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致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日）

雪艇、文伯先生勋鉴：

8月10日来函，对敝党十二条意见所作之答复，于收到之后，即转电延安。以往返电码多有错误，校正费去一些时间。兹将敝党中央命弟奉复的意见，转告如后，敬请再转达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来函说：政府提示案已交给中共两月余，"尚未得中共方面之切实答复"，殊出先生等"意料之外"。并说：这个提示案，已能"大部容纳"中共之意见，内含有责备我方无理拖延之态度。应该声明，这是完全不合事实与错误的见解。因为弟已在屡次会谈中表示：政府提示案与我党已经提出的书面十二条及口头八条，在原则上相距太远，无法接受。比如在政府提示案中：

（一）关于我方所恳切要求解决的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爱国政治犯，释放叶挺等被捕人员等项，一字未提。

（二）编军数目，只承认四个军十个师；且不顾抗战需要及敌后游击战争环境，要将十个师以外数十万正在抗战的军队"限期取消"；并要将十个师"集中使用"。

（三）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法令，不提实行三民主义，不承认为抗日所需要并且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现行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

（四）对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要求取消。

由于两党意见距离如此之远，但敝党中央仍不愿谈判停顿与破裂，曾命弟邀请两先生去延安商谈，或要弟回延报告谈判经过，以求获得继续商谈之途径，使问题终能"有利抗战团结，有利促进民主"的原则，而得到合理解决。两先生对于延安之行，已称在请示中。弟之回延，亦希望能于旬日内实现。

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致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

国共两党关于全国政治问题及两党关系之谈判，并非自这次弟与两先生谈判开始。远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六年之间，敝党曾不断向国民党建议，只有立即实行民主，实行孙中山

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才能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只有从民主的途径，才能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与解决国内其他的政治问题。我们拥护统一，是拥护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我们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要求他坚决抗战与实行三民主义。这不仅是共产党一党的要求，而且是全国99%的广大人民的要求。为了求得国民党中央政府能够接受敝党的建议，接受全国广大人民的要求，敝党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曾提出了保证实行四项诺言。八年来，这四项诺言我们早已完全实践了，而且至今还在实行，这是有充分事实可以证明的。今年3月12日，我党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说中，已经详细的说明到了这点，可以参考。八年来，敝党中央又不断派弟与周恩来、董必武、林彪诸同志，耐心的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求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周董两同志驻渝已有数年，始终未能得到结果。究竟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那里呢？不能不指出：由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诸公的观点，和我们及全国广大人民的观点，有着很大的距离。政府负责诸公，始终不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足以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民主政治，这就是现时双方谈判所以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

我们希望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党一派一己的私利放在第一，应从有利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而不应从维持一党统治的方针出发，才能使双方的谈判易于接近，才能使一切问题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但是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8月10日来信，可惜均不能符合这些期望。比如：

(一)关于全国政治制度问题。我们所提出的三项要求：(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实行名符其实的地方自治)，正是反映今天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正是今天为着团结全国力量，认真准备反攻，必须立即实行的措施。如能这样做，不仅对整个国家民族有利，而且对国民党也是有利的。然而两先生来信，仍坚持“中央之决定政策”是要在抗战以后才能实行宪政，实行民主。批评我们所提民主要求为“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认为于实行无其益，“徒为异日增加纠纷”。但照我们的经验，在敌后那样的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遍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后方反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国民党有无准备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和诚意。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立即实行宪政，而不推在抗战之后。

(二)关于中共所领导的四十七万七千正规军队之编制、防地与饷械问题，如果从这个军队过去抗战的成绩与今天准备反攻的需要来说，他们在八年来的敌后艰苦作战的环境中，坚持与发展了敌后三大战场(华北、华中、华南)，建立起许多强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了八千八百余万的人民，组织了二百二十余万的民兵，抗击了侵华绝大部分的敌军与伪军，并成为将来总反攻的先锋部队。为了准备反攻的需要，政府应当奖励他，装备他，增强他，首先就应当全部承认他，才为合理。我们在建议书中请求政府“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是为着谈话更容易接近。关于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及盟国援华物资请求公平合理分配等，这是配合抗战需要与无可非难的。而政府提示案的“限期集中使用”的办法，是未能顾到抗战需要与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两先生8月10日来信中强调反对带兵官“自己扩编军队”与反对军队防地维持现状，责备我们不守军令的统一。但两先生恰恰忽视了一件平常人都懂得的真理，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是在抗战中，我们所扩编的军队，是在沦陷区，

发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组织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的防地都是在敌后,从敌人手里解放出来与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如果我们反对在沦陷区发展人民抗日武装，或企图削弱消灭这个抗日武装，以及想使敌后解放区的人民抗日武装从该地离开,这一切,都会在客观上成为有利于敌的。

(三)今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其所实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坚持敌后抗战,就是实行民族主义。抗日政权，完全是民权主义性质的。我们各抗日根据地,除汉奸外,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均有一切自由和权利，并行使直接民权,组织三三制的地方政府。我们又实行劳动互助,生产节约，救灾开荒，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普及教育,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等政策，更无一不合乎民生主义的原则。由于我们在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彻底实行了三民主义，所以能团结全体人民,克服一切困难,长期坚持抗战,并可以有力量组织反攻。象这样的抗日民主政府,就应当承认他成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就应当给他们以地方自治的权利。象这样政府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就应加以奖励，提倡，推行于全国。这才是真正奉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应采取的态度。但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8月10日来信,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法令，对各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与各种有利抗战的民主设施，则要求取消，也是不利于今天敌后抗日的需要的。

总之,促进目前形势,要最后战胜日本强盗,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迅速解决。而这种解决,只有国民党诸公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增强全国团结抗战力量,才能使一切走上轨道,才能停止目前敌人进攻,实行将来的全面反攻，也才能建立战后的国内和平合作与国际和平合作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十分热烈的心情来希望国民党当轴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迅速改变其旧有的政策，才能打开目前政治上的僵局与完成盟国共同期望的神圣事业。我们这里绝没有乘国民党形势不利而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更没有利用国民党处境困难而拖延不愿解决(有些无知的人正在如此散布谣言),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东西。

我们在爱护、帮助国民党进步,而不是在冷眼坐视国民党的困难,耿耿忠言,定为国民党贤达所鉴察。希望两先生将上述意见,再向蒋主席及贵党中央转述。时乎不待,望早决策。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忠实执行四项诺言,忠实实行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团结,与政治解决的方针,以期待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回答。敝党中央所提邀请两先生赴延安继续谈判一事，不仅表示敝党不愿使谈判破裂之诚心,而且想使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重要负责人员亲到边区看看,我们是怎样忠实实行四项诺言与彻底实行三民主义,我们在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建设,是很可以为全国实行民主参考的，想因此使双方谈判更易得到解决。未识两先生对此已商得政府及贵党中央同意否？盼能早复。敬颂勋祺

林　祖　涵

[附] 张治中在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

一

关于中共问题商谈的经过，国民参政会诸位先生要求提出报告，治中奉命代表政府，把这一次商谈经过，简明扼要报告如下：

在本年一月间，据军事委员会派在十八集团军之联络参谋郭仲容给军令部子筱电、说：'本月十六日，毛泽东先生约谈，表示目前中共拟于周恩来、林祖涵、朱德总司令中，择一或三人同行到渝，晋谒委座请示，并嘱报告请示可否。' 二月二日，军令部复郭联络参谋一电：'朱、周、林各位来渝，甚表欢迎，来时请先电告。' 嗣接郭联络参谋二月十八日电：'毛泽东先生谈，中共决先派林祖涵先生赴渝。' 至四月间，又接郭联络参谋来电，谓据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先生说，林定四月二十八日起程。中央据报后，于五月一日派张治中和王世杰先生到西安与林祖涵先生作初步会谈，我们与林先生同于二日先后到达西安，计自五月四日至十一日，在西安共会谈五次，会谈中关于林先生表示的意见，都记录下来，作成一个记录，送给林先生看过以后，经林先生增减修改，当面交给我们，并签字于记录上面。当时林先生询问我们可否亦在上面签字，我们以为这是林先生所提出，或同意我们一部分的意见，自应只由林先生签字，至于中央的意见，我们当于返渝请示之后，正式提出。现在将林先生签过字的记录原文录下：

自五月四日至同月八日会谈中所表示的各项

甲　关于军事者

（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照去年林彪所提出四军十二师之数；（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一俟抗战胜利后，应照中央命令移动，以守指定集中之防地；（四）前项军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规呈报请委；（五）前项军队改编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军队同样办法，同等待遇。

乙　关于陕甘宁边区者

（一）名称可改为陕北行政区；（二）该行政区直隶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三）区域以原有地区为范围（附地图略），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报中央核定实行；

（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六）该行政区及第十八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由财政部妥定办法处理；（七）该行政区内，国民党可以去办党办报，并在延安设电台；同时国民党也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在重庆设电台，以利两党中央能经常交换意见；（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不予变更。

丙　关于党的问题

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因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

丁　其　　他

（一）中共表示继续忠实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的解决两党关系问题；（二）撤除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现在对于商业交通，即先予以便利；（三）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问题，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一切按有利抗战的原则去解决。

林祖涵　　五月十一日

附　去春林彪师长所提四条

（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

二

因林祖涵先生已有具体意见表示，我们遂于五月十七日同林祖涵先生回重庆，当时中央正要开十二中全会及全国行政会议，虽在百忙之中，仍然将在西安谈话经过及林祖涵先生所表示意见，报告中央，由中央考虑解决此项问题之具体方案，于六月五日约林祖涵先生晤面，即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文件一种，面交林祖涵先生，其原文如下：

三十三年六月五日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

兹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作以下之提示案：

甲　关于军事问题

（一）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二）该集团军应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三）该集团军之员额，按照国军通行编制（由军政部颁发）。不得在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四）该集团军之人事，准予按照人事法规呈保请委；（五）该集团军之军费，由中央按照国军一般给与规定发给，并须按照经理法规办理，实行军需独立；（六）该集团军之教育，应照中

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校阅；（七）该集团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凡其在各战区内之部队，应归其所在地战区司令长官整训指挥。

乙　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

（一）该边区之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二）该行政区域，以其现有地区为范围，但须经中央派员会同勘定；（三）该行政区公署直隶行政院；（四）该行政区，须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应呈报中央核定施行；（五）该行政区之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辖专员县长等，得由该主席提请中央委派；（六）该行政区之组织与规程应呈请中央核准；（七）该行政区预算，逐年编呈中央核定；（八）该行政区暨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驻在地区，概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行之钞票应与财政部妥商办法处理；（九）其他各地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

丙　关于党的问题

（一）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二）中国共产党应再表示忠实实行其四项诺言。

在中央提示案面交林祖涵先生之后，并经声明中共如将以上办法实行后，则中央对于撤去防护地区之守备部队，可予考虑，并可恢复该地区与其邻地之商业交通，及中共人员违法被捕者，亦可以宽酌予保释。

林先生随从口袋内取出一函，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文件一分，交与我们阅看，其原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
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

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已历七年，中共谋国之忠诚，抗敌之英勇，执行三民主义，实践四项诺言，拥护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先生抗战建国，始终如一，均为有目所共见；惟目前抗战形势，极为严重，日寇继续进攻，而国内政治情况与国共关系，尚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为克服目前困难，击败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惟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以下万分紧急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悬案方面者，兹率直胪陈如下：

甲　关于全国政治者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乙　关于两党悬案者

（一）根据抗日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应请政府对中共军队编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

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

（三）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四）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接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自1940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分钱粒米之接济，此种状况请速改变；

（五）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尤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分；

（六）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取销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七）请政府饬令军事机关，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八）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却，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文、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禅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九）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边区办党办报。

以上各条仅举其主要者，中共方面诚恳希望我国民政府予以合理与尽可能迅速之解决。诚以苏方反希特勒斗争，今年可胜利；东方反攻日寇，明年必可开始，而且日寇正大举进攻威胁抗日阵线，若我国共两党，不但继续合作，而且能对国内政治予以刷新，党派关系予以改进，则不特于目前时局大有裨益，且于明年配合同盟国举行大规模之反攻，放出坚固之曙光，愿我政府实利图之。

中共中央代表团林祖涵　　民国卅三年六月四日

此时我们曾对林祖涵先生说：上次于五月廿二日先生所提出之廿项，因内容与在西安所表示的意见出入甚大，未便接受，当经先生收回；此次所提出之十二项，项目虽较前减少，但内容并未改变，本不能接受，惟不欲过拂先生的意思，仅允留下，但不能转呈。当时林先生亦说就留在你们两位处参考亦好。

三

到了六月六日，我们接到林祖涵先生的来信，对于中央提示案，提出两点声明：第一、认为提示案与中共六月四日正式提出的意见相距甚远，除将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请示外、亦请将中共提出的十二条转请中央作合理解决；第二、对于提示案开头所谈的'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一语，认为与经过事实不符，他认为西安的记录是'最后共同作成的初步意见'。他同意'约定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因此他还是希望中央考虑中共最近提出的正式意见。我们当即在六月八日回林先生一封信，就他所声明的两点提出答复：第一、林先生六月五日交来的函件，因为前后出入太大，曾经声明未便转呈，林先先最后说'就留在你们两位处参考也好'，所以当时仅允留下，但仍声明不能转呈；第二、在西安谈话中记录下来经过林先生增减修改，另自缮清再行签字的意见，我们回来以后，已经转呈中央，所以中央提示案就以林先生的意见为基础，并且尽量容纳了林先生的意见，希望林先生能够完全接受。

四

六月十一日，又接到林先生来信，他对我们六月八日的回信，认为‘有两点甚难理解’：第一、说我们已承认他是中共的代表，就不应该不把中共正式提出的意见转报中央，而只片面要求他个人接受中央提示案，他个人如何能够做主。第二、他承认六月五日面交的中共所提的十二条诚与西安商谈的意见‘略有’出入，但中央提示案和西安商谈的意见，亦有出入，他以为这种谈判过程中的出入，双方都有，不足为异，他现在已经将中央提示案电告中共中央，我们就不应该拒绝将中共正式提出的意见转呈中央请示。

其实林先生说不能理解的两点，事实是很明显的，正因为林先生是中共的代表，所以他所表示的意见当然可以作算的。至于中共随后所提的十二条，内容与林先生的意见大有出入，而且中共对于服从军令政令的根本观念，并无表示，只是提出片面的要求，所以我们当时郑重声明不能转呈，是不难理解的。但我们因为希望问题早日得到解决，尤不愿大家因此发生误解，所以仍将林先生交来的十二条附呈中央政府。随奉中央指示，以‘中央六月五日已以提示案交其代表转达中共，凡中共意见，中央政府所能容纳者，该提示案已尽量容纳，希望中共方面接受。’

六月十五日我们就将中央的指示函达林先生，并申述此次商谈之基本精神，须本国家统一军令政令之原则，为改善现状增强团结的前提。而中共所提十二条内容，对于如何实行中央政府的军令政令和改善措施，整编部队各点均未提及，至于整编部队的数字，在西安时我们说可能的数字是三军八师，现在中央提示案决定为四军十师，比较我们所说的数字还增加了两师，可见中央尽量迁就的意思。

五

六月十五日我们回复了林先生的信以后，经过十几天，中共方面，对于中央提示案仍无答复。到七月三日，林先生约我们会面，口头提出，对中央提示案有两点商量：第一、关于政治问题希望中央将民主尺度放宽。第二、关于军队问题，希望按五军十六师扩编。同时又说，延安有电报，欢迎你们两位到延安商谈。当时我们就说明：关于民主问题，政府已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例如废止图书事先强制审查办法，严令后方各省完成县参议会之设置，及中央即将公布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法令，和其他正在拟议中的很多关于民主的措施，不必列举。至于军队扩编数目的问题，中央现在正在厉行精兵政策，尽量的缩简单位，对于中共的要求，已经尽最大限度来容纳，如果拿抗战初期国军数额和现在增加数额来作一对比，就可以了解中央委曲求全的苦衷。最后我们认为象这样谈下去，有点象故意拖延，似乎应该将中央提示案作一全面确切的答复，来作具体商讨的基础，不宜再在口头上空言往返，讨价还价，徒增枝节。并表示如在重庆能得到结论之后，我们可以考虑去访问延安的问题。

六

至七月十三日，林先生又来会面，当时他又请中央对他们所提的十二项有所‘指示’，

而对于中央交给他们的提示案如何答复问题，他并未提及。当时我们以林先生所提各项问题过去多已经加以说明，就不必再加辩驳，仅答林先生来意已明，我们再另订期商谈而散。

七

到了七月二十三日，林祖涵先生又来一信，内容仍系问及我们对他所提十二项的意见，是否已请示答复，并请我们到延安去。

七月二十五日，我们再与林先生见面，对于他所提十二项内列各项问题，在口头上曾有较详细之解释，并告以中央所提出之提示案，即系中央具体意见，乃中共延久未与答复，并且我们曾说中共如此态度，很象有意拖延，不愿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八

我们在这个期间，曾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并且考虑在上一次口头答复之后，应该再有一个书面答复，才比较具体，又于八月五日同林祖涵先生见面一次，曾说明我们预备将上一次口头答复的意见做成一个书面答复，同时并等你们对中央提示案有确实答复之后，那时我们再考虑进一步商谈，和是否去延安的问题。在此次谈话之后，于八月十日根据前述写成一信，送给林祖涵先生，其要旨如左：

从五月三日在西安晤面起，已逾三月，自六月五日面交中央提示案以后，亦两月余，迄未得中共切实答复，殊出初料之外。此次政府提示案之内容，不但对去岁林彪师长所请求各款，几已全部容纳，即对先生在西安表示之意见，亦已大部容纳，中共即表示拥护团结与统一，请即促其接受。

关于中共之十二条意见第一至第三条，政府提示案中，已剀切申示：在抗战期内厉行中共及一切党派所已接受之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意义显豁而具体，若于申示以外，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徒为异日增加纠纷。现在中央政府已定之政策，在依抗战进展，胜利接近与夫社会安定，逐渐扩大人民自由范围，促进地方自治；一方面政府希望中共接受提示案后，随时提出关于厉行抗战建国纲领之意见，并积极参加参政会及宪政实施协进会之工作，期彼此观点渐趋一致，国家真正统一团结，可以实现，此为政治解决之根本意义。

十二条中关于军队编列、数额、军队驻地、军饷、军械等四条：十八集团军原来编为三师，现在允许扩编为四军十师，在政府厉行精兵政策裁减单位之时期中，自属委曲求全之至。关于军队驻地，提示案一面指示集中使用之原则，一面规定在集中前整训指挥系统，实已面面兼顾。至于军饷，则已规定与国军享受一律待遇；军械则政府当随时依需要与所负之任务为合理之分配。

十二条中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之一条，在陕北边区问题，政府提示案中已提出十分宽大之办法，至其他任何地区之行政机构，自当依照提示案，由各该管省政府接管，以免纷歧。

其他尚有若干要求，或则与事实不符，或则与事实不合，均已向先生口头说明，兹不赘述。

九

以后收到林祖涵先生八月三十日来函，以奉中共之命答复我们八月十日的去信，大意是：

一、认为我们八月十日之信上，含有责备中共无理拖延的意思，系完全不合事实与错误的见解。因为政府提示案与中共所提之书面十二条与口头八条，原则上相距太远，并举出：(一)提示案对于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政治犯等一字未提；(二)编军的数目和编制外军队的取消及军队集中使用；(三)只要求中央政府实行中央法令，而不提实行三民主义，不承认现行各项设施与法令；(四)取消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选出之民主政府等，承认为距离太远的事实。二、认为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由于中央政府与中共及'全国广大人民'的观点，有着很大的距离，因为政府始终不愿意立即实行三民主义和民主制度。三、希望中央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应从有利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后面又重复提到上面已经列举过的'政治问题'，'军队问题'，和'边区'及'华中'、'华南'、'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重申第一项各点所持的态度，同时张大了许多范围。四、申述中共始终忠实执行四项诺言，忠实实行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团结与政治解决的方针。证明中共不愿使谈判破裂。

我们看了林先生八月三十日来信之后使我们感觉诧异，其中所举各项情形的真实性，究竟到如何程度？想各位都会有一个很确当的判断，用不着多加说明。我们是奉命商谈具体问题，从去西安到现在，已经把问题愈谈愈远了，所以远的原因，诸位从以上的文件里，可以看得出。我们不能不引为惋惜。但是我们并不绝望。为了使中共方面能够确实的明了我们的意思，所以随后就复了一信（九月十日）大意是：

申述中央政府命我们与先生商谈，在求全国之真正统一，亦即求中共切实履行四项诺言（见附注），切实拥护全国政权的统一，如先生所说中共始终执行四项诺言，则中共对各地国军何致有侵犯之事实？中央何致今日尚须命我们与先生商谈服从军令政令等问题？

中央命我们与先生商谈统一，原为未来之宪政与整个三民主义的实施，树立强国的基础。关于民主政治及党派问题，中央提示案已有剀切条文，我们八月十日函内复有详细的申说，何以说是'一字不提'？来函所说的中共在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彻底实行了三民主义，又说在中共的一切地区内，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但有很多事实，迫着我们否认。即如民主与自由，国父遗教，欲五权分立为民主的正轨与人民自由的保障。中共区域内可有司法权与监察权独立的事实？中共区域内的人民乃至共产党员，可有言论自由，身体自由的保障？我们前函希望对于民主自由等问题，勿提出毫无边际的抽象要求，并请中共随时与中央政府，国民参政会及宪政实施协进会等切实商讨各项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惟至当，且属必要。

说明来函所提种种问题，早已一并奉答，其中一点，即中央提示案对于去岁林彪师长和最近先生在西安所提意见，已经'大部容纳'，确系绝对真实，但先生依然强调'距离太远'，可是距离远的原因，不外是因中共的要求与时俱增，先生在西安所提的较去年林师长所提的多，中共所提的十二条又较先生在西安所提的多，此次来函又于十二条以外，加上所谓'口头八条'，要求既与时俱增，距离乃不能不远，例如陕北边区和所谓'其他抗日根据地'问题，林师长所提为'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先生在西安签字的文件，并未列入'其他抗日根据地'；中共所提十二条中，则要求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先生来函则更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的承认为言，此种逐渐变化，逐渐扩大要求的情形下，倘商谈不能接近，其责任究在谁方？

说明中央政府与国民党决不将一党一派的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切望中共能够同守此旨。

最后谈到只要于事实有益，我们赴延安一节亦所乐从，不问中共能否派代表来重庆解决本问题，并派何人代表偕返重庆。

(附注)二十六年九月中共申述之四项诺言

(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这一次商谈的经过和来往有关文件的重要内容，一一报告如上。今日中共问题，为了国家统一团结及争取抗战胜利，建国成功，全国的人民，都恳切希望早日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受中央政府之命，负着商谈的任务，当然要抱着最大的热忱和希望。中央政府所求的，只为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必须如此，乃能有确实的团结，乃能以举国军民一致的力量，打击敌寇，更必须如此，乃能有利于抗战建国。在这一个大前提之下，中央政府无不根据事实，委曲求全，尽量容纳中共的意见，这在中央提示案上，都可以明白看出来的。

至于民主自由问题，中央政府一向重在实事求是实在去做，不在徒托空言。在抗战建国纲领原则之下，如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扩大民意机关职权，都在着着进行，今后自仍本此方针，继续致力，使战争结束之后，能够顺利推行宪政，那时候党的问题，自然可以解决。现在中共方面，虽然还没有接受中央提示案和实行遵守国家军令政令的表示，但是我们希望中共当能本诸团结抗战的真义，以事实和行动来实践诺言，实现国家真正的统一。中央政府决不变更政治解决的方针，而且竭诚期待中共修正其所持的观点，早日解决此一问题，以慰全国同胞的期望。因知诸位先生对这一问题之关切，特来报告关于本问题商谈经过，并郑重说明中央政府的态度和商谈经过，还请诸位先生指教。

评此次国民参政会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放日报》社论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九月六日开幕于重庆，十八日闭幕。这次国民参政会大会与历届历次大会比较起来，可以说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它表现了国民党寡头专制统治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深刻危机；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误国政策之愤怒；暴露了国民党内部各集团之互相倾轧和斗争，也揭破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玩弄“民主”伪装“民主”的卑鄙伎俩。

国民参政会此次大会开会于中国正面战场处在濒于崩溃的深刻危机之时，继中原长沙衡阳三次败战之后，在开会期间，两星期内，日寇沿湘桂铁路从祁阳窜抵兴安，前进五百八十华里，在湘粤桂三省失守了祁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全县、资源、高明、开平、鹤山、四会、新兴、肇庆、连江、怀集等十六县城，平均日失一城而有余。西南重镇桂林已极危殆。这种悲剧式的溃败，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之严重的愤懑。在政治上，国民党的统治也陷于深刻的危机中。在国内团结上，国共两党谈判虽已继续四个半月，但由于国民党之顽冥不化与缺乏诚意，而毫无结果；在国际上，由于消极观战与暗中反苏，以致国际声望一落千丈，国际舆论抨击日烈；虽置身盟国之林，而外交上却十分孤立、与参政会同时开会以决定进攻日寇之战略方针为主题的魁北克会议，中国竟至没有被邀参加。在经济上，则三月至七月物价高涨了两倍，达战前之四百倍至一千二百倍，以致士兵及公教人员“待遇低微，饥寒交迫，骨形菜色，时有饿莩”。至工农大众的生活，更不必说了。在文化教育上，是“学生成绩低落，体力衰退，教师待遇菲薄，学校量增质减。”总之，由于国民党政府之误国政策——其具体体现，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的结果。国民党中国目前所遭遇的严重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是谁也看得见，谁也无从掩饰的了！

这种严重的危机，不能不在国民参政会上得到某种反映。虽然，国民参政会历来是国民党员占绝对多数，非国民党参政员少到几乎连提案都提不出的程度，虽然蒋介石氏在参政会开幕之日讲话中，粉饰太平，轻浮乐观，企图以武断词句抹煞严重危机，和以充满杀气的寡头统一论封住参政员的口，但是他并没有成功。老参政员林虎氏给了他当头一棒，痛斥轻率乐观论，号召“发奋振作，痛涤旧污，革除积弊”。要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氏“万不可专靠同盟国胜利做胜利，致贻我中华民族之羞”。接着在政府各部长报告，参政员纷纷质问，问题之多，辞气之严，为历届所未见。尤其集中于对豫湘败战，通货膨胀，贪污舞弊，箝制舆论，反动教育诸项上。更于政府报告期中，提出临时动议，“请财政军政两部将改善官兵及公教人员待遇之具体办法，提交本会讨论案”，猛烈攻击何应钦、孔祥熙。至审议提案时，政府

交议之《三十四年度国家施政方针》一案，参政员严厉批评其空洞不切实际。黄炎培氏称之为“一篇空洞之策论”。许多参政员均要求参政会有决定国家予算之权。施政方针案实际上是被参政会拒绝了。其后国内政治上之最重要问题：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由王云五、胡霖两参政员之要求，由中共代表林祖涵同志及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在参政会上作了报告，并决议组织延安视察团。在参政员的许多提案中，又特别通过了《加强中苏合作》一案。所有这些质问，讨论，以及国共关系，在会上公开提出，是部分地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愤怒，对于要求加强全国团结改善国共关系的热忱，要求民主自由权利的热望，要求加强与盟国，尤其是与苏联合作的殷切。

但是，正因为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员占大多数的“国民”参政会，而不是真正的“战时的民意机关”和“革命时期的临时议会”；所以它只能部分地反映民意，而决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例如在本届大会上，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公意的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虽然由中共代表提出来了，但是由于国民党之阻挠，甚至没有在会议上郑重讨论。这就足以揭露国民党及蒋介石氏企图把国民参政会粉饰为“革命时期的临时议会”是何等虚伪和无聊。

其次，本届大会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内危机之深刻化，国民党内部各集团各派别之间的倾轧与斗争，也尖锐化了。本届大会对政府批评质问之热烈，除了反映人民之不满外，也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国民党内部的每一派，都想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尤其CC团，利用其在参政会中的人数众多，展开了对何应钦、孔祥熙之攻击。声名狼藉的CC分子黄宇人，领衔提出：《请财政军政两部将改善官兵待遇具体办法提交本会讨论案》及《限制财政部长不得兼任银行董事长及总裁》案，就充分暴露CC的企图。而对教育部长陈立夫的质问达四十六点多，足见国民党内其他派别与集团对CC的反攻。CC分子又在会议上攻击败战将军汤恩伯，要求枪毙他，蒋介石则极力庇护汤恩伯，反映了CC团与复兴社冲突的表面化。所有这些实在是对于高唱寡头统一论的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一种无情的讽刺，寡头统一非但统一不了全民族，而且也统一不了他们自己的党与派。

更值得注意与重视的，是国民党及蒋介石应付这次参政会的卑鄙手腕。开会之初，国民党是想以骗与压的方法来驯服参政会，甚至使参政会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开幕时蒋介石之演说，足以表明此点。他一方面高唱敌人无害论，一面在狂呼寡头统一论。但是危机是如此严重，愤怒是如此激昂，蒋的演说遭到林虎氏的痛驳及其他参政员不出席的抗议。而粉饰太平的各部长的报告，受到猛烈的非难。许多腐败现象，终于因无可掩饰而暴露了出来。国共关系问题，被迫地不能不提交大会。这时候，国民党便决心伪装民主，以破坏民主。它怂容其党徒跟在公正人士之后去“揭露”若干尽人皆知的腐败情形，提出若干词严意宽的质问，它发表修正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表示“扩大”名额，“扩大”职权。它命令其机关通讯社对大会经过大肆渲染，描画得好象真的是“议会”一样。最后，蒋介石复于闭会前夜去讲话，承认“中国战场……处在最艰危的时期”，恭维参政会为“战时民意机关”，“革命时期的临时议会”，空口允许“考虑提早结束训政”之类。凡此一切，都是国民党伪装民主以破坏民主的手法。其目的是在全中国人民中间造成一种幻想，以为国民党今天开始实行民主政治了，以为经过国民参政会就可以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了，而不需要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的寡头统治，立即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立即建立普选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民意机关。

但是，伪装终究只是伪装，偶一不慎，就会暴露狐狸尾巴的。在大唱其放宽言论、保障

人权的呼声中，林祖涵同志在参政会的报告，被中央社妄加窜改，面目全非。十六日《新华日报》发表的林同志报告提纲，又被删得七零八落。外国记者关于桂林危急的消息，依然被扣。叶挺、廖承志及无数爱国志士，依然关在牢里。非法逮捕，依然层出不穷。尤其重要的，是依然高唱寡头统一，并且以这种寡头统一为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依然要以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失败主义的军令去“统一”一切。拆穿了这个伪装之后，所余者仍旧是那个“应万变”的“不变”，即保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保持寡头专制统治及其一切法西斯主义的“政令”与失败主义的“军令”。

我们要正告国民党及其总裁蒋介石：伪装、欺骗即使一时能蒙蔽若干人，但是决不能挽救今日的危局的。更何况正如胡参政员霖所说：“抗战以来，一般老百姓知识程度增加很多，所以老百姓也不是可以欺骗的，不是理论与空洞好听的话可以欺骗的，一定要看事实根据。”“不变应万变”，固然不行，”“万变保不变”，亦一样不行。现在需要彻底的一变，即将寡头专制变为真正的民主政治。而其具体办法，就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紧急国事会议，彻底改组政府及统帅部，以民主的新政策代替独裁的老政策，以民主的积极抗战的新人物代替那些反动的失败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老人物。这个问题，已经在此次国参会上提出来了。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历史的发展将必然会解决和实现这个提案的，因为这是挽救危局的唯一办法。愿国民党人及蒋介石氏有以善处之。

周恩来同志离渝前的声明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

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博士本星期三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因为他只说了在国共谈判中政府方面提出的所谓让步，而并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或前提下，才有这些所谓的让步。第一，国民政府在谈判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将其所领导的一切军队移交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即是说，移交于国民党领导，因为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第二，在谈判中，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不能结束。由于有这两个条件或前提，这一切所谓的让步，不是落空，便是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不是让步而是束缚或破坏抗战的力量。具体说来，第一，不把军队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便没有中共的合法。第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从来就不开会，也没有任何权力。第三，在党治下的行政院内设置所谓战时内阁，并无最后决定政策之权。第四，不取消党治和不改变排除异已的军事政策，三人委员会改编中共军队仍等于将中共军队移交于国民党政府。而且照打敌人的成绩看来，应该改编的不是中共军队，而是国民党军队。说明了这些，便懂得我代表中共中央为什么拒绝了国民政府整个的提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拒绝了我们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以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改革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政策的建议。我们又曾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由国民政府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以便在取得一致同意后，好实现联合政府的方针。国民政府的答案是一种咨询性质的会议，而会议中预定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因此，我必须回延向我党中央报告。至于我们希望国民政府首先释放爱国政治犯，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撤退一切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等项，政府当局并未接受。这就是数月来两党谈判的主要内容。

（原载1945年2月17日《解放日报》）

如 何 解 决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的讲演）

周 恩 来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33年的国庆日子，正当着国内外局势急剧变化的时候，我们有许多感触，也有许多话要说。

目前战争情况，是欧战节节胜利，不久便可直捣柏林，太平洋战争亦着着前进。可是，我们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却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为什么我们正面战场这样不能配合盟国胜利呢？为什么我们只能有敌后战场的胜利呢？这是中华民国胜败兴衰的关键，这是中国命运的转变关头，我们必须唤起全中国人民来注意它，解决它。

现在中国正面战场，是处在严重的失败之中。河南战役，四十四天工夫，失掉了四十五个城市。湘桂战役，又连失长沙、衡阳、零陵、宝庆、肇庆、梧州等这样多的大城市，敌人现在已逼近桂林，威胁柳州，甚至昆明贵阳亦成为敌人窥伺的目标。沿海战役，温州、福州相继失陷，从此沿海较大的港口，都不在我们手里了。这一连串失败的事情，为什么今年会连续发生呢？为什么在日寇已经转入不利的形势下发生呢？这绝非偶然，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历来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所造成，这是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所造成。因此，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遂在敌人进攻的面前，呈现出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严重危机。

军事方面，国民党当局是历来只许政府抗战，不要人民抗战的。因此，我们在敌后发动人民抗战，便被诬为“武力割据，违抗军令”，而他们在大后方，对人民决不动员，不组织，只有捆绑勒索，于是壮丁越来越少，军队越打越弱，政府也就越抗越没劲了。尤其近年来，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常政策，因此我们在敌后积极抗战，便被诬为“奸党奸军”，加以破坏进攻，而他们在正面战线，却消极观战，决不出击；敌不来则通敌走私，鱼肉人民；敌小来则勉强应战，敷衍门面；敌大来则节节败退，一让千里。其尤甚者，是一面标榜抗战，迷惑人民，骗取外援，牺牲盟邦，企图以此坐享胜利的果实，另一面则信使往还，暗通敌伪，企图以此在目前和缓敌人进攻，加紧敌后“扫荡”，在将来则预留妥协余地，以便外抗盟邦，造成均势，内压人民，进行内战。这种极端矛盾的两面政策，无论如何是不能长久不被戳穿西洋镜的。所以英国邱吉尔首相，对于国民党政府这次严重的军事挫败，不能不认为“极大遗憾”，不能不认为“是最大的令人失望和烦恼的事”。而美国罗斯福总统也公开声明援华物资由每月二、三千吨空运增加到每月二万吨空运，是一个优异

的成就和伟大的事业，以驳斥国民党政府那种以援华物资不足而打败仗的借口。其实，打败仗是由于援华物资不足么？不是，绝对的不是。汤恩伯、薛岳的部队，不都是装备了美国的枪炮么？何以败得那样快，那么惨？胡宗南的部队，不是装备了更多的美国枪炮，还带坦克么？何以潼关以东的一仗，打得那么坏？何以胡宗南现在还保存着那么多的用美国枪炮武装起来的部队，不开往抗战紧急的前线，而专门用来封锁抗日的陕甘宁边区呢？并且，也不是非有美国的物资援助，便不能打胜仗的。河南战役中，能够守虎牢关、守洛阳而打得较好的，偏偏不是用美国枪炮武装起来的汤恩伯军队，而是没有得到美国枪炮的地方系军队。敌后战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人民抗日军队，不仅被国民党政府阻挡住，得不到盟邦的物质援助，便连国民党政府自己也从未装备过我们的敌后部队，但我们却偏偏能在敌后存在、发展和胜利。另一方面，史迪威上将指挥的在印缅的中国军队，有了美国的枪炮坦克的装备，不也是打得较好么？可见，中国人民和军队，绝不是不能打胜仗的，而且很英勇很坚韧的打着，这就是我中华民族抗战七年多的伟迹。正面战场之所以连打败仗的缘故，绝不是人民和军队不行，而是国民党政府及其指挥者的错误，自私和无能所造成。所以我们主张争取外援，但这种外援，必须结合在自立更生的基础之上，才有作用，才有力量。我们也主张盟邦的物资援助加多，但这种物资必须装备那能够打仗，而且打得很好的部队，才能打退敌人，反攻敌人。否则援助愈多，损失愈大，保存实力的也愈多，最后不仅不能得到抗战的胜利，而且反会增加内战的危险。这点，我们盟邦美国的舆论似已有同一认识。美国报纸，目前公开指出华莱士副总统及纳尔逊、赫尔利之相继来华，是为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说："如果给中国人民以粮食和装备，它能够担任象任何其他民族一样好的战斗任务"的。

这种西洋镜，现在不仅在外国戳穿了，而且还在国内招致了不可弥补的失败。河南战役所以失败得如此之快之惨的，就是因为汤恩伯胡宗南军队专心一意的反共反人民，所以敌人一来，仓皇失措，稍一接触，便溃乱四散，这证明反共反人民与抗战，是绝不能并存的，尤其是暗通敌伪，反共，反盟邦，与抗战更不能并存。远者如去年豫北之战，刘进、陈孝强因为预得蒋鼎文指示可以通敌打共，等到敌人打来仍想以反共为缓冲，结果庞孙投敌，陈孝强宁可不受八路军之助去打敌，而甘于公开投入敌垒来反共。近者如今年衡阳之战，守城将领明明知道庞炳勋、孙殿英、陈孝强等虽投敌，不仅未受国民政府通缉，而且还得到国民党当局支持，盟邦虽不断以空运增援衡阳，但当局仍怪外援不够，等到衡阳不守，何能单单责备方先觉等不能死节，还不是上边早给他们暗示了投降的出路么？语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你上边可以暗通敌伪，我下边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投降？现在既可以两面投机，将来又可以卷土重来。抗敌有罪，投敌有功，这就是军事失败主义的实质。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当局是死死守着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绝不容许有多党政治、人民民主的。因此我们在敌后解放了八十三万七千多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九千万的人口，建立了人民普选出来的地方各级政府，便被称为"奸区""伪府"，绝不承认。而他们在大后方，却只有党治，绝无民选。各级参政会，由县而省而全国，都是指定的。各级官吏，由保甲长直到国民政府主席，都是党部委派的。而这些指定、委派，又为国民党少数统治集团所包办，党内广大党员及民主领袖是得不到这种权利的。所以，与其称为党治，毋宁称为寡头专制。还有国民党当局是一心一意实行法西斯主义政治，而拒绝实行三民主义的。因此，我们在敌后，在边区，忠实于我们自己的诺言，努力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坚持对敌斗争，三三制，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政策，便被诬为"进行赤化"、"违抗政令"，而他们在大后

方，却剥夺人民自由，实行官办自治，箝制舆论，摧残文化，垄断专卖，横征暴敛，纵使特务机关蹂躏人权，纵使官僚资本破坏民业，致造成目前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甚至革命的三民主义，即在国民党内，也不容许宣传，联共容共主张，更被禁止传播。这种政治，请问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什么？

这种错误的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如果再不改弦更张，而仍要倒行逆施下去，则种种危机，还会继长增高，还会更加严重。我们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眼看着中华民族解放的事业，在这光明胜利的前途上，横梗着这种种危机，真是忧心如焚，焦急万分。

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起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这一主张的具体实施，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下列步骤：第一、这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代表总额，为应时局急需，且便于召集起见，可不必太多。第二、这国事会议，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以免延误事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第三、在这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第五、这一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第六、在联合政府的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只有这样的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只有这样的联合统帅部，才能听命政府，协和盟邦，击退敌人的进攻，配合盟国的反攻。如果仍欲以一党包办，伪造民意，即使由国民党再来一次决议，提前到抗战期中召集所谓国民大会与制定宪法，那仍然是党治，不是民治，仍然是伪宪政，不是真宪政。满清末年，不也是玩过伪装准备立宪的把戏么！结果何补于当时的危机!?今日如再重复这一教训，自毁事小，误国罪大。又如果不变更一党专政的实质，不变更现在执行的各项错误政策，即使国民党政府肯邀请各方参加，那仍然是请客式的一党政府，决不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九一八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也曾召集过国难会议，不也曾请过党外人士参加政府么？结果何补于当时的投降政策?!又如果统帅部不容许各主要军队的代表参加，不服从众所公认的政纲及各党派联合的政府，而仍然排除异己制造内战，即使国事会议开了，联合政府成立了，那仍然会成为有职无权的伴食宰相，一筹莫展的傀儡机关。民国初年，熊希龄号称的第一流人才内阁，五四以后，胡适之的好人政府主张，都因军人不能服从政治，军事自外于政府，结果何补于军事独裁?!北伐期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不受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的指挥，结果遂造成军事独裁，断送革命。

由此可见，我们所主张的以民主为基础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彻底的统一。如果统一于一党专政，统一于军事独裁，那便是假统一，结果别的党派被排除，别的军队被吞并，不服的起来反抗，打败的散之四方，于是祸乱相寻，内战频仍，还有什么统一可说？民国三

十三年的历史，还不够寻味么？

同样，我们所拥护的军令政令的统一，也必须是有利于抗战的军令，而不是那些失败主义的“军令”，必须是合于革命三民主义的政令，而不是那些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抗战七年多，我们深入敌后，在外援断绝的条件之下，既受敌伪的反复“扫荡”和烧杀，又遭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夹击，始终屹然不动，坚持至今。我们不仅没有如国民党当局所料，为敌伪顽三方面的夹击而消灭，而且还能够生存，还能够发展，还能够胜利。难道这是偶然么？不，这决非偶然！这是由于我们所服从所拥护的是抗战军令，是民主政令，所反对所违犯的是失败主义的“军令”，是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只要肯打敌人，能打敌人，并懂得怎样去打敌人，我们是绝不会被消灭，而且会继续胜利的。只要肯依靠人民，属于人民，为着人民，我们是绝对能生存，而且会继续发展的。因此，我们敌后战场才能与正面战场失败的相反，得到连续不断的胜利。

我们看，在最近半年内，截至九月为止，中国正面战场沦陷了十万多方公里的土地，而我们敌后战场却从敌人手中收复了五万方公里的土地。正面战场丢弃了四千多万的人口，而敌后战场却又解放了四百多万的人口。正面战场失掉了一百零二个城市，而敌后战场却又夺回了八个城市。正面战场损失了几十万军队，而敌后战场却又扩大了十万正规军。单单拿这几项来做比较，已经够说明我们敌后抗战部队——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抗日的部队，是多么有功于国家民族，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是多么有负于国家民族了。照道理讲，我们不仅应该要求惩办豫湘作战失败的那些主要负责将领，而且还应该请求奖励敌后作战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将领。可是，有功不尝，有罪不罚，已成惯例，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是中国人民是知道应该尝谁，应该罚谁的。并且，依照国民政府最近交给我们的提示案，还要我们取消数十万的抗日部队，取消敌后解放区的一切民选政府，这真是没有道理之至。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两个取消要求，那就等于帮助了敌人，那才真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呢！可是，敌后抗日部队，敌后人民政权，就是这样可以命令取消的么？谁也知道，这是绝对不应该，不可能的。

我们看，敌后解放区的胜利，究竟有多大？截至本年九月为止，综合华北华中华南十五个抗日根据地的报导，敌后各解放区现已拥有被解放的人口达九千万，占沦陷区人口（二万零七百八十万）的百分之四十三。敌后各解放区所收复的国土，约八十三万七千余方公里，占敌后总面积（一百二十六万三千余方公里）的百分之六十六。敌后各解放区所夺回的城市，现在已达到二十八个。敌后我抗战兵力，正规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已达五十七万，民兵游击队约二百二十万，地方自卫军则有数百万。在这些解放区内，共有民选县政府五百九十一县，专员公署八十五处，民选的边区政府及行署十二处。以上各项，陕甘宁边区均不在内。敌后我军所抗击的敌伪，在1944年3月河南战役以前，为日军侵华全数（三十四个半师团，约五十六万人）的百分之六四点五，为伪军全数（约七十八万人）的百分之九十五，合起来则为百分之八十四。在目前，虽由于敌人增加兵力于湘桂、粤汉、平汉三路，向中国正面战场作深入的进攻，但敌后我军仍继续抗击侵华日军（据已明位置的三十三个半师团计算，另有六个师团位置不明未算入）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五，几近半数，而伪军情况则没有变化，合起来尚为百分之七十六点四。敌后我军经常围困或袭击的十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有三十八个，为敌占大城市四十五个的百分之八十五。敌后我军经常逼近活动或进行破坏的铁路线，达九千六百多公里，为敌占铁路线约一万公里的百分之九十六。敌后我军

完全控制的海岸线约八百公里,经常有我活动的海岸线,约六千五百公里。总起来说，我们敌后人民在这七年多所发展起来的抗日部队五十七万正规军及二百二十万民兵总计起来，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我们敌后人民，在这七年多所建立起来的五百九十一县地方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以这样有功的抗日部队和广泛的人民政权，它已经是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旗帜和行为指标。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会灭亡。谁要想“取消”这个力量，谁就抹杀中国人民的抗敌意志，就等于断送了全中国。

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承认敌后解放区的数十万正规军、数百万民兵和各级民选政府，并且直到现在，国民党军队还不断在各地封锁进攻，企图消灭这些敌后抗日部队和民主政府。即在目前正面战场最危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用以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兵力,也还有五十六个师及其他地方团队,人数达七十七万五千之众（华南尚未计入），而进攻侵扰的事件始终未停，因之，内战危机，亦依然存在。我们坚决要求全国人民、同盟国家和我们一道有效地制止这种内战危机，要求国民党取消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行为，以便将我们全国力量都能用到抗敌的战场上去。

还有敌后我抗日部队，在此七年多奋勇血战，除了抗战初期领了一百二十挺轻机关枪和六门反坦克小炮以外，从未得到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任何轻重武器的装备，即弹药、被服、粮秣、经费以及各项交通、卫生器材的供给和补充，也在1940年起全部停止了。甚至连英美红十字会捐助的一百零一箱药品，也在三原被军事委员会没收了。因此，我们部队之所以能存在、发展和胜利，完全是依靠于中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和自立更生的成功。但为着今天更有效的消耗和牵制敌人的进攻，明日更有力地配合盟国的反攻起见，我们有充分权利要求国民政府以应得的军火和物资，来装备和供给我们部队，我们更有充分权利要求同盟国将援助中国军队的武器、弹药及一切器材和物资，按照抗击敌伪数目的比例，以大部分供给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一切抗日游击部队。我们英美盟邦应该知道，没有中国敌后抗日部队的参加，不仅在中国战场进行反攻，成为不可能，即连目前欲制止敌人的深入进攻，也成为不可能。我们可断言，拿敌后我们军民的力量、成绩及其所处的战略地位，如果再加以盟国的装备，我们必能达成更高的战斗任务。

现在当魁北克会议之后，英美盟邦正在加增其注意力于中国战场。在重庆刚开过的国民参政会上，蒋主席曾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问题，而参政会又决定派遣五位参政员来延视察，我们除表示欢迎之外，愿乘此国庆纪念，再一次重申我们上面的主张。

我们认为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废除失败主义的“军令“和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是挽救目前危机切合时要的唯一正确方案。

我们继续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全部抗日部队和各级民选政府，坚决反对取消敌后数十万抗日部队和民选政府。

我党中央六月四日所提出的十二条意见书与委托林祖涵同志口头提出的八条，仍应成为今后国共谈判的根据。

我们继续邀请并欢迎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两先生来延视查和谈判。我们认为问题可以逐步解决，但必须在不违背抗战、民主、团结的大原则之下来解决。

时机太紧迫了，我们切望国民党当局，全国爱国志士，全国人民，奋起急图，扭转时局的关键，抗战幸甚！国家幸甚！

（原载1944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

[附] 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消息

——四月河南战役之后至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

(一九四四年九月三十日)

达　生

国民党的寡头统治，特别在豫战以后，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即为此种危机的一种表现。兹根据大后方报纸中所得到一些材料分述如下。

一　广西方面

六月十日，桂林文化界经李济琛、黄旭初等人发起，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进行"保卫东南的全民动员"。六月十五日，李济琛、龙积之、封祯祈、陈树勋、柳亚子、李任仁等组织长老团，向桂林的富商大贾募捐劳军；至六月十八日，正式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以李济琛任会长，李任仁、欧阳予倩、白鹏飞、陈劭先等二十七人为工作委员。由于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名流学者以及广大青年学生之动员宣传的结果，桂林在六月间，确曾一度现出新的气象。

六月十五日李济琛在桂林发表广播演说，大呼铲除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民主抗战，"希望中央与各地区地方长官，要尽到领导抗战的责任，立刻动员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并使一部分武装起来……"（六月二十八日《新华日报》）。

这个运动之所以可能在广西发生，显然由于蒋桂矛盾的缘故。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提到李济琛协助从香港逃到桂林的一批文化人，拒绝蒋介石"邀请到重庆集中"的一件事，也就可以明白了。据三月十五日"云南日报"载桂林通讯称："李氏卸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以来，即滞留桂市……前往桂林文化界欢迎会席上，曾表示其为人态度：不强人之所不为，而愿人人心安理得，正直做去，故前不愿奉劝桂林文化人，跋涉数千里，走入雾都"。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在今年初，消弱了李济琛的实际权力，只给他以一个"军事参议院院长"的空头职位，故可见李之滞留桂林，事非偶然。在这里，我们不妨略为追述一下广西与中央的关系。该省在抗战以来，一方面是白崇禧为首一部分力量，向蒋介石卖身投靠，但以黄旭初为首旧有地方势力集团，则日益增长着对蒋氏独裁的不满，这种不满的倾向曾在前年（三十一年）八、九月间，一度表现出来。当时广西省三十六县遭受水灾，而该省财政又因中央政府垄断了省银行与田赋的结果，陷于十分困难状态，省及各县救灾准备金额数，合共仅六十万元（见《建设研究》八卷一期），不足以救济嗷嗷待哺的大批灾民，因此，桂省当局于是年八月十五日急电中央拨款救济，但中央却迂缓拖延，坐视不救。"省方急电中央请

命，而中央又电省检查，俟检查后再呈中央，中央再核给账款”，纸片政治程序未完，而桂林省灾民已满填沟壑，这引起广西当局的极大愤懑，他们慨叹当时该省境遇之凄惨，乃由于“地方制度被支离破碎”的结果。在去年三月十九日，白崇禧在广西省政府纪念周上，做了一次阿Q式的训话（载三月二十一日《广西日报》），全篇都是把何应钦对广西各界的训词，重复一遍，说：“何总长对广西的建设，给了很多奖励，尤其广西自动（？）的将兵工厂、马牧场、航空机械厂交给中央管理，更给予很大奖励……”这篇可笑的论调，引起桂系内部一些人的“懊恼”（白氏自语）。四月，白崇禧之母八十岁生日，何应钦奉蒋之命，往白府拜寿，其他各主席长官，均派代表祝贺，黄旭初为白母祝寿之二发起人的一个（另是李宗仁），但到生日却派代表一人前往，这又显然表示了黄旭初对国民党之分化与消弱异已政策之不满。自南宁之役以后，桂省实际上已在中央军控制之下了。如今，蒋介石反动统治所造成之军事危机，又直接降临广西的头上，但国民党军队仍一如过去，老是挨打，而没有任何积极办法，这自然更增涨李济琛等的愤怒。

广西这个运动，自六月发动以来，先后得到各方的声援。七月初，重庆文化界沈钧儒、张申府等二十人（其中包括救国派、第三党及生活教育社），首先联合致电响应，力主采取民主办法，组织人力物力，坚持到底。其原电文如下：

“桂林省政府黄主席转李仁潮、张向华、余幄奇、夏威、李任仁、龙积之、柳亚子、陈劭先、梁漱溟、白鹏飞、何香凝、田寿昌、欧阳予倩诸先生暨党、政、文化各界钧鉴：敌侵湘南，密迩桂粤，…任潮先生（即李济琛）广播力主动员全民、坚决抵抗，痛斥畏祸先逃，动摇战志之失败主义者，义正辞严，震铄中外，尤为武汉会战以来所仅有之巨吼，甚望即行紧急措施，采取民主办法，组织人力、物力、坚持到底……愤切同仇，敢贡赤忱，誓为后盾，肃电遥应，敬伫捷音。

沈钧儒、郭沫若、张申府、邓初民、张志让、章伯钧、
茅盾、沈志远、夏衍、刘清杨、胡风、封禾子、金山、
候外卢、史良、陶行知、宋之的、司徒慧敏、叶以群”。

继陪都文化界之后，以黄炎培为首的宪政月刊社，国讯社，即致电响应（原电载七月十六日《新华日报》）代表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华西日报”，也在七月十八日发表了题为“民主动员进行坚决保卫战”的社论一篇，响应桂林的运动，该报郑重指出：“不动员民力，当然会自陷于无法无力之境……时至今日，起死回生，改弦更张，唯有从认真动员做起”，“到敌人已经扼住我们的咽喉，要窒息我们的时候……急起直追，都已为时恨晚，倘再因循，真就误事透底，要谋补救，都来不及了”。

二 云 南 方 面

豫湘战败，也引起云南方面的震动。八月十二日《云南日报》，特发表《检查与改善专论》一篇，该文称：“三、四年前，汤恩伯部调入豫皖边区，以界首为中心，把豫东的沈邱、项城、商水、郾城、淮路等县和皖北的临泉、阜阳、颍上、蒙城、衡阳、太和等县划为‘重建区域’，一切均要听他的指挥。不但专员县长要由他决定，就是各种财务机关，亦要归他掌握，甚至普通学校都由他主办。因此引起了一面和豫皖省政府的冲突，一面和财政部的抵触，所以地方军政机关，平时既不能密切合作，战时更不能集中力量对付敌人”。该文

又反映了中央军与杂牌军的矛盾，并指出国民党之腐败政治，“处处阻碍军事进展”的许多事实，最后提出国民党，“应该一视同仁，打破系统关系，实行待遇平等。凡是能打并且肯打的，应不问他来自何方，都应予以鼓励，若是不能打而不肯打的，应不问他来自何系，都应予以制裁，至于肯打而实不能打的，更不应看他属于何部，都应速予补充”。

以龙云为首的滇省地方势力，正强力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扩大地方职权，改变其“一切均归中央统制”的独裁政策。这种主张已经露骨地由“云南日报”与“云南民国日报”反映出来。例如在五月间，当国民党政府召开全国行政会议的时候，“云南日报”五月二十六日社论声称：“以现情而论，中央正厉行集权，凡政府（指地方政府）从前所有之一切权利，渐次吸收，而集中于各部院会手中，以致政令频繁，机关林立，直接指挥，收效殊鲜……事实上，事事都要靠省政府来工作，但省政府有责无权，有事无权”，因此，他们主张：“省不仅代表中央，且应为地方自治之总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切实保障地方权益，使地方能因地制宜，运行其高度的职权”（题为《确定中央与地方之职权关系》）。八月十六日该报社论又称：“我们不要一辈子，仅披着民主的外衣，戴着自由的假面具，让一切魑魅魍魉，在这外衣和假面具之下，张牙舞爪，为非作恶…………我们支付的代价已经够多，今天该到它总清算的时候了，我们要求一切善良的有知觉有灵魂的社会人士……多对丑恶的现实，加以愤恨，公开举发，大量举发，鸣鼓而攻。要使一切躲在外衣和假面具之下的魑魅魍魉，放下屠刀，各显原形，悉绝以法”。

原来，滇省之不满蒋介石中央，是老早就存在的，今天不过是趋于严重化罢了。另外有一个新的因素，使该省在对于国民党中央的斗争中，态度更为强硬起来，那就是由于美国与云南当局直接发生了联系。早在去年一月间，云南早已自设了留美学生训练班（详见去年一月三十一日《云南日报》），班主任为缪云台，那是龙云的嫡系，富滇新银行经理兼省府委员，去年六月已由龙云派往美国去了。

由于龙云与国民党中共的矛盾，所以在昆明的一批自由主义的教授，名流以及各大学的学生，也得有较为便利的活动环境。教授们创办了一个杂志，叫做“自由论坛”，那是西南方面，鼓吹民主，反对专制主义的一个相当有力的刊物。该刊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说：“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自由论坛》一卷四期），不久以前，云大学生自治会，联大壁报协会，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及省立英专学生自治会，曾于“七七”联合召开“时事座谈会”，到会者除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外，尚有杨西孟、闻一多、邵循正、潘大逵、蔡维藩、潘光旦等十五、六位教授。至于教育当局方面，则有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等三、四人出席。讨论多集中在要求改革政治问题上。潘大逵教授驳斥了国民党当局所进行的守法运动，并呼吁“青年们应加紧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不要吝惜任何牺牲！”社会学教授潘光旦也说：“今天不是‘躲’的时代，我们必须要追求光明，打倒黑暗！”闻一多教授更激昂的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他说：“而今不幸的很，战事正走向失败的方向，大多数人们都在等待着胜利，他们满以为总有一天，胜利自然落到他们头上，‘可怕的冷静’正笼罩着中国，但我们青年们能眼见这种事实而不震惊吗？我们能使自己一手所造的神圣抗战失败吗？不！绝对不能！我们应该再来一次（一顿）‘闹’！”（见七月八日《云南日报》，及七月十九日《新中国日报》）这些激昂的呼声，在学生群众中得到了热烈的回响，保守派于是乎着慌了！在场的云大校长熊庆来，马上搬出一套祖传的“法宝”来，说什么“我辈做师生的人，就应该每人守着他的讲求学术的岗位，而不应当驰

于学术以外的事物，例如政治商业（！）之类”。然而，时至今日，这个古老的“法宝”，竟毫无用处。这位校长先生，当场就受到驳斥。事后，“自由论坛”上又发表了题为“说学人论政”的社论一篇（《自由论坛》六卷二期，八月一日出版），针对着阻挠民主运动者的叫嚣，给予回击，紧接着，闻一多教授又发表“可怕的冷静”一文（该文由《华西日报》载于八月六日该报之社论地位），痛斥国民党当局隐讳痼疾，粉饰太平。闻氏点破了大后方的深重危机，说太平景象正如“肺结核患者脸上的红晕”，是“将死前的回光反照”。并谓“现在是非常时期”，“任何平时的规范都是可以搁置的枝节，火烧上了眉毛，就是抢救！”国民党当局极力要把这个运动镇压下去，在该事发生后不久，教育部便将闻一多及其他一位教授解职（九月四日《新华日报》昆明讯），联大壁报也遭当局干涉（八月二十八日西安《秦风日报》）。但是，专制独裁者的企图并没有成功，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据最近报纸所载，“教授与学生们正谋下学期后之对策。某教授则倡导应有更有效之行动表现，并将向政府建议更具体之意见”（八月二十八日《秦风日报》昆明通讯）。另在八月十八日，昆明青年军人服务部和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合办的学生假期服务队，于昆明附近某军部举行“时事座谈会”讨论“目前局势和中国的反攻问题”，出席的除服务队全体队员外，有某军邱军长以及高级长官多人，西南联大教授陈雪屏、华罗庚、闻一多、杨西孟、冯友兰、刘崇鋐、邵循正、吴晗、曾昭抡、马大猷、陆钦致等十一人，也被邀参加。座谈会自上午五时许开始，直到下午十时十五分才结束，他们一塀认为：现在“一切重要的焦点在政治”，必须积极改革，准备反攻（详见九月一日“新华日报”及八月十九日《云南日报》）。最近，昆明的文化界、名流、教授，为进行民主活动，又筹备创办“民主周刊”，并经市政府登记认可，但其第一期稿件，竟为国民党云南图书审查处扣押，不准出版。闻他们对于这种无理的统治业已提出严重抗议，并进行公开的控诉了！（九月十二日《新华日报》）

三 四川方面

代表四川地方势力的“华西日报”。自五月以来，就连续不断的主张“迅速刷新政治”，以挽救目前的危机。据统计，仅从五月十日起至六月十三日为止的一个短时期中，该报发表要求民主的社论，即达十七篇之多。他驳斥了专制独裁者想坐待胜利的自私算盘，指出：目前军事的危机，“决不是单靠盟国的若干协助，就可以改变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治的彻底刷新”。并认为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华西日报》五月十一日及七月十二日社论）他们看穿了那些“目注心营，无非想利用人类为民主、为和平、与消灭德意日法西斯强盗所流的血，暗中灌溉新的暴力统治”的企图（《华西日报》五月十八日社论）。所以又力主“肃清变相的法西斯”（《华西日报》五月二十日社论），八月十九日，该报更明确的表示了对一党专政的反对态度，它说，“关于政权属谁的问题，有人说，中国的政权，应该永为掌握政权的政党所掌握，老实说，这就是反对民主之最露骨的表现”。深居西康的刘文辉，也于八月一日发表了“加强团结，挽救当前难关”的主张。他认为：“今天不只要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而且要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人民的团结。其目的在进行大后方的保卫战，除此而外，实无他途”（在省参会上的开幕词，载西康雅安八月八日《建康日报》）。

此外，由张澜、邵从恩、李璜和川省名流士绅所组成的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曾于六月

二十日郑重提出对国事的十项主张，认为“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按：原文载七月三日《新华日报》，其中第九条全部被删，六、七两条亦删的残缺不全），其十项主张，可概括为下列三要点：

一、“切实施行约法”（第一条），“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第三条），“人身之自由”（第四条），“思想信仰及一切结社集会之自由。公教人员、学生士兵入党入团，须基于自愿，并不得以党员团员资格，为铨叙考核之标准，及享受其他特权”（第五条）。

二、刷新政治。“给予各级民意机构以必要的权力”（第六条），“政府用人，应一本天下为公之旨，选贤与能”（第七条），“切实改革征兵，征实，征税等之弊端，严惩贪污，杜绝中饱，革除苛扰，以减轻人民痛苦”（第八条）。

三、实施全民动员。“举凡训练群众、组织民众，均应以国家立场出之，不再以党的立场出之”（第二条），“实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以保国家复兴之基地”（第十条）。

四川方面对国民党专政不满的增涨，也正是与国民党所加于他们的压制相并行的。一九四〇年春，在所谓甄审的名义下，三分之一的四川原有的县长被撤换了，而代之以黄埔出身的干部。同时，改组了盐业银行董事会，统制了平民、商业、垦业和聚兴城等十大地方银行。在军事上，则更是众所周知的，川军分散在各个战区，象其它杂牌军一样，虽在抗日战争中遭受很大损失，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充，所余已无几了。而在四川本省，中央军深入叙府一带，割裂了西康与四川之间的联系。本年渝区行政会议之后，八月三日，川省府又在“整饬吏治”的美名下，调动了安县、丹棱、金堂、彭水、资中、蒲江、江油、蓬溪、威远、巫山、垫江、资阳、璧山、射洪、合川、巫溪、梁山、峨边、成都、夹江、北川、彭山等二十三个县长（八月八日《新蜀报》成都通讯）。原来，在该次会议上，四川参议员告发了不少贪污案件，但当权者，却利用这个机会来了一个调动，按插一批所谓能够“忠实领袖”的干部。那些因为贪污枉法，已引起民众愤懑的县长老爷，经过了“调差”“对调”之后，又仍然安享其官位，而没有后台比较廉静的，却“撤职”或“调省”了（参见八月十九日《新蜀报》载“关于四川几个县长的调查”，及八月八日《华西日报》载张群的演说）。更严重的，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统治四川，进行以该省为基地的结果，四川人民的负担，是空前加重了！本年度川省田赋征实数额，原定两千四百万担，后因省参议会反对（按：该省参议会的不少参议员代表四川地方势力的），减为两千一百万市担。据川籍参政员周崒池对记者表示，这个负担仍是过重的（见九月三日《新华日报》）。因此，不断有“欠粮”或“抗粮”的事件，也有些县长因“征实不力”而被记过的，现在国民党又在四川追征田赋，上自财粮二部高级官员，下至行政督察专员、县长、田管储运处长，以及党、团人员，均“分途下乡追收”，官方表示“如粮欠在征收人员或包商者，限即日交清，欠在保甲人员者限十日交清，欠在粮民者限一月交清，即有延误，即由专署县府拘押讯办（！），务使全县三年来欠粮，如数扫解，颗粒不准短收（！）”（九月九日《新蜀报》）。以前的负担尚无力缴清，但近闻当局，又拟在四川“增借三千万石（！）以补豫湘军粮之不足”之说（九月八日《新蜀报》）。在豫湘大片土地失去以后，苟安于西南这个角落的国民党政权，为维持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关，对川民以至士绅的压榨，更要加紧起来是必然的。除正税外，川民还必须担负

繁重的杂捐摊派。据调查，云阳，巴县一带摊派，普通超过各县正税额二、三十倍，甚至也有超过二百七十五倍的（四川训练团的调查报告，载《经济季刊》第三期）。这一切，自然更要引起人们的愤怒。

四 小党派方面

在小党派中，中国青年党负责人李璜，除与四川士绅名流相联系，一起进行民主活动之外，在四川各大学的青年学生中颇为活动。早在今年元旦，他在《新中国日报》上发表了论文一篇，警告那些想做皇帝的人说："如果有野心家要想夺去四万万人的皇冠，来戴在他一个人或几个头上，那未四万万人也要起来把它打倒。以四万万人打倒少数人是很容易的事，袁世凯是一个例，张勋也是一个例"。七月六日，李璜又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说，主张在目前就应实现三大自由，并要求国民党取消一党专制。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使各政党能够自由充分的发展"。七月二日，左舜生著文，力主"切实调整国共关系"，"加速实现民主，以澄清国际的疑虑，并举国内团结之实"（《民宪》一卷五期），大家知道，青年党是反共起家，一个带有极大妥协性的集团，现在留在国民党统制区的，仅西康、四川、湖南还有点力量，但仍受到寡头统治的严格限制，因此，它也不满意国民党。正当九月六日国民参政会开幕时，该党机关报，就提出根本改造国民参政会的主张，它认为目前的参政会，不足称为"过渡的民意机构"，只是"聊备一格之外交姿态而已"！（九月六日《新中国日报》）。

国社党张君励氏，曾于二月间发表"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证"一文，要求立即实行民主政治（载《再生》九十四期），六月十日，该党负责人之一，罗隆基氏，在云南民主系统讲演会中，驳斥国民党借口"方法"，来反对民主运动的企图，并大声疾呼："中国需要真正民主"，这种民主在"政治上必须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经济上必须生产手段公有"（七月二十四日《新华日报》。在"七七"昆明各大学所举行的座谈会上，罗氏也曾出席讲演，他指出"军事上吃败仗，完全是政治上不民主的缘故"，故主张立即实行"多党政治"。最近，张君励又发表"联合国家中之治国与乱国"一文（《民宪》一卷六期，八月十五日出版），针对着国民党的寡头统一论，加以批驳，该文首先阐明，"一致"之道，是"由于政府设施之感人，不由于强压"，继而讥笑国民党人所津津乐道的"统一"，说"专恃有形之武力和军警等，而忽视其自动自发之忠诚，则猜忌防制之术，终而穷之，而其一致所生之效果，微未不足道矣"！最后结论称："唯有民主，唯有有言论结社自由之民主，有反对党之民主"，才能"去乱国而成治国"。

三届三次参政会前夕，青年党及国社党领袖对记者谈话时，均曾表示同意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青年党左舜生说："各党各派团结努力，已是全民一致的要求，民主宪政的推进，也以此为据，我以为各党各派联合政权应实现。政治问题只能以政治方式来解决，绝不能用流血方法来解决。"国社党张君励氏也认为"将来的政治，必须以各党各派共谋的民主政治"（载九月五日《时事新报》）。

此外，闻各小党派为了集中他们的力量，已联合起来，将"民主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并已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纲领。

五 民族企业家方面

五月间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以及中国生产促进会等五个工业团体，曾联名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送交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要求国民党政策改变。五月二十四日章乃器、吴蕴初、吴羹梅等八十几位工业代表，又在重庆集议，一致呼吁要求政治民主，生产自由，取消统制政策（见五月二十五日，《新华日报》及《宪政月刊》第七，八号合刊）。同时期，宪政月刊社，接连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召开二次座谈会，除该社同人外，并邀请民族企业家参加，讨论亦均集中在保护民营企业的问题上面。吴羹梅曾大声疾呼的说：

“本人以为今日私人企业界或工业界最需要的便是“生产自由”获得。以目前而论，我们工业界无论在原料、运输、资本、营业以及机械等任何一方面，都需要这种自由。原料方面自从统制以来，有些物品日渐减少，而有些物品竟致绝迹不见。……至于运输方法，各地关卡林立，滞留货物来使工业界四肢不灵，例如重庆附近，即于黄沙溪之外，再有相国寺的关卡。机械方面则都市里堆更大量机器，停置不用，甚而有拆成废铁按斤出卖者，但在各地乡村中，对于这种机器却正是求而不有。营业方面更是困难，政府……不准更改价格，然而事实上黑市满街，于是我们工业界只好坐视亏本。此外以不合标准，管理不佳等理由，下令停闭的中小工厂，更是为数不少。而一息残存的几家较大的工厂，也只是苟延撑支而已。……所以在今天这种机器停搁、技工失业、原料久封不启等等实况下，我们工业界便不得不发出这一要求“生产自由”的呼声”（见《宪政月刊》第六号）。

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不根本改变国民党的统制政策，那末，所有正当的工商业，必然要被窒息至死！至于什么“扶助”与“保护”，那更是谈不到了。多次破产的痛切经验，帮助民族企业家们，认识了这个道理，并且自然的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与垄断的斗争。黄炎培氏最近在国讯及宪政月刊社方面的许多活动，显然是大后方民族企业家这种情绪的反映。

三年以来，黄炎培还是那么怯懦的，仅仅主张“逐步实现民主”，“励行法治”“反对暴力斗争”，还想以温和手段，把“政治扶上（！）轨道”的人物（引文均系黄氏自由，载《国讯》港版第一期）。而今在全国民主浪潮推动下，黄氏也激昂的喊出了：“要为民主拚命”。五月二十九日，他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说：

“……要民主，我们自己把不动，休想别人把礼物送上门。要成功，一定要我们“求”的有力。要成功的快，也得拚命的“求”，而且……必须成为一个大的运动才行，希望我们大家以后，做人要改变作风。我们以前做事也未免有些地方怕困难，怕阻碍。今后，要说的就说，要干的就干，良心以为该做便做，硬是要做，认为不当做的便不做，绝对不做！”

九月一日，黄炎培、张志让、杨卫玉，褚辅成、冷遹、江恒源、王云五、薛明剑、吴蕴初、向乃祺、刘伯昌、傅彬然、陈乃昌、王印佛、徐子为、张雪澄、贾观仁、黄敬武、祝公健、孙起孟、陈北鸥、卢作孚、潘仰山、胡西园、张肖梅、章乃器、潘序伦、吴羹梅、张树霖、尹致中等三十人（其中包括工商企业总经理，地方银行家，士绅及文化教育界各人士），在《国讯》及“宪政月刊”上同时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此寇深患急之时，“与民更始”“一新政象”，以期“迎最后胜利”。该件提出九项主张如下：

一、及早实施“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不维其名，务求其实”。

二、“切实执行，训政时期约法”，“以迄于宪政之公布”。

三、约法所规定人民之各项权“如身体与财产之保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亦须予以实际的充分的享受与保障”。

四、“严厉告诫文武官员，一致守法，一致设施，力行法治，有犯必惩”。

五、“切实开放言论，除图书审查，业已废止外，其它杂志、日报、凡受检查与限制，应以涉及军事秘密或反对抗战者为限”。

六、“兵役、工役与一切赋税制度订立与执行，皆须绝对平等，在税法上，尤须着重与民力之调节，借以纠正社会贫富两热化之危险状态”。

七、“必须给产业界以一切解放，简化各项法令与手续，维护其一线生机”。

八、“学生在不妨碍学校纪律与普通法规之下，予以言论与行动之自由”。

九、“行政机构，自中央以迄基层，一切政令，皆须绝对公开与民更始”。

六 国民党内部方面

对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满，同时也见之国民党内部。立法院长孙科，从去年十二月，在“中央日报”发表“实施宪政的几个问题”一文以后，便不断的到处演讲，大写文章，高喊不应当再维持一党专政，并出版了“民主世界杂志”，广为鼓吹。立法委员周一志，抨击萨孟武等“拥护总统独裁”的理论，并供认这是国民党内“重大争论问题”。“七七”七周年纪念的时候，孙科又发表“我们的唯一路线”一文，主张“切实执行亲英美同时亲苏联的外交政策”；“赶速实际施行民主政治”“彻底发动全民力量”。同日，并对美国广播说：“联合国必须肃清各处的法西斯主义，甚至联合中国，如有法西斯主义存在也要铲除！”（七月七日《新华日报》）此外，孙科还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前途”一书，据“纽约时报”的评论，该书直截了当的说，“纵令中国在战争中是反法西斯轴心营垒之内，然而，他正不复为民主国家了，他把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描写为一个独裁的官僚集团”（合家社纽约七月三十日电）。他坦白的说过：“我们是民主阵线四大盟邦之一，对外既与盟邦携手，和法西斯敌人作战，对于国内政治建设方向，当然只有走向民主的路线，以与国际路线相配合”（引自“我们的唯一路线”，一文），“如果我们把宪政实施，一天天搁下来，不能完成国家的建设，那就不但违背了建国纲领而且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去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日报》载 孙科文）。“政府对人民损失威信，更予反对党以攻击本党的口实，而中央也就会为人民所不满”（一月二十一日孙科在中训团高级党政班的讲演）。孙科对于国民党统治危机之焦虑，于此可见!

此外，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曾于五月七日，在复旦演讲“新旧问题时”，间接的指责蒋介石法西斯主义，他说：“今天还有人歌颂旧时代，以及旧时代的人物，我真不懂是什么道理，举例说，他们说清朝的制度好（按：蒋著《中国之命运》第二章第一节，即歌颂清朝“建国规模宏远，政制法令的精密”），我要问，如果真是好，清朝为什么会灭亡？这论调真太危险了！他们又喜欢推崇曾国藩，却不知道即使今日有曾国藩出现，依然拯救不了中国，最多也不过可以使今日的中国，成为曾国藩时代的中国！崇尚旧，不如崇尚新，推崇曾国藩，不如推崇国父！”五月二十六日，邵氏又称：“我们必须把一批不忠心于民主政治的人，清洗出去。中国也有中国的‘贝当’和‘赖伐尔’，这算不了什么，只要有正义的人，

能把‘贝当’和‘赖伐尔’这批赶掉！毁掉！”（在中法联谊会上的演说，载五月二十六《新华日报》），大家看，邵力子所说的是要“毁灭”法西斯，而不是“绝对服从”。

最近召开的三届三次参政会，林虎氏对蒋介石粉饰太平论调的驳斥，以及许多国民党参政员对当局的质问，均反映出国民党内部正在开始分化。

七 人民的斗争

大后事老百姓，对于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往往用实际行动来表示。

七月间，河南发生大规模的民变，桐柏、随县、唐县、应山、泌阳、信阳诸县的民众，因反对不抗日，光害民的国民党军队，联合数万人，缴了汤恩伯几个师人的枪。暴动经过是这样的：七月十七日（旧历五月二十七日）夜，在桐柏南山四十里冲，以王川为首结合七千余人，将驻防叶家塞至天河口一带的第五战区第一游击队何励生部工兵，机械连，卫队等部队缴械，其部属王贯五被杀，曹文彬所辖之李大队士兵损失过半。军事当局闻变，即派六十九军二十八师前往镇压，任意屠杀，凡年在十岁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全，被屠杀者达五千人，血流成渠，造成抗战以来军民相残之最大惨剧，该地人民以当局如此惨痛措施，人人自危，除一部分人民逃到我区避难外，强捍者不约而同，群起反抗，将二十八师全部缴械，师长被杀。现已联合达十万之众，迁住四望山西吴大店、汪溪店、天河口、应家店等山中各市镇上。他们的口号是“反对不抗日的军队”，“反对军队派勒壮丁”，其旗帜为白地黄边，中写“天一”二字，臂章为农民救国军。起义的原因，据当地的人民谈：“主要是派勒太凶，老百姓收的不够交给军队，今年又是旱荒，汤恩伯军队每保要七十名壮丁，老百姓觉得一切都完了，政府不但不救他们，反而残杀，只好自己起来救自己”（新华社鄂中九月十五日电）。这就是国民党寡头专制的政令，逼迫人民起来反抗的情形。

湖南湘西一带的武装农民，现在仍和国民党警察队在作战。去年常德会战中，澧水上游的农民暴动，一度攻入大庸县城，其后，湖南当局，即派警察处长李树林（三青团湖南书记）专驻沅陵“督剿”，薛岳下令“只剿不抚”，这些失败主义的军队，对于残杀人民的勾当，却又是干的多么起劲啊！据本月六日《大刚报》消息：“活动于湘鄂川边区之一部五千人左右，有化整为零的形势，现正在永绥乾城一带，与六战区“剿匪”部队，及湖南武装警察队六个大队激战中”。

另在川西北夷汉杂居处，数千“烟民”，武装反抗政府“督查铲烟”，围困归化县城，激战二昼夜，松沟县县长被俘，“烟匪”们用乱刀将他砍死。人民之愤怒，于此可见！同时，并击伤川省第十六专署副司令叶嘉宾，据报，川省保安处又派第二指挥部副指挥前往镇压了！（连载八月一、三、四日《华西日报》）最近，这种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下层群众行动，甚至也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附近发生。六月二十八日重庆北培文星坊的一个老人，被合川水上警察北培分驻所，无理拘押、严刑拷打，勒索二千元，并不准取保，七月一日又遭毒打，老人于是呼冤，当即引起街坊的公愤，一千多过路人群把该所捣毁了！（七月十二日《新蜀报》）。足见人民对政府积怨之深，实已至忍无可忍的地步。

（原标题为《大后方民主运动消息》）

［附］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集会要求改组政府的消息报导

九月廿四日的下午，在重庆迁川大厦礼堂，挤满了五百位为民主中国而呼号奋斗的战士，这里面有国民党的元老冯玉祥先生，覃振先生，邵力子先生，孔庚先生，有国民党的人士钟天心先生，司徒德先生，王昆仑先生，邓初民先生，屈武先生等人，有各党各派的负责人及社会名流张澜先生，沈钧儒先生，章伯钧先生，李璜先生，左舜生先生，黄炎培先生，董必武同志，张申府先生，刘清扬先生，胡子婴先生等人，还有众多的各界青年男女。这真是集各党派、各阶层的男女老幼于一堂，大家只有一颗热的心——爱国家民族的热心，一个期望——立即实现民主的期望。

会场从二点钟不停休地进行到六点钟，始终在热烈紧张的空气中。闷热的天气，炽热的心情，交融成一片火热。激动的慷慨的演说，如雷的掌声，几乎要把全场都爆裂了。寇深矣！祸急矣！山城的人民已经再也无法忍耐了，再也无法抑制他们一腔为国为民的悲愤了！他们的吼声，将鼓舞全国未死的民心，为民主的实现抗战的胜利，作最大的努力！

大会一开始，主席张澜老先生，就慷慨地说：民国已经卅三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如今弄到政治、军事、经济各部门都陷于十分困难之中，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时间将不等人。我们将来要民主，而目前为了挽救危亡，尤其需要民主。

张老先生同我们重庆人民阔别了三年，三年来在成都为民主运动鼓吹不遗余力，会场中人，今天听到他这番语重心长的话，顿时掀起一阵狂烈的掌声。由于张老先生的高龄，左舜生先生代替他来作大会的主席。

冯玉祥先生在掌声中起立说话，他说：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的意思，这一点对军队尤其重要。我们中原之战的失利，就是由于军队得罪了主人所致。他感慨地说：如果对民主有了认识，就不应该把壮丁糟塌为弱丁，糟塌为病丁，甚至死丁。他又说……中国先贤说过："兵未入舍将未敢入舍，兵炊未熟将不敢食"，俗语也有"与士卒同甘苦"的话，我们现在带兵的人，统统没有做到。穿老百姓的，吃老百姓的，还不够，还要想穿洋货，那末，失败也可说是报应了。今天如再没有新的改革，亡国之痛，就在眼前。

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先生走上讲台，很激昂感慨地说：民元约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从同盟会到亲亥革命，许多革命志士在国父领导下，流血奋斗，为求得民主的实现。如今民国已三十有三年，还要大家谈提早实现民主，真令人感慨系之。他更激昂的说：民主不容许人不认识清楚，民主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假如还有人不认清民主，就是民主的障碍！挽救危亡，实行民主的具体办法，只有大家人人自己起来担当这实行民主的责任。如果要让别人家来担这责任，那一定行不通。他说：现在打仗第一，而军队一碰即溃，兵源如此成问题，从前尚有壮丁可捆绑，现在连可捆绑的壮丁也没有了，国家闹到如此危险地步，我们看看现在

局面，应该如何努力？我们全国人民如果个个都能拿出主人翁的责任感与精神来奋斗，国家决不会弄到如此地步。我不相信中国真会在世界民主潮流中落伍，我们要坚决起来做主人，不做牛马。我们同志也要想想同盟会的革命精神！（一时掌声四起）

邵力子先生经主席敦请，他表示冯先生已说了，他不准备说话。左舜生先生即宣布大会进入讨论，希望本着原则的二个题目：如何提早实行民主？提早实现民主的具体办法，请大家自由发言。

李璜先生首先起来说话，他说了成都民主运动的情形，并着重指出实行民主的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言论自由，他说政府虽有放宽尺度的决定，但是真正言论自由是要做到除军事秘密外一概不受检查。我们不要这尺度！（鼓掌）第二是身体自由，他说：现在社会死气沉沉，尤其是青年学生在恐怖笼罩下恹恹无生气，象这样的国家是不能生存的。政府虽有保障身体自由的法令，可是若不能把一切非法捕人机关和军法裁判机关取消，一切由司法机关来办理，则人民身体自由决不能实现。言论自由若没有身体自由的保障，就要落空。他说他曾看到某地一乡公所拘押一百余老百姓，被虐待至死。所以他大声疾呼，我们不仅要为知识分子谋身体自由，更要为老百姓求身体解放！再说第三个集会结社自由，他说：若言论与身体有自由，则引申下去，集会结社必然要自由，不然则是不要有组织的人民，今天要动员人民，尤其必须要人民有组织的自由！

左舜生先生这时特意补充了几句话，他说：政府颁布的身体保障法令，应该是有政治意义的，不应该只是条文。要说一般条文那在约法中早已有了，何必多此一举。可是今天，非法捕人，秘密审判的事情，还是多得很！（掌声大起！）

刘子周先生接着发言，他说：现在军事危机日深，我们非有彻底改革，亡国的危险就在目前。我们再不能蹈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的复辙。我们老百姓已成长为有能力担当主人翁的责任，要争取在亡国危险之前，实现民主，才能救中国。

孔庚先生说了一大段话，他说民主的潮流不可侮，就是秦始皇汉高祖明太祖满清皇帝再世，杀人如麻，也不能阻止，中国目前不实行民主，就要亡国！

一个青年起立说话：他大声说我们不服气！今天讲话的老是白发飘萧的老先生，他们为民主奋斗了三四十年，而今还是他们在提倡，这是我们中年人青年人之耻！他引证王云五先生访英回来所记的英国各党派在公园搭台讲演，批评政府，而没有遭到任何干涉为例，说明要实行民主，首先要有言论自由！

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先生走上讲台，慷慨陈词，他说：现在要实行民主，只有靠人民自己起来！他说要提实行民主的具体办法，只有遵行民国十三年国父北上宣言所主张的召开国民会议。中国共产党提出举行国事会议，民主同盟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共同主张召开党派会议，实行联合政权这一条路，这是国内的舆论！国外的舆论则是扩大政府，实行民主，不许任何地方有法西斯存在。我们要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就应该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不要等到亡国以后！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孔副院长在美说参政会就等于美国工会，而今天参政会的职权，根本谈不到是民意机关。我们今天要自己起来，不能等待政府今天颁布一个条例，明天下个命令！寇深祸急，我们不能坐待亡国了！（一阵狂烈掌声淹没了他说话的声音）。

又一青年起立发言，他同意了章先生所说的话，主张应有具体办法来争取实现民主。他说我们应该做全国人民的示范，敌人快打到重庆来了，时机紧急了，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成

立一个促进民主的团体，成立决议，发表宣言，号召人民，为民主和抗战胜利而奋斗。我们应不惜流血牺牲，为抗战的胜利民主的实现而努力！（又是一遍掌声）

又一位青年起立发言，从他的衣着的简单可知是一勤苦的人，发言被感情的激荡所影响，致使听众难以听清其全部内容。他是一个武训的崇拜者，他提出民主的重要，非民主不能救危亡，非民主不能团结，不团结就不能统一。把民主的重要，一再反复说明。最后他提出了意见书，向主席呈递，向主席下跪作揖。

董必武同志起立讲话，他为刚才这青年坦直精诚的真情所感动而语不成声。噙住了两眶热泪，他说政府要求人民的，人民都做到了。一千二百万壮丁，三千万石的粮食，种种捐税都承受了。而人民所要求的言论身体集会结社三种自由，还没有得到。不实现这三种自由，不实现民主，中国就要亡国，但是光有这三种自由，今天还不能得救。今天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机构人事都有毛病，政策是等待胜利的政策，机构是叠床架屋的机构，人事是诚如粮食部长所讲的好人不来的人事。要解决，一定要彻底改革。我们向参政会提出的是召开国事会议和联合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动员起来，团结全国人民，把日寇打出去！（掌声大起）

黄炎培先生说：今天才真正听到了民意，并提议有意见书面送宪政协进会。又说：我们又如小孩子被关在屋里，邻舍已经说我们不卫生，我们应该自己要求走出房了，到花园去游玩！

一位青年起立说：军事形势空前严重，现在不应该是空谈的时候，公车上书的办法也要考虑，我们人民不会说话，是由于几千年长期专制政治下所产生的结果。难道我们真不知道花园美丽吗？我们一定争取言论自由，不应再存害怕的心理！

邓初民先生接着说：今天已不是应否需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中山先生说，民主是人民作主，所有权应属全体人民，不应在个人或一个集团手中。今天的问题，是民主由什么人来实行的问题，抓强盗，不能由强盗来抓强盗。要抗战不能由反对抗战的人来领导抗战。要实行民主，必须要由赞成民主的人来实行民主，决非反对民主的人来实行民主。（掌声）我很为现状忧虑。今天人事机构不改变，则决不能实行民主。要实行民主的办法，蒋主席的提早实施宪政来还政于民是一个方案，林祖涵先生所提开国事会议也是一个方案，左舜生先生主张各党派联合政权也是一个方案，章伯钧先生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也是一个方案。兄弟是国民党员，站在本党立场，我主张实行国父遗教召开国民会议，这是总理遗嘱中所说的。总理的主张，也是各党派各团体的代表会议。要对得起总理，就要召开国民会议。我本人也有点怕，不想讲话。但民主不是怕能得到的。今天不召开国民会议，就不能实行民主，不民主就不能胜利！（掌声）

沈钧儒先生说：国内外形势，盟邦天天胜利，我们节节失败，真令人着急。大家所讲联合政权，国民会议，其实都很平常，容易做的。问题在政府能否接受，如何实行。政府如要表示民主的诚意，只要五分钟就可以使言论自由，承认各党派地位，及释放政治犯三点。他特别提到张学良先生为何不释放？杜重远先生生死不明，以及其他政治犯很多都应立即释放。同时提议组织效昆明成都先例，成立重庆民主促进会，并提议今天发起人及钟天心、司徒德、王昆仑、屈武等先生为筹备人，会场一致鼓掌赞成。

刘清扬主张组织起来，也赞成开国民会议，以争取民主。随后刘子周、胡子婴等人相继发言，此刻已到六时，已不允延长下去，主席宣告散会。散会以前，正当阳光从乌云的包围中照射到会场上，散着万条金光，这象征着光明是有望的。

（原载1944年10月17日《解放日报》）

［附］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

一　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理军队，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

一、改善官兵之生活待遇；

二、实行精兵政策；改善装备，加强训练，并提高军官教育之水准；

三、排除派系及地方观念，以军事能力与作战成绩为选任与升降军官之准则；

四、淘汰抗战以来作战不力之将领；

五、划清军政、军令、参谋以及前线作战指挥之权责；

六、根据民主动员之原则，彻底改革现行兵役办法；

七、加强沦陷区之行政组织，并发展人民之抗敌活动；

八、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

九、尽量发展本国军需工业，以求达对武器自给之目的。

二　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一、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

二、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之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妨害上列自由权利之法令与条例；

三、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

四、迅速筹备实施宪政，立即召集全国宪法会议，制颁宪法；

五、在宪法颁布前，付予国民参政会以各民主国家议会具有之主要职权，并扩大省市参议会之职权；

六、充实一切地方自治基层组织，普遍实行民选；

七、废除特务及劳动营等类组织；

八、简化政府机构，分明权责；

九、本公平原则，按照生活指数，改善公务员待遇，并厉行裁汰冗员，严惩贪污；

十、对于战时战后之受灾人民，统筹切实救济。

三　确立亲睦之外交政策，加强对英、美、苏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并把握当前之胜利，奠定世界永久之和平

一、促进中苏邦交，以期实现英、美、苏、中四国之团结；

二、严整外交阵容，淘汰不称职之外交官吏，尤应注重驻各重要盟邦之外交人选；

三、加强国民外交，并分别组织文化经济等国间立场之国际访问，以期增进了解，加强亲善；

四、此次战争结束之媾和条约，以及参加战后一切和平机构之提案与人选，政府必须交由民意机关予以正式通过；

五、关于运用外资，以及一切经济或工业之协定，政府必须征求民意机关之同意。

四　确立战时经济，财政之合理机构与政策，以期对内对外树立政府与国家之信誉，并奠定和平建设之坚实基础

一、财政绝对公开：国家之预算、决算，须交民意机关审核通过；

二、关于增加租税，募集公债，以及带有强迫性之储蓄等事项，必须征求民意机关之同意；

三、根据公平原则，调整一切税法，并整饬税收机关与人员，简化收税手续，以免除苛扰，根绝贪污；

四、成立币制委员会，力谋稳定币值，并整理流行全国之一切通货；

五、成立调整物价委员会，以研究调查一切生产、分配、运输、专卖以及合作、工贷、农贷等实际情况，以为平抑物价之张本；

六、制止少数人之奢侈，停止滥费，及一切与战争无关之兴作。

五　彻底革新目前之教育文化政策，保证思想、学术之自由发展，并迅速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准

一、立即停止党化教育；

二、保障讲学自由及从事教育职业自由；

三、保障学生读书，阅报之自由，不得根据党见，加以取缔；

四、保障教职员生活之安定，并注意改善学生之营养；

五、立即停止学校内之特务活动。

（选自《民主同盟文献》）

[附] 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

最近欧洲情势虽小有变化，但不问德军如何挣扎，德国之无条件屈服，及欧洲整个问题的澄清，要必于本年内告一段落。

美军吕宋登陆，已大告成功，菲律宾的完全解放，当为时已近。继菲岛以后，或即为美军之在华登陆，早则本年春夏之交，至迟亦不至延到今年的夏季以后。

美军一旦在华登岸，必以大量陆军源源开到中国，此时不问欧洲问题是否已完全解决，苏联对于远东，要并一反其过去沉默的态度，而突趋积极。英国在缅甸至香港一线，此时将大事活跃，固不待论，即法国亦必以相当力量，与英军配合，以图恢复安南。

敌人为应付上举情势以图死里求生起见，其重视津浦粤汉两线以东，当不在重视两线以西之下，其在中国境内的陆军力量，必远较过去加强。

凡此外在的形势，均促使中国不能不团结统一，否则即不能发动一切人力物力，与美苏英法诸盟邦夹攻，以收将敌人全部击溃之效。

就内在的形势而论，自河南湖南广西相继沦陷，人民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牺牲之大，死亡之多，为抗战以来所无，于是后方各地自卫自救的活动，已渐渐奋起。国共关系，自去年正月双方代表在西安谈话以来，已历时半年以上，且中经友邦有力人士多方撮合，但至今仍无成就可言，甚至我们认为比较轻而易举之事，如释放政治犯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亦未彻底一办。目前全国要求民主之声，自各党派以迄文化界工商界，自国民党外以迄国民党内，已逐渐趋于一致，然当局则迄无有效办法之表示。

本年元旦，蒋主席发表新年文告，谓："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确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最近国民党中常会，更有本年五月五日召开六全代表大会的决议，其主要工作，闻即在讨论如何召集国民大会。假定能召开一举国一致而又确能解决当前一切实际问题的国民大会，吾人在原则上自亦赞成之，但目前事实上乃绝少办到的希望。如仅仅将二十五六年所选出之一部分代表，再就无法选举之若干省分指派若干，以足一千四百四十名之额，更益以数百名国民党中委及候补中委为当然代表，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国共遵之宪法，以此而居然"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认为必将适得其反。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已有四年之历史，其一贯的职志，即在突破一切军事与政治之难关，为中国实现民主团结，一以收抗战之全功，一以确立建国的基础。自去年九月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并于双十节公布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三十六条，举其重点，则有如以下之十项：

（一）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

（二）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并筹备正式国民大会之召开，及宪法

之制定；

（三）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之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妨害上列自由权利之法令条例；

（四）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并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废除特务及劳动营一类纯粹法西斯之组织；

（六）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

（七）财政绝对公开，凡预算决算及增加人民负担之措施，必须交由现有民意机关审查通过；

（八）保障人民之最低生活，改善士兵及公务人员之待遇，对战时战后之受灾人民，尤应统筹救济；

（九）立即停止党化教育，保障讲学自由及从事教育职业之自由；

（十）促进中苏邦交，加强对英美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

吾人提出上列各项主张，为时已历四月，但对目前情势，仍完全适用。吾人以为在战争未结束以前，必须将此项过渡办法切实做到，中国始有实现民主宪政之可能，否则借延宕以资敷衍，弄名词以布观听，则不惟当前一切困难问题无从解决，整个国家民族且有陷于分裂破碎之虞。为国民党计，与其空谈"还政于民"，何如实行与民合作以免自误误国之为愈也。邦人君子，幸共图之。

（选自《民主同盟文献》）

［附］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二日）

中国到了今天，更迫切的需要实行团结，实现民主了。以整个的国际局势来说，盟国大军，东西夹击德国，乘胜直驱柏林，欧洲战事，短期即可结束。在太平洋方面，跟着菲律宾的解放，琉璜岛的占领，空前强大的美国海空军，行将掩护空前强大的美国陆军，或直捣日寇本土，或在中国沿海登陆，以清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这一举是决定盟国在远东战场上军事胜利的关键。同时，本年四月廿五日，中美苏英将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依照敦巴顿橡树林会议及克里米亚会议建议的方针，树立世界永久和平制度。这一举又是决定同盟国家"和平胜利"的关键。

以上这些重大事件，无疑的是中华民国抗战建国成败的大关键，这些重大事件无疑的将决定中华民族今后生死存亡的命运。

我们眼看着盟国迎接全面胜利，并着手奠定世界永久和平，回顾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国家今日所处的环境，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空前的危机！在短短的一年内，敌军如入无

人之境，由郑州而洛阳，而长沙，而衡阳，而桂林，而柳州，而曲江，而赣州，一连串的军事溃败，沦丧好几省国土，损失无量数物质，使万万人民流离失所，颠沛死亡。不止如此，最近日寇又在湘桂积极增兵，并在安南解除法军及安南军武装，夺取全部安南，以为在大陆上临死挣扎的军事布置。日寇此种行为，更使我国托身寄命的西南一隅，若昆明成都重庆等重要城市，遭受威胁，而国命的存亡断续，更将不堪设想了！

在这样严重的局面下政府当局竟没有警惕悔悟的表示。独裁专制，贪污成风，这依然是中国的政治；富人的黄金让它安全存储国外，政府完全靠苛捐杂税与恶性通货膨胀过日子，这依然是中国的财政；借党化之名，行奴化之实，这依然是中国的教育；诚不足以结友，量不足以容人，这依然是中国的外交。最近所谓革新行政，改进人事，也只是对调几个部长，变更几个官衔，旧瓶还装旧酒，原汤仍熬原药，这不止使国人痛心，并且使盟友失望。

盟国正在迎接胜利与和平的时候，中国政府却在坐误时机，自毁前途。大家平心问问，造成这样严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每一个愿意尊重事实的人，都知道正确的答案，那就是，国民党内的少数分子要继续维持权位，所以他们不惜抹煞全国民意，拒绝实行民主，对于全国人民一致呼吁的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废除特务制度与集中营等组织，释放政治犯，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并与全国各党派开诚合作共挽危局等等要求，始终不肯接纳。最近国共谈判又宣告破裂，团结一线希望，复被断送。谁能否认我们的政府是在拒绝 抗战胜利！

三月一日蒋主席为解释不能团结的原因，发表了一篇演说，允诺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行宪政。这实际只是蒙蔽国际视听，拖延国内民主的技术。谁都知道，宪法是十年前一党包办的草案，国民代表是十年前一党包办的选举。试问以这样的代表，通过这样的宪法，再来选举大总统，产生新政府，这样的民主有真实的意义吗？试问这样迂回迁延的方式，能够挽救当前千钧一发的危局吗？其实国人呼吁的各党派会议及联合政府，只是目前团结合作的方案，谓如是而后共商政策政纲，如是而后共负抗建责任，如是而后实施宪政，实行民主。目前的团结合作，并无移交政权于各党派，还政于民之说，而蒋主席必斤斤以此辩白于天下，这倘不是搪塞粉饰之词，那就是固执一党独裁的成见了。

迩来重庆成都各界人士又一致起来发表签名宣言，提出具体主张，呼吁民主团结，——用民主的精神实行团结，用团结的国家实现民主，义正辞严，举国同声。我们昆明文化界人士，自知不能推卸国民一分子的责任，不忍坐视国家前途的毁灭，民族生命的沦亡，因此，根据我们共同的信念，坦白提出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以为前趋者之应，以为首倡者之和。我们的主张是：

一、政府应立即邀约全国各在野党如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自推选的代表，而后会同各政党代表共同推定社会上无党无派各界进步人士，共同举行国是会议，决定战时的政治纲领，并重行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筹备召集真能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以通过宪法，实行宪政。

二、国是会议为战时过渡的最高民意机关，由该会议产生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以执行战时政治纲领，并共同负担 抗战及参预一切国际会议，奠定世界和平的责任。

三、现政府应立即宣布解散特务组织，取消言论出版登记检查制度，释放全国政治犯，切实保障人民身体，思想，言论，出版，演剧，集合，结社，居住，旅行，通信等自由。

四、彻底改组国家最高统帅部，使统帅部成为超党派的国家机构，以统一全国军事指

挥，集中全国军事力量，以便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消灭日寇，争取抗战胜利，并保障在民主政治基础上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

丁力等三百四十二人

（原载1945年5月11日《解放日报》）

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元旦广播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

［新华社延安三日电］延安权威人士发表对于蒋介石元旦广播的评论。该评论称：蒋介石在其广播中开始说：抗战“八年以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由于国民党失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危机之深刻性。对于陷国家于如此危境的原因，蒋氏要求“全国上下”“彻底的反省和一致的觉悟”。可是蒋氏本人却既无反省，又不觉悟。蒋氏说：“过去这种弱点和错误的存在，政府与社会都有其责任。就政府来说，一方面是战时行政不够积极，不能彻底。另一方面是顾恤人民的困难，不愿增加人民的负担，……结果影响了战斗精神，影响了军纪、风纪，最后影响了军事。”在蒋氏统治的区域内，人民负担占收人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时候，蒋氏竟说什么“不愿增加人民负担”，确实要有很厚的脸皮才说得出口。蒋氏不但不肯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反而将责任推委给“社会”，就这一点来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痛恨蒋氏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达到了空前高度，怒骂指责，无日无之。为了平抑众怒，蒋氏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对于他的政府工作，说了“不够”二字。但随即抬出一个“社会”，说什么“社会”也“有其责任”，藉以欺骗那些政治水平不高的人们。但是“社会”里一切受蒋氏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民，已经逐渐清醒起来，他们知道受压迫的人民是不能担负这种责任的，唯一应负责任的是蒋氏及其一群的寡头专政、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路线。既然政府的责任只是一个工作做得“不够”，而且还有“顾恤人民困难”的深恩厚泽，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万岁万万岁。可是蒋氏觉得不然，他又在其广播中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岂不有些奇怪?但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最近几个月来形成的极其紧张的政治形势，迫着蒋氏将其早已发出的不兑现纸币，填上一个似乎不很久就有希望的实无日期的日期。可是蒋氏这一声明，决不会有什么积极影响，因为他的这种声明，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毫无记性这一点上。可是中国人民是有记性的，他们记得国民党政府开过很多支票。请看“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为宪政开始日期”，“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开国民大会，开始宪政”，“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国民大会”，“至迟要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限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抗战结束后一年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蒋介石先生，我们要问你：你的票子不是早已填上了许多确定兑现的日期吗？第一张，“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第二张，“民国二十四年四月”，第三张，“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均在“七七”抗战以前，那时并无“军事紧张，民国大会的召集，事实上陷于困难”的情形，何以一次也不兑现？抗战

七年半，不论那一年均比现在的“军事紧张”情形要好些，何以不兑现？你现在开的一张，又答应在“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的时候”，请问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不改变，你的“军事形势”能够稳定么？“俟我们反攻基础确立……的时候”，请问在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之下，你的“反攻基础”能够“确立”么？“俟我们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请问何时“更有把握”？你不是历来都说“绝对有把握”么？何以现在忽然觉得缺少把握了呢？你一向压迫人民，垄断抗战，妄自奠大，为所欲为，到了一九四五年元旦，忽以缺乏把握宣告于世，请问你及你的一群，该当何罪？还有什么资格来谈国民大会？孙中山还在一九二五年的临终遗嘱上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你违背孙中山,从人民手里篡夺政权，建立你的血腥寡头专政，人民不赞成，基础不稳，你就三番五次以召开国民大会空言骗人，过去还有确定日期，现在日期也没有了，抗战胜利的把握也没有了，请问该当何罪？就拿你的话来说吧，在抗战期内召开国民大会，请问是战前贿选出来而在战后大部投汪附逆了的那个“国民大会”，还是重新选举的呢？如果是前者，谁要那个不但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而且烂了的“国民大会”呢？如果是后者，如何选法？谁来执行？谁来监督？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袁世凯开过洪宪国会，曹锟开过猪仔国会，难道到了今天还有什么独夫民贼胆敢召开什么蒋家国民大会、或猪仔国民大会么？延安权威人士于揭破蒋氏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耻欺骗之后，结语称：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属望的立即建立联合政府，蒋氏搬出了挡箭牌。可是蒋氏及其一群的所谓“国民大会”，早已臭名远播，不搬还可藏拙，搬出一次就会臭气大发一次。孟子说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是个美人，蒙了不洁，人皆掩鼻。一个独夫浑身浸在粪缸里，怎能叫中国人民不掩着鼻子开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粪。

（原载1945年1月4日《解放日报》）

新华社记者评蒋介石演讲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

［新华社延安二日电］新华社记者评论蒋介石三月一日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讲。新华社记者称：蒋氏这个演讲鲜明地反映了国民党内最反动集团的立场和企图。这一集团，坚持寡头独裁及其法西斯主义、失败主义的政治军事政策，反对联合政府，反对民主与人民，阴谋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与取消中国解放区。这一反动集团是助长敌人的侵略，造成目前国民党区域军事政治经济严重危机的负责者。蒋氏此次演说，不过是又一次充当这个极端反动集团的代言人而已。统观全篇演说，其要旨不外：一、坚持党治，严拒民主的联合政府；二、曲解国共谈判经过，诬蔑中国共产党；三、玩弄所谓“还政于民”与“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聊戏法，保持其法西斯独裁。

关于第一点，蒋氏声称：“共产党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而我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及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于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与理论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这是蒋氏坚持寡头专政，拒绝联合政府的鲜明表示。也好，与其如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王世杰氏那样的含糊吞吐，还不如蒋氏这样一掌推开，使人感觉其立场的清楚明确。蒋氏用以拒绝联合政府的“论据”，除了所谓建国大纲之外，尚有：“如将政权与责任移交各党各派，则中央政府必日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结果必使抗战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怕变乱”，“因为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国民政府之基础，是革命先烈与抗战军民无量数生命鲜血的牺牲所构成的……有不容放弃的责任……决不能以国事为儿戏”等项。所有这一切，明眼人一看，都会知道不过是专制主义者的一篇低级遁辞，本来不值一驳。但是蒋氏既然那么像煞有介事的津津乐道，我们也就不能默尔而息了。

我们首先要问：所谓不能违反建国大纲一说，是那一条法律定下来的？建国大纲只不过是孙中山先生早年的一种对建国程序的设想，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孙中山晚年自己就已修改了这种程序。民国十三年孙先生北上时，主张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的国民会议，解决国事。孙先生临终时，又在其遗嘱上谆谆嘱咐：“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必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他的不肖子孙，背叛遗嘱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及其首领蒋介石，却在孙先生死后二十年的今天，还是背着孙先生自己修改了的那篇所谓建国大纲，当作维持自己独夫统治的护身符，岂不令人笑脱牙齿？按照孙先生遗嘱，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战胜日本侵略者，然后由联合政府主持，在全部国土上实行无拘无束的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岂不正适合今天的需要？所谓组织联合政府将招致抗战失败国家紊乱

一说，请问何以见得？十八年来中国并无联合政府，只有蒋介石的独夫统治，难道抗战还未失败，国家还未紊乱么？远的姑且不说，即如去年河南战役以来的事实：几个月内，就使敌寇打通了大陆交通线，百万军队望风而逃，豫、鄂、湘、桂、赣、粤诸省，一万万同胞沦陷敌手，难道不算是抗战失败，反而算是抗战胜利么？特务横行，贪污猖獗，工商破产，民怨沸腾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难道不算是国家紊乱，反而算是国家上了轨道么？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及很多无党无派人士之所以提出立即废止一党专政，组织民主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中央政府，难道不正是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为了要挽救由于蒋介石独夫统治所造成的这种抗战失败和国家紊乱的可怕现象么？中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独夫统治，一刻也不愿意它继续下去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可能还让蒋介石在这个政府中占上一席，让其痛改前非，将功赎罪以观后效。但是十八年来，尤其是抗战八年来把中国引导到如此水深火热的危境的这个独夫统治，必须立即结束，中国人民是具有了这种坚决意志的。所谓"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中国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的负责团体"，这项论据，也属荒谬可笑。为什么十八年来只有独夫统治，没有人民代表机关？这是谁的责任？我们的独夫将一切人民的自由权利剥夺干净，于今连党派会议也不愿召开，但是他却愿意在今年十一月召开他那个拖延了八年不愿召开的猪仔国民大会。岂不是因为只要不是猪仔，便是最容易开的党派会议也决不愿意"征询"一下，惟有猪仔才愿"征询"么？我的政权是流血得来的云云，这不是论据，只是一套流氓腔调。视国家为私财，以国事为儿戏，正是独夫的观点。综观蒋氏拒绝联合政府的各项"论据"，纯是一片遁辞。其真正理由，乃是反映蒋氏及国民党内的最反动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利害，坚持其一人一派的私利。只有这一点是真的，其他都不过说说骗人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一主张，提出来还不过短短几个月，现在已轰动国内外，成了广大人民的主张，使得蒋介石不能不抛头露面，表示正面拒绝的态度。

关于国共谈判毫无结果的原因，新华社记者称：蒋氏委责于中共的企图是失败了。蒋氏力说他的"宽大"和"尽量替共产党着想"。但是他到底是怎样个"宽大"和怎样个"替共产党着想"呢？

蒋氏说："政府在行政院内设置战时政务会议，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构，将使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人士参加。"但是所谓行政院战时政务会议，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是没有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的"伴食机关，是粉饰独夫统治的花瓶，共产党及其他政党若果参加了这种机关，无异于帮助法西斯主义者、失败主义者来欺蒙人民，阻碍抗战胜利。蒋氏既说："容纳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有志之士参加"，但是他同时又说："在宪政实施之日起，各政党均有合法的平等地位。"这里蒋氏在自己打嘴。照这样说，在蒋氏的"国民大会"未开以前，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是没有合法地位的，你要各党各派以不合法的地位去参加所谓战时政务会议，还说"实在没有不可接受的道理"，试问这样的话，除了蒋氏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还有什么人说得出来的么？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一致拒绝了蒋氏这个无聊提议，难道有什么丝毫不对的么？

蒋氏说："政府并准备组织一个三人委员会管理整编共产党军队为国军的一切事宜，三委员中，一位代表政府，一位代表共产党，一位是美军军官"。蒋氏又说："可将共产党军队在最高统帅节制之下，指派一个美国将官直接统率。"在这里蒋介石神经错乱，讲疯话了，

如果不是疯话，那就应该说：组织一个人民的委员会，管理与整编蒋介石所统率的那些压迫人民与经常打败仗的军队。蒋介石指挥无能，应予撤职查办，由人民组织的委员会指派一个在抗战中立了功勋的中国将官去代替他。此外，给予八路军新四军以崇高的褒奖，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奋战敌后，抗击了多数的敌伪，收复了广大的国土，解放了众多的人民。只有这样，才算公道。我们不愿请出外国人来压迫异已，仅仅提出中华民族赏功罚罪的民族纪律，中国人民定会一致赞成的。

蒋介石说：在国共商谈中，“我们所得到的经验，都是一个要求方才容纳，立刻就来一个另外新的要求。”蒋氏的疯话是这样无穷无尽的。不是吗？从一九四三年林彪同志赴渝，一九四四年林祖涵同志赴渝，同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偕同赫尔利将军赴渝，今年一月周恩来同志再度赴渝，中国共产党所提出一切建议，蒋氏曾经“容纳”了那一件呢？即如最轻而易举的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取消镇压人民的反动法令，撤消封锁，承认解放区等等，你在何时“容纳”了呢？

关于蒋氏所谓“还政于民”及“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宪政”一节，新华社记者称之为在政治上走死路。独夫蒋介石及国民党内最反动的专制主义者们，现在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他们不从顺从民意，废止独夫统治，成立联合政府求出路，却想找寻一件民主的外衣，来包裹其反革命法西斯的躯壳，这就是所谓“还政于民”与“召开国民大会”的实质。

我们的独夫现已穷极无聊，在政治上钻牛角，竟然钻到袁世凯的洪宪国会和曹锟的猪仔议会那里去了。好吧，我们共产党人代表中国人民向蒋氏劝告，叫他不要如此自寻死路也算仁至义尽了，你一定要钻进牛角尖里去，就让你钻去罢。只是一件，要提醒你：在你钻进去出不来时，不要妄想什么人再给你解救，因为这是任何人也解救不了的。袁世凯做皇帝之前，也曾有人劝过他不要如此，他一定不听，做了八十三天皇帝之后，留下了一场“新华春梦”，给中国历史添上个无足轻重的插曲，做了个“一双空手见阎王”的枉死鬼。现在有想追他踪迹的，尽可追上去罢。

新华社记者结语称：综观蒋氏演说，最清楚地暴露了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立场与企图。此种立场与企图，与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所自由表达的意见，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目前的国共谈判，早已不是商谈两党之间个别悬案的问题，而是解决着国家民族生命所系的迫切的政治问题。共产党在谈判中所提的要求，不仅是中国解放区九千万人民的要求，而且是中国沦陷区人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共同要求，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言，海外侨胞的通电及其他无数文件，足资作证。就是在国民党内，亦有数量众多的爱国之士对共产党的主张，深抱同感。现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深闭固拒，谈判不得结果，这是全国人民的不幸，也是国民党的不幸。蒋氏声称：“政府仍将继续寻求合理的办法”，似乎尚有转园余地。果然如此，中共是不会拒绝的。但是所谓“合理办法”，实在无需再去寻求，这就是立即废止这个威信扫地的一党专政，成立一个有威信的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来领导抗战，争取胜利，并准备在战后召集真正由无拘束的自由选举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民主的正式政府。我们希望蒋介石不要再要什么花枪，要就照着这个主张去做，要就走你自己的路。我们的立场是坚定而清楚的，任何花言巧语，欺骗恐吓，江湖流氓，借外人以压同胞，逞武力以图异己等等下流无耻行为，让那些下流人物自由自在地去干罢，要想吹动别人一根毫毛，那是没有希望的。

（原载1945年3月3日《解放日报》）

［附］在宪政促进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蒋　介　石

各位先生：中国国民党继承国父遗志，努力国民革命，以实行宪政，完成建国为最大目标。七七抗战发生以前，政府原决定于廿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不意日寇发动侵略，因此不能不延期召集；但国民党实施宪政之意愿，依然日益加强。第六次中央全会仍决议廿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终以战事扩大，当时参政会同人主张缓开，乃又因而延期。于是在前年有宪政实施协进会之设立。本席于本年元旦，复代表政府宣布本年内在军事形势许可之下，则可召集国民大会，制颁宪法，以符国民党建立民国还政于民之宗旨。

就中国国民党既往的历史观察，以实行三民主义，领导国民自求解放，以达到国内各宗族及国际之自由平等为目的。辛亥以来，本党领导国民，推翻满清专制政府，消灭阴谋帝制之袁世凯，以及打倒继续袁世凯而兴起的一切军阀，及至民国十七年，中华民国完成统一；最近八年以来，不避任何牺牲，备历险阻艰难，领导全国，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时并积极准备实施宪政的工作。凡此事实，均明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以解放中国，扶植民权，为其历史使命的革命政党。

我们要在这一次神圣抗战中，完成一个永久统一的国家，惟有统一的国家，才能顺利的推行宪政；亦惟有统一的国家，才能顺利推行各种经济建设工作，以提高我一般辛劳勤苦同胞的生活水准。而且更惟有统一的国家，才能站在新世界中，为人类和平福祉而有所贡献。我们在日寇开始侵略以前，本是一个完整的统一国家，到现在除了共产党与他们的军队不受中央命令而外，还是一个完整统一国家；此外，并没有不奉中央军令的军队，亦并没有不奉中央政令的地方政府。

本席迭次宣示，中国共产党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近来外面对于中央竭诚宽容力谋解决的经过，尚有未明者，因此不得不将重要的经过，加以说明。

这几年来，中央与共产党的会商，已有多次，每次均是悬而不决。而在我们所得到的经验，都是一个要求方才容纳，立刻就来另外一个新的要求。共产党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组织的联合政府，而在我们的政府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与全国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的决定权，移交给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理论与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政府并又曾请中共参加行政院决定政策的政务会议，类如外国的战时内阁之组织。

八年来，在抗战的进行中，国家屡遭军事上的失利与经济上的压迫。我们所以能渡过危

机，实由于我们有一个巩固安定而负责的政府领导着的缘故。现在战事仍极严重，前途尚有不少的艰险，国民政府如将一切政权或责任交给于各党各派，则中央政权势必日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结果必使抗战崩溃革命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怖的变乱，而陷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国便无一个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所以吾人能只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他联合政府。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之基础，是革命先烈与抗战军民无数生命鲜血的牺牲所构成的，吾人上对国父与先烈，下对后世民族与抗战军民都有不容放弃的责任，在此紧要关头，更必须负责到底，以巩固国家基础，决不以国事为儿戏，使抗战大业功败垂成，以辜负国民与友邦的期望。

我国自民国廿年九一八东三省被日寇侵略以来，此十余年无日不在危疑振撼，狂风暴雨的危舟中进行，中国国民党已负起了伟大艰难领导全国的责任。所谓还政于民，就是交付这样巨大的责任于全体人民，故必须经过国民大会的这个机构，始可有所托付。但在目前状况之下，亦准备其他党派参加政府的组织。

其次，说到军权统一问题。凡是一个独立统一国家决没有军权不统一的，尤其是对外抵抗侵略的时候。如果是真正爱国爱民的政党决不会有妨碍军权的统一，以削弱国家抗战力量，而帮助了敌人的侵略。我们在抗战时期中应集中一切力量，驱逐敌人，所以必要军权统一。共产党不应有独立的军队，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现在共产党在各国的宣传，说是他们的军队，如果一旦归中央统一，便不免要被消灭或被歧视；而在国外亦不免有未明事实的人，受这种宣传的蛊惑，甚至夸张共产党的军队力量，与事实真不符合，有时且与他们所宣传的几乎完全相反。抗战以来，八年之中，始终负作战责任的，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政府所统率的国军，现在已有盟国通力合作，政府已准备极强大的军队与配备，以进行反攻，并配合盟军共同作战，以驱日寇于亚洲大陆之外。

本席对于共产党的要求，已曾明白答复，最近政府曾对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说：政府准备在行政院内设置战时政务会议，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关，将使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人士参加，政府并准备组织一个三人委员会，办理整编共产党军队为国军一切事宜。三个委员中，一位代表政府，一位代表共产党，一位是美国军官，如果美国政府同意，固然最好，即美国政府不能同意派人，我政府亦必用其他适当方法，担保共产党军队整编后的安全，及与其他国军享受同等待遇。

此外，本席还提出一种办法，以为共产党对于其军队的整编，既不免有无端的疑虑，政府愿意在抗战期中，如美国政府同意时，可将共产党军队，在最高统帅节制之下，指定一个美国将官直接统率。不意上面这两种提议，皆已遭受共产党拒绝。所以共产党如果真心诚意愿与国军及盟军联合作战，在政府实已将公允可能的方法坦白诚意的提出了。

抑又有须申述者，自从上年十一月中央与共产党开始会商以来，中央深信各方意见有争执时，果为诚意谋取解决，便不应互相攻讦。因此竭力劝告国内舆论，不应有攻击共产党的论调。乃不意共产党即借此商谈机会，在国内外广事宣传，并且对政府及国民党肆意抨击。因之国内外人士所听闻者，只为共产党片面之词，且在双方会商之时，竟造作各种极可笑的流言，如谓政府已在同日寇洽商和平等语。本席在代表国家的人格与地位，认为此种诬蔑之言，实在不值一驳。

凡我国人，莫不关心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未来之前途，亦莫不深明其本人对于其后世继起

者应尽的责任，决不愿重视国家发生内战，亦必能深悉政府历年来委曲求全的事实，准备随时与共产党商筹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政府所提出的办法，如此宽大，也已尽量替共产党着想了。如果共产党真正为国为民，有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决定，而并无推倒国民政府，破坏抗战，以谋夺政权的企图，对于政府的提议，实在没有不可以接受的道理。政府嗣后仍将继续寻求合理的办法，以期共产党与其军队均能贡献能力，竭诚效忠国家。

本席所以不厌求详，反复说明中共问题者，实在因为中共问题悬而不决，是目前抗战与一切建设障碍。至于实施宪政问题，政策得以下列步骤，促其早日实施。

（1）预定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国父八十诞辰召集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一俟五月间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即可正式决定公布）。

（2）自实施宪政之日起，各政党均有合法的平等地位（政府前经向中央宣示，只须共产党愿将其军队及地方政府的组织交归政府，即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此项宣示，仍为有效）。

（3）国民参政会将于近期内举行第四届集会，此届参政员人数及参政会职权，均较以前增大。政府拟在此届参政会集会时，将召集国民大会办法，及其他宪政问题，提出参政会审议。

本席对于抗战的胜利，与吾国民主政治的前途，均甚乐观，日益增强，此种舆论，为全国民心所向，将成为伟大澎湃而不可抑止之力量。深信全国任何团体，任何个人，终必遵循这种舆论的要求，共谋抗战胜利与建设成功之实现。我们宪政实施协进会员有促成宪政，以巩固国家统一与永久福利之责任，故特为各位先生郑重言之。

新华社评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华社延安29日电**〕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5月5日在重庆开幕，21日闭幕。这次大会虽然开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团结、加强对日作战、反对内战危机的时候，开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已将全国人民的要求加以总结和宣布的时候，但是它对于希望国民党有所改进的国民党员与国内外人士，所给予的却是失望。国民党的大会在该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这是在全国实现团结统一，保障国内和平与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最小的民主改革的必要前提）；决定仍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决定坚持独裁的反人民的“统一”，“绝对禁止违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军事、财政、交通、币制上有任何破坏统一之设施与行动”；对于国共谈判，决定“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也就是说，准备随时以所谓“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帽子戴在共产党头上，一切问题实行武力解决。国民党的大会，既然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违反了人民的意志，它对于目前的局势就不但不能澄清和改进，而且更正式地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已经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这样，这次大会所作出的一切“民主”的姿态就只能成为一种显然的伪善。蒋介石向大会提出：“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在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与各省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正式民意机关；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本党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于本届代表大会休会后，陆续移归政府办理。”这就是说：国民党当局决定如同把他的政权交给他所制造的国民大会一样，把他的军队青年团及其他行政工作（包括他的特务工作）交给实质上毫无变更的国民党政府；使他所制造的各省县市参议会由临时变为正式；其他政党凡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合法，不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非法。并且所谓撤消军队的党部实质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加强国民党法西斯组织控制军队，这等于在1938年蒋介石宣布废除小组织，但是实际上是加强了ＣＣ团、复兴社等法西斯小组织。国民党的这次大会吸收了几乎所有高级军官为中央委员，便是一个明证。国民党统治集团现在实际上是把国民党的各种反民主的活动“国家化”，所以蒋介石的开幕词也说，“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责任不但不因之减轻，而无宁更为加重”。总之，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而这就叫做“民主”，并且不许不叫做“民主”，反对的就是“破坏统一”，就是“妨碍抗战危害国家”，就不合于“政治结社法”。国民党的大会此外还通过了很多很多“民主”的宣言和决议，在这些文件里，国民党当局对于人民的迫切而易行的要求如减租减息、救济民营工业等等不作明白的规定，却高谈其所谓都市土地的公有，集体农场，消灭剥削，党与国家的超阶级，甚至决定“抑制遗传缺憾分子之生育”、“调剂两性比例”等等，而其中心只是在实际上为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垄断兼并开辟更多的门路，这是政治上反民主的必然结果。因

此，国民党大会的许多漂亮文件只是引起广泛的厌倦与怀疑。合众社24日的重庆电讯说："此间独立的和自由派的中国报纸一般的论题是提醒过去漂亮的决议案和诺言太多，而兑现得太少了。"它转述国民公报的社论称："过去二十年来国民党威信日降，可以归之于这样的事实，即它没有按照它的话去做。"它又转述素来为国民党政府说话的大公报的意见："宣言和决议案无论怎么样，除非他们立即见诸行动，他们就会经常停留在一纸诺言上的。不仅如此，全国的统一和团结，是全国最根本的也是国民党当前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如果能够办到，则一切就将自动解决；如果不可能办到，那末，整个八年武装抵抗所作的牺牲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国民党的宣言没有充分规定这一点。"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成就，就是如此。

必须指出，国民党的大会是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之下进行的：虽然大会的代表实际上出于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指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在各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情绪与改革要求，但是这些人的意见一般地不可能在被操纵的大会上通过。例如对于国民大会问题，据中央社宣称，代表们即曾提出"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确定重新推选国民大会代表，以便实施宪政案"，"请修正国民大会选举法以应需要案"，"请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案"等等，但是一切这些重大问题国民党的大会都只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会慎重研讨之"一句话而不加解决，可是开会的日期却又以"应依照总裁宣示"一句话而解决了。同样，虽然这次大会是为狂热反共与准备内战的反动集团所支配，但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影响着大会的代表，反动集团终于未敢公开作出反共内战的决议，而只以"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种暧昧的阴谋家的词令来作内战的伏笔。国民党大会所通过的若干漂亮决议，虽然只是内战阴谋的装饰品，但是仍然反映了广大人民和国民党员对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本家统治在实际上太不漂亮的愤懑反抗，与他们对于共产党所实行的，其他民主党派所主张的民主纲领的同情响慕。国民党大会恢复该党第一次大会承认少数民族的宣言，这是纠正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错误。大会又通过没收或"征用征借"中国在美各银行的冻结存款，这也多少表示了对于蒋孔宋金融寡头及其他大存户的不满情绪。大会要求"提高各级党部工作人员素质，特别注重其经历，人格，学识与革命性"，这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集团是使用着一批怎样的爪牙，而蒋介石本人关于撤消军队学校中党部的提议，更自己答复了国民党的统治到底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的问题。但是军队学校的国民党党部既然应该撤消，政府中的国民党独裁为什么反而不应该撤消呢？不但这个问题蒋介石不能答复，其他许多在大会上提出的问题蒋介石也不能答复。在9、10两日的国民党大会上，质问的人数达一百几十人，问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准备反攻、澄清吏治、改善役政、改善士兵公教人员生活，花纱布管制局业务失职案，黄金涨价消息泄露案，等等问题，而质问的结果乃是蒋介石的一顿大骂，用中央社的说法则是"总裁莅会致训，勖勉各代表多提供根本问题而有建设性意见"。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党外的独裁同样也实行于党内，这甚至在细节上都表现出来。国民党这次大会的主席团与新的多至四百六十名的中央执监委员会，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因为大会主席团的职权是"于总裁不出席大会时轮流主持大会"，大会后的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职权比这当然要更小而且要宣誓"服从总裁命令"。蒋介石虽然要大会"全体一致起立"（而不是无记名投票）"选举"他继续做总裁，但在大会选举以前的开会期间，他的总裁职务却始终没有停止，这种"选举"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国民党大会的路线既然是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而这种路线又不仅违反全世界潮流和全国人民公意，并且也违反多数国民党员的意见，那么，这个路线与其支持者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民将丝毫不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恐吓、欺骗和摧残所动摇。中国人民将继续以一切力量，为争取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团结、加强对日作战，反对内战阴谋，为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战斗到底。

（原载1945年5月30日《解放日报》）

[附]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反共问题的两个决议

一　对外发表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

大会听取中央关于中共问题之总报告，深以中央以往所采政治解决之方针为适当。本党领导全国军民艰苦抗战，无时不尽力于团结御侮，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中共在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亦曾有四项诺言之宣告。虽频年以来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而本党始终宽大容忍，委曲求全，其苦心已为中外人士所共见。现值国民大会召开在迩，本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之初愿，不久当可实现。为巩固国家之统一，确保胜利之果实，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所愿中共党员亦能懔于民国缔造，原非易事，抗战胜利，犹待争取，共体时艰，实践宿诺。在不妨碍抗战，有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斯则国家民族之大事。本党同志应共喻此旨，以促成之。

二　对内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

本党本团结抗战的精神，数年以来，对中共问题坚主以政治方式力求解决。今后自仍本此既定方针，继续努力。惟根据中央对于中共问题之总报告，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致本党委曲求全政治解决之苦心，迄无成效。而本党同志在各地艰苦奋斗，遭中共残害，为数已多。追溯往事，能无愤慨？乃中共最近更变本加厉，据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复政府，危害国家。凡我同志均应提高警觉，发扬革命精神，努力奋斗，肃军肃政，加强力量，使本党政治解决之方针得以贯彻。兹特提出会后全党同志对此问题之工作方针如左：

一、本党同志应切实深入农工群众，解除农工痛苦，大量吸收农工党员，发展本党在农工社会中组织。

二、应以革命进取之精神，吸收富于革命性之知识分子，并正确的领导青年。

三、对外应配合政治环境，加强国际宣传；对内应加强党员政治训练，纠正中共之虚伪

宣传。

四、一切社团中之本党同志，应加强党团组织，争取第三者对本党之同情。

五、在沦陷区应确立并加强党的领导权，一切军政设施，均须适应党的工作方针，并由中央选派坚强干部深入敌后工作。

六、加强中央及各地对于本问题之统一指导机构。

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将上列工作方针，通令全国各级党部，勖勉同志，一致力行。中央并应随时依本方针，规划具体办法，切实施行。

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此届国民参政会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

新华社记者就国民党政府决定于7月7日召集新的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是否有人出席一项问题询问中共中央负责人。承其答复如下：

国民党政府决定于今年7月7日召集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没有什么人去出席。这是因为：（一）从去年9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发布民主纲领，实现民主改革，以便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有力地配合同盟国战胜日本侵略者；并由此种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于全部国土获得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在本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几次谈判之后，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至于恢复团结与建立联合政府之一些起码的条件，例如取消镇压人民的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承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国解放区，撤退包围与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等项，不但一项也不愿实行，反而变本加厉增强了破坏团结与破坏抗战的反动措施。（二）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之召集，国民党政府当局事前并未与本党协商，亦未与其他民主党派协商，仍和过去的国民参政会一样，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法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至今没有合法地位。即就中共方面的参政员而论，亦为国民党当局所指派，并非中共自己所推选。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现在已成了战胜民族敌人、解放中国人民的中心力量。国民党政府此种对待中共的态度，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一切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而如果这样做，就将铸成大错，反民族反人民反民主的大规模内战就会爆发。很明显，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根据上述各项理由，中共方面已决定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以示抗议。

（原载1945年6月17日《解放日报》）

从六人被捕案
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解放日报》时评

本月六日，美国发生了一件令人注意的事件。六个同情中国抗战民主事业的美国人士，包括美亚杂志的编辑、政府外交人员和海军人员，被联邦调查局以泄露秘密的罪名加以逮捕，事后副国务卿格鲁即发表声明，说这一案件是“精密的安全计划的成果”。

六人被捕案的内幕究竟怎样？美国下午报编辑史东的文章说得很清楚：“政府在我国（指美国）远东政策上正处在激烈的幕后争论之中。现在有着倾向于绥靖主义并对中国采取强烈的新政策的趋势。有些官吏认为我们应该帮蒋介石摧毁中国共产党。……现在这六位被捕者每一位都曾对国务院统治人物（以副国务卿格鲁为象征）作了许多批评，其中有三位曾计划出版著作批评国务院和国民党。”这就是说，六人被捕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什么泄露“秘密”，而在于这六位友华人士曾剧烈反对国务院里面部分统治人物支持中国反动派的政策。

六人被捕案，无疑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和美国对华政策有密切关系的事件。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回溯几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美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向抱热烈的同情。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美两国并肩对日作战。美国政府更采取积极援助我国，促进中国民主团结，以便有效地打击日寇的方针。一九四四年三月间美故总统罗斯福在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演讲中曾这样说：“孙中山先生所坚决奋斗的诸大目标，就是保持主权，建立代表人民以及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这些目标是中国各地人民共同一致的信念，也是决心抵抗日本暴徒的原动力。”早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美副国务卿威尔斯在一件备忘录中回答美共领袖白劳德指摘某些官吏执行着“用战争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宣称“本政府不曾有过这种政策，不管新的或是旧的。”美国政府促进中国内部民主团结的方针，还表现于它在中国的代表人物的具体行动。据美国各报章杂志所载：“史迪威与高斯所设法做到的，便是使委员长和共产党合作”，（皮尔生语）美前副总统华莱士也“间接地参加了一手”，并“和言辞锋利的‘酸醋约瑟’（史迪威将军的绰号）基本上的意见是一致的。”（皮尔生语）史迪威将军还力图“监督租借法案供应品”，“保证这些器械不是被中央用来反对共产党”（纽约时报），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对游击区的封锁，允许美国供给游击队以最低限度的装备。”（美亚杂志）

可是由于中国反动派和美国内部新绥靖主义分子的协力活动，使近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

了某些变化。据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的评论，去年十月史迪威将军“被一个曾经一贯对他横加阻碍的政治制度赶出了中国”以后，“美国默认在精神上与事实上都是反民主的、而又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这样的一个制度。”事态的发展，说明爱金生这一判断，不是没有根据的。四月二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美京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粉饰国民党统治的反动面目，称之为“并无法西斯野心”，“正在为了他的国家而走向民主政府”；他把阻碍中国统一战线的原因，归之于“有武力之政党”，就是说，归之于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他抛开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团结，而谈中国的“军事的统一”。正因为这样，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更感觉到有恃无恐，增强了坚持独裁、摧残民主、准备内战的决心；本月六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公开声明将以盟国租借武器进行内战，即是一个例证。

六人被捕案，正是美国对华政策两条不同路线剧烈争论的表面化，一条路线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力量和这个力量的中坚——中国解放区、八路军和新四军，因而主张和这个力量合作，反对中国反动派利用美国的援助来打内战，愿意以美国的影响促进中国的民主团结，以便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增进中美两大国家在反法西斯事业中的真正友谊。拥护这条路线的，有富有民主传统的美国广大人民，美国朝野具有远见的民主人士。与此相反的，是另外一条路线，这条路线不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而只承认“反民主的而又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反动头子与杀人魔王蒋介石，认为“他就是中国”（美议员孟斯菲尔语，载于孤立主义分子鲁斯所办的时代周刊上），因而采取支持中国反动势力的方针，实际上助长了中国的内战危机，妨碍了对日抗战的共同事业。主张这条路线者，有美国的反动势力——绥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赫尔利之流，是其代表者。他们不仅拥有反动的新闻机构，而且在美国政府里面也占了一些重要位置，因而他们的阴谋活动能够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

今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究竟将要怎样呢？支持独夫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呢？还是赞助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呢？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加以慎重的考虑，美国必须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究竟是什么人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美国人，中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而不是属于少数独裁者的。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伟大运动，是世界上任何力量所阻遏不住的。美国人民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是值得感谢的。我们中国人民欢迎美国人民给我们以更有效的援助，我们准备和美国及其他同盟国一致努力，配合作战，来完成击败日寇和重建远东和平的伟业。但是我们愿意重复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的警句，希望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使他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或失去中国人民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我们一不反对美国人民，二也不反对美国政府中一切愿意赞助中国人民事业的朋友，但是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者——赫尔利之流，因为这些老爷的目的，和中国的独夫民贼的目的完全一致，要在中国人民身上喝取鲜血。这些帝国主义者如不早日缩手，敢于向中国人民头上动一个指头，那他们就将从中国人民获得其应有的教训。

新华社记者再评赫尔利政策

［**新华社延安19日电**］对于赫尔利政策，新华社记者继续有所评论。新华社记者指出：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其拥蒋反共的错误政策以来，美国国内一部分帝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愈益表现的鲜明了。最近美国拥有广大读者的“读者文摘”6月号上发表了鲍威尔与伊斯特曼二人合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在中国爆发了世界命运的危机”，可以说是赫尔利政策的一个公开说明。首先鲍伊二人在强调了中国“在决定世界命运上实具有决定的力量”之后，即认为中国“今天最大的政治问题”是所谓“中国究竟走向民主主义还是走向极权主义的问题”。我们姑且把他们关于所谓“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含义，放在后面去谈，而先来看一下他们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所拟定的答案。他们说，中国究竟走向民主主义或极权主义的问题“是与谁人的领导权——是民主主义的美国的领导权，或是极权主义的俄国的领导权——在中国占优势的问题完全相同的。”中国的同胞们，听听这些帝国主义者亲口说出来的供辞吧！原来他们对于中国的政策，是要把中国放在美国的“领导权”之下。不用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同美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意思，“完全相同的”，这里一切伪善的假面具被撕破了，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接着鲍伊二人说：中国人现在“正站在十字路口上，可以走到二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上去，或者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俄国极权主义的道路，或者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所指出的美国民主主义的道路”。他们说：因为蒋介石所要走的是“美国民主主义的道路”，所以他们拥护蒋介石，又因为中国共产党所应走的是“俄国极权主义的道路”，所以他们反对共产党，他们在文章中力说了美国采取拥蒋反共政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们对于赫尔利拥蒋反共政策表示欢呼。他们说，“可告慰于一切聪明的读者，即我国国务院最近已决定将供应品给与蒋介石，而不给与共产党。”他们认为美国政府现在不但在供应物质上应尽一切力量援助蒋介石，而且在精神上还“必须予以谅解”。他们批评美国政府过去采取的对蒋介石施用压力使其与中共达到“团结统一”的史迪威、高斯的政策，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因此，他们大声疾呼的说，“作为聪明的民主主义者的我们，对于在华北共产党的宣传与政权加以柔和的绥靖的全权政策，是必须予以放弃的了”。中国的同胞们，我们从美国这些帝国主义者供辞中，不是又可以理解到这班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执行的拥蒋反共的政策，就是所谓要在中国取得“领导权”的具体步骤吗!?美国国内的帝国主义分子为了要在中国取得领导权，不惜公开鼓动中国的分裂，不惜公开支持蒋介石贯彻其发动内战的阴谋，不惜公开号召美国在华将士重走英国反动将军斯科比在希腊所走过的道路，使中国人民大众的血再一次的流遍于中国的原野！可是鲍、伊二人在其文章中再三玩弄的所谓“美国的民主主义”与“俄国的极权主义”的把戏，却是十分可笑而且又是十分愚蠢的。

既然他们说，蒋介石今天所走的道路，就是“美国民主主义的道路”，那未所谓“美国民主主义的道路”之在中国，也就是在伪装民主下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了。而且既然他

们又说，蒋介石今天所走的道路是可以使美国在中国取得领导权的道路，那末所谓“美国民主主义的道路”之在中国，也自然就是使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的道路了。可见，“作为聪明的民主主义者的”先生们的所谓“美国的民主主义的道路”，实在只是美国的帝国主义的道路！除此之外，自然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中国人民当然决不愿走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要强制他们去走的殖民地道路，他们要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这当然不免激怒了这些帝国主义老爷们，于是他们狂吠起所谓“俄国的极权主义”的滥调来了。为什么他们称苏联的社会主义为“极权主义”呢？原来苏联人曾经说过，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据他们说，只要谁承认“专政”，那谁就是“极权主义”。他们从来不肯了解一个最简单的真理，就是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真正民主，是较之美国资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要民主得几百倍。当然，这些老爷们是不肯承认美国今天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但是这种不承认并不能否定此种专政之存在于美国，正象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者并不能否定他们是道地的帝国主义者一样。至于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所要实行的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各阶级的民主的联合专政，这当然既不是美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是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他们因为只欢喜蒋介石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少数人专政，而不欢喜我们毛泽东同志的各革命阶级的人民专政，因而他们一定要说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是“民主主义”。而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是“极权主义”，那当然是他们的“自由”。但中国人民一定要走毛泽东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不走蒋介石所指出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道路，那是已经确定的了。任何帝国主义者拥蒋反共的政策，改变不了中国政治的这种十分明显的趋向。为了共同战胜日寇与建设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一切愿以平等待我的公正的美国舆论界、政府人员及军队人员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只会拖延对日战争的胜利与破坏世界和平。

（原载1945年7月20日《解放日报》）

［附］美国驻重庆政府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

“美国新闻处华盛顿二日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国务院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从中国带回了两个主要印象。

第一、中国对美国非常友好，感激美国的一切援助，在八年战争之后，疲倦而痛苦，但将作战至胜利结束。

第二、美国对于参加统一军事力量的努力，其目的在使该国最充分的军事力量对日本作战。

赫尔利说，在后一方面已有若干进步，但希望有更多进步。他又说，大家一定很明白，在武装的政党和军阀强大得足以抗拒政府的时候，中国是不能有政治统一的。美国方面曾过分估计了后者那些力量，而最强大的力量，依然是重庆的国民政府。

赫尔利说，中美军事组织，和中国国民政府及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一起，形成一个打败日本的队伍，在这个队伍中合作得很好。大使说，他常常被人问起关于蒋介石的性格和志愿，他的答复是：在对日长期战争中，蒋介石曾运用了他所能有的一切力量。虽然，他并无法西斯心理。他很想把他所有的一切权力，抛给孙逸仙博士所主张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他正在为了他的国家走向民主政府，那是他的事业的目标。

有人问赫尔利，他心里认为阻止中国统一的军阀或武装的党派是什么，他说，他的意思是共产党和中国南部的若干军阀。有人问他后者是否拥护蒋，他回答道，他们拥护国民政府，但并不拥护蒋个人。有人请他估计共产党军队的实力，他说，目前做这桩事，在他是不恰当的，军事当局做起来也许更恰当。

有人问赫尔利，中共是否要求美国给他们一些从日军那里夺来的武器。他说，对于报纸上的这个消息，他不能肯定也不能否认。但他确实知道共产党曾以一个政党的资格，请求美国供给他军火，他的意见认为把武器供给一个武装的政党，就成为承认一个交战国了。他又说，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并不曾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

有人问，他以为在中国共产党的现况中，莫斯科的作用如何。他回答道，他觉得让苏联政府为它自己说话好，但在他在莫斯科的会谈中，俄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普遍地友好的，莫斯科表示过希望和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谐的关系。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曾经有过民主的基础，这使人有中国共产党员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说法，因为他们拥护的诸原则，恰恰和国民政府所公布的一样。在这样情形之下，有人问赫尔利，两派之间造成分歧的是什么？赫尔利回答道：分歧之点似乎不在目标上，因为双方都希望一个分权的在民主基础上工作的政府。分歧点被认为是更在于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上，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立即着手若干改革、并且提议组织两党联合政府。在另一方面，据国民政府说，它有一个中国的解放者孙逸仙博士所草拟的政纲，因此权力应在宪法之下还给人民。

赫尔利说，重庆政府力言这政纲将在一个于五月五日开始的会议上进行，而该会议以还政府于民为目标，还并非还政府给任何政党或联盟。

有人问关于期待着在中国的结果，赫尔利说，美国和中国政府在军事方面，曾有一些冲突，在牵涉到内阁人员的事情上曾有一些分歧，但所有这些，已经被顺利的消除了。他说，当中国政府正象旧金山会议应做的一样承认一切政党的时候，期待中的结果将来到。

赫尔利说，中国武装的党正在互相接近，但在该国有强得足以抗拒政府的武装力量的时候，一个自由的，团结的和民主的中国总不能在这次战争中出现。他说，他不期待乌托邦，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期待人们按照他的性格和本性的活动，因此只有为打败日本的军事统一完成以后，才能希望该国政治上的统一。

（原载1945年5月8日《解放日报》）

新华社记者论时局
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新华社延安二十二日电**］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对时局的评论。新华社记者说：中国政治形势在最近半年内，被赫尔利——蒋介石政策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希腊的黑暗局面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威胁着抗日战争与国际和平。这一危险形势，在中国解放区人民面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面前，也在英、美、苏三同盟国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纠正赫尔利——蒋介石政策与制止内战危机。大家明白，要打倒日本侵略者与建设国际和平，决不能容许中国打内战，决不能容许赫尔利——蒋介石政策继续推行下去而不被制止。在赫尔利鼓励之下，蒋介石于一月一日与三月一日宣布了实质上是准备内战的计划。这个计划采取了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形式。这个计划，近日虽然受到了某些阻碍，不得不在国民参政会上略为修改所谓“国民”大会的办法，但是内战危机依然在继续发展。对于赫尔利——蒋介石的这个反动计划，中共自始即表示了坚决反对的立场。其他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在内，也表示了反对态度。此次参政会开会的前夜，中共发表声明不派人出席，这一行动鼓励了许多民主派参政员在参政会内与会外反对“国民”大会的勇气，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来延时，中共当局和他们交换了意见，表示了同样的态度。参政会开了两星期，已于二十日闭会。整个会议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民大会问题。在几次的激烈辩论中，独裁派与民主派均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十九日，通过了一个决议案。新华社记者指出：这个决议包含了某些妥协性，但是并未变更国民党的反动计划。这个决议说到了四个问题：（一）国民大会的日期；（二）国民大会的代表性；（三）国民大会的职权；（四）某些民主要求。关于日期问题，决议说：“本会同人意见未尽一致，本会兹不提出具体意见，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所谓“日期”，在反动派看来，决不只是一个事关“政府威信”的问题，而是一个独裁与内战的问题。他们一定要保持一党专政即独裁的权力，不允许有非国民党人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大会的日期问题上作决定。在内战问题上，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军事布置上都是为着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解放区“收复失地”与消灭中共这个具体目标的。而要打内战，没有国民大会固然一样可以打，有了国民大会则更加好打。日期“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他们将斟酌些什么情形呢？当然是斟酌最有利于保持国民党独裁的时机，尤其是斟酌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时机。要说这一条有它的一点积极意义，那就是以十分委婉的语调没有承认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国民大会这个威胁人民的确定的日期。这就是说，国民大会这个威胁人民的法宝仍然拿在独裁者手里，他想什么时候使用都由他；不过为了应付人民的坚决反对，日子或者会稍为更动一下。中国政治形势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中国独裁者争着要

“还政于民”时间越早越好：中国人民却坚决的反对。这件事看来好像奇怪而且滑稽，实际则是表现了中国独裁者与中国人民所处的从来没有的新环境。这件事不可能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战争初期与中期，因为那时还没有造成中国独裁制度遭受到如像现时这样严重的危机，也没有造成中国人民如像现时这样巨大的民主力量，也没有造成现时这样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国际条件。七月十九日的参政会决议，没有赞成独裁者今年开国民大会的“还政于民”的反动计划，对于独裁者说来，无损独裁制度的毫末，对于人民说来，没有增加丝毫的权利。必须记着：“国民”大会这个法宝仍然拿在独裁者手里，而且即使没有“国民”大会，仍然可以打内战，中国人民绝对不可稍有疏忽与大意。中国独裁派是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要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他们一群的下一手是什么，中国人民，首先是各民主党派，必须十分注意。新华社记者说：参政会决议的第二条也是极其含糊的，反动派很可以利用这一条。这一条说：“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请政府参照本会各参政员提案，衡量法律与事实，妥定办法，尽使国民大会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这里所说的“政府”，是独裁派的政府，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独裁派的法律，现在写上了决议案，将来他们“衡量”一番的结果，依然不外强迫人民承认十年前的那一批国大“代表”依然有效。独裁派也会“衡量”“事实”，其结果不外加“选”或加派一批人。这样他们就会说：已经“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了。但是中国人民与民主党派应该这样来看问题，所谓“政府”必须是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任何由现在的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召集的“国民”大会，我们都反对。所谓“法律”，必须由联合政府来重新制定，任何由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制定的反动的代表选举法，国大组织法等等，我们都反对。“事实”是十年前的所谓国大代表，是由国民党一手伪造的，必须全部否定它；在敌人未完全消灭，国土未完全解放，人民无完全自由的全部时间内，不许可办理国大代表的选举。只有全部否定旧代表，并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下重新选举新代表，才能称之为“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我们完全赞成“极完满代表性”这几个字。从今以后，谁要召开什么绝无代表性及代表性不完满的“国民”大会，必将受到坚决的反对。第三条：“宪法制定时，应即予实施，裨政府还政于民之旨早获实现”。这一条表现了国民党独裁派的反动计划，依然坚持着。历来只唱“制颁”宪法，反对“实施”宪法的，现在他们唱起“即予实施”的好听的调子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选举”大总统、仿效袁世凯做皇帝。今天中国的独裁派即帝制派很需要这一条，他们急于要以帝制（一名大总统）来镇压人民、发动内战、以维持其自己的反动统治。第四条列举了几项要求。“采取可能之政治步骤”，这一项，独裁派必然要耍新花样，对于民主派所主张的召开党派会议，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一项要求，仍将深闭固拒。第二项，保障人民自由，加了“合法”二字。第三项，承认各政治党派，加了“依法”二字，在独裁派看来，一切都好办了。第四项，“各省各级民选机构之设置”，也是独裁派需要的，因为所谓“民选”，实际上都是党选，独裁派有了这些“机构”，他们的宝座就更稳当了。综合第四条各项，对于独裁派，并不会损失什么东西。仅有一点稍有意义，就是规定这些措施，应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做到，表示国民大会今年或者不会开。新华社记者结语说：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现有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包括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事行动在内，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国民参政会对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决定，绝不会改变这种危险的形势。新华社记者说，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

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原载1945年7月23日《解放日报》）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五年四月）

周　恩　来

同志们！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逼近胜利的今天，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地开幕了。我在此，预祝大会的成功！

从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七个年头。在这两个大会之间的十七年中，我们党经历了国际、国内、党内多次的重大事变，走过了千辛万苦，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锻炼成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很有能力的共产党了。

我们党现在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多党员，比起六大时候的党员，已经大了三十多倍。在全国最重要的地区，都有了我们党的组织，有了党的报纸，有了广大群众的联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真正群众性的政党啊！

我们党现在领导了中国解放区的九十一万多正规部队，二百二十多万民兵，近千万的人民自卫队，而在六大时候，我们才只有散在各地的数万农民游击队。经过这十七年的奋斗，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为中国人民锻炼出一支永远打不败的人民的军队了。

我们党现在在敌后建立了十八个解放区，连陕甘宁边区共十九个，解放了九千五百五十多万人口，组织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民主政府共九百一十五县。而在六大时候，我们才只有极少数几个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县区政府。经过这十七年的奋斗，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为中国人民在大块土地上，建立起永远推翻不了的人民政权了。

这样的党，是怎样锻炼成的呢？

在二十四年的历史中，我们党是从永远不息地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从永远保持群众的联系中锻炼出来的；是从永不放下武器以保护人民利益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从不断地反对民族中反动的思想和派别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从长期地反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从勇敢地实行自我批评中锻炼出来的。

二十四年来，我们依靠了什么力量锻炼成的呢？

我们依靠了全党同志的努力奋斗。

我们依靠了数十万党内外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

我们依靠了四万万人民大众的共同奋斗。

我们依靠了国内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国外进步人士的同情。

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

了今天的初步胜利。

同志们！这是快要胜利的党啊！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将保证顺利地引导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

我们号召全中国人民，全中国民主党派，全中国民主分子，我们愿和他们一道，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奋斗到底。

我们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进步的人民，我们愿和他们一道，为消灭世界法西斯主义及其最后残余，重建世界民主和平，奋斗到底！

我们在此警告国内外一切不愿意承认或不重视中国共产党这种代表人民的力量和意见的人们，如果他们仍要继续这种态度下去，他们将不能解决中国任何问题。

同志们！我们的面前困难还多，但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革命完全胜利的路程还长，但我们一定要把它走完。

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消灭日本侵略者！

抗日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同志万岁！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5月1日）

论解放区战场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

朱 德

同志们！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进行英勇的抗日战争将近八年的时候开会的。我很荣幸，我能够代表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九十几万军队和二百几十万民兵，在这里向我们党的大会说话。我应该指出：这八年中，我伟大的中国人民组成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各个战线上，不分男女老幼，轰轰烈烈，与日寇作殊死的斗争；不管日寇如何凶暴残酷，也不管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及其统帅部的指挥方针有如何错误，但中国人民仍本一往无前的精神，前仆后继，坚持了这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国人民将赢得最后胜利，这已是无可怀疑的了。这八年中，我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与一切抗日的友军，协同保卫祖国；在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上，我们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曾流洒了最多的热血；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愧为中华民族最好的子孙，因为我们做了中国人民所最希望的事业，而且我们将继续不屈不挠地做下去。

我在此向我国一切军队中为抗日战争而殉难的战士致衷心的哀悼！向一切为抗日战争殉难的共产党人及人民致衷心的哀悼！（代表全体起立，脱帽静默三分钟）

我在此向全国一切在抗日战争前线上的武装同胞致衷心的敬礼！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将士们，致衷心的敬礼！向东北抗日联军致衷心的敬礼！

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是为了总结抗战经验，进一步地准备与全国人民、抗日友军协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大会。我完全同意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人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而流血斗争的经验，规定了和提出了打败日寇和建设新中国的具体步骤与具体纲领，真正给我党和全国人民指示了决定中国抗战胜利和决定战后中国命运的道路。

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就不能有正确的军事方针。胜利的人民战争，是只能在正确的政治方针指导下，并在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联合政府基础上来取得的。八年来，我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敌人进行了空前英勇的、残酷的、可歌可泣的胜利战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就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治方针与正确军事方针的结合，就造成了人民军队，造成了解放区，造成了解放区三三制的民主联合政府，造成了解放区真正的人民战争，并使解放区战场所进行的战争能够取得不断的、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要准备抗日战争的全国胜利，就同样

地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这个政治报告的方针，必须在毛泽东同志这个总的政治方针指导之下。离开政治，单纯地就军事论军事，显然是不正确的。我现在向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军事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个政治报告的精神及其方针的。

一　抗　战　八　年

同志们！我前面说过，我们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已将近八年了。在这八年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变化不管怎样复杂，其发展过程，仍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这就是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的相持阶段，我方的反攻阶段。这三个阶段还没有走完，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三阶段的前夜。

第一阶段，是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武汉失守。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特别是由于我党坚持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得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由不抵抗主义转变为对日抗战，不得不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某些进步设施。这个时期中曾有相当数量在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系军队对敌人进行过积极的抵抗，虽然又有另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遇到敌人不加抵抗即溃退下来。这时期国民党当局政策的转变，是为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所欢迎、所赞助的。可惜，国民党当局这种转变，并没有彻底。我党中央在抗战一开始就指出，如果没有全面的人民战争，就不可能进行胜利的抗战。但国民党当局既然继续保持反人民的制度和立场，因此就不能进行这样的人民战争，这就给了日寇进攻以很大的便宜。日寇就是利用了国民党战场上的这种弱点，仅仅在十五个月内就打到了广州、武汉，囊括华北、华中的大片土地和华南的要地。当然，日寇是有很多弱点的，这就是它所进行的战争乃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战争，因而是失道寡助的；就是由于这个帝国主义的先天不足，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都感缺乏；就是它只片面地估计了国民党当局一方面的力量，而轻视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意志和抗战力量；就是又由上述这些弱点所形成的它的分散使用兵力与逐步使用兵力的战略部署和指挥。日本侵略者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但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无敌的敌人。其弱点是应当为我们利用的。很不幸的，就是日寇这种弱点没有被国民党当局所利用；反之，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个大弱点倒是被日寇所利用了。反人民的政治制度，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就使得国民党手中的几百万兵，在十五个月之内，遭受到很大的牺牲；这种笨拙的战略，就使得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不能获得应有的战果。

可是，就在这第一阶段，与敌人的进攻方向相反，我伟大的人民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向着敌后挺进，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就是说：当敌人向我进攻，而国民党军队大批退却的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则以无比英勇的姿态向敌后反攻，取得不断胜利，牵制敌人，建立战略根据地，创造了解放区，并在精神上兴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在事实上证明了亡国论是错误的，而人民战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同时，也正在事实上证明了速胜论是错误的，由于敌强我弱的诸条件，必然要经过人民战争逐步转移战局，因而抗日战争乃是持久战。

第一阶段的十五个月，使中国内部发生很大变化，日寇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当局看到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很成功地建立了新的战场，收复了广大的失地，从抗日的立场说，本来没有任何理由不表示欢迎的，可是它偏不欢迎，而且非常不满。就在武汉失守之后，国

民党当局改变了政策，改变到对日寇消极抗战，对内积极反共反人民。在日寇方面，虽然侵占了我国很多地方，但是在华北、华中，出其不意，遇到八路军、新四军这样的对手，许多地方被我收复，好像心脏里插进了一把利刃，所以也改变了政策，改变到对国民党战场停止进攻，对国民党当局诱降，而对八路军、新四军则集中兵力进行“扫荡”。这样，就出现了战略的相持阶段。不管怎样，有一件事是明白的：敌人进攻，国民党败退，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像的。

第二阶段，亦即战略相持阶段。如上所说，这是在武汉失守之后开始的。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覆的最残酷的战争。所谓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五年半之久；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在对着解放区作战，解放区战场抵抗的敌伪力量，到一九四三年，竟占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在这同一期间，国民党战场并没有严重的战争。这就是相持阶段的实际。

解放区的战争，是伟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战争，解放区人民在这个阶段中所进行的战争，其无比的英勇，无比的坚忍，实为中华民族永久增光。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之下长期坚持下来，那末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特别是在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当局的主要政策错误地由对外移到对内，对抗日战争消极，对反共反人民积极，举行了三次反共高潮，而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又是其特出的罪恶行为；如果中国人民不能挡住这股逆流，抵住这种袭击，也就不会有解放区战场及其与敌人的长期相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不能坚持下来。一九四四年日寇向国民党战场新进攻的势如破竹的事实，把这点毫无疑义地证明了。而且，假如没有解放区战场的力量，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妥协的企图受到最大的阻力，则必不能克服几次投降危险，而将使抗日战争陷于夭折。很多的事实与经验，以至敌人的许多文件，也把这点毫无疑义地证明了。可是这些情形，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外面还有很多人不了解。

国民党政府在这五年半的长期间中，是有充分的馀裕可以力求进步，准备反攻的。但它所做的，不是准备反攻，而是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不是去增强抗战的力量，而是去削弱这个力量；不是去坚决抗战，而是去“曲线救国”，勾搭敌人。于是国民党在敌后的军队，就经不起考验，不是站不住脚，就是变为伪军。一九四四年日寇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进攻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湖南、广东、广西诸省的大块土地，就在很短的期间沦于敌手，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在抗日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危机。但是正当国民党战场无力招架的时候，解放区战场却渡过了一九四一——四二年的严重困难，向敌人举行了有力的反攻。敌人向国民党战场进攻，而解放区战场则向敌人进攻，这是一九四四年以来的新形势，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期的特点，并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前期相区别。

这样，大家看得很明白：国民党当局把应该做的不做，不应该做的做得很努力，这种倒行逆施的结果，使国民党军队愈来愈弱。解放区的情形则与此恰恰相反，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等，愈战愈强，收复了很多失地，渡过最严重的难关，现在转到了新的发展与扩大的阶段。现在抗战的重心，是在解放区战场，而不在国民党战场。

由于中国人民八年的战斗，由于伟大的苏联军队向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进军和法西斯德国即将完全崩溃，由于美英军队在远东的胜利（这里需要指出美国人民有特别的努力），由于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后在远东举足轻重的地位，毫无疑义，我们所进行的抗日战争现已处在大反攻阶段的前夜了。

怎样来准备和进行大反攻呢？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已在政治上说明了一切。在这里，我只指出：解放区人民的长期英勇战斗及其各种建设，是真正替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造成了可能的基础，是给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做了最大的准备。正像上面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掩护了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地阻遏敌势，则全中国形势早已改观。在将来的反攻中，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战略基地。那里集中了广大的人力（将近百万的正规军、二百余万民兵、近千万自卫军），那里保护了和发展了巨大的经济力量（相当大量的粮食生产、公私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经营），那里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沦陷区的大城市、铁路以及许多海岸在解放区包围中或控制下），那里有重要的战略据点（华北山地、平原和华中平原都是便于对敌大反攻的地带，而华北更为进出东北内蒙的枢纽），在那里特别是有着解放区人民在持久战争中已锻炼出极坚强的战斗意志，而民主政治的实施则提供了便利于大反攻的政治条件。任何人如果轻视解放区战场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事业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及其所已获得的伟大成就，如果轻视解放区九千余万英勇战斗人民的重要性，必将犯很大的错误，那是一定的。

以下我就特别来说解放区战场。

二　论解放区战场

解放区战场的创造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这是中国抗战的特点，其中解放区战场是由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所创造起来，并负起独特的作战责任的。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这是中国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前身即是中国红军。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其创造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的时候，即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给它规定了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以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为它的奋斗目标。"九一八"以后，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痛心疾首于我神圣国土之被日寇蹂躏，充满了抗日的热情，数年间千方百计，经过无数艰难的流血的斗争和万里长征，以求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伟大的目的。到达陕甘宁边区之后，这支军队对于抗日战争做了切实的准备工作：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干部的准备，与全国许多友军的联络，这些都做得很好。七七事变发生，我们党中央和这支伟大人民军队的全体将士接到警报，即于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发出呼吁，要求出发前线，与敌周旋，不久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即出现在抗日的最前线。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在毛泽东同志的天才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入华北敌后。我一一五师进入晋察冀地区，我一二○师进入晋西北地区，我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一九三八年我军更向东进，一部进入冀鲁豫平原和冀鲁平原，一部进入冀中平原，一部进得更远，

到冀东配合了二十万人民的抗日大起义。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继八路军之后开赴前线，进入华中敌后，在长江两岸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同年冬，东江纵队于广州沦陷后在当地起义。一九三九年，琼崖沦陷后，当地人民在我党领导之下组织游击队从事抗战。八路军初出马的时候，即在平型关进行了全国抗战中第一次的对敌歼灭战。

“九一八”以后，我党即在平津、宁沪、武汉、香港、广州等大城市及广大农村，进行了有系统的抗日运动，赢得了广大同胞的同情。虽则在国内战争时期，这些工作曾遭受极残酷的摧残和破坏，但无论环境如何困难，我党在许多地方所散布的抗日种子，是深入到人民中间，造成坚固的潜在力量。特别是一九三五年我党所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曾对于促进抗日战争的爆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华北华中相继沦陷后，当地党的组织，即协同当地各阶层人民，武装起义，转入农村游击，于是使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发展，大批知识青年和劳动人民参加到我军中来。以平津流亡青年为骨干，在山西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决死队。决死队是山西的新军，我们对它曾给以兄弟一样的援助。在冀中，回民同胞组织了回民抗日支队参加八路军。我们对于许多别的抗日武装力量，也作了大力的援助。这些当地的人民武装与八路军、新四军这种人民军队两相结合，形成了坚强的抗日力量。

这样，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瓦解了的华北、华中战局，立即由我党、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合作，而迅速恢复起来。敌后变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了。

这样，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从此到敌后代替了国民党退出之前的单纯防御的地位。

这样，为国民党当局所丧失的陷入黑暗的广大沦陷地区，逐步经过我们之手，收复过来，变成了光明的广大解放区，这就是华北、华中、华南三大解放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凡是国民党当局丢掉的地方，每个中国人都有把它光复的责任，我们正是这样做了。

这样，解放区战场在抗日战争初期，便牵制了日寇很多兵力，造成了使日寇不能全力西进的形势，随后又变成为与日寇作战的主要战场。

这样，解放区战场就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重要的和决定的战略地位，变成为抗日的重心。若干反动派企图利用日寇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借刀杀人的无耻阴谋，是彻底破产了。

这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和毛泽东同志出奇制胜的人民战略所造成的结果。

解放区抗战的三个时期

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平型关初战胜利，至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为止，这个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初期粉碎敌寇讨伐队分进合击的“扫荡”战术。一九三九年以后，又连续粉碎了敌酋山下奉文和桑木师团长所提出的“封锁”“分割”“扫荡”三者并用的新战术。这些不断胜利，打开了局面，创造了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八路军由几万人发展到四十万，解放人口近四千万。新四军由一万二千人发展至十万，解放人口一千三百万。这是敌后解放区的创造与开辟时期。

一九四〇年秋，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威力，惊醒了敌寇。敌寇改换了统帅，由冈村宁次出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又全部改订进攻我军的办法，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并重新规定在一九三九年即已提出的所谓确保华北“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侵略任务，以准备太平洋战争，从而集中兵力，对华北解放区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其“扫荡”办法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敌寇所到之处，实行

彻底烧杀，企图建立“无人区”，以消灭我军的生存条件。敌寇经常以十万人左右的兵力对一个地区进行反复“扫荡”，每次连续至三月或四月之久，这是空前严重的局面。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华北各地发生灾荒，军民食树叶草根，更加强了局面的严重性。我军团结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奋斗。这一时期，到一九四二年为止，我解放区人口缩小至五千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三十万。华中解放区战斗频繁仅次于华北，新四军则维持着发展的局势。经过这个困难时期，我军和解放区受到了锻炼，数量缩小而质量增强。敌寇之“扫荡”伎俩有限，而我军反“扫荡”办法则层出不穷。我们在这时期更加亲密地与人民相结合，因而学会了坚持与敌人顽强斗争和战胜强敌的许多本事。八路军、新四军就这样胜利地渡过了解放区战场的最困难的阶段。

从一九四二年冬，冀南、冀中、冀东各解放区工作开始恢复，华北各解放区转到新的扩张的时期，也即是开始了解放区抗战的第三个时期。敌寇企图继续其一九四二年的残酷“扫荡”，我军乃以敌进我进之战略，到敌后之敌后，去开辟解放区，粉碎敌之进攻。这一战略发生了极大效果，使解放区的发展，超过抗战初期的记录。接着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伟大的整风运动，和伟大的生产运动，各解放区随即响应进入行动，获得巨大成绩。同一时期，各地再次深入减租减息，更加发展了群众的抗日热潮，三三制联合政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使各解放区内部更加团结起来；在军事上，主力兵团更坚强，地方兵团日益扩大，民兵之普遍发动，又大大加强了各解放区的军事力量。这一切，把解放区巩固和加强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第一时期初，国民党留在敌后的部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关系还不太坏。武汉失守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政策的推行，特别是该党颁布所谓限制“异党”、“异军”方案后，即积极反共反人民，与日寇共同行动夹击解放区，成为解放区战场的积极破坏者。在第二个时期，敌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由于反人民的结果，经不起敌寇“扫荡”，一九四一年崩溃于中条山脉，一九四二年又在浙赣间崩溃，一九四三年又在山东崩溃，证明了任何反人民的军队在敌后都站不住脚。一九四一年起，敌后国民党部队，出现了大批投降的潮流。到第三个时期，庞炳勋、孙殿英投敌之后，国民党投敌部队，近五十万人，将官投敌者六七十人，扩大了伪军，帮助敌寇加强对解放区之“扫荡”。

光荣的牺牲和伟大的成绩

同志们！我在前面已说明了解放区战场的创造及其作战的各个时期。应该知道：在这样持久的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各解放区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是说不尽的，写不完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说，但我应该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些概括的数字，说明在这种残酷的战斗和牺牲中，中国人民得到了些什么。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的七年半（华南抗日纵队缺一九四三年以前的数字）中，总计对敌大小战斗十一万五千余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计九十六万余名，俘虏敌伪军计二十八万余名，争取投诚反正敌伪军计十万余名，敌伪总共损失计一百三十六万余名。

我军主要缴获：炮类共计一千零二十八门，机枪共计七千七百余挺，步马枪四十三万余枝，攻克碉堡三万四千余座，攻克据点一万一千余个。

在一九四四年中原战役以前（正如我在这报告的第一部分里所已说到了的），八路军、

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抗击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即在今天，在侵华日军（满洲的不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所抗击的仍有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百分之五十六，而所抗击的伪军则完全没有变化。敌寇重兵屯集华北、华中，这个形势，就说明了并更日益增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抗战中极艰巨的责任。

这种抗日人民战争的优异战绩，甚至可以从敌寇方面的反映看出来。例如，一九四三年六月敌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一月到五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五千五百二十四次之多，其兵力达五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人之众。"又如：敌华北派遣军司令部，一九四三年即敌昭和十八年度，综合战果报道说：

> "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解放区战场的战绩，正是全面的人民战争的战绩，难道还不明显吗？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解放区人民，其抵抗的极端英勇，其对所受苦难的极端坚忍，其牺牲的极端残酷，实是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浩大的正气，写下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最壮烈不朽的史诗，难道还不明显吗？

中国人民付出了上述的伟大牺牲，获得了下列代价，即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十九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共计九千五百五十万。

我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全军总数计九十一万正规军，民兵二百二十万以上。这些数目字，明白指出解放区战场人民战争的伟大发展，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极其明显的对照。

这种解放区的力量，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所有的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使中国人民有了胜利的展望，有了民主和光明的展望。

解放区抗战的经验

若问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既缺乏武器，特别是缺乏新式武器，又无外援，并且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夹击，为什么解放区在极残酷的战争中，竟能日益壮大起来？毛泽东同志报告中关于"人民战争"的部分，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我在这里再稍为说一些经验。

总的经验何在呢？简单的同时又是明确的，就是解放区经过了我们党的领导，依据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方针，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实现了解放区的全民抗战总动员，实现了解放区的民主联合政府，实现了解放区各阶级的大团结，也因此实现了抗战一元化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一切，就没有解放区全面的人民战争，而如果没有这种人民战争，也就没有了一切。

在政治上，就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经济生活的方法，实现了全民总动员和巩固的民族团结，合千百万人之心为一心，同仇敌忾，造成人民战争的真正基础。没有真正的民

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国民党统治区证明了这一方面。而解放区则证明了另一方面：实行了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作了改善，就必能实行人民战争。

就是这样，把解放区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和民族自信心发扬到最高度，纵使在敌人空前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之下，战斗意志仍然能够坚持下来。

就是这样，把军民团结和官兵团结发扬到最高度，并普遍推行了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的运动，不管敌伪的从外进攻及其奸细特务的从内挑拨，这个团结都是打不散，挑不开的。

就是这样，实现了政治的统一、军队的统一、以及政治与军事的统一，而打破了敌伪的“总力战”。

就是这样，能够在极困难条件下，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加强战斗单位，去对付敌之包围袭击，任何组织都能于根据地发生变化时，继续与人民一起，坚持斗争，指导斗争。

就是这样，能够以深入的政治工作去动摇敌军军心和瓦解与争取伪军。尽管日本俘虏很顽强，可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很好。我们特别感谢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冈野进同志所领导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感谢朝鲜独立同盟，他们在崇高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下工作，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极有价值的帮助。

就是这样，能够有效地以地下工作方法，去争取敌占区有民族意识的广大人民，使敌寇自首自新政策失其效果。

经济是作为政治、军事、文化的基础的东西。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首先的和主要的，就是实行减租减息，而另方面，又规定交租交息，这是保证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解放区在经济上坚持抗战的基础。

就是这样，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扬起来，纵使在敌人不断“扫荡”下面，仍能使生产不致中断。

就是这样，才能发动农民实行组织劳动互助（变工队，换工班等），造成各解放区群众生产运动的热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但发展了农业（这是各解放区现阶段的主要的生产部门）而且发展了家庭手工业和手工工场，走向自给自足和丰衣足食的目标。

就是这样，公营工业和工商合作事业才能够获得人民真正的合作，并因此而有了发展的真正基础。

就是这样，产生了军民的生产合作，并配合了精兵简政、军队生产和节约政策来减轻人民负担，节省人力物力，以支持长期斗争，减少了浪费，使民力有喘息机会，使物力得到积蓄。

就是这样，各解放区就能够努力在经济上互相调剂，救灾恤邻，以克服灾荒，救活民命数百万人，而达到坚持斗争的目的。

军事是和政治、经济相关联的东西。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而有了上述的一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东西，才有实行这种群众战的可能。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告诉了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八年来在解放区战场所实行的战略战术的出发点，由此创造了解放区战场抗日人民战争的全套的战略战术。这种群众战的特点，就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协力。这种战争不是军队单独进行的，而是以人民大众共同作战

的灵活配合来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配合作战，是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

就是这样，能够实行内线与外线的灵活作战，夹击敌人。

就是这样，能够对于敌人的包围实行反包围，对于敌人的“扫荡”实行反“扫荡”，对于敌人的“蚕食”实行反“蚕食”，对于敌人的封锁实行反封锁。

就是这样，能够对敌人力争战略指挥和战役指挥的主动权，力求摆脱被动地位，而反转逼敌处于被动。

就是这样，能够以反覆穿插打破敌之“反转电击”，以分散隐蔽、灵活转移、寻求敌之弱点，打破敌之纵深包围。

就是这样，能够以我之集中，歼灭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袭击敌之集中。

就是这样，能够以军民大破坏，打破敌之封锁分割，以民兵和分散之小部队相结合之地雷战，打破敌之梳篦搜索。

就是这样，能够以数个地区之配合出击，援助友邻区，打破敌之合围“扫荡”，坚持平原游击战以援助山地，坚持山地游击战以支持平原。

就是这样，能够使主力灵活转移，进行或准备适时之胜利反击，地方军则就地坚持，就地游击，与敌人扭打纠缠，困扰消耗敌人。

就是这样，能够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的斗争方式，成为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敌人把“扫荡”带至我之根据地，我武装工作队把各种抗日斗争的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去动摇敌人之心脏，并创造了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中的所谓犬牙交错的战争，是在八年来解放区战场上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者是一致的东西，这三者一致的东西造成了各解放区战场，又恰是各解放区战场作战的特点。

所有上述这一切，都是我们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抗日人民战争的经验，都是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及抗日人民战争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如果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则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上述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们就不但不能压碎敌人，并且早就被敌人所压碎了。

三　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

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正确地指出了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这两条路线，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表现在军事上。

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与此相反，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

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的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

前一条路线主张保留中国军队的旧制度、旧习惯、旧战术的老一套，拒绝根据抗日战争的新条件加以改革。这样，就便利少数人长期窃据兵符，把军队当作压迫人民、厉行专制的工具。后一条路线，主张根据北伐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经验、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武力与国民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原则，将中国军队加以改革。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团结军民，焕发士气，打败敌人。

前一条路线，说抗战可以速胜，是速决战，并从而不准备人民的力量，乃至肆意摧残人民的力量。后一条路线，说抗战不能速胜，是持久战，并从而主张加强准备人民的力量，发展人民的力量。

前一条路线，估计抗战全部过程只有两个阶段，说武汉失守以前，是敌胜我败时期，而以后，即是转败为胜的时期，它否认中间的相持阶段。后一条路线说不然，抗战全过程包括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以相持阶段为最艰苦，这时应作的事特别多，特别是要经过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经济状况去组织广大人民的力量，经过相持阶段有效的努力，准备了一切反攻条件，才足以说转到反攻。

前一条路线，历来把战争胜利寄托在日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上面，不寄托在自己的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抗战努力上面，结果使他们失望，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们遭了去年一整年的更大失败。后一条路线，历来相信人民的力量，它争取外援而不依赖外援。几年来解放区战场的胜利，便是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以自力更生的努力去获得的。

前一条路线，主张和实施了单纯防御的消极战略，后一条路线主张在大反攻之前采取攻势防御的积极战略。

前一条路线，对于叛将不加讨伐，反而纵容降将，反而囚禁有功将领，如对叶挺将军等。后一条路线，则反对各种各色的投降理论，奖励有功战士，坚决讨伐叛官降将，伸张正气，振奋人心。

前一条路线，实施错误的兵役制，到处强拉壮丁，贿赂公行，浪费和虐害了中国人口中的精华。后一条路线，则普遍地实行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实行了在完全自愿基础上的志愿兵制，这样既满足了军队的需要，又正当地保护了中国的人力。

前一条军事路线，是国民党的军事路线。后一条军事路线，是共产党的军事路线。

这两条军事路线，是这样显明的不同。而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早从八年来两个抗战战场（一个战场越战越弱，一个战场越战越强）的史实中证明了。

毛泽东同志的名著如“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尽人皆知，是代表了共产党的正确军事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总括地说，就是人民军队的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正是使抗战胜利的路线。

国民党内的反动派的军事路线，是由它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而它的军事路线，又正是和它的军事学说相结合的东西。国民党的军事学说，浸染了德意日法西斯的思想，其最大特点，就是使军队高压在人民身上（军队对人民的特别权威），使军官高压在士兵身上（军官对士兵的特别权威）。在民族强敌面前，这种军事思想，等于解除自己武装，使作战陷于失败。

建 军 的 原 则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报告中关于“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那些部分所提出和所解决的建军问题。

我这里只简单地说一下我们建军的宗旨。为了说明我们的建军的宗旨，我要把中国现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的建军宗旨，对照起来说一说。

成千成万的军队，成千成万的带枪的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人民，其中最大多数的是农民。可是，过去和现在，都有两种军队。一种，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训练起来，保卫人民利益，替人民服务的军队。另一种，也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训练起来，但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地主、大买办、大银行家极少数人的利益，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奴役人民。

没有一种军队不是国家的。但是有两种国家，一种是主权属于人民的，属于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人民的军队，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军队。大地主大买办大银行家的军队，则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人民的军队，因为和人民一体，对外就能有效地保卫祖国，对内就能保卫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因为与人民分裂，对于保卫祖国就不能不是无能的、动摇的、失败主义的，以至变为叛逆（如当伪军）。对于人民的民主自由，则是摧残的、压迫的。

人民的军队，内部是民主的，是官兵一致的，它对军队以外的人民，也是民主的，是军民一致的，所以能够一扫军阀制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内部要用压迫制度和欺骗方法，不如此，就无法叫由人民出身的最大多数的官兵去做反人民的事情；它对军队以外的人民，当然要压迫，不如此，就不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奴役人民的工具了。所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不但要保持军阀制度，而且要发展军阀制度，干脆用更野蛮更无耻的法西斯制度来统御军队。国民党内的反动的统治集团，现在正在努力做这项工作。

这两种军队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属于那一种呢？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就是属于前一种的军队，这种军队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创造这样的人民军队，是足以自豪的。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从其前身即内战时期的红军建军以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即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它是民族的，因为它始终站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具有保卫祖国的至高无上的热情。它是人民的，因为它是从人民当中来，始终是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它是民主的，因为它是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因为它一扫军阀制度，成为为人民的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工具。它的战斗力，它的不可战胜，就是由于它具备了这三大特点。这三大特点，在抗战中，经过毛泽东同志具体政策的指导，又有了新的发展，因而在保卫祖国的血战中，造成了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大的战绩。

八路军、新四军这三大特点，事实上也即是建军的三原则。而归根到底，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因为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因此就能够把保卫祖国当成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也就能充分发扬军队中的民主主义。这种人民的军队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的军队，是具有最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

毫无疑义的，八路军、新四军所走的建军道路，是全中国军队所应该走的道路，是全中国军队所应该依照改造的模范。这是中国军队的光明之路，走这条路也即是国家之福。中国人民不要抗战胜利和民主解放则已，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和民主解放，就要努力扩大和组织像八路军、新四军这样的军队。反之，如果有人要想削弱八路军、新四军，或者想依照反人民的军队模样来改造八路军、新四军，这就等于自坏长城，必然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做日本强盗的应声虫，中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

我们愿意全国军队，都向光明方向走，把自己的军队改造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成为任何私人压迫人民的工具，正像毛泽东同志报告所说："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上面说了我们建军的这些主要原则，我准备在下面继续讲我们建军的几个具体问题。

兵役问题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兵役制度。人民的军队，当兵的和当官的都是自愿来的，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所实行的那种志愿兵制，或者将来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所要实行的义务兵制，都是建筑在与人民的意志相符合的基础之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其兵役制度不能不是与人民的意志相违反的，因而不强迫就没有人肯去当这种兵。现在国民党的所谓征兵制，就是反人民的征兵制。国民党的这种强迫征兵制，现在发展成了最黑暗的一种制度，那里"征兵"的方法，是买、抓、骗。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所实行的，是志愿兵制。加入这个军队的，都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自愿来的。他们里面，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而最大部分则是非共产党员。由于八路军、新四军与人民密切结合，它的兵源永不枯竭。

将来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成立之后，将要有可能采取义务兵制。这种义务兵制，将与国民党政府现在所执行的黑暗的强迫征兵制根本不同，是建筑在自愿与说服的基础之上的兵役制。

怎样养兵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便有两种不同的养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养兵"方法，实际上是从剥削人民，因而又是从剥削士兵出发。而人民的军队的养兵方法，则是从爱护人民，因而又是从爱护士兵出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养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

由于以剥削人民剥削士兵为出发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以"国家养兵"为名，想出种种办法，来向人民索取军费。国内搜刮不足，则以国家名义借外债。军费筹得之后，就以吃空额等办法自饱私囊，一层吃一层，官职愈高，吃得愈多；所以尽管筹得的军费很多，士兵却面黄肌瘦，衣不蔽体。中国的军阀，往往是最有钱的人，他们的钱，就是从军费中刮来的。到了国民党的反动派手里，这种黑暗的现象是更加大为发展了。"军费"，这是一笔烂账，从这里，国民党内的反动派不知把好大一笔钱变成了私产。

八路军、新四军怎样养兵呢？

我们的兵是穿起军服的武装农民，军队即是穿军服带武装的人民集团。要穿、要吃、要

喝、要休息、要工作，都与普通老百姓无异。注意衣食住行的满足，这是物质营养；注意抗战爱民教育，这是精神营养。八路军、新四军的养兵办法，不但特别注意军队的精神营养，而且也特别注意军队的物质营养。

这种物质营养：第一，是在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原则之下，去保养军队，因为不然，军民之间就会发生矛盾，人民生活困难，军队生活也困难，就不能有力地对敌作战。在形势开展的时候，在军队的扩大成为必要的时候，必须以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为条件来扩大军队。在环境困难的时候，如像在一九四二年，我们在敌后则以精兵简政，实施了兼顾军民的原则。第二，是在官兵平等待遇的原则之下，订定部队人员的待遇，军官以身作则，与士兵共甘苦。只有能代表士兵利益，能体贴士兵疾苦的军官，不脱离士兵群众的军官，才是一个好的军官，这就是养兵的原则。这样，就在军队中绝灭了吃空额和剥削士兵的恶习，开了中国军事历史中的新纪元。第三，近年以来，我们在养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实行军队自己生产，解决军队自身的物质需要，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个新创造，对于我军有非常巨大的意义。根据边区军队生产的经验，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下，第一年可以达到部分自给，第二年可以达到半自给，第三年可以达到全自给。在有战争的地区，部队自己生产，也可做到部分自给或半自给。首长自己动手，是发动军队生产的一个重要方法。军队自己生产之后，民众负担大为减轻，军民关系更加团结，军队生活更加紧张，部队更加巩固，训练更加有效，战斗更加积极，并为养兵的经费开了无穷的源泉。

对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安置残废军人退伍军人的工作，近年来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除了发动代耕及抚恤慰劳等以外，还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家务。在他们之中，出现了许多生产的英雄，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好。今后对于这件工作，各解放区都要努力做好，使他们的生活过得舒服。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这种养兵方法，乃是中国军队史上空前的大改革。这种改革，正是人民军队内部生活，同时又是其外部生活（与人民关系）的特点。八路军、新四军全无外援而能养兵，且养得很好，其理由就在这里。

怎 样 带 兵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带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带兵方法，是把士兵当成奴隶。而人民的军队的带兵方法则是把士兵当成自觉的战士。八路军、新四军的带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又去反对人民，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种军队，发展了一整套极其野蛮的带兵办法。他们主张“将贵智，兵贵愚”的愚兵政策，因为兵如果聪明了，就不肯干反人民的事情了。他们制定一套军法军令军纪，依照这套军法军令军纪，就树立起军队中绝对独裁、绝对服从的残暴制度，凡是不听话的就处罚，听话的就升官发财，一面威胁，一面利诱。他们在军队中，广泛发展打骂制度、特务监视、甚至暗杀士兵的办法。这一切，是不承认部属和士兵的独立人格，是以黑暗的绝对服从的制度，造成部属与士兵畏惧慑服，以便独裁者为所欲为地去使用军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要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奴役人民，那末，除了这种野蛮的办法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统率军队呢？

八路军、新四军，彻底破坏了几千年来军队中的压迫制度。我们这里，从一九二七年创

立中国红军以来，就废除了打骂制度。我们这里，承认官兵人格平等，只有职务的区别，不允许有军官压迫士兵或上级军官压迫下级军官的行为。我们的士兵为人民当兵，而不是为军官当兵。我们主张极其严格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这个纪律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官兵一体服从纪律，绝无例外。

近年以来，我们在带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尊干爱兵运动的开展。尊干爱兵就是说士兵要尊重干部，干部要爱护士兵。这一运动，大大的加强了部队的团结，大大的提高了官兵的积极性，使军队的各方面工作有飞跃的进步。

怎样练兵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练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练兵方法，是用盲目的、强迫的方法。而人民的军队的练兵方法，则是用自觉、自动的方法。八路军、新四军的练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

练兵分三方面：一是智力，二是体力，三是技术。

练兵首先是练智力。政治觉悟不高，不懂得为什么打仗，就没有积极性，兵也就练不好。没有政治觉悟的勇敢，只是血气之勇，有了政治觉悟的自觉的勇敢，乃是大勇。为了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知识，又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作为基础。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既然主张愚兵政策，所以体力和技术就练不好，因为大家不高兴练。兵练不好，就算有了新式武器也没有用，反而会送给敌人。

八路军、新四军，在智力的训练方面，历来是有成绩的。我们的军队，政治觉悟最高，所以是打不垮的。近年以来，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政治训练更加切实和深入了。在官兵的军事素养方面更有系统的提高了，战略战术的学习与实际运用也相当的发展。在文化学习方面，我们过去有成绩，近年来做得更好。我们军队智力训练中，近年来，在政治与文化教育之外，又加上了生产教育。生产教育，不仅帮助了生产运动，而且灌输了劳动观念，使我们的军人，不会变成“兵痞子”、“二流子”，即使将来战争结束，仍是社会上有用的人材。

还应当指出，在我军的智力训练方面的成绩，有许多要归功于抗战以来加入我军的许多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我在这里对他们表示十分的欢迎。

其次说到练体力。打仗是格斗，是角力，所以体力锻炼很重要。增强体力，首先要吃饱穿暖，其次才是各种体力操练。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既然存在着剥削士兵的制度，就不能使士兵锻炼出强健的体格。而人民的军队既然存在爱护士兵的制度，则必然与之相反。

再其次，说到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过去我们军队中，有不尊重体力与技术的倾向，似乎以为军队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够了。这是很错误的。过去，我们不是也打了胜仗么？不错，过去也打了胜仗，但打了胜仗，不是说我们的技术已经好了，已经够了。我们有了政治觉悟，再加上体力好，技术好，就可以打更大的胜仗，更少伤亡。应该说，上述这种错误的倾向，近年来已经改正过来了。在前年冬天和去年冬天，都进行了很大规模的练兵运动，有的地区发展成为全民练兵。正规军进步很大，广大的民兵学会了埋地雷，这个成绩也是非同小可的。

我们近年来在练兵习武中的新创造，就是以上下合作的群众路线，代替由上包办的军官干部路线。在我们军队中，已创造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官教官，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教学相长的新教育办法。这是适合于我们目前的战争状况的。我

们尊重军官和军事干部的特殊技能的传授。抗战以来，许多军事专家加入我们的军队，这对于我军战斗力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十分欢迎。同时，要使军官们承认在他所指挥的几百几千人中，每人都有特长，行行都有状元，军官们应虚心去向他们学习。我们把军官高于一切的妄自尊大的态度，改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态度。这个练兵的群众路线一经提倡，就发现在几十万八路军、新四军中有不少被埋没了的人材。在练兵运动中，每天均有新英雄新技巧出现，这样就丰富了我们的技术。这种学习热潮正是造成士兵群众掌握技术的基础。总之，把士兵害怕的操场课堂，变成军队锻炼本领和智慧的场所，改变了空气，提高了兴趣，军营变成学校。

我们在练兵中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就可以自满了吗？不能够的。为了将来的反攻，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学习掌握新的技术，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炮兵技术。

我们还要提高战术，注重实战总结，注重野外演习。四大教程的内容，只作为战术和技术教育的参考，择其合乎实用的东西，而不是照本宣科。八路军、新四军今天还不可能做到精通一切军事科学技术，这方面我们还很不够，我们全军需要继续学习，去掌握一切我们所必需掌握的新军事技术，这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这种练兵的原则之下，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士兵是抗日前线有智慧的勇士，明天抗战胜利之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就可以变成现代化的国防骨干和国家经济建设时期生产与文化的干部。所以将来我们军队的复员，是不会给人民与国家造成困难的。

怎 样 用 兵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用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用兵方法，不能不限于固定成规和固定格式。而人民的军队用兵方法，则是随机应变，变化无穷。八路军、新四军的用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得不到人民的帮助，又因为官兵之间的离心离德，作战的时候，不但不能依靠部属和士兵的自动性、积极性，反而必须在这个时候化很多的力量，来防止大量逃亡。这样，用起兵来，就非常之苦了。上面下的命令，都是依照一个主观的公式，既不问敌我力量对比，亦不问时间地点的条件，所以他的命令，是一定做不到的。下级接到这种办不到的命令，就向上诳报一阵。上下互相欺骗，这种军队还能打胜仗么？在抗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怪事，就是对于叛将不加讨伐，投敌的将领回来还可以做大官，有些艰苦守城的将领，反而被枪决。难道这不是奇怪的赏罚制度么？

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形，完全不同。我们打起仗来，处处得到人民的帮助，民兵组织起来之后，挖地道和爆炸运动开展起来之后，人民对我军的帮助，其巨大与重要，是无可比拟的。在军队本身方面，因为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官兵之间相互的了解与团结，所以人人自觉自动，在一个意图之下，机动灵活，奋勇杀敌。孙子说："将不知兵，以其国与敌也。兵不知将，以其将与敌也。"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完全没有的。

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这几句话有很深的意义，古今中外，不知有若干军事家在这里栽过筋斗的。而我们过去有些犯"左"倾幼稚病的同志，也恰是不懂得这种道理。当早年我们军队仅是步枪加梭标大刀时，我们即研究如何根据这个

现有条件去下决心，去决定战法，那时我们对着这样的军队不去高谈机械化兵团的战术。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当然我们处在解放区战场，需要我们去定出适合解放区战场的时间地点的战法。这几条用兵通则，还围绕着军队与广大人民结合的特点。一方面是以军队的作战去援助各种人民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是用各种人民的斗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交通的、军事的）去配合军队作战。军队与人民的这种全面配合一直贯彻到战场上、战役上、战斗上去，这是我们进行人民战争所创造出来的新兵法，也即是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

官兵与人民一致，人人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敌人，因此，八路军、新四军里下的命令，只要适合情况，办得通，每次都是被正确地执行了的；有时也有办不通的过时的命令，因为下面能够适应情况，机断专行，也可以避免损失。这就是我们战无不胜的道理。

国民党军队去年在河南大败，有人检讨经验，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五不和，即军与军不和，官与兵不和，军与政不和，军与党不和，军与民不和。这是很对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到处不和；八路军、新四军，到处有“人和”，这是根本的区别。

我们来说一说军事理论。谈到军事理论，有些人就会搬出一套军官学校的高头讲章，或者广泛引用各国战史，他们讲的都是很高的理论，可惜这些理论，不一定合乎中国人民的实用。无疑义的，我们需要吸收各国军事理论与经验，我们应向他们学习，不学习是不行的。但我们不机械搬用它，不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看待。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八年来的抗日战争，已经产生了合乎中国人民需要的正确的军事学，这是又有理论又有实际的军事学。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军事著作，便是这种新军事学的代表作品。这些著作中的思想，过去可以根据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战例，现在则可以根据国民党战场与解放区战场的各种战例，来证明他的正确性。抗日战争的实践，是检验和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之正确的尺度。我在前面所叙述的解放区战场的抗战军事经验，人民战争的战略，便是毛泽东同志用兵方法特出的结果。

我们在敌后的坚持，我们的胜利，都是遵循了毛泽东同志从来用兵所已规定了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而得到的，这就是：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这种基本原则就是根据军队与人民在作战上的深相结合而规定，也是以这种深相结合而实现的。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两种不同的军队，也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工作。

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其目的在使官兵愚蠢，因为如果官兵不愚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便不能任意为所欲为。所以，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军队中不是进行抗日教育，而是进行反共教育，不是教育官兵去争取民主，而是叫他们去一味盲从。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军队中努力进行特务化的政策，凡是官兵中有民主思想的人，都被目为危险分子，就要被监视，被开除，被逮捕，甚至被暗杀。国民党反动派的那种黑暗残暴的特务化政策，是在于麻痹士兵的政治自觉性，养成士兵的盲目性，是在于监视、绞杀有民主思想的官兵，是在于使军队和人民隔绝，并压迫人民。凡是士兵被压迫的军队，决不能是服务人民的军队，而必然成为压迫人民的军队。虽则那种军队的特务工作，也叫做“政治工作”，但和我们的

政治工作，是有天渊之别的。

八路军、新四军既把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作为宗旨，则政治工作便成为这种军队的灵魂。我们的政治工作：第一，是在于提高官兵的政治自觉性，发扬他们爱国爱人民和改造自己的热情；第二，是在于团结本军与友军；第三，是在于团结军队与人民，提高人民保卫祖国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觉悟，帮助人民的文化教育工作；第四，是在于从政治上心理上瓦解敌伪，使之丧失战斗力；第五，是巩固和提高军队本身的战斗力，保证命令之执行，深入政治、军事、文化、生产各方面的学习。而这五方面工作，又是互相关联、互相一致的东西。这些，是我们政治工作的特点。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能达到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我们进行的战争之所以是人民的战争，所以能进行人民的战略战术，所以能打胜仗，都是和这种政治工作不能分开的。

军队的指挥

两种不同的军队，也有两种不同的指挥方法和指挥机关。

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因为要消灭异己，派了许多私人去当师长，这些师长，常常只受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一个人指挥，别人指挥不动。所以许多师以上的指挥机关，等于虚设，毫无作用；打起仗来，号令纷歧，莫衷一是，互相抵触。那里的参谋机关，甚至连最高统帅部的参谋机关，也常常成为一个传达机关而已。

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机关，层层节制，有职有权，内部一致，号令统一，下级则有机动的余地，所以上下团结。

八路军、新四军的特长之一，就是各部分军队之间的互相配合，协同动作。上级有命令的时候，当然决无推诿，就是上级没有命令，也能自动配合。主力军与地方军、游击队、民兵、自卫队之间的协同动作也很好。所以各军之间，皆能团结。

八路军、新四军的参谋机关，是真正能够工作的机关，这与国民党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它的工作，近年来也有改进，这要归功于参谋工作人员们的努力。今后为了准备反攻，必须更加健全参谋工作。大兵团的作战，在现代的条件下，不能光靠个人的指挥，而要靠指挥机关来指挥。没有健全的参谋工作，就不可能有健全的指挥机关。另一方面，我们的参谋机关，还必须加强自己的业务，首先要加强侦察与通信工作，力求情报的确实与迅速。

怎样解决装备及其他事项

几年来在解放区战场，我们最困难的，是部队装备和各种军用器材问题。我们解决的方策：第一是夺取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几年来都依靠这个原则发展自己，维持战力；第二，就地取材，华北煤铁之丰富，铁道铁轨之破坏取给，大大便利我们自己去制造武器，能普遍使广大民兵发展地雷战术的缘故，就在这里；第三，自己从敌伪手中夺取部分机械，拼凑起来，建设小型的轻便军事工业；第四，这些军事工业，常成为敌寇“扫荡”的搜寻目标，必需分散隐蔽配置，加强必要的武装保护，达到不间断的制造以供给前线。医药方面，采兼用中西的原则，主要依靠缴获与购买，自己也有部分的制造。抗战初期，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帮助了一些药物，令人感谢。自国民党当局在一九三九年封锁解放区，这个来源便断绝了。然而，我们不怕困难，仍能自己解决。这是我们后勤工作人员的努力奋斗的成绩。

强大的主力与强大的后备

解放区部队分为主力军、地方军、民兵自卫军三大类。民兵和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主要担任保卫自己家乡的任务。每一地方的民兵自卫军，完成自己的保家自卫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和配合了全地区全解放区的抗战任务。地方任务和全国抗战任务是密切相联系的。解放区的巨大的民兵队伍，这是我军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我们学会了组织民兵的工作，这件事情，其意义极为重大。民兵一经组织起来之后，就配合正规军作战，或者自己独立作战。解放区人民的生产运动，民兵保卫的功劳很大，敌后许多据点的收复，民兵的围困起了很大作用。民兵的主要武器是地雷，此外还有步枪、手榴弹和各种原始武器，以及土制掷弹筒。为了自己解决武器，许多地方开了“军火田”。民兵的联防作战，亦在许多地方组织起来了，这里看出了民兵向地方军转化的端倪。同时民兵自卫军还普遍的担任着生产任务，这样使战斗与生产结合，武力与劳力结合，实施此种任务，便改造了农村中的许多旧有形态。地方军站在主力兵团与民兵之间，它担任一个县或几个县的保卫任务，不仅担任反“扫荡”的较大军事任务，而且还应该为保护人民日常利益而战斗，如掩护收割耕耘，抢救灾荒之类。我们是根据地方军生于斯，食于斯，祖宗坟墓于斯的乡土热情，加强它去完成保护地方的抗战任务。每一支地方军在这一任务中锻炼得坚强，则它业已接近并提高到主力的水准了。主力在战斗中常处于不时集中、不时分散的状态中，主力必须与地方军、民兵相结合，才能使自己更强大，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互相结合，这样造成了三者的有机联系。在最严重情况下可实施主力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反之，如在情况便利发展时，则民兵、地方军又可在一定条件下集结起来配合主力或转化为主力去完成更大的发展任务。根据这种办法，就使八路军、新四军拥有二百万以上民兵，作为自己的助手，作为自己的后备，这是他们经得起持久战斗的原因的一方面，也是解放区军事建设上伟大的成就。

毛主席在政治报告中说：“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怎样瓦解伪军

在瓦解伪军的工作方面，近年来我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伪军是中国人，帮助日寇来屠杀与压迫中国人民，犯了滔天的罪行，再不赶快觉悟，反正起义，戴罪图功，将来是逃不了民族纪律的严厉惩罚，而与日寇同归于尽的。

伪军之中，成份复杂。在我军所面对着的八十万伪军中，其中五十万是原来的国民党军队，是在国民党内反动派“曲线救国”的荒谬指示下投降敌人的。

因此，我们对伪军的政策，就不能简单化。我们对于死心塌地为敌作伥，屡次劝告无效的伪军，应该干脆地加以消灭；对于具有民族意识，但被国民党内反动派所蒙蔽而投敌的一部分伪军官兵，则要宣传争取，把他们从万恶的泥潭中挽救出来，重回祖国的怀抱。

不过，应当警告他们：希特勒已经垮台，日寇死亡不远，他们做了许多罪恶的事情，再

不立即反正，就没有时间来为国立功，向民族赎他们的罪恶了，他们也就要受到民族纪律的惩罚。对反正的迟疑，其代价将是他们自己的倒霉。

四　今后的军事任务

同志们！上面我已经比较有系统的说明了我们的军事路线，也说明了我们各项工作要怎样做。现在，我要说一说今后的军事任务：

全国的军事任务

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主张，是使中国抗战建国获得胜利的政治方向。

在这个方向下的军事任务，便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执行这一任务，全国军民都迫切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统帅部，按照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原则，成立一个能够胜任的统一指挥的联合统帅部。

这个联合统帅部，要按照孙先生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原则来办事。按照这个原则，则原来在国民党统帅部中和各军队中的一切脱离人民的、反人民的腐败陋习，都必须革除和改造，原来不适合于抗战和人民利益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政策都必须改变，原来上层的失败主义分子、亲日分子都必须解职，军事训练必须加强，军队的民主主义作风和政治自觉性必须发扬，军队中的特务作风必须根本废除，贻害人民和贻害抗战的兵役制度必须根本改变，而民族纪律必须建立，官兵待遇必须提高；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国民党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才能改变国民党军队内部官兵的关系，才能实现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而发挥其能力于抗战。所以这个联合统帅部的成立，是与国民党部队的爱国官兵的利益相符合的。

这个联合统帅部的成立，也符合于一切地方系军队中的爱国官兵的利益，因为经过它将废除分裂全国军队的一切不平等的差别待遇，废除那种牺牲异己保存自己实力的失败主义战略，经过它将增强地方系军队本身的进步，以符合人民对军队的希望，并使全国各军团结起来，有力地去改变战局。

坚持八年苦战的解放区战场，和所有苦战敌后的军队，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敌后友军，他们同样需要这个联合统帅部，以便使国民党战场与解放区战场有效地配合作战，以便援助解放区的各种军队，更有力地去打败日本侵略者。

特别需要指出：这个联合统帅部必须毫无例外地把一切新式武器去武装一切能对敌作战的部队，以加紧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完成民族的解放，而不是把它保留收藏起来，准备内战，以压迫人民。

共产党员，要与军界中的一切民主分子和军队，实行广泛的军内合作与军外合作。八路

军、新四军中，共产党员只占少数，这里并无国民党军队里那种强迫官兵全体入党的制度，所以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是共产党人与民主分子联盟的军队，即是人民的军队。

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愿与全国抗日武装力量亲密团结起来，为成立联合统帅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共同奋斗。过去的成见应该废除；一切磨擦应该停止。我们认为一切抗战的友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都曾英勇奋斗，都有功于国家民族，在改组国民党统帅部，造成了全国军队团结联合的基础时，必须更大发挥全国军队的联合力量，去配合同盟国迅速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不仅是全国军民的期望，同样是各同盟国家的民主舆论所期望的，同时也是国民党内部大部分爱国军官和民主分子所期望的。

沦陷区的军事任务

在沦陷区的军事任务，是加强对沦陷区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以争取他们反正，加强敌后各城市工作和组织地下军的任务；这些工作与我军行动配合，则大反攻的伟大日期到来，我军必能站在大反攻的主导地位，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大陆之外。

毛泽东同志时常说："应该学习法国地下军解放自己的经验。"沦陷区的一切爱国同胞，我们在沦陷区一切工作的同志，都要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这个亲切的教训，认识自己责任的重大，足踏实地，准备力量，以便时机成熟的时候，即摧毁日寇，光复我们神圣的河山。

解放区的军事任务

解放区的军队站在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前线上，要担负起极其重大的战略任务，来协同国内一切友军和同盟国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

解放区的军事任务是：

一、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凡是敌人占领的地方，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都要去收回。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说："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藉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但是同时应当注意，敌人在目前还是有力量的，它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去年一年，我军在敌后收复县城十六个，今年四个月，收复县城十二个，这是因为日寇自顾不暇，而我军则在锻炼中更加坚强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依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集中较大兵力，向可能收复的地区发动进攻，是有利的，这可以减少敌人对我的进攻，并逐渐准备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同时，在一个时期内，要估计到敌人还可能向解放区进攻，所以仍须作粉碎敌人进攻的准备。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与不适合情况的集中行动，还是应该避免的。

二、扩大人民武装，消灭与瓦解敌伪军。为了抗战的胜利，和制止内战的危险，主力军、地方军、游击队、民兵都还要扩大，不过必须在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条件之下进行。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他并且指出："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为了争取新中国的实现，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就要有强大的人民武装。至于消灭与瓦解敌伪军，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必需加紧去做。

三、为了准备反攻，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对于主力兵团向运动战的转化，要在适当的集中作战进攻敌人的过程中，逐渐锻炼和学习。民兵的训练，也须注意。民兵应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学会各种爆炸方法，使成为普遍的爆炸运动。

四、提高军事技术。为着战略反攻，必须有新式的装备，从现在起就要注意提高军事技术，以便到时能够使用。我们已经缴获一些炮，现在就应好好学习炮兵技术，和研究现代战争的战术。

五、加强指挥机关。要加强参谋工作，使其能够胜任地担负起现况下的军队指挥，同时准备战局之扩大。要讲求更强有力的应付伟大反攻的考验。要加强政治工作，鼓励士气，提高士气，加强军事学习，保证能胜利地应付敌后现有情况，并能于情况剧烈变更时，有把握地去迎接新的战斗。要针对目前的实际作适当部署，还要对将来的变化有远见，预先有打算，这是政治工作的新任务。要加强后勤工作，诸如供给、卫生、兵工等事项，要使其能应付现在战局的需要，并对反攻之需要有打算有准备，以期大动用时不致匮乏，这是后勤工作的方向。我们指挥机关将来需要极其大量的优秀的干部，我们要把许多好干部输送到军队中去。

六、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全军动员起来，进行生产与节约，储蓄粮食和物资；自己努力，筹集大反攻的所需要的物资。到将来集中作战之时，可以有备无患。

七、加强优待抗属、抚恤伤亡、安置残废军人及退伍军人的工作。

八、要推进这一切工作，完成这许多任务，必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内部有很好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团结广大的友军。团结与进步是不可分的。同志们应切忌自满，切忌骄傲；自满与骄傲，是山头主义的来源之一。不论有怎样大的功劳，不应归功于个人，而应归功于人民；相反的，我们要时时进行自我批评，互相学习，以便提高自己的能力，无负于人民的信赖和委托。谦虚谨慎，自我批评，山头主义就会减少，军内军外的团结就会加强，我们就是无敌的了。

上面所提出的这一切解放区的今后的军事任务，其一个总的趋向，也即是其所必须准备的中心战略任务，概括地说，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战初期所已指出了的：八路军、新四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再加重说一遍：任何人如果轻视解放区战场和解放区九千余万英勇战斗人民对于中国解放事业和对日大反攻的伟大重要性，必将犯很大的错误，那是一定的。

五 结 束 语

胜利的光芒很快要放射到全世界全中国，中国人民八年来所努力的伟大工程，业已逐渐接近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提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方向。我的报告总结了八年抗战军事的经验，主要是解放区抗战军事的经验，为的是如何在军事上去完成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完成其所提出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抗战建国任务。

同志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是经过我们无数同志、无数中国人民流血牺牲

创造出来的，所有已牺牲的同志们和战士们，将永远不朽。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支人民军队曾作了这样的论断：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毛泽东同志这个有力的、英雄式的论断，是真实的，是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深厚力量。这支代表中国人民力量的军队，这个中国人民力量的精华，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这个力量将永远与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存，将永远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战胜日寇，战胜一切妨碍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障碍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们党的这次大会，便是要引我们走到这胜利之路。

同志们！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来和全中国人民在一起，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但已锻炼出了一条极坚强的政治路线，能够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且已锻炼出了一条极坚强的军事路线，能够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这条军事路线，正如政治路线一样，其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着争取抗战的胜利，我在这大会上特别号召同志们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一如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学说一样，所有部队、军事学校、军事训练班，都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作为基本教本，作为教育的灵魂，以便于在思想上加强武装自己战胜敌人。

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胜利万岁！

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万岁！

团结一切友军打败日本侵略者！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万岁！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

刘 少 奇

一、引 言

同志们！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次大会的报告中，对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作了一个深刻的英明的分析，对于八年来中国民族的抗日战争以及我们党在抗战中所坚持奋斗的路线，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对于如何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力量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及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如何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制订了全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的伟大的纲领。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是中国人民战斗的胜利的号召，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大宪章。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过去二十四年的英勇奋斗中，特别在最近八年的英勇抗战中，经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迂迴曲折的道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终于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打出了无限的光明。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抗日救国的重心。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规定了彻底代表中国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革命纲领与革命政策，不但和中国民族与人民的敌人及一切违反中国民族与人民利益的反动政治派别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并且粉碎了党内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我们党正是在这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集合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中最忠实、最勇敢、最觉悟与最守纪律的代表，从而使它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使它在和民族与人民的敌人斗争时，是十分坚决、十分勇敢、并且知道如何去打击敌人与如何避免敌人的打击。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又在于坚持地实行了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组织原则，使它成为建立在人民群众中、保证它和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严格纪律的党。它有严格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有自觉的铁的纪律，有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内不容许有小组织和派别活动，慎重地接收党员，每个党员都要直接参加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等等。所有这些组织原则，都是为着领导人民达到彻底解放的目的。这些组织原则，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制订党章起，就体现在我们的党章内，经过二十四年的伟大的实践斗争，证明

我们党的这些组织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我们的党是按照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就保证着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在斗争中的行动一致，以及各种艰难困苦的克服，并领导人民获得伟大的胜利。

广大的革命的中国人民，是热烈欢迎与信赖我们这样性质的党，因为它不只是有彻底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革命的纲领和政策，而且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在严重的艰苦的战斗中，经得起锻炼，并表示了自己坚强的组织力量。灾难深重的、具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国民族，在强大、狡猾而野蛮的敌人面前，它的解放斗争，是十分严重的。只有我们这样性质的党，才能也才敢于率领全国人民战胜这样的敌人，获得解放。因此，我们今天来修改党章，并不是要改变我们党的这种性质和修改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相反，而是要根据我们党的新的经验，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三个大革命时期中所更加丰富起来的建党学说，进一步地发展与加强我们党的这种性质和这些原则。很明显，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事变，为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为了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了极大地增强我们党的战斗能力及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那末，进一步地发展与加强我们党的这种性质与这些原则，乃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党章，党的法规，不祇是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是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建造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末，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否则，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就要障碍我们党的工作内容的发展与政治任务的执行。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所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我们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进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因此，在我们党的一定基本组织原则下，依据新的环境和条件以及我们党内的新的情况来修改党章，也是完全必要的。

党是坚持基本的组织原则之不可破坏性，但应规定适合于环境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以促进党的工作的发展，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与行动的统一。

党的七次大会对于我们的党章，其所以要作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乃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我们的党章，从一九二八年六次大会修改以后，到现在已有十七年了，党内党外的情况，与十七年前比较，都有了极大的变动。党在今天又有了需要动员全党去执行的完全新的政治任务。

第二，我们党在最近十七年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是极端丰富与极端重要的，必须总结性的用这些经验来充实我们的党章，和加强我们党的建设。

第三，党的六次大会通过的党章，由于情况的特殊，许多部分不能适用，这就造成许多党员对于党章重视不够、实行不利的习惯，因此，七大必须制订完全适合于今天现实情况的党章。

现在我们党的情况，与历史上任何时期比较，都有了极大的特点。我们党现在已经是这样一个党：

第一，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它已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它的组织与党员遍布全国各地,它已被全国人民认为是他们唯一的救星。

第二，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在它领导之下所组织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已成为目前抗日战争中的主力军，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依靠这支人民军队长期抵抗着日本侵略者，并将依靠它使战后的中国成为民主的统一的新中国。

第三，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在这里，实行了各种民主改革，并进行了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因而使这里的生产提高，民生改善，社会安定，人民文化与觉悟提高，因而动员与团结了这里的全体人民有力地抗击了日寇，并鼓舞着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里是新中国的模型，是是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保障。

第四，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我们党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路线，业已被彻底清算，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业已在整风运动中被大量克服，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与路线，则在全党获得了从来未有的巩固的胜利。暗藏在党内的民族破坏分子和奸细，也业已有许多被清出。因此，我们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业已空前的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这在中国全部解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将是不可衡量的。

最后，第五，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在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们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跟从这条道路，在一九二七年前，发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是这个大革命的组织者；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创造了伟大的苏区和红军，毛泽东同志是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毛泽东同志又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由于毛泽东同志是这样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人物，并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考验，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信任、审慎选择的结果。我们党不只是有了自己的伟大的领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围绕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中坚干部，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被证明是中国民族最优秀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各方面的最上乘的干才。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有了这样的伟大的领袖，又有了大批这样的干部，我们是不可被战胜的，并将战胜民族的和人民的一切敌人。

同志们！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

的并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它在今天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

这就是我们党的目前情况的主要特点。

这就是我们党业已得到的伟大的成功。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领导的胜利。

然而，在我们党内，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弱点了，也不是在我们前面就没有困难了，我们还有缺点和弱点，我们已做的事业，距离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我们党的绝大部分，还是处在农村中，我们的党员，绝大部分是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虽已经过严重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们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一般还是不高。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在一些同志中还没有完全克服，并且在一些同志中，还存在着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倾向，以及妨碍全党团结和统一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我们党的这些缺点和弱点，还需要我们有更重大的努力和更艰苦的教育工作，才能克服。

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特别经过了最近八年的英勇抗战，现在是接近胜利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与准备胜利，就是动员与团结全中国人民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的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沦陷了的城市和乡村，并克服中国一切反民主势力，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这个目的，就要百倍加强我们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的工作，提高我们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的组织作用与领导作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人民，去迎接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斗争和空前伟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任务。

目前我们党的情况和我们党的这些任务，就是我们重新修改党章的出发点。

二　关于党章的总纲

我们现在制定了党的总纲，加在党章前面。这就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这也是党章的组成部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因此，凡是党员，都必须承认这个总纲，并以这个总纲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准则。我们党有了这个总纲，将更加促进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这个总纲，是概括我党二十四年斗争的经验，并吸收了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好的经验，也即是概括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而制订的。它在简单的文字中，说明了我们党的性质与理论；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以及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基本方针和我们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还说到了在我们党内不能容许机会主义存在；说到了党内的自我批评，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组织原则等。所有这些，在党章的总纲内都已提到。我只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一些解释：

第一　是关于我们党的性质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首先就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我们党的这种性质，是不是还有疑问呢？我以为没有疑问了。

还在我们党成立以前，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在其优秀人物的领导之下，就进行了八十年

的、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的革命斗争，直到一九二一年，由于当时的国际条件（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与国内条件（越来越凶的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的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与“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革命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第一批从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因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从它产生时起，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就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各种优良作风，因而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到现在，它已经过了二十四年艰苦、曲折而极端复杂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它不只是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的胜利局面，而且积蓄了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集中与创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达到了高度的完备的发展。这就是说，我们党从来就是而现在尤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新式的政党。

虽然，现在我们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很少，只有将出身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党员合起来算，才占了大多数。我们党今天的这种情形，以及其他的情形，自然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党内反映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甚至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思想，也时常经过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传达到党内来，这就是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及政治上、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来源。然而，这种情形还不能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是由以下一些条件来决定的：(一)我们党是在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接受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最优良的传统，从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大革命及大革命以前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并与中国工人运动有不断的联系；(二)党是一贯遵循毛泽东同志创造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及其所制订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违反这个路线的都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及其无限威信，大批久经锻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其中并有许多是直接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干部，足以担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导的事业。(三)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纲领与政策，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并以这种纲领和政策独立地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大限度的实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实现了无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革命的领导权，并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四)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纲党章，并成为党的一个组织内的工作者。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是一直保持着与加强着的。党清除了自己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及不可救药、不可改造的机会主义分子出党。(五)二十余年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锻炼，几十万党员长期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社会职业，转入革命的军事集体生活与生死斗争中，使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与锻炼，这样，就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与集体的意志，加强了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使他们懂得：在敌人面前形成全党利害的一致，而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的服从党的集中领导，并使动摇分子在严重的革命斗争中从党内不断地自然淘汰出去。(六)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实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经过这样产生、又经过这样锻炼与教育出来的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

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

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论它是怎样大量的反映在党内，但它在党内是不合法的，并在党的教育和整风中被不断纠正，在严重的实践斗争中被不断证明它是不适合人民利益的，因而使它不断破产。我们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亦如欧洲某些国家工党中党员的社会成份不能决定工党的性质一样，在那些工党内的党员，虽然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然而它们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不能执行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的任务。

在中国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进我们党内来，这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党决不应该拒绝他们。我们党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无产阶级要从小资产阶级中不断补充自己的队伍。乃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法则。

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都是过渡的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要分化的，除开极少数的分子走向资产阶级而外，一般地要走向破产，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当它还是作为过渡阶级而存在时，它在政治上是可以跟自由资产阶级走，也可以跟无产阶级走，它在思想上可以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可以大量的加入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而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党是能够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经验证明：在他们接受我们党的条件加入我党以后，极大多数都能认真学习，接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接受党的纪律，参加群众的实际革命斗争，因而改变了他们原来的性格，使他们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其中并有许多人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他们的性命。然而，也还有极少数的人，在他们入党以后，不能认真地正确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改变他们原来的观点与作风，有时甚至顽强地对抗无产阶级的观点与作风，企图按照他们小资产阶级的面貌和兴趣来改造我们党和建立我们党内的生活，这就自然不独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而且要在党内引起各种错误与分歧。这也是被党的历史经验所多次证明了的。

因此，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列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克服他们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没有这种改造，就不能成为很好的党员。而这种改造，又常是一种长期的艰苦工作，对于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来说，当其还不完全自觉时，并且是一种痛苦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特点。

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只有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 ,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相反，如果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甚至侵夺党的领导，压抑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

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

由于中国社会上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和我们党内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之众多，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我们党以前还是处在幼稚的缺少经验的时期，此外，还由于我们党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全部投入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宣传工作，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不够。这种情形，就给了党内没有经过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可能，利用许多党员思想上的盲目性及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下，来宣传实质上的机会主义。这就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获取了某些时期的暂时优势的原因。

当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据优势时，他们不只是在政治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且也在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党内某些同志的自由主义路线。这些同志企图使我们党变成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党，反对与废弃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肃性，破坏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与党内铁的纪律，集体地无分别地接收党员，听任各种错误思想在党内发展而不加以纠正，对党的敌人及暗害分子丧失警戒，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拥护党内的散漫性和小团体倾向及自发性等。很明白，这将影响我们党不能成功任何事业，并将瓦解我们的党。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某些同志无视中国的特点，机械地搬运外国关于党的建设的经验，并把它当作教条而加以绝对化，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内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一旦这种虚伪形式被揭破，就要产生党内极端民主的无政府状态。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的小团体。

这两种偏向，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与急性病在组织问题上的反映。

除开上述两种偏向外，还有一些同志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软弱与盲目性，他们不知道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而只是单纯的着重从组织上建党，因而使党的建设流于形式主义，他们喜爱与奖励那些只知盲目服从的所谓"老实人"，而惧怕与责备那些有思想、有能力但不盲目服从的人。他们只是琐碎地从生活上去注意人家的小节，而不注意一件极端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去启发与提高党员群众的觉悟，因而也就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更不了解为了达此目的，首先必须启发与提高高级干部与中级干部的觉悟。他们只是注意党内的工农成分，而惧怕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忙于所谓组织上的"领导"，忙于开会，忙于奔跑，忙于各种琐事，但是不用思想，不能将组织上的领导提到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水平上来，而使党的组织工作脱离党的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这就是在党的建设工作中的盲目性。很明白，照着这种做法，也同样不能建设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党，并可能被党内机会主义利用。

我们党对于上述各种错误路线，是不断的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加以克服，而一致地拥护与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建党路线，和上述各种错误路线相反，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他经常指示我们：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他为我们党制订了详尽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他在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就着重提出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各种不正确倾向，号召同志起来，彻底加以纠正。毛泽东同志还采取了整风这种创造性的教育方法，去改造一切反映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组织方法与千篇一律的滥调）。他把我们党的发展过程，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他把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同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党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密切联系着。毛泽东同志的"古田会议决议"，"论新阶段"的下半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中央关于继续整风运动的决定"，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等著作以及其他著作，就是毛泽东同志建党路线的集中表现，就是毛泽东同志针对我们党的特点而提出来的正确的建党路线。我们党实行了这条路线，因而克服了各种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的建党路线，因而使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成功。

很明白，如果我们党采取了上述错误的建党路线，即使我们党内的工人成份再多些，也不能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党采取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份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我们党的主要部分之所以长期处在农村中，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最广大的农民作为目前革命中的主力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受压迫，长时期内无法自由进行革命活动，乃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组织自己广大的农村同盟军，以便在适当时机配合这个同盟军解放城市。这就是我们党长期在农村中工作的实际意义。在现今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只有当我们党是这样作了之后，我们党才是代表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执行了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时期的任务。如果我们党没有这样作，那我们党就决不能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因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我们的党，要长期在农村中用最大力量来组织与领导这个农民革命，乃是必然的道理。

党章的总纲指出了我们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当然，这是我们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各个时期都是一致的。我们党现在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只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只有当它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而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全体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它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体人民，它自己也就不能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只有中国工人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才是中国民族的主体，只有他们的利益，才构成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本身。中国共产党在目前为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代表全体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在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也同样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即是全人类的最后解放。

第二　是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对于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的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的一概接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的接受其优良的与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与不适用的东西。这些都非常清楚。

现在要加以说明的，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我想，我们的大会以至全党是会热烈拥护这种确定的。

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免的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及其与人民联系的缺乏和思想眼界的有限性，他们的代表者，纵也能提出一种革命的纲领和一定的民主思想（这些好东西已由我们当成一种遗产接受下来），却不能形成一种有系统的革命理论，更说不上能形成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

我们的大会应该热烈庆祝：在中国共产党产出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精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和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投降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长期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覆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而列宁——斯大林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将对各个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重大的有益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标准。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的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这不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作精确的科学分析，而且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要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无限忠心，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因此，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

适合于新的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而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因此，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为此目的，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

在闭塞头脑的党内的教条主义被克服之后，继续努一把力去克服经验主义的阻碍，并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党内将会有一个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高涨。这就从思想上准备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第三　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指出了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现在具有近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则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了。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指明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性、复杂性等等。

由于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又由于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人民大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和现时的国际条件，便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最新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但还有别的阶级可以参加革命，还有其国内外的广泛的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就是联合所有一切能够参加这个革命的阶级、阶层、民族和个人，为彻底肃清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些问题，过去在党内曾经是混淆不清、发生过许多争论的，但现在已是非常清楚而确定的了。

此外，我们在党章的总纲上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其他许多特点，如革命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斗争的复杂性、在一定时期内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所有这些，今天也已经是很清楚了。

关于中国革命这些特点问题，过去在党内是争论最多的，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错误，差不多都对于这些问题有过错误的了解，毛泽东思想，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备的发展。因此，这些特点，必须在党章的总纲上加以肯定的说明。每个党员彻底了解这些特点，乃是必要的。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最好地说明了中国革命这些特点。我们党从一九一九年中国“五四”

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今天领导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是经过了光荣的特殊的历史道路的。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认识与利用中国这些特点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在中国人民大众力争解放的基础上，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大众一切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与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向压迫中国民族的外国帝国主义、向压迫人民大众的国内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和暗害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三次伟大革命战争中，即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发展和锻炼出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期间的历史，乃是三次革命战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中国广大的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对敌，又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反动性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与中国广大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结合的历史，乃是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又与它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建设伟大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上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期间的历史，乃是中国近代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各种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在这种根据地上试验成功，藉以教育我们党与全国人民的历史。

最后，中国共产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反对党内无视或者误解中国革命这些特点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与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并将其粉碎的历史，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而不断结合的历史。

这些，就是我们党已经走过的具体的历史道路。

我们党的这种历史道路，最好地说明了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以及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这个革命中的决定的作用。

我们党的历史道路，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特点所早已阐明的历史道路。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同志在某几个历史时期，不能在形式上、组织上决定全党的行动，然而也正在这种时期，就愈加明白表示：真正的我们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继续着，存在着，发展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为中心而存在，而发展。

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所以我们在党章的总纲上特别强调地说到了这些特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

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彻底胜利时，这些特点，是会继续存在的；因此，每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经常记住这些特点，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否则，过去的许多错误还是会要重复的。比如，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在目前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因而在政策上犯了偏右的或者偏左的各种错误。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因而在工作中犯了过分的集中与不适当的正规化以及工作中的简单化，一般化，缺乏充分的灵活性等。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在精神上没有充分的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因而犯了各种形式的急性病，或在困难时悲观颓丧。由于不了解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重视军队工作，不学习军事知识的错误。由于不了解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适当地在农村环境中强调城市观点和不重视农村工作的错误。又由于不了解在某种时期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因而又可能犯忽视城市工作、拘守农村的保守主义错误。由于不了解在一切人民群众中进行长期忍耐工作的必要性，因而采取盲动冒险及命令主义的办法等。如果我们同志只就一般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些特点，那还是完全不够的，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在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时，都能具体地照顾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所以这些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党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至少是目前阶段中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

第四　是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并贯串着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

毛泽东同志屡次指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他在向这次大会的报告中，又以极恳切的词句指示我们：要根据群众路线去进行工作。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帜。他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小集团或自己个人利益出发"。他要我们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以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否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要我们同志明了："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又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所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都是极端重要的，每个同志都必须细心领会和切实执行。

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根本不相同的。

我们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全部过程中所起的决定的作用，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就将使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而如果没有这种领导，就将使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下，只有依照我们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

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关系，它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于人民群众。否则，先锋队是完全可能脱离人民群众的。而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独不能实现它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这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有彻底的明确的群众路线。

在一些什么重要情形下，先锋队就要脱离人民群众呢？

首先，就是先锋队如果不能履行自己当作人民先锋队的应有职责，不能在一切时期和一切情况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不能坚持真理，不能在有错误时及时修正错误，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尾巴主义、自流主义，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公开的自发论，公开主张追随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主义"理论"，公开主张不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理论"，是还没有的。但是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就是一种尾巴主义，它们远远落在当时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后面，不能提出代表人民群众并鼓励人民群众前进的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因而脱离人民群众，使革命受到损失或失败。此外，还有些同志在各种工作中有尾巴主义这类性质的错误。比如，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不把党看作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把党看作是军队的、政府党团的或职工会的附属品。另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疲蹋，老一套，安于现状，任其自流，丧失上进之心，而不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情况，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率领群众力求前进，违反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迁就群众中落后的意见，把自己降到普通工人、农民甚至落后份子的水平，失去先锋队的作用。有时又迁就群众中错误的意见，而跟随在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后面跑，不能对群众实行正确的有远见的领导。这种倾向，是要使我们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因为人民群众并不需要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

其次，就是先锋队如果不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不设法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来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因而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或者提出了过高的口号、过左的政策，或者提出了当时情况所不能允许的与群众所不能接受的过高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是犯过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的错误的。比如，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对人民群众负责，不相信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去代替群众斗争，恩赐群众解放，命令群众行动。他们犯了急性病，表面上积极，然而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怎样才能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启发群众的觉悟并适当的等候群众的觉悟，不知道采取许多步骤去使群众自然而然的革命化，而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和任务，并强制群众起来行动。他们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特别在提出了过高的口号与过左的政策，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之时，他们更用强迫命令甚至惩办主义的办法，去推动其工作。其中最恶劣的作法，就是他们每到一地，就去找那里的错误、缺点和坏典型，加以批评、斗争和处罚，以此去吓唬人民和干部，去推进工作；而不去找那里的优点和好典型，

加以研究、补充和系统化，奖励那里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传布好的经验，以鼓励党员和人民前进，同时即可以克服那里的错误、缺点。他们到处打击人，用命令简单解决一切，不向人民群众学习，不吸收群众中的新发明与新创造，而强迫别人依照他们的办法行动。这种倾向，是要严重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并要引起群众对于他们、以至对于党发生怨恨。

除开上述两种倾向外，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也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中发生了。这也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

官僚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观点。其典型的表现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绝群众的批评，抹煞人民的权利，甚至要求人民为他们服务，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劳民伤财，贪污腐化，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等。

军阀主义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不了解：我们的军队，乃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武力，乃是人民用以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把军队看成是超出人民之外、或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一种特殊势力，甚至把军队看成是可以造成少数个人势力、个人地位的工具，因而他们就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用在人民的军队工作中。其特点：首先表现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上，用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办法来统率自己的士兵与部下，而不依靠士兵与部下的自觉与自动。其次，表现在军民关系上，不注意严整部属的群众纪律，不热爱人民，强迫、打骂人民群众，使军队脱离人民群众。再其次，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在革命军队与革命政府的关系上，企图照军阀那样把军队拿在政府的上面，企图以军治政。很明白，这种倾向，与人民军队是根本不相容的。

上述这些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之所以在我们党内产生，是由于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不够和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影响，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份以及脱离社会生产甚久的成份，常常容易接受这种影响而成为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以至在我们党章的总纲上也提到了它们。将来革命愈扩展，工作愈繁重，我们内部的这些倾向也愈有可能生长。因此，我们应经常和这些倾向作斗争，才能经常保持和巩固我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应该经常扫地和洗脸，以免这些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蒙蔽与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

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先锋队，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必须经常清除上述各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而实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的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的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我们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与正确的组织路线分不开的。虽然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间，可能发生部份的暂时的不调和的现象，但不能设想，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组织路线是不正确；反之，组织路线正确了，政治路线却是不正确；要把二者互相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谓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彻底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

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

为了贯彻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强调地指出了以下几个群众观点，这几个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的建设起来。

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因此，凡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一切党员，以及参加我们队伍中的一切人员，只要是忠于职务，并多少著有成绩的，也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管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与否，也不管他们担负的是重要的领导职务，或是普通的战斗员与伙夫马夫等职务，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直接或间接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我们都是平等的、光荣的。我们要在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中，提高自觉性，使我们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都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我们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获得益处，获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害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损失。凡属是我们提出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都应该是正确的，才于人民有利，如不正确，即要损害人民的利益，即要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速速求得改正。就是说，我们要善于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得很好，而不要服务得很坏。因此，我们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应采取轻率态度，都应有严肃的负责的态度。

还必须了解：向人民负责与向自己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即是说，我们党员受了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命令去进行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是要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负责的；但如果把这种对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分开来看，那是错误的。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才算是尽了最后与最大之责。要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凡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即是对党有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尽力去作。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每个党员都必须反对，必须避免。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最不负责。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发现自己领导机关与领导人所指示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有缺点、错误时，即应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向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建议改正，要弄清是非，不应马虎敷衍。否则，就是对人民没有负起责任，也就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党的纪律是必须遵守的，党的统一是必须保持的，因为保持我们党的统一与纪律，即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藉口对人民负责而破坏党的纪律与统一；但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任何缺点、错误，都必须纠正，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去帮助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纠正任何缺点与错误。因为任何缺点与错误，都是对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对党不利。我们党员忠诚的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及对领导机关的错误所采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以及遵守党的纪律的精神，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马克思早就说过：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不是皇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杰，而全靠群众自己救自己。这就是说，人民

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所以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由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并且举出自己的先锋队，在先锋队的指导下，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去斗争，自己去争取，然后群众才能自觉的去获得斗争的果实，并保持与巩固这种果实。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否则，人民的敌人是不能被打倒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自觉与真正发动，仅有先锋队的奋斗，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不会前进的，任何事业都是不能成功的。甚至就是如减租减息、变工队、合作社这样有关人民直接的利益，没有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即使有什么人“恩赐”了减租减息，代替群众把变工队、合作社组织起来，群众还是“明减暗不减”，变工队、合作社也只能是形式的空洞的东西。

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但只要我们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真正的自觉与真正的发动，又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作好的；因为只有作好了这第一步，才能进入第二步，即是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我们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份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

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迫切需要有远见的坚强的引导者与向导，因为这样的引导者和向导，是人民群众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是人民群众并不需要代替他们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因为这种脱离群众的“英雄好汉”不能成就任何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

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我们要很好地为群众服务，要去启发群众的自觉，要去指导群众的行动，那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条件，必须有预见，对于各种问题必须有预先的计算。就是说，必须是先觉者。只有先觉者，才能觉后觉。我们同志除开完全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具有充分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还必须是十分有经验和十分机警，才能很好地去启发群众自觉和指导群众行动，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和有经验，为了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向敌人学习，也可以增加知识，而最重要的，就是同人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的知识，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群众的创造能力，是最伟大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常常教导我们：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教

育群众。只有我们同志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如果不向群众学习，而自作聪明地从脑子中想出一套东西，或生硬地从历史经验与外国经验中搬运一套东西，来启发群众与指导群众，那是一定无用的。为了能够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如果我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那我们的知识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就决不能是聪明的，决不能是有知识有本事的，我们就决不能领导群众。

"平常的人，常常比我们某些高级机关原来更接近于真理得多。"

"为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光靠我们的经验，光靠领导者之经验，还是远不够的。为要实行正确的领导，除有领导者之经验而外，还须用党员群众之经验、工人阶级之经验、劳动者之经验，所谓'无关重要的人'之经验以补不及。"

为要做到这一步，"一定要领导者是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一定要领导者是与党员群众、与工人阶级、与农民、与劳动知识份子有极密切的联系。"

"与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随时都决意倾听群众之意见，——这就是布尔塞维克领导之力量所在及其必胜不败之原因。"（"斯大林选集"第五册三二二页）

这是斯大林告诫苏联共产党人的话。这是一条普遍真理。

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职责，就是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是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务，决定问题，正确地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实行自己的决定，正确地组织群众来审查自己决定之实行的情形。而为要使这些事情都做得好，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必须实行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否则，任何一件领导工作都是做得不好的。

这就是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有些同志只把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看成是群众工作，但不把其他工作也看成是群众工作，这是错误的。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无一项不是）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都应该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去进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

我们党内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党的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军队本身，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军队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自然，各种工作，各有其特殊的工作方式，不可混同，如工会、农会的工作方式，和党的、军队的工作方式，应该有所区别，但各种工作，都是群众工作。

自然，人民群众不是划一的，各种工作是复杂的。我们同志应从各种工作的岗位上，直接地去为部分的、具体的人民服务（如为一个工厂的工人、一个农村的农民、一个机关的职员、一个部队的士兵服务，以至只为几个人服务等），而汇合于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个共同目标上。因此，我们同志必须正确理解部分与全体的关系，直接进行部分工作与为部分人民服务，间接推进与加强整个革命工作与为全体人民服务，我们同志必须同时具有部分观点与

全局观点，只照顾部分不照顾全体，是不对的，只照顾全体不照顾部分，也是不对的。应使部分与全体统一起来。在人民群众部分的暂时的利益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使部分的暂时的利益服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这就是说，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小原则应该服从大原则。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而，只有当我们同志善于思想，善于在一切具体情况下，正确地区别与配合人民群众的部分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才能有彻底的群众路线；否则，就可能自觉与不自觉地只站在部分人民的暂时的利益上，反对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而从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上把自己孤立起来。

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在最初时期，通常都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而积极份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按照群众路线，必须照顾多数，即是必须照顾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我们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以及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都必须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能够接受的，所谓启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主要地就是要去注意启发那些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有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有了觉悟，有了热情，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有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团结与组织积极份子，使积极份子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组织积极份子而去组织积极份子的，绝对不能使积极份子从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而仅仅是为了要经过积极份子才能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即是为了最广大群众而去组织群众中的积极份子。如果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还未自觉，我们就要善于去启发他们，并要善于等待他们；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待，而冒冒失失地率领少数积极份子前进，我们就会脱离群众，我们就要失败。

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就全国范围来说，所谓照顾人民群众的多数，主要地就是照顾农民。我们的群众观点与农村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看不见中国的农民，如果不着眼于中国农村的解放，是一定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中国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他群众的文化水平（除知识份子外）也很低，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法，就更有必要。指导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仅用一般号召，是决定地不能成功的。因为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从亲自看到的、亲自体验到的事情上去理解问题，而不是从我们一般的宣传和口号上去理解问题。我们必须在工作中突破一点，做出模范，让群众亲自看到、体验到，给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以理解问题的可能与方便，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在我们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成为群众的热潮。近来各地部队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之所以发生很大的作用，成为群众中最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就是因为他们是以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和经验，使群众理解了问题，提高了群众的自觉与自信。中国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建设事业对于全国人民的教育启发作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自觉与自信，也是这样。至于指导方面在突破一点的过程中取得具体经验，以加强自己的一般号召，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对于群众，如果没有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经验来做一般号召的内容，群众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要照顾全体，照顾多数，不要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

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

我们要从群众原来的水准出发，去提高群众的觉悟，率领群众前进。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这当然是不容易作到的，但只有如此，才能够得上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配称为好的共产党员。

关于总纲的解释，就是这样。

三　关于党员

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者，方得被接收为党员。因为一个人一般地要到十八岁以后，才可能有自己的比较坚定的政治上的判断力。

在修改党章以前，已经接收入党的十八岁以下的党员，仍应保留有效。

如有在政治上发育得甚早的青年，即是说，未满十八岁的青年已经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并且认为如果不接收入党就有所损失，那末，特殊地接收其为候补党员，是可以的。但必须在满十八岁以后，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接收入党，除年龄的规定外，还依据被接收入党者的社会地位，党章规定分为四类。这种分别，在中国今天的社会情况下是必要的。

第一类，是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其介绍人与候补期的规定均较宽。就是说，对无产者与半无产者入党，没有特殊的限制。对于从幼就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生长的人，也应归入这一类。

所谓城市贫民，是指的破产了的手工业者、小贩、到城市找职业而不得的农民、依靠不定劳动维持生活的苦力。

第二类，是接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入党，则须比较有经验的党员来作介绍人，并须有一年的候补期。因为从这个阶层出身的人们的思想，常常是比较复杂，对于我们党的纪律及参加严重革命斗争的顾虑，也比较多，因此，须有较长的候补期，并须比较有经验的人来作介绍。

在这第二类中党章上所指的职员，是不包括旧政权中的高级官吏在内的。

由于中国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由于我党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地下状态，那里有大批的革命者要求加入我党而找不到门径，因此，党章规定在革命新发展地区，接收第一、第二类人入党，可以临时将介绍人的资格及新党员候补期限放宽。不过这种临时办法，须由省委或边区党委规定。

第三类，就是社会上中层与高层剥削阶级中出身的革命者，他们的思想更加复杂，对于我们党的纲领和纪律，是更难接受的，所以他们要求入党时，党章规定必须找有经验的党员介绍，经过比较高级的党委批准，并须有二年的候补期。

第四类，就是曾经有过其他的政治信仰，并曾经加入过其他政党或政治团体的人，他们中有些人要求入党，党章规定需要更有经验的党员介绍，经过更高级的党委审查、批准之后，才能入党。不过其中又有其他政党的普通党员、比较负责的人员和重要负责人员的区别。至于还有一些曾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或集体入党的人，在加入该党时，既是违反或没有自己的志愿，在加入该党后，又未参加该党的政治活动，那末，这种人只要有了这些证明，在接收加入我党时，就应按照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履行手续，而不当作有党派关系者待遇。

一切其他政党的党员，一般地只有当其脱离其他政党以后，才能接收加入本党。

凡为某种社会团体（如工会、农会、文化团体等）的成员，并未参加其他政党政派者，即按其社会地位的不同接收入党。

凡曾加入我党，后来退出，要求再入党者，照第四类人履行手续入党；因为这种人经过政治上的动摇，须有经验的党员来作介绍，并须有比较高级党委的审查。但其候补期一般可以缩短。

凡曾被迫失去我党的关系，请求恢复党籍者，在经过省委或边区党委以上之党委审查确实后，即恢复党籍；无须重新履行入党手续。

党章规定：凡新党员入党，均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即须有本人的请求并在入党志愿书上签字，有介绍人的负责介绍书，经过支部大会的讨论与决定及一定上级党委的批准。成批地集体地入党，是不能认为有效的。至于新党员入党的仪式，如有需要，各地可采取不同的方式。

在党章上，规定了介绍人及决定和批准新党员入党之党委的工作和应负的责任。这种规定，是很重要的，各级党委必须注意执行；因有某些党委过去关于接收党员的工作，是做得不甚好的。

在抗战之后，我们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共接收了一百多万党员，建立了近千个县委、几万个支部，因而组织与领导了解放区九千五百万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战，并领导了沦陷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很大的成绩。但是有些党委在发展党员与巩固党的组织的工作中，也有过一些缺点和错误。

有些党委，特别是比较高级的省委、边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对于接收党员，缺少负责的领导，缺少具体的工作和具体的指导，缺少经验的总结，他们把发展党员这样一件对于党的建设起着基本作用的严肃的工作，只是委托给支部和区委去办理，或者只规定要发展党员的数目字给区委和支部去限期完成，因而就使发展党员的工作，形成自流的没有领导的现象。甚至委托一些没有经过审查的、在政治上不可靠的、在品质上不好的、对于党的建设毫无经验的人，去主持发展党员和建立下层党的组织的工作，因而大大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严肃性。在这种情况下，不独是各种不可靠的和品质上很坏的人，可以因此而得混入我党，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成份不好的支部。很明显，在我们的支部中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党的上级组织对于党务工作缺乏领导的结果。为了根绝这类现象，并使这类现象以后再不发生，为了建设工人阶级的先进的党，各级党委，尤其是高级党委，必须把接收党员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重要地位上来，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使接收党员的工作走上完全正确的道路。

在农村中，应该接收什么样的人入党呢？应该接收在对敌斗争中，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在生产运动中，在其他各种革命斗争中，表现了积极性的、思想纯正的份子入党。如果当地的上述各种运动还没有发展，因而也没有上述各种积极份子出现时，那末，在这里除开接收个别觉悟份子入党外，就不要大量的发展党员。只有在各种运动已经开展，并有了大量积极份子之后，经过相当时期的宣传和考察之后，才能从这些积极份子中比较更多地接收党员。在农村中，各种运动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积极份子的产生与成长也极不一致，因此，发展党员的工作，也应该是分别地进行，不可在同一时期在一切地区普遍地号召发展党员，而必须具体考察与具体指导。

在部队、工厂、机关和学校中接收党员，也必须是在战斗中、在各种工作中表现了积极性的份子，并须经过宣传和教育之后，才能接收。

在发展党员之前，必须向群众中的积极份子宣传党的纲领与政策，宣传党章。

最重要的，是要将发展党员的工作，委托给一些完全可靠的、在党的建设上有经验的、思想与作风都是纯正的工作人员去主持。这些人都是经过了考验的。某些地方如果缺少这种人，就应该培养与训练这样一批人，然后委托他们以主持发展党员的任务，并在工作中经常具体指导与教育他们。这就是我们党的组织员。每一个区党委、地委、县委以至区委，都应该有这样一些经过考验与训练的组织员，进行经常工作。在决定和批准接收新党员时，各级党委就应该依靠他们去进行详细的谈话及参加审查与介绍等。这样就可以经常接收新党员，又不致使这种工作失去党的领导与控制。

接收新党员，是党的支部的经常任务之一。不可因为有了上述一批组织员，就不动员一切支部去发展党员。发展党员必须由支部进行，但还必须有上级党委的密切领导，而上级党委则依靠这样一批经过考验的组织员去指导工作。

党章规定：介绍人对被介绍人，须作真实的负责的介绍。上级党委批准新党员入党，更须负责的进行，决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批准。

总之，要进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并要使这种工作是很正确的进行，因如能够真正接收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这就不只是要有支部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要有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

现在各解放区党员的数量虽已很大，但还有一半以上的乡村没有党的支部，很多的乡村没有党员，只在几个边区，有支部的乡村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在另外几个边区，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乡村没有一个党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每一个乡村建立一个几个人至几十个人的党的支部，是必要的。因此，在解放区还须发展党员，建立新的支部。就是在已有支部的乡村，因为年来的对敌斗争、减租减息、生产运动、整风审干等，已有很大的进行，在这些运动中产生了大批的积极分子，也需要从他们中接收党员。在新解放的地区，则更须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因此，发展党员，这是党在解放区的重要组织任务之一。而这种发展党员的工作，应根据上述方法，很正确地去进行。过去的缺点，不应再重复。

发展党员和巩固党的组织，都不能和其他的工作，和群众的各种斗争分开来孤立的进行。党员是从群众斗争与各种工作的积极分子中接收的，党的支部以及区与县之党的组织的巩固，也只能在群众斗争以及各种工作的过程中达到。譬如说，农村党的组织，只有当它领导群众彻底完成了减租减息，又普遍地发展了生产，因而使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生活水准提高；又组织了很好的民兵，因而在对敌斗争中保卫了群众；经过了人民的选举运动，因而使群众懂得掌握政权的重要；并进行了有效的合作社与文化卫生工作等。那末，这些地方党的组织，就会巩固起来；因为它在这些工作中已与群众联系起来，群众的觉悟提高，并已有了经验，它的内部团结也在这些工作中巩固起来，并在这些工作中体会了党的政策和取得了工作的经验。

关于新党员的候补期，在六大的党章上没有规定，在过去的实际工作中，有规定为两个月至一年者，各地亦不一致。经验证明：在农村中两三个月的候补期，是等于没有的。在机关、学校和部队中的作用，也不大。过去对于候补党员很少进行必要的教育工作。

在新的党章上规定：新党员候补期为半年、一年、两年三种。但所属党委均得延长或缩短。并指出候补期的作用，是使候补人接受初步的党的教育，并保证党的组织考察候补人的政治品质。就是说，对于候补党员的教育与审查，是党的组织一项必须注意进行的工作，否则候补期的作用，将仍会很少。对于候补党员，教育他们认识党章和党的纲领与政策，并使他们确立几个共产党人的基本观点，如组织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的唯物观点等，是非常重要的。

党员有退出党的自由。党章规定在他申请退党，交出党的一切证件以后，即可由支部除名。这表示退党是自由的，入党则是有条件的、不能自由的。

党章上有开除党员的规定。如果被开除者是各级党委的委员，须经各该级党委之全体会议决定，并经上级党委批准。

四　关于党员的义务与权利

在这次修改的党章上，规定了党员的义务与权利。我想，这些义务与权利的规定，将要保证我们党内的生活更加在正常情况中发展，将要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并保证党的行动的统一。

关于党员的义务，党章首先就规定：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因为这是每一个党员能否正确地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基本关节。如果党员的觉悟程度不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不能领会，那他就不能作一个很好的党员，不能自觉地很好地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党的组织上的统一，首先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党员在思想上的一致为其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党在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就不能保证，党的纪律，就不能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各种分歧，就可能产生，党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就不能胜利。我们在党内，是强调党员的自觉性，党的一切工作，主要地都是依靠党员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去进行，党也采用一切办法去提高党员的觉悟，但是每一个党员必须自己努力，自己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弄通自己的思想。因此，这就规定为党员义务的第一项。

党章把这规定为党员的义务，这就是说，党员必须是为人民的事业而去学习，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这就是说，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弄通自己的思想，是每一个党员对党对人民不可推诿的一种职责；这就是说，没有学习精神与学习态度，骄傲自满，不求进步，就是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

其次，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都要严格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党员的这些义务，是大家历来所公认的。

在这里我们强调了党员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必要性，而不只是强调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因为一个党员，是必须在政治上来关心党的一切，在政治上对党负责的。党的选举与党的会议以及党的决议之成立等，每个党员都应以负责态度来积极参加。

每一个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危害党，不得有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并且还必须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党章规定为人民群众服务，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从而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不只是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应该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的一切法纪和一切其他革命组织——如革命的军队、革命的群众团体和革命的事业机关的纪律。每一个党员在各种革命事业中应起模范作用。应该把遵守党纪与遵守革命政府和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统一起来，而不可把二者对立起来。党就是要自己的每一个党员，模范地遵守人民的革命纪律，遵守革命政府与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而每一个党员如果不遵守革命政府和一

切革命组织的纪律，也就是不遵守党纪。有些同志把二者对立起来，应该切实纠正。

我们的党，早已是而现在尤其是一个大党，而且是已经在解放区执政的党，除开少数的革命职业家而外，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必须有一件社会职业；因此，每一个党员都应该精通自己的业务。如果我们的党员，只有革命的热情，而无熟练的业务本领，那我们就不能领导人民的事业，就不能建设强盛的国家。

党章规定一切党员都有下列各项权利：(一)在党的会议上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二)党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无疑的，在党章上规定党员的这些权利，会要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责任心，保障党员群众对于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并且给党以装器，来有效地反对高傲自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来改善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并因此而来改善党的各种工作。

所以党员的这些权利，应该完全被尊重。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尊重党员这些权利的现象，是常常发生的。例如，有些同志在会议上想种种方法禁止关于反对自己意见的发言，在党内的选举与被选举中加以各种限制，禁止党员向上级机关提出建议和声明，或在中途稽留党员的申诉书，在党的会议上不允许党员对党的负责人提出批评，甚至有些党员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受到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分子的报复与打击。这些现象，必须彻底肃清。

在我们党内，少数服从多数，是绝对地必须遵守的。但少数人的正当权利，亦必须被尊重。少数人在声明服从多数决定的条件之下，有权在会议上发表他们与多数相反的意见和在表决时举反对之手，党的组织必须保证这少数人不致因此而遭到多数人任何不应有的打击与不幸。少数人的意见，如果他们自己不放弃，在服从多数决定条件下，是有权保留的。保障少数人的这些基本权利，是党内民主所要求的，并且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真理并不一定在多数方面，而可能在少数方面。在通常情形下，多数人是对的，少数人是错了，我们给少数人以这种权利，就是给少数人以回旋余地，好让他们恰当地改正其不正确的意见。

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包括任何负责的党员在内，是每一个党员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这个规定是和现在某些地方不许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负责人员的习惯相反的。应该说，这种习惯原来就不好，流弊甚多，它助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发展，窒息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因此，应该纠正这种习惯。如果大会通过这一项规定，这种习惯从此即成为非法的，只要是在党的会议上，禁止任何党员对于任何党的工作人员的批评，即成为违反党章的非法举动。

应该明白，只有实行“言者无罪”，才能收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并从而达到和加强党内的团结与纪律。

一切党员都有权按照党章参加可能的应有的选举及被选举到党的领导机关之中，除党章规定者外，不得加以限制。

一切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建议、声明及控诉书等，各级党委均必须迅速转达，不得稽留。

只有充分保证党员这些民主权利，才会减少党内某些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批评，言论和行动，减少小广播，并将引导党员群众的批评、言论、行动走向负责的、正确的轨道，走上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方向。

自然，反党分子及暗藏在党内的奸细分子，是可能利用党内民主来进行破坏活动的。但我们的党员群众，是不会允许这些分子活动的，是会和党的领导机关一起清除这些分子的。

党内的各种缺点，必须清除。然而只有发扬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才能清除这些缺点，并保持和发扬党内一切生动活泼的力量至最高限度。党章给予党员这些权利，保障全体党员积极性与责任心的发扬，我相信全体党员将利用党章所给予的这些权利，负责地来清除党内的一切缺点，发扬党内的一切优良作风，推进党的各种工作，并将我们党放在从来未有的健全的强有力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五　关于党内民主的集中制

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民主的集中制。

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农村中，仅有三个党员在一起，这还不是党的组织，还必须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三个党员中有一个是组长，其余两个是组员，即是在各种活动中有一个领导者，两个被领导者，才能成为党的组织。有了这种组织，就产生出新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

为什么说，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呢？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他们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与执行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党员群众行使它的集中领导的权力，处理党的一切事务，并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所服从。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来建立的。这就是说，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

为什么说，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呢？这就是说，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候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这就是说，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如是就使自己的领导，脱离党内的民主，脱离党员群众，并把此种状态名之曰“集中”。他们认为自己的领导上的权力，无须由党员群众授予，而是可以自己攫取的。他们的领导地位，也无须经过选举，无须取得党员和下级组织的信任，而是可以自封的。他们的指导方针与决议，也无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并经过群众去决定，而是可以独断的。他们是站在党员群众之上，而不是结合于党员群众之中，他们是站在党的组织之上，来命令党，支配党，而不是站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服从党，受党的支配。他们对于上级，则利用党内的民主制向上级闹独立性，对于下级和党员，则利

用党内的集中制来压制下级和党员的民主权利。他们既不民主(对下级)，又不集中(对上级)。多数通过的决议和党的纪律，别人都得服从与遵守，但他们领导人自己觉得是可以不服从不遵守的。所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这些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他们都不遵守。他们认为党的法规和决议，是为那些普通人写的，而不是为他们这些特殊的领导人写的。这是党内一种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与我们党的集中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偏向，在我们党的组织中是存在着的，应该完全肃清它。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如是他们就使自己的行动脱离党的集中领导，脱离党的整体。他们不顾大局，不顾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在党内任意的自由的行动，他们不严格地遵守党纪，不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党内发展各种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或者故意夸大事实，在党内播弄是非，或者在党内实行无限制的空谈与争论，不顾环境的严重与紧急情况，甚至利用党员群众一时在思想上没有准备的盲目状态，来表决自己的要求，利用“多数”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企图等。这些就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与我们党的民主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思想的危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这种思想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小农生产及城市小资本）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传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客观上实在是反革命思想的一种，具有这种思想的人，若不努力纠正，而任他发展下去，必然地要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古田会议决议”)。

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而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极大地妨碍与破坏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全党必须警惕，严防这些现象的发生。

现在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同时，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党的领导上的高度集中。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由于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反映到党内，就产生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实在妨碍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化之不足”。从六中全会以来，情形是有了一些变化，不独中国解放区的民主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就是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整风运动中，在检查工作的运动中，党内的民主已有极大的发挥。在党的七次大会以前，干部中对于党的历史、党的路线的深入的自由的检讨，是党内民主的切实发挥，因而充分地准备了我们这次大会。然而，就全党来说，就各个地方来说，党内民主生活至今还是不足的，还应该继续扩大的发展。因此，党章上有许多扩大党内民主的规定。

目前我们党虽然是处在战争中，但我们的战争，是一种长期战争，在我们的技术条件和敌军的情况没有改变以前，基本上还是一种游击战争。因此，凡在游击战争中可以进行的会议和选举，都必须进行，不应藉口战争环境，不必要地缩小党内民主。

在解放区，在一切可以召集大会进行选举的地方，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党员大会，必须依照党章的规定来召集，并由大会来选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党章规定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时，除大会主席团有权提出候选人名单外，必须保证各代

表团及所有代表都有权提出候选人，并保证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候选人名单，须经过充分的讨论。选举时须按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或表决。

党章规定各地方党的代表大会每二年召集一次，即是说每二年改选党的各级地方领导机关一次，那末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再召集代表会议若干次，来讨论并决定当前的各种工作问题，乃是必要的与可能的。在过去是召集各种大小干部会议来检讨与决定工作问题，而无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在今后则召集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选举只能每两年进行一次，过多的选举，没有必要，并将妨碍工作，因此，除代表大会外还须召集代表会议来检讨与布置工作，这种代表会议，每年可按各地工作需要召集一次至二次，其代表即由下级党的委员会选派。它有权撤换与补选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但它的决议和撤换与补选的委员，须经过各该委员会批准，因它比过去的干部会虽有较大的权力，但它还是各该级委员会的下级机关。

省或边区、地方、县、区的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可以轮番召集。比如，今年召集省或边区、县的代表大会，地方与区则召集代表会议，明年召集地方与区的代表大会，省或边区与县，则召集代表会议。

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较过去扩大，应将各方面负责的与人民群众有很好联系的干部包括在内，党章规定在委员会中再组织常委，进行日常工作。在常委委员中，亦须包括各方面负责的干部，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经常的总的领导核心。在各级委员会中，除有一个正书记外，可以按工作需要再设一个至二个副书记，以便没有缺陷地照顾全盘工作。各级党的委员会，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团，党内的组织工作只是党委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应由党委的组织部门去作专门的管理；因此，凡是各级委员会比较带普遍性的工作决定和工作计划，应召集全体会议来集体的讨论和决定。集体决定之后，就应分途去执行。

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着重地说到了自我批评，他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要启发党员和干部对党的政策与工作的积极负责精神，要使他们考虑问题，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为此，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之中的缺点与错误，必须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党员和干部中以身作则，必须有充分的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准备，万不可在遇到别人批评时，即冲动爆燥，或采取压制打击等办法。只有如此，党内民主才可顺利发扬，否则，即使按期召集各种大会和会议，仍然可能是死气沉沉的、人云亦云的，照例听报告和举手的，没有生气、没有民主的大会与会议。我们有许多同志，甚至有些负责人，至今还不能很好地领导开会，使会议开好，因此，有许多会议是失败的，或是开得不好的，有时甚至变为党员和群众的严重负担。可见单是多开会，还不是民主，还必须把会开好，必须发扬民主精神，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此，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的指示。

经验证明：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发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信仰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这在我们党内及人民中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相反，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肯或惧怕批评自己的缺点与揭露自己的错误，企图掩盖与隐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或在别人批评后不表示感谢别人，不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而是面红耳赤，反口

相讥，或寻隙报复，那末，那里的党员和人民中的民主与自我批评，就不会发展，积极性就不会提高，内部团结就不能达到，缺点不能克服，工作不能进步，负责人的威信也就会丧失。因此，发展与扩大党内民主，各地党的负责人所负责任，非常之大。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应该定期地向选举自己的党员和下级组织报告自己的工作。在这种报告中，不只应该说到当前的情况和工作的成绩，而且应该说到缺点和弱点以及工作中的错误，请求自己的选举人和下级组织提出意见和批评。经验证明：许多下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与缺点，其责任并不能由下级组织及党员与干部来担负，而应该由上级领导机关来担负。因为这些错误和缺点的造成，许多是因为上级领导机关没有及时的提出任务、指示政策；或者虽然提出了任务，指示了政策，但是没有系统地彻底地解决问题，或者提出的任务、指示的政策本身就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责备下级组织和党员与干部，把责任向下面推卸的现象，是很不好的，是最能使下级丧失信心和积极性的。当然，下级党委，被领导的党员与干部，如果有错误、缺点，也应一样有自我批评精神。

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只有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巩固党内的自觉的纪律，才能建立与巩固党内的集中制，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为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

要在党内放手实行高度的民主，决不是要削弱党内的集中制，相反，要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同时实行高度的集中。要使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对立起来。只有实行高度的民主，才能达到领导上的高度集中；只有在以民主为基础的高度集中领导之下，才能实行高度的民主。认为实行高度的民主就要削弱领导上的集中，是错误的。因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遵照党内民主原则进行工作时，不能妨碍党内的集中原则，不能使正当的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

党内民主，必须保证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即人民的事业）的方向进行，不能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团结，不能被暗害份子、反党份子和党内的分裂主义者与投机家、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党的或地方范围的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之彻底检讨与辩论，必须是有领导的，必须是在时间上允许，即客观情况不紧急的条件下，并须有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的决议。下级组织有过半数以上的提议，或有上级组织的提议，也可以进行这种检讨。

党内的民主应该扩大，但党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党章规定的这些原则，必须是无条件的执行。

有些同志在执行这些原则时，是提出条件的，他们或者以同意决议、指示的正确性作为服从的条件，或者以人事上的能力之强弱、地位之高低、党龄之长短、文化程度之高低以及某些历史的恩怨与山头亲疏等关系，来作为服从的条件。应该说：所有这些条件，都是不应该有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只有在他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或者在他与党的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原则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当他处在少数地位时，仍然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的组织原则，他才是一个有高度纪律性和原

则性的党员，才能表示他是个顾大局的，是懂得局部服从全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懂得个别的原则分歧与人事上的分歧，是应该服从于党的统一与党的纪律之最高原则的。

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盲目的服从性。由于我们现在还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各个地区的内外情况，常有极大的悬殊，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采取过分集中经营的政策与平均主义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分散经营（即各个地区独立的进行工作和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是闹独立性），不是脱离集中领导，而是必须有领导上的集中。在这里，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而只能是带着一般性的。因此，决议与指示，就常有在一般地区行得通，而在某些特殊地区行不通的情形。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中有错误，在实际上行不通的事情，也常有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是提倡盲目的执行与服从，而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执行。这就是说，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眼睛，硬要去实行，以至劳民伤财，脱离群众。下级这样做，并不是反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正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这是应该特别奖励的。在这里，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上级的决议、指示，合口味的就执行，不合的就不执行。这叫闹独立性。不管他用什么话来敷衍搪塞，这总是闹独立性。这是要不得的。第二，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研究决议、指示，又不研究情况，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这是一种盲目性。这不是在认真地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而是在盲目地执行。这也是要不得的。第三，既研究决议、指示，又研究情况，行得通的就坚决执行，行不通的就向上级提出，详尽地报告为什么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决议、指示。这叫做自觉地认真地执行决议、指示。只有这第三种态度，才是正确的。共产党员的这种创造性与自动性，我们不独不反对，而且应该大大提倡。党反对没有纪律性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但提倡奖励每个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

领导机关的决议、指示，应该允许下级和党员提出意见，提出怀疑，提出修改。如果是决议、指示真有缺点和错误，应该接受下级意见加以修正，如果是下级的意见不对，也应很好解释，把思想弄通，而决不可对下级加以错误的打击。对任何指示、决议，在请求修改后，上级仍然决定要执行者，均必须执行，不可坚持自己的意见，反抗上级的决定。

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动性与创造精神的所谓"纪律"。应该使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精神结合起来。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宣传中央机关与上级组织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这是我们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中央与上级组织的决议和政策，必须在各地宣传，而与这些决议和政策相反的一切思想，则不应宣传。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得宣传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某些地方党的组织的执行情形并不是很好的，有些报纸，对中央决议与政策宣传不够，并且有过抵触中央决议与政策的文字发生。为此，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加以检查和改正。

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国性质的问题，在中央没有发布意见和决定以前，各地方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除自行讨论及向中央建议外，均不得自由发布意见和决定。这也是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我们全党只能有一个方针、一条路线，而不能有几个方针、几条路线。对于全国性的问题，只能有一种态度，一种意见，而不应有几种态度、几种意见。凡是应该

和必须由中央决定与发布的问题，各地方党的组织，不要越俎代庖，抢在中央之先来发布意见。凡关于全国性的问题，一切党的负责人，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在没有得到中央同意前，均不得发布意见，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在当地党的委员会内加以讨论，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但是对内对外发布中央尚未发布的意见，或通电各地党委宣传这种意见，则不能允许。因为这种意见与决定如与中央意见和决定相抵触，则在党内，在人民中，在敌人面前，均将留下极不好的影响。在没有或缺少无线电的时期，我们没有强调这一点；但在无线电已经畅通的情形下，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抗战期间，中央曾经几次指示了这个问题。

关于地方性质的问题，党章规定：在不抵触中央与上级决定的条件下，党的地方组织有自主决定之权。在这里，上级组织的过分干涉，代替下级决定问题，也是应该避免的。上级组织向下级提议，帮助下级正确的决定问题，是必需的；但决定之权，应给下级组织。

我们党现在许多地区，还是处于地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党的组织，必须采取特别的形式去进行工作。因此党章规定党在公开状态之下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凡不适用于秘密状态之下的党的组织者，均得变通办理之。这个规定，是必要的，党章所规定的组织原则，全党都必须执行，但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应该依照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六　关于干部问题

从我们的党章上就可看到：我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对于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及党的事业，是有极端重大的关系的。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是由党的干部组成的，因此，党的干部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党的干部，就是党的领导骨干，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大家知道的。没有干部，我们党的纲领与政策，就不可能通过群众去执行，就不能完成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党在二十四年的英勇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大批的干部，他们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勇于自我牺牲，富有创造性和坚持性，表现了中国人民最高贵的革命的品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他们“是民族的珍宝，全党的荣誉”。在过去，没有我们党这大批干部的牺牲奋斗，人民事业就不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在今后，如果没有我们党全体干部的一致努力，人民的解放就不能彻底胜利。因此，我们党的干部问题，实是中国人民事业中决定一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稍为严重的错误，都足以损害中国人民的事业。

我们的干部，也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他们应该是群众的领袖，又是群众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是人民群众中的领导骨干，是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产生出来，又去指导人民群众的斗争的。所以干部是人民群众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部分。正因为我们重视人民群众及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才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干部。我们重视干部，是从重视人民群众的观点出发的，并不是离开人民群众的观点而去孤立的重视干部，不是为重视干部而重视干部。因此，脱离人民群众的干部，不能为人民群众作好事、而作坏事的干部，是不值得被人重视的，党对这种干部必须严格地进行教育，使他们转变。因此，干部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好坏，以及联系群众的密切与否，应该是我们鉴定干部最重要的一项标准。

我们的干部是来自社会各方面，大别之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工农出身的，另一部分是从学生知识份子出身的，然而他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战斗，而工作。在两部分干

部中，以前一部分占多数。而在前一部分中，又以农民出身的干部占多数。我们干部的这种情况，证明我们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我们的党才能从普通的工人、农民中教育与培养出成千成万的优秀干部，他们也只有在我们党的教育与培养之下，才能得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为民族事业中的英雄人物。这是党的功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功绩。我们党的这两部分干部，各有其优点，也各有其缺点。应各自发扬其优点，克服其缺点。工农干部应努力保持和扩大他们与群众的联系及其群众作风，而努力克服自己文化上与理论上的缺陷。知识份子干部，则应培养自己实事求是的观点和群众观点，去掉唯心观点与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观点，并努力去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这两部分干部，都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没有工农干部固然不成，没有知识份子干部也一定不成。因此，不重视工农干部、轻视工农干部的观点，是不对的。不重视知识份子干部、轻视与排斥知识份子干部，也是不对的。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这两部分干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的团结与合作，就决定了我们事业的前进与胜利。

在上述两部分干部中，又各有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区别，其中又以新干部占大多数。从抗战以来加入党的干部，绝大部分都为人民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受过了很好的锻炼，是已经有了斗争经验的干部。我们党是不断有大批新干部增加上来的，也必须有大批新干部不断增加上来，我们党的事业才能胜利与发展。因此，新老干部的关系问题，即老干部应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新干部，新干部应用怎样的态度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乃是我们党内一个经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屡次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我们“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但有许多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这些极重要的指示，是重视不够的。新干部看不起老干部，老干部看不起新干部，不欢迎、不关心新干部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在今后必须各自进行反省，彻底纠正，只有新老干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的团结与合作，才能成就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干部，又因为在革命过程中各人的工作性质、工作历史和工作地区的不同，而有各种区别，例如：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一部份军队的干部与那一部份军队的干部，这一地方的干部与那一地方的干部，这一工作部门的干部与那一工作部门的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等。所有这些干部对于各项革命工作，各有内行，各有外行，也各有优点，各有缺点。因此，他们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而不应该互相轻视，互相抱怨，互相摩擦。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曾经强调地说到了这些干部的相互关系，一切干部和党员必须遵照执行。只有这些干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的团结与合作，才能推动我们的共同事业前进。

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同志的干部政策，首先就是团结干部的政策，团结工农干部与知识份子干部的政策，团结新老干部的政策，团结各种工作干部和各种地区干部的政策，团结全党干部的政策。所以一切妨碍团结的东西，都是应该克服的。

我们党的干部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团结起来呢？什么东西障碍我们干部的互相团结呢？

我们的党，不是家族团体，也不是同业公会，而是在共同思想与共同政治纲领上团结起来的革命的政党。因此，我们干部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不是以私人生活上的利益和感情来作团结基础的，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上的一致，来作为团结基础的，而是以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纲领，来作为团结基础的，而是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来作为团结基础的，而是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下的。因此，只要我们在思

想上是一致的，我们服务于人民的信念与纲领是相同的，我们都是拥护与执行中央路线的，我们都是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的，那末，我们不论是那一种干部，那一种工作、那一个地区的干部，都应该团结起来，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不能再以生活上、感情上的小问题来引起我们干部之间的不团结。这就是我们全党团结一致以及各种干部团结一致的坚固的基础。

如果在我们党员和干部中，有那一个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宣传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不站在全体人民利益上，而站在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集团利益上，不执行党中央的路线，而违反党中央的路线，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是说，离开我们党的共同纲领，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离开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去搅［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那就失去了我们团结的基础，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才能达到我们的团结。所以党内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是妨碍我们团结的东西，必须加以克服。

经过几年的整风与党史学习，党内的教条主义，可以说，已经受到了严格的批判。虽然教条主义的残余还是存在，我们还要注意克服这种残余，但是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市场已经缩小，同志们对它的嗅觉，已经提高，它今后再要在党内发展，已有了很大的困难。党内的经验主义，在整风和党史学习中，也已受到了相当的批判，它在党内的市场也已缩小，但是，应该说，这种批判还是不够的，许多同志对于经验主义的嗅觉，还不甚高，党内还有它的市场。这种情形，就使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党内的团结，还受到某些阻碍。因此，我们还应继续以整风的精神，来彻底克服经验主义的倾向，以便更进一步团结我们全党。

同样，经过几年的整风与党史学习，党内最严重的宗派主义已在基本上被克服，但妨碍党内团结的盲目的山头主义偏向，还在党的某些部分中存在着。党内这种盲目山头主义倾向的产生，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这是由于：（一）党内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成份多；（二）党的各个部分长期处在被分割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因而形成党的各个部分之间彼此不同的特殊的历史、特殊的联系与特殊的作风；（三）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不够。因此，在党的各个部分具有山头主义情绪的同志中，常常不自觉地表现这样一些典型的不良现象：只记得、只了解自己部分的光荣历史，而不了解或者忽视其他部分的光荣历史，只了解自己部分的成绩，而不了解自己的缺点，因此，其他部分的人只能赞扬他们的成绩，不能批评他们的缺点，即使这种缺点是真实而明显存在的。但是相反，他们对党的其他部分，就只看见人家的缺点，看不见人家的成绩，因而只批评人家的缺点，不赞扬人家的成绩，也不估计与原谅人家的困难。他们在自己内部，相互之间，有说有笑，生活融洽，照顾周到，甚至无话不谈；而对其他部分的人，则格格不入，表示生疏、冷淡和漠视，没有应有的尊重和照顾。他们在党的关系上，表现他们有特殊的山头关系，甚至互相联合，压抑其他部分的人。某些人们，常是盛气凌人的，而其他的某些人们，就不得不心存戒惧。这种典型的山头主义倾向，是存在于党的某些部分之间，比如，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这部分军队的干部与那部分军队的干部之间，这一个地区的干部与那一个地区的干部之间，就不时发生一些这样的不良现象；因而就使党的各个部分之间，不能很好的团结，发生不应有的纠纷与摩擦。然而，这种山头主义倾向，就其极大多数的情形来说，是盲目的，而不是自觉的，因此，在未经恰当地指明与说服之前，他们总是不承认自己是有这种山头主义倾向的。

这种山头主义倾向的盲目性，如果一被个别有野心的分子利用，就可能在党内造成严重的纠纷。

党内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它没有明显的错误的政治纲领，但有许多不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组织观点，有严重的排外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倾向，它严重的脱离群众，它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妨碍全党团结与统一的，它是一种小团体倾向。因此，必须反对与消灭山头主义倾向，这是必须肯定的原则，不能有丝毫模糊。

当着我们在党内提出有山头主义倾向存在，并说明这种倾向产生的客观原因时，有人似乎就觉得党内的山头团结有存在之必要，以有山头团结为荣，以没有山头团结为恨，从而就想团结山头，建立山头，加强山头主义，争取山头主义在党内的合法地位，使盲目的山头主义变为自觉的山头主义，很明白，这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

党内的山头主义倾向必须消灭，山头界线也必须消灭，但是在反对这种倾向时，也和反对其他的错误同样，不能采取鲁莽的急性的办法，而必须是首先认识这种倾向的客观存在，照顾这种倾向的盲目性及其产生的客观历史原因，耐心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逐渐进行反省，特别是那些占优势的站在领导地位的同志要首先进行反省与自我批评，逐渐去掉盲目性，才能逐渐缩小以至消灭这种倾向。只有在各部分同志的内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之后，山头主义倾向才能消灭。

还有一种妨碍我们干部团结的东西，就是各人自己背上的包袱。我们的各种干部，差不多都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但有不少的人，容易把自己的优点片面地夸大起来，既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也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因而就容易骄傲。看不起人，受不起人家的批评，听不得人家的“闲话”,这样就使各人的优点变成了自己的包袱，变成了自己往前进步的障碍，也变成了干部之间相互团结的障碍。因而各人的优点也就常常变为各人的缺点。例如：工农干部常以自己的光荣出身看不起知识分子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又常以自己的知识而看不起工农干部；老干部常以自己的资格老，斗争历史长，而看不起新干部，新干部又常以自己的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干部；军队干部常以自己会打仗而看不起地方干部，地方干部又常以自己的经验多而看不起军队干部；这一军队的干部常以自己的胜仗打得多，斗争历史光荣，而看不起别一军队的干部，别一军队的干部又常以同样的原因而看不起这一军队的干部；此外，这一地区的干部与那一地区的干部，这一部门的干部与那一部门的干部，也常各自以其成绩、以其知识而互相看不起别人。由于这种情形，由于自己的包袱、看不起别人，就一定引起别人不满，引起干部之间的不团结现象。所以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干部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以便联系群众，少犯错误，团结全党。然而，许多同志对于自己背上的包袱，还是盲目的，我们的干部有许多人不知道自己背上有甚至很重的包袱，因而他们不肯放下来，所以必须提高干部的自觉性，谨防自己的骄傲，不要使自己的优点，自己的成绩，不但不能使其继续发展、增长，反而变为自己的缺点。所以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要善于开动脑筋这个机器，善用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这样，我们干部的优点就可发扬，缺点就可克服，并且会日新月异的进步起来。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我们干部之间的互相团结，也就会大大加强起来。

我们的干部必须去掉自己背上的包袱，去掉山头主义，去掉主观主义，必须自己动用脑筋，对于各项重要问题，加以分析，提高自己的觉悟性，去掉盲目性，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和领导之下，一致团结起来，去进行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这就是全党干部当前的任务。

我们干部的团结与干部的进步，是不可分离的，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没有觉悟程度的提高，自己背上的包袱是放不下来的，盲目山头主义是去掉不了的，主观主义是克服不了的，团结同志、团结群众的重要性是看不到的，自骄自满的脾气，是改不掉的。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继续以整风精神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这是我们党和我们干部进步的原动力——来克服我们的缺点，提高我们的觉悟。所以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就是提高干部的政策，就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干部缺点、提高干部觉悟的政策。

我们的干部，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有不断的牺牲和损失，而革命事业的发展，又不断须要增加大批干部，在人民群众伟大斗争的潮流中，也不断地涌出大批有能力的新干部，这种情形，就给了我们选拔干部的经常的严重任务。

怎样选拔干部？选拔干部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的干部，应该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同时又有清醒的革命的理智。

我们的干部，应该对人民群众的事业，有无限的忠心；应该与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应该善于独立地在复杂环境中识别方向，并不怕负责的决定问题，应该在对敌人的斗争中以及在党内的原则斗争中，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锻炼。

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关于干部政策指示我们说，我们的干部政策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为私利等等为标准。"

总之一句，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干部，就是最好的干部。

所有上述这些标准，是正确的，我们同志都是知道的。然而，也还有同志提出了其他的标准，如要求我们在选拔干部时，首先地并且是唯一地估计他的党龄的长短与资格的高低。另有人在选拔干部时仅以能说会写为标准，而不问其切实与否。或者以能否盲目服从自己为标准，或者以与自己的亲疏关系为标准。很明显，这些标准，都是不正确的。

应该怎样认识干部呢？

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干部：第一，在领导方面，对于每一个干部的长、短、优、劣及其全历史、全工作，作仔细的本质的考察；第二，在干部工作地方，在被干部领导的群众中去考察干部。必须使这两方面的考察总合起来，才能对干部有较全面的认识，才可以免去许多偏向。

有些同志认为：对于干部的考察，只可以从上而下来实行，就是领导者根据被领导者的工作报告来考察被领导者。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从上而下地来考察干部，当然是需要的，并是有效办法之一，但仅是从上而下的考察，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从下而上地来考察我们的干部。就是说，必须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考察领导者。这种考察，乃是最有效的办法。

党章规定了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考察与选拔干部的办法。这就是由党员群众在各种会议上、在代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审查自己的领导者，听他们的工作报告，批评他们的缺点，选举或不选举这个或那个同志到领导机关去负责。党章所要求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党内确切执行，党的机关由选举产生，提出候选人及取消候选人资格之权利，批评与自我批评之自由，都必须确切执行。

应该使由上而下的识别与选拔干部，和由下而上的识别与选拔干部联接起来。我们相信

这将会正确的识别我们的干部与选拔我们的干部的，这就是党章所规定的一切党的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并须经上级党委批准的原故。

选拔与培养本地干部在本地负责，许多地区党的组织，还是注意不够的，特别是培养本地军事干部，更注意不够。比如：在一九四三年的材料中，太北区八个地委三十七个干部中，本地干部只有九人，仅占百分之二十六，外地干部二十八人，占百分之七十四，太岳四个地委的三十七个县委干部中，本县干部只有六人，占百分之十六，外县干部三十一人，占百分之八十四。太行第六地委五个县十八个干部中，本县干部只有五人，占百分之二十八，外县干部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二。由此可见，就是县委、地委这样的干部，都很少选拔本地干部，更高级的干部，就更难说了。最近太行区党委报告：全区现有各系统的各级干部五千人中，本区干部占百分之八十，外区干部仅占百分之二十，本地干部的情形比一九四三年应该有所改变。但许多领导机关中的负责干部，仍是外区干部占多数，而且在干部配备上，常是不把本县、本地方的干部分配在本县、本地方工作，特别是负责工作，而配上外县、外地干部去负责，因此外来干部仍占负责位置的很大的比例。这种情形，必须有切实的转变。

其他许多根据地本地干部的情况，也大概与上述情形相同。

向下级党委随便委派负责人和轻易调动下级党委干部的现象，以及“钦差大臣满天飞”的现象，在某些地区的组织中仍然存在。比如，据冀南同志说：地委书记在七年中被调动最少者五次，一般都在六次以上。县委书记调动少者五次，多者十三次。第四地委刘洪范同志，在六年间曾任县委书记八次。这种随便调动下级党委干部的现象，必须停止。

在革命新发展地区，一般是不能不从外面派干部去工作的，但须注意派本地人回去工作，如派外地人去工作，则须谆谆告诫他们，只能当作本地干部的引导者，要十分注意培养本地干部，并须准备本地干部来代替自己的工作，不可在那里包办、垄断一切，不让本地人参与工作，在已有本地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地区、就不要派人去，如必须派人去，则应谆谆告诫派去的人，在原来领导机关和干部的领导之下，调查研究，老实工作，帮助原来干部，而不可在那里盛气凌人，称王称霸。上级党委向下级派遣巡视员，也必须十分慎重，必须力戒“钦差大臣”的派头。总之，过去错误的党内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必须彻底改变。

全党同志都应该了解，党之所以这样注意培养与选拔本地干部，其意义不仅是一个干部问题，而是一个联系人民群众的十分严重的问题。自然，外来干部也要联系人民群众，也要在群众中生根，但是外来干部必须经过本地干部才能联系人民群众，必须从本地人民中培养出很多很好的干部，才能生根。脱离本地干部，即是要脱离与本地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尊重本地干部，糟蹋本地干部，即是不尊重和糟蹋党并他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经验告诉我们：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好，取得多数本地干部的真心拥护，是与本地人民群众建立亲密联系的中心环节。我们党在某一个地区的工作是否已经作好，就看是否已从当地人民群众中培养出足够的真正很好的干部和领袖为主要标志。党是重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所以重视本地干部，而不是为重视本地干部而重视本地干部，也并不因为重视了本地干部，党就不重视或轻视外来干部。我们党有一大批带全国性的、能够到一切地区去工作的干部，他们经过了更多的锻炼，有更多的工作经验，是我们党最珍贵的财产。然而，我们如果仅有这样一批干部，而没有到处的大批的地方干部来配合，或者他们不能到处培养与选拔大批地方干部，不能到处与多数地方干部的关系弄好，那我们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就决定地不能发展，不能胜利。相反，如果我们的外来干部能到处与本地干部、本地人民群众的关系弄好，

那我们就一定发展，一定胜利。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的性质。当然，本地干部一定要联系人民群众，脱离人民群众的、作风不正派的本地干部，是不应该选拔的，本地干部应向外来干部学习，欢迎与尊重外来干部，而不应该排挤外来干部，但首先地与主要地是要外来干部尊重、培养与帮助本地干部。

应该了解，党在某种时期特别提出重视与培养某一种或某几种干部，是根据于政治上的理由，根据于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别的，更不是由于某一种或几种干部有什么特别可爱或高人一等。应该从政治上来理解党的干部问题与干部政策，而不仅仅从组织上来理解党的干部问题，更不要仅仅从干部问题上来理解干部问题。

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形成经常健全的、团结一致的、联系群众的领导核心，是极端重要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群众，都要注意在工作中、斗争中组织各个地方的和各个工作部门的领导核心。但是这种领导核心的形成，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决不能性急，而必须是在长期的工作中、斗争中形成起来，有时还必须经过失败与成功、正确与犯错误和错误的改正等曲折的过程，才能形成。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必须善于组织自己的领导核心，必须善于把优秀的干部选拔到领导核心中去，代替那些没有能力来领导的干部和作风不正派的干部。但是，调换负责干部，改组或改造党的任何领导机关，是要对党对人民负严格的责任的。既不可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也不可采取轻率的态度。党的上级机关不可随便调动下级的负责干部，就是在党章规定的选举中也不要轻率地调换干部。对于党的任何领导机关的改组或改造，必须是确有可能改造得更好、更强、更对人民有利，才去改造它。如果不是确有这种可能，或者相反，可能改造得更坏、更弱、更对人民不利，那就不应改造，而应耐心地帮助它，教育它，让他在实际工作中、群众斗争中去锻炼与学习。犯了错误的干部，有些是需要调换的，但不是一切犯了错误的干部都一律要调换，在许多情形下，犯过错误的干部并不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干部更坏，只要他真正了解错误，改正错误，他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干部更好，更能为人民服务。党章已经规定，区委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每两年改选一次，没有十分必要，就不要有更多的改选。改选时，干部亦得连选连任，没有必要，没有更强更好的干部来代替，改选时亦不要随便调换干部（自然可以增加新的成份）。这不论是上级领导机关或党员群众，都必须注意，都要采取既严肃、又谨慎的态度，才对人民的事业有利。

党内的干部教育，近年来有很大的成绩，但仍须经常重视。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在检查工作中，在党校及党的各种训练班中，在整风运动中，均必须用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很好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应特别重视对区、乡、村级干部的教育。因为他们是直接联系人民群众的，是党的一切政策与一切决定的最后的执行者。过去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对于区、乡、村干部的教育，一般又是忽视的，因此，各地必须普遍地有计划地训练区、乡、村的干部，如果区、乡、村的干部，没有正确的群众路线、正确的工作作风及对于党的政策的正确了解，那末，我们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不能很好在人民群众中实现的。

在人民的各种事业中，吸收和提拔非党干部，以及共产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合作，近年来是有很大的成绩和进步。然而，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获得完满的解决。在这里，我们党的干部还存在着缺点，不严重注意吸收党外各种有用的人材来为人民服务，不善于与非党干部共事，不善于帮助非党干部进行各种工作，在某些同志中，宗派主义的作风，包办垄断的作风，是仍旧存在的。因此，在某些地方党外干部有职无权的现象，不安心工作的现象，仍旧存在。在这里，一切共产党员干部，必须严格检查自己，去掉自己的一切缺点，以便在

吸收与团结党外干部的工作中做出最大的成绩。必须善于发扬党外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帮助他们真正能够做成功许多事业，在人民事业中建立功绩，建立威信，并从而吸引人民中广大的优秀分子来为人民服务。至于党外干部原则上的错误，及其和我们的政治上的分歧，则应进行很好的耐心的说服。只有如此，中国人民的事业才会胜利，也才能表示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当着共产党员干部是在党外干部领导之下工作时，必须是服从领导，执行任务的模范。为了纠正党员干部在这方面的缺点，首先党员干部自己召开一些检讨会，然后，在非党干部中进行自我批评，发动非党干部对于我们党员干部的批评，做到双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解除误会，纠正缺点，达到进一步的团结合作，共同为人民服务。这种方法，有些地方已经实行，效果是很好的，各地应该普遍的经常的实行。在有些地方，曾在党内党外检讨了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发动了党内党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结果使党员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大大改善，这种方法，在很好准备与领导之下，应该普遍地实行于一切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中，以便能够到处改善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及党员与非党群众的关系。

必须使全党明白，在政权机关中，军队中，民众团体中，经济组织中，国民教育机关中，城市及乡村中，都是我党与党外群众联盟的，我党通常只占少数或极少数，党外（包括和我党合作的民主党派）通常总是占多数或绝大多数。不要把这些机关、团体和组织看作只是共产党一党的，党外群众是无份的，这样看，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我们党的任务，就在于团结党外的多数或绝大多数，共同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必须使这种联盟的观念深入于同志的心中，才能很好地建立党与党外的关系。而党的干部和党外人民的干部、领袖人物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党与人民群众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环节。

七　关于党的基础组织

党章规定：党的基础组织，按照生产单位、工作单位来组织，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使我们党的组织基础放在社会组织的细胞中。

党章规定：在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机关和学校中，不论党员有多少人，从三个党员起，到几千个党员止，都只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的组织，成为党的基础组织，成为党在这个工厂、矿山、机关和学校等等群众中的战斗的堡垒。党的基础组织，一般称为党的支部，特殊地称为党的总支部或党的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党的支部之内，将党员编入若干小组的办法，是应该采用的，对工作有些便利，有些作用，但不应该过分强调小组的作用，不应将许多工作分散在小组内去进行，而应由支部统一的集中的进行，只有由支部集中进行不方便的，才分散到小组去进行。比如，一个工厂、机关或学校中的支部，有党员三四十人，是十分集中的，开会、讨论，解决问题和学习等，主要应由支委召开支部大会来进行，而不必在支部大会之后，再去重复地开许多小组会。有了定期的支部大会，就不必再有定期的小组会，只在必要时才去开小组会。不可把党的小组事实上当成党的基础组织，而使党的支部反而不起多大的作用，使支部委员会成为“上级”领导机关，而不是党员的直接领导机关，使支委与党员之间隔着一层小组的组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已经有人把党的小组误认为党的基础组织，把许多工作推到小组去进行，支委反而不做工作。这种现象，应该纠正。

在有党的总支部或有党的委员会的工厂、机关、学校，在总支下的分支部，或在委员会下的支部，是有大的作用的，许多工作，应由分支部或支部去做，因为集中在委员会或总支来做，是不方便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比如，决定新党员入党，由分支大会决定即可，不必再开总支大会（但仍须经过总支委同意并报告区委批准）。但是这种总支或委员会，仍是一个生产单位或工作单位中的基础组织。

党的工厂、机关、学校和乡镇委员会，应有批准新党员入党之权。它的权利，应相当于党的区委。

党在乡村中的支部，党章规定，一般按照行政村或行政乡为单位来建立，但乡村中群众的集合点，则是自然村，因此，自然村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重视自然村，党的基础组织，主要的应放在自然村。但自然村大小悬殊，大者有数千数万人口，小者只有数十人口，因此，在以行政乡或村为单位的党的支部之下按自然村来划分党的小组，即使在一个自然村只有党员三五人或七八人，那末，这种小组的作用就很大，它起着党的基础组织的作用，就应该强调小组作用，许多工作——如开会、解决问题和学习等，应该以小组为单位来进行，而不必一切都以支部为单位来进行。党章规定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五十人之乡村，即得成立（但不一定要成立）党的总支部，在总支部之下按农庄、居住来成立分支部，就是顾到乡村中分散的村庄情况而规定的。

但是也有很大的自然村，那末，一个大自然村可以成立一个支部，或一个总支部，以至一个乡镇委员会。在这种大自然村的党的小组的作用，也是不大的，因此，也不要过分强调由小组进行许多工作，而应强调支部工作。

按照生产单位和群众的集合点来建立党的基础组织，建立党的堡垒，这是必须遵守的党的一个组织原则。但在一个生产单位和群众的集合点中，党的支部小组，或党的总支部、党的工厂委员会、乡镇委员会等，应该着重那一个环节，才对于工作便利和有效，须按照情况来决定。

各级政府机关及其他机关中党的支部，应直接由同级党的委员会来领导。这种机关支部，不应该代替党组的工作。党章规定这种机关中的党组，是由在该机关中负责的党员来组织，有其特殊的为党的机关支部所不能代替的任务。党组在实现自己的任务有必要时，并得指导该机关中的党的支部，动员该机关中一切党员来协助自己的工作。

党的支部，是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工作单位，是党的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支部必须使人民群众与党的领导机关密切地结合起来。

党章规定：支部必须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口号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必须经常注意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并及时向上级机关反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支部必须经常在人民群众中实现这些任务，并为实现这些任务而进行斗争，才能使人民群众与党及党的领导机关建立密切的联系。

在解放区，党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的支部，应动员和组织群众来协助与保证该工厂、机关、学校的计划之实施，并与阻碍这些计划实施的现象进行斗争。

支部对自己每一个党员的历史、政治面貌、觉悟程度以及优点与缺点，应该审查清楚，并作出适当的鉴定。应该关心自己每一个党员的政治情绪与政治趋向，吸引他们参加党的政治生活与国内的革命运动。对于暗藏在群众中的和党内的民族破坏份子与奸细，支部必须负

责进行调查研究并协同群众清查出来。

党章规定，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是支部的责任。

党章规定，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是支部的经常任务。

支部在党的上级组织指导之下，进行上述各项工作，并获到上级组织的批准。

支部委员会，是支部的领导机关。在委员会中，应按情况包括掌握各方面工作的党员在内，比如在乡村中，应包括在乡政权、乡自卫军及乡的经济、文化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在内，只有在支委中包括了各方面的负责的党员在内，它才能很好领导该单位的各种工作，成为领导核心。

党章规定：支部书记照顾全般工作，其他各委员的分工，不机械规定，可由各种支部委员会按实际情况去决定。管理党务工作的委员是需要的，如果支部中办了报纸，有经常的宣传工作与党内的教育工作，管理宣传教育工作的委员，也是需要的。其他可按情况来分工。

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与切合实际的分工，对于整个支部工作之有效进行，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因此，应该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

八 关于奖励与处分

我们党早已是现在尤其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因此，党内任何没有纪律的、不统一的或分裂的现象，都要极大地影响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因此，保障与加强全党的统一，并与一切反党、分裂党、闹独立性及小组织行为和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进行斗争，与一切违反纪律的现象现行斗争，是一切党员、一切党的组织的职责。这就是说，不论我们党内有何等的暂时的原则分歧与政策上的分歧，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必须保障全党的统一，都不得有破坏全党统一的行为，不得有分裂党、闹独立性及小组织行为和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都必须服从于全党统一的最高原则。凡有因为暂时原则分歧与政策分歧而违反党的纪律者，一切党员，一切党的组织，都不得随声附和，都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但是恰当的斗争。

我们党是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党，在党内建立优良作风，确立模范标准，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党章规定：对于成绩优异的党员，给予奖励。凡是在工作中，在敌人的法庭上，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在党内斗争中，表现了自己是完全忠于党的事业——人民事业者，成为遵守党与革命政府纪律之模范者，在实现党的纲领和决议中富于创造性者，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取得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者，不论是党员个人或党的组织，均给予奖励。奖励的方法，可以是当面的奖励，可以是当众的奖励，并传布其事绩与经验。也可以其他方法奖励。

凡不执行中央与上级机关的决议及违犯党章、党纪者，党章规定给予处分。处分的方法，对于整个组织，就是：指责；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撤消其领导机关并指定其临时领导机关；解散整个组织并进行党员的重新登记。这种处分，是在整个组织或该组织的整个领导机关违犯党的纪律或有其他特殊重大情节时采取的。

对于党员个人的处分，是当面的劝告或警告；当众的劝告或警告；撤消工作；一定时期的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在我们党内，不只是规定有处分，而且规定有奖励，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特点之一。

党章规定：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的组织，在采用这种处分时，应保持

高度的慎重。不可以把党内的处分与党外的处分混淆起来。在党内对于党员的处分，只能以开除党籍为最后手段。除此以外，不得再采用其他手段。除非是该党员犯了国家的法律，由政府机关依法处理外，在党内不能有涉及国家法律的行政上的处分。

党的组织在决定处分任何党员时，应尽可能使被处分者亲自到会，进行辩护。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可在本人缺席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在处分后，应将处分的理由正式通知被处分者。被处分者对处分不服时，可以要求复议，要求改变处分，党的组织应细心考虑被处分者的这种要求，加以复议。被处分者如要向上级机关申诉，各级党的组织不得抑止，并须援助其上诉。

不执行决议，违犯党章、党纪的党员，应受处分。各级党的组织有完全的权力对这种党员给予处分。但各级党的组织在给予这种党员以处分时，应分别各人所犯错误的不同情况来分别处理，而不可以平均处分。比如，有些人是因不明党章、党纪，不了解党的政策与决议而犯错误者，另外有些人则是明知故犯；有些人所犯错误，仅属私人生活性质，并不直接违犯党章、党纪和党的政策与决议，而另外有些人则是直接违犯党章、党纪与党的政策和决议；有些人在犯了错误之后，经过批评指出，即诚心改正，而另外有些人则在批评指出后，仍不改悔。因此，各级党的组织应分别这些情况，给以不同的结论。对于前一种人的结论应比较宽大，而对后一种人的结论应比较严格。

对于党员的处分，在该党员从事实上改正错误以后，即取消处分。或者处分错误，处分与事实不符，经证明后，即应取消。

党章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在中央认为必要与可能时，即行组织之。监委的组织细则与工作细则，以及各级党的组织对党员给予处分的手续等，由中央制订颁布之。

党章规定：党奖励党员的积极目的，是教育党员与人民群众，并教育受奖者本人，是为着建立党内的优良作风，确立党员的模范标准，而不是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过去因为革命竞赛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引起党员中某些锦标主义、风头主义的情绪，以及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是错误的。今后必须防止之。

党章指出：党处分党员的积极目的，也是教育党员与人民群众，并教育受处分者本人，是为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实行党内的惩办主义。这种指出是必要的，因为过去某些党的组织对于犯错误的党员，仅仅简单地着重组织上的处分，而忽视思想上、政治上的教育，忽视从思想上、政治上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因而妨碍党员在被处分以后，彻底明了自己错误与改正错误。这在今后必须注意改正。

九　党的严肃性与灵活性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了我们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区别。这是极端重要的。为了要领导一个十分严重的、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国民族的大革命到胜利，没有一个在原则上十分严肃的、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党，是不能设想的。中国人民现在正处在接近于打倒日本侵略者与建立新中国的前夜。一方面，我们党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阶级和一切民主党派来争取胜利；另一方面，我们党必须严整自己的队伍，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提高自己的严肃性，与其他一切政党分清界限，才

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才能不与其他政党混淆，才能提高别人，领导群众。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它的世界观与思想方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区别于一切其他阶级的。它在中国目前的革命中，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它不只是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相区别，而且也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相区别。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革命理论、革命方法和革命的最终目的，都与无产阶级的政党根本相区别。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动摇性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武器，他们常常不容易认清敌人、认清朋友，不能组织足以战胜敌人的革命队伍和正确指导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些，就是我们在目前民主革命中，在政治上区别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所在。在组织上，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铁的纪律和彻底的群众路线与自我批评，也是区别于其他一切阶级的。只有当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自己和其他一切阶级区别开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正确地去联合别人，提高别人。这就是说，求同必先立异。不立异，就不能正确的求同。不立异而去求同，就必然变成投降主义。

我们的这种立异，不是宗派主义的立异，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清界限，以便强有力地去团结一切民主阶级与民主派别。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独与其他一切阶级应该分清界限，就是与本阶级的群众也必须分清界限。就是说，我们的党员——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必须与普通的罢工工人有所区别，与普通的要求减租减息的农民有所区别。我们的党，必须与职工会有所区别。即使在党内，也是一样。如果党内发生了机会主义。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主张，我们党员也必须与这些东西分清是非，分清界限。我们的党员，只有当他们能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自己和其他一切阶级分子，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区别开来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们才能去改造别人，提高别人。

这就是我们党的原则上的严肃性。

我们党从来就是一个严肃的党，所以它能实现自己在中国人民革命的任务。而在目前时期的目前任务之下，我们党更加需要提高自己的严肃性，才能实现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中今后更加伟大而复杂的任务。因此，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就特别表现为一个高度严肃的党章。这是我们党的目前任务和环境所要求于我们的。

我们党必须有原则上的严肃性。但在实施原则时的具体工作中又必须有高度的灵活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与本阶级的群众和全体劳动人民建立极密切的联系，必须与所有各革命阶级及革命党派建立革命联盟，必须在革命行动中同广大群众和必要的同盟者一道前进，因此，它必须有灵活性。为了前进，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它必须善于向自己的同盟者和群众作具体的有益的让步、妥协和等待。它必须绕过横在革命道路上的一切暗礁，必须善于配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部分利益，配合各种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就是说。它决不应该使自己的原则上的严肃性与宗派主义、孤傲态度相混淆。然后，它才能去领导别人，提高别人，实现人民的解放。这就是说，必须求同，立异而不求同，就必然变成宗派主义。

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没有原则的灵活，超出原则的让步与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比如，为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是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是测量我们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是否正确的标准和尺度，一切合于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正确的，一切不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不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

要和别人求同，不是放弃原则去求同，不是从原则上降低自己去求同，而是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去求同，而是以逐步地提高别人到自己的原则高度为目的去求同，而是从群众和同盟者现有的经验和水准出发，逐步地去提高他们的觉悟，提高他们到共产党所主张的一定纲领的水平去求同。换句话说，是以提高别人为目的的求同，而不是以降低自己为目的的求同。

这就是说，我们的灵活性，必须密切结合于党的原则上的严肃性。

我们党现在正处在中国人民争取抗日建国大胜利的前夜。所有党员，除开以最大的热情和最大的勇气去争取胜利之外，还必须有最高的理智与最冷静的思考去准备我们各方面工作的进步与转变，要使这种进步与转变是主动的、自觉的，而不是被逼的、不自觉的。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也是估计到了这种情况的。在党章上强调了原则上的严肃性，同时又照顾了行动上和工作中的灵活性，就是不只估计了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同时又估计了将来的情况而决定的。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不只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应该而且能够实行，就是在日本侵略者已被打倒、中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时，也是能够实行的。

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是伟大的光明的前途，是新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全党应该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方针与组织方针之下，根据本大会通过的新的党章，迅速地、严格地整编自己的队伍，磨炼自己的组织上的武器，以便全党都能毫无遗憾地去率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克服一切困难，争取历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

我们大会通过的党章，将是一个能够保证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获得胜利与解放的党章。

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我们党的领袖、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毛泽东同志万岁！

中国共产党党章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总　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除了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外，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由于现时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民主份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并由于现时的国际条件，便规定了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有国内外广泛的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对内，组织与团结中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界和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同自己一道；对外，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为解除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侵略，为肃清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的压迫，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为实现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而奋斗。

在将来阶段，在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又是一个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并且还不统一的国家，一方面，人民大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群众有英勇斗争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革命道路上的阻力特别强大，这就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并由此产生了革命的长期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武装斗争在极长时期内，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革命在主要城市胜利以前强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重要性，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进行长期忍耐工作的必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是十分勇敢、十分有经验、十分机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根据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放手动员与组织千百万群众，战胜一切阻难，绕过一切暗礁，以奔赴自己的目标，并不

断锻炼自己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及革命的国家组织之中坚。中国共产党对于从内部或外部来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破坏各革命阶级联盟、以及破坏其他革命事业的一切活动，必须进行严正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队伍内部，不能容许右的及“左”的机会主义存在。中国共产党必须用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对待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冒险主义者，并将其中坚持错误的人清除出党，以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

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

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每一个党员，积极地自我牺牲地进行工作，以实现党的纲领和党的一切决议，达到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凡承认本党纲领和党章、参加党的一切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凡党员均有下列义务：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二)严格地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三)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

(四)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组织的纪律，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

第三条：凡党员均有下列权利：

(一)在党的会议和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切实的讨论。

(二)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

(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

第四条：年满十八岁者，方得被接收为党员。

凡新党员入党，均须依照下列规定，个别地履行入党手续，方能认为有效。

(甲)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党的支部大会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党委批准，并须经过六个月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乙)中农、职员、知识份子、自由职业者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一年以上党龄的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一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甲乙两项所规定之介绍人的资格及新党员的候补期，在革命新发展地区，得由党的中央代表机关或省委边区党委规定临时办法，变通办理之。

(丙)除甲乙两项所举各种成份以外之其他社会成份的人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县委、市委或相当于县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二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丁)凡脱离其他政党加入本党者，如系其他政党之普通党员，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之党委的批准；如系其他政党之负责人员，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五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之党委的批准（如系其他政党之重要负责人员，则须经中央批准）。以上均须经过二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第五条：在特殊情形下，县委以上之党委及相当于县委之党委，有权直接决定个别地接收新党员。

第六条：介绍人对被介绍人的思想、品质、经历，须真实地向党作负责的介绍，并须在介绍前，向被介绍人说明党章及党的纲领和政策。

党委在决定和批准新党员入党前，须指定党的工作人员与之进行详细的谈话，并须经过负责的审查。

第七条：候补党员候补期的作用，是使候补人接收初步的党的教育，并在工作中保证党的组织考察候补人的政治品质。

候补党员的义务和权利，除无选举权、被选举权与表决权外，与正式党员同。

第八条：候补党员候补期满、转为正式党员时，须经支部大会的决定，及原批准入党之上级党委或相当的上级党委的批准。

候补党员的候补期限，所属党委得决定延长或缩短之。

候补党员经过候补期间考察后，被认为不能入党者，得取消其候补党员资格。

第九条：党员的党龄，由候补党员决定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第十条：党员及候补党员由这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的工作地区时，即作为后一个组织的党员或候补党员。

第十一条：党员及候补党员请求脱党者，须向党的支部正式申请，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告上级党委备案。

第十二条：凡党员及候补党员，没有正当理由，在六个月内不参加党的生活，不进行党所分配的工作，又不缴纳党费者，即认为自行脱党，由党的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告上级党委批准。

第十三条：开除党员或候补党员的党籍，须经该党员或候补党员所属之支部党员大会的讨论和决定，并须经上级党委的批准，方能认为有效。

支部以上之各级党委，在特殊情况下，均得决定开除党员及候补党员的党籍，但均须经上级党委之批准，方能认为有效。

第二章 党的组织机构

第十四条：党的组织机构，是按照民主的集中制建设起来的。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其基本条件如下：

(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

(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

(三)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

(四)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

第十五条：党的组织，是按照地区或按照生产部门为标准建设起来的。

在某一个地区内，管理全区党的工作的组织，对于该地区内各个部分党的组织来说，是上级机关。

在某一个生产部门内，管理全部门党的工作的组织，对于该部门的各个部分党的组织来说，是上级机关。

第十六条：党的组织系统如下：

(一)在全中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

(二)在省、边区、地方，是党的省代表大会，边区代表大会，地方代表大会，省委员会，边区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省代表会议，边区代表会议，地方代表会议。

(三)在县，是党的县代表大会，县委员会，县代表会议。

(四)在城市，是党的市代表大会，市委员会，市代表会议。

(五)在城市中或乡村中的区，是党的区代表大会（或区全体党员大会），区委员会，区代表会议。

(六)在每一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连队、机关和学校，是全体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支部代表会议。

第十七条：各级党的组织之最高的领导机关，在支部——是全体党员大会，在区、县、市、地方、边区、省——是代表大会，在全党——是全国代表大会。在各级大会闭会时期，由各级大会所选出之党的各级委员会，即为各级党的组织之最高领导机关。

第十八条：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凡能进行选举的地方，均须由选举产生之。仅由于环境或条件的限制不能召开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时，方得召集代表会议选举之，或由上级组

织指定之。

第十九条：选举党的各级委员会，须按候选人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或表决，并保障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

第二十条：各级党的组织，为了传达与讨论上级组织的重要决定及为了检查工作与布置工作，得召集各种干部会议及活动份子会议。

第二十一条：党的政策及各种问题，在未经决定以前，每个党员在党的组织内及党的会议上，均可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一经决议以后，即须服从，并须无条件的执行。

第二十二条：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才能发扬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与巩固党的纪律，并使这种纪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纪律，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才能建立与巩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但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遵照党内民主原则进行工作时，不能妨害党内的集中原则，不能使正当的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

第二十三条：为了保证党内民主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方向进行，而不致在紧急情况下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团结，不被可能的暗害份子、反党份子及企图进行小组织活动的人们利用党内民主来进行损害党、分裂党的活动，以及不致被极少数人利用党内极大多数人思想上一时没有准备的状态来达到自己的企图起见，凡关于全国范围或地方范围内的党的政策问题之全般的广泛的检讨与辩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在时间上允许，即在客观情况不紧急的条件下；（二）并有党中央或党的地方领导机关的决议；（三）或有过半数之下级组织的提议，或有上级组织的提议。

第二十四条：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宣传中央机关和上级组织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

第二十五条：凡关于全国性质的问题，在中央没有发布意见和决定以前，各部份和各地方党的组织及党的负责人，除自行讨论及向中央建议外，均不得自由发布意见和决定。凡关于地方性质的问题，党的地方组织有自主决定之权；但不得和中央及上级的决定相抵触。

第二十六条：凡新成立之党的组织，须经所属之上级机关批准。

第二十七条：为便于指导各地方党的工作，中央委员会按情况之需要，在数省或几个边区范围内，得成立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并对中央负责。此种中央代表机关，在情况不需要时，得撤消或合并之。

第二十八条：为分别进行各项工作起见，在党的各级委员会内，按照工作需要，得设立管理党务的、宣传教育的、军事的、经济的、民众运动的各种部门或委员会，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各项工作。

为进行某项临时的、特殊的工作，各级党委得设立临时的工作委员会或部门。

第三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二十九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并召集之。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延期或提前召集。

如有代表半数党员以上之党的地方组织要求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必须召集

之。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代表过半数的党员之代表出席时，方能认为有效。

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数额及选举方法，由中央决定之。

第三十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听取、讨论和批准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其他机关的报告。

(二)决定和修改党的纲领与党章。

(三)决定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四)选举中央委员会。

第三十一条：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员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并选举之。中央委员出缺，由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之。

第三十二条：中央委员会代表本党与其他政党和团体发生关系，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并指导其活动，分配党的人力和财力。

第三十三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每半年召集一次。但中央政治局得按情况延期或提前召集之。候补中央委员出席全会，有发言权。

第三十四条：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

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前后两届全体会议期间，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

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央委员会依工作需要，设组织、宣传等部与军事、党报等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关，分别办理中央各项工作，受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中央主席之指导监督。

第三十五条：在前后两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得召集各地方党委代表举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若干次，讨论并决定当前的党的政策问题。

第三十六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由各省委、边区党委及中央直属之其他各党委的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之。代表数额，由中央规定。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须有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委及边区党委的代表出席。

第三十七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有权撤换个别不能履行自己责任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并有权补选部份候补中央委员。但每次撤换之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或补选之候补中央委员的数额，均不得超过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五分之一。

第三十八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及撤换与补选之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发生效力。

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之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一切党的组织，都必须执行。

第四章　党的省及边区之组织

第三十九条：党的省或边区代表大会，省委或边区党委，均受中央或中央代表机关之领导。

第四十条：省或边区代表大会，有省委或边区党委每二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省

委或边区党委，得延期或提前召集。如有该省或该边区半数以上的下级组织之要求，或有中央、中央代表机关的提议，省委或边区党委必须召集之。

出席省或边区代表大会之代表数额及选举方法，由省委或边区党委决定，中央或中央代表机关批准。

第四十一条：省或边区代表大会，听取、讨论和批准省委或边区党委的报告及省或边区其他机关的报告，讨论和决定本省或本边区的各种问题与各种工作，选举党的省委员会或边区委员会以及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

第四十二条：由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全体会议，选举省委或边区党委的常务委员会及正副书记，进行经常工作。省委或边区党委的书记和常委，须经中央批准。书记须有五年以上党龄的党员充任。

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第四十三条：省委或边区党委，在本省或边区范围内，执行代表大会及中央机关的决议，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分配党的人力和财力，指导党外各种非党组织中党组的工作。

第四十四条：在前后两届省或边区代表大会期间，省委或边区党委得召集各地委、县委及其他直属党委的代表，举行省或边区代表会议若干次，讨论并决定该省或该边区范围内当前的各种工作问题。

省或边区代表会议，有撤换与补选部份省委或边区党委委员之权；但其数额均不得超过该委员会总数的四分之一。

第四十五条：省或边区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及撤换与补选之委员，须经省或边区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发生效力

第五章　党的地方、县、市及区之组织

第四十六条：党之在一个地方、一个县、一个城市、一个区的组织和工作规则，相同于前党章之在一个省或一个边区的组织和工作规则，各属于各该上级组织之领导。

第四十七条：党的地方、县、市及区代表大会，每二年召集一次。在两届代表大会之间，均得召集代表会议若干次。

第四十八条：地委、县委之全体会议，至少每年召开四次。市委、区委之全体会议，至少每一个月召开一次。

地委、县委、市委、区委之委员及正副书记，均须经各该上级组织之批准。地委、县委、市委书记，须有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充任。区委书记，须有一年以上党龄之党员充任。在革命新发展地区，此项党龄规定得变通办理，但须得到省委或边区党委之批准。

第六章　党的基础组织

第四十九条：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支部。

在每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连队、机关、学校等等之内，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的支部组织。凡有党员不到三人者，则加入邻近之党的支部组织。

党的支部组织，须经县委或市委之批准。

第五十条：凡在党员数量比较多的处所，在党的支部委员会之下，得按自然的、居住的或工作的情况，划分小组。每组选举组长一人，必要时再选举副组长一人。

凡有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五十人之乡村，或超过一百人之工厂、机关和学校，得成立党的总支部，在总支部下，按居住、车间、部门和班次，成立分支部。分支部享有普通支部的权利。

第五十一条：凡有党员及候补党员超过五百人以上之大乡镇、大工厂、机关和学校，得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允许，得选举党的乡镇、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委员会之下，按居住、车间、部门和班次，成立党的支部。

第五十二条：支部必须使人民群众与党密切结合起来。

支部的任务是：

(一)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主张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

(二)经常注意并向上级机关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关心人民群众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各种问题。

(三)吸收新党员，徵收党费，审查与鉴定党员，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

(四)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

第五十三条：由支部全体党员大会选举支部委员会，以进行经常工作。任期半年至一年。支部委员会人数之多少，由支部之大小来决定，最少者二人，最多者十一人。由委员会选举书记一人，必要时得再选举副书记一人，其他委员的分工，由委员会按照实际需要决定之。

在七个党员以下的支部，只选举支部书记一人或正副书记各一人，不设支委。

第七章　党的地下组织

第五十四条：凡本党不能合法存在与活动的地区之党的地下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由中央根据党章通过特别的决议规定之。本党章各条所规定之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凡不适用于党的地下组织者，均得变动办理之。

第五十五条：党的地下组织，在接收党员时，须经更慎重的考察。新党员入党时，只履行秘密环境下所能允许的手续。

第八章　党的监察机关

第五十六条：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

第五十七条：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各该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

第五十八条：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与职权，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

第五十九条：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

第九章　党外组织中的党组

第六十条：在政府、工会、农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凡有担任负责

工作的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组。党组的任务，是在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指导党员为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政策而工作。

第六十一条：党组设书记一人，党员人数超过十人之党组，设党组干事会，担负经常工作。党组干事会及书记，由所属党委指定之。

第六十二条：各级非党组织中之党组，服从各该级党的委员会之领导，并执行其决议。各级党委的会议，得吸收重要党组的负责人参加。

第十章　奖励与处分

第六十三条：凡在工作中，表现自己是完全忠于党与人民的事业，是遵守党和革命政府纪律的模范，在实现党的纲领、党的政策和中央及上级组织的决议中富于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取得人民群众真诚拥护的党员与党的组织，得给予奖励。

第六十四条：凡不执行中央和上级组织的决议，及违犯党章、党纪者，各级党的组织，按照具体情况，得以下列方法给予处分：

（一）对于整个组织的处分是：指责；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撤消其领导机关并指定其临时的领导机关；解散整个组织，并进行党员的重新登记。

（二）对于党员个人的处分是：当面的劝告或警告；当众的劝告或警告；撤消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第六十五条：党的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如有严重地破坏党纪的行为，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其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直至开除其党籍，但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央委员的赞成，方能认为有效。

第六十六条：对党的组织及党员个人给予处分，须将处分的理由通知被处分者。凡被处分后不服者，均可进行辩护，并可要求复议及向上级机关申诉。各级党委对于任何党员的申诉书，须迅速转递，不得扣压。

第六十七条：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的组织，在决定和批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时，应保持高度的慎重，仔细听取本人的申诉和分析其犯错误时的情况。

第六十八条：党对党员一切奖励与处分的积极目的，是教育党员与人民群众，并教育受奖励者与受处分者本人；既不是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也不是实行党内的惩办主义。党对成绩优异的同志给予奖励，是为着建立党内的优良作风，确立党员的模范标准。党对犯错误同志给予批评或处分，是为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十一章　经　　费

第六十九条：党的经费，由党员缴纳党费，党所经营的各种生产和企业的收入与党外捐助等方法筹集之。

第七十条：各地党员及候补党员应缴党费数额，由各省委、边区党委或其他相当的党委规定实行之。

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

《解放日报》社论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了。自四月廿三日起至六月十一日止，大会历时五十天。代表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五百四十七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位候补代表，聚集在自己所手创的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根据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共开大会二十二次，八个代表团会议及许多小组会议多次，详尽的听取和讨论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及党章条文，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和新的党章，郑重的民主的以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四十四位中央委员和三十三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了新的全国领导机关。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次大会的举行，正当中国人民处在新的历史变化关头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败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的胜利，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亦已胜利在望，世界和中国走向光明进步的总趋势，已经确切无疑的决定了；但是，日寇还有力量，世界上还存在着强大的反动势力，中国还是不团结的，中国人民仍然是被分裂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机。于是放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明显的两个前途，一个是光明的前途，一个是黑暗的前途。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的各阶级都对于时局表示自己重大的关心。最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举行了自己的全国大会，这决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因而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这个历史关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第一个历史的标志，就是全体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指出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两条路线的存在，这两条路线，就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与中国人民觉醒与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国民党内主要统治集团，因为坚持反人民的路线，它的力量大为削弱了，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反之，中国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因为坚持了人民战争的路线，它的力量大为增强了，成了全国抗战的重心和主力军。

中国人民，对于这一种情形，应当怎样办呢？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力量用于积极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

的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依靠国民党。消灭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权利。任何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这种神圣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中国人民在其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的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

对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集团的反动路线，可以有两种态度。或者采取上述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态度，或者采取另一种态度，即是替它捧场的态度，替它涂脂擦粉的态度，对它一切服从一切依靠的态度，不放手扩大人民军队的态度，对反动派的无理进攻不站在自卫立场上于劝说无效之后坚决给以反击的态度。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这两种态度，是正确的人民路线与不正确的反人民路线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和人民的民主解放，光坚持正确的领导路线，反对反动的反人民的领导路线，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力量，有巨大的革命队伍，这个队伍包括各阶层的人民，即是一、产业工人手工工人与雇农，二、农民，三、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这三种人民都在团结之列，非如此，便不利于战胜民族敌人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但是这三种人之中，最众多的就是农民，它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这是革命队伍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革命以来三次革命战争的经验证明：如果革命运动没有与农民结合起来，那末，那怕有其他人民群众的参加，革命队伍是没有力量的，是可以轰轰烈烈一时而不能持久的，是在敌人一个或几个严重打击之下就要垮台的；反之，如果革命运动与农民结合起来了，那就成了任何反动派所不能摧毁的力量，就有了粮食，有了军队，有了根据地，有了向前发展的立脚点，就可以在长期斗争中不断增大革命的队伍，吸引其他阶层的人民来参加革命斗争。要打败日寇及其走狗，我们只应该这样做。毛泽东同志再三再四地强调农民的重要性，指出农民是工人的前身，工业的市场，军队的来源，现阶段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础，和现阶段文化运动的主要基础。毛泽东同志号召广大的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克服自己以城市观点去观察农村的错误现象，把自己与农民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

对于农民的这两种态度，乃是人民路线与反人民路线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抗日运动与农民结合了，民主运动与农民结合了，这些运动才找到了基本队伍，才有力量。但是光有农民和其他部分的人民群众，还不足以致富强。要富强，就要城市，就要工人。放在我们眼前的，将有从农村工作到城市工作的转变，将有从游击战到正规战的转变，这些转变，必须依靠工人及其他广大城市人民的援助。只有展开了广大的工人运动与城市人民民主运动，中国人民才有巩固的基础，来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中国的实现。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就是中国人民的路线。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详细规定了中国人民的战斗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的宪章，其重要性不待指出就可明白。为了实现这个纲领，实现这个宪章，就一定要实行中国人民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主要决定于两个问题，即是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对于农民的态度。实行这条路线，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态度，那末，不管还有多少反动派的阻碍，不管中途还有多少波折，中国人民就会有光明的前途。不实行这条路线，对于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采取不

正确的态度，不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错误路线进行必要的斗争，或者对反动势力的回击超过了自卫的立场，对于农民采取不正确的态度，或者不要农民，不去为实现农民的民主民生要求而斗争，或者以城市观点去观察农村，因而脱离农民，孤立起来，那末，人民的队伍会被打散，中国人民还有被拖上黑暗的前途的可能。再则，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纲领，还必须发展工人运动与城市人民运动，把这个运动提到很高的地位。没有工人运动与城市人民运动的发展，没有城市，不学会很好管理城市，管理工业，仅仅停止在乡村，满足于乡村，就没有办法从城市中消灭日寇，就没有办法把争取新中国的基础巩固起来。

七大的第二个历史标志，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和十七年武装斗争的经验，制定了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体系，这是朱德同志军事报告中的主要部分。八路军、新四军这支人民军队，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亲手抚育起来的。这支军队，没有城市作依靠而依靠乡村，没有国家政权作依靠而依靠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农村根据地，这样进行了十七年的长期战争，经常以弱敌强，以寡敌众，而能取得胜利。这种战争，就在世界上也是很少前例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敌人是强大的，大城市在敌人手里，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民能不能组织自己的军队，维持自己的军队，并且能不能以弱胜强以寡胜众呢？如果可能的话，怎么才会可能呢？朱德同志的报告，不但原则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在兵役、养兵、带兵、练兵、用兵、政治工作、指挥、后方勤务、民兵等具体问题上做了答复。我们的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彻头彻尾的与旧军队不同，彻头彻尾是人民的军队，彻头彻尾的与人民结合在一起。任何军队，只要他的领导者愿意照八路军新四军的样子做，他就能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神奇奥妙，因为“成千成万的军队，成千成万带枪的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人民，其中最大多数是农民。”这个道理一经指出之后，人民军队的发展就开辟了无限宽广的前途，把二三百万旧军队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就成为可能的和应当的事业。对于八路军新四军来说，今后遵循大会的方针，继续前进，就有把握与人民更加亲密结合，成为更完善的常胜的人民军队，打败日寇及其走狗，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

大会的第三个历史标志，就是新的党章的制定，这意味着党内生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已经而且将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有长足的进步。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就是我党组织路线的总结与发挥。国民党六次大会的特点之一，是在国民党内建立了公开的个人的独裁；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正在竭力设法把国民党进一步法西斯化。而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则正与它作了显明的对照。在中国共产党新的党章上，规定了党员的四项义务和四项权利。义务中的第三项是：“为人民服务，巩固与群众的联系，及时反映群众的需要和要求，向非党群众解释党的政策。”权利中的第四项是：“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是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做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人民，只有特殊的义务，没有特殊的权利。共产党员，首先是人民的勤务员，然后才是人民的领导者，首先是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是人民的先生。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员如果依照教条或狭隘经验，站在人民头上，强迫人民依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进行解放斗争，那怕这种主观愿望，这种动机是为人民的，结果是办不通的，人民是不要这种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人的。但是，如果共产党员做人民的学生与勤务员，虚心向人民学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站在人民之中，做人民的模范，与人

民一起坚持下去，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那末，人民就非要这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可，因为如果没有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共产党作为领导者，人民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党章上关于党员义务的第三项规定，保证中国共产党永远排除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对人民的错误态度，那种态度实际上与剥削者对人民的态度有共同之点，即是脱离人民。

党内生活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亦是如此。党是依靠党员去进行实际工作的，与领导机关对比起来说，党员是党的主体，领导机关是由党员委托来为党员服务的，是党员用来集中意志，指导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是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就不能战胜强敌，所以选出自己的领导机关，信托它的领导，并且自愿遵守严格的纪律，服从领导机关所定出的纲领、章程和决议。这是一个方面，这说明了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领导机关要领导得好，必须对于遵守党的纲领、章程和决议的广大党员，发展他们的自动性、创造性，时常听取党员的批评和意见；在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上级机关不能专门责备下级，而应当首先听取下级对自己的批评，进行对自己的批评，然后来帮助下级检讨自己的缺点与错误。这就是在集中指导之下的民主。这种民主集中制，我党向来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全党曾有几个短时期做得不够与不好，现在若干地方组织也在有些时候做得不够与不好，有的对发展党内民主做得不好，有的对坚持集中制做得不好。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所规定的党员权利第四条，乃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党内的高度的民主，新的党章同时把学习与服从纪律规定为党员的义务，以保证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相结合，将是今后党内生活的特征，这对于我党更进一步的团结与进步，将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大会最后一个历史标志，而且是最重要的历史标志，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被全党一致承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新的党章，在其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个总纲，又用极其简洁的词句，叙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经过了二十四年三次革命战争的考验，我们党创造了这个完全适合国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找到了它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同志，这是中国人民伟大无比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取得了决定胜利的历史标志。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全体党员所公认的领袖，中国人民有了自己从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领袖，这就十倍百倍加强了党的团结，这就标志了党已经成熟，标志了它是将要胜利的党。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知道只要跟着他一路前进就一定会胜利，就会达到百余年来无数先烈抛头流血以求实现的目标，这就十倍百倍增强了人民的解放意志与胜利信心，十倍百倍增强了人民的力量。这就最后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内反动派企图分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卑鄙阴谋。这就保证人民解放胜利的到来，而且加速这个胜利的到来，日寇及其在中国的同盟者将只有死亡一条路。

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在中央委员会之内，包括了经过考验的、对各方面工作有经验的、在人民中有极大威信的、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同志们。大会选举的过程，经过了毛泽东同志对于选举方针的指示，自由提名单，介绍，讨论，预选，正式选举的过程，充分表现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党内高度民主高度集中的生动活泼的生活。经过每个代表郑重讨论和以无记名投票选出来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乃是我党历史上最完善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它一定能够保证大会路线的完满实现。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团结的大会，是准备胜利的大会。这个大会已经闭幕了。大会的代表将要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去了。我们的代表们，是带着巨大的喜悦但也是极其严肃的心情回到自己岗位上去的。中国民族敌人的被消灭与中国人民解放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了，但是前途还有重重困难，重重险阻，另一方面，我们不懂得的东西还多，还要好好努力学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才能称得上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毛泽东同志说："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在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的，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中国建设起来。"我们七百多位大会代表们，一定不忘记我们党的伟大领袖的话，并且一定会在工作中把他的意志实现起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党的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消灭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附] 关于党的第七次大会开、闭幕消息的报导

（一九四四年五至六月）

[新华社延安1日电] 中国共产党4月下旬在延安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事件之一。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在中国反攻的前夜团结全国人民，挽救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所造成的时局危机，彻底打败和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

大会正式代表五百四十四名，候补代表二百零八名，共七百五十二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全党的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洛浦、彭真等十五人为主席团，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大会的议事日程共有四项，即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的修改党章报告，与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全部经过及各种决议文件，均将陆续发表。

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程。报告全文长约六万字，总题为《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指出惟有成立联合政府（而绝对不是为全国人民所绝对反对的国民党当局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才是目前中国时局的出路。他的报告详述中国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与中国人民觉醒与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并详述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般

纲领与在目前时期的具体纲领。中国共产党将为联合政府的成立及其民主纲领在全国的实现而坚决奋斗；这一奋斗的最近步骤之一，将为尽可能迅速在延安召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过去共召集过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时间为：第一次，1921年7月，第二次，1922年7月，第三次，1923年6月，第四次，1925年1月，第五次，1927年4月，第六次，1928年7月。自第六次大会迄今，已达十七年，因为长期处于严重的战争与斗争中，直至今日，始能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此次大会开会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党内的巩固与团结一致，及其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均较过去任何时期为高。中国共产党现在不仅已拥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并已领导数达九十一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正规军，二百二十万的民兵，十九个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与西北十九个省份的解放区，这些解放区的人口总数已达九千五百五十万。这些数字由于解放区抗日战争继续迅速发展中，亦均继续在增大中。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区，实际已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争取解放的重心。中国共产党的此次大会，无疑地将对中国抗日战争及国内政治的今后发展，产生极端重大的影响。

［**新华社延安1日电**］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下旬某日由任弼时同志宣布开会，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朱德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林伯渠同志及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同志均相继发表演说。兹分志于下：

任弼时同志宣布开幕。他说："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已有二十四年了。在这二十四年中，我们党经过了无数艰难困苦的斗争，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我党二十四年来英勇奋斗的最主要的收获是：我党的主张获得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斗争中，体验到我党自成立以来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也就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方向，以及各项具体政策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感觉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他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他们把我们党看成洪涛险浪中的舵手。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寄托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身上。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同志，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了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在最近两三年内，在中国和东方，将要发生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全国人民，全东方各民族和全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在这巨大的事变中，我们将采取什么政策，什么步骤，来最后驱逐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时机召开的。我现在正式宣布大会的开幕。"

（原载1945年5月1日《解放日报》）

［**新华社延安13日电**］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已于11日胜利闭幕。大会开幕于4月23日，自开幕至闭幕适为五十日。大会的程序完全依照原定计划进行：4月24日由毛泽东同志作政治报告，25日由朱德同志作军事报告，5月14日、15日由刘少奇同志作修改党章的报告，6月9日、10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余大量时间，均用于各代表团小组、各代表团及大会详细讨论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党章条文与选举的准备工作，其中共开全体大会二十二次，因此大会得以实现了高度的民主。大会根据三个报告分别通过了两个简短决议与新的党章。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系于5月31日通过，全文如下："大会完全同

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与新的党章则于6月11日闭幕式以前通过，其全文将另行发表。毛泽东同志在闭幕词中指出大会的美满的成功，要求代表们把大会的民主精神与团结精神带到全党的各个工作部门中去，向全党与全国人民宣传大会的路线，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坚持民族的独立自由，坚持联合政府，坚持制止内战。毛泽东同志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加上团结一致的奋斗，就一定会胜利。”同日朱德同志、吴玉章同志、徐特立同志也发表演说，庆祝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空前的成功，并根据辛亥以来四个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说明中国人民必然胜利的各种条件。

［新华社延安13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三名。正式中央委员名单如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祖涵、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陈绍禹、秦邦宪。候补中央委员名单如下：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程子华、刘长胜、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云泽、赵振声、王维舟、万毅、古大存、曾镜冰、陈郁、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张宗逊、陈赓、王从吾、习仲勋、萧劲光、刘澜涛。名单中包括在国民党狱中者三名：陈潭秋、廖承志、马明芳，妇女三名：蔡畅、邓颖超、陈少敏，蒙古人一名：云泽。全体正式与候补中央委员均以获得大会正式代表之过半数选票而当选。

［新华社延安13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称为团结大会胜利大会，这两个名词可以概括这次大会对于中国前途的影响。七次大会对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中的一切民主派）都采取团结的方针，它所提出的纲领适合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需要。因此七次大会的文件不但得到解放区以至沦陷区各阶层的普遍拥护，即在国民党统治区亦获得广泛的同情；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虽无公开表示此种同情的自由，但他们透过国民党检查而发出的呼声，仍与共产党的主张相一致，这就是中国最真实的民意测验。共产党的大会对于国民党当局也表示着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的愿望。它与国民党的大会相反：后者一面虚伪地空谈政治解决，一面却阴谋地主张反民主的所谓绝对统一，其目的显然在于挑起大规模的内战；共产党的大会则一面坦白地批评国民党当局的错误，公开地指出内战的危机，一面力求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其目的显然在于制止内战，求得国内和平，以便加强对日作战。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两个大会也是相反的：国民党大会极少谈到抗日战争，压制关于战争的质问，因为国民党当局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美国的代庖与日本的自动退却，寄托于妥协的和平，而自己则热中于准备内战；共产党大会则以极大的努力，讨论如何更广泛更有效地组织与武装人民，壮大人民力量，配合盟军，收复华北、华中、华南的沦陷区，收复华北、华中、华南的大城市，并收复沦陷最久的东北。在大会的讨论过程中，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高岗、洛甫、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志中、陆定一、刘伯承、朱瑞、古大存、李富春、乌兰夫、林彪、马凤舞、刘澜涛、张鼎丞、傅钟、叶剑英等同志发言的主要中心，即在于此。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同志，朝鲜革命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朴一禹同志亦被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说明日本与朝鲜的革命运动及对中国独立民主的希望。由于大会的团结方针，大会坚信中国抗日战争与民主改革的前途必然是胜利的。大会

同时也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还会有各种可能的严重困难，全党与全国人民对这些严重困难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无论何种困难，终不能阻止中国人民的胜利。

七次大会对于党内的影响，也可以用团结大会与胜利大会来概括。七次大会的团结，是以毛泽东路线、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的团结，是在广泛发展自我批评与党内民主基础上的团结。七次大会所通过的新党章，充分表现了这一点。新党章的前面加了一项总纲，在总纲上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新的党章又规定党员的权利为："（一）在党的会议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和各种实际问题的讨论；（二）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这种精神也实际表现在大会的讨论与选举中。大会的三项报告均由代表团小组、代表团与全体大会充分讨论，提出对于报告内容及党的实际工作的各种意见，发言的同志并对过去党内所犯过的错误进行各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甚至因病不能出席者也写了书面的意见，因此使党内的意见达到空前的一致。新的中央的选举，系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最初步的名单，主席团即以此为基础提出预选的候选名单，再交各代表团讨论后举行无记名投票，作为预选，然后主席团始以预选的结果为基础提出正式的候选名单交大会作无记名选举，选举时并允许投票者另行提出名单，及自由改变名单。在高度民主基础上所建立的高度集中，与在高度集中指导下所实行的高度民主，使党的团结达到空前的巩固。这种巩固的党内团结的组织路线，与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正确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相结合，就是共产党大会的坚强胜利信心的全部根源。因此，在大会闭幕以后，可以预料中国共产党内团结民主的新高涨，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团结民主的新高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新高涨，这三个高涨的潮流将最终冲决一切困难阻碍，淹没中国人民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使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涌现于亚洲大陆。

（原载1945年6月14日《解放日报》）

纪念抗战八周年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

《解放日报》社论

今天是神圣的抗日民族战争的八周年纪念日。八年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八年来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斗不但对东方的抗日战争及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作了极大的贡献，而且对保障战后世界的巩固和持久的和平亦将起极大的作用。八年来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既无愧于中华民族抵御外患奋求独立的光荣传统，亦无愧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五个最大国家之一的地位。经历了八年来无数艰难困苦与自我牺牲之后，一个新局面，在中国人民面前出现了，这就是：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的与富强的新中国快诞生了。当此民族抗战进入第九年时，中国人民正以不胜不休的坚强意志，必胜必成的胜利信心，继续八年来的英勇奋斗。以求这个崭新的局面完全实现！

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现在有着空前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的条件。

目前的国际条件是空前有利的，这便是：（一）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获得了完全与彻底的胜利，这个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胜利，其后果与影响是不可衡量的，它首先将加速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的胜利；（二）以苏美英为首的爱好自由的民族继续团结一致，正在建设着持久和平的世界新秩序；（三）欧洲被解放的国家正在医治法西斯奴役所带来的创伤，根绝法西斯的残余和游魂，在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基础上恢复与重建新的民主的欧洲。世界正在彻底消灭专制与反动，走向民主与进步。“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这就是目前世界新形势的规律。”（毛泽东同志）

目前中国的国内形势也是具备有利的条件，经过了八年战争长期锻炼，历经了无数艰难困苦，支付了重大的牺牲与代价之后，中国人民不但有了空前高度的觉悟与团结，而且有了空前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有了一万万人口从外国侵略者及国内专制主义者的羁绊下解放出来了，他们已经拥有将近一百万的自己的人民军队，这个军队在过去一年中解放了一千三百八十万人民和包括五十座城市的八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而那个抗战失败的负责者，民族团结和抗战力量的破坏者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经过八年的战争经不起考验而威信扫地了。这个实行消极抗战压迫人民的法西斯专政，去年一年即抛弃了从黄河边上直到贵州高原的大块国土，以及居住在这块国土上及其以东的一万万人民，损失几十万近百万的军队。废除一党专政现在已经是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了，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已经展开了，即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敢再为这个一党专政辩护，而不得不玩弄“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的把戏了。所有这些，是便于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国内有利条件。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空前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却并不是说：中国人民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途程上已经没有重大的困难和阻碍了。在国际上——特别在国内，困难和阻碍还是巨大的。只有放手动员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中国人民才能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诞生。

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和障碍，首先是日本侵略者还有力量，它还拥有了强大的陆军及虽受损失而仍然相当有力的海空军，它还拥有相当优越的战略地位，盟军在太平洋交通线的漫长，及接近日本本土的幅员广大的屯兵场与数量足够前进基地的缺乏，都使日本法西斯加强抵抗的信心，准备持久挣扎。而中国及美英同盟国内部还存在着动摇分子与绥靖主义分子更使日本法西斯有持久抵抗、争取时间，乘间抵隙、谋取妥协和平的妄图。这就是说：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路上，还有一段复杂艰难的历程，不应该低估敌人的战斗力而盲目乐观，也不应漠视敌人阴谋诱和而毫不警惕。中国人民应该要求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制止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要求一切同盟国家坚持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人民军队，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在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发动抗日的人民战争，并准备配合盟军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

其次是美英盟邦统治阶层中的绥靖主义分子与帝国主义分子，这些老爷们企图在远东恢复其战前的殖民地血腥统治，他们不愿意中国人民获得民族独立解放，而企图把从日本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中国放在自己的压榨之下，把中国变为他们独占的或共占的殖民地。国民党反动派对英国反动将军斯科比在希腊的屠杀事业欢呼。这些老爷们响应这个欢呼。他们支持独夫蒋介石，支持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专政，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应该告诉这些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民为自己的独立自由，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奋斗了八年之久，决不会忍受其他帝国主义者奴役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政治的伟大运动，是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抗拒的。中国人民要求美、英盟邦切实执行大西洋宪章诺言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历次会议的决议。中国人民要求立即停止以租借物资仅仅援助消极抗战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一切援助必须公平分配给一切中国抗日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必须得到一半以上的物资援助。

中国人民感谢美英和一切同盟国家的人民对于我们的宝贵的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知道这样一些必要的区别：第一个，美英政府与美英广大人民的区别，其政府对华政策包含着很错误的部分，这部分政策的实质是帝国主义性的，但是其最大的人民是不负这个责任的。第二个，美英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与其它广大工作人员的区别，前者包含有帝国主义成分，后者很多是同情中国人民的。第三个，今天的政策与可能改变的明天的政策之间的区别。例如，最近半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假如有一天它改变了这个政策，我们并不要反对到底。我们希望盟国的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外交政策，勿使它违背你们的意志，带上帝国主义的成分，而损害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丧失中国人民的友谊。

然而最大的困难与阻碍却在于中国内部，这便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寡头专制统治及其消极抗战摧残人民的政策。这一集团的统治与政策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彻底打败日本建设新中国的根本障碍。八年抗战的经验，证明了：中国存在着两条抗日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与中国人民觉醒与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不克服第一条路线和不采用第二条路线抗战就不能胜利，建国就不能成功。中国人民已经从惨痛的经验中认识了这点。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反人民的一党专政，废除它

的失败主义的与法西斯主义的路线。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要求实行积极抗战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但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却至今深闭固拒，压制人民的要求，坚持专制独裁，坚持反动祸国政策，拒绝联合政府，拒绝作任何民主改革。且更进一步玩弄名词以淆观听，挟外人以压同胞。口头上玩弄“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欺骗，实际上积极勾引国际间的帝国主义反动分子准备大规模的内战。不废止这一个反人民的专政，不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改革，则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与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人民在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民主的新中国的斗争中，应当再接再励，为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而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七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已经为全中国人民提出了争取实现这一联合政府的道路与办法，这一联合政府应有的纲领与政策。团结在这一伟大的历史报告之下，动员、统一与扩大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民主力量，为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而斗争，是抗战进入第九年时中国人民最紧迫的战斗任务。只有实现这个任务，才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

抗战八年了！中国人民在日本法西斯侵略下，在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独裁专制下，无限英勇坚忍、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发展了伟大的保卫祖国的人民战争，现在人民战争的胜利快要来临了，继续努力吧，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任何企图阻碍我们胜利的国内及国际的反动力量，将被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从历史舞台推落下去。

胜利的保卫祖国人民战争万岁！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通电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三日）

全解放区的同胞们！全中国的同胞们！

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自六月二十一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与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发起以来，迅速得到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与解放区各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在短短的二十二天里，各方选出参加筹备工作的代表已达一百二十九人。被选担任筹备工作的同人鉴于解放区人民对于这个代表会议的迫切期望，已于今日（七月十三日）在延安集会，宣告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并选出周恩来、林伯渠、续范亭、邢肇棠、李鼎铭、谢觉哉、刘少白、杨秀林、成仿吾、郭任之、郭子化、李澄之、沈其震、古大存、何思敬、杨尚昆、潘汉年、蔡畅、邓发、丁玲、张宗麟、柳湜、乌兰夫、李延禄、周泽昭等二十五人为常务委员。

在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会上，通过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在延安举行，希望各地各团体选出的代表统于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到达延安。为使这个代表会议尽可能反映最广泛的中国人民的意旨起见，筹委会又决定：代表会议的代表，除极大部分由各解放区依地域选出外，解放区各种性质的人民团体，如工人团体、农民团体、妇女团体、青年团体、文化团体、宗教团体等，都有权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此外，筹委会并热诚欢迎中国的各党派，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的人民团体，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团体，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团体，南洋及其他海外各地的华侨团体，都能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参加这个关系中国前途的会议。

全解放区的同胞！全中国的同胞！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使命，如我们所已再三宣布的，就是统一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全国联合政府的成立。随着解放区与同盟国对日战争的进展，随着中国人民争取中国民主事业的进展，上述的这些重大的使命，是一天比一天更加重大了。我们坚信，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为中国的最后胜利与全国民主开辟广大的道路。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将是一个加强抗战、配合盟国、准备对日反攻的大会，将是一个加强团结制止分裂与内战的大会，将是一个促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之迅速结束与民主的联合政府之迅速产生的大会。我们要求全解放区的人民与全中国的人民一致起来协助、监督和指导我们的工作，迅速地慎重地选出自己的代表，以便使这个伟大的会议得以如期召集，并获得伟大的胜利！

（原载1945年7月14日《解放日报》）

延安总部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七号命令

（一） 第一号命令

新华社延安10日电：延安总部顷发表命令如下：

延安总部命令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顿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顿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附近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以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后，率队反正听候编遣，逾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理，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总司令 朱 德

1945年8月10日24时

（二） 第二号命令

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总司令 朱 德

1945年8月11日8时

（三） 第三号命令

延安总部命令第三号

为配合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进入内蒙及绥热察等地作战，并准备接受日、“蒙”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

二、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

总司令 朱 德

1945年8月11日9时

（四） 第四号命令

延安总部命令第四号

为实现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之敌伪军，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与进入太原之任务，我命令：

一、所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

二、在达成任务时，应克服一切困难，击破前进路上一切敌伪之阻碍，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

总司令 朱 德

1945年8月11日10时半

（五）第五号命令

延安总部命令第五号

为肃清中国境内交通要道之敌伪军队，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所有沿北宁路、平绥路、平汉路、同蒲路、沧石路、正太路、白晋路、道清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路、广九路、潮汕路等铁路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伪交通要道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在执行上项任务时，应克服一切困难，击破前进路上一切敌伪之阻碍，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

总司令 朱 德

1945年8月11日11时

（六） 第六号命令

延安总部命令第六号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

现地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总司令 朱 德

1945年8月11日12时

（七） 第七号命令

延安总部命令第七号

当我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敌伪侵占之城镇要塞后，我命令各部队司令员负责实施下列紧急军事管制。

一、规定管制区域，指定警戒部队，委任卫戍司令，负责实施军事戒严。

二、划出安置俘虏及日本居留民区域，实施军事管制。

三、登记及逮捕战争罪犯及卖国奸贼。

四、控制一切军事性质的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兵营及要塞，严禁自由出入。

五、控制一切轮船、火车、军用汽车、水陆码头及邮政、电话、电报、无线电机关，实施严格军事检查。

六、控制一切军用和商用的飞机场及其仓库，派兵驻守，严行保护。

七、维持秩序，保护居民，严防反动破坏分子及残留敌探奸细进行破坏活动，如有发现，应行军事制裁。

八、居民中如有抗日武装组织，应令其报告人数武器，归该地区卫戍司令指挥。

九、通告居民不得藏匿敌伪分子及散枪武器，一经发现，应予严惩。

十、管制粮食，煤炭及水电，严禁奸商囤积操纵。

总司令 朱 德

1945年8月11日18时

当前的紧急任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解放日报》社论

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空前未有的急剧变化的时候。随着苏联对日本的宣战，百万红军以迅雷之势进入东北；不出两天，日寇政府即在不可抗拒的盟军威力前面和完全毁灭威胁前面，向盟国举手投降。这标志着：远东反日战争的胜利结束即将到来了！八年来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解放出来，争取独立自由的日子已经降临了！

在兹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我们中国人民应当清醒地认识当前的严重任务，坚定不移地奔赴自己的解放目标。日寇政府已经要求投降盟国；但是日寇的庞大武装还待迅速解除。在我国战场上，五十八万敌军和将近八十万的伪军，还盘踞着广大地区和许多城市交通要道。我们要依据波茨顿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迅速解除敌伪军的武装，收复一切敌占城镇交通要道，把沦陷区一万万六千万同胞赶快解救出来。这便是中国人民，首先是解放区军民义不容辞的紧急任务。

我们解放区军民，具备着负担这一紧急任务的有利条件。我们有一百万英勇善战的正规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为先锋，有数百万民兵作后备，有一万万人民有组织力量为基础，有沦陷区广大人民和地下军的活动为内应，还有我们的同盟国家，特别是在东北作战的苏联红军的互相配合声援。我们深信，在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人民军队统帅朱德同志的领导下，解放区军民，一定能够肩负当前的紧急任务，并胜利地完成它。

现在各解放区的军队，正在遵照着延安总部的命令，向敌占区城镇和交通要道全面进展。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在这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进军中，要坚决的大胆的迅速的进攻，勇敢勇敢再勇敢，就是我们的口号。战略防御的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要向中心城市交通要道举行大进攻，对这一点，如果认识不足，如果稍有犹豫，稍有动摇，就会为将来遗下很大祸害。你们一定要坚决扫除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逼迫敌伪军向我投降，彻底消灭拒绝投降的敌伪军，收缴敌伪军的武装，占领城镇和交通要道，摧毁敌伪组织和反动势力，维持革命秩序，建立人民政权！我们解放军所到之处，要经常不懈地以模范的纪律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取得当地人民亲密无间的合作！

沦陷区的同胞们！地下军的指战员们！盼望了许多年的报仇雪耻的日子已经到来了！隐蔽埋伏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你们所热烈盼望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在向你们的地区前进！赶快配合解放军，解除敌伪军的武装，并把自己武装起来！

旧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同胞们！要一刻不放松地加强支持前线的工作！要热烈地援助进攻的军队，动员人民参军，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属，解决军队的物质的困难！扩大和加

强地方军和民兵，保卫后方，并扩大主力兵团的后备！要贯彻减租减息，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要加紧生产，历行节约，积蓄粮食和物资，借以供应目前大进军的需要和战争结束后长期建设之用！

为了保证完成上面所说的紧急任务，我们必须要加强行动的统一和集中。目前解放军向敌占区全面进军，规模的巨大，工作的复杂，都为以前所未有。各兵团之间，各地区之间，党政军民之间，都需要统一和集中的指导下协调动作。这方面如果我们做得不够，便会减弱我军进攻的速度，妨碍紧急任务的执行。因此，在前方和后方的同志们，都必须认识统一和集中的重要性，坚决抛弃长期游击战争中养成若干不统一不集中的习惯。在大规模的集中行动中，必须服从上级的统一指挥，很好地照顾友邻，任何各自为政，闹独立性，只顾局部、忽视全体的倾向，必须加以克服。

从乡村到城市，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我党七次大会所预见的转变，由于时局的突变，现在要迅速加以实现。我们过去长期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所习惯使用的一套办法，已不足以适应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的城市工作和大兵团运动战的新环境了。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勇于转变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细心研究转变的途径，掌握新的一套办法，并按照具体情况，坚决地和有步骤地实行转变。只有如此，我们的主观指导，才能站在运动的前面而不是落在它的后面；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胜任愉快地完成我们的艰巨任务。如果我们不向这方面努力，无视于今天局势划时代的巨大变化，满足于现有的一套，不愿实行转变，或者转变的不够坚决，那末一定会给我们的工作以不小的损失。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今天时局的一个显著特点：今天中国战场上的大反攻，是在全国性的民主的联合政府还没有成立的情况下进行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解放区军民负担着把很大部分敌人占领区解放出来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我们完成这样的任务时，还会遭到许多阻碍和困难。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解放区军民应该更加放手，更紧张地工作，用一切力量迅速解除敌伪军的武装，占领城镇和交通要道，解放沦陷区广大人民，把他们武装和组织起来，猛烈地扩大解放区，壮大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越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也愈有保证。

勇敢前进！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

[附] 雅尔塔协定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代表美、英、苏在雅尔塔签定一项包括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政治条件的协定。此协定全文如下：

苏美英三强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一九〇四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转自《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

[附] 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美英中三国政府领袖同意对日本发表公告，促其立即无条件投降，公告原文如次：

美英中三国政府领袖公告

(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残毁。

(四)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

（十一）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可准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当即撤退。

（十三）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

（转自《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

[附]苏联对日宣战

[塔斯社莫斯科 8 日电] 8 月 8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长莫洛托夫接见日本大使佐藤，并代表苏联政府对他发表下列宣言，请其通知日本政府：

“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与投降之后，日本是依然坚持继续战争的唯一强国。美、英、中三大强国今年 7 月26日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失去一切根据。鉴于日本拒绝投降，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的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苏联政府忠实于其对盟国的义务，接受了盟国的建议，并参加盟国今年 7 月26日的宣言。苏联政府认为苏联政策的这一方针，是能使和平更加接近、解决各国人民进一步的牺牲与苦难、并使日本人民避免德国在拒绝其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受的那些危险与毁灭的唯一方法。由于上述各点，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 8 月 9 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1945年 8 月 8 日。”

莫洛托夫对佐藤声明：与此同时，苏联驻东京大使马利克将通知日本政府苏联这一宣言。佐藤允将苏联政府宣言通知日本政府。

（原载1945年 8 月 9 日《解放日报》）

朱彭总副司令致电蒋介石
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13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照后一个命令，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才象个样子。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军队，不是发给我们，而发给我们的另是一套。朱德在本月10日下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在"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的，无疑这是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的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的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　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朱总司令再电蒋介石
警告其收回错误命令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朱总司令顷致电蒋介石，要他制止内战。其办法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受降。而蒋介石军队，则接受被蒋军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朱总司令认为这是避免内战的最好办法。并向蒋介石提出严重警告，如果蒋不这样办，势将引起不良后果。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顷致电蒋介石，提出六项要求，并要蒋公开承认错误，收回十一日错误命令，原电如下：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顿宣言条款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提起你注意目前中国战场上的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一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十九个省区内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海岸。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中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伪。在作战中，我们自今犹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且更以九十四万大军包围和进攻它们。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虽受尽了敌伪及你的军队两方面夹击之苦，但丝毫未减弱他们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意志。中国解放区人民及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你及你的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纷争，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均为你及你的政府所拒绝。凡此一切，我们是非常之不满意的。

现在敌国投降将要签字了，而你及你的政府仍然漠视我们的意见，并且于8月11日下了一个非常无理的命令给我，又命令你的军队以收缴敌人枪械为借口大举向解放区压迫，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凡此种种，使得我们不得不向你及你的政府提出下列的要求：

一、你及你的政府与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你及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

区及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协定和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及其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顿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我们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我在8月10日下了一道命令给中国解放区军队，叫他们努力进击敌军，并准备接受敌人投降。8月15日，我已下令给敌军统帅冈村宁次，叫他率部投降，但这只限于解放区军队作战的范围内，并不干涉其他区域。我的这些命令，我认为是非常合理与非常符合中国及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请求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为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

六、请求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及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民主党派至今被你及你的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及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此外，我在8月13日发了一个电报给你，回答你在8月11日给我的命令，谅你已经收到了。我这里重复声言，你那个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你在8月11日叫我的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打敌人了。但是不但在8月11日，就是在今天（8月17日）日本政府还只在口头宣布投降，并没有在事实上投降，投降协定尚未签字，投降事实尚未发生，我的这个意见，和英美苏各同盟国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就在你下命令给我的那一天（8月11日），缅甸前线英军当局宣布："对日战争仍在进行中"。美军统帅尼米兹宣布："不仅战争仍是存在的，而且具有一切毁灭结果的战争，必须继续进行"。苏联远东红军宣布："敌人必须粉碎，不要留情"。8月15日，红军总参谋长安托诺夫上将还作了下列声明："8月14日日皇所发表的日本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发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下令其军队停止敌对行为及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时，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鉴于上述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进行攻势作战"。由此看来，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是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及同盟国的共同利益上，坚决的彻底的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英国、美国、苏联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我向你声明：我是一个爱国军人，我

不能不这样做。

以上各项，我请求你早日回答。

朱　　德

新华社记者揭破蒋伪合流反对中国人民的大阴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新华社延安十四日电**］新华社记者顷揭破蒋伪合流反对人民的大阴谋。新华社记者说：谁都知道，今日的南京伪政权就是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的一个双生子。它同重庆蒋政权的分歧，只是在对日态度问题上，它们对于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则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绝对仇视中国人民及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它们最害怕中国人民的觉醒与解放，最痛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真正爱国的民族战争。不论是南京伪政权，或是重庆蒋政权，都是彻头彻尾反人民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反动政权。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即在它们过去暂时对立的情况下，仍然暗中保持着它们的亲属关系，并且经常以同情的态度互相注视着对方反人民与反共的一切活动。现在日寇就要倒台了，它们中间的分歧也就要消失了，因而它们又要合在一块，共同反对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新华社记者说：蒋介石本月十一日给所谓“地下军”及伪军的命令，就是蒋伪合流共同反对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大阴谋的公开暴露。他命令各色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试问要伪军“维持”的那种“治安”，不就是伪军在日寇指挥下“维持”了八年的那种“治安”吗？试问，要伪军“保护”的那些“人民”，不就是日寇和伪军一向“保护”的那些奴事日寇，鱼肉人民，为非作恶，发财致富的那些汉奸卖国贼吗？总之，日本人倒了，但是封建、买办、法西斯政权的“治安”必须“维持”，汉奸们的权益必须“保护”——这就是蒋介石命令各色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真正意义。而这就是蒋介石给与各色伪军趁机赎罪努力自勉的具体任务，这证明蒋介石命令之目的所在，是在鼓励各地伪军继续其过去在敌统治下的那种反对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滔天罪行，以便于他的大军能够从峨嵋山上源源东下，及时的赶到目的地，然后协同伪军向解放区人民及其军队举行一致的进攻。也就是这个目的，这个蒋介石又在同一天给八路军各部队发出了“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的所谓“命令”。照他的意思，伪军比八路军还好些，八路军比伪军还不如些，所以他把“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责任交给伪军，却叫八路军“驻防待命”。就是说，不准八路军打日寇，打伪军，只许在那里等着，现在被敌伪打，将来被蒋介石打。新华社记者说：蒋介石这种认贼作父，视民如仇的想法，中国人民已经认识清楚了。蒋介石在同一天里给八路军与给伪军下的两个命令，就是他背叛祖国发动内战的动员令。但是中国已经喊出了响亮的口号，这些口号就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坚决制止内战，废止一党专政，与建立联合政府。在这些口号下，蒋介石的阴谋将遇到失败，中国人民定要胜利。

（原载1945年8月15日《解放日报》）

朱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南京冈村宁次将军：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顿宣言条款宣布投降。

（二）你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三）关于投降事宜，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五师大悟山地区，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四）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之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

（五）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但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

（六）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七）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东、华北、华中、及华南的日军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　朱　德

（原载1945年8月16日《解放日报》）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今日以说帖一件分送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英驻华大使薛穆爵士，苏驻华大使彼特罗夫，请其转达美、英、苏三国政府。说帖原文如下：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宣布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谨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联合王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送出下列的说帖。

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我们请求你们注意目前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国民党政府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组织了一百万以上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十九省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自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及沿海口岸。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人。在作战中，我们至今犹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百分之六十九（东北四省不在内）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敌伪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且更以九十四万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我们中国解放区的全体军民，虽然受尽了日顽两方面长期夹击之苦，但丝毫未减弱我们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意志。中国解放区人民、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纠纷，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均被中国国民党政府所拒绝。

现敌国投降瞬将签字，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有理由向贵国政府及贵国人民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

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为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的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已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

（转自《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

庆祝抗战最后胜利

（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

《解放日报》社论

9月2日，在美英中苏等胜利的同盟国家代表面前，日寇政府代表正式签署了解除武装、履行波茨顿宣言的投降文件。目前全世界各国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庆祝对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迎接和平建设时期的到临。

我们中国人民，半世纪以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凌欺压。1894年甲午之役，日寇利用满清政府的昏庸腐朽，突然发动战争，击破了中国的海陆军，逼迫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二百兆两，日寇并于是时占领了朝鲜，到了1911年就灭亡了它。在1915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寇又利用袁世凯的称帝野心，逼迫北京政府于5月9日签定了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奇耻大辱的二十一条，这是我中华民族的国耻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寇阴谋并吞中国的活动益加狠毒。敌酋田中的奏折竟肆无忌惮地宣布“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东亚，欲征服东亚，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计划。这一计划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开始实施，攘夺了我东北四省。1937年“七七”以后，日寇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蹂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兽蹄所至，庐舍为墟。日本帝国主义给予我中华民族的损失和耻辱，实在是书不胜书。现在这个万恶的敌人，已被中苏美英的联合力量所打倒了。中华民族已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独立生存的严重威胁已被消除。半世纪来，我中华民族所受到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现在报仇雪耻了。这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百年来未有的大事，值得全国同胞的热烈庆祝。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表现了无比的英勇和坚毅。在前线，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流血战斗；在后方，工农大众、知识界和产业界努力工作；海外爱国侨胞则踊跃输将，援助祖国抗战。全中国同胞这种英勇奋斗的事迹，将永远垂诸史册。

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作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自其成立之日起，即站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斗争的最前线，举其显著者，1925年5月上海日本内外棉纱厂工人的伟大罢工，即为中国共产党所组织领导。在日寇侵凌日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中国共产党首先倡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屈不挠地为实现这一统一战线而工作。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当时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下，中国共产党虽遭受种种压迫，但仍英勇坚决地为组织抗日战争而努力工作。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联合抗日军民，建立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忍的战斗。在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大规模的反日罢工，支持了十九路军的抗战。1933年中国共产党向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建议在三个条件下停止内战，一至抗日。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及全国同胞组织

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是年12月领导了平津学生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求停止内战，并实行两党合作，共同抗日。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宣布了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由于共产党的不断努力，中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终于形成了国内的和平团结，发动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去岁以还，中国共产党更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联合政府的主张，以便克服内战危机，团结全国一切抗日民主的力量，完成抗战建国的伟业。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95%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收复二百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尤其值得称道的，早在1938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曾在其名著“论持久战”一书中，运用了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预见，详尽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规律，指出了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抗战的战略方针应当是坚持持久战，争取胜利的关键在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的路线。八年来的抗战历史，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指示的正确性。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其对抗日战争的正确指导路线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报告，曾以一句话概括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走团结与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现在日本侵略者已经被打败了，中国人民就要建设新中国。为了打败侵略者，要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为了建设新中国，也要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中国共产党日前发表的“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心口号——和平、民主、团结，并提出了为了巩固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所必需的紧急措施。这一宣言，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和在和平建设中，都走团结与民主路线的又一证明。

经过八年的战争，全中国创痍满目，百废待兴，全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和平、团结与民主，以便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但是已被打败的日本侵略者至今在中国战场上还没有放下武器，并且还在尽力挑拨中国内战，破坏中国内部团结，阻挠中国民主运动，保存和继续培植其走狗——亲日派势力，力图保持其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待机卷土重来，死灰复燃，再度侵略与奴役我中华民族。对于这一恶毒阴谋，全国各党派和同胞们必须高度警惕，并予以有力的回击。

让我们全中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大纛下，万众一心，迈步前进，扫除一切障碍，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附] 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

我们谨奉日皇、日本政府与其帝国大本营的命令，并代表日皇，日本政府与其帝国大本营，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元首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宣布的，及以后由苏联附署的公告各条款。以下称四大强国为同盟国。

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我们兹命令驻扎各地的一切日本武装部队及日本人民，即刻停止战事，保存一切舰艇、飞机、资源、军事及非军事的财产，免受损失，并服从同盟国最高统帅，或在他指导下日本政府各机关所要求的一切需要。

我们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即刻下令日本的一切武装部队及不论驻在何地的日本控制下的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他们自己及他们所率的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

我们兹命令一切民政的、军事的与海军的官员，服从与实行盟国最高统帅认为实践这一投降所适当的一切宣言、命令与指令，以及盟国最高统帅及在他授权下所颁布的一切宣言、命令与指令，并训令上述一切官员留在他们现有职位，除非由盟国最高统帅或在他授权下特别解除职务者外，继续执行非战斗的职责。

我们兹担承日皇、日本政府及其继承者忠实实行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文，并颁布盟国最高统帅所需要的任何命令及采取盟国最高统帅所需要的任何行动，或者实行盟国代表为实行波茨坦公告的任何其他指令。

我们兹命令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即刻解放在日本控制下的一切盟国军事俘虏与被拘禁的公民，并给予他们保卫、照料，维持并供给运抵指定地点的运输工具。

日皇与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将服从盟国最高统帅，盟国最高统帅将采取他们认为实行这些投降条款所需要的一切步骤。

(转自《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

[附]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战场的五个统计材料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抗击日军兵力统计表

一九三七、七——一九四五、八

年　　代	全部侵华日军（只计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四区，东北未计入）	人民解放军抗击日军兵力	占侵华日军全部的比例
1937	500,000		
1938	680,000	400,000	58.8%
1939	860,000	540,000	62%
1940	800,000	470,000	58%
1941	610,000	460,000	75%
1942	550,000	332,000	63%
1943	600,000	350,000	58%
1944	730,000	468,000	64%
1945	1,088,500	758,700	69%

注：1. 我军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出师华北，因此时敌人主要是向我全国进攻，故未作抗击比例。

2. 此材料不包括全部为我所抗击之日本关东军数字。

3. 此系根据延安总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材料。

4. 此材料曾经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和平谈判时期公布过。

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抗击伪军兵力统计表

年　代	人民解放军抗击伪军数	人民解放军抗击伪军百分比
1938	78,000	100%
1939	145,000	100%
1940	225,000	100%
1941	348,000	100%
1942	555,000	100%
1943	735,000	90%
1944	782,000	95%
1945,8止	955,782	95%

注：1. 材料时间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八月。
2. 材料内容包括华北、华中、华南三地伪军。
3. 统计时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延安总部材料）。
4. 此材料曾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和平谈判时期公布过。

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战绩统计表

日伪军 ＼ 数目 ＼ 项别		日　军	伪　军
敌伪兵力损失	毙　伤	520,463	490,130
	俘　虏	6,213	512,933
	投诚反正	746	183,632
	合　计	527,422	1,186,695
主要缴获	长短枪	682,831	
	轻重机枪	11,895	
	各种口径炮	1,852	
作战总数		125,165	

注：1. 材料时间：一九三七年九月——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
2. 材料内容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战绩。
3. 统计时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延安总部材料）。

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力逐年增长统计表

年代 \ 兵力 \ 部队	八路军	新四军	华南游击队	合计
1937	80,000	12,000		92,000
1938	156,700	25,000		181,700
1939	270,000	50,000		320,000
1940	400,000	100,000		500,000
1941	305,000	135,000		440,000
1942	340,000	110,960		450,960
1943	339,000	125,892	4,500	469,392
1944	507,620	251,393	20,730	779,743
1945	1,028,893	268,581	20,820	1,318,294

各解放区民兵统计：1944年　1,685,384 人
1945年　2,687,698 人

注：此材料是根据一九四四年叶参谋长与中外记者团谈话时所公布的数目，加上一九四五年的材料。

五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区面积人口统计表

年代	面积	人口
1944	935,960平方公里	91,500,000
1945	956,960平方公里	95,500,000

注：解放区面积人口仅有该两年材料。

（《新华月报》1951年9月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9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编
页数=610
SS号=10273511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
目录
目录